第五卷・1962-196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歷史的變局

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錢庠理 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

——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1962–1965)

錢庠理 著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1962–1965)
錢庠理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88–17274–5–9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發行及總代理：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箱：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5
Historical Turn: Responding to Crisis and Combating Revisionism (1962–1965) (in Chinese)
By Qian Xiangl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17274–5–9

Publisher: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序：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金觀濤

經過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終於分批出版、與讀者見面了。對我來說，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視為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把當代中國人經歷的驚心動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經歷了苦難，又見證了啟蒙時期思想的風雨雷霆，這一切理應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然而我深知這一工作又是多麼困難。

首先，作者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近年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和口述歷史資料，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與中共高層決策有關的檔案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為寫作帶來困難。在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除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為複雜和重要的，是對史料的辨偽和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只有少數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專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十分幸運的是，本套書的撰寫正是依靠了這批有深厚檔案功底、又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家。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省及市縣檔案資料館，搜集整理檔案並對史料辨偽。史料之豐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書的重要特色。

歷史研究者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搜集史料、整理檔案只是第一步。歷史學家在研究和寫作中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如果不能做到對歷史場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內心

重演歷史事件展開過程以及理會當時支配事件展開的普遍觀念，就無法接近歷史的真實。本套書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論述主線，這二十餘年正是毛澤東思想支配中國的時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令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於本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近幾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這些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氛圍，這就使他們具備了某種比西方史家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優勢。當然，作者要發揮這種優勢，僅僅停留在感性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某一種意識形態中走出來、盡可能價值中立地審視過去，達到反思的高度，以獲得超越的視野。開始注意到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與重大社會事件的互動，特別是這些事件是如何從中央決策到地方、再到基層展開的，是本套書的另一特色。由於各卷作者是獨立寫作，分批出版，雖然現在對全套書作出整體評價尚為時過早，但是，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中國人終於開始為不尋常的二十世紀中國撰寫大型歷史著作了。

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設主編，以便各位作者在寫作時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統一風格，使十卷著作組成連續的整體。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在動筆之前充分討論各卷內容，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工作會議，切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今，我仍不能忘懷一次又一次的國史寫作討論會。窗外是北國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會議室中不分晝夜地討論，最後形成會議紀要。這一場景使我想起1970年代末青年時代和朋友的徹夜長談。很多時候，大家就某一觀點、細節甚至是提法，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使我十分感動的是，無論在討論中發生多大的爭論，甚至是立場和價值上的分歧，最後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實之上得到統一。根據時段，本書大約以兩三年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兩位作者撰寫，而其他作者都把自己對該時段的見解和史料提供給該卷作者，整個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一種今日中國學術界罕見的真誠合作精神。在此意義上講，這套書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組織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這套書

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沈志華和李丹慧夫婦，從確定撰寫計劃到尋找適當的作者以及整體工作的協調，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其次，我要感謝青峰和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強先生、林立偉先生、張志偉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張素芬小姐。他們在青峰的帶領下，以巨大的熱忱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否則，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編輯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還要感謝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本書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方正兄，該書從醞釀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雖已退休數年，但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的出版，認為它對香港中文大學有着重要性。在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時期那種注重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意義的「中大精神」。

這套書出版之時，我也到達退休年齡，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我想指出的是，由於可以看到的檔案和其他種種限制，這套書只寫到 1981 年。如果不談此後發生的波瀾壯闊的 80 年代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 1989 年震驚世界的事件，我們仍無法理解今日中國和世界。在這一意義上，僅僅由前十卷組成的二十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不完備的，寫史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歷史傳統，但很少有史家為當代寫史，故這套書的出版是一種新現象。它說明中國歷史學家已走出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並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歷史反思意識已經產生，並開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後繼者。

2007 年 12 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錄

總序 ..... 金觀濤 ix

導言 1

第一章　天人之惑 23
一　問天 24
二　問地 33
三　問人 42

第二章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七千人大會」及其圍繞大會所產生的分歧 51

一　為甚麼要開七千人規模的大會 52
二　一致耶？分歧耶？ 66
三　矛盾與選擇 78
四　分歧在延續 95
1 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本身的質疑 100
2 對錯誤表現形式的揭露 101
3 對錯誤發生根源的認識 101
4 挑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102
五　劉、毛、林：三個各有「弦音」的講話 104

六　並非尾聲的高潮 138
1 工農業生產高指標到底發生在甚麼時候？ 141
2 關於「第二次躍進」的起因 142
3 關於高指標產生的影響及其糾正之困難 143
4 關於產生錯誤的原因 144
5 關於「反傾向鬥爭」 145

第三章　「非常時期」 151
一　西樓會議 151
二　重設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159
三　著名的「五月會議」 167
四　非常措施 173

第四章　包產到戶：中國社會主義初期的一個癥結 179
一　歸去來兮責任田 179
二　「河北有個胡開明」 189
三　風起高牆 195
四　攤牌 202

第五章　調整風雲 209
一　甄別平反與糾正錯誤 209
二　彭德懷上書風波 221
三　「脫帽加冕」 226
四　早春天氣乍暖還寒 239

第六章　緩和與霜凍 245
一　出現緩和 246
二　平波之下的湧浪 251
三　王稼祥的建議書 261

第七章　重提階級鬥爭 267
一　何來憂患？ 267
二　「東臨碣石有遺篇」 271
三　「警鐘長鳴」 280

第八章　抓住龍尾 289
一　尋找階級鬥爭 290
二　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有了綱領 297
三　夾縫中的經濟調整 305
四　階級鬥爭樣板 308
五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 313
六　劉少奇動了「真格」 320

第九章　對決 331
一　引火線 332
二　反擊 342
三　破裂 347
四　「三家條約」 355
五　公開論戰 358
六　赫魯曉夫下台 365
七　斷裂 371

第十章　緊張的政壇 377
一　批鬼戲 377
二　批「兩界」 383
三　「兩個主席吵架」 395
四　「二十三條」 404
五　醞釀「新革命」 407
六　點火 412

七　羅瑞卿事件之謎 419

第十一章　面對「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世界 433
一　走向大分化 433
二　「最冷的冷戰」 441
1 關於中國的核武器計劃 444
2 中美敵對的第二個問題：越戰的迅速升級 451
三　尋找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 454
四　「動盪」和「分化」環境下中國國內經濟運行的突然轉軌 ... 459
五　國際與國內政治的一種特殊交互作用 473

第十二章　需要「精神」的時代 481
一　時代精神的樁柱 482
二　時代精神的標誌 488
三　時代精神的異化 497

後記 509

附錄
大事記 515
參考文獻 527
索引 533

導言

也許，用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觀感，可以避開人們習慣了的歷史思維定勢，從另一個角度勾勒二十世紀60年代前半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面貌。這種辦法，如同從地球觀察月亮或其他太空物體一樣，由於陽光的折射，使它們顯得更立體、明亮和透徹。

如果從本卷開端的1962年講起，那麼有這樣幾件事情，是中國以外的世界所難以忘卻的：

第一件事。

1962年年中，從廣東省深圳以及大陸同香港毗鄰地區，越界私逃香港的人數突然猛增。在高峰期，一周的外逃人數幾乎等於此之前一年的總數。香港警方當時極為震驚，試圖強力加以阻止。但私逃客如過江之鯽，「破網而入」。據今天見到的一些材料透露，從1954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5萬人次，逃出14.6萬多人。其中，1962年的偷渡外逃是第一個「高潮」。當時，廣東全省共發生外逃事件11.7萬多人次，逃出3.9萬多人。這樣一個數字，同1979年上半年發生的最大規模的逃港事件相比，其成功出逃者的數量仍要多出近一萬人。[1] 毫無疑問，因為有了這樣一大批人湧入香港，香港的1962年夏季，變得緊張、惶惑和繁忙了。可以想像，那些偷渡者們隻

1　楊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廣東群眾偷渡問題研究〉，全國黨史系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身或多人鋌而走險，從一切可以出境的地方，用一切辦法走向一條可能是不歸路。他們絕大多數是來自廣東、福建的農民。在他們眼裏，香港就是天堂。那裏有飯吃，有錢賺，也更自由。為此，他們付出了慘重代價：拋家捨親、東躲西藏、慘對牢獄、平遭白眼。可這一切他們都忍了。

大陸人大量私逃香港，不僅讓港英方面措手不及，更讓美國人震動。開始時，美國情報部門搞不清為甚麼這時會有這麼大量的大陸人，在一個非常集中的時間突然湧向香港？繼而，他們猜測，是大陸政府有意而為，縱容人們逃亡香港。不管怎樣，美國人對這個突然而來的「外逃潮」疑慮甚多：大陸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那裏的飢餓狀態到底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否還能有效地控制社會？人民的反抗情緒到底有多高？台灣蔣氏父子一直在試圖反攻大陸的計劃真的有了可行之機？

後來，美國人認識到，大量的大陸人集中外逃，基本原因就是飢餓。不管進行怎樣的評估，大陸人的飢餓程度和範圍，還是超出了一般人想像。這一點，是美國人從逃港的大陸人那裏逐漸獲得大量第一手情報，才最後予以證實了的。他們當時曾得出一個結論，即大陸的經濟困難和糧食緊缺，將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動亂。對共產黨政權來說，這將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不過，美國高層並沒有因此而制定某種行動計劃，來立刻顛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政權。他們還是保持着「冷靜觀察」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

歷史證明，美國決策層的這種態度是明智的。中國雖然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挫折，雖然人民的生活曾一度極端困苦，但國家沒有發生動亂。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認同。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間有廣泛的號召力。人民相信，領導他們推翻了舊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這個國家的領導力量，是國家富強和社會安定的希望所在。甚至，共產黨在領導人民糾正所犯錯誤，在努力實踐社會平等的諾言時，人民對共產黨反而更加信任和熱愛了。在1949年後的整個時代，這完全是真實的。

因此，美國人不但沒有採取「顛覆」動作——這是通常大陸中國人習慣接受的意識形態宣傳——企圖在那個特定時期趁亂搞垮「紅色中國」，反而在60年代初期的對華策略方針上，逐漸有了「現實」的苗頭。所謂「現實」，就是傾向於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現實存在——在此之前，美國政府至少在對外宣示上，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實存在的。可是，在1962年前後，也就是肯尼迪政府開始執政後，他們有所變化。在那時，他們甚至改變了對中共政權的稱謂，正式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這意味着，美國決策層意識到了早晚要同「紅色中國」打交道。無視這個共產黨統治的大國，是沒有道理的。二十世紀6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中蘊含的這種微妙變化，現在仍未細緻嚴謹地為中國大陸的主流歷史話語所接受。這多少有些遺憾。

儘管如此，美國從1962年中國內地人大量逃港事件中，還是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在此之前，中國大陸是極端封閉的。外界很少能透過冷戰鼓吹者所宣揚的所謂「鐵幕」，看到中國大陸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而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前期，通過大陸大量逃港人員，美國情報部門終於獲取了關於中國內地情況的真實情報。這些情報經匯總、梳理和分析後，以摘要形式報送給總統。今天，研究者可以沒有任何阻礙地在美國檔案館裏看到這些情報彙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情報彙集在美國最高決策中曾發生過重要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說，1962年大量內地人出逃香港，不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局勢，同時也造成了一種「蒲公英現象」：被風吹起的蒲公英，搖搖曳曳飄向遠方。它們把稀缺的信息帶到了外界。那麼，這些信息究竟怎樣影響了外界對中國的看法？它又怎樣涉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以及這種信息所包含的寓意，在中國內部反映的是甚麼樣的矛盾衝突與現實發展，就將是我們所特別應予關注和揭示的了。

第二件事。

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發生武裝衝突。中國軍隊迅猛突破印軍構築在中國境內的地堡工事，擊潰和俘獲了大量印度軍事人員。之後，中國軍隊又迅速撤回到實際控制線後二十公里，並宣布停火。這件事瞬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

《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作者澳大利亞人馬克斯韋爾，他對中印邊界衝突作了這樣的評論：「中印邊界爭端是二十世紀中葉國際關係史上富於戲劇性的一段。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亞洲的兩個偉大的新共和國，儘管政治性質不同，似乎已經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但後來卻為了幾塊荒涼的、艱險的、沒有甚麼價值的土地爭吵起來，還打了一場短促而劇烈的邊境戰爭。印度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2] 這個評論表達了當時世界上相當一些人對中印邊界衝突的觀感。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尼赫魯總理有着極端強烈的大國欲望。他拒絕同當時相互冷戰的兩個集團聯繫在一起，而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本來，尼赫魯的目標很明確：如果要集中發展本國經濟，就需要在北方同中國保持一條友好、和平的邊界。然而，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使他變得輕率固執起來。他執意要把歷史遺留的有爭議的邊界問題，看成是民族尊嚴和自尊心的重大問題，從而不惜一切地要在他認為的屬於印度領土的那些沒人居住的高山上，向中國一方推進，挑起戰爭。不幸的是，邊界衝突使印度支出了巨額軍費，並在軍事失敗的後果中，損失了本來應有的國際國內威望。同北方強大的中國交惡，也在地緣因素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遺留了惡果。因此有評論這樣說：「支撐尼赫魯的各項政策的拱門整個垮下來。尼赫魯的統治地位也會隨之告終。」[3]

中印邊界衝突對中國也造成了影響深遠的複雜後果。已有大量著作對這場短暫戰爭進行過描述。但如果從世界對這場衝突的看法而言，中國當時卻承擔了更為沉重的壓力。因為，無論蘇聯還是世界的輿論，都在給中國施壓。而在這其中，與中國有着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聯，不但不站在中國的一邊，反而以所謂的「中立」立場，譴責了中國的行為。早在1959年8月底朗久事件發生後，塔斯社就不顧中國方

---

2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Maxwell Neville）：《印度對華戰爭》，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71），頁1。

3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上冊，頁1－2。

面的勸阻，堅持發表了一個聲明。聲明表面上對兩方都未傷害，只是說蘇聯對所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並對有人（指西方報刊）利用這個事件離間兩個亞洲國家關係、破壞和平共處的思想而感到惋惜。可在中國人看來，蘇聯的做法非常值得懷疑：既然中蘇是同盟國家，為甚麼你蘇方要發出這樣一個不問是非曲直的聲明？朗久在麥克馬洪線中國一側，而你蘇聯卻對衝突雙方表示遺憾，這就在事實上偏袒了製造事端的印度一方，是在實際上「拉偏手」。

中國堅持認為，蘇聯這樣做，是出於它正同美國人進行的「示好」行為：赫魯曉夫像孔雀一樣，張開它美麗的尾羽，向美國人展示自己的亮麗。可是，正如中國的一個俗語所說，孔雀再美麗，也無法在張開尾羽的同時，掩飾住難看的屁股。赫魯曉夫當時極為自信地聲稱，他已經找到了一種辦法，可以把作為解決國際爭端手段的戰爭徹底消滅掉。而在1959年整個夏季，赫魯曉夫都在尋求同美國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當年8月，他完成了自己十分得意的美國之行，號稱建立了「戴維營精神」。正在這樣一個興致勃勃的時候，發生了中國同印度的邊界衝突。之後的三年裏，中印之間在荒涼的喜馬拉亞山麓和帕米爾高原上緊張對峙，直至發生1962年大規模軍事衝突。赫魯曉夫似乎有理由認為，中國的行動「破壞」了他「戰爭可以避免」的諾言。而中國則認為，蘇聯的立場是有意貶損中國。赫魯曉夫宣稱的美麗的「三無世界」，不過是一廂情願。他的「拉偏架」的做法，猶如孔雀的屁股，是掩不住它的醜陋的。

冷戰中結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取向與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幾乎在一開始就困擾着這個陣營。即使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人們事實上也難以作到「鐵板一塊」。50年代的波蘭、匈牙利事件，充分說明了「陣營」沒有強求的統一，只有「壓服」下的歎息。而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在共產黨陣營的整個對內對外策略上，形成了巨大的分歧點。特別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更造成了中蘇、蘇東國家之間極大的意識形態爭端。此外，人們對永遠服從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蘇聯的意志，各具自己的想法。更何況，所謂共同意志，長期以來大都

對蘇聯有利。因此，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的矛盾，不可能融解和調和，正如中國的那句老話所說，這是「禿子頭頂上的虱子，明擺着的」。

事實上，中國早在1956年前後，就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了。不管這條路是否真的找到了，但中國試圖擺脱蘇聯的行動「軌跡」是明顯的。至少，中國不想亦步亦趨地跟隨蘇聯。特別是在沒有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世界，人們敢想、敢說和敢做的欲望被大大激發了。對毛澤東本人說來，以他的獨特經歷和性格，特別是他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中所獲得革命成功的威望，使他不可能屈從斯大林後輩們的意志。他理所當然要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進程中做出一些不同凡響的業績來，用他自己的那句名言說，就是「他們（蘇聯）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

在國家現實利益上，中蘇之間也有深深的芥蒂。且不說老沙皇，就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30年代中對中國的所作所為，也是對中國欠賬頗多的。東北、新疆，鐵路、貿易，令毛澤東和中共屢屢感到不快和激憤。因此，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態度，不僅使中國難堪，更令中國人感到憤慨。中蘇之間關係「鬧掰」的伏筆，已然被種下了。1960年2月6日，蘇共中央在一個通知中說：「以為印度這樣一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遠比中國軟弱的國家，真的會妄想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進行侵略，那是完全不嚴肅的。」[4] 這段話是在中蘇分裂之後被「揭發」出來的，成為中蘇意識形態和國家關係破裂的一個重要證詞。當然，蘇聯的這一看法，暴露了他們同中國之間完全不相融的國家利益立場。這種分歧，由於國家利益而變得更為不可調和了。當時中國認為，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蘇聯公開偏袒印度，不但將中蘇矛盾暴露給世界，而且突出了中蘇之間已經存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分裂可以說同中印邊界衝突如影隨形。

在另一方面，中國還認為，印度侵略性質的「前進政策」，受到了美國的縱容，尼赫魯正在加緊向美國靠攏。有證據表明，從1947年到1959年的十二年中，美國對印度的援助總共有20億美元。而從

---

4 《人民日報》編輯部：〈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相〉，1963年11月2日。

1959 年到 1962 年，美國對印承諾的援助，已經是這個數目的兩倍以上。因此，中國得出的結論是：「印度越是反華，美援就越增多。」[5]

由此看來，馬克斯韋爾的確低估了發生在「幾塊荒涼的、艱險的、沒有甚麼價值的土地上的爭吵」的意義。準確地說，在中印邊界衝突的背後，裹挾着中國同世界的複雜關係。這種複雜關係恰恰勾連在1962年前後，特別是圍繞着中國同北方強大的盟友蘇聯，以及同西方同樣強大的「寇仇」之間展開，這就不能不深深影響着二十世紀 60 年代前期中國的走向。

第三件事。

中蘇意識形態爭論的公開和兩國關係的最終破裂，是讓二十世紀 60 年代前期整個世界都極為驚異的大事件。

一般認為，中蘇關係走向公開破裂的起點，是1962年的秋季。當時，在相繼召開的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東道主公開點名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參加上述各黨大會的觀察員，也在會議上對這些點名批判進行了回擊。於是，一場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陣營大論戰爆發了。

可以說，中蘇公開論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重大事件之一。由此，世界的一系列基本格局開始改觀。無論是持續的冷戰，還是具有廣泛和深刻影響的社會主義理念，都因此發生改變。一位中國學者曾經指出：「60 年代，沒有甚麼能像中蘇分裂那樣對中國的內外政策發生如此重大和深遠的影響。」[6] 同樣，在 60 年代以後的將近 40 年時間裏，也沒有甚麼能像中蘇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那樣，對世界政治的走向產生如此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中國是這場政治分裂和理論爭鬥的頑強一方。同時，它又在這場爭鬥中不斷地推動自身的轉變。從歷史走向考察，這種轉變是以一個「之」字型為特徵的。所謂「之」字型走向，是說中國政治運行的先「左」後「右」（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左」是政治概念，而「右」

---

5 《北京周報》社論：〈中印邊境問題〉，1962 年 8 月 17 日。

6 蘭冬連：《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277。

則不是政治概念。它更多的是形象地指中國對外關係的路向選擇）。正如大多數研究者指出的那樣，中蘇意識形態論戰的政治結果，推動了中國國內政治向「極左」轉。1962年下半年，中國國內政治出現一個「銳角」式的變化：原本以糾正「大躍進」中形成的錯誤、緩和國內政治緊張關係為主導的政治走向，遽然為「重提階級鬥爭」所打斷。中國「國內的修正主義」這個概念，就首先是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前的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此後，這個概念在政治運行中愈來愈被具體化、特指化、目標化。而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由於提出了所謂「三和」、「兩全」（係「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縮略語），而被中共方面看作是「修正主義」走到了「最高點」和「成熟點」。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看來，修正主義真正有了現代版的「靶子」。於是，中國國內的所謂「反修防修」變得實質化了。從1962年起發生的中國政治思想領域的激烈批判，從1963年開始掀起的全黨全民捲入的「四清」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但確立起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政治概念，而且造成整個政治性的緊張和對敵鬥爭意識。如果說這種整個社會的政治緊張和鬥爭意識是一股洪流，那麼，它的聚集力和沖決力，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在這股洪流的盡頭，人們終於看到了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有人形容，在中蘇兩國難以妥協的爭吵背後，始終站立着一個黑影，這就是美國。對於中蘇同盟，美國始終保持着小心翼翼的研究和觀察。它希望看到兩個共產黨巨人之間的裂隙，並進而利用它。大約在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確定，中蘇分裂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兩相比較，中國對西方的態度更為「激進」和「好戰」。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更直接和更大的威脅。美國前駐蘇聯大使波倫甚至把中蘇兩黨比作「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而中共就是更為激進的「左派」布爾什維克。因此，美國必須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對中國繼續施加壓力。不過，幾乎所有的美國當權者都從這個分裂中意識到，美國雖不能預期在短時間內從中蘇分裂獲得好處，但從長遠觀點看，這個分裂肯定將有益於美國的利益。

事實證明，美國人的觀察並不虛妄。在不到十年裏，中美關係的確由於這場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分裂，而演化出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積極成果。在中國方面，中蘇分裂使中共獲得了更加獨立自主的戰略空間，隨之，它整個的對外戰略及其理念也發生了一系列大轉變。這些轉變經過必要的準備和鋪墊之後，使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某種看法變得更實際了。現實主義的態度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變得比過分意識形態化的東西更具有優先性。此後，世界流行起「大三角」、「一條線」、「兩霸爭奪」、「三個世界」等一系列政治概念。世界格局因此而被深刻地改變了。

中蘇分裂給中國自己和世界都帶來了深刻的轉變。雖然，在全球意義上說，中國並不具有改變世界政治走向的決定性實力和影響。但從近現代以來，它自身的改變的確在影響和改變着世界，儘管這種改變有大有小，有長有短。因此，研究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內部的變化，分析這個變化及其後果，就成為勾畫這段歷史的最重要任務。

第四件事。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在西北的試驗場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個消息本身，也如同一顆威力巨大的原子彈，震動了世界。因為從這一刻起，地球上的核大國增加到了五個。

顯然，世界上最關注這件事情的是美國。肯尼迪政府執政之初，美國的情報人員就曾經推斷，中國不久即可能加入核俱樂部。1961年1月，駐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部報告華盛頓，中國可能於1962年底進行原子彈試爆，到1965年，中國很可能擁有少量可用於實戰的原子武器。據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回憶，肯尼迪本人曾認為，「60年代最大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的核武器爆炸」。

出於反共意識形態和安全考慮，美國格外憂心中國的核武器研製計劃。60年代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報告認為，北京的核計劃將造成比軍事還要嚴重的政治和心理問題。因為它會在世界形成一種概念：共產主義將是未來的潮流，這潮流將引起人們的心理分化。在亞洲，中國的核試驗可能會使它經濟發展模式的信譽提高。人們會對資本主義式的體制以及美國的實力產生懷疑。中國的核試驗將使許多國家更主動

地接近中國，從而，使美國在東亞甚至更多地方的影響受到削弱。美國以盟國名義所進行的各種干預行為，也將遇到麻煩。在安全層面上，美國決策層憂慮的是核擴散。美國官方認為，一旦有核國家數量稍許增加，世界不穩定因素就必會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擲的可能性更難以控制了。

對於中國日臻成熟的核計劃，美國設想了多種辦法，目的是將它「扼殺在搖籃」裏。在不斷派遣間諜飛機冒險前往中國西北進行高空偵察的同時，美國在做兩方面的事情：一是加緊同蘇聯談判達成一項部分禁止核試驗國際條約；另一個是探討用武力摧毀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戰略計劃部門和國防部專家們一共設計出如下四種方案：(1)由美國發動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的空中打擊；(2)由台灣空軍進行空中打擊；(3)僱傭在中國的國民黨特工人員進行地面攻擊；(4)空投國民黨軍隊。顯然，這四種方案都是以極大的政治和軍事代價為前提的，它們的實施決非易事。美國高層甚至還設想，可否用鼓勵和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的辦法，來抗衡和消除中國核武器所產生的心理影響。此外，為了遏制中國的核計劃，美國還希望同蘇聯聯手對付它。但這個計劃同樣難以實現。因為此時的蘇聯，更關注美國倡導的歐洲「多邊核力量」計劃，特別是對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因為那才是它來自西面的現實威脅。而在中國核武問題上，蘇聯反而表現得「放鬆」。因為蘇聯比美國更清楚地知道，中國即使有了核武器，也無法在短時期內構成對蘇聯的戰略威脅。赫魯曉夫對美國特使哈里曼說，中國的核計劃沒有那麼厲害。有了核武器，中國會更加自我約束。因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他準是叫得最兇的人」。

當所有的辦法都被設想過，當人們還在對這些辦法爭論不休時，在中國西北大漠深處，一個蘑菇狀煙雲已騰空而起。直到這個時候，美國決策人才不得不承認，對於中國的核武器，美國只能以政治方式和外交方式加以應對了。

可是，大洋彼岸的中國，此時卻成了歡樂的海洋。當周恩來把核試驗成功的消息提前告訴參加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三千多名演

員時，他不得不微笑着制止蹦跳的人群：「不要把人民大會堂的地板震塌了」。

中國人有理由在心理和實力兩方面，為原子彈爆炸成功而歡呼。首先，那是一顆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核武器。眾所周知，中國在1955年開始啟動核計劃。當時，中國的鈾礦資源被首次探明。50年代，蘇聯根據中蘇間的協議，曾允諾幫助中國試製原子彈。但在1959年他們卻終止了這項援助。蘇聯人的這種「不夠朋友」的做法，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於是有了以蘇聯廢除援助中國核計劃的日期為代號的中國核研究計劃——「59 · 6」計劃。後來，外界曾猜測，中國的核工程得到了當時在中國的一位美國人的指點。197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訪華時，鄭重要求他的同學、中國原子武器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鄧稼先證實這個傳言。鄧在請示了周恩來後，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中國核計劃完全自主的設計過程。楊振寧為此極度興奮。他竟在一個重要的禮儀場合留下眼淚，從而不得不請化妝師替他補妝。在任何人看來，中國的核計劃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它從提議到完成，僅僅用了九年時間；如果從「59 · 6」算起，它才經過了五年時間。

其次，這是一顆在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環境中造出的原子彈。這種困難除技術方面外，更多的是指物質的極度匱乏。剛剛經歷大躍進失敗的60年代，中國國民經濟狀況下降到了最低點。誠如上面講到的那樣，當時吃飯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問題。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核計劃並沒有停止。中共中央特地成立專門委員會，統籌領導核武器的研製。全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為這顆原子彈奉獻了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東西；科學家們克服了極大的技術和物資困難，終於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

毛澤東曾說過，中國的原子彈只是「嚇唬人」的。這句俏皮話具有雙重意義：對外，它為不太平和並且充滿敵視的世界放下了一個嚴重警告；對內，它使人民更加看到「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玉汝於成」的精神威力。中國有了原子彈，這件事對中國人的凝聚力，是外人難以理解的。特別是在物質極度

困難的環境下，人的精神力量比物質力量還要來得重要。世界只有懂得了這一點，才能在觀察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歷史的進程時，增加更多的悟性。

第五件事。

誰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在二十世紀60年代前期，愈來愈成為大國政治家們感興趣的事情。

從1935年在貴州召開的遵義會議算起，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已經建立和持續了近三十年。除斯大林和鐵托外，毛澤東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領袖，是世界上時間最長者之一。到1963年，毛澤東將屆七十高齡。從生理意義上，人們自然會想到毛身後的接班問題。

但事實上，對毛澤東接班人問題的關注，主要還不是從人的生理意義上引起的。

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愈來愈顯著，是人們看重毛澤東接班人問題的潛在原因。誠如上面提到的幾件事情所表明的，中國不僅在黨的政治關係方面同蘇聯鬧僵，使得兩國關係的破裂不可避免，進而造成社會主義陣營的嚴重分化，而且它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也樹立起愈來愈不能低估的影響。此外，中國在政治上的感召力在逐漸增大。許多國家中的許多人，對中國式的發展道路感到興趣。甚至，二十世紀6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激進思潮，也受到「中國式」或稱「毛式」模式的感染。例如，發生於1968年巴黎的「五月風暴」，就明顯表露了中國「革命」意識形態的影響：「二十多年來，歐洲的左派力量第一次發現，他們一直羨慕的遠方其他大陸風起雲湧的政治風暴，突然有一天也在自家的門前發生了。」[7] 這是當年一位風雲一時的歐洲反叛運動領袖的回顧。他在述說激進運動的起源時，明顯帶有對中國「革命」意識形態的崇拜和認同。這說明，「毛澤東式」的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當然還有「越南式」和「格瓦拉式」）。對這樣一

7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蘇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著，范昌龍等譯：《1968年：反叛的年代》（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7。

個「輻射力」強大的國家，不引起人們的注意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中國馬上就要加入核俱樂部。它在軍事上真正具有了「五大國」的實力。上述種種情況同毛澤東的生理因素結合在一起，就使得大國政治家們存在某種渴望：越早知道誰將是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主導者，越有利於設計未來同中國關係的框架。

這種渴望是以頗帶戲劇性的一幕開場的。

1961年9月，英國退役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華。這是繼他1960年短暫的五天訪華之後第二次來到中國。蒙帥是二次大戰的英雄，在北非打敗過德軍號稱「沙漠之狐」的隆美爾，因此聲望卓著。他比毛澤東大六歲，此時已滿七十四周歲。按照中方確定的接待計劃，除由外交部長陳毅在他到京時接談一次外，中國方面同他會見的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沒有見他的安排。但是，在蒙帥訪華接近尾聲時，毛、劉都破例會見了他。劉少奇9月22日下午的會見沒有太多實質內容。但毛澤東在武漢卻出乎尋常地兩次同蒙帥談話，其中9月24日下午的談話，主要就是談自己的「繼承人」問題。在蒙帥看來，這頗有點意外。因為世界上大凡有魅力、有統治力的領導人，比如印度的尼赫魯、葡萄牙的薩拉查、聯邦德國的阿登納、英國的麥克米倫和法國的戴高樂，都「非常討厭提出他們的繼承人」問題。毛澤東之所以同蒙帥談繼承人，其實是對蒙帥做法的一個回應。因為蒙帥在太原和包頭訪問時，是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別在不同場合隨意向三個人（工人、農民、學生或服務員）突然提問：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當然，他得到的答覆都是「毛主席」。後來，他在西安和三門峽又突然分別向三個人發問：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蒙帥如此發問，使得普通中國人感到茫然。在那個時代，中國人心中只有毛澤東，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過毛澤東會「不在」、誰將是他的接班人這類奇怪的問題。因此，幾個人的答案也就不一致了。[8] 正是蒙帥的這種「抽樣調查」式的舉動，引起了毛澤

8 熊向暉：〈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384。

東的注意。毛決定「捅破窗戶紙」，告訴這位友好的西方軍事統帥，中國共產黨領袖繼承人沒有秘密，在解決這個問題上，中共比斯大林要高明得多。[9]

這次關於「繼承人」的談話，因當事人熊向暉的回憶，今天已人所共知了。毛澤東告訴蒙帥，劉少奇是中共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並表示自己要在七十三歲去見馬克思。蒙帥聽後很感動，但也開了一句玩笑說：如果我知道馬克思在甚麼地方，我要就這一問題同他談幾句。毛澤東聽後大笑。會見在非常輕鬆友好的氣氛中進行。毛澤東似乎在不經意中就把中共黨的接班人問題，捅給了整個西方。

目前我們得知，蒙帥到中國打聽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並非出自個人的好奇。西方著名「文革」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一個註釋中透露，在為蒙帥出訪中國的準備會上，正是麥氏建議，蒙帥應該向中國人提出關於毛澤東的接班人和接班人的接班人問題。[10] 麥克法夸爾教授當時是西方唯一一本公開出版的研究中國政治歷史的刊物——《中國季刊》的主編。這本刊物在英國編輯，但受到美國的資助，它同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政府部門，有着種種聯繫。麥氏本人出身英國上層，擔任過英國工黨議員，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有極大興趣。因此，他的提議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西方政治學術精英們的意向的。

這個判斷言之有據。因為美國人當時正就這個問題進行詳細調查。CIA（中央情報局）解密的檔案揭示了這一點。

1964年3月19日，CIA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和繼承問題》的機密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應該是美國情報

---

9 熊向暉：〈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頁386－387。事實上，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並沒有比斯大林高明多少。由誰接他的班這件事，曾引起中國巨大的政治變故。

1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640 － 641.

部門在60年代中期對中國進行系列情報研究的重要文件之一。備忘錄在導語部分認為：1、目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所有人員都屬於第一代革命者。在政治局的十八個成員中，六十至七十九歲的人佔了絕大多數。毛澤東已過七十歲生日；2、毛澤東是中共黨內威望最高者。中共的最高核心層穩定；3、毛公開確認自己的繼承人為劉少奇；4、在中共第二代中——所謂第二代，是指現年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的一批人——誰來接班還尚不能肯定。綜上可見，CIA在確認劉是毛的接班人這個關鍵之後，更關注的是誰將成為劉之後的中共接班人？

他們這樣看，同分析中共的第二代有關。因為CIA認為，劉和毛都屬中共第一代革命者。在年齡上相差不多。劉即使接毛的班，也是同代相傳。其遠景意義並不明顯。而中共日後走向的關鍵在第二代。選取第二代中某個人接班，才具有接班意義。

CIA經過研究認為，在中共第一代傳接過程中，除劉接續毛外，應該還有一個「第三人」。在「第三人」之後才能延伸到第二代。CIA通過排列、分析認定，這個「第三人」只能在周恩來、鄧小平和林彪三人中出現。

CIA對周、林、鄧三人的看法是饒有興味的：首先是林彪。中情局的專家們注意到，林是中共政治局裏最年輕的委員，當時只有五十六歲。作為國防部長，他在戰爭年代戰功顯赫；1958年後，他出人意料地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被選為黨的副主席。這是作為接班人的明顯跡象。但專家們最終否定了林成為接班人的可能性。因為據他們所知，林正患「慢性結核病」，這對接班是致命的。其次是周。在西方人的觀察中，周恩來是中共黨內最具威望、資歷和人格魅力的領導人之一。他排在劉之後作為中共的第三號人物是無可爭辯的。周在政治上成熟、幹練，特別是他比別人更了解外部世界，在大國政治家中有良好印象。但是，中情局專家們還是否定了周作為「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點在於，除年齡因素外，周在中共黨內屬「溫和派」。而「溫和派」在意識形態日益「激進」的趨勢下，是不可能居於主導地位的。最後是鄧小平。專家們幾乎一致認為，中共黨內的「第三人」就

是鄧小平。原因是：鄧在政治局裏是最年輕的人之一；他屬於中共的第一代；在目前中共政治格局中，他執掌書記處，是最有實際權力的人之一；在意識形態上，鄧反蘇態度尖銳犀利，屬「激進」一派。中情局認為，鄧是當前最受毛器重、被認為是最能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專家們肯定，鄧小平的政治崛起是不容否定的。

經過四分之一世紀歷史的汰滌，中情局專家們的判斷終於得到了驗證。可以說，他們有對也有錯。但有一條他們沒有預料到，就是鄧小平終於在歷經磨難之後，成為包括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黨的精英的「核心」。這一點，對中國、對中美關係、乃至對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無論怎樣說，二十世紀60年代美國和世界上一些人對中共接班人的關注，透露出了一種強大的「中國影響效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康倫報告」，美國學術理事會組織出版的「中國研究叢書」，以及「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理念等等，都是這種「效應」的反映。這一點是研究者不能不承認的。

第六件事。

美國侵越戰爭的嚴重擴大化和升級，造成了印度支那形勢的爆炸性。面對現實威脅，中國作出了重大和實質性反應。為此，整個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了這個山林密布的區域。

美國注意到了中國的反應，但很難說它對中國意圖的分析是精確的。美國更主要地是從軍事層面考慮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意義。而中國則必須從政治、安全和「國際主義」的道義原則等若干因素出發，來決定自己的行動。更明白地說，越戰，在美國是一場海外戰爭；而在中國，它卻在一定意義上變成了自己的戰事。越戰對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從60年代初起，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愈來愈認為，對越戰的捲入，是在亞洲遏制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環節。約翰遜甚至肯定，如果美國在越南南方失敗，那麼中國和蘇聯，特別是中國，就會填補美國離開後的「真空」，可能會有二十萬中國軍隊從「山間小路」湧進印度支那。他聲稱，自己決不做「目睹東南亞重蹈中國覆轍」的美國總

統。[11] 當時，美國高層決策人幾乎一致認為，加大對越戰的軍事捲入，雖可能引起中國強烈而巨大的反應，但中國不會軍事介入。而如果中國「發出干涉越南的威脅，美國應『悄悄而堅定地』給它一個嚴重的警告」。[12] 事實上，美國低估了越戰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影響。

從1964年北部灣事件起，美國有意使這場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美國因此而陷入了一個政治軍事的泥潭；中國則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自己國內政治運行的軌跡。而中國的問題，當時並不為外界所知曉。

中國國內的政治變動主要有如下幾點：首先，從1964年起，中國改變了原本已經確立的恢復國民經濟的戰略性計劃，而代之以突出戰爭準備為實質內容的思路。其中最為重大的戰略性調整，是決心投入巨資建設國家的「三線」。其次，在對外行動方面，中國決定了自己主要的戰略動作，即支援越南的抗美戰爭。當時中國已作最壞打算：如果美國將所謂「特種戰爭」擴大為「局部戰爭」，中國將採取「美國走一步，中國走一步；美國出兵，中國也出兵」的軍事步驟。[13] 這實際上已經將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抗預想到了最大限度。第三，中美在印度支那的戰略對峙，造成了中國國內的政治緊張化，形成「加強戰備與反修防修雙管齊下」的政治局面。中國領導人作出了「要準備戰爭早打、大打」，「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聯合打，打核戰爭」，「準備兩面打」[14] 的預期。這無異於一個悲壯的民族戰爭宣言。

可以說，「緊張」是1964年後中國政治運行的一個突出特徵。越戰帶來的安全壓力、中蘇意識形態衝突帶來的國家敵對、國內政策分歧造成的思想抵觸，凡此種種，促使毛澤東以更緊迫的眼光觀察中國和世界。毛澤東說：「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不信馬列主義了，馬

---

11 轉引自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497。

12 轉引自《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412。

13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20－221。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520－525。

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他又說：「帝國主義勢力還在包圍着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後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着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於措手不及。」[15] 6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處在一種同仇敵愾的政治氛圍中。那時，所有人在思想上都被動員起來：既高度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陰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改變中國鮮紅的無產階級顏色；也時刻準備着向帝國主義和所有反動派宣戰，捍衛世界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天安門成為一個高大的革命象徵。它代表着世界革命的紅色，也代表着無產階級的希望。從那時起，天安門開始見證世界上情緒最為熱烈、規模最為宏大的群眾集會和遊行。人們把產生於內心的最為激動的情緒，匯集到這個世界最大廣場的中心，迸發和呼喊出來，形成一個不可遏止的和準備沖決一切的「革命」浪潮。

1966年6月下旬，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滴水洞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正是神州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表面看來，這是毛澤東的詩興閒筆，但詩中蘊含的魄力和神思，卻是凡人所難企及的。「有事時」、「踏芳枝」、「蒼天發」、「敗葉紛」、「驚世界」、「走旌旗」，這一連串氣度非凡的比興，不僅述說了詩人的才情，更透露出一個具有充分自信心的革命領袖，準備在一個他看來將要發生歷史大變動的前夜，率領他的人民向一切舊勢力和反動勢力作殊死抗爭的勇氣。十幾天後，他從那個「南方的山洞」走出來，

15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

先作「萬里長江橫渡」，再以迅雷般的氣勢，在北京、在全中國燃起了「革命」的大火。似乎這世界所要發生的一切，早在他運籌千里的胸中。中國再次被捲入到「革命」的排天大浪裏，世界也再次為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所震驚。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上面講到的六件事情，在它們的相互聯繫和影響中，會發現它們正是從不同維度和不同時段，為毛澤東的「革命」進行着歷史鋪墊。例如，第一件事反映的正是大躍進運動失敗所顯現的結果。這個不期然的後果，極大震撼了中國共產黨人原本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想模式、進行方式和期待速度的預想。人們因此而反思，思想分歧也不可避免。而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在毛澤東的巨大威望下，正常、平靜地糾錯機制步履維艱。於是，黨內鬥爭也不可避免。這是1966年後中國發生政治動亂的一個基本原因。毛澤東當時所說的「聯繫1962年的右傾，1964年的形左實右」，蓋指這個背景。而第三件事情，則從外部爭論和強辨「是非」的角度，給中國內部思想分歧以極大地「裂化」影響。作為中美對峙的第六件事情，主要是增大中國的外部壓力。在一定條件下，外部壓力促使內部矛盾的激化，通常是呈「加速」效應的。而中國原子彈爆炸所產生的真正威力，在當時歷史環境中，更多地是在鼓舞人民「鬥志」上面。那時的中國人，還不理解「核冬天」的涵義，當然更沒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概念。中國人只是知道，自己的原子彈代表了中國人的世界地位和決不屈從於人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形成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而第五件事情，非常戲劇性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進程：在無數是是非非中，在各種政治壓力下，中國共產黨在選定自己的接班人時，也不能不經歷某種奇異甚或意想不到的結果。毛澤東雖然在選接班人方面沒有比斯大林高明多少，但他給中國歷史留下的政治遺產，卻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70年代末以後中國人的生活。

因此，在結束這篇導論的時候，接續上述「典型性」的交代而贅述三言兩語，以申明本卷的主題立意。古人說，這叫作開物成務。

無論從世界看中國，還是從中國人自己的感受來體驗歷史，二十世紀60年代前半期的四、五年間，確乎表現出「紛繁」的時代

特徵。所謂「紛繁」，是指事變的多發、矛盾的隱伏、衝突的尖銳和結局的不確定等等。要恰當概括這段紛繁的歷史，給出一個精確且精緻的標題，殊非易事。與同人推敲再三，終於選用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這樣一個聽起來並不「精彩」的書名。的確，以「歷史變局」來解構文革發動前的這段歷史，有它貼切的地方，但又不十分精確。我們過去聽慣了「在曲折中前進」這樣官方的命名，特別是，國內知名的黨史大家曾採用了一個叫「兩個發展趨向」的說法，作為認識這段歷史的框架。就歷史概括而言，不論「曲折前進」還是「兩個發展趨向」，都極盡了黨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政治關懷。例如，我們不能不承認「兩個發展趨向」表述的智慧性：在文化大革命前，「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發展趨向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這就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另一個發展趨向是錯誤的趨向，這就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經驗。」在探索中，「正確的發展趨向和錯誤的發展趨向並不是截然分開的，許多時候都是互相滲透和交織的，不但共存於全黨的共同探索過程中，而且往往共存於同一個人的認識發展過程中。」[16] 當然，最終是錯誤的發展趨向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從而引發了那場「砸爛舊世界」的大革命。

顯然，這個說法「智慧」地規避了所謂「路線鬥爭」的評價體系。但仔細想來，正確與錯誤的較量，是歷史活動的基本現象。誰總是正確，誰又永遠錯誤呢？人的活動，就是在正確或錯誤判斷歷史的過程中，交替推進的。因此，從歷史概括的角度，我們還應深究事物發展的一般走向。對這個走向的概括，既不應過於意識形態化，也無須深文周納。它應該是一種遵循歷史主義原則的描述。這樣做，即使暫時無法臻於精確，也至少可以給讀者一個可感觸和近時代的歷史解釋。

---

16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405。

「歷史的變局」大約就是以這樣思想確定下來的。它雖用詞普通，但比較客觀直白地描述了這段「紛繁」歷史的走向。事實上，生活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人，面對的是一系列挑戰和對決：面對着飢餓的挑戰，面對着大躍進失敗後解決中國路向的挑戰，更面對着國內「階級敵人」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的挑戰。當然，挑戰者有時就是中國人民本身：向封鎖、壓迫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國際體系和秩序挑戰；向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現存體制挑戰；向人們理解中的一切背離社會主義「規範」的事物挑戰；向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挑戰；向一切不平等的現象挑戰。

挑戰就意味着對決。而對決的結果，無疑變動了歷史——這是一段鮮有人能預見結果的歷史變局。

毛澤東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他還說：「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世界的所有人都知道，在毛澤東的統帥下，從二十世紀60年代前半期起，中國開始掀起一個「天地翻覆」的社會革命熱潮。這個熱潮撲面而來。它沖決封鎖，打爛藩籬，要掃除所有「害人蟲」，以締造一個別開生面的世界。也許，這就是自1962年以來中國選擇的歷史走向。

作為歷史敘述，我們應盡力給讀者提供一個可以俯視的角度。如果我們不能擺脱歷史本身的糾纏，而同那些是是非非攪在一起，那將使讀者看不到歷史的脈絡和直觀的畫面。因此，在確定了主題立意之後，無論從世界看中國還是從中國看世界，歷史就變成了多棱鏡。為了把歷史敘述得更豐滿和更全面，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眼光變得更寬廣、更高遠，同時也要更細微。正如我們在開篇時所說，我們的目的，是要使這個歷史變得「更透徹」、「更明亮」。這大概就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

第一章

天人之惑

至今，在中國還沒有正式的說法：大躍進運動失敗。在正式文本裏，一般稱「大躍進」運動在1960年冬「被停止」。[1]但是，人們都知道，這個試圖用十幾年甚至幾年就「超英趕美」的全國性運動，的確是失敗了。所謂失敗，不但是指預期目標沒有達到，而且指代價過於慘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說：「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毫無疑問，重大損失包括工業、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近年來，中外媒體又在不斷「熱炒」從1958年到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人口死亡數量。不應迴避，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慘痛的記憶。可問題在於，這場由中國共產黨發動、得到幾乎全體中國人擁護並表現出前所未有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08。

的興奮情緒的運動，為甚麼會失敗？是天道不公，地不作美嗎？當時，處在餘熱尚存的氛圍裏，人們肯定存在着疑惑。而在今天，人們對於大躍進失敗的歷史，仍在進行爭論。有人斷言，大躍進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對「甚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因此發生失誤。顯然這是個概念性的解釋。它所缺乏的，是歷史研究的嚴密論證。事實上，鄧小平講這兩個「沒搞清楚」，是一種政治經驗總結。他在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依據。很明顯，兩個「沒搞清楚」的主要寓意不是說明歷史，而是解讀政治。作為史家，在發現歷史時是不能拿這個政治「結論」來做終極解釋的。因為，歷史到底是怎樣游走的，歷史學家應做細緻的說明。歷史學家不能把前人都看作「傻子」，似乎他們做的一切都愚不可及。當然，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前人都認作「目光如炬」、「預見一切」的人，好像他們可以避免所有災禍。從廣義上說，人的實踐都有巨大局限性。因此，任何人的實踐都在一定的歷史斷面上「犯着傻」。科學的歷史解釋在於說明：人們為甚麼要公開犯這麼「傻」的錯誤？可以不可以更聰明一點？馬克思說過，人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他們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和主觀條件之下來書寫自己歷史的。一切隨客觀條件而定。幾乎沒有不犯錯誤的先知。無疑，這意思本身不僅包括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括了毛澤東和當時將近七億中國人。

在這一章裏，我們試圖探究的，就是天、地、人之間到底出現了怎樣的不和諧，以至把人們所做的傻事推向了極端。

一　問天

古代大文豪屈原在《天問》開篇即吟道：「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誰能極之？」在詰問天地的運行規律時，詩人明顯帶着對時世的不解。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中國人對1959至1961這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的天災也存有某種疑惑：到底這段時間中國的災情有多大？是甚麼性

質的災害？這一災害對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危害究竟有多嚴重？那一時期中國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與自然災害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如果從世界現代自然災害史的角度看，中國在二十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所受災害的社會影響，處在甚麼樣的程度上？等等。隨着研究的深化，人們似乎應對這些問題作出大致的解答，否則，人們很難科學判斷大躍進運動失敗後，三年經濟嚴重困難對其後中國政治走向造成的影響。

根據專家的記錄和分析，從1957年到1963年中國的氣象災害大體情況為：1957年全國較大範圍乾旱。1958年災害較輕。1959年全國較大範圍乾旱，旱情較重。1960年在上年乾旱的情況下，持續較大範圍乾旱。1961年至1962年雨水有所增加，但仍不充沛。1963年則以澇災為主。[2] 按照這個記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自然災害，在性質上應為旱災。

但是，也有人認為，所謂「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是一種「神話」。其依據是，按照《中國近500年旱澇分布圖集》中一百二十個水文觀測點的平均指數來判斷，「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至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3] 另一位學者則認為：「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乾燥度大於平均值，乾燥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乾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4]

2　馮佩芝等編著：《中國主要氣象災害分析（1951－1980年）》（北京：氣象出版社，1985），頁143－151。引自李若建：〈自然災害與自然條件對困難時期饑荒形成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　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4　王維洛：〈天問——「三年自然災害」〉，《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1期。轉引自陳東林：〈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顯然，兩位學者的看法並非沒有依據。他們是在研究了氣象歷史的資料後得出結論的。但是，中國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到底有沒有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氣象平均值問題。這不僅因為氣象學有自己的學科方法，它的統計目的與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差別甚大。而且，取氣象平均值的方法，很難真實反映社會歷史狀況。比如，在上述兩位學者中，前者使用的是一系列觀測點的數據，然後得出平均值。一百二十個觀測點不可謂少。但如果在數據比較中使用平均值計算，那麼，旱和澇兩種災害就被中和了。此外，在平均值統計中，權重比例不同，結論也會迥然而異。後者引入的則是「乾燥度」這樣一個概念。「乾燥度」概念是否同自然災害所界定的乾旱是一個意思？顯然，「乾燥範圍」與「乾燥度平均」兩個概念，很難表明在全國範圍內個別地區所遭受自然災害的強度，以及隨之產生的社會損害。

由此我們可以說，籠統地認定自然災害的性質和以平均值來說明災害的程度，都暴露出相當程度的學術缺陷。特別是，當我們進行自然災害的社會性研究而非純氣象學研究的時候，氣象記錄材料必須是具體而不是抽象的。如果沒有災害分布、危害程度的準確記載，我們就無法判斷自然加給社會的影響。因為中國國土面積廣大。東邊日出，西邊冰雹，南邊暴雨、北邊霜凍的現象，幾乎是一種常態。也就是說，在一個特定時段內，受災情況可能非常不同。而要說明災害的影響，就必須確定哪一種災害發生在甚麼地方，以及甚麼是當時為害最重的災害。

必須承認，中國由於自然條件的原因，天災出現得相當頻繁。而中國歷史傳統中對自然災害的記載，都是具體的，即說明在何時何地發生了何種災害，災害所造成的社會狀況怎樣等等。現姑舉幾個事例以證明之：其一，辛亥革命後的第九年，即在1920年，中國北方五省一區曾遭受嚴重旱災。當時，黃河流域乾旱異常，直、魯、豫、晉、秦五省發生四十年來未有之奇荒。東起海岱，西達關隴，南至洛陽，北抵京畿，禾苗枯稿，赤地千里；加之蟲雹為患，飢民多達數千萬。關於這次嚴重災害，當時北洋政府的內務部賑務

處在給外交部行文中詳細說明了災情性質、被災地區及受災人口：「據各省區調查報告，被災縣份，京兆區共二十縣，被災者十七縣。直隸省共一百十九縣，被災者八十六縣。河南省共一百零八縣，被災者七十七縣。山東省共一百零七縣，被災者二十一縣。山西省共一百零五縣，被災者有六十四縣。陝西省共九十一縣，被災者有七十五縣。」[5] 這個災害的記載就是具體的。它可以作為歷史家分析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依據。

其二，1946年中國發生了一次比較大的災荒。當時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描述是：「若救濟災區之工作，如不加緊進行，中國人民之死於饑饉者，將達三千萬人。中國戰後之災區達十九省，現今約有四百萬人接得小部分之接濟。……中國災區之成因，有以下數點，即戰禍、大旱、水災、蝗蟲、瘟疫、漁業不振，農事無耕具，又需以大量米糧供軍隊及日本戰俘……湖南地區，人口中竟有七百萬人為饑饉之眾，食草根、泥土、樹皮以維持生命，其他如河南河北等地區亦有同樣情形，遍地草根已有搶食一光之勢。」[6] 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報告，明確寫出了造成災害的成因，即旱、澇、蝗和瘟疫，幾害並行。這個報告明確地給人們提供了當時自然災害的信息。

事實上，說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國面對的主要氣象災害是旱災，並且是持續旱災，也不過是一種籠統的估計，只不過沒有使用平均值的概念而已。從歷史記載看，自然災害的發生基本是綜合性的，即旱、澇、熱帶氣旋、地震、風雹、冷凍、病蟲害和雪災等是綜合出現的。因此，災害學研究使用「自然災害綜合活動程度指數」這樣一個統計方法。自 1949 年中共執政到上世紀末近半個世紀中，1952、

5　〈賑務通告〉，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六期，《公牘》，頁37－39。轉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1919－1949）》（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頁1。

6　《國民日報》，1946年4月10日。轉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1919－1949）》，頁3。

1967和1971年三年自然災害綜合活動程度指數低於1，而1954、1960、1976、1991和1998等五年的指數接近於8。[7]在這五年中，1960年的確主要以旱災為最重。但是，由於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在各單類災害中，洪澇災害又是中國最具影響或危險性最大的災害，其比例幾乎佔到全部災害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即使在主要為大旱災的1960－1961年，按照記載，山東於1960年卻遭受水災，共死亡13246人。[8]而1961年，魯北地區又發生大水災，日降雨量超過50毫米的暴雨次數和雨量都超過常年（常年為四至八次）。[9]山東全省的1.2億畝總耕地中，有3500萬畝受澇災，產量很低。[10]在江蘇，1961年自然災害情況也是綜合性的，即春旱秋澇。「7、8、9三個月內接連三次颱風暴雨襲擊，致使全省3000多萬畝農田嚴重受災。其中本來比較差的徐（州）淮（陰）鹽（城）揚（州）四個專區，糧食減產達13.1億斤。」[11]按照這樣具體的記載，1961年就不僅是旱災一項災害危及全國了。這再次說明，用於歷史分析的氣象資料，必須指明災害的種類、性質以及災害發生的地區、破壞程度等具體數據。否則，用籠統的辦法說明受災狀態，並進而分析災害對社會的影響，必定是牽強的。

顯然，當時人的記載比後人的推論更可靠。而當時中國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對國家災害的判斷，無疑對歷史研究更有參考價值。

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武漢同來訪的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曾說：「所謂旱災，不是說所有的地方都旱。今年旱災最嚴重的是四

---

7 國家科技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災害綜合研究組主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4），頁7。

8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5。

9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國民經濟調整》（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145。

10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國民經濟調整》，頁227。

11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蘇省計劃與經濟委員會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江蘇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336。

川、湖北、安徽，就是長江流域。今年主要是長江三省旱。」[12] 毛澤東還對蒙哥馬利說：「擺在面前的困難很多，遇到許多過去沒有經驗的事，如1954年這裏的大水災，漢口都幾乎淹掉了。還有最近幾年的大旱。過去局部性的旱災有過，但全國性的沒有。」[13] 毛澤東的話至少證明了兩點：一，1961年中國所經歷的不是整體性旱災，而是局部旱災；二、最近幾年中國的確發生了連續性的乾旱，且乾旱程度較為嚴重。以災害歷史的一般現象來判斷，毛澤東對 1961 年當年以及自 1959 年以來中國自然災害的講解，是客觀的。他既沒有特意誇大災情，同時也肯定了災害的存在。

一天前，劉少奇在同蒙哥馬利會談中也提到連續乾旱問題。以下是劉和蒙關於中國遭遇自然災害問題的對話：

> 劉：是的，我們的人民生活相當苦，又遇到天災，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在數量方面的速度是放慢了。
>
> 蒙：這是三年災害所積累起來的影響。
>
> 劉：在中國歷史上有過不少次一連三年的大旱。我們的工、農業生產在數量方面的發展將有所降低，但我們的產品在質量、品種、規格方面將提高一些。
>
> 蒙：上一次一連三年大災是何時發生的？
>
> 劉：八十年前。在中國歷史上，大約一百年左右總要有一兩次一連三年的大旱。[14]

從整個談話的語氣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領導人的心態是平和的。他們沒有極力渲染中國面對的自然災害。對災害的描述也是非常

12　〈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 年 9 月 23 日），《黨的文獻》，2003 年第 1 期，頁 41。

13　〈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 年 9 月 23 日），《黨的文獻》，2003 年第 1 期，頁 41。

14　〈劉少奇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 年 9 月 22 日），《黨的文獻》，2003 年第 1 期，頁 35。

有限度的。但同時，他們又都提到了災害的嚴重性對社會發展的損害。因此可以認為，在所謂「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國的部分地區的確遭受了連續性乾旱。否定這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性是站不腳的。伴隨着其他自然災害，中國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間，絕非「風調雨順」。自然災害就是災害，不是「神話」。

據國家科技部、國家計委和國家經貿委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輯的《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一書載：「中國於1959－1961年發生大面積嚴重乾旱以及局部水災，加之低溫冷凍害、病蟲害和風雹等災害，受災範圍遍及大半個中國。」[15]

各地具體受災情況是：1959年1－4月，黑龍江、河北發生嚴重春旱；2－6月，珠江、長江和淮河流域發生洪災；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發生風雹災；6－8月，江淮流域發生旱災；7－9月，東南沿海遭五次颱風襲擊，颱風等級最高超過十二級。此外，1959年還在部分地區發生了蝗災、粘蟲災和鼠患。

1960年1－9月，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陝西等華北、西北地區發生持續乾旱。自1959年秋季，有些地方持續三百天至四百天未下雨；6－10月，東部沿海地區颱風連續登陸，共達十一次，高於以往平均次數的兩倍。每次颱風過境時間長達10－12個小時，高於往年平均數的三倍以上。颱風造成暴雨頻發，洪水泛濫。此外，1960年的3－5月和9月，中國西北部地區和東部部分地區還發生嚴重霜凍，3－9月發生波及二十一省區的風雹災害。

1961年，自上年冬季開始至當年3月，黃河、淮河流域發生大旱。4－6月，災情擴大到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這是中國連續發生旱災的第三年。4－5月，淮河流域又遭受霜凍、大風等災害。4－6月，珠江、湘江、贛江和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造成洪水泛濫成災。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造成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和山東部分地區的災情為百年不遇。8－10月，廣東、福建、

15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162。

浙江、江西、江蘇和安徽遭颱風襲擊十一次，其中十二級以上的達九次之多。[16]

從全球地理角度看，中國剛好處在世界兩大災害帶即北半球中緯度災害帶和環太平洋災害帶的交匯部位。由於地球不規則運動的原因，第一個災害帶多發地震、熱帶氣旋、風暴潮和颶風、龍捲風，同時，伴隨着乾旱、洪澇、低溫冷凍害和雪災等災害。第二個災害帶是地球上地震、火山、熱帶氣旋和風暴潮高發的地帶。碰巧的是，這個災害帶同樣多發乾旱、洪澇、冷凍和雪災等災害。據統計，二十世紀全世界約百分之八十的大災害發生在這兩個地帶。處在這兩個災害帶交錯環境下的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因此，中國多自然災害的現實，特別是中國歷史上頻遭大旱、水澇和地震災害的現象，是難以否定的。

問題在於，當我們根據歷史上自然災害的嚴重與否來判斷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問題時，不應過分誇大也不能任意縮小自然災害對社會矛盾產生的影響。這裏有兩個相關的問題需要處理：一、承認中國經常遭受自然災害是個基本事實；二、根據災害引發的社會矛盾來解釋歷史現象以及其發展規律。

誠然，某次重大自然災害發生過後，社會政治和歷史的變化可能在短時間內並不十分明顯，至少，它們並不以過於直接的形式自我地反映出來。但是，從歷史規律看，凡重大自然災害發生過後，社會就像受到一次重創一樣，產生某種非常態的變動。在古代，嚴重自然災害過後，往往是社會最動亂的時期。災害最直接的受害者——農民，往往在極其惡劣的生活條件下，鋌而走險。另一方面，嚴重自然災害也迫使統治者放鬆盤剝，與民休息。在當代，自然災害的社會作用是同方向的。這其中一個基本的道理就是，嚴重災害迫使人對社會政治和政策進行反思。

16　參見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陳東林：〈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一個著名的事例是，二十世紀30年代美國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嚴重乾旱。1934年5月和1935年春天，兩次巨大的「黑風暴」席捲了美國東部的廣大地區。1934年5月的沙塵形成了一個東西長2400公里、南北寬1500公里，高3.2公里的巨大塵土帶，捲起約3億多噸的沙土。乾旱和沙塵使250萬人逃離家園，中部大平原地區生態遭到毀滅性的損壞。這個巨大的生態災難，使得美國人很快通過了《水土保持法》。羅斯福總統動員了至少三百萬人參加治理沙塵暴的行動。由此，美國的自然氣候得到初步改觀。

另一個同樣著名的事例是，1961年5月，國家主席劉少奇回湖南寧鄉花明樓老家調查。據陪同調查的主席夫人王光美回憶，劉一進村就注意到池塘裏的水。劉問童年放牛的朋友李桂生的第一句話就是，人們說去年乾旱得很厲害，安湖塘的水車乾了吧？李回答，沒有，還有半塘水。「少奇一聽就明白了，因為他清楚地記得，他小時候有一年大旱，安湖塘乾得底朝天，能在塘底裏曬穀子，就那樣的收成，農民生活也沒那麼大的困難。他斷定，認為農村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天災的說法，是不對的。」[17] 後來，劉少奇有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著名判斷。

這是劉少奇同蒙哥馬利元帥談話前四個多月發生的事情。對於天災（當時主要是旱災）的嚴重性和社會破壞力問題，劉通過親身走訪才獲得了自己的估計：天災確實存在，但並不都像想像中那麼嚴重。這個估計得來不易。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如果不是走到自己家鄉並尋找特殊的談話機會，劉顯然只能了解一般的氣象災難統計和聽取地方領導人不盡準確的匯報。無疑，地方領導人的匯報會強調天災的一面，而盡力掩蓋人為的錯誤。天災和錯誤，成為那個時代糾纏在一起的政治鏈環。它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天人之惑。當我們再進一步追問這個天人之際的難題時，更為複雜嚴重的事態將展現出來。

---

17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52。

二　問地

自然災害對於農業的破壞，是從田畝被摧毀開始的。受災面積，通常是衡量自然災害程度的基本參數。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又是農業大國。因此，自然災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至深且大。同時，由於中國地域寬廣，地區間自然條件和社會發達程度差異很大，中國自然災害的危險性與危害性分布，也極不均衡。這種現象的後果，是更為嚴重地加劇了自然災荒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如果嚴重自然災害發生在西部人煙稀少、經濟水平落後的地區，其破壞力將被客觀地限制在低層次和小範圍的水平上。而如果嚴重自然災害發生在東部發達地區，則同等的災害將造成比落後地區大得多的財產和經濟損失。不幸的是，根據氣象學和歷史資料的記載、分析，中國自然災害綜合活動程度和綜合損失程度均以華南地區為最嚴重。其走向是逐步向西向北遞減。在災害發生的時間上，分布亦不平均。在十二個月中，隨時可能發生各種災害。而在災害的周期上，則大約每三至五年有一次較嚴重的災年。

面對這樣嚴酷的自然條件，難怪大詩人屈原要在兩千多年前作《天問》，一口氣提出一百七十二個問題，問天，問地，問人。可結果卻是，「聲聲詰問，蒼穹禁語。凜凜質疑，大地無言」。

據《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的統計，中國於1959－1961年發生的大面積嚴重乾旱以及其他局部各種類型的災害，使受災面超過半個中國。全國農作物受災面積約佔播種面積的49%，其中成災面積約佔播種面積的21%。而大面積的持續乾旱席捲了全國國土總面積的二分之一的廣大地區，全國每年農作物旱災受災面積3000萬－4000萬公頃，每年減產糧食1100萬－1300萬噸，造成了嚴重的災荒並影響到1962年各地的生產和生活。[18]

18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162。

誠如上文所言，1959 — 1961 年連續出現的自然災害，恰恰遵從了中國災害的分布規律，即東部平原和長江流域的富庶地區遭災最為嚴重，東北和內蒙地區受災較輕，青海、寧夏和新疆受災最輕。[19] 受災最重的省區是：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四川、陝西，其受災農作物面積和災荒缺糧人口比率均在30%以上，最高者超過 60%。

就全國而言，1959 年旱災受災農作物面積為 3381 萬公頃，水災為481萬公頃，風雹災193萬公頃，其他災害為316萬公頃，總受災面積為 4371 萬公頃；1960 年遭受旱災的農作物面積為 3812 公頃，水災為1015萬公頃，風雹災為392萬公頃，其他災為1325萬公頃，災害總面積為6544萬公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業遭受最嚴重自然災害的一年；1961年遭受旱災的農作物面積為3785公頃，水災為887萬公頃，風雹災為444萬公頃，其他災害為1095萬公頃，受災總面積為 6175 萬公頃。[20]

1959、1960和1961三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分別是11602萬、12243萬和12144萬公頃。農作物受災面積約佔播種面積的49%，其中成災面積約佔播種面積的 21%。[21]

如以各省受災情況論，則1959年的最嚴重者應為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和黑龍江。其中，黑龍江和河北遭春旱，有300萬公頃農作物生長受到影響。珠江、長江和淮河流域春夏季遭洪澇災害，200 多萬公頃農田被淹。6 — 8 月，江淮流域大旱，受災面積達821.2萬公頃，至8月上旬，旱情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到 2276 萬公頃。

從統計數字看，1960年是三年連續災害中受災最嚴重的一年。這年從年初到9月，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和陝西各

---

19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 162。

20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 162。

21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 162。

省，均遭持續大旱，三百至四百天未雨，受災面積達到2319.1萬公頃。進入夏季，旱災擴大至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雲南等省，使農作物受災面積達到了3812.46萬公頃。此外，還有大面積農作物受到其他災害的襲擊。當年12月28日，新華社曾發出專稿〈我國農業生產今年遭受特大天災，六億人民滿懷信心克服困難〉。專稿說，1960年我國有9億畝農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災害，佔總耕地面積一半以上。其中有3億到4億畝農田遭到重災，甚至有一部分農田因災害特別嚴重而沒有收成。今年災情最重的是旱災。全國除西藏沒有受災，新疆地區雖氣候不正常，但沒有成災以外，其餘各省、自治區都先後發生程度不等的乾旱，受旱農田達6億畝。受災地區中以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受旱災面積最大，佔四省總耕地面積60%以上；受災時間最長，一般持續六七個月。[22]

1961年接續1960年的災情，自1960年冬季開始至1961年3月下旬，黃淮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旱災；4－6月，災情擴大到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使年內全國旱災受災面積達到了3785萬公頃。其中河北、河南和山東等主要產糧區域農作物減產達一半左右。湖北省有67萬公頃土地未播種，河南73萬公頃農田基本絕收。當年春夏季，珠江、湘江、贛江和閩江流域普降暴雨，引發洪水泛濫。至夏季，河北、山東又發生百年不遇的洪澇災害，使近百萬公頃農田絕收。此外，夏秋季在東南沿海地區又發生多次颱風，造成魚船損壞、房屋倒塌、海堤沖決等災情。[23]

對尚處於初級工業化早期的農業國家說來，自然災害對國民經濟影響最最敏感的莫過於糧食的減產和損失。

根據晚近的統計數字，1959年因旱災全國糧食減產1081萬噸，約佔當年糧食總產量的6.3%；1960年因旱災糧食減產1128萬噸，約

22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548－549。

23　參見陳東林：〈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佔當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的7.8%；1961年因旱災減產糧食1323萬噸，約佔當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的9%。[24]這只是因旱災糧食減產所佔糧食總產量的比率。如果加上其他災害引起的糧食減產，則所佔比重肯定會更大。但有的統計認為，1959、1960和1961三年全國糧食產量分別比1958年下降11%、28.3%和26.25%。[25]這個比例大大超過了《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的統計，最高減產接近三成。

如果按照《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的產量數量，則1959－1961年因旱災糧食平均減少不到一成。如果以平均數計算，1959年全國人均糧食消費應為506斤。這個消費數量也似乎不算很低。如果以原糧計算，可折合大約420－450斤左右的細糧。在副食品也極度缺乏的年代，每天一斤多一點糧食，對成年人說來是難以飽腹的。

但實際情況卻是，全國上下幾乎每個經歷這一年代的人，其飢餓感要比理論推算出來的糧食消費結果大得多。1960年7月30日，北京開始實行發放糧票、定量供應糧食的辦法。而在此之前，全國已有許多地方實行了糧食定量制度。9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在淮河以南地區，維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糧360斤的標準，豐收的地方可以提高到原糧380斤。淮河以北地區，應壓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糧300斤左右，各省的重災區應當壓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城市供應標準，除高溫、高空、井下和擔負重體力勞動的職工外，其餘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須壓低口糧標準兩斤左右。[26]由中共中央的這個指示推算，即使在淮河以南生產水準比較高的地區，原糧360斤的標準，也僅僅相當於成品糧300斤左右，即每人每天平均可消費八兩左右的糧食。對成年勞

---

24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162。不知這個統計是否準確完善。因為按照統計，年糧食平均損失量似乎不是很大，這不僅同人們的切身感受差別巨大，而且同當時的統計也有不小的距離。

25 陳東林：〈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上冊，頁511。

力來說，這無論如何是不夠的。而在北方地區，按上述標準，顯然更為窘迫。在城市，糧食定量國家幹部每人每月22市斤；縣城和農村集鎮吃商品糧的居民，則分別降為17市斤和16市斤。

據時任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的回憶，1960年，河北省委作出了日吃四兩口糧的新規定。這個規定全省一刀切，不得例外。張家口地區本來即生產落後，且面臨渡冬的艱難問題。當年春，胡來到蔚縣西合營。他了解到，農民播種時，前邊點上種子，後邊就有人把種子扒出來吃掉。生產隊沒辦法，把種子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飢餓難忍的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大大超過了對毒藥的恐懼，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把扒到的糧食先在土裏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27] 可以說，這是中國在1960年代初遭受大饑荒的最為慘痛的情景之一。

全國性的糧食緊張，還反映在糧食調運計劃不能按時完成上面。從1960年第二季度開始，全國糧食調運計劃即開始拖延，5月份各調出省區調出的糧食僅完成計劃的一半。這使大城市和缺糧省份的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當時，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已不夠銷售，庫存幾乎挖空了。北京和上海這樣大型城市的銷售糧，大約只能維持三天。[28] 這種嚴重情況是共和國成立以來所未見的。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抓緊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指示說，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上述省市，將有脫銷的危險。還在5月28日，中共中央就曾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但是由於各地糧食也很緊張，糧食調運工作一直進展不快。6、7、8月份糧食調運計劃仍然沒有完成，糧食供應情況仍未改善。中共中央9月的這次指示，要求各糧食調出省、自治區黨委立即採取措施，改善運糧狀況，確保調運計劃的完成。

但事實上由於各地糧食都出現緊張，調運糧食便變得非常困難。

27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57。

28　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頁161。

例如在張家口地區，90%的大田作物遭受了自然災害，產量已降低為15.8億斤（實產12.1億斤），不僅國家和省裏確定的5000萬斤糧食調不出，而且自己還虧空2000萬斤。[29] 又據説，國家從四川調運上海準備出口的糧食，由長江水運到武漢時曾為湖北省截住。當時武漢市僅有一天的存糧。為了救急，武漢市的負責人無奈出此下策，遭到中央辦公廳的申斥。經很大一番周折，運糧船才得以重新起航。[30]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這個指示承認，糧食生產的發展還不能適應整個國民經濟躍進發展的需要。同時，由於糧食生產的指標偏高，估產不實；又由於糧食消費安排不好，主要是用糧計劃太高，管理不善，浪費不少，前鬆後緊，「前方吃了後方糧」；因而，1958和1959連續兩年，在青黃不接時期，都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面。1960年雖然夏收已經到手，但是，收購不快，庫存減少，調撥不靈，某些城市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還沒有過去，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出口計劃也完成得不好。指示説，這種嚴重情況，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指示提出，為保證糧食生產，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包括增加勞動力，充實農業；壓縮水利等農村基本建設；搞好秋田管理，力爭秋季豐收；重視除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的生產，開展規模更大的「小秋收」運動等等。[31] 進入1960年以來，中共中央屢次發出文件，強調糧食調運、糧食分配問題。而這一次，文件有「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必須全黨動手，全民動手，大辦糧食」的語句出現，透露出糧食問題的嚴重形勢。

兩個月後，中共中央又轉發〈晉、冀、魯、豫、北京五省市農業書記會議紀要〉。這個紀要反映了華北地區因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糧食短缺情況。其中説：五省市今年農業生產遭到特大的自然災害，受災

---

29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60。

30 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82。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16－522。

面積約佔播種總面積一半以上……預計今年的糧食總產量仍可以和1957年相仿……但是由於嚴重災害的影響，總的說來，今年的糧食情況是相當緊張的。根據預計，這五個省市今年每人平均佔有的糧食，最低的不到四百斤，最高的也只有四百四十多斤。紀要提出的若干措施有：壓低口糧標準，做到糧食產量和群眾口糧的落實，保證忙時多吃，閒時少吃，規定每月吃糧計劃，不得超過；大種蔬菜；大搞代食品；切實辦好公共食堂；冬春季要有一百天的半日勞動等。[32]事實上，該文件仍然高估了1960年的糧食總產量。按後來的統計，1960年糧食產量為1.4350億噸，比1957年的1.9505億噸少了5100多萬噸。直到196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才增長到1.6億噸，仍然沒有超過1957年的水平。

五省市農業書記會議紀要提到「大搞代食品」這樣一個措施。11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指示說，近兩年來，農業生產連續遭受特大自然災害，城市和鄉村的口糧標準有所降低，肉類和油類也有所減少。因此，除了應當首先增產糧食、增產瓜菜外，還要千方百計增產各種代食品。中央要求各地抓緊秋收已經完畢的時機，大規模動員群眾，採集和製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難，渡過災荒。[33] 所謂「代食品」，是1960年代中國一個特有的稱謂，它指除糧食以外能當作食物的幾乎所有野生和人造食品，如家生和野生植物的稭、莖、果、根、葉以及豆餅、棉餅、花生餅和芝麻餅之類。在城市則有人造肉精(一種食用酵母)和小球藻等。事實上，飢餓迫使人們把尋找食物的範圍擴大了許多，舉凡能夠填進嘴裏、腹中的東西，都找來吃掉了。當時，安徽省無為縣委常委會議定的可抵口糧的「代食品」共有三十二種，計有：藕、荸薺、茨菇、菱角、茭白、玉米葉、玉米皮芯、高粱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344－345。

3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687－692。

稈、黃豆稈子、芝麻稈子、花生藤、花生殼、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綠豆、野泥豆、山蘿蔔、野涼茶、大頭薇、蒌蒿、野紅花草、馬蘭草、水草、鵝耳腸、野菜、荷葉稈子、芡實稈子、螺螄、蚌肉。[34]這些東西有的富含營養價值，是頗為入口的菜蔬果品，如藕、荸薺、菱角和茨菇。但大部分是連當豬飼料都不可能的稽稈，如高粱稈、黃豆稈、芝麻稈、荷葉稈等等。這些「代食品」顯然是無法下咽的。

胡開明記述說：1960年12月一個星期天，由市委書記處書記和市長帶隊，張家口市四萬多工人、學生、機關幹部和城市居民上山採集各種野生雜物。十天後，張家口市區參加採集代食品活動的人增加到五十多萬人。山坡上長的，平川裏埋的，水底下游的，能採集的統統採集回來，共獲得代食品5500多萬斤，其中玉米棒子芯、高粱穗、土豆藤、蘿蔔纓、榆樹葉也都成了代食品原料，26400多台加工機械晝夜運轉，粉碎這些原料。[35]代食品的種類雖因南北方地域關係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料不離玉米、高粱稽稈和紅薯、土豆的藤蔓等物。這些東西被粉碎後，摻以一些糠麩，蒸製成饅頭，曾被譽為「優質產品」。而食用之時，粗糙乾澀，難以下咽。許多人出現腸梗阻症狀。胡開明親見自己的司機因吃了兩個「優質」窩窩頭，腹中劇痛，冷汗淋漓，最後嘔吐不止。[36]所謂「低標準，瓜菜代」，是當時中共中央提倡的一個口號。事實上，瓜和菜已經成為食物中的上品。有關研究部門曾實驗、鑑定、改進和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的製造方法。其產品仍主要是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稈麵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柵藻和紅蟲。當時人們甚至相信，「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代食品的營養成分比糧食還要豐富得多，吃了可以預防和治療浮腫病和其他一些疾病。……而且將來糧食多起來以後，製造營養豐富的代食品仍然是食品來源和飼料來源的一個重要方面。」[37]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神話」而已。

---

34 楊金聲：〈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炎黃春秋》，2002年第7期。

35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59。

36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59。

37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688。

正如張家口市區的做法一樣，代食品的製造統統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中共中央曾設立以周恩來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習仲勳等五人的代食品生產領導小組，並於其下設立專門的辦公室。五人小組包括了中央書記處的重要成員和國務院秘書長，是一個規格非常高的臨時性機構。1960年8月1日，中央書記處批轉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的特殊供應副食品辦法共分三類：第一類，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第二類即政府正副部長，全國人大、政協常委，民主黨派中央的正副主席，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和行政七級的其他人員，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第三類即全國人大黨外代表，全國政協黨外委員，正副司局長，各民主黨派中央常委，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二、三級人員，行政十一級以上其他人員，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二斤。這項措施除保障黨的高級幹部外，高級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也受到相當的照顧。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為了緩解糧食緊張，經周恩來和陳雲批准，由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持，從1961年起開始進口加拿大、澳大利亞糧食。當年進口了100萬噸，即20億斤。[38] 雖然缺口仍十分巨大，但畢竟使緊張形勢有了一定緩解。由此，中國進口外國糧食的做法至少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以後進口糧食已不再是救急，而變成了調劑餘缺）。進口糧食的國家也擴大到法國、美國和阿根廷等。

民以食為天。一個國家安定與否，與這個國家能否以自己的土地物產，養活生存於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為基本限度。縱觀中國歷史，人和糧食的矛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那麼激烈的。生存於黃河流域黃土地帶的中華民族先民，曾經創造了輝煌的農業文明。商周時期製造的大量青銅器，多是為飲酒而設計的。這說明，糧食在我們的先民

38　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頁162。

那裏，是充足和豐盛的。那麼，為甚麼幾千年之後，當科學技術有了巨大進步，社會制度發生了天翻地覆式的改變，人們卻還要為糧食發愁呢？這種情況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是老天爺故意施虐？還是土地爺突然發威？是中國的土地養不活在其上繁殖的人口？還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幹了愚蠢的事？

天還是那片天，地也還是那片地。問天和問地，都只能找到使人困惑的一部分原因。最終，我們還是得去問人。

三　問人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自然災害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程度可分為五個等級，即巨災（特大災）、大災、中災、小災和微災。其中巨災是指受災人口達千萬人以上，死亡人數達數千或數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100億元以上的自然災害；大災是指死亡250－1000人，直接經濟損失10億－100億元的自然災害。

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期至少發生過六次死亡超過數十萬人的旱災：

1905年，廣東發生旱災，死亡數十萬人；

同年，山東地區遭旱災，死亡五十萬人；

1920年，華北地區乾旱，死亡約五十萬人；

1923－1925年，四川遭旱災，死亡十萬人；

1929－1932年，陝西遇連年大旱，死亡一百多萬人；

1942－1943年，河南因旱災死亡一百萬人以上。[39]

顯然，按照這個所謂國際通行標準，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發生的幾次旱災，就死亡人口而言，都是超大型的「巨災」。並且，這些死亡人口眾多的旱災，幾乎是在一個省區發生的。可見，自然災害對中國社會經濟打擊通常異常沉重。中國人在自然災害面前，抗禦能力顯得極為脆弱。

---

39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4－5。

那麼，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到底死亡了多少人？這三年的災害，是「大災」、「巨災」抑或「極為巨大的災」呢？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非正常人口死亡的統計，可以說莫衷一是，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一千萬。大陸出版、由胡繩主編的權威黨史著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即採用這個說法：「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40]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所著〈「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根據所掌握的材料，他認為，這三年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萬。

國家科技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災害綜合研究組編輯的《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對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人口死亡數字做了圖表統計。根據這個統計，三年中因災直接死亡人口分別是：1959年8043人；1960年6247人；1961年7710人。總計三年因災直接死亡人口為22000人。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分別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三年總計為1039753人。[41]這個數字是指因災直接死亡的人數。顯然，無論同已知的任何一個估量相比，該統計報導的實際人口死亡數都要小得多。作為官方著作，其引用的資料來自國家統計局和國家民政部。但該書也承認，在1960年和1961年兩年，全國人口比上年分別減少1000萬人和348萬人。[42]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與李南先生合作，利用1953、1964和1982等三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以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歷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進而，他們估算歷年人口死亡數，再減去正常人口死亡數，得出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推算結果。這個數字是大約1700萬人。[43]

40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頁369。

41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162。

42　《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頁163。

43　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1月18日，第15版。

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考證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44]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於1989年出版《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照保守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這個估計沒有附帶詳盡的考證。[45]

上海大學的金輝是大陸最關注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數字的研究者之一。他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計算出1960年和1961年兩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同時，他根據國家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新增人口應為2568萬人，再以1956、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從而估算1960和1961年的正常死亡人數約為1395萬。這樣，按照理論推算，減少人口和正常死亡人口大致相抵，那麼以出生率估出的新增人口就應是非正常死亡人數。金輝認為，中國大陸在三年之間，非正常人口死亡人數不低於2791萬。[46]但金輝認為這個數字對該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狀況反映並不準確。因為，在農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是增長的。如果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那麼總人口減少值將得到修正。金認為，修正後的全國總人口減少值，應為3471萬人，即在2791萬人的基礎上，再加上這期間城市人口的增加量680萬人。這應是三年全國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準確數字。[47]

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紅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大饑荒」一節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48]此說有可能採自叢進書。作者本人未加論證和考證。

---

4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272－273。

45 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1月18日，第15版。

46 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1月18日，第15版。

47 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1月18日，第15版。

48 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1月18日，第15版。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方法，以縣級行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行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在其所著〈1959－1961年中國大饑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一文中，曹提出的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是3250萬人。[49]

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李若建根據詳細的統計資料，對1957－1963年大陸各省區的旱澇災害程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根據計算和觀察，在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各地死亡率與各地的旱澇災害程度基本無關，說明1960年的饑荒帶來的人口損失受自然災害直接的影響不大。而1961年各地區人口死亡率與當年、上一年的旱澇災害程度都具有明顯相關性，這表明，1961年的饑荒主要是自然災害的結果。[50]李對材料的運用是精細的。但對事情結果的判斷是否正確，還值得商榷。因為，除去洪水、地震、颶風、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會直接致人死命外，乾旱對人的致死性並不直接。人的病餓一般要殘喘相當時日。因此，斷言1960年大陸人口損失同自然災害沒有相關關係，難以成立。

但李的研究是實證式的。例如，他肯定：雖然困難時期中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地區都出現人口負增長。在當時全國的二十九個地區中，只有十二個地區出現負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十二個地區中，只有三個在沿海，其他九個在內陸地區。在一些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沿海省份，實際出現人口負增長的大部分在省內的內陸縣。有四個地區連續出現兩年的人口負增長，這四個地區中的三個在內陸地區。三年困難時期對人口的不良影響，在內陸比沿海要更為嚴重得多。[51]

49　王珍：〈三年大饑荒的數字之謎〉，《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1月18日，第15版。

50　李若建：〈自然災害與自然條件對困難時期饑荒形成的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5期。

51　李若建：〈自然災害與自然條件對困難時期饑荒形成的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5期。

很明顯，通過對不同地區的實證性考察，特別是走進各個省份的歷史檔案館，以求得「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死亡的準確數量，思路是正確的。依據幾十年後頒布的全國性統計資料，然後再做各種分析，是目前歷史學家們不得已的辦法。如果甚麼人能痛下決心，同時又具備可行的條件，經過艱苦努力，這個問題應當能予以澄清。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懸案，人言言殊是不正常的。特別是，這個懸案為世界的中國問題學者所矚目，影響甚為巨大。事實上，目前已出版的由各省黨史研究部門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叢書》中，已透露出比較可靠的材料。例如，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和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安徽卷）》一書中即提供了一個比較平實的說法：「1958年冬，鄉村農民開始吃野菜、樹葉、樹皮，個別地方已有人餓死。1960年，安徽糧荒嚴重，除去徵購、種子和水利糧，農村人均口糧不足200斤，全省2900萬人處在飢餓線上。廣大農村田園荒蕪，人們背井離鄉，乞討為生。由於飢餓及營養不足，全省城鄉普遍發生浮腫病，出現低出生率、高死亡率情況，死亡人口增加。1960年，全省出生率為11.35‰，死亡率高達68‰，為全國平均數的3.5倍還多。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57.23‰，全省總人口3042萬人，比上年淨減少384萬人。淨減少的人口中，除自然死亡、遷徙外省外，絕大部分是飢餓所致。[52] 這個數字即1960年安徽省總人口淨減少384萬人，應該較少水份。如果再加上1959和1961兩年的實測數字，安徽一省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就相當龐大驚人了。

河南省無疑是受災最嚴重同時也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據《河南人口地理》的計算，河南省1960年人口的死亡率是39.6‰，自然增長率是負25.59‰。「文革」中，群眾批判當時的省委書記吳芝圃，揭發出來的數字是二百萬到三百萬。[53] 這個數字是否

---

52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和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頁201。

53 林福瑞、陳代光編著：《河南人口地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115。轉引自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8月號。

可靠，頗需考證。但這樣高的死亡率和負人口增長率，曾居當年全國之首，是頗能說明問題的。當年僅信陽一地，死亡率超過100‰，餓死約一百萬人。

2005年，中國政府宣布將即時公開重大災害人員和財產損失數字。9月，中國民政部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字，「我們不掌握」。這大約是官方首次公開面對這一問題，但數字仍付闕如。也許，時至今日，中國官方的確沒有掌握一個可靠的數字。其原因可能當時就沒有進行專門的統計。而且，報導或統計人口死亡的機構有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得到的數字差別很大。更可能的情況是，當時對這件事情非常忌諱。由於政治壓力，也出於自己政績和仕途的考慮，地方官員不願意講出實情，甚至會掩蓋真相。例如，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就追問過安徽省長黃岩：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

不管確切的數字究竟多少，「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數量是巨大的。即使是最保守的說法，也超過了1000萬。如果以1962年全國總人口6.7億計算，則死亡人數已佔到1/67。這是和平時期，又是所謂「如果趕不上資本主義，就開除你球籍」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因此，問題無論如何是嚴重的。

對於死去的人，我們是無法詢問了。而活着的人，會因為這樣巨大而嚴重的災難，究詰很久很久。作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宣稱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和提出在十幾年間趕上、超過資本主義之後，卻遭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會引起怎樣的震動，是不難想像的。由此，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生活中，添加了一個特別重要的爭論焦點：導致如此重大的慘劇，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是天災，天災佔幾分？如是人禍，人禍又幾何？

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54] 此時，災害的情況尚未向社會

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00。

公布。作為總理，周恩來正在忙於算糧、籌糧和調糧。可以肯定，他的感受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誠如上文所述，中國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大國。上世紀和上上世紀都有特別重大的自然災害出現。十九世紀70年代後半期，亦即清光緒三年前後，就曾出現過史稱「丁戊奇荒」的大旱災。這次特大旱災也是持續三年。當時的記載是：「天禍晉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涸，歲饑，無禾無麥，無粱菽黍稷，無蔬無果。官倉匱，民儲罄，市販絕，客糶阻。斗米千錢，斗米三千錢，斗米五千錢。……賣田，賣屋，賣牛馬，賣車輛，賣農具，賣衣服器具，賣妻，賣女，賣兒。食草根，食樹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紙，食絲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為人食，親友不敢相過。食人者死，忍飢者死，疫病死，自盡死，生子女不舉，餓殍載途，白骨盈野。」據《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一書統計，「丁戊奇荒」所波及的人口達到1.6億到2億之多。直接死於饑荒和大災之後的瘟疫的，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其中太原府災前人口一百萬人，災後僅剩五萬人。中華民族歷史上發生的這些大饑荒，真是令人觸目驚心，痛至心腹。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面對特重大災荒，除去發放一點賑災糧食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到皇宮北面的大高殿去祈雨。幾滴稀疏的落雨，是難以解救遠在千里之外數億農民的災難的。

我們已無法考證「丁戊奇荒」是否就是劉少奇同蒙哥馬利談話時提到的那次「八十年前」發生的大災荒。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言及災荒時，不能不聯想到歷史上中國所承載的自然災難。這勢必要引起這些領袖人物的內心檢視：作為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的共產黨人，在執掌政權和實現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後，仍不得不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承擔責任。毫無疑問，承擔責任在政治上是危險的。承擔重大損失的責任更將危及一個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人們如何去面對這個責任？責任的大小、輕重將怎樣在執政群體中加以分配？此外，直面災荒，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能否將災荒對人民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除去調集大量救援物資和實行緊急減災措施以外，執政者將如何反思由大災荒所折射的政策缺陷？

所有這些問題都將無法掩飾地出現在歷史進程中。顯然，無論是問天、問地還是問人，大災荒過程中和災荒平緩後在人們中發生的上述爭論，都將延續相當長的時日。這些爭論將無可避免地為當代中國的政治進程留下鮮明的歷史符號。

第二章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七千人大會」及其圍繞大會所產生的分歧

在中共執政五十七年的歷史中，由中共中央主持召開的會議，應有百次以上。其中任何一次，都對中共執政過程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所有這些會議中特別值得關注者之一。首先，它是自1949年以來中共中央召開的參加人數最多的「中央工作會議」；其次，它的召開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第三，它的餘音和意義遠非尋常。

1962年1月11日，農曆辛丑年臘月初六，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這一天氣溫很低，白天攝氏三度，夜間則降到零下十度。在北京，這也是一個相當寒冷的日子。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決定由北京市負責大會會務。事實上，抵達北京的遠不止七千人。除規定的參會人員外，各中央局、省、地市的領導，都帶來一些工作人員。這樣，每省到京多達幾百人。總共算下來，大約有一萬人秘密地在1962年新年過後抵達北京（會議沒有對外宣布）。顯然，處在物質匱乏中的北京，面對着重大壓力。

但是，相對於接待壓力，會議組織者事實上面對着更為重要的考驗。召開如此規模的大會，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直至會議開始前，似乎並沒有一個非常肯定的預期。中共中央在關於召開這次擴大的工作會議的通知中，曾對會議宗旨做了如下說明：「今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情況，部分

地區已經有了顯著的好轉，但是困難還沒有渡過。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間，還存在着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例如，分散主義狀況，本位主義觀點，不講老實話的作風，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面地只顧本地或者只顧農民一頭，缺乏朝氣，縮手縮腳的畏難情緒，等等。這些觀點、作風，又妨礙着困難的克服。中央希望，經過這次會議，能夠總結經驗，統一認識，鼓足幹勁，加強紀律性，全黨團結一致，一心一德，積極地、不失時機地加強各方面的工作，使當前的困難較快的克服，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順利發展。」從上述通知的語義看，會議主要是想解決「作風」問題。但是，按照常規，中共若決心召開大型會議，首先要解決的應該是路線問題、政治問題並通過決議，而不是一般的「作風」問題。或問，「作風」問題是那個年代政治精英們要解決的最關鍵的問題嗎？

正因為七千人大會召開的這種非成熟設計，才形成了會議的一系列關節點。這些節點曾令歷史學者長久關注。

一　為甚麼要開七千人規模的大會

據現有材料說明，七千人大會召開的最初意圖，是反對所謂「分散主義」。這就是會議通知中所說，存在的「分散主義狀況」，「本位主義觀點」，要加強紀律性，全黨團結一致。而反對分散主義，同糧食問題有關。從1959年下半年起，不少地方糧食開始緊張。1960年後，中共中央一邊發布指示精簡城市人口，一邊制定調集糧食的計劃。調糧計劃往往非常緊急，但卻被地方打了折扣，這是中央所不能允許的。1961年11月1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和上調問題。[1]但中央書記處的強硬態

1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9。此書恰逢本章寫作時出版。它提供了許多過去沒有開放的檔案材料，因此很有參考價值。本書將會在不同的章節提到和引用它。

度並沒有得到地方大員的完全認可。鄧小平提出，1962年全國上調糧食任務將有120億、150億和180億斤三個方案。如果上調120億斤，就不得不加大進口；上調150億斤，日子勉強可過，但仍需一部分糧食進口；只有第三種方案即上調180億斤，才可不進口並有部分調劑。對於這個調糧盤子，華東局柯慶施首先質疑。他提出，按150億斤的方案，華東難以一下調出這麼多。其他中央局負責人也表示難打保票，要回去做工作。此時，大家對吃糧問題非常敏感。農民的困頓和餓飯，不能不在各方負責大員的思考中反映出來。農民的生計必須加以調養，政策不得不加以傾斜。在這種情形下，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提議，與其回去做工作，不如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兩天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了陶鑄的建議。顯然，毛澤東所看重的並不僅僅是調糧這樣具體的問題。在了解了地方大員反映的情緒後，他認為「空氣有些沉悶，人們的氣不壯」。於此他想到，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了」，索性就把縣委書記都找來，要開就開個大會，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他認為，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幹勁。這幾年各省只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幾年來中央犯了甚麼錯誤，要講。中央的賬要交代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毛澤東還提出，他要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思想統一起來。[2]

大躍進中，各省為了將中央和省一級的政策意圖快捷與完整地貫徹下去，曾發明了召開「四級幹部大會」、「五級幹部大會」、「六級幹部大會」這樣大型幹部會議的形式。例如，毛澤東1959年3月5日所寫的《黨內通信》，就題為〈關於召開討論人民公社為主題的六級幹部大會問題〉。所謂六級幹部，即指省、地（市）、縣、社、生產

2 中央書記處1961年11月13日會議記錄。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9－21。

大隊、生產隊的負責人。毛澤東在上述通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即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關於六級幹部大會的規模和會期，毛澤東認為應該是「共計少則千餘人，多者二千餘人。會期七天至十天」。[3] 而要把方針「即刻放出去」，將「大小矛盾轟開」，沒有一定的形式，即召集盡可能多的參與者共同介入，是難以做到的。在「大躍進」時代，由「改天換地」引發的社會氛圍，同常態下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毛澤東上述《黨內通信》寫於3月9日凌晨4時。當日下午1時，毛澤東又在湖南省委的一份簡報上做批示，具體建議湖南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的方法：「不必事先做調查，以省時間。很多同志做了幾個月的調查，開過不少的大會小會，結果對於大量存在的事物，確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原因是方法不對，找不到主要矛盾在甚麼地方。……現在已有了鄭州會議的方針，只須將六級幾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針一放，幾天，情況就會明白了，思想就會弄通了。」[4]

領袖毛澤東，有非常人可比的自信：只要「把方針一放」，情況立即明瞭，問題即可解決。特別在幹部中出現歧見、思想並不一致的情況下，索性召開大型會議，把觀點一直「捅」到最基層，可能更為有效。因此，當中央書記處提出1962年初召開一個地委以上幹部參加的會議時，毛澤東不僅立即批准了這個原本在中共中央議事日程中沒有的會議，並且還擴大了會議規模，即除中央局、省、地（市）縣主要領導幹部以外，工業部門的重要廠礦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軍兵種和院校的主要領導人，都在參加之列。此外，毛澤東當即表示要在大會上講話，並要「中央各同志都講講」。

從某種意義上說，七千人大會雖堪稱中共建政以來召開的最大規模的會議，但它卻是一次臨時動議召開的大會。從毛澤東批准到會議召開，僅僅兩個月時間。通常，黨的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是由一年

3　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9日。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6。

以前的中央全會決定的。會議主要文件即體現黨在一個時期內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政治報告，需要仔細加以研究、設計和多次起草。此外，組織人事問題的確定，也是極費周章的，非有一年時間不能從容解決。而七千人大會的籌備只有兩個月，在時間上顯得比較倉促。事後證明，大會召開時，連會議的主報告也沒能夠完全定稿。

那麼，是毛澤東對會議的設想過於隨意了嗎？恐怕也不能這麼說。根據會前毛澤東的一系列想法，我們發現，毛澤東對整個形勢是有把握的。其主要的方面，是對形勢持有一種積極樂觀的看法。至少，在他看來，這時召開黨內大規模會議，不會出現觀點、說法上的某種爭議，或者，大會不會發生甚麼完全意料不到的分歧。因為，自1960年底以來，經過不斷地努力，對國民經濟進行的調整已經有了成效，體制制度方面也做了相當大的改變，整個形勢都在毛澤東的牢牢掌握之中。

七千人大會前，中央曾經召開過一次工作會議。會議於 1961 年 12 月 20 日開始，一直進行到翌年 1 月 10 日。會議是根據當年 9 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決定召開的。其議題是，討論國際國內形勢；討論1962年的年度計劃和長遠計劃、商業問題；討論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和黨的建設等問題。事實上，這次工作會議為臨時決定的七千人大會進行了準備。

12 月 20 日，即上述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當晚，毛澤東同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談話中，毛澤東着重對國內形勢、當前工作、錯誤的責任、未來希望諸問題表露了自己的想法。這些看法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基本判斷。

關於形勢到底是好是壞，毛澤東說，感覺去年前年心情不那麼愉快。究竟國內形勢怎樣？做一個總的分析，還是不錯的。今年很高興，因為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首先見效在農村，《六十條》一搞，最近把隊為基礎更進一步解決了，現在農村見效了。

關於對過去幾年如何看，毛澤東說，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點錯誤，我們把它總結起來了。好的成功的、錯誤的統統總結起來了，就變成了財

富。然後，我們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事情就會好辦。

關於責任。毛澤東指出，在研究了1958年北戴河會議以來中央工作的情況後，發現問題還是很多。有些問題是部門、地方出的主意，為甚麼中央聽呢？責任第一在中央，第二是省。

關於有沒有希望。毛澤東認為，應該是有希望，是扎扎實實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應該不斷革命，一個任務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務。毛澤東告訴鄧小平，明年要抓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方面，要大抓一年，幾個方面要理出一個頭緒來，都要「躍進」一下。[5]

總的看，毛澤東此時的心境是好的。他認為，經過兩年的調整，「退」得已經差不多了，到了「谷底」了。1962年應該是向上爬行的形勢。按照這樣的基本判斷，他認為全黨需要的是鼓勁，而不是泄氣。而鼓勁便需要統一思想。

毛澤東的這些看法，在他剛剛巡遊的地方，獲得了有力的佐證。中央工作會議前，毛澤東於10月30日晚啟程到上海、浙江小住。12月13日到無錫。第二天聽取江蘇省委負責人匯報。他得到的信息是，江蘇糧食徵購任務已完成94%，棉花超產，原定徵購150萬到200萬擔，實際完成220萬擔。豬、家禽、外貿、財政情況都比較好。在幾年來喊困難不絕於耳的時候，江蘇1961年的形勢令毛澤東精神為之一振。原打算暫時停留的毛澤東，將行期推遲，在無錫住了三天。

在繼續聽取匯報過程中，毛澤東的講話值得注意。毛澤東說，對形勢要從積極的方面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毛澤東還說，貫徹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精神要快一點，一傳達

---

5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190。

下去就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要明確大隊幹甚麼，生產隊幹甚麼，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他強調，「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幹」。[6]

「不要灰溜溜」，「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是兩句最能代表毛澤東此時心境的話。「大躍進」發生嚴重問題後，一般人對國家形勢持悲觀態度。至少，人們看到和感受到的是政治緊張、物質緊蹙和生活凋敝。但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和共和國建設的設計者，他如果也同樣感到悲觀泄氣，便不可想像了。以毛澤東百折不撓的性格，以他希望創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境界的氣魄，在面對「大躍進」所帶來的這些困頓的時候，雖小有挫折感，也謹慎地進行了「糾偏」，但決沒有「垂頭喪氣」「灰溜溜」的道理。在歷史上，毛澤東曾經創造過無數從絕境中奮起的政治奇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翻山」。翻過一次次陡峭的山峰，必定有雲開日出、無限風光的前景。況且，自1958年11月開始糾正「混亂」的努力，雖經廬山會議的「插曲」而有所波折，但所改正的東西仍然是多方面的，甚至已經觸到了許多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從總的方面來說，國家仍是按照毛澤東所期待的社會主義建設方向在前進。有問題加以糾正，同倒退和轉向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綜觀60年代前半期，毛澤東所發的歷史性感慨最多。這些歷史性感慨，都是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來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跨越來說明中國發展道路的。深刻體會這些歷史性感慨，對理解毛澤東這樣一位偉大歷史人物所獨有的精神氣質，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一般人所擔憂的問題，在毛澤東那裏不過是暫時性的困難而已。至於研究者和歷史學家們後來不斷追索的「歷史責任」問題，在毛澤東的心裏可能就根本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死人、餓飯，的確是令人難過，但比較對中國社會主義大方向和大前途的認定、比較

---

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85－1186。

處理事務層面與強調精神追求兩種價值取向說來，前者就有「小人常戚戚」的感覺了。毛澤東要的是精神力量！要的是幹大事業的那麼一股氣！

即使從事務層面講，毛澤東的看法也自有他的道理。這就是他說到的，「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一事只要一傳達，立刻可以調動積極性」等一系列的「政策調整」。這些政策調整，對規範「大躍進」以來的混亂，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關於農業條例的制定。

從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來，不到半年時間，「再次躍進」的口號便軟弱無力起來。農業生產因自然災害的影響，糧食開始大幅減產。據核實後的數字，1960年實際糧食產量只有2870億斤，比1959年減少530億斤，下降15.6%。前章已經詳細講到各地缺糧所形成的緊張。實際上，更為嚴重的在制度方面。新的「大躍進」風潮，引發了新一輪「共產風」的泛濫。在批判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過程中，農村所有制形式再次出現劇烈變動。而與1958年不同，這一次的「求變」，是打出從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的旗號。所謂基本隊有，就是以生產大隊為核算單位所確立的集體所有制形式。而向社有過渡，即意味着將核算範圍擴大到公社一級。無疑，在形式上這是向「公產主義」的更快「邁進」，但本質上則強化和擴大了生產的統一性質，使分配上的平均性更為嚴重。這不僅嚴重脫離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甚至也違反了農業生物學原理。

為了接近這個海市蜃樓，許多省提出三到五年或者五年左右實現從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的過渡。而許多地方為登上這個虛幻的樓閣，不得不滿足一個基本條件，這就是社有經濟在公社的工農業總產值中必須佔絕對優勢。辦法是，大辦社有工業，大辦養豬場，大力興修水利工程。這樣做的結果是，必須無償地從大隊、生產隊抽調勞力、資金和財物。而為拉平窮隊和富隊的物質水平，唯一的方法就是剝奪富隊，讓富隊在資金、勞力、生產資料等同窮隊實行「共產主義大協作」。這種在1958年盛行一時的「平調」方法，不僅沒有威信掃地，反而捲土重來。而對農村生產力構成更大威脅的，是公共食堂

的再度興起。它被看作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大事，從而被極力渲染和執行起來。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示〉。該批示指出，公共食堂是個「極端重要的」的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普遍推行」。[7]據該文件之附件〈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國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截止到1959年底止，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000個，參加吃飯的約四億人，佔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8]四億農村人口捨棄自家的鍋竈，與同村同隊的老少爺們一起吃飯，在人類進化歷史上也可說是個驚人的「壯舉」。如果人們不理解怎樣違背「農業生物學原理」這樣一個十分專業的術語，那麼，從四億人在同一個鍋裏吃飯的情景，就大約可以弄懂其寓意了。

可以肯定的是，廬山會議後出現的這種由政治生態而催化的社會走向，是非常難以逆轉的。在當時的體制機制下，毛澤東可能是唯一能對此提出公開質疑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加以糾正的人。實際上，1959年後掀起的再次「大躍進」運動，到1960年上半年，已經難以再繼續下去。毛澤東通過地方報告的情況，開始對此產生警覺並表示不滿。1960年3月3日，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轉發廣東省委關於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的批語中，比較嚴厲地寫下這樣幾句話：「這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甚為切合現實人民公社在缺點錯誤方面的情況和糾正這些缺點錯誤的迫切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大體上一定都同廣東一樣，發生了這些問題，都應該提起嚴重的注意，仿照廣東的辦法，發出一個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點錯誤糾正過來。」[9]廣東省委披露的人民公社的缺點錯誤是：「目前有些地方，在發展公社經濟上，實際上在重複『一平二調』颳『共產風』

---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80。

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89。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0。

的錯誤。主要表現：1、亂抓亂調或無償抽調大隊的種苗、生產工具、建築材料及其他物資，過多的佔用大隊的土地；2、無償、無限度的調用大隊的勞動力；3、不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和公社的經濟力量，過多的將一些大隊或小隊轉為社辦農場，或以此來擴大公社的經濟的比重。」[10] 對毛澤東來說，這種「平調」之風，是再熟悉不過的了。1958年11月以後，毛澤東已經嚴肅批判了「平調」之風多次。不想，只要水土適宜，它立刻又冒了出來。

3月23日，毛澤東在看到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情況簡報時，對地方上再次出現「共產風」和「一平二調」，表示了相當大的厭惡。他在批語裏說：「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颳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經上級批准，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甚麼叫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11]

這些情況再次促使毛澤東下決心「糾亂」、「糾左」。對毛澤東來說，治「亂」的唯一有效辦法，就是制定若干「規矩」。所謂「規矩」，是以一系列「工作條例」來實現的。在共和國的歷史上，1960年代初期是中共出台各種「條例」最多的時期之一。著名的有〈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十二條）、「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科學十四條」，「文藝八條」等等。這些條例並不是法律和法規，因為它們不具備法律的法理講究和條文規範。但在性質上，它們卻具有剛性，是工作上的「規矩」甚或

10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36。

1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129。

命令。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裏，這些不是法的「規矩」，約束力並不比法律來得差。毛澤東非常看重這些條例，相信它們的作用。

在這些條例中，毛澤東理所當然地最重視兩個關於農業的文件，即「緊急指示信」和「農業六十條」。前者是中央委託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主要內容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等。可以看出，「緊急指示信」的「緊急」意圖，是先糾正再度泛濫起來的「共產風」，即所謂「一平二調」。因為這是對農民危害最嚴重的東西。這時，毛澤東已經了解到農村餓飯、死人問題。不久前，他終於知道了發生在河南的「信陽事件」。這種動輒死去幾十萬人的情況，令毛澤東大為震驚。毛澤東僅用一天時間就審改完周恩來報送的「緊急指示信」稿，對其中一些規定性的提法做了修改。這些修改主要是拉長了對規定執行的時間，比如草稿中「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至少五年不變」，被毛澤東改為至少七年不變；草稿中「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一句中，在「現階段」後加了「在很長時期內，至少在今後二十年內」一句話。[12] 顯然，這是很關鍵的話。

「緊急指示信」下發後，農村反應較好。雖然規定的十二條，過去幾乎都提到過，但以「緊急指示信」的形式再次予以重申，迫使胡鬧的人警覺起來。那些明顯的「共產」做法，由此不能不有所收斂。但「緊急指示信」仍然有「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的規定，這仍然使農民難以真正接受。

相比「緊急指示信」，「農業六十條」是更為徹底地研究和規範當時人民公社問題的重要文件（規定）。「農業六十條」的本意，仍然在規範人民公社的體制。此前，1959年4月上海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曾要求最終制定出一個人民公社示範

1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00。

章程。但人民公社體制不斷調整，示範章程難以搞定。於是，1961年2月田家英提議「可以搞一個章程」。此議獲毛澤東首肯。毛澤東的基本想法是：「要搞一個人民公社章程恐怕有困難，準備一個工作條例，把公社各級組織的職能、權利，想做甚麼，不能做甚麼，都規定好。規定好了，就好辦事了。」[13] 據《毛澤東傳》，毛澤東於1961年1月底從北京出發，沿途經過河北、山東、浙江、江西，最後到達廣州，在廣州召開了著名的「三南」會議，起草定稿了「農業六十條（草案）」（也稱「三月草案」）。

「農業六十條」最重要的內容是，規定以生產大隊的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為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確定人民公社的規模不宜過大，公社大體上相當於鄉，生產大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分配上工資和供給部分為七比三；以及公社佔用大隊勞動力不能超過後者勞力總數的2%和允許社員經營佔耕地面積5%的自留地等等。這其中，體制和規模是最關鍵的地方。它限制了「平調」和所謂「一大二公」，是反「共產風」之道而行之的。而在一兩年前，要提出縮小人民公社的規模，還是不可想像的。因為，縮小規模將意味着喪失農村社會主義的標誌。而自留地的被肯定，不僅對農民生活改善極有幫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緩解了農民怕政策多變的恐懼心理」。[14]

儘管廣州會議議定了「農業六十條」的第一稿，但事實上，對人民公社的調整並沒有停止。三個月後，經過北京中央工作會議，「農業六十條」再次被修改。這個修改稿被稱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最可值得重視的地方是：「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這意味着，自1958年被宣傳為共產主義標誌的公共食堂，自此宣布取消。緊接着，毛澤東於9月29日給中共中央常委寫信，提出人民公社體制還是要「退」：「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

---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914。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922。

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甚麼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即仍然受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15] 10月7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發出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研究「究竟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還是以生產隊（即原來的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的問題」。[16] 最終，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體制變動，在1962年2月1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予以確定：「在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將不是短期內的事情，而是在一個長時期內，例如至少三十年，實行的根本制度。」[17]

在所謂集體經濟的框架內，以規模只有二三十戶左右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可能是「退」的最後界限了。由以上敘述可知，此事一直是在毛澤東不斷思考甚至直接提議下促成的。儘管，農民從生活本能和避災出發，仍希望再降低所有制的「公有」程度，但在毛澤東看來，這只能是最後的界限了。毛澤東認為，通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制度確立，人民公社最大的弊病——平均主義，即，在一個核算單位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經濟不平衡，生產好壞差別很大，窮隊與富隊之間差別很大，而收益卻在生產大隊統一分配從而造成的平均主義，終於可以被解決掉了。由此毛澤東長舒一口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1956年高級社成立），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18]

---

15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284。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728。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80。

1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頁705。

以往人們對毛澤東這個感慨的解釋，多是讚歎，因為毛經過不懈探索，終於找到了比較正確的方式，來糾正「大躍進」的錯誤，解決人民公社最關鍵的問題。但是，從歷史本質看，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毛澤東理念中的社會主義的根本進行方式。他的探索，是在堅持這個社會主義根本進行方式的框架下進行的。他並不想根本地改變甚麼。他所做的，只是堅決「治理」在這個框架裏面出現的混亂。他在〈十年總結〉中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1956年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1958年5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並且提出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1958年的大躍進。是年八月發現人民公社是可行的。」[19] 這個總結性的話，表明了毛澤東對找到一條適合中國自己發展、獨創性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理想寄託。在內心裏，如同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由他提出並被他解決一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制度也被看作是新的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從不得已而學習蘇聯，到「找到一條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當作對社會主義的創造來理解和褒頌的。正如中共黨內最著名的農業問題專家杜潤生所說：最初，「中國合作化的組織形式，基本是學習蘇聯共耕社（初級社）、集體農莊（高級社），只是小有改進，而無大的創新。人民公社就不同了，毛打算領導中國數億農民做個大試驗。這個試驗不是民粹派式的，避開工業化問題；也不同於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西方合作模式；更有別於第二國際先資本主義、再社會主義的主張；不是嚴格的先社會主義、後共產主義的模式，不走一般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而是想試驗一下中國大同世界的理想」。[20]

理解毛澤東的這個「試驗」情結非常重要。它傾注了毛澤東自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即樹立的理想。這個理想是獨特的。它沒有重複前人的設計或某種理論模式，而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土地上

---

19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418。

20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77－78。

自己構造的東西，這無疑加大了人們的寄託。蘇聯30年代搞過類似的公社性質的農村組織，但歸於失敗。這是赫魯曉夫看不起中國的人民公社和對毛幸災樂禍的原因。但是，毛澤東同樣看不起赫魯曉夫，認為他不過是個善於拍斯大林馬屁、外表粗鄙而又沒有智慧的人。對赫魯曉夫的譏諷，毛澤東只是用了他獨特的詩化語言：「嚇倒了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就使中國人陡長了民族志氣，而看輕了自己面對的極為艱難的經濟形勢。毛澤東甚至說過，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從糾正「混亂」和關乎農民生存狀態的角度看，把農村所有制規模降到二三十戶的生產小隊，已經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最為重大的調整了。它的確要比給國家帶來動盪的蘇聯集體化合理得多。但是，從理想或理念上講，人民公社體制的根基不能動搖，如果再進行調整，比如合法化地看待「責任制」和「包產到戶」，那將突破原本設定的制度基礎，也就是向毛澤東的底線挑戰了。在毛澤東看來，實行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和取消公共食堂，已經根本地解決了平均主義問題，因之也就解決了1958年以來人民公社運動出現的混亂問題，因此，他認為，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應該是有希望，是扎扎實實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正因為如此，他的心情變得舒暢了。在1961年12月20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周恩來說到，他對形勢的估計是四句話，即「形勢好，成績大，困難多，任務重」時，毛澤東說：「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向走。農業有六十條，工業有七十條，教育有六十條，商業也將要有幾十條或者一百條，這就有辦法。」[21] 可見毛澤東此時的心境是怎樣一種狀態了。這就是七千人大會召開前，毛澤東的基本想法和他欣然提議開大會的思想背景。

然而，事情並不像毛澤東想像和希望的那樣。人們的思想並不都是那樣一致。在會議的準備階段和會議進行中，逐漸暴露出許多不同

---

21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88。

意見。這些意見，同毛澤東的認識有分歧，甚至分歧還相當大和尖銳。其根本點，還是人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存在着不同的價值評判。同時，由於客觀形勢的困難，還自然引發了對犯錯誤的原因和責任的追問。這當然是毛澤東所不願看到的。

二　一致耶？分歧耶？

在迄今的官方中共黨史文本上，對七千人大會的說法，大致以「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增強團結」為基調。這個判斷是主流意識形態的積極性評價。但實際上，當更多的歷史材料為人們所了解，當1958年至1966年「文革」發動被人們作為一整個歷史時空來研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基調，將可能發生改變。

通常，中共內部的思想矛盾不會以外在的對立形式表現出來。廬山會議後，在對彭德懷進行無限上綱和無中生有的批判鬥爭時，彭曾極度痛苦和陷於絕望。即使如此，彭在身揹惡名而又有口難辯之際，仍出於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威信，而被迫承認和檢討了所謂「罪行」。老一代共產黨人，對於黨內的政治爭論，通常是以黨性來自我約束的。即使存在反對意見，也鮮用公開方式表達出來。隨着毛澤東威望日高，體制所賦予他的權力越益強大時，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首先是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認為毛澤東的意見具有天然的正確性。而在確有不同看法時，也是不會公開表示的。因此，黨史上的確沒有「反對力量」存在。

但是不同的看法總是存在的。一些重要知情人的回憶，提供了關於七千人大會的重要情節。這些情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不同看法之間的矛盾，並且，它們一直涉及到中央最高層之間。

據吳冷西的回憶，1961年12月21日，鄧小平開始主持討論七千人大會報告第一稿。這次討論實際上就透露出人們看法的不一致。會議的參加者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成員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譚震林以及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等人。會上，大家認為報告第一稿對形勢估

計還是過於樂觀，應有所保留。因為目前情況還沒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業、財貿方面的問題還很多；另外，關於十五年「超英」的口號是否還應該提，值得考慮；第一稿對集中統一還強調不夠；有關經驗教訓，要根據中央書記處給政治局常委的檢查加以闡述，而且要聯繫黨的歷史教訓寫等等問題，都提了出來。[22]

在中共黨的文件起草模式中，文件的第一個部分通常要對形勢作出估計。其作用是為整個文件設計背景。一般說，對形勢的描述總是積極的和正面的。在正面肯定問題後再指出面對的問題。先講形勢的積極方面，然後用「但書」加以轉折，構成了文件摹寫的規矩。除非人們對形勢的看法非常負面，形勢到了一種緊急狀態時，文件的形勢部分才可能寫得不那麼昂揚。否則，作為一個正式的黨內文件，其情緒就不太對頭了。而顯然，當 1960 至 1961 年國家經濟遭受重大挫折之際，會議報告的形勢部分雖不能講一片漆黑，但要做過多粉飾，也是不那麼恰當的。因此，參加會議的中央負責人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見。至於提出聯繫歷史教訓來寫的意見，不知所指為何？是廬山會議？還是更早些的「冒進」等等，就不得而知了。但中央書記處確曾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對1958年北戴河會議以後中央發出的文件進行檢視。這是由陳伯達領銜進行的。其成果形式是，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編了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在這個階段的語錄，一本是中央具體的指示和批轉的文件，即由中央各個部門發出的具體指示，以中央名義批准。檢視的結論是，前者確定了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而後者「毛病很多」，問題和責任應由中央書記處來承擔。現在，在參加七千人大會報告第一稿討論的人們看來，這個第一稿，似乎連書記處的認識也沒有達到。

12 月 22 日，劉少奇在看完報告第一稿後，專門到釣魚台找起草組談話。據吳冷西回憶：「少奇同志劈頭就說，報告的起草，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講的那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

22　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黨的文獻》，1996 年第 5 期。

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二）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一年來中央逐步改正錯誤，要求各地、各部門也改正錯誤，不能自行其是。（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示事實，每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這種現象太多，太普遍了。（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半段否定前半段、會後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鬥爭，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糾正。劉少奇特意叮囑起草文件的「秀才」們，不要怕這怕那、束手束腳，要敢講老實話，講過了頭也沒有關係。錯了由政治局負責。[23]

不知此時劉與毛之間有無溝通。據近年披露的材料，毛澤東於11月底即離開北京，在上海、杭州、無錫等地盤桓了二十天。於12月19日晚返回北京。[24] 如果兩人之間有溝通，從毛回到北京至劉來起草組談話，有一天多的時間，就文件起草交換看法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看毛澤東11月12日同鄧小平的談話記錄，則可知毛澤東並沒有想到要起草一個報告。他只是說，他自己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和大區的負責人也要講一講。從毛的這個態度看，似乎他並沒有像通常對待黨的代表大會那樣，要就召開大會考慮正式的程序，要準備一個正規的報告。在他看來，這只是一個工作會議，如同省裏召開的四級、六級幹部會議一樣，確定一個會議的主題，由領導人來講話，確認整個形勢處在好轉之中，把工作講清楚，目的即可以達到了。後來，從臨時延長會期和毛澤東根本沒有審讀完大會報告等情況，也可以說明這種推測。

但文件起草組、特別是負責籌備會議的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常委們，卻無法掉以輕心。他們希望通過這次大型會議，說明當前形勢，

---

23 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黨的文獻》，1996年第5期。

24 袁小榮：〈建國後毛澤東的57次離京〉，《黨史博覽》，2003年第12期。

揭示一些嚴重問題，至少要在大會上討論一些認識不一致的爭論，才算不枉大會的舉行。因此，他們對文件起草十分看重。此時，離大會開始還有不到二十天。「秀才們」深深感到起草報告的壓力。他們幾乎夜以繼日，工作極為緊張：「陳伯達往那兒一坐，就說，我要死了，昨天又是沒有睡好覺，你們有甚麼想法先說說。有時候我們說一說，有時候陳伯達又說了，你們不說，我先說，他就談開了。其實他早就心裏有數了。我們改了一稿又一稿……上午扯完了，下午就寫……很緊張。」[25] 起草小組的田家英私下曾對陳伯達說：少奇同志這次更加強調缺點講透，而且措辭尖銳，我們是做文字工作的，報告是少奇同志做的，我們起草時只能照他說的寫，要改由他改。起草小組當時的共識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見修改一遍。[26]

在劉少奇對草稿提出尖銳意見之後，「秀才們」加班加點，於12月31日終於陸續拿出各個部分的修改稿。這一稿寫作艱難，是增加了「高手」的。據胡繩回憶，他是在1962年元旦的晚飯時，由陳伯達拉進寫作班子參加報告起草的。後者安排他起草第一部分「形勢和任務」。《變局》一書作者認為，吳冷西關於報告起草的前述回憶有誤。真正的第一稿應該是在12月31日完成並送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但根據檔案材料，鄧小平在12月16日已經講到報告要有一個提綱。這說明秀才們已經開始工作。而用半個月時間起草第一稿，按一般速度推算顯得有些慢了。按慣例，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都是由若干「大筆桿子」分工合作而成。一旦指導思想確定，已熟練掌握文本語言、有熟練寫作技巧的「秀才」們，在幾天之內連綴出一篇報告稿並不難。何況，按常例這樣的報告不可能一次完成，它一定要經過反覆修改，多次上下往返才能逐漸「磨」出來。因此，先很快拿出一稿作為「靶子」，是完全合理的。

在知道了劉少奇對形勢部分（即第一部分）的尖銳意見之後，主持文件起草的陳伯達「搬援兵」幫忙是合乎情理的。胡繩的回憶是：

---

25 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0。

26 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黨的文獻》，1996年第5期。

（1月6日）「下午，少奇又來看，看後他找到我，問：你看下面縣委書記一級的同志們對形勢的估計會滿意嗎？我說差不多了吧。他舉了下面的一些情況，說了有些縣委書記的意見。意思就是說，我們把當時困難的經濟形勢估計得太輕了，講得不夠。好像對前兩年工作的檢討也提出了意見。總的感覺，少奇沒有通過，表示不滿意。於是大動干戈，一直改到凌晨3點才大體完成。好像也不只是內容不行，還包括邏輯上的問題。」

根據胡繩的這個回憶，劉在12月22日已經對報告稿提出過尖銳意見的說法，應該是成立的。因為，劉對胡繩所談，比第一次由吳冷西記述的要和緩許多。在後來定稿的報告中，對形勢的判斷是這樣表述的：「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但是，應該看到，目前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困難，還是相當嚴重的……工業總產值在1961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業，由於原料、材料、燃料不足，還陷於半停產甚至停工狀態。特別是對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目前還不可能有多少改善……分散主義傾向的存在，又嚴重地妨礙着我們集中力量去克服這些困難。」[27] 相比較吳冷西回憶的劉12月22日對報告的意見，顯然已經和緩多了，同一般工作報告的「但書」內容很相像了。「下猛藥」、「代表政治局做自我批評」、「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等意思是完全不見的了。

大會開始在即。從1月6日鄧、劉再度到釣魚台談報告起草問題算起，會議開始的時間已經沒有幾天了。據胡繩的記述，7、8兩天鄧和劉又先後到釣魚台來談稿子。同時，稿子的一、二部分還發給了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大區書記們討論，他們也「議論甚多」[28]。此時，劉對稿子還沒有完全放下心來。他又將稿子帶回家，獨自研磨。8日夜12時，劉在稿子上批：「胡繩同志：此件我又把前面幾段看了一遍，有一點修改。國內形勢部分還有些地方是彆扭的。請你們

---

27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58。

2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4。

明天好好再改一遍。」[29] 9日，劉再次到釣魚台同「秀才」們商量報告稿，直到深夜，才算最終定稿。從上述過程看，劉對報告最費心思的還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形勢和任務〉。關於形勢的「說法」和分寸把握，極費周章。同時，表達這種「分寸」的邏輯，也必須精心設計過。從這樣一種「語境」看問題，可說明劉少奇等人面對的複雜形勢及他們的複雜心情。從報告的定稿看，劉先前的態度和設想已經基本不見了。可見，「猛藥」還難以輕易下。對於一個政治家說來，在既定的體制下，在形成文件的文本上是不可能把話說「過」了的。但即使如此，這種「妥協」的結果，並不表明劉對形勢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改變。他總要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問題在於時機。

毫無疑問，毛澤東的態度最關鍵。1月9日10時，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向毛澤東報告：「主席：小平同志囑向你報告兩件事：一、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初稿），共三部分，前兩部分已於昨日上午送上（已同時發工作會議，今天各組即將討論），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這個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報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審閱。二、書記處向常委的報告和幾個附件，應如何處理，請示。出席擴大工作會議的同志們，昨天已到齊，近幾天他們都在參觀。」[30] 此時，離大會開始還有不到四十八小時，時間緊迫。這件檔案透露的兩點情況值得注意：第一，這樣一個大的報告，直到8日上午才送到毛澤東那裏，時間似乎過緊了。毛還有時間仔細審閱修改它嗎？第二，劉將要在大會上作報告一事，此前似乎並未在常委中進行安排，毛似乎也不知道（是楊尚昆做再次提醒嗎？）。所謂「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報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一語，是告知性的話，不像事先已商定而再臨時加以提醒。如事先已決定由劉做大會報告，楊在便條中應該說「少奇報告如何如何」，這比較符合中央決策層的語言習慣。既然劉做報告事先並未研究確定，那麼，報

29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4。

3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6。

告的寫法和對形勢的判斷，似乎也沒有經毛澤東和常委認真討論過。由此可以印證我們的上述推斷：毛預先並沒有仔細考慮過是否要寫一個正式報告，由劉少奇出面向大會宣讀，對當前形勢以及相關問題做出判斷，並以此作為中央的一個結論性意見來指導工作。

那麼，如果毛沒有搞一個正式的大報告的設想，那麼從12月上旬即組織「秀才」班子進行報告的寫作，又是出於誰的安排呢？現在可以確信，毛對報告的寫法和內容是不知情的。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沒有參與過任何意見。他到南方巡視二十天，恰巧是報告在北京構思的時候。毛12月19日晚回京後，劉似乎也沒有把報告的寫作情況報告毛澤東。而根據上面吳冷西的回憶，劉對報告的寫法，特別是對報告形勢部分的寫法，是有相當成熟的考慮的。其關鍵點，就是對幾年來錯誤的估計，即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發生的問題，看得比較負面，認為它們的錯誤程度甚至錯誤性質並沒有被恰當地加以評價。而要解決問題，就必須糾正不實的認識，指出問題的嚴重性。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把錯誤「翻箱倒篋地找出來」。而這同毛澤東關於形勢的看法，是有明顯區別的。前面說過，毛澤東的看法接近於「絕對樂觀」。他認為，通過這一年的努力，特別是農業的條例一發，最嚴重的問題已經大致解決了。國家的形勢正在好轉。他強調，溝底已經爬過了，該開始走上坡路。因此他自己的心情是舒暢的。按照這個總判斷，他同劉等人之間在情緒上都大相逕庭，又何況政見呢？在這種背景下，他關於報告的印象，將難以是肯定的。

據說，毛澤東在8日和9日分別接到報告的稿子後，一夜未眠，於10日上午10時看完了報告的前兩部分，並寫了批示：「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達同志：此兩部分已經看過一遍，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還沒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按指省委書記以上在中央參加小型工作會議的人)，可能也是這樣。因此建議：推遲三天做報告。在此三天內（1月11、12、13），擴大工作會議的同志們，先分組討論農村基本核算單位那個問題及別的問題〔例如總理報告的（蘇共）

二十二大問題〕。請考慮一下是否適當？」[31] 這件在毛的秘書呈送信上作出的批示，頗可琢磨。毛澤東看了報告，但只看了一遍。雖然覺得好，但又說並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再看一遍，才能有所感覺。這些話是甚麼意思呢？是滿意還是不滿意？從語氣看，至少不能說滿意。即時間太急，不能消化。而且他還推測參加小型工作會議的人也沒有時間仔細研究這個報告。因此，毛澤東建議會議開幕的第一天不開大會，而是分組討論別的問題，以待對報告進行再修改。很快，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吩咐鄧等人，報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也不再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報告，而是立刻將報告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准許各種意見發表，根據大家意見再修改，然後提交政治局通過後正式做報告。[32]

在建國後中共召開的歷次會議中，類似毛澤東這種做法，是絕無僅有的。開會拿不出報告，等於沒有一個集中討論的議題。如何聚攏大家的意見，怎樣通過討論達到共識？便都變得沒了譜。這是不得已而出的一個「變招」。它告訴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中央高層中沒有形成一個鞏固一致的看法。毛澤東在1月30日他的講話裏曾經這樣講到報告起草的過程：「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志和別的幾位同志，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同志們，你們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報告稿子發給你們了，果然議論紛紛，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針以外，還提出許多意見。」[33] 可見，毛澤東對

---

31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7。

32 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7。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6。

「秀才」們起草的稿子，至少是放心不下。認為在中央的人並不能充分反映問題的本質。有人認為，毛澤東不贊成報告的內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縣委書記去討論，充實，看看是不是符合他們那裏的實際。」[34] 而起草組成員胡繩後來回憶，毛澤東不贊成報告，是因為報告的調子太低了，對「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不夠，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他「是要大區書記出來講話，不是少奇的話就是最高指示了」。[35]

作為當事人和中共黨史研究的權威，胡繩的分析顯然更有道理。《變局》一書作者在研究毛澤東當時心態時，由1966年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判反推，認為七千人大會的報告起草，已經種下了毛劉之間的恩怨。事實上，不用追溯到四年後毛劉矛盾公開那麼遠。早在1964年8月，毛澤東在與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的談話中，就已經表露過：「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36] 對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不符合毛澤東的看法。這涉及到對1960年以來、也就是毛澤東通過重大努力，用制定一系列條例即黨內法規的形式，確認農業生產所有制必須「退」後等若干新發展的判斷。對形勢和若干新發展所做的判斷，在黨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同總體的「路線」、方針緊密相連，從而也同毛澤東的政治領導聯繫起來，因此有相當的敏感性。後來，由於對形勢判斷再次發生分歧，中共黨內的矛盾也進一步激化了。這是後話。

《變局》一書作者以下的分析是準確的：「既然毛澤東對報告的起草工作採取了比較超脫的態度，是否就可以理解為，當他看了報告稿以後，繼續採取一種超脫的態度，看也不要看完，乾脆就讓大會去討論好了呢？從他1962年1月10日寫給劉少奇、鄧小平等的批示來

---

34 訪問汪東興記錄，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7－49。

35 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49。

36 引自林蘊暉：〈讀《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學習時報》，2006年8月21日，第三版。

看，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應該說，報告的內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37]說毛澤東對他自己提議的有省、地、縣、重要企業各級領導共七千餘人參加的大會文件保持「超脫」姿態，顯然是幼稚的。這樣一個正式報告所代表的，是黨的核心的聲音。其觀點和結論，都應被看作是中央關於方針路線性的意見。毛澤東顯然不會無動於衷。

《變局》作者認為，毛澤東感到意外的，是報告稿草稿的第一部分，也就是〈目前形勢和任務〉。這一部分包括兩個目：「國內形勢」和「基本經驗教訓」。《變局》作者說：「問題恐怕就出在這裏。儘管報告的框架結構和基本精神，是按照毛澤東的思路來搞的，但問題是對過去幾年的工作怎麼總結？講到甚麼程度？這中間肯定要涉及成績和錯誤、錯誤的責任和原因，涉及對當時形勢的估計等等。如果把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報告同後來修改的報告稿進行一番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前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是講將建國以來十二年的成績放在一起混着講的，哪些成績是『大躍進』以來取得的，沒有單獨講，而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所以在大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沒勁。修改後的稿子，重點總結『大躍進』以來成績十二條，缺點錯誤四條，並增加了基本經驗教訓十六條，此外，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前稿上，卻沒有這樣的判斷。」[38]

《變局》作者提供的信息是獨家而重要的。我們現在看不到報告草稿的第一稿。如果這個稿子真是將成績和缺點錯誤做這樣的安排，即將建國十二年來的成績放在一起講，而將錯誤都「歸結」於「大躍進」之後，那無疑是不妥當的。如上文所說，在黨的重要政治文件的表述裏，開篇即應肯定成績。在充分肯定成績之後，再過渡到問題上面。這樣寫，整個文件才是積極和正面的。否則，將缺點放在文件的突出位置，成績部分就自然淡化掉了，文件的傾向也就值得懷疑：到

37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 57。

3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 57－58。

底這個時期的工作是好還是壞？路線是對了還是錯了？在黨內「路線鬥爭」激化期，政治文獻為了鬥爭需要，一般是採用先缺點後成績的處理方式的。例如，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博古作政治報告之後，張聞天作了「反報告」。「反報告」當然是為了批駁「正報告」。當時黨內鬥爭激烈，為挽救西征紅軍的命運，以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為一方的「反對派」，挑戰以博古和李德為一方的「當權派」。反映在政治文獻上，便是述說針鋒相對的意見。蘇聯以「政變」方式剝奪赫魯曉夫第一書記時，決議也是以歷數赫在執政時的錯誤和缺陷為內容的。在黨內政治環境處在穩定時期，毛澤東作為全黨擁護的領袖已經有了近二十年的歷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有了長足發展時，這樣處理黨的一個重要政治文件，必定引起分歧：如果否定了成績，那意味着甚麼呢？在毛澤東看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全黨一致贊成的一項社會主義實驗，錯誤在所難免。而且，有了錯誤，大家已經承認並極力從制度上加以改進，形勢本來是好的。可現在這樣處理，變成了單挑錯誤，至少是沒有突出成績。這是甚麼意思？難道通過對生產關係的調整和降低指標，已經把「亂子」解決得差不多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等等，不是事實嗎？面對七千黨內幹部，怎麼能優點沒有講足，卻「突出」錯誤呢？

當代中國歷史研究界對這種情況的解釋，莫衷一是。主流學者一般是用文件起草者堅持「正確觀點」、堅持「黨性原則」來說明它。但是，這種將歷史截然分為「正確」和「錯誤」的解讀方式，並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因為，一方面，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人，私下的不同看法可能存在，但並沒有出現截然對立的思想分野。要知道，採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來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的意圖，是中共核心層的共識。始作俑者不僅有毛澤東，還有其他人，包括劉、鄧。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那句名言：「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39]

39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96。

「大躍進」出現挫折，並不一定立刻就形成人們認識的對立和出現一批要用「正確」方法來「清算」和「改正」它的黨內「反對者」。從歷史分析看，在60年代初期，即使是黨內精英的認識，也遠沒有達到這種程度。如果說要追究「大躍進」的責任，那就更加荒唐了。追究誰呢？這在當時還是「無解」的問題。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是與非，當時還不能一下分清楚。大家都擠在一個「空想的快車」裏。因此，用所謂兩極思維是解釋不了問題的。另一方面，人們必須考慮黨的政治文化規則。即使有意見和不同看法，在一定政治環境中，也是不能過於直露地表達出來的。它必須考慮整體影響、國內外反映、群眾觀感，特別是，必須顧及毛澤東的威信和態度。在毛澤東巨大政治威望已經樹立起來，在「反冒進」和廬山會議之後，黨內民主環境已大大下滑的情況下，富有幾十年政治生活經驗的政治家們，當然應該謹慎一些。他們自然懂得這一點。

那麼，怎麼解釋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起草報告稿時的想法呢？從吳冷西的回憶看，劉少奇的確對問題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這同他前往湖南老家做調查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他對廬山會議以來黨內不容樂觀的狀況深所擔憂。他在1961年初工作會議上和這次起草報告稿時，都提到如果廬山會議時真正糾正錯誤就好了的意思。這表明，他對廬山會議的結果非常懊悔（對彭德懷的看法應另論）。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說，劉少奇同毛澤東已經存在嚴重政治分歧。在某種意義上，在中共核心層，對於在中國進行的社會主義實驗，是很難遽然區分政治分野的，最多也就是像「陳雲沒有表態」這樣一種認識狀態。從後來劉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看，他還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持肯定態度的。因為他還沒有理由完全否定它。歷史的答案，在當時並沒有被完全清晰地提出來。但劉對現狀確實很焦慮。這表明他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於是，他比較直率地談出自己的感受，而把明顯犯「忌諱」的東西也擺了出來。至少，他認為七千人大會應是一次「震動」幹部們的機會。通過「震動」改正一些問題。這就是報告起草過程中毛與劉之間看法「分歧」的理性解說。

三　矛盾與選擇

下面幾段材料取自《楊尚昆日記》，記錄了七千人大會召開之際中共中央核心層的活動。

1962年1月8日記：「上午看〈在擴大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前兩部分，基本上是好的，目標鮮明！已發各小組討論。第三部分關於黨的問題，明天才能修改好。」

1月10日記：「12時（陳）伯達、（田）家英同志來談上午小平同志同他們去主席處談話的意見，主席認為報告的中心（反對分散主義）不能變動，必須堅持，並決定立即將報告印發七千人大會，分組討論三天，徵求意見，准許各種意見發表……」

1月11日記：「上午10時到12時，書記處開會，由小平同志談各組對報告反應和會議開法、主席指示要點。大家一致認為報告很好，主導思想不能變動，否則不利於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也就不利於建設。」

1月15日記：「幾天來忙於開大會，文件壓了一大堆，今天上午都集中力量看了一些，特別着重看了各小組的簡報，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在於省級幹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會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洩氣了！……晚間8時半到12時，開匯報會議，聽了各組的意見。前面所說的感覺更加證實。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無分散主義來討論，而（王）任重的發言是否定的！……縣級幹部對人民公社的正確性，還有懷疑，覺得不好說。」

1月16日記：「午睡後去少奇同志處，將小組情況向他匯報。他認為：問題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訓不夠，還沒有充分認識，現在不說通，將來會犯錯誤。此情況應向主席反映，由主席決定會議如何開法。……田家英同志來談，劉、鄧已向主席談過，主席

決定成立二十人的起草委員會，先談主要矛盾是甚麼，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起草委員會決定明天下午3時開會。」[40]

楊尚昆的日記通常記錄十分簡要。大多是找誰誰談話、閱讀文件、參加娛樂活動以及同家人間的聚談等等。七千人大會召開前，楊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對大會籌備自然負有重大責任。除行政事務外，他參與了會議籌劃。日記在這一段時間裏內容陡然多了起來。從中透露出許多重要信息。

首先，劉少奇書面報告經「秀才」們起草後，除分送毛、劉、鄧以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審閱外，在參加中央小型工作會議的人員中徵求意見。在這個過程中，參加小型工作會議的中央局和省的領導人，對報告的看法並不一致。其中主要是不認同文件提出的關於以反對分散主義為目標的指向。他們的基本意見是，把分散主義作為反對對象，並不妥當。工業上的分散問題，都有原因。而農業上根本不是甚麼分散主義的問題，是集中過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楊尚昆提到這樣一個情況：縣級幹部對人民公社的正確性，還有懷疑，覺得不好說。由此看來，中央同地方官員的認識不僅存在差別，甚至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如關於人民公社，基層領導人是存在懷疑的。毫無疑問，地方官員對問題的認識更直觀也更實際。只是他們長期揹負較大的政治壓力，不能直接和有效地表達他們的觀點。一旦壓力有所和緩，他們的自主性會明顯增強。而中央考慮的主要是政令的有效性。處在糧食危機局面之下，中央行使職權如調動糧食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

毛澤東主張報告仍應以反對分散主義為中心，這是個不能變動的主題。他堅持認為，分散主義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他看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等是正確的，不存在改變路線和方針的問題。這一點不能動搖。問題在於，黨的幹部們不能嚴格執行中央的調整政策，對「混亂的東西」包括那些完全違背客觀規律的做法，仍不願加以改變。這裏面主要是認識問題。因此，應強調反對分散主義。

---

40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09－113。

但是，參加小型中央工作會議的省級領導人，特別是深得毛澤東褒賞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卻公開反對以分散主義為會議中心議題，這使會議籌備變得複雜起來。楊尚昆在他的日記裏提到王任重的態度時，竟打了一個重重的驚歎號。王任重要幹甚麼呢？我們沒有直接的材料來說明。但從後來報告起草委員會上的爭論看，問題遠不是關於所謂分散主義一個。而是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是是非非了。

楊尚昆日記提到了兩個重要的細節：首先，報告稿不再議論，先發給參加大會的人閱讀，徵求意見。其次，組成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修改。這兩個變動，都是毛澤東提議的。以往關於七千人大會的研究，都想當然地把大會開始的情景，描寫成七千人興高采烈地於1月11日走進人民大會堂。而實際上，由於報告不能定稿，毛澤東突然有了一個奇想，就是不在政治局裏討論報告，而是把報告未定稿交參會人員，大家集體研究討論。所以會議的前三天，代表們是在各自下榻的賓館裏閱讀書面報告。而正是在這時，臨時組織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卻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口頭較量。由楊尚昆日記可知，報告起草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是在17日下午3時召開的，地點是懷仁堂後廳，會議進行了三個半小時。[41]

報告起草委員會都有誰參加？至今仍不能確定其準確的名單。據《變局》一書透露，共有十六個人在報告起草委員會上發言，他們是：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這個委員會共二十一人，那麼，也就是還有五人沒有發言。如果加上政治局常委中應該參加而未出席的毛澤東、朱德和林彪三人，再加上負責執筆起草的吳冷西和田家英，就是二十一人。[42] 但是，《變局》作者這個揣測是有紕漏的。因為據《楊尚昆日記》，楊是每天都

41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3。

42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96－97。

參加了起草委員會的會議的。而且，楊的日記說：「主席決定成立二十人的起草委員會，先談談主要矛盾是甚麼，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43] 可見，劉、鄧在毛處匯報時，定的是二十人起草委員會。當然，這是一個臨時性的班子，增刪人員都可能是隨機的。但楊的日記可證明，發言者為十五位，同《變局》提供的大致相等。但是，裏面卻漏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即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不知楊為甚麼漏記了身份重要並且意見尖銳的柯，其原因只能存疑了。準確地說，這個委員會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各大區的第一書記（只有王任重是省委書記）組成的，他們是中共中央領導層中最核心的人物，也是最具發言權的一些人。這個委員會討論和爭論的東西，將成為整個大會的中心議題。

據《楊尚昆日記》記載，起草委員會從1月17日開始會議，一直到24日結束，共開了八天。每天的會議都是在下午舉行。會上發言井然，似乎有過爭論，但一致大於分歧。經過三天的務虛，到19日，「思想大體統一起來了」。但《變局》一書披露，爭論不僅有，還相當激烈。歸納起來，爭執共有如下幾個焦點：1、報告稿要不要推翻重寫；2、反對分散主義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指標到底高了還是低了；4、犯錯誤的原因和犯錯誤的責任；5、「三面紅旗」究竟怎麼評價，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問題都帶有極為重大和緊迫的性質。它們不僅困擾着當時中共的領導人，也同樣困擾着七千位赴京開會和更大數量的中共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學生以及一般群眾。報告起草委員會的爭論，其實代表着中國人對於自己所處方位的詰問。這一點，成為七千人大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報告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他的主持發言主要談稿子的修改辦法：（昨天）「到主席處談了修改稿子的問題，怎樣修改還是個問題。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主席主張成立起草委員會。稿子中不好的地方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

43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3。

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確的不能推翻。」「首先討論這個稿子是否可以作為基礎？分散主義是否要反？目前形勢與任務是否重新估計？然後討論其他問題。主席說，起草委員會內部要充分討論問題。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緊，不過最好不推翻。」[44] 從劉的這番話可以看出，毛對稿子並不滿意。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關於分散主義是否是當前主要矛盾，由於有人明確表示不同意，也拿不準了。而對形勢的估計，要從新釐定。這是比較嚴重的。說明稿子對形勢的估計不能讓毛澤東感到滿意。

《變局》記述說：聽着劉少奇的講話，「參加報告的諸位，神情專注嚴肅，他們知道這些問題非同一般，十分重大。」《變局》作者如何了解了參會人的表情和心理活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劉講話中提到的毛說報告可以推翻，可知問題並不那麼簡單。據說，在幾個大區書記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和中南，都對報告表示了贊同或基本贊同的意見。惟有華東，意見相反。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明確表示：這個報告愈看愈沒勁。[45] 事實上，柯慶施的話講得要比這尖銳得多。他提出了一連串問題，這些問題是：〈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要不要？十五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指標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甚麼方法鼓幹勁？[46] 不難看出，柯的這些質問很不簡單，話中有話。它是衝着報告的基本看法來的。顯然，報告凡涉及這些有關「大躍進」運動緣起以及運動本身的重大問題，都同柯的認識對不上口徑。柯的反應激烈。姑且不說柯的真實看法是否與劉等人不同，就是他這種尖銳地、不加掩飾地向中央一線領導人發問的做法，也非同尋常。柯同劉在歷史上有較深關係。上世紀30年代，柯在劉的領導下在北方做地下工作，後在延安整風時受到嚴厲審查。柯同劉是老上下級關係這一點，黨內老人都了解。但柯在50年代表現得比較「左」，受

---

4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93。

45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97－98。

46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問題〉，1988年全國社會主義時期學術討論會論文。

到毛澤東的多次稱讚。1958年經過南寧和成都兩次批判右傾保守主義的會議之後，柯的官運開始有明顯改變。在當年5月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他同李井泉、譚震林一起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在大躍進運動將要展開的時刻，人事變更既敏感又說明問題。據說，毛澤東甚至一度想以柯取代周恩來做總理。柯此時提出尖銳意見，是否得到毛澤東的甚麼信息，亦未可知。這樣提出問題的態度和方式，令與會的大多數人感覺激烈和突兀。柯接着又解釋了他的質問。他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除了幾種地區以外，還是適用的。糧食總產量六千億斤不行，五千億斤總還是可以的。華東區到1967年可以完成四千億斤糧的指標。他最後指出，報告否定了這些指標，就愈看愈沒有勁。

柯慶施為甚麼要一再提起〈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工作規劃性質的東西，同七千人大會報告稿有甚麼關係呢？這裏不得不略作交代。原來，關於這個規劃條例本身，隱藏着很深的矛盾。〈綱要四十條〉全稱〈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共四十條。它是1955年1月間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當時的背景是，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正值高潮，為使全國農民看到「繁榮幸福的明天」，制定合作化後的長遠生產規劃便顯得必要了。應當說，存在疑義的並非〈綱要〉本身，而是〈綱要〉規定的一些工農業生產指標，估計得過高了。例如，〈綱要〉規定「在三年五年中推廣雙輪雙鏵犁六百萬部」；在五年內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達到2000斤，半個世紀內做到畝產2000斤等等，顯然是脫離中國農業生產實際的。有些規定還缺乏科學論證。比如，雙輪雙鏵犁這種當時比較先進的農具，對於北方農村耕作是適用的，但在南方的水田裏，雙輪雙鏵犁則「寸步難行」，根本不能使用。1956年，按照〈綱要〉指標要生產雙輪雙鏵犁600萬部，後壓縮為350萬部，實際生產了250萬部，售出170萬部，農民退回80萬部。這說明農民並不完全認可新式犁，並且，製造雙輪雙鏵犁也浪費了大量人、財、物力。柯慶施舊事重提，是在揭一個舊疤。1956年中共中央部分領導人反對冒進，曾對〈綱要〉提出意見。到了1957年，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反唇相譏，指責了反冒進。而直到1958年

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反反冒進」一直持續了近八個月，聲勢浩大，幾乎無人能當。這八個月的「反反冒進」，是「大躍進」得以發動的直接引火線之一。

柯慶施似乎並未參加〈綱要〉的制定。但是，柯卻是「大躍進」最積極的擁躉。早在1957年底，在「超英趕美」和「躍進」口號提出不久，柯就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屆代表大會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工作報告。報告的一個突出內容就是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指責。報告說：「曾經有些人同黨的看法相反，他們把這種革命態度、革命氣概和革命速度，看作是冒進，看作是『好大喜功』。他們總是說這也辦多了，那也辦快了，這也冒進了，那也冒進了。他們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會主義前進了，還是資本主義前進了；到底是社會主義多了、快了，還是資本主義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還是相反。試問，經過一番努力能夠使社會主義前進得快一些，多一些，這難道是錯誤了嗎？」柯的這個講話，把問題的性質直接提到「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高度，以勢壓人，卻根本不討論經濟發展的規律問題，是別有用心的。這種做法雖不自即日起，但使「躍進」與否從工作問題變為政治問題，使得人們不能分辨、無法講話，最終的結果，就是以政治批判和黨內鬥爭來壓制不同意見，造成極不正常的黨內氣氛。在「大躍進」發動階段帶頭批判國務院領導人，並把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當作政治問題加以指責，柯是地方領導人中的第一位。難怪毛澤東曾責問周恩來，你寫得出〈乘風破浪〉這樣的文章來嗎？周謙恭地回答，寫不出來。

柯此時出來「護短」，當然也有隱情，這就是庇護自己的短處。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記載，從1958年6月中旬開始，剛成立的各大協作區先後召開農業協作會議。由柯慶施主持的華東大區率先放出「躍進」炮：華東五省市（不包括山東）當年將獲1200億斤的糧食高產。這個數字使人大吃一驚，因為它相當於華東區上年糧食產量的170%。連主管農業、也對「躍進」甚感興趣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也大為震動。他當即表示，根據華東的經驗，原來

估計今年全國增產1000億斤糧食，就小得不像樣子了。「此後，其他各大協作區也紛紛按『大躍進』的願望和要求測算本區的產量。湘、鄂、贛、粵、桂五省區協作會估計，春秋作物和早稻增產一倍多。一向低產的西北地區提出：1958年每人平均糧食產量要達到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47]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毛澤東在「大躍進」過後，曾承認過自己在建立人民公社問題上有點「冒失」，是「始作俑者」。而事實是，「大躍進」中的地方大員，如柯慶施之類，才是大大助長「冒失」的推動者。他們的動機，往好裏說，是「希望盡快改變中國落後面貌」；而如從官場進退、政治沉浮角度看，則可能要齷齪很多。他們順從毛的意志，即使看出問題，也決不進言，反而推波助瀾，把問題烘托到極致。難道他們就不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嗎？李銳《廬山會議實錄》記，「大躍進」鋼產量翻番的真正緣由，也同1958年各大區安排1959年鋼產指標，特別是同華東區鼓吹鋼產有大空間可以抬升有直接關係。李銳說：「我參加了華東區的這次計劃會議。華東區1959年的鋼指標，要達到600－700萬噸，冶金部曾據此計算過，1959年全國可達3000萬噸。因此促動毛澤東下決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48]李銳當時是水電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的通訊秘書，具有豐富的業務工作經驗。他以當時全國所能生產的電力計算，得出即使調全國大部分電力，也無法滿足華東鋼產量的「超高指標」的科學結論。因此，他回北京後曾向毛澤東諫言，華東的鋼產指標不可信。但正希望全力「鼓氣」的毛澤東沒有理睬。

這兩件材料透露，「大躍進」中最為眩目的高指標，即一個糧食，一個鋼鐵，都同柯慶施治下的華東區「躍進壯志」有直接關係。因而可以想像，到了問題暴露的時候，柯出來「護短」，大講〈綱要〉、「指標」、「趕超」、「鼓勁」等等，就不足為怪了。從本質

4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88。

48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36。

上說，維護了毛澤東的「大躍進」，也就維護了他自己。所謂對形勢認識的矛盾和分歧，這時已經主要表現在政治層面之上，而非思想層面上了。

如果說，柯慶施對報告草稿提出尖銳意見有其自身背景，那麼彭真18日的發言，就更把問題引向了一個新的焦點：誰來對問題負責？彭真 18 日的發言是這樣講的：「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甚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49] 對彭真的這段話，歷來都評價甚高。說他慷慨陳詞，直擊要害。特別是，他直接提到毛澤東的錯誤。薄一波說：「彭真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是有道理的，符合實事求是精神和唯物辨證法觀點。他當時敢於這樣披肝瀝膽直言，是很不簡單的。」[50] 的確，彭真的發言，觸及到毛在「大躍進」運動中的錯誤和所應擔負的責任。他態度率直，沒有掩飾。就當時黨內政治生態而言，這種對毛澤東的坦率批評，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信，只說了「得不償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還是泛指），即引起那樣大的風波。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維護黨的路線的正確性，對那一代共產黨員說來，是無條件的。彭真決不應該例外。

但他為甚麼要這樣說呢？僅僅是因為他敢於披肝瀝膽地直言嗎？或者，因為他嚴格遵守實事求是原則和唯物辯證法觀點嗎？如果是這

---

49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 108。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 1027。

樣，黨內長期形成的領袖與個人間的政治遊戲規則，就將失效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是很難理解的。劉少奇主持的報告稿，遠沒有涉及毛澤東的錯誤，更沒有追究毛澤東的責任，只是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做了一些分析，就有柯慶施這樣的人出來說反對，扔出一句難聽的「越看越沒勁」。即使黨內政治生活是正常的，當大家認識沒有統一、對許多事情的確還看不清楚時，要做到實事求是也極難。「大躍進」問題說到底不是經濟問題，也不僅是建設方式問題，而主要是政治問題。既然是政治問題，其中的擁護與反對、支持與批評，就不是個簡單問題，它不是僅憑實事求態度就能解決的。

大約有兩種人會這樣直率提出意見：一種是彭德懷式的人。他們一貫黨性堅強。為人處世耿直不彎、疾惡如仇而又較少城府。他們通常在黨內資格甚老，戰功卓著，擁有話語「資本」。也就是說，他們很少顧忌，並不特別擔心提出意見的後果。另一種人則是非常受毛澤東器重和信任的人。他們與毛澤東有長期密切的工作關係，通常堅決地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他們把毛澤東看作導師。對導師服從甚至崇拜。毛澤東也把他們視作自己最信任的人。無疑，彭真屬於後一類。在歷史上，彭真並不是典型的從南方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他雖然入黨甚早（1923年在太原加入中國共產黨），屬於黨內資格非常老的那一代人。但他沒有參加過早期的武裝鬥爭。從最初的山西地下黨活動開始，彭真一直在「白色區域」工作，領導天津的工人運動，並長期坐牢。至「七七事變」後，彭真才公開身份，成為中共北方分局的書記。他第一次見毛，是1936年到延安參加白區工作會議。據他的《年譜》記載，彭這次到延安參加會議，深為毛澤東的思想和威望折服，認為毛才是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的領袖，從此成為毛澤東的堅定擁護者。據說，到達延安後，彭真決心以「澎湃馬克思主義真理」為己任，改名彭真（原名傅懋恭）。

應該說，在北方成長起來的革命領導人中，彭真是深得毛澤東信任的人之一。在延安整風的發源地中央黨校，身為副校長的彭真不遺餘力地貫徹了毛澤東的思想意圖，使整風在黨校進行得如火如荼。中共七大前，彭真取代陳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彭連中央委員都

不是，而陳雲卻是六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曾有不成文規定，各個黨的中央組織部長應由政治局委員擔任。彭可以說是一個中國例外。在中共七大上，彭真不僅進入了僅有四十餘人的中央委員會，而且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於1945年8月赴重慶談判前曾向中央提議，如果毛和周遇意外回不來，中央書記處還應保持五人領導核心。因將陳雲和彭真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彭真由此已進入了中共黨的核心層。

抗戰勝利後，中共將獨佔東北作為最高戰略目標。彭真被派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第一政治委員，是為東北地區中共的一把手。當時中共派往東北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佔到中央委員會的將近一半。其中張聞天、陳雲不僅是老牌政治局委員，張聞天還曾擔任過黨的總書記。此外，像林彪、高崗、李富春這樣黨和軍事的重量級領導人，也都在彭真的統領之下。但由於東北形勢異常複雜，獨佔東北、禦蔣軍於東北之外和「放開大路，佔領兩廂」兩種戰略方針都有因時而宜的合理性。可以說，彭真堅決執行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在非常複雜的局面下，勉力支撐了東北解放戰爭的前九個月。當然，以獨佔東北為戰略目標的設想，由於蘇我、蘇蔣、蘇美和我蔣之間錯綜矛盾未能實現，彭的東北中共第一把手的位置也為林彪所取代。

但這並未影響毛澤東對彭真的信任。彭從東北返回晉察冀後，先後任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央組織部長。建國在即，彭被委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這是當時地方大員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一。1956年中共八大設立中央書記處，鄧小平為總書記，彭為書記處的第二把手。黨內曾有規定，彭為鄧小平的「副手」，實為「副總書記」。在中共核心的排位上，彭處在第八的位置，這也是中共核心中出身於北方且未參加過長征等最著名軍事戰爭的唯一高任了。

彭真對毛澤東的擁戴是無可指摘的。即使不是字字珠璣，也大約是言聽計從。這是歷史形成的。因此，彭真在起草委員會上突然提出毛澤東的錯誤問題、責任問題，的確讓聽者感到意外。因為，彭這樣講，是不符合中共黨內的高層政治生活規則的。即使看到毛澤東的問題，為維護黨和領袖權威計，話也不能是這樣的講法。簡單地以「敢

於直言」來評價，有點表面化了。事實上，彭真講這些話的意思，極有可能就來自毛澤東本人，是毛澤東有意讓他這樣講的。其理由可以作這樣的推斷：首先，彭是毛澤東最為信任的人之一。毛對彭沒有像對彭德懷那樣懷有戒心。因為彭真與彭德懷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歷史淵源的人。毛澤東與彭德懷，歷史上雖曾長期緊密合作，但也有很多齟齬的時候。例如長征中的會理會議、抗戰中的百團大戰和西北高幹會議等。抗美援朝戰爭後，毛澤東說彭有驕傲之氣，同元帥們不來往，實則是毛認為彭居功自傲。據說，毛澤東說過，自己身後最擔心的兩個人之一，就是彭德懷。[51] 彭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大功臣。無論井岡山、長征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他都獨當一面，拚殺出不可磨滅的戰績。因此，由威望甚高、功績蓋世的彭來提意見，容易造成某種懷疑：彭的意圖是甚麼？如果彭再同其他幾個重要人物有交流，則更大大犯了中共黨內生活的忌諱。廬山會議的轉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事之間的舊怨和歷史形成的糾葛所引發。按照李銳的說法，他們這些「秀才」小字輩在廬山上同毛澤東談到的「大躍進」以來發生的錯誤，用詞要比彭德懷嚴重得多，無忌諱得多，毛聽後並不生氣，還請他們一起喝茅台。但是，彭德懷出來提意見，毛則倍加警惕，不能忍受。彭真可以說完全沒有上述這些同毛的舊怨，甚至還因東北問題代毛受過。毛對這些當然是清楚的。因此，毛不會對彭真的任何說法產生懷疑。相反，彭這種尖銳意見的提出，同他對毛一貫的有目共睹的尊敬形成鮮明反差，由此使人猜測，除非經毛澤東默許或暗示，彭不會講這些太過「傷人」的話。

其次，彭真對毛的這些批評，都是毛在「大躍進」遇到挫折後自己多次承認過的，並沒有新的內容和新的觀點。例如，「三五年過渡」、「公共食堂」等，毛在不同場合都曾經「攬過」於己。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過，計劃工作的缺點，「不僅沒有注意農業，而且是擠了農業，擠了農業的人力、物力，工業戰

51 參見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線過長，面過廣。這三年都是指標高了後來退不下來。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從九月份開始大搞，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這三年大煉鋼鐵，擠了農業。」「現在看來，社會主義建設也不要那麼急，過急了辦不成，要搞它半個世紀。要波浪式地向前發展。要搞幾年慢騰騰，要搞紮實一點，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農業六十條〉（六月修正草案）頒布後，因為明確規定「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使農民終於解脫了公共食堂這道「枷鎖」。毛澤東此時已經意識到公共食堂的弊端。因為有了他的支持，「六月修正案」才得以實行。當毛聽說絕大部分農村公共食堂散了伙的消息後，曾大加感慨地說：「這是一件大好事。」[52] 這些情況都表明，即使在這些曾經關係所謂「共產主義」實踐的大問題上，毛澤東也有了明確的態度，即「讓步」的態度。無疑，「讓步」就是承認錯誤的表示。就在幾天前，毛澤東還在同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說：「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53] 由此可以肯定，即使彭舉例批評了毛的錯誤，也並不是「揭露」式的。它們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彭真沒有加以渲染，也不是追究責任。彭在這裏強調毛澤東屢次承認過的錯誤，在效果上反而加強了毛澤東的即有威望：承認錯誤而不是掩蓋錯誤，是更加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

第三，對毛澤東本人而言，彭真的說法類似「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比如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這些話其實也是毛澤東自己講過的。比如鄧小平在1962年1月

5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929。

5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88。

11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澤東對報告的意見時就轉述：毛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要怕講我的缺點。[54] 再往前追溯，毛澤東在1960年下半年以後，曾多次向全黨承認過自己的錯誤。例如，毛的為中共中央轉發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第四次報告的批語，就做了一個十分引人注意的姿態：「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的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七年時間現行公社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共社的產，而不是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堅決不變，二十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55] 《毛澤東傳》的作者在引用這個批語時評價說，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對於『大躍進』以來急於過渡的問題進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檢討」，這在他同時期所寫的許多批語中，是「最令人矚目」的。[56] 通觀1960年下半年以後毛澤東的言行，這樣的評價當算公允。毛澤東在這裏承擔的，是人民公社體制上的關鍵錯誤，或者說是「大躍進」以

5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10。

55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222－223。

56 《毛澤東傳》用語，見該書下冊，頁1103。

來農村發生「混亂」的根源性錯誤，所謂三四年間實現從集體到全民的過渡，「共產風」一哄而起。雖然問題已經是明擺着的，但由毛主動承擔「發明權」的責任，的確讓人印象深刻。彭真在這裏不過是重提毛的話。知過必改，是真正的君子。同時，也有提醒別人「認賬」、承認錯誤的意思。其用意顯然不是單單追究毛澤東的責任。

最後，彭真的發言，與其說是針對毛澤東，還不如說是通過坦率的指陳來維護毛澤東。從背景上說，「大躍進」亂子多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已成全黨共識。在這種情況下，敷衍責任、文過飾非顯然是不策略的。七千人大會前，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和書記處講了他對形勢感到滿意的話，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毛澤東所意料的那樣，人人心裏都表示服帖。如果說，吳冷西所回憶的劉少奇對報告第一稿表示不滿，強調一定把問題寫深寫透的情況是真實的話，那麼，毛澤東一定會感到黨內存在的壓力。誠如熟悉中央高層內情人士所透露，當時「攻毛」的苗頭是存在的。在這麼大的災難面前，人們無法迴避責任。而最大的責任者是誰呢？雖然，毛澤東在一般黨的幹部中威望如日中天，沒有人敢或有意識地懷疑毛澤東。但中央高層中的看法卻可能並不一致。當然，當時的這種不一致不應被誇大。也許它們就顯示在某種政治的感覺、關於錯誤的程度或判斷責任的輕重等等想法上。可這種微妙的差異，卻可能造成政治上的敏感和猜忌。否則，人們就不好解釋五年後毛澤東所講的話。毛澤東說，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從政治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的話顯然有水分，是在為打倒劉少奇找歷史根據。因為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劉矛盾並不激烈，非但不激烈，甚至可說是在保持着一致；差別只在於對問題的認識。毛承認「亂子」，但總體肯定；劉則希望全黨更深刻地認識過去幾年做的糊塗事。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到了蘇聯，但並未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而是態度和緩，強調要向蘇聯學習。現在毛講話的公開版本，是1966年整理的，加重了反修的內容和口氣。因此，毛1967年同巴盧庫的談話，並

不真實可信。但是，透過這個講話，可以看出毛從1962年就有了不滿意的記憶。至少毛會認為，劉當時是在「攻」他。對毛來說，化解這種「困境」的最好辦法，當然是於談笑風生中承認錯誤、指明缺點。因為形勢的確不容樂觀，錯誤也是明擺着的。況且一年多來已經多次承認過錯誤。承認錯誤主動，「捂」反而被動。特別是在他那樣崇高的威望（彭真說是「珠穆朗瑪峰」）之下，承認錯誤，只能獲得政治上更大的讚譽。因此合理的解釋是，如果不是毛澤東授意極為信任的彭真出來講話，也是彭真自己出於維護毛澤東而採取的頗具深意的行動。

可並不是所有人都參透了這番深意。1月19日，即報告起草委員會開會的第三天，《楊尚昆日記》記：「3時到7時半起草委員會的討論結束，發言的有先念、陳雲、恩來、小平、伯達等同志，思想大體統一起來了，決定明天起集體討論第二稿。」但據《變局》的記載，當天會議圍繞着18日彭真發言，卻發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鋒。首先是周恩來的一番很不以為然的表態。他說：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會成績大些。調查工作進行後，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經驗現在還不能完全總結，還是初步總結。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覆，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全黨要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不一心一德，集中統一，就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這一點思想不通，辯論三天三夜也可以。[57] 事

57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09－110。

實上，周恩來這番話表了一個「大」態度：不能同意彭真的上述說法。他強調了三個基本觀點：一要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二不能否定「三面紅旗」；三必須「扛住暫時」困難，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周的這個表態是耐人尋味。因為不久前，周在河北調查時，曾比較尖銳地提出了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不同意再搞公共食堂。他在調查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信，毛當即批發黨內。而目前這個發言，卻態度迥然不同了。或許，作為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周恩來發現了某些傾向，意識到必須出來表這個態？

接着是陳伯達發言。陳說：我們不要做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說八道過，要檢查。我們還是要根據毛主席的指導思想來檢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關於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是不是檢查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58] 無疑，陳伯達在袒護毛澤東：誰觸及毛澤東的名字，他就是大逆不道。但這種袒護是否純粹，值得懷疑。八年之後，毛澤東在廬山上說，我和陳伯達認識幾十年，從來就沒有很好合作過。這不啻是個絕妙的諷刺。陳伯達善作長袖之舞，嗅到政治風向不對，立刻壓上賭注，誰知卻並不事事靈驗。此次由他負責起草大會報告。劉少奇所表明的基本態度，即，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等等，陳伯達是知道的。現在他有了應該「反戈一擊」的感覺。因為，毛從外地回來了。毛對報告的基本看法，也似乎傳了出來。這就有了一個表示態度的需要。在黨內被稱做老夫子的陳伯達並不傻，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該怎麼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抬升自己，是需要恰到好處的政治火候的。由陳伯達出來反駁彭真，恰好說

5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10。

明一個問題：風向明確了！雖然與彭真的爭辯，是文件起草以外的事情，但顯然，文件的基本態度，應該改變了。其實，陳伯達並沒有擺脫「書生治國」的宿命。如上文所說，他並未看透事情的本質。要知道，擁護與反對之間，沒有一個恆古不變的界限。有時「反對」之中卻包含着更深層的擁護；而有時，不諳內情的簡單擁護也會被看作是反對。在分歧面前，怎樣巧妙地化解矛盾，從政治層面來思考問題，佔得時機上的主動，就是政治智慧了。

看起來，事情並不像《楊尚昆日記》所記，「思想大體上統一起來了」。

關鍵是，一個認為毛澤東不檢討，會給事情留下隱患；另一個則根本不讓毛澤東揹負任何責任。哪個更明智些呢？顯然，在嚴重問題面前，前者更為主動。

四　分歧在延續

21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的討論，份量其實更重。劉少奇直率表示了如下看法：〈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可以修改。四、五、八百斤（指〈綱要〉規定不同地區糧食畝產量所要達到的指標）提法本身不太科學，農業方面確有人有意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薄一波接着說，躍進的提法，不要隨便提，正常情況下不能躍進，只有各種條件湊在一起時才能躍進，工農業都是如此。鄧小平也贊成說，基數愈大上去愈困難，美國每年只有2%，蘇聯12%就了不起了，技術革命發生了大變化才能躍進。增長的問題變得愈來愈現實起來。二十年後，當鄧小平又一次講到增長數字時，他表現得越加謹慎。經過反覆論證，他才下決心肯定了到二十世紀末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樣的指標。或許，這是在50年代經歷的挫折為他建立了經驗機制？鄧說完後，彭真又提出一個觀點：總路線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但他這個觀點沒有展開。最後，劉少奇總結說，還是要提

「躍進」，「三面紅旗」少一面不好。但對「大躍進」要有新的解釋，要從歷史時期看。[59]

應該認為，至21日起草委員會的討論，最終為報告定下了一個基本的調子，這就是劉少奇所說，「躍進」還是要提，「三面紅旗」少一面不好說。但這樣說，必須對「大躍進」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釋，這是一個難題。可以看出來，劉的說法，是一個政治性的考慮而不是工作性的總結。從會上提到的〈農業發展綱要〉、「躍進」的涵義等等言論看，劉、鄧等主要領導人對「大躍進」的認識，已接近於實際放棄它，至少要進行重新考量的程度。只不過因為政治原因而無法公開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給毛澤東和整個1958年以來的「折騰」留下面子。而這同毛澤東的基本估計則大相逕庭。毛從來沒有要否定「大躍進」的意思。他的真實想法是，「大躍進」出了亂子，就「糾正亂子」。把亂子處理妥善後，仍沿着中國自己「獨創」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走下去。對毛澤東說來，丟「面子」事小（當然也不是小事），同蘇聯赫魯曉夫「叫板」「獨創性」才是大事。可以說，這是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黨內分歧最本質的方面。以這個分歧為界限，分出不同觀點的人。這其中又包裹着其他一系列的爭論，比如分散主義、主要矛盾、中央和地方各負甚麼責任等等，從這一系列爭論中，也可看出不同人的表現：直陳的、擔憂的、辯解的和維護的。

因此，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黨內思想，是一種矯飾。面對如此重大的社會挫折，並進而引發複雜的有關政治態度、思想認識和人事糾葛的矛盾，豈是開一次近乎臨時決定的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說七千人大會恰恰暴露了黨內的認識矛盾，則可能更接近於事實。一年多前的廬山會議，是「大躍進」以來黨內矛盾的第一個暴露點。但是，廬山會議的結局帶有偶然性。因為那時問題雖然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但還沒有後來這樣充分。事實上，到了1962年，人們由於經歷的事情更多了，認識也更為深化了。因為彭德懷、張聞天這兩位講真話的

59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問題〉。

人，在歷史上都同毛澤東有恩怨，因此，廬山會議上矛盾觸發的個人因素相對較重。而七千人大會不同，它在促使人們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時機方面顯然更成熟了。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甚麼劉少奇屢次說到：廬山會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當時反對實際工作中的「左」的錯誤的鬥爭完全丟開，則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大家「同仇敵愾」地向彭德懷和張聞天「開火」，把兩個人都打倒了，但卻找錯了「敵人」。其實敵人就在心裏，即「左」的動機。劉少奇幾次為此惱火，是出於一個有責任的政治家的良心。現在，雖然完全改弦易轍的「火候」還不到，但通過七千人大會這個機會，至少要有所收穫，對所犯的嚴重錯誤要有個認識才好。

事實上，與會者中並不乏有識之士。他們在幾個主要問題上向中央發出了質疑。這使七千人大會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思想史意義。

按照會議安排，與會代表首先討論的是「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儘管這個議題本身就存在爭論，但來自基層的人們並沒有按中央領導層的思路去尋求「統一」。多數人是就他們意識到的「分散」問題提出意見的。如有人提出，分散主義的錯誤，主要是由經濟上的高指標引發的，造成基本建設的亂上馬，搞得戰線過長。他們揭發，在省市和基層，某些領導人鬧分散主義還有很多「道道」，比如「留後手，搞鋪張，打埋伏，盲目地擴大城市人口，增加全民所有制職工」等等。有人歸納分散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種種表現形式是：在政治上亂提口號，亂創理論，標新立異；在組織上的無紀律、無政府，甚至發展到搞獨立王國、對中央封鎖消息，拒絕檢查等等。更有人歷數分散主義的所謂「八大罪狀」：（一）各自為政，目無中央；（二）亂提口號，擅作主張；（三）破壞計劃，不顧國法；（四）謊報封鎖，風頭至上；（五）監守自盜，以鄰為壑；（六）欺上壓下，獨斷專行；（七）生活特殊，像個國王；（八）資本復辟，亡國亡黨。除明顯情感化的東西外，上述人們想像到的分散主義，從根本來說，其實還可以以一個「亂」字概括之，即地方負責人借「大躍進」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之機，各行其是，毫無章法。不過，人們還是「猜」

到了問題的核心，即經濟上的高指標，導致了章法盡失，沒有規矩可循。這樣，就又把問題根源歸結到了「大躍進」上面。這同中央領導層想像的「分散主義」根本不是一個東西。因為各地不服從命令調不出糧，才提反「分散主義」。但顯然，在更大的是非面前，分散主義只不過是個表面現象。因此，連王任重和柯慶施這樣的方面大員，也不同意當前主要矛盾是分散主義。

與會代表追究的「分散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內容，這就是「大躍進」的媒體責任。而這是書面報告所沒有涉及到的。一位代表指出，在「大躍進」的幾個關鍵時刻，如1958年夏秋、1960年春夏，新聞媒體的宣傳口徑嚴重失實，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例如畝產「放衛星」，首先是通過《人民日報》這個代表中央的喉舌「放」出來的。這種媒體之「禍」一經「吹」出，立即引來「群星競放」，颳起了難以遏止的「浮誇風」。又比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口號，不僅違背了科學，有悖於常識，而且在人們思想中造成了混亂。這是一個頗有點皇帝新衣式的揭露。即使在整個民族都在「發燒」「狂熱」的時期，又有多少人真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於二十年」這樣的鬼話呢？一位《人民日報》的老記者回顧過鋼鐵「衛星」上天的實況，從中透露出苦澀。讓我們看看究竟是甚麼導致了「媒體之禍」：「在那一段時間，我每次都列席中南海大煉鋼鐵的電話會議，成為親聆這個最高指揮部聲音唯一的新聞工作者。這樣的會議多由周總理主持，有時是由薄一波同志，個別時候也由李富春同志主持的……各省是工業書記參加。總理挨個詢問：昨天產量多少？書記們挨個回答：昨天生產焦炭多少，鐵多少，鋼多少。《人民日報》與此配合，在顯著位置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各地放的『衛星』和創造的先進經驗：8月21日三版報導了〈河南一千多座轉爐土爐煉出千噸鋼〉；23日三版報導了〈海寧縣有個小高爐五晝夜出鐵八噸多〉；9月26日一版報導：〈江蘇人民決心加速實現萬噸省，新增一百萬煉鋼大軍，趕建十二個鋼鐵基地〉；9月28日報導：〈四川八萬鋼鐵大軍，國慶節不下火線〉；10月27日二版報導：〈首都鋼鐵星期日，城裏城外一片紅，七十萬

人大煉鋼〉。《人民日報》大煉鋼鐵的宣傳，就是這樣產生和進行的。」[60] 通過這個見證式的回憶，我們應該承認，當時不管是亂提政治口號，還是鼓吹「放衛星」，媒體固然難辭其咎，但普通記者卻不應該為分散主義泛濫「買單」。記者們只是「衛星」製造的「見證人」。他們聽從黨的召喚，「滿懷熱情」地反映「衛星上天」，試圖鼓舞人民創造更大的「奇跡」。他們的報導為中國「大躍進」留下了一幅幅戲謔的畫面，結果也給自己職業帶來了羞辱。

真正製造「衛星」的「車間」，其實是中南海裏的電話會議。最高領導人喜好高產量，省裏的書記們當然跟風而上。從常識上說，國家經濟的主持者們是不應相信「一個小高爐五晝夜出鐵八噸」和「趕建十二個鋼鐵基地」這樣神話的。特別是，有人動輒宣布小麥、水稻畝產達到萬斤和十幾萬斤，更愚弄了所有正常的中國人。連著名科學家也耐不住寂寞，鼓吹經過光合作用，農作物可獲理論上的萬斤畝產。中國人在二十世紀50年代出現的集體大狂熱，為歷史研究提供一個「個案」：究竟是怎樣的機制、制度在起作用，才造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紊亂？生活常識不是「新理論」。正常情況下，它是不易被突破的。當時，七千人大會的參加者們給出了這樣一個參考答案：問題主要是主觀方面也就是黨的作風問題。黨的作風這幾年被「吹牛皮」、不實事求是那一套搞壞了，同時使個人主義膨脹起來。分散主義不是一般的個人主義，而是執政黨內部那種「官大、權大、膽大」的人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散主義的重點，是在中央各部和省一級。就是有些人各行其是、標新立異，吹出高指標、搞獨立王國。這是分散主義最大的表現。

提出黨的作風和執政黨內部的個人主義問題，是十分尖銳的。因為從道理上說，共產黨人應該沒有私欲，特別是不應為自己的「官」、「權」、「利」而處心積慮，否則，共產黨不是要墮落成利益集團？可惜的是，某些人一旦成為執政者，他的利益取向就變了。它

---

60 聶眉初：〈頭腦發熱的日子〉，載人民日報報史編輯組編：《人民日報回憶錄：1948－1988》（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頁145－146。

表明，經過幾年的折騰，黨的大多數幹部已經有了實在的感覺，在很大程度上發現了問題的根源。而在整個社會層面說來，「大躍進」已經離散人心，搞不下去了。因此，對於責任問題，總要有個說法，才能令人信服。

判斷歷史進步與否，最終尺度是社會性的覺悟。領袖人物的思想結晶，離不開底層群眾的社會實踐。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基層領導者們，在這場大折騰中親歷親為，是最直接的實踐者。他們為責任和良心所驅使，決心不再隱藏自己的觀點。就在報告起草委員會內部激烈交鋒的時候，大會分組討論也出現了許多勇敢的聲音。

這些坦率的意見，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1 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本身的質疑

例如，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紅旗」抽象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這些具體問題歸納起來共有七點：（一）躍進還是沒有躍進，以甚麼標準來衡量？（二）如果說這幾年大躍進了，為甚麼糧食、市場緊張？（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糧食減產了，對大躍進怎麼理解？（四）高指標、大規劃是不是執行路線的錯誤？（五）路線是正確的，為甚麼有些錯誤和缺點會形成全國性的？（六）有些事情大躍進了，有些並沒有大躍進，怎麼看才是正確的？（七）現在工業調整，農業恢復，能不能說還在躍進？

更有人提出，1959年、1960年糧食減產，牲畜死亡，群眾積極性不高，跟農民說大躍進感到難以解釋。人民公社是不是辦早了，辦快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是否要求這樣改變生產關係？還有人指出，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級社時的生產關係並沒有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一定非辦公社不可。此外，大躍進沒有標準，以至過去說燒飯也要大躍進，將大躍進庸俗化了。

還有一部分人在說法上仍表示堅持三面紅旗，但很明顯已經對它失去了信心。他們認為，不是三面紅旗是否正確的問題，而主要是在

具體執行時數據不夠。如指標要求過高過急，容易發生強迫命令；對某些好的典型強調過分過多，往往使下面不問具體情況，一哄而起。「大躍進」、人民公社雖有問題，不盡符合國內需要，可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必須爭一口氣，把「三面紅旗」高高舉起。

2 對錯誤表現形式的揭露

談到錯誤的表現形式，與會者不但發言活躍，而且比較一致地提出其特徵：（一）高指標；（二）強迫命令；（三）迷信小土群，強迫「遍地開花」、「以土為主」、「愈土愈好」；（四）農輕重比例關係失調；（五）所有制變化過快；（六）對技術革命作用估計過高，忽視一切經過試驗的原則，如某地提出「一天革一個命」，「創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工藝」的口號。（七）理論宣傳失誤。媒體自1958年以來發表很多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文章，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起了動搖作用。提出「拔白旗」，學術批判同政治反修聯繫起來，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學術批判，不適當地宣揚「厚今薄古」的口號，用厚今否定了經驗。當然，中央主要媒體對誇大主觀能動性、提倡唯心主義負有報導責任。這就是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放高產衛星等等。（八）對毛主席指示執行不力。

3 對錯誤發生根源的認識

在這一方面，人們的認識差別很大。有看問題角度的差異，也有認識深淺不一的局限，但分析是認真和尖銳的。如有人說，幾年來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經驗。但相當多的與會者不同意這個說法。他們指出，不能把一切缺點錯誤都歸結到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有蘇聯的經驗，還有中國歷史上的經驗。如果說經濟建設經驗不足，在黨的工作、調查研究方面，就不能說沒有經驗。如果說在鄭州會議、廬山會議前沒有經驗，在鄭州會議、廬山會議主席已經指出工作中的缺點，並且調整了指標之後，

就不能說沒有經驗。因此，沒有經驗，固然是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任何地方、任何部門一切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還有人認為，開始確實由於缺乏經驗，當時形勢大好，大家急於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對於各地出現的一些高產量、放衛星等經驗，就輕易相信、急於學習和推廣。但是，後來在工作中受到損失，逐漸感到不對頭的時候，由於黨內強調反右，帽子很多，壓力很大，以為自己風格不高，因此不敢如實反映情況，說假話，當然不能歸結為沒有經驗。還有人尖銳詰問到：這幾年實際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說成主要是沒有經驗？抗美援朝、社會主義革命也都沒有經驗，都辦得很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沒有經驗，為甚麼單在這幾年發生這麼大的問題？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為甚麼短時間就丟掉了？

有人指出，這幾年經驗教訓關鍵在於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鬥爭上。幾年來認為右是主要危險，認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場問題。大家「談右色變」。光是以反右考慮問題，討論工作，脫離實際。還有人提出，這幾年來所犯錯誤，應該劃分為兩段，即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前和之後。前段所犯錯誤的主要原因，可以說是由於建設經驗不足，後段則不能說是經驗不足，而主要是黨內民主生活和幹部精神狀態不正常。廬山會議前，任務雖重，壓力也有，但大家幹得很起勁。但反右傾以後，情況大為改變，幹群心情沉重，看風使舵，摸上級的底，而不是按黨的政策辦事。有人乾脆揭底說，1959年廬山會議前後，在全國範圍內，究竟「左」傾是主要的，右傾是主要的？需要弄清楚。廬山會議反右及其由此引起的全國反右傾，反瞞產、拔白旗，對地方工作，特別是人的思想發生重要影響。許多幹部挨整，受處分，長期得不到平反、甄別。

4 挑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有人說，「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己也不懷疑。但是，為甚麼實際中出了這麼多的問題？而且問題這麼嚴重，這麼普遍，造成這麼大的困難？文件中把高指標作為主要教訓，但高指標不是根本的而是

派生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是片面強調總路線的靈魂是高速度。還有人指出，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是分散主義，也不是高指標，而是主觀主義以及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懲辦主義的組織手段。高指標、命令主義、懲辦主義都是由主觀主義產生的。更有人直言不諱：這幾年來為甚麼瞎指揮，為甚麼高指標，為甚麼腦子發熱，為甚麼對許多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為甚麼自以為是，總的根源是對社會發展階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認識上有錯誤，誤認為生產力發展很快，誤認為很快就能過渡到共產主義。與此有關的是，不尊重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價值法則，以及剝奪同盟軍——農民等等。有人甚至呼籲：這次會把「三面紅旗」講清楚，就算會開好了！

一位作者這樣描述七千人大會的分組討論：「1月的北京，正值朔風呼嘯、滴水成冰的時節。然而，各代表團駐地卻熱氣騰騰。人們高聲談論，暢抒己見，甚至面對面地展開爭論。幾年之中，人們曾登臨高峰，也經歷挫折，要說的話和要辯明的問題自然很多很多。」[61] 事實上，要說的話固然很多，但問題並不容易辯明。關鍵在於人們的困惑。首先是對毛澤東的崇拜。在五、六十年代，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崇拜是真誠和徹底的，幾乎沒有人相信毛澤東會犯錯誤。毛澤東總是正確的。他總是比別人更高瞻遠矚。即使想到錯誤，人們也不願同毛澤東劃等號——正是由於執行中誤解了毛澤東的思想，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才發生錯誤。這種思維模式甚至讓毛澤東自己都感到不舒服。他多次（包括七千人大會）聲明，毛澤東本人也不是甚麼錯誤都沒有。他願意同大家一起承擔責任。可當時的人們卻永遠忽視毛澤東的真誠。人們寧願自己被禍，也不願讓毛主席跟着「揹黑鍋」。

其次，人們在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的複雜認同之間選擇艱難。好心辦壞事，是責備好心還是善待壞事？在特定社會和歷史環境中，這個選擇成了難題。例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了中國早日

61　林志堅主編：《新中國要事述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276。

改變貧困落後面貌。在動機上，這無可指責。可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卻真實地給人民帶來嚴重損失和災難。怎麼去評判其中的動機與責任？哲學教科書說，動機與效果應該統一。人們不應該離開動機去談效果，也不可能不計效果去論動機。而在現實政治中，動機和效果的追究，卻沒有那麼簡單：或者動機正確效果無論怎樣都應接受？或者效果負面動機也應該被否定？不要說一般幹部，就是黨內高層，也得不出一個圓滿的解答。這其中，有看清了卻不好說的，有始終就沒有弄明白的。而更大多數的人，則從樸素的情感出發，對動機毫不懷疑。儘管如此，人們仍需要一個討論的平台。七千人大會正好為參加者提供了一個機會。因此，一些思考者得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對是非做出判斷。上面引述的這些發言，不僅初步對「大躍進」的指導思想提出了質疑，也對犯錯誤的表現、原因和根源進行了剖析。可以說，人們終究要突破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兩難，實事求是地反思「大躍進」的問題。這一點還可以從劉少奇在大會上所作的口頭報告得到驗證。他在許多地方試圖突破原有的認識，建立起新的對「大躍進」的認知標準。這是具有標誌意義的。

五　劉、毛、林：三個各有「弦音」的講話

1月27日下午，劉少奇向大會作口頭報告。《楊尚昆日記》載：「午飯後，稍事休息即去大會堂開會，2時人已到齊，按時開會。少奇同志報告，花了三小時，5時10分散會。」[62] 事實上，這是七千人大會這個超大型會議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此時，七千多位幹部已經到北京半個多月了。他們還沒有見到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也不知道領袖們都將要講些甚麼。在各個小組的駐地，代表們熱烈討論了有關分散主義和書面報告。這些討論觸發了許許多多的想法，而這些想法理應是得到統一的。

62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17。

按毛澤東自己的解釋，把已經準備的書面報告交給代表討論，會上只由劉少奇做口頭報告，這個「創意」是由他提出的。毛澤東自己說，報告稿子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因為參加大會的同志們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就是，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

毛的這個說法，有十分可信之處。也就是說，他當時的確希望聽到這樣一大批代表各個方面的人對報告的反映。至於毛為甚麼要這樣做，有着不同的解釋。《變局》一書提供了四個人後來的說法：參加報告起草的吳冷西說：毛澤東提出這個不同於往常的開會方法，可能是考慮到大會要解決的問題關係重大，有必要充分發揚民主，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汪東興說：毛澤東不贊成報告的內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讓縣委書記去討論、充實，看看是不是符合他們那裏的實際。同樣是參加了報告起草的胡繩說：毛澤東不贊成報告的內容，是因為報告的調子太低了，對「大躍進」的成績肯定得不夠，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他是要大區書記出來說話，不是少奇的話就是最高指示了。王若水說：毛澤東把報告直接發給大會討論，採取三不主義，表面上看是充分發揚民主，實際是釣魚。[63] 當然，政治通常是弔詭的。如果所有人都說實話，也就沒有「政治」之事了。無論毛澤東自己的說法，還是上述四個人的解釋，都不能算作終極詮釋。只是，在四人中汪和王的猜測恐怕最無道理。

很明顯，報告的要害不是「空」，而是不合毛的心思。這是上面已經講到的。如果說毛是想「釣魚」，那麼，可釣的魚又是誰呢？劉和鄧主持了報告的起草。他們兩個在明面上，無須釣。而大會的參加者，絕大多數對「大躍進」還來不及深刻反思，因此也不值得「釣」。王雖是「圈」裏的筆桿子，但他沒有參加大會籌備，不是當事人，因

63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 48 － 49。

此對政治內情並不深知。這時，黨內鬥爭還沒有形成「兩軍對壘」。認識雖有不同，也沒到用政治鬥爭解決的「份」上。吳冷西的說法用了「可能」，本身就是模棱兩可。只有胡繩的看法最符合當時毛的心態。毛看了報告稿的第一部分，意識到照這樣的寫法，對形勢估計太低，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都評價不夠，這將讓大會開得了無生氣，違背了他召開這樣大型會議的初衷。按照毛自己的觀察，「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有的已經被發現，有的通過制定各種工作條例正在得以解決。開七千人大會的目的，就是統一認識，以便「鼓足幹勁」。報告稿調子這麼低，如何能把大家的認識統一到積極方面來？讓大家一起討論，結論不可能一團黑。這毛澤東是有把握的。對於報告的書面稿，毛澤東肯定不滿意。因此才有成立起草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修改的舉措。況且，毛澤東本人也沒有時間推倒原稿，親自改寫了。

毛澤東對報告第一稿不滿，主要在形勢判斷上。這種情況在27日劉做口頭報告時，終於有所流露。

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實際是對書面報告第二稿即起草委員會討論後形成的稿子，進行口頭說明。據《變局》一書披露，劉少奇做口頭報告時並沒有稿子，只是有一個十幾頁的提綱。這個提綱直到27日下午2時大會開始前，在後台休息室裏常委們聚齊時，才由劉少奇交給毛澤東看的。毛一頁一頁看過後傳給其他常委。「因為字寫得很大，很快就傳看完了」[64]。當然，傳看不可能有討論，更不可能再斟酌。大會馬上就開始了。此前，26日下午政治局常委曾專門開會討論並通過報告的第二稿。劉的提綱應該是在常委會後，根據會議精神趕寫的。

劉的口頭報告1985年公布於《劉少奇選集》下卷。編者在題下註明，講話收入選集時「有刪節」。究竟怎樣刪節，並沒有說明，這使我們今天難以看到講話的全貌。

---

6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29。

其實，講話最重要的部分還是「關於國內形勢問題」。通觀講話全文，劉的想法似乎既堅定又游移。許多地方講得非常肯定，有些地方又像在兩可之間。毛間有插話，在關鍵地方表示自己的態度。關於形勢判斷，劉是這樣說的：「關於目前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夠。」[65] 他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劉在這裏很簡單地畫了一幅草圖，把對形勢的基本估計表露出來。

接着，劉開始分析原因。他說：「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是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區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

說到這裏，劉舉了他去年回湖南的例子。這個例子我們在上文曾經提到過。劉基於他早年在家鄉的生活經驗，把池塘裏還有水作為判斷天災嚴重與否的尺度。這個生活經驗是有說服力的。農民用水自然非常節儉適度。水和糧食的關係，如同人與糧食的關係。有水在，必是農民已經侍候好了莊稼，莊稼必不缺水。劉少奇早年的經驗甚至是，塘裏的水被用乾了，塘底都成了晾曬穀物的場，也不意味着天災就一定嚴重。相反，農民如果生活窘迫，又有極大的意見，那就說明政策出了問題。劉通過調查，這一點是心中有底的。

因此，他在口頭報告裏講了一段當時使人驚詫、事後被歷史學家們廣泛關注的話。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

---

65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頁418。以下凡是出於劉選集的引文不再另註。

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區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本來，劉少奇在前面說到天災和人禍的關係時，是強調各個地方根據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的。可在這裏，他又強調從「全國總起來講」，不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比例。這就有些矛盾了。「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是毛澤東對「大躍進」以來成績和錯誤比例的估計。他常常使用這個比例，人所共知。而劉的論調，突破了這個比例。非但突破了比例，而且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倒過來了，特別是從「全國總起來講」的話，份量很重。儘管劉在講話中還說了「但是這些缺點和錯誤，大部分已經停止，不再犯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說，缺點和錯誤的大部分已經過去了，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現在這場病基本上已經好了」等「補救」性的話，但他「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總估計，還是「過了」。毛澤東在劉說到「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方還可以這樣講」時，有一句重要插話，毛說：「這種地區也不少」。這句話很能表示毛對改變「指頭」數的態度。

毛在劉講話中還有不少插話。比如，毛在劉講到「也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時，又打斷劉的話，插了一句說：還有甘肅的酒泉、張掖地區，甘肅的天水地區。在劉講到發生缺點和錯誤的責任主要應由中央來負，包括中央各部門，包括國務院和國務院所屬的各部門時，毛插話說：包括中央一些不恰當的東西。這句話比劉的指責更直接：是中央而不僅是中央部門要對提出的一些不恰當的東西負責。後面，在劉講到這幾年的缺點錯誤使黨員幹部以至絕大多數人

民都有了切膚之痛，餓了兩年飯時，毛又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從這些插話看，毛似乎沒有掩飾錯謬的意思。他甚至比劉說得還要尖銳些。但是，他也決不會認同形勢一片黑暗。錯誤是明擺着的，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但要說總體上是（或「全國總體上來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是不認可的。

劉的講話似乎有些地方也不那麼有把握。例如他說，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有哪一些？書面報告上寫了四條，請大家看看夠不夠。成績寫了十二條，缺點和錯誤只寫了四條，你們如果認為缺點寫得還不夠，再加上一兩條也可以。這個話反映了劉對參會人員的態度，可能還不太吃得準。有人估計得嚴重，也有人根本不認為是嚴重錯誤。因此，劉說，我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業、文教、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績。不能否認這些成績，不能抹殺這些成績。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面報告上沒有這樣講的，那裏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麼樣，書面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又比如，劉在講到錯誤的性質時說，書面報告肯定了我們犯的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在執行總路線中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的過程中，在某些時候，發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對於好省注意不夠，或者沒有注意；只注意數量，對於品種、質量注意不夠。多快好省本來是對的，但我們沒有全部照着做，沒有做好。劉的這些話，分寸和限制性都很明顯。「執行中」的「某些時候」，「沒全部照着做，沒有做好」；「只注意數量」，「品種、質量注意不夠」等等，份量有限，像是一種很輕的純工作性質的問題。可就在前面，他卻這樣講道：總之，這幾年的經驗、教訓，我們不要忘記了。如果根本不承認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這裏的話又說得很重：「教訓」、「壞事」、「傾箱倒篋地承認」等等，則完全不是在說工作性質問題，而是指斥犯了大錯誤。

又比如，劉說：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但幾年來在執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夠。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種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還看不那麼清楚，不那麼明顯。……對於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不能只是根據現在的情況去斷定，而應該看它將來的發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們說，人民公社是建設社會主義旗幟，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也會採取這種組織形式。……現在看來，人民公社還是應該辦的，問題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鋪開，不要搞得太急。應該經過典型試驗。……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廣，……我們辦人民公社的主要教訓，也就在這裏。[66]

要劉在這時完全吃準問題，是困難的。他一方面對問題看得很深，另一方面又身陷政治解釋的兩難：在肯定和和否定之間，難下斷語。下面兩段話最能說明他的這種兩難困境。他說：在書面報告上，我們總結了十六條經驗。這是初步的總結，現在只能做初步的總結。因為有些事情現在還看不很清楚，等到將來，我們的經濟再回升，全部恢復，並且繼續前進以後，再來看看，就能夠看得更清楚。再過五年，或者再過十年，我們還要做進一步的總結。他又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

根據劉少奇之子劉源的回憶，1962年7月上旬，剛從南方回來的毛澤東，同劉少奇相見於中南海游泳池，兩人間曾有一場言語衝突。這個衝突透露出劉少奇的內心苦痛，也可以看作是七千人大會後兩人對形勢及問題認識的一次攤牌：當時，在泳池裏的毛質問前來同他談話的劉說：「你急甚麼？壓不住陣腳了？為甚麼不頂住？」又說：（陳雲、田家英）「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甚麼？」這時，劉也按捺不住，竟直言冒犯了：「餓死這麼多人，

66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記錄，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36－137。

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但毛並未退讓，仍然抓住政治問題不放：「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面對毛的咄咄逼人和氣勢，劉未再爭論下去。他向毛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方案：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從應對危機的角度說，這「四不」在政治層面上是可為毛接受的。但是，毛劉之間在形勢總判斷上的分歧，顯然已不容易彌合了。

從時間上說，這是七千人大會半年以後發生的事情。但不難看出，它同七千人大會上的分歧如影隨形。毛在七千人大會後到南方視察，實際是在尋找證據，證明形勢並不像有些人估計得那麼壞。以毛的性格，他不會斷然改變自己成熟的判斷，同時，一些地方大員也樂於給他「好看」又「好聽」的東西。因此，他更堅定了自己的判斷。如果把「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那毛怎麼能容忍呢？因為三面紅旗和人民公社，寄託了他太多的理想，是他獨創的社會主義實踐。但劉的認識不同。他是從國家主席職位的角度看問題，從責任的深重來檢討作為的。他「歷史要寫上你我」，「人相食，要上書」的話，憂患極深，不僅可看作共產黨領袖的自責，更是作為國家主席甚至一般意義上最高統治者的「德行」檢討。可以想見，劉長期以來必定心情壓抑，時時受到道德和良心的煎熬。同毛比較起來，劉更「務實」。在嚴重局勢面前，他不能只從理想出發，而更多的是考慮責任、後果，並全力從問題的實際應對着想。這樣，毛劉之間就形成了思維和理念的「兩分」。

但是，要說毛就是想把中國的事情搞壞，那也非常荒謬。毛作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受到人民的極大擁戴，他為甚麼要把中國的事情搞壞呢？這說不通。毛難道沒有意識到責任嗎？也不是。他甚至比劉還要顧及責任。他多次說過，我們搞不好就下台，由國民黨來。說毛澤東只從個人責任思索問題，那是看低了他。根本而言，他認為自己堅持的建設道路沒有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得到人民擁護。並且，一年多來，對錯誤也做了糾正，連食堂也不辦了，還要「退」到哪裏？這根本不是責任問題，而是共產黨意圖倫理

有沒有合法性的問題。共產黨幹了這麼多好事，到底是胡亂來還是自有理由？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毛澤東堅信自己的道理：共產黨所幹的事情，不僅黨員擁護，老百姓也不反對。你劉少奇能否認嗎？即使餓死一些人，也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不能因為死了人，就宣布共產黨沒幹好事！死了人，老百姓也不會反對共產黨。老百姓反對的是那些直接統治他們的幹部。這些人行為好壞，德性高低，是否親民，在老百姓眼裏是有稱量的。由此而言，共產黨的領導和共產黨幹的事，群眾是認同的。更何況，在困難面前，共產黨還在想盡辦法，帶領群眾克服當前困難，然後再奔前程！這是不能否定的。

劉少奇即使把責任看得再重，也不能否認上面的道理。劉不是毛澤東的反對派。他是同毛澤東一心一德想把中國事情辦「漂亮」的人。可是，他畢竟不是毛澤東。他有自己的憂慮和焦躁。他或許缺的就是毛澤東那種大氣磅礴和高屋建瓴。因此，他內心充滿了矛盾。在毛澤東看來，他是右了，頂不住困難；而在他自己的良心說來，他又是「左」了，太對不住老百姓。他的口頭報告的弦音正是這種矛盾表露：「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劉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原話是：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對劉說來，這是一個政治和道德尺度。這個尺度既無奈又合理，是唯一能合攏毛劉認識並統一所有人思想的說法。

因為上面這些緣故，劉的口頭報告顯得含混和模棱。但作為黨的領袖，在許多方面劉是可以直言其弊而不須掩飾的。例如，關於黨內民主和黨內鬥爭，劉已經到了不申斥不行的地步：這些年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根本原因，「是違反了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有些單位，就完全依靠命令辦事，用電話會議以及其他方法進行瞎指揮，有時也開些群眾性大會，但大都是形式主義地討論和決定問題，不能反映群眾真實的意見和要求；同時，在黨內和群眾中，又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鬥爭，使群眾和幹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也不讓講真話。這樣，就

嚴重地損害了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許多錯誤長期不能發現，長期拖延不能改正。」在缺乏民主傳統的文化氛圍內，人一旦執掌不受制約的權力，過火鬥爭和蠻幹、胡幹不可避免。通過檢討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毛和劉都尖銳看到了這種現象。可是，申斥是不解決問題的。劉雖然幾次惋惜提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卻不能正確認識那場效果極壞的黨內鬥爭，以至他在大會上仍然點了彭德懷的名字，說他裏通外國，無異把彭之罹罪定成了死案。這不僅是彭的被難，更是劉的悲哀。

劉還嚴厲批判了「左」比右好的說法。劉指出：「犯『左』傾錯誤是方法問題，犯右傾錯誤是立場問題。我看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是錯誤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勸告同志們，不要做那個引號裏面的左派，要做實事求是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密切聯繫群眾的、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真正的左派。……不要做那種脫離實際的、脫離群眾的、冒裏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蠻幹的那種加引號的左派。……這種人就其所犯錯誤的後果來說，和右派差不多，不見得比右派好一點。有些人在犯了極左的錯誤以後，轉過來又犯極右的錯誤。」劉把帶引號的左派定性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冒冒失失」和「蠻幹」，是針對着大躍進以來的表現。通常的說法是，「左」是超過了客觀的可能；右是落後於客觀實際。但是，在共產黨內，對「左」和右的解釋，通常不是從認識進入的。「左」比右好的潛在意識，要政治化得多。「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方法錯了，只表明動機良好卻辦了錯事，但立場出了問題，就是革命的異類和對「主義」的背叛了。在歷史上，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幾乎不可原諒（近年人們逐漸摘掉了陳獨秀這頂罪孽深重的帽子，改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定性。對陳本人，也不斷被由衷懷念起來）。毛澤東曾被國際派稱為右傾。在江西蘇維埃區域，毛澤東也因為「右傾」挨了整，曾被罷官，十分痛苦。再後來，劉竟也被說成「形左實右」，成為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可見，凡是右傾或右派，都沒有好下場。相反，人們

對「左」總是有一種同情。錯誤雖然可恨，但其情卻可原。因為他們是所謂「好心辦壞事」。這種現象，是中共黨內長期存在的一種政治文化現象。它可能同共產國際的某些特定思維有關，但更重要的來源，還是一種激進主義的政治態度。這在中國具有更為深遠的意識根源，其力量也更為強悍。鄧小平說過，我們共產黨人太性急，總想把好事一下子都做完。這與其說是批判，倒不如說是開脫。因為它還是從善意的方面去評價超過客觀可能的「左」。真正意義上的原因，應該是百年以來中國激進主義思潮的作祟。因為近代以來民族倍受欺淩，國家始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要革命和爭獨立的意識，在一輩又一輩知識分子中升騰起來。他們由此建立自己的世界觀，接受世界範圍內流行的暴力革命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是最為他們接受的一種理論。在所謂「武器的批判」中，激進主義大興其道，總是以最革命的面貌，走在運動的前面。在這個意義上，也許愛默生的說法是對的：「沒有歷史，只有傳統。」1949年以後的情形，並沒有因革命成功而完全改變。為了盡快變革「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激進主義似乎又找到了自己適宜的土壤。大躍進、大蠻幹、大胡幹和荒唐幹的事情，不僅為美麗的理想宣示所掩蓋，而且具有了更為「合法」的色彩：在「左」是方法問題的思維模式下，下層幹部們不會考慮胡幹的後果，只會以越「出格」越顯示你「良好動機」為思考原點，從而得到上級的賞識。在劉的這番對「左」比右好的批判中，他明顯是溫和的，並不那麼深惡痛絕。他甚至還希望出現「真正的左派」。可在三十年過後，鄧小平對「左」的批判就要深刻得多了。這是在經歷太多失敗和吃過大虧之後，對激進主義包裹的具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破壞的實質反思：「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的這個反思，被中國思想界和有識之士們奉為經典，甚至被人們當作一件武器，用來同「老左」們鬥爭。至於清算帶功利關懷的激進主義的任務，我們必須承認，這是劉少奇那一代人所無法提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在口頭報告裏再一次講到了他鍾情的政治倫理，即「吃虧」與「佔便宜」問題。他說：「過去，有些老實人說了老實話，吃了虧，而不老實的人卻佔了便宜。黨內的這種情況，使一些幹部產生了一種印象：似乎老實人總是吃虧；似乎手長一點，隱瞞一點，說點假話，總是佔便宜。這種現象是不正確的，不正常的。在共產黨內，在人民群眾中，不允許滋長這種風氣。要抵制這種風氣，要對這種風氣進行鬥爭。說老實話真的吃虧，說假話真的不吃虧嗎？老實人真的吃虧，不老實的人真的不吃虧嗎？(毛澤東插話：總有一天要吃虧的。)我看，不怕吃虧的老實人，最後是不會吃虧的。因為老實人吃點虧，黨內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黨和人民終究是會信任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虧的『聰明』人，不老實的人，最後是要吃大虧的。因為你總是說假話，長期這樣搞，黨和人民就不會信任你了。」幾年以後，劉的這套政治倫理被惡批為「吃小虧佔大便宜論」。對於共產黨員和一般老百姓，這批判的衝擊是巨大的。因為，世俗原則在同革命原則的對峙中，終於敗下陣來。在所謂「超凡」革命的年代，除了奉獻，是不能談「佔便宜」的。誰談佔便宜，就意味着對革命的背叛。可以說，在中國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最合理的事情，就是「以革命的名義」。在所謂革命的名義下，一切沒有法紀的、沒有制度的、沒有道德的和有悖常理的事情，都堂皇登場了。「革命」的破壞力之大，甚至能掀起近十億人的集體「瘋狂」和「道德失憶」。劉的這套「吃虧與佔便宜」理論，被徹底擊垮。劉少奇本人也在「革命」的沖決中，死於非命。因此李慎之先生曾說，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兒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無疑，劉少奇的動機是好的。他的道理也是符合正常社會倫理原則的。更何況，他當時是從共產黨員要實事求是角度，解釋吃虧與佔便宜的道理的。而悲劇在於，「革命」的「功利」和「酣暢淋漓」，要遠遠大於實事求是的艱難和獲益。因此，劉當時也不得不承認「要實事求是還要有勇氣的」。

劉的口頭報告，是一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勇氣和灼見的報告。除去對形勢判斷講了真話以外，報告對三面紅旗的有限保留態度，也是突破了以往的界限。因此，人們長期以來對報告的歷史評價

甚高，認為它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文件。但從今天的解讀出發，我們更看重的，則是它的歷史價值。所謂歷史價值，是指它在怎樣的程度上推動當代共產黨人士深化了自己的認識。我們知道，知難而行易。認識問題總要受到時空的限制。特別是，當政治考慮不能不遮擋認知需求時，人們探索問題的本質和公開改變一些東西的期待，會受到很大制約。劉少奇自1961年實行農村調查之後，看到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民和農村帶來的嚴重問題。出於責任，他希望把問題講透並盡快吸取教訓。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角色，使得他不可能無所顧忌。因此，他的口頭報告總讓人感到上下矛盾（編輯者已經做了若干刪節），不是那樣淋漓盡致。同不久後（1962年上半年）他主持所謂「傷筋動骨」的調整相比，做的就遠遠大於七千人大會上說的了。其實所謂調整，是不公開的「倒退」：打着「堅持過去」的旗號，把走得「太遠」、「太快」和「太亂」的東西，強行加以校正，有些地方甚至要矯枉過正，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有點改弦易轍的意思了。不能否認，這樣做會觸動自1958年以來大家一致認可的政治努力，也引起劉毛之間的政治不快。到1962年夏季，這種不快變成了政治分歧。毛對劉說，我不在，你就「頂不住」。後來，毛果然就此責難劉少奇，說劉「1962年的右傾」（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批評劉的用語）。從歷史價值判斷，劉的這個「右傾」恰恰表現了他敢於回應錯誤，堅持自己想法的一面。因此，劉在1962年的政治主張，應該給予較高的價值評判。

《楊尚昆日記》1962年1月29日記：「下午4時到7時，開大會，林彪同志講話。」從時長上看，林彪講話同劉少奇一樣，都用了三個小時。應該是一次很有內容的講話。可惜今天人們看不到講話的原文，因為林彪不可能出版自己的年譜或文集了。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林彪講話有一個自己的習慣，就是「拉條子」。所謂「拉條子」，是林在重要講話前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用很大的字把想到的內容寫在白紙上，一張紙寫一條，寫完扔到地板上，然後再收拾起來，串成一個講話提綱。在中共領導人中，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講話準備方式了。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實際上預先由羅瑞卿組織人起

草。稿子草擬後，林不滿意。林彪對講稿不滿意可能有三種情況。第一種可能是確實對草擬稿內容不滿意。因為，寫作班子起草的東西，往往熟練運用流行的套話，做一般性的表態。這種講稿沒有實質內容，更沒有講話者的神氣。第二種可能是，林對七千人大會的發言非常重視，因此，必須由自己思考並定下講話要點。第三種情況是，通過會議的進行，林彪改變了自己預定的想法，需要有針對性地講些意思，因此必須躬身為之。如果是後兩種情況，文件起草班子的稿子當然是不能合用的。從現象和後果看，第三種考慮可能最符合實情。

林彪雖是軍隊統帥，但決非鹵莽武人。他是一位極有頭腦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對政治形勢的判斷，都是一流的。姑且不論他在戰爭年代指揮重大戰役的勝算與功績，即在建國後的政治風雨中，他也做到了既非唐突行事也非謹言慎行，而是長居中樞，穩步遷升。1955 年軍隊授銜時，林居十大元帥第三位，僅排於朱德和彭德懷之後。1958年八屆五中全會，林又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前，林除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外，只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虛職（1955年起曾任副總理），不久即長期養病，並未活躍於政壇。1954年高崗事件中，林還多少沾了點邊，成為高拉攏的對象。但在1958年，他突然竄升至中國前七位的領導人，即中共中央六個副主席、七個常委之一，成為在公眾場合懸掛頭像的領袖。可惜的是，迄今未見黨史學家對林的這種奇異政治升遷做出合理解釋。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林的上山，被說成是毛搬的救兵。由李銳披露的材料可知，林彪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兩次常委會上，對彭做了蓋棺論定式的批判，為彭的「野心家」定了調子。但即使在這兩次會議上，也有意味深長的插曲。被毛耿耿了二十餘年的長征中會理會議問題，反而由林彪加以澄清，給彭德懷以某種開脫。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林彪是中國當代政治中不能忽略的人物。他的每一次講話，都有不同凡響的地方。

林彪講話分為兩個問題：一為國內形勢判斷問題，一為軍事問題。軍事問題是林的主管。此時國際形勢比較平穩，沒有非常敏感的軍事鬥爭議題。因此，他的帶有「專業」性質的講話，沒有特別震動

人的地方。相反，林對於國內政治問題的講法，卻引起很大反響。這同林素來語出驚人的特色有關。林對於人們正熱烈討論的「三面紅旗」問題做了這樣的判斷：「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採取這條路線，應該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幹勁的做法，不爭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費的做法。總路線本身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各個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們抓到一個方面，丟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林彪接着對「三面紅旗」做了具體分析：「關於大躍進，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的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歷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大躍進是正確的。人民公社，具有很多優越性。在開始階段，我們還沒有完整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這種制度，把過去初級社、高級社的優點都集中起來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特點，毫無疑問，這種組織，在今後會愈來愈顯示它的優越性。它將隨着實踐的經驗更加證明是正確的，是能夠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更好發展的，我們的的確確找到了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

迄今我們不知道，七千人大會是否對中央領導人的發言順序做了特殊安排？林彪第二個發言，緊接在劉少奇之後，時間同樣是三個小時，論調卻截然相反（指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反差極為鮮明。這是耐人尋味的。一般說來，中央領導人的大會發言，至少要在中央

常委會上有所議論。現在我們知道，劉的口頭報告是在常委會上議論過的。但林彪的講話顯然沒有經過中央常委討論。由羅瑞卿主持起草班子的講話稿，被林棄之不用。他「拉出的條子」，雖看似沒有完整文字，但卻理出了思路。這些「條子」和思路，林大約完成於講話的前夜，已經來不及由常委討論了。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毛澤東根本沒有要討論林講話的意思。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大會講話不經過集體討論，在現在是不可想像的。可在當時，林就這樣把講話拿了出來。對林彪這個講話的出現，我們可以有幾種猜想：第一，這的確不是一個精心準備的大會。正如前文所說，毛決定開這樣一個會，是在「靈機一動」中定下來的。議題本來是反分散主義；形式則是仿照當時經常召開的「四級幹部會」、「六級幹部會」，以人員眾多、基層參與、「精神直接」為特徵。但由於時間倉促，領導人的認識並未真正統一起來，特別是，人們開始接觸「大躍進」失敗以後的國內形勢判斷、對錯誤到底多嚴重進行評估這樣重大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作出所有人都接受的回答，還必須假以時日。因此可以說，大會是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召開的。第二，在看法上，意見相互對立是存在的。從大多數參會者的討論發言看，對大躍進產生明顯懷疑的人，已有相當一部分。他們可能還代表着各地區、各部門的相當一批人。他們是勇敢者，比較直白地質疑了大躍進中的問題，甚至質疑了大躍進本身。但必須承認，當時的大多數人還是對大躍進持讚賞和支持的態度。讚賞和支持，可能有各種原因，當然首先是政治上的。否定和質疑大躍進，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自廬山會議以來，批判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使人們很難講真話。像彭德懷一樣，講真話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也有大量的不容否定的認識問題的存在，即思想上真實地擁護大躍進。這是「意圖倫理」的心理效應。因為當時人們徹底反思大躍進的歷史條件還沒有出現。第三種，就是通常由黨史學者解釋（包括一些老年人的回憶和研究也作出同樣的解釋）的，像林彪這樣的人，他們「對如何迎合毛澤東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林彪看到，「劉少奇的講話雖然隻字未提毛澤東的錯誤，但顯然對『三面紅旗』也沒有給予理直氣壯的、充分的肯定。他講的『三

七開』，更暗含着追究黨的責任、毛澤東的責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會上批評的不少錯誤的決策都是毛澤東提出或支持的，毛澤東的內心深處一定不好過。這個時候，倘若有人站出來為他說話，一定會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或許還會被視為知己。有了這樣的考慮，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應該講甚麼內容了。」[67]

在既定制度和政治生態下，討好毛澤東並進而有所圖，不是件不正常的事情。在共產黨內，誰存心想同毛澤東分道揚鑣呢？即使彭德懷也決非這樣想。擁護毛澤東有兩種情況。一是不論毛澤東做甚麼，都毫無疑義地、死心塌地地擁護。這一類人如同宗教崇拜，對是非沒有興趣。還有一類，是看到問題存在但礙於各種考量，不但沒有提出意見反而褒以擁護言辭。後一類人構成比較複雜，但並不一定是壞人。歷史不能逆推。一個人後來出了事，其前面的歷史不能被推為同惡。對林彪評價也應如此。[68]

林彪講話自有他的道理：「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這種困難，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關於1960年至1961年的自然災害，我們在前章已經備極詳盡地考證過。那是一次八十年一遇、以旱災為主要特徵的自然災害。據我們引述過的《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統計，中國於1959－1961年發生的大面積嚴重乾旱，使受災面超過半個中國。全國農作物受災面積約佔播種面積的49%，其中成災面積約佔播種面積的21%。大面積的持續乾旱席捲了全國國土總面積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廣大地區，全國每年農作物旱災受災面積3000萬一

67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40－141。

68 據2006年9月出版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林彪開始並不想在七千人大會講話。因軍隊和地方一些領導人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都鼓動林講，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林是在這種情況下才作講話的。

4000萬公頃，每年減產糧食1100萬－1300萬噸，造成了嚴重的災荒並影響到1962年各地的生產和生活。1960年12月28日新華社專稿〈我國農業生產今年遭受特大天災，六億人民滿懷信心克服困難〉說，1960年我國有九億畝農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災害，佔總耕地面積一半以上。其中有三億畝到四億畝農田，遭到重災，甚至有一部分農田因災害特別嚴重而沒有收成。按照這些專業統計，林彪在這裏強調的特大、連續的自然災害，應是實情，並不為過。黨史學者指摘林彪有意渲染自然災害的說法，即「從1959年到1961年確實發生了一些自然災害，但絕沒有林彪講的甚麼特大的、毀滅性的自然災害。竭力誇大自然災害的程度，也是林彪的一大用心」[69]云云，顯然是不公允的。至少，這個傾向性的判斷，沒有專業氣象材料的支持。

黨史學者對林彪關於大躍進中的錯誤是「付學費」說法，也做了揣度。林彪當時是這樣講的：「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十八年的時間，他甚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那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林彪為說明自己的觀點，還舉了軍隊的例子為證：「我們軍隊現在不打仗，也經常要打槍、大炮，打了不少的炮彈、子彈，飛機、坦克、兵艦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裏練，而且弄得很疲勞，半夜起來練，練了以後還不是那個人？一點物質都沒有增加，相反還消耗了很多物質。付了學費，學到本事，本事就能夠轉化為物質，不是轉化為原來所消耗的那個相等的物質，而是幾倍、幾十倍增加了的物質。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林彪的這段話，在今天可以被我們看作是典型的「意圖倫理」掩蓋「責任倫理」，

69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43。

甚至可以說成是詭辯。責任就是責任。損失則是必須加以計量的。耗去的物質已經被計入成本，一次交易已經失敗了，如何能解釋為下一次的交易價值呢？但是，在「意圖倫理」總被認為正確，失誤與否的價值判斷總被意識形態強勢所抹殺的情況下，林彪這些言辭，無疑具有倫理價值的充分支撐。

不過，林彪這些話是否含有個人政治意圖，倒是值得研究的。黨史研究者通常認為，雖然「付學費」說法不是林彪的發明，但被放大到如此極致，卻是林有意所為。「一年多來，困難形勢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給人一種灰溜溜的感覺，包括毛澤東也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對於全國出現的困難形勢，認為有不可推卸責任，所以他不斷地作出自我批評，當然他也不斷地向黨的高級幹部說，因為我們還缺乏經驗。今天，林彪居然提出一個連毛澤東也難於啟齒的說法——『付學費』，使毛澤東多少增加了些底氣。」[70] 顯然，這個判斷首先是一種推測。它得不到史證；其次，講沒有經驗，是黨對犯錯誤加以解釋的一般說法，並不自七千人大會始（雖然在參加會議的人們中已經質疑了「沒有經驗」問題，認為一五時期更沒有經驗，卻沒有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暗示經驗不能為違背規律的「胡來」開脫）。可以說，「缺少經驗」是可以被廣大幹部接受的一個說法。「付學費」是從「沒經驗」引申出來的，並不是甚麼新發明。林彪的「詳細」解說，當然是動了腦筋的。可這並不能證明林講了「付學費」，就使毛澤東陡然有了「底氣」。其效果用維持黨的威信和毛澤東的威信，當然也是說得通的。林彪的發言同劉不同調，但不能證明林的話就是陰謀，更不能證明林當時已成了與劉對立的「壞人」。

林彪下一段話更成為黨史學者認定問題的關鍵。林彪是這樣說的：

>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

7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44。

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的一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顯然，在今天聽來，林彪這段話確實有點「肉麻」。他對毛的「焦點恭維」，似乎有點「過」了。但是，歷史分析不能憑感覺，更不能離開歷史環境。當我們今天不再把毛澤東看作神，並且發現他身上還存在巨大局限性時，我們就從仰視變成了直視。也就是說，我們已經可以直接地觀察毛，甚至拿放大鏡來看毛身上的每一個細部，而不再被他身上包裹的光暈所眩目。可如果回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說出林彪這樣的話，就不是甚麼特意恭維了。不說，反而會反映某種問題。1959年9月，劉少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曾經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就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望，我們在很長時間就是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們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劉講這個話，離七千人大會不過兩年多一點。當時是在廬山會議之後，在軍委批判彭德懷的大會上講的。廬山出彭德懷問題，從根本上說，並沒有損害毛的威信，反而以批倒彭為

結局。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毛的確受到了彭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其來有自。他不僅出自彭德懷，更是大躍進實行後在黨內的反映，即懷疑和反對之聲。應該說，這才是對毛的真正挑戰。劉少奇在軍委擴大會議上重提個人崇拜，甚至講了他從七大以前即開始宣傳毛主席，實質是在替毛澤東應對挑戰。可是，兩年多後，在問題暴露更多，形勢變得更差的情況下，劉卻不講這個話了。這至少能說明兩點：一是劉思想確實發生了轉變，認識到了大躍進的嚴重性質；再就是劉同毛之間出現了實質性分歧。

有人認為，個人崇拜是人民的選擇。此話有一定道理。通常，在一個民族長期遭受外來侵略和不斷受到外來威脅時，人民會選擇一個人禮頂膜拜，以凝聚力量，對抗外敵。同樣，當一個民族以振興為基本取向時，它也會選擇一個人作偶像，以化解艱難，整合力量。因此，個人崇拜並不具有特殊的文化印記。即使在所謂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只要有需求，對於個人的崇拜也難免。那麼，如果一個民族在向既定目標推進的過程中遭受挫折，需不需要更強烈的個人崇拜呢？這一點應該是肯定的。

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共黨內包括毛澤東公開談論個人崇拜的一次會議。毛澤東當時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甚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有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歷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得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毛澤東在這裏對個人崇拜問題做了傾向明顯的揮灑。他似乎忘記了一年前「八大」專門強調的反對個人迷信的觀點。當然，這時談論個人崇拜，是有政治背景的。在反冒進問題上，毛澤東感到自己的權威沒有被充分尊重。這是當時講崇拜的基本原因

之一。在這次會議上，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而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則講得更為露骨：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柯的話後來成為「名言」，被多次拿來奚落批判。可是，柯既然講得這樣露骨，為甚麼當場就沒有人起而反對，加以批判呢？顯然，當時人們確有這種心理需求。那麼，林彪在中共事業遭受重大挫折時，出來維護毛澤東（他還沒有使用柯慶施那樣露骨的語言），按說也代表了一種黨內的心理需要，為甚麼一定要被看作是別有用心呢？

毫無疑問，道德評判不能代替歷史解釋。同樣，歷史闡釋也不能為人物的政治結局負責。林彪後來出逃蘇聯，成為中共的叛徒。其原因錯綜複雜。至今仍有不少非主流的歷史評說。但不管怎麼樣，林的出走，是在七千人大會的九年之後。我們顯然不能把所有我們認為負面的東西，都加在後來帶有罪名的林彪身上。似乎林彪從來就是個奸佞之徒。他所做的一切，都由陰謀、野心所驅使。同時，我們也不能僅僅用道德標準來衡量林彪。似乎林彪完全背離黨的黨性原則和意識形態原則，只是出於個人需要或陰暗心理才故意講這番話。事實上，林彪講話是否得到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支持，是否得到與會人員的正面評價，或者，林的意見是否代表了當時中共黨內相當一些人的看法，是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據。

在前幾節，我們引用了周恩來在報告起草委員會上的發言。這個發言由《變局》一書披露出來，是過去研究七千人大會的學者所不了解的。周恩來的意思很明顯：不同意將形勢看得過於悲觀。他說，調查工作進行後，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覆，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他似乎更在意問題的政治性：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而在有關責任問題上，他同林彪的講法幾乎相同：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

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同林彪一樣，周恩來也試圖說明維護毛澤東威望的重要意義：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奮圖強，埋頭苦幹。……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

周恩來這番話，是在彭真發表他關於如何看待毛澤東的有關責任的意見之後，針對彭的意思講的。周恩來講話之後，陳伯達乘勢向彭真發起責問。根據已知材料，林彪雖列名報告起草委員會，但始終沒有參加會議。因此他當時並不知道會議上的情況。但毫無疑問，林彪會馬上了解報告起草委員會的爭論，並進而分析中央核心裏有關的各種動向。既然毛澤東安排中央常委在大會上都要講一講，那麼，林彪也就必須對黨內出現的爭論和分歧做出自己的反應。茲事體大。因此他對講話稿格外重視，甚至放棄軍委辦公廳擬好的稿子，單獨以「拉條子」的方式，進行了精心準備。從林彪講話內容和效果看，他的意圖得到了充分展示。首先，這個講話是對當時黨內關於形勢判斷、責任歸屬以及「三面紅旗」爭論的一個表態。其次，這個表態是以肯定毛澤東功過和維護他的威信為出發點的。第三，這個出發點決不僅是林彪個人的選擇，而是代表了黨內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見。這一點從林彪講話後的會議反映中可以得到印證。以林彪在黨內的地位(副主席)和他軍事統帥的威信，其講話具有很大影響力是肯定的。他做這種表態，當然會得到毛澤東的激賞。但並不能以此反推，說林彪講話就是為「邀功領賞」、「取悅誰誰」。特別是，它基本不是一個有關個人道德的命題，而是中共在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過程中，精英們面對一系列複雜矛盾所做出的政治選擇：劉少奇選擇了傾向於揭露矛盾的做法；彭真則以一種更為迂迴曲折的方式回護着毛澤東；周恩來以其一貫的維護大局的思路來表示自己的態度；林彪則用自己特有的斷語式的鮮明表態，來擁護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如果猜測說，由於林彪這個講話，表明他這時已有了進一步「篡奪」更高權力的意圖，那顯然是牽強的。林彪此時已是中共核心圈的一員。但當時黨內權位順序已經確定。劉的接班人地位的合法性，不僅由組織程序而規定，同時也出

於毛澤東本人的安排，並經過了歷史的確認。其他人如周恩來、陳雲的政治順序都在林之前。林彪離權力頂峰還有相當距離。林在中共核心圈內是年齡最小的成員之一。雖然我們在導論中曾提到，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度把林和鄧判斷為毛的接班人。但從實際情況看，林在建國後不久即開始「小病大養」，似乎無意在政治舞台上迎風起舞。毛澤東雖器重他，但在正常的接班輪替中，林肯定還要排很長的隊。更何況，包括毛澤東自己也不能預料，幾年後會出現一個「文化大革命」，徹底打亂原有的政治秩序。因此，我們分析林彪發言的意圖，應避免簡單化、道德化。我們與其把林彪發言認作「別有用心」，不如說他不過是要表示自己的立場。這樣更「靠譜」一些。很可能，林彪當時已經看出來，在黨的核心中，有否定「三面紅旗」之風，發展下去，必然會危及毛澤東的地位和威信。他認為此舉十分不妥，有出來講話的必要。其三小時的發言，生動而堅決。其意圖蓋在於此。

1月30日，七千人大會的「大軸戲」終於唱響。毛澤東做大會講話，歷兩小時。據楊尚昆日記載，講話「中心是發揚民主問題，號召大家繼續出氣，反映熱烈」。

毛澤東講話全文發表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這個稿本首度公開於1978年7月1日的《人民日報》，後又節編入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而原始稿本是毛親自根據講話記錄稿於1962年2月至4月間整理修改的。毛對這個講話稿的修改定稿極為慎重：一開始是他本人與田家英「對照一起修改」。後秘書林克也參加進來。這一稿改好後，毛特意送江青看過。之後，這個稿子被印成七份又改。直到3月20日，毛才囑將稿子印九份，分交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等看，同時，另四份由毛、田家英、林克和江青分別存閱。至4月7日下午，毛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信，認為稿子已「修改得好」，可用了。196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2]147號文件印發了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在上述修改過程中，毛澤東一再關照，修改稿印出後，要把原稿交還他。甚至在印給劉、周等人修改時，毛竟交代，「印後版拆掉，原稿毀掉」。這種異常謹慎的做法，不知是出於毛的習慣還是另有原因。

1966年2月，毛澤東又將這個講話送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閱讀，再次提出修改講話稿。這次修改是為編輯《毛選》五卷做準備。王任重看過稿子後給毛寫信說：「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新的高潮。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導這個高潮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主席講話中所指出的『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這是當務之急，也是經過『四清』運動和領導幹部蹲點之後，能夠逐步做到的。」王任重這封信顯然引起了毛澤東的共鳴。他隨即在王信上寫了給彭真的批語：「請商在京常委和康生、定一、伯達諸同志修改一遍。並考慮是否應中南局的要求印發給縣團級同志看。看來此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制，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覆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志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在京常委和彭真等人，又對稿子進行了修改，然後報毛澤東。2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將講話稿發給全黨縣團以上幹部。這是該文件兩次用「中發」名義下發全黨。此時已經接近「山雨欲來風滿樓」、「滿街紅綠走旌旗」的時刻了。實現民主集中制度，特別是提起黨內和國家的民主取向，似乎真的「不過是一句空話」了。

1966年修改稿有幾處重要修改，標識出鮮亮的時代色彩。其中一處是加進了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一段話：「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甚至有時是很激烈的。」事實上，這段話正是八屆十中全會的靈魂。另一處加寫則完全改變了講話稿的原意。這段話是針對蘇聯的：「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蘇聯被修正主義者統治了」，「至於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我們應當看作反面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今天看來，這段話對蘇聯社會性質和

黨的性質的認定，是沒有根據的。但更為重要的是，加入了以上一些話，毛澤東1962年講話的原意就變得相反了。毛當時講話的基調是強調向蘇聯學習。他說：「無論甚麼時候，現在、將來，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現在加上了「蘇聯領導權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一段話，整個話的邏輯發生了問題。到底是「反對」還是「學習」？據說，當時有人聽了毛講話後，回去傳達時宣傳要向蘇聯學習，結果在「文革」中倒了大霉。

毛澤東的講話一仍其旁徵博引、不拘一格、揮灑磅礴的風格，在談笑風生中點出幾個主題。歷來研究者都把講話關於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一段，作為最精彩的部分。毛澤東自己也說，講話的「中心是講了一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毛澤東在這一段中引用了三個典故：《史記．報任少卿書》、劉邦與酈食其和項羽與虞姬。三個典故都被發揮得入情入理、淋漓盡致，很好地說明了主題。但講話並沒有從理論上闡述民主集中制問題，而是強調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必要。這樣，講話實質上沒有對列寧以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理論有所推進。事實上，毛談民主集中制的背景，是意識到自廬山會議以來，黨內反右傾運動造成了極大的政治緊張。許多基層幹部對上級的專橫和霸道強自忍受，有意見不能提。反對則被批判、處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隨時可能被戴在頭上。一些省份大量揪出「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反黨集團」。這使得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地方政治非常暗淡，許多幹部「憋」着氣而不得出。加之「大躍進」的巨大損失已經暴露，追究責任成為一般人的心理。而造成嚴重損失和後果的，一般都是有權力的領導人頭腦發熱，胡搞亂來造成的。一般幹部當然看在眼裏。既然大會報告討論了「大躍進」以來的得失，基層幹部當然要「放」。毛澤東的民主集中制的議論受到代表的竭誠歡迎，正是因為毛給受壓的幹部撐了腰、打了氣。讓他們盡量地「放」，一倒苦水。因此，與其說毛澤東的講話對民主集中制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毋寧說他準確把握了政治關節，並捕捉到基層幹部需要釋放的情感鬱結點。這就是為甚麼毛澤東講完話以後，參會幹部反應極其熱烈，甚至

痛哭流涕的原因。但是，黨內一些高級幹部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毛澤東應該在講話中進一步分析「大躍進」的錯誤，總結教訓。《變局》作者就指出：「有的親歷者回憶，當時覺得毛主席應該多談一談過去幾年的經驗教訓，因為死了那麼多的人嘛，談一談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到底應該怎麼搞。」「希望他講講我們不敢講的，講得比劉少奇再深入、再進一步。」鄧力群說得更直接：「毛澤東的講話當時聽了不過癮，覺得很一般。」[71] 可以認為，這些反應是更理性和更有眼光的。

如果從歷史考察的角度，比較毛澤東提倡民主集中制的說辭，倒是講話中另外三處地方更值得玩味和研究。

首先，是毛澤東又一次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且是更直白地承認錯誤。毛澤東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自1959年以來，毛澤東多次承認自己的錯誤，承認對工業建設沒有經驗，甚至承認打了「敗仗」，「碰了釘子」。1960年11月28日，在中共中央轉發甘肅省委報告的批示中，毛澤東甚至這樣寫道：「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72] 語極誠懇，十分感人。

他還承認，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是個新問題，我們缺少經驗。[73] 他還說，我們各級幹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甚麼東西，甚麼叫

---

71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61。

7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頁729。

73 毛澤東1961年1月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

按勞付酬，甚麼叫等價交換。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74]

特別是，他承認了自己在經濟建設方面不如其他領導人：

> 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少奇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不是懂得較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75]

毛澤東這些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說法，在中共執政以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毛講話後聽眾的反應可以用「群情激動」、「震動」來形容。很多人不免落下熱淚。從小組發言看，人們普遍認為，我們在工作中惹下亂子，卻由毛主席來擔責任，過意不去；連毛主席都做了檢討，我們更應該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從這一方面說來，毛講話中關於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話，反而更增加了他的威信。

從毛澤東1959年以來多次承認自己錯誤的情況看，他的話應該是真誠的。他的確意識到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問題不是小問題，「亂」到了一定程度。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範圍內，都暴露出相當多的不成熟的東西。當然，他不是出於謙虛，也沒有必要貪過諉功。他的確看到了問題。因此，他有號召讀書，即讀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強烈呼籲，而且寫了〈十年總

---

74 《毛澤東文集》，第八冊，頁276。

75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67。按，1966年修改稿本刪掉了本段話裏的一些地方，如還有「恩來同志比我懂」，陳雲「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等等。

結〉，力圖梳理1956年後由他主導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思路。這些行動說明他對錯誤也痛心疾首。

但在另一方面，承認錯誤也會帶來政治代價。最直接的代價就是威信降低、政治分歧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面的不利影響。事實證明，毛的威信並未因此降低。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受到更多的敬重。因為他在問題面前，虛心下士，承擔了責任。自毛澤東成為黨的領袖以來，由於戰爭進程順利和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等原因，他的威望始終呈上升趨勢。雖不能說這種威望在60年代前半期達到了頂峰，但大躍進帶來的問題卻沒有影響他個人的聲望。只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流行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一個黨的主要領導人如果犯了路線錯誤，其領袖地位將被剝奪。其所犯「錯誤」將被用作聲討之用。蘇聯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中國的王明和博古，都是因路線錯誤被趕下台。在蘇聯、東歐國家，這些人甚至性命不保。毛澤東自己後來也說過，機會主義頭子改也難。所謂「難」，就意味着下台。當然，毛澤東自己所承認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而是工作性質的錯誤。但即使如此，以在位最高領袖身份承認錯誤，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至於在國際方面的影響，我們迄今沒有看到更多有關負面的證據。但是，鑑於中國的「大躍進」始終是赫魯曉夫詬病的一件事，中蘇兩黨之間沒少為這件事鬧彆扭，因此對外宣布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做錯了，當然是非常尷尬的事情。說到底，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憋着一股氣：此人沒有文化、沒有教養，個人資歷只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將，卻在那裏對中國的事情說三道四，甚至橫加指責。而毛澤東是甚麼人？是大國革命領袖，是同斯大林一輩的黨的領導人。在中共黨內大多數人看來，赫的政治地位根本同毛不是一個級別。赫魯曉夫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執政以來在內外政策上丟分很多。特別是在意識形態上，對帝國主義妥協，讚賞非暴力革命，幾乎走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反面。赫氏基於蘇聯30年代曾經有過類似人民公社式的實驗並遭到失敗，就譏諷中國的「大躍進」，聲稱要同中國「對錶」，這是令毛澤東和中共非常反感的。由於這樣的背景，毛澤東在黨內承認幾年來

「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不能不令人想到「忌諱」二字。因此，毛澤東的做法是極不尋常的。

其次，毛澤東講話中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一段，是更加意味深長的。毛澤東說：

>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覆的實踐，在實踐裏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筋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辨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着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了解黨史文獻的人會很熟悉，這樣的話毛澤東幾次說過，有點不厭其煩。1960年寫〈十年總結〉時，他大概是第一次說這樣的話；而這一次他又加以更理性的發揮；後來在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他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加了同樣的話，並被冠以「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樣的題目。如果說，毛澤東在建國後希望對哲學有所發揮的話，那麼「必然與自由」說可能是顯著的一次。

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是來自古希臘的一對概念。希臘人認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即對命運的認識。德國哲學家康德把這對概念引入了認識論。馬克思和列寧也曾使用這對概念，說明人認識世界的途徑和規律。必然王國指人們掌握客觀規律前盲目地受客觀規律支配的狀態；自由王國則指人們掌握客觀規律後自覺地運用規律改造世界的境界。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那裏，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常常喻指社會的歷史形態：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為有

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所以馬克思說：「一直統治着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76] 而毛澤東這裏講的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的關係，是從認識論角度切入的。它的一個基本點是：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從必然王國（即異於人、支配人的自然形態）向自由王國（即真正屬於人類可認知和支配的客觀世界）的進步。人類通過實踐，逐漸認識、把握和駕馭而不是服從於自然規律。人類的實踐便在人的進一步推進中，逐漸走向成熟，直至達到克服了盲目的、受自然決定論和因果律所支配的歷史自由王國。

這是毛澤東親歷社會主義建設挫折後由衷的感慨和感悟。社會主義之難在於它的長期實踐性，也就是要耽於時日。這是毛澤東們一開始沒能想到的。幾乎所有人都曾認為，社會主義很快就會建成。如果我們把時間倒推十三年，毛澤東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向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們是這樣講的：

>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如果我們的先人和我們自己能夠渡過長期的極端艱苦的歲月，戰勝了強大的內外反動派，為甚麼不能在勝利以後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呢？……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也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77]

如果我們再把時間倒推七年，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是這樣說的：

---

7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323。

7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4－6。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78]

如果我們再把時間倒推六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曾這樣展望未來：

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甚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79]

如果我們再倒退三年，毛澤東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時，則用了這樣的話：

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頭髮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

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如果要

7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68。

7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296。

垮台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話，又是因為甚麼？不為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要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

他甚至還在給王稼祥的信中說：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這些話帶着毛澤東特有的氣勢！無論此前遇到甚麼困難，毛澤東都堅信，共產黨為人民辦好事，就不會垮台。毛澤東甚至認為，只要有了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再加上老百姓被動員起來的熱情，中國的事情沒有辦不好的。可是，在「大折騰」之後，毛澤東不得不承認，要想為人民辦好事，僅靠氣勢和勇氣是不行的，還要有現代經濟頭腦，懂得經濟規律。不然，人總要被夢囈般的必然王國糾纏着。比起前十三年，毛澤東少了一些「霸氣」和張揚，多了一些謹慎和反思。他開始明白了，要達到自由王國的境界，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他在講話裏背誦了《史記·報任少卿書》精彩的一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曲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揮之所為也。太史公在蒙受痛苦和羞辱並重的宮刑之後，悲憤交集，以先哲聖賢精神自厲和厲人。這種情緒引起了毛澤東的內心共鳴。他要把這種共鳴傳達給中共幹部們：忍辱負重，待時而起。可以說，這是毛澤東七千人大會講話給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

此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中關於蘇聯問題的說法，也耐人尋味。七千人大會正值蘇共二十二大結束不久。在中共黨內高層包括毛澤東都認為，赫魯曉夫在大會上提出的二十年建成共產主義的綱領和這個綱領確定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口號，是修正主義發展到了完備形態和它的頂峰。由於赫魯曉夫在會議上又大肆反華，因此中國黨要有準備，國際共產主義有出現破裂的危險。要準備最壞的情況，準備蘇共領導把公開破裂強加予我們。但是，毛在講話中並沒

有使用嚴肅和臨戰式的語言，卻講了一段非常「軟」的話：「我們這一輩子，我們的子孫，都要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經驗。不學習蘇聯，要犯錯誤。」並說：「我們永遠要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云云。對此，一個解釋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在檢討錯誤時，自然想到別人的優點。再一個解釋，是主觀上確實希望緩和關係。吳冷西《十年論戰》說：「儘管我們希望我們緩和一下中蘇關係，但是蘇聯方面卻是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趁我們國內經濟嚴重困難的時候搞顛覆活動。」[80] 兩種解釋，前一種更為合理。在問題嚴重發生時，想起學習別人，是正常反應。而後一種解釋，則是完全不對問題進行反思，仍然站在四十年前不變的立場上，用論戰思維來評價歷史現象，是不可取的。事實上，說蘇聯想顛覆我們，歷史至今沒有提供證據。即使是七千人大會不久後發生的新疆伊、塔邊民外逃事件，也不能說就是蘇聯顛覆我們的事件。因此，毛澤東七千人大會上關於學習蘇聯的講話，應該被看作是他在一個特殊環境下思想的特殊反應。儘管以後不久，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爭論驟然升溫，以至最後兩黨和兩國關係完全走向破裂。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這段講話，才具有歷史研究價值。

對比分析劉、林、毛在七千人大會講話之後，本節標題所採用的「各有弦音」一詞，看來有了比較恰當的解讀。弦音之發出，必是彈撥者用心選擇的某種心曲。而不同心曲的由來，則是彈撥者對外界情狀觀察和感受的結果。1962年之初，中共和中國正處在一個微妙的轉折點上。對大躍進問題的檢討和對社會主義道路如何走法的考慮，當然不能完全統一。而這將深刻影響未來中共的政策選擇和黨內關係。從不同的「弦音」裏，我們已可看到某些矛盾的端倪。在外界因素的影響下，矛盾將會發生「裂變」。當然其結果只能在若干年後才公開揭曉。

---

80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495。

六　並非尾聲的高潮

毛澤東的講話令到會者群情激動。當天晚上，有人這樣表示態度：「毛主席絕對正確，有些事辦錯了，也是歪嘴和尚唸錯了經，是下面的錯。」福建與會者當場就有人這樣評論毛的講話：「聽了主席的講話，只有一條意見，就是他老人家不該做檢討，我們把工作做壞了，為甚麼叫他老人家檢討呢？」據說，講話者邊說邊落淚，十分激動。一些地委、縣委的領導幹部表示，主席都檢討了，我們還有甚麼說的？[81]

據史料載，毛講話的當晚10時30分，他又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書記會議，研究會議的「出氣」問題。所謂「出氣」，是毛澤東於29日林彪講話後提出的一個說法，即號召與會人員向各省市領導和中央提意見，把積壓於胸中的怨氣、怒氣和委屈吐露出來。毛澤東當時宣布延長會期，邀請全體參會人員在北京過春節。毛澤東的這個決定，更讓所有參會人員欣幸異常。史書上通常將1月30日以後的會議，稱作七千人大會的「第二高潮」。

據《楊尚昆日記》，1月30日晚頤年堂會議決定，中央常委分別參加幾個省的會議，以三天時間為期，放手讓大家提意見。具體分工是，劉少奇到安徽組，周恩來到福建組，鄧小平到四川組。除毛以外，朱、陳、林三個常委似乎當時也沒有參加小組會議。31日，劉、周、鄧即到各組聽會。

「出氣」開始時似乎並不那麼順暢。《楊尚昆日記》記：「從今天的情況看來，由於少奇、恩來同志坐鎮安徽、福建，這兩個省已經慢慢地展開了，向省委領導上初步提出了些意見，還待深入。四川省雖有小平參加，似乎並未展開，而且兩次冷場。」看來，經過反右、反右傾等嚴厲的政治運動，黨內仍然餘悸多多。

81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67－168。

《楊尚昆日記》同日還記：「下午去河北保定小組開會，會議中大家講話主要集中三個問題：（一）省委不重視大家意見，天津三級幹部會提了許多意見，無交代；（二）近年來，幾次大運動，整的幹部太多，傷了幹部的心，規定比例、排隊等辦法使幹部害怕，因而不敢說話；（三）天津地區與保定地區的水利糾紛。」從這段記載看，終於還是有敢說話的人站了出來。從會議的發言記錄看，人們一旦被發動起來，「氣」還是真的不打一處來。人們反映最強烈和意見最集中的，是針對着一些省級負責人。這些省委領導人自1959年反右傾運動以來，整人下手太重，並滋長起一言堂和專制作風，大大傷害了一批人。在所謂繼續躍進中，這些領導人瞎指揮、蠻幹、壓制不同意見，對反對他們的人實行殘酷打擊。而當高指標和瞎指揮帶來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嚴重困難，許多地方出現大面積的病餓、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後，他們又往往向中央封鎖消息，報喜不報憂，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這些人很快成為與會者控訴的對象。

在幾個受災最重、問題最多的省份，其參會者反應也最為強烈。例如河南、安徽、甘肅等省，當年浮誇風颳得最嚴重，口號喊得最為高昂，結果損害也最重。特別是安徽省，原省委主要領導人作風粗暴，性喜專斷，在政策執行中總是「另搞一套」，其很多「左」的做法，在幹部中積怨甚深。據統計，全省幹部在「大躍進」發動後受到批判、鬥爭和處分的比例，竟高達三分之一，其中包括三個省委書記、一個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和八個省委委員。從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所謂「反瞞產」運動中，用行政手段強迫農民交出「隱瞞」的糧食，使廣大農民群眾倉空缽淨，生活無着。了解情況的基層幹部敢怒而不敢言。有些故意抵制上級命令的幹部，則動輒罹受殘酷打擊，以至遭撤職查辦等重罰。當時有人形容這種大批幹部遭清算的現象為「幹部大換班」。由於這樣的背景，安徽小組的「出氣會」開得氣氛緊張，批評之聲極為激烈和尖銳，以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三次親臨會場，傾聽控訴。想來這些基層幹部反映的情況，會令劉少奇觸目驚心，長歎欷歔！

安徽小組的「揭蓋子」，推動了「出氣會」的進程。許多小組的「出氣」，將意見集中在諸如「天災」為主還是工作中缺點和錯誤為

主，犯錯誤是因為指導思想錯了還是缺乏經驗這類帶根本性質的問題上。一般說來，因為有了毛澤東「出氣」的許諾，人們一旦發洩出來，便不再會掩飾自己的積怨，而無例外地將憤怒傾灑在工作失誤和指導思想的錯誤上面。

同這種會議的主流相對應，這時卻出現一個明顯的例外，這就是軍隊代表團的動態。從整個會議的進程看，解放軍代表團始終表現平穩。即使在劉少奇講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樣重大的結論時，解放軍代表團也似乎沒有受到多大震動。相反，軍隊發出的聲音，一直是積極和正面的。對黨內和群眾議論的焦點，如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得失等等，軍隊代表團的態度也殊為平淡。這使軍隊代表團的態度顯得很微妙。慶幸的是，2006年出版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對軍隊參加七千人大會的情況，做了特別敘述。這才使研究者原本的猜測，變成了可考的歷史。吳法憲這樣回憶道：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軍委重要領導人如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說要緊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們跟軍隊幹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會上亂發言。因為「大躍進」、大煉鋼鐵軍隊都沒有參加，與軍隊關係不大，不存在甚麼「出氣」問題。他們還再三強調，軍隊幹部不要跟着地方幹部走，有話讓地方幹部說好了。由此我們可知，七千人大會遠非像某些「幼稚」的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是「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獲得了黨內思想的統一」。大會所暴露出來的認識分歧和政治歧見，要比會議上的「談笑風生」尖刻得多。黨內軍內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政治動向的把握，是很深的一潭水。在政治層面上，擁護與反對，率性與觀望，牽扯到許多方面的考慮，甚至包含歷史的恩怨、親疏的情感和派別的分野等等並非政治的東西。

但是，地方幹部的「出氣」，已經到了不能阻擋的程度。從1月31日開始，各大區書記、省委領導人分別在小組上進行檢查，接受基層幹部的批評。他們的檢查大多觸及到了幾年來最嚴重的問題。這些檢查大致可歸納為下述幾個方面：

1 工農業生產高指標到底發生在甚麼時候？

2月6日，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在代表華東局和前華東區協作委員會做檢查發言時說：頭腦最熱的時期是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北戴河會議的前後。首先是農業生產，1957年的估產就偏高，1958年麥收以後頭腦更熱，對畝產幾千斤是相信的。1959年11月，華東協作區委員會估計全區當年產量是1680億斤，提出1960年「最低限度」比上年增產20%，即達到2000億斤，人均1000斤糧食，並要求兩三年內增加到人均1500－2000斤糧。柯說，1960年10月華東局濟南會議檢查山東工作，大家才真正清醒過來。由於農業上的高估產，以為糧食過關了，工業生產的指標也就高了，基本戰線拉得過長了。

在某種程度上，柯在這裏講了實話。在毛澤東自己做了檢查之後，像柯這樣同毛心理上有共通之處的「諸侯」，心裏不免要打翻五味瓶。當然，柯事實上不會交代出自己「頭腦發熱」的真正原因。那在政治上屬於諱莫如深的「隱私」。因此柯的檢查並沒有說到要害。正如前文所提及，柯是華東區工業高指標的首創者，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擁躉。柯依仗華東工業基礎好的優勢，試圖在鋼鐵上先聲奪人來個「大躍進」。當時，柯本人剛剛進入政治局，受到毛的信任，頭腦當然要熱要「靈」。華東1958年600萬噸鋼的指標，佔了全國1070萬噸的一多半。這個數字直接推動了他所說的北戴河時候的「熱」。按照李鋭的計算，如滿足華東的煉鋼計劃，1959年全國共需生產發電設備900萬千瓦。而當時世界上即使發達國家的發電設備增長，也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蘇聯發電設備一年的增長才750萬千瓦。如果要實現柯慶施的這個「偉大目標」，中國當時得把發電設備的生產提高十倍。而如果按供電量計算，1959年全國要多發電100億度以上。可1958年全國發電量還不到300億度。這就是所謂「頭腦發熱」的數字統計，可見華東當時熱昏的程度，也可見柯慶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承認了自己的熱昏。

2 關於「第二次躍進」的起因

其實，這個問題是明擺着的：廬山會議的風暴餘波。但是，起興還是有具體原因的。2月1日下午，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在檢查裏說：問題最大的是1959年底到1960年初。農村中急於過渡，砍掉了私人養豬這一條，接着是高估產、高徵購，大辦食堂，發動養豬「萬、千、百」運動，取消自留地。這段「共產風」颳得特別厲害，瞎指揮也更多了。在工業上，一本賬、兩本賬、三本賬，層層加碼。開門紅、月月紅、紅到底。遼寧提出追上海「一天一個億」(產值)……比例關係就這樣被徹底打破了。2月3日下午，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在檢查中也認為，1959年「反右傾」面搞大了，1960年就更「左」，更發熱了，錯誤缺點也就出得更多。有許多事情不從實際出發，搞了許多大辦，損失就更大。如1960年5、6月份大搞煤鐵戰役，大辦「五小」成群。本來福建已經有土到洋，有了三明市的中型鋼鐵廠，有了一些「小洋群」了，不必再搞「小土群」了。可那時又大搞，這樣一來，不僅影響了農業，計劃也打亂了。所謂「小土群」、「小洋群」，是「大躍進」中出現的以群眾運動為特徵、以土法上馬為手段的生產方式。在批判「洋、大、全」口號的慫恿之下，似乎「敢想、敢說、敢幹」就成為天下無所不成的點金術。人們希圖以小規模、大數量的方法，達成大規模、高數字的結果。例如，發動全民煉鋼，就是此種熱昏的一着。結果可想而知，無不是自欺欺人，落得慘敗。因此，「小土群」、「小洋群」之類，不僅是大量浪費人力物力的胡鬧，而且是推動「大幹快上」、掀起「躍進」的能源。無怪乎毛澤東在看了「小土群」又鋪天蓋地而來時，也驚呼「糟糕」，這不是「共產風」又來了嗎？

當然，說到底「共產風」又捲土重來的原因，是政治上的所謂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後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大批判、大整肅，不僅中斷了原來正進行的「糾亂」進程，反而更變本加厲地推動了虛假的「躍進」。因此，研究再次「躍進」的起因，不揭露到「左」的指導思想層面，只不過隔靴搔癢而已。但當時誰又能把自己剖析至骨髓深處

呢。至少，在政治上這種剖析是犯忌的。劉少奇的話就已經「過」了，誰還願再「過」？

3 關於高指標產生的影響及其糾正之困難

柯慶施再次講了認錯的話：指標過高，帶來不少問題。例如，影響到幹部作風，過多地搞計劃外協作，影響國家統一計劃。他承認，早在1958年底市場就出現緊張，當時也有察覺，以為是社辦工業搞多了影響市場供應，只是要各地整頓社辦工業，沒有追根到底，沒有同高指標聯繫起來，因而每當中央、主席糾正高指標的錯誤時，我們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怕退得太多，思想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又訂出了比較高的增長計劃，使糾正這方面缺點錯誤的時間拖延下來。柯的這些說法，無意中觸及到一個高度集權體制下的「通病」，這就是層級放大和層級縮小效應。在高度集權的政治壓力下，越下層的幹部越失去自我意識，而隨時擔心自己所為無法跟隨上層的旨意。因此他們逐級放大上級的增產指標或逐級縮小上級的收縮計劃，以便總可以達到執行上情的先機性。「大躍進」中的情況即如此，幹部們執行「躍進」計劃總是比要求的更躍進，糾正問題時總是比要求的更緩慢。如此反覆，造成更大的災難。這也是毛澤東總感到自己政令得不到很好貫徹的原因之一。當然他不會想到，正是他自己要對這種現象負責。

2月1日下午，貴州省委書記周林在檢查發言中提到：問題最開始發生在糧食產量上的浮誇。1959年糧食本來沒有那麼多，而貴州估產則高達160億斤。在高估產的錯誤下，產生了高徵購。1959年糧食徵購達33億4千萬斤，比正常年景貴州糧產17億斤多了近一倍。1960年春，貴州召開四級幹部和黨代表會，糧食產量仍未落實，而且當時浮誇又起。有些地方重新開展「反瞞產」，夾雜以違法亂紀和強迫命令，結果老百姓的浮腫病和死人問題就暴露出來。能夠看得出，周書記的話比較實在。「大躍進」中，往往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反而是社隊存糧最多的。這種現象在今天很不好理解，但在當時卻是正常的。因為公家糧倉有糧，說明當地指標完成得好，也說明反瞞產反得力度

大，更說明當地糧產指標高。這是在當時政治體制和政治氛圍下幹部玩弄職權的一種手段。最著名的是河南信陽。地委最高官員行事惡劣，甚至辱罵、吊打不服從旨意的幹部和農民，壓制不同意見，製造虛假繁榮。結果，信陽地區成為全國死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地委書記路某也被逮捕法辦。可見糧食高指標帶來的恐怖和罪孽有多大。

4 關於產生錯誤的原因

其實，這幾乎是不用回答的一個問題。但，當時人和當事人的解釋，今天看來仍有歷史價值。一般說來，與會代表幾乎都會談到發生錯誤的主觀原因，是主觀主義、命令主義、驕傲自滿、自以為是和脫離群眾等等。此外，還有一些人強調缺乏經驗。但是，在單個人的檢查中，其認識深度是有差別的。黃火青是這樣檢討的：幾年來工作中存在着嚴重的主觀性、片面性、盲目性，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幾年中，總是存在着「爭先進、怕落後」的思想。所謂「形勢所迫，急起直追」，和人家爭「版權」（即躍進中的發明權）。有人提「幾天一個革命」，我們就提「一天革幾個命」。鼓吹「人家能辦到的，我們為甚麼辦不到？」一時間主觀主義泛濫，而又把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主觀主義的東西變成行動，這就必然帶來強迫命令，對下級施加壓力。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說：在約兩年的時間內，我們實際丟掉了黨的兩個優良傳統：一是黨內鬥爭治病救人，懲前毖後，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的傳統，出現了過火鬥爭；一是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的傳統。而這兩個恰恰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幾年來丟掉了這兩個傳統，損失巨大。廣東省委在工作中有錦標主義，故而沉不住氣；有官僚主義，因而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即使人下去了，又不懂生產，走馬看花，只看好的，不看壞的，只從計算穗粒來定產量，沒有不犯錯誤的。趙承認，他自己在工作中有急於挽回名譽的思想，提出過「重奪上游」的口號，表現為一種患得患失的思想。坦白說，黃、趙兩人的檢討是誠摯的。雖然話不多，但點到了痛處。特別是對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有了痛切的認識，指出了它同中共一貫堅持

的三個重要傳統相背離的嚴重危害。就這一點而言，丟掉作風又何止一人一事？由「大躍進」形成的急於求成思想，同原本為執政而奮鬥時的謹慎、謙遜和求實，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所謂指導思想一錯，便一錯百錯是也。

5 關於「反傾向鬥爭」

所謂「反傾向鬥爭」，即對黨內的一派意見進行鬥爭，為黨內鬥爭的一種形式，一般來說，鬥爭方式都比較嚴厲，結果比較嚴重。所謂一派意見，實際是不同認識。比如1956年的「反冒進」，本來是對工作進度和方式的不同看法，但後來卻被說成是政治問題，「給六億人民潑了冷水」，「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甚至還被扯到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問題上面，變得十分離奇。這種現象自開始社會主義建設以來便出現，且愈演愈烈。中央頻出，地方也不斷發案。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說：省委在幾次反傾向鬥爭中，是犯有機械過火的錯誤的。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沒有嚴格區分黨內外的界線，在黨內對一些犯錯誤的同志，不適當地採取了機械過火的批透鬥臭的方法。第二次是1958年大煉鋼鐵時，將一些實事求是的好同志錯誤地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第三次是廬山會議以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機械過火鬥爭更加嚴重。第四次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糾正「五風」運動，不適當地把縣一級作為整風重點，各縣舉行的四級幹部整風會議相當普遍地發生了過火的鬥爭。另外，對當時農村階級復辟的所謂情況在黨內的影響也估計過於嚴重，從而又傷害了一批同志。陶魯笳認為，黨內發生過火鬥爭主要是三個原因：首先是片面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主要的經常的傾向是右傾保守；其次，混淆了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以及實際工作問題三者的界限，往往把思想問題和實際工作問題誇大為政治問題；第三，對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唯一辦法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指示，領會不夠。

陶魯笳這個發言是中肯的。特別是對黨內鬥爭來源的分析，切中要害。「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傾向是右傾保守」一句，非常貼切地反

映了當時人們的政治心態。整個社會的情緒，都朝急於求成的方向集中，從而營造了黨內和國家的激進氛圍。在這種時刻，誰要說出「急」會招致問題，他一定會被更大的急流所沖決。如果再加上政治壓力，比如像廬山會議那樣把不同意見（實際是很委婉的意見）說成是「過去十年來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則言路必塞，黨內不同意見將完全不得反映，這是非常可怕的。

七千人大會開到這個程度，已經到了它所能達到的高潮。不管是做了自我批評還是提了意見的人，總算是「出了一口氣」。就這一方面而言，大會給人印象深刻。1992年7月，鄧小平曾這樣回憶說，在那次大會上，大家都做檢討嘛！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那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其實，1978年以後，中共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有做自我批評的事例。比如華國鋒，後來就不得不做出自我批評，檢討「兩個凡是」問題。他自己也因為這個問題最終下了台。但七千人大會沒有人下台。大家做自我批評，也接受批評。從這一意義上說，七千人大會的確在中共歷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

但是，七千人大會也留下重大遺憾，這就是，所有參加會議和主持會議的人們，對究竟國家為甚麼會遭受如此重大挫折的問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和深入的分析（很多人就是衝着這個來的）。劉少奇說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只是對問題形態的描述和對責任的劃分。他說，總的說，從1958年以來，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他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還看不那麼清楚，不那麼明顯……對於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不能只根據現在的情況去斷定，而應該看它將來的發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他又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這些話讓今天的人聽起來，也是不明就裏的。你

到底是擁護還是否定「大躍進」？你到底是話裏有話還是真的就這麼想？如果說彭德懷能講出「得不償失」、「有失有得」，那經歷1960年到1961年的大災難，劉少奇為甚麼就不能再說得清楚一些呢？這肯定使許多人感到失望。

的確，劉少奇似乎不可能說得那麼清楚、那麼透。連他自己也處在矛盾兩難之間。於是乎，史家的評論就只能高調宣傳所謂「初步統一了思想」、「做了自我批評」之類了。如果是真真切切地看，七千人大會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大會之後，形勢一旦緊迫，中央一線領導人一旦加大調整力度，毛澤東便生出警惕，他「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的路線也就破繭出籠。由此而言，作為歷史學家，我們不能一面說七千人大會具有很高歷史地位和政治貢獻，一面又說不到半年，形勢發生了急轉。這在邏輯上顯然不通。有人用「變局」來概括大會的政治含義，似乎是恰如其分的。

2月6日和7日，鄧小平和周恩來分別在大會上講話。兩人無例外地都做了自我批評。鄧代表中央書記處，周代表國務院，將責任大包大攬起來。毛澤東沒有對兩個講話評論甚麼。在通過大會書面報告的決議後，毛澤東宣布：「這個會議就閉幕了。這個會開得很好，開完了，散會。」

第二天晚上，即1962年的2月8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此去近一個半月。

如果說到會議的尾聲，有這樣幾件事情可以交代：

首先，大會閉幕後，作為問題比較突出的安徽組被留下繼續解決問題。2月9日，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再次作檢討。劉少奇在會上講話，指責曾希聖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並宣布中央決定，免去曾的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離安徽，改組安徽省委，由李葆華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其次，毛澤東在南巡途次，對七千人大會幾個講話做了修改和批示。其中包括他本人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林彪的講話、周恩來的講話，以及通過劉少奇報告的決議。對於自己的講話稿，毛相當認真地進行了修改和增刪，並在北京和他的駐地之間往返傳閱，最後才定

稿（1966年2月又做再修改，這是上文已經交代的）。在修改上述幾人講話的評語中，毛突出而唯一地對林彪講話作了高評價，稱其為：「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第三，中央常委中，只有陳雲沒有在大會上講話。毛澤東實際上很希望陳雲講話。在中共黨內，陳雲以穩健著稱。在經濟問題上，陳的發言有別人沒有的權威性。因此，陳關於形勢好壞、問題多少和前景估量的判斷，會有很大影響力。從這一點出發，毛當然希望陳雲對經濟形勢給以正面估價。可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陳雲更不能輕易講話表態。說好說壞，都有忌諱。當時他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為由，把講話推掉了。此後，不到一個月，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終於道出了自己的隱憂：他之不能講這個話、是因為「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82] 後來，陳雲在1988年的一次訪談中回憶：「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雲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83] 看來，在高層政治中，忌諱之事甚多。陳雲的方法通常是，形勢允許當面講，就公開講；不行，則不發言。政治壓力過大時，則稱病。這樣既保持了原則，又照顧了面子，也保全了自己。不過在七千人大會上，陳雲實際還是講了一次話，不過不是在全體會議上，而是在陝西組的發言。正如上文所說，在政治問題敏感時，人們把批判矛頭對準黨風，最為妥帖：「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難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84] 此

---

82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91。

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292。

84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187。

話可以說是義正詞嚴。但無論是誰，在既定的體制和遊戲規則下，都難以做到「全拋一片心」。事實上陳雲也故意不講給毛澤東帶來難堪的話。因此他也只說了「三分話」而已。

近期出版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透露了有關七千人大會的這樣幾則史料：

第一條是，林彪是在幾個老帥和羅瑞卿的一再勸說下才在大會上講話的。講過以後，大家都叫好，惟獨林彪不高興。他私下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這個材料證實了我們在上面的分析。林彪講話的確是有感而發。同時也證明，七千人大會的確是一次未經精心準備的大會。其召開的倉促性，恰恰暴露了人們思想仍存在巨大差距的事實。在會上，毛澤東的關於形勢已經好起來的觀點和他對錯誤性質的判斷，都受到了挑戰。黨內分歧由此而進一步展開。

另一則史料是：毛澤東在人大會堂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擴大會議上（這個會議的名稱存疑）說：從 1961 年 11 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大，這次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了個一片黑暗，沒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呢？吳註明，毛的這段話是劉亞樓轉告的。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這一材料的準確性，而着重於它所反映的毛澤東的心態，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條線索，即，對老百姓如何交代？在黨內討個怎樣的說法，是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作出評判的底線。突破了這個底線，矛盾將不可避免。

第三章
「非常時期」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離京南下，主持中央工作的權力理所當然落到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身上。不久中共中央先後召開「西樓會議」，國務院各部、委黨組負責人會議以及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等重要會議。這些會議着重在發現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進一步實行對國民經濟的重大調整。

而就是在西樓會議上，劉少奇驚呼：「現在類似非常時期」。

一　西樓會議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離京南下，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說到劉少奇主政，這裏要說一個插曲。還在上年9月下旬，毛澤東突然兩次講到他的接班人問題，明確說，「以後兩個主席都姓劉」。那時，英國元帥蒙奇馬利來訪，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輝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壽昌負責接待。或許是客人出了題目，或許毛澤東有意放放空氣。9月23日，毛澤東同熊向輝和浦壽昌談話，發了以下的一篇議論：八大通過新黨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甚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

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人，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

第二天，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答道：「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蒙哥馬利又問。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聽到這裏，使人聯想起三國時諸葛亮臨終前，劉禪五丈原問政的典故。毛澤東在這種場合講這番話，是隨便一說，還是另有深意，頗讓人尋味。從以後的事態發展看，毛澤東並沒有引退之意。他對劉少奇這位「接班人」並不滿意。但從外國人方面，現在有材料證明，大約從60年代開始，他們已經注意到毛澤東的接續問題。因為到1963年，毛將屆七十歲。在西方政治家特別是對中國懷有某種複雜心情的政治家們看來，中國似乎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人身上，會發生變化。而變化主要是看誰來執掌中央權力，也就是誰來接毛澤東的「班」。本書導論中已經詳細介紹了西方政治家和情報部門對中國政情的猜測。蒙哥馬利鍥而不捨的發問，就是在他訪華前策劃好了的。[1]

但毛澤東瀟灑表態至少可以證實一點，自從進入調整時期，劉少奇的影響明顯上升了。七千人大會以後，這一點更加明顯。然而，這時，毛澤東也在某種程度上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和猜忌。劉少奇覺察到沒有，不得而知。從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看出，劉少奇感到，再也不能事事遷就，瞻前顧後了，必須下決心搞好調整，擺脫困境。

---

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640－641.

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一副主席」，他也沒有其他選擇。黨國事業，黎民生計，重任在身，不容稍有懈怠。

七千人大會出了題目，定了原則，具體如何調整法，沒有切實研究。那麼多人在一起，人多嘴雜，也沒辦法研究。這個責任便落到了劉少奇及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常委們身上了。劉少奇決定開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這件事。七千人大會結束後兩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擴大會議開始舉行，連着開了三天。常委當中除毛澤東、林彪離京外，其他人包括書記處成員和中央經濟部門負責人共十六人到會。[2] 因為人數不多，會議地點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樓會議室。所以後來稱它為「西樓會議」。就是這個「西樓會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擊。

會議首先討論國家計委和財政部提出的年度報告。核算下來，發現當年財政收支出現30億元赤字，這是原先沒預料到的。這在經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將十分危險。其實，財政出現赤字，並非1962年開始，從1958年就有了。經過核實，1958年21.8億，1959年為65.8億，1960年為81.8億，1961年為10.9億。只是屈於政治壓力，怕戴右傾的帽子，財經部門沒敢報告。

根據李先念的解釋，財政赤字大致是這樣形成的：「據財政部過去的數字，四年共收入2004億元，支出1965億元，結餘39億元。實際上，農業產量有虛假，工業產值有虛假，庫存減少，票子多發，物價上漲，市場緊張，唯獨財政有結餘，這是不可理解的。實際上，財政不是有結餘，而是有赤字。……赤字是從哪裏來的呢？首先，收入方面有虛假。收入為了完成高指標，不外乎把一部分企業流動資金當作稅收和利潤上繳了，財政賬面上增加了收入，企業那裏卻向銀行多貸了資金，不是真正地增加了財政收入，而是把銀行多發的票子當作企業賺的錢。其次，支出過多。支出也是高指標。基建投資大，其他各項建設事業的開支大，同國家的財力不相適應。一方面支出過多，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97。

一方面應該列入財政支出的卻沒有列進去。如企業定額流動資金，應該由財政支出的，但是財政沒有列夠。財政動用上年結餘在制度上是合法的，但是這筆錢銀行已經作為信貸資金用掉了，在國家預算的平衡上，應當撥出相應的信貸資金來彌補，沒有彌補，就是財政赤字。」[3] 撇開技術層面的問題，我們從李先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發生赤字的根源，根本在於政治取向。在正常政治氛圍下面，財政技術官僚們不會故意掩蓋虛假。因為虛假的財政報告對他們自己並沒有額外的利益。只有在政治壓力下面，也就是李先念所說的「為了完成高指標」，財政技術官僚們才斗膽「財政大躍進」了：把赤字隱藏在貸款和流動資金上繳下面。這是非常缺乏職業道德的事情，會給國家決策帶來嚴重的誤導。

劉少奇在發現財政虛假報告後，十分生氣。他批評經濟部門沒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責成他們重新提出報告。他說：「收入要可靠，爭取的數字不能打上，作預算的人要負責。有赤字要提出來警告大家，採取措施來彌補。過去幾年沒有揭露赤字是不對的，搞不好，經濟還要繼續惡化。只要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4] 劉少奇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即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甚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他說：「目前形勢是一個困難的形勢，類似非常時期」。他要求，「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5]

---

3 李先念：《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1950－1991年》，下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頁7－8。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048。

5 《劉少奇傳》，下冊，頁898。

七千人大會上，陳雲謝絕了毛澤東讓他在大會發言的邀請，並不是他心中沒底。通過這幾年的冷靜觀察，深入摸底，加上上一年親自回老家上海青浦縣調查，他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在此之前，陳雲已經就解決經濟困難提出了若干針對性措施，其中包括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高價食品」和減少城鎮人口等項，都非常明智有效。1961年1月9日，陳雲領導的物價問題小組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呈送了〈關於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問題的報告〉。1月15日，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並在批語中說：「中央同意這個報告，批准從今年夏收起，全國糧食收購價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同時1960年已經實行的對主要產糧區的加價獎勵全國平均百分之五，照舊執行，這樣糧食收購價共計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銷價暫不提高）；並且在今明兩年內有步驟地分批分期提高肉、禽、蛋、食油、棉、煙、麻、茶、糖、木材、毛竹等產品的價格。」[6] 所謂「穀賤傷農」。此時不打破計劃價格，農民將難以渡過難關。而陳雲首創的困難時期實行「高價食品」的政策，也曾產生重大影響。陳雲認為，為了使城裏有錢的人能買到他們想要買的吃的東西，為了有相應的高價商品能同農民手裏的「雞蛋」等高價商品「等價交換」，也為了回籠貨幣，在大城市「供給相當數量的比較高級的糖果、點心和『賣炒肉片』」是必要的。陳說：現在要兩條腿走路，一條叫定量供應，另一條叫賣高價糖果、點心和炒肉片。「兩個辦法同時來，目的是這樣：第一緩和人心，第二增加熱量，第三回籠貨幣。」[7] 出賣高價食品可以算「不按規矩出牌」，是一「奇着」。它又一次離開了「計劃」思維，成為大家都看好的辦法。陳雲還是減少城鎮人口以緩解糧食困難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因為農民最後還是看我們徵購多少。如果徵購數量還是那麼多，農民還是吃不飽，那麼，他們的積極性仍然不會高。所以，面前擺着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

---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9。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233。

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甚麼別的路可走。我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8] 事實證明，壓縮城鎮人口也是國家渡過困難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陳雲自己說，在七千人大會上，他沒有講話是因為不能「和稀泥」，而講真話，又怕毛澤東「難堪」。經過七千人大會，包括毛澤東在內，大家都作了自我批評，同意落實調整方針。陳雲認為是時候了，該拿出自己的對策了。終於，在西樓會上，陳雲將對當前形勢和如何走出困境的看法和盤托出。

陳雲認為，要下決心進行調整，必須對當前的困難有個清醒的認識。在分析經濟困難的基本情況之後，陳雲指出了五點：「一、農業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1961年的產量同1957年相比，糧食大約減少800億斤，棉花等經濟作物和畜牧產品也減產很多。」當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農業減產，糧食不夠吃。「我們都是幹革命的，搞社會主義的，對於這樣關係全國六億多人民的大事，關係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是不能不關心的。」陳雲說。這時，還有人為了維護「大躍進」的面子，還在閉目塞聽，硬說「有的鄉村，農民吃得好，雞鴨成群」等昏話。陳雲毫不客氣地批駁說：「有這樣的鄉村，但這是極少數。全國大多數地區不是如此，大多數農民糧食不夠吃。」

農業能很快恢復嗎？對這個問題的不同估計，決定着經濟決策的大局。如果一年半載就能恢復，那就用不着大調整。陳雲分析了農業生產的一些基本條件，如土地、耕畜、肥料、農具、種子、水利、機械，以及工業支援農業的可能性等等，一一數來。有利與不利相抵，陳雲得出結論：恐怕很難說目前的情況比一五計劃時好。農業的恢復不會很快。「農業恢復能夠多快，目前還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兩年」。「我們工作的基本點應該是：爭取快，準備慢。」

「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在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陳雲說。說到工業規模，

---

8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61。

分歧就更大了。工業高速度，尤其鋼鐵高速度，這是「大躍進」的主要目標。「大躍進」中搭起來的「架子」，誰都不願把它拆掉。有人說：「大躍進」那幾年建設規模是合適的，就是因為有災荒才發生了問題。有人說：是農業拖了後腿，不然就正好。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工業吃了農業的虧，工業本身沒問題。陳雲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最近幾年工業建設的大發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產7000億斤糧食、7000萬擔棉花的錯誤估計上的。當時認為糧食過關，可以去辦工業，所以大量招工。又是根據鋼產量很快可以達到5000萬至6000萬噸的設想來布置的。已經擺開的建設規模，不僅農業負擔不了，也超過了工業的基礎。不僅在災荒年內負擔不了，即使正常年景，也維持不了。

陳雲列舉的另外三個困難是：1. 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的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十至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照現在的情況看，在採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還不能停止。我們必須堅決扭轉通貨膨脹的趨勢；2. 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一部分農民手裏的鈔票很多，投機倒把在發展；3.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工資下降很多。陳雲認為：以上一共五點，其中一、二兩點是基本的，其他三點都是派生出來的。

緊接着，陳雲提出了六條克服困難的對策：

（一）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恢復階段從1960年起，大體上要五年。如果不是這樣，籠統地要大家執行十年規劃，又想發展，又要下馬，又想擴大規模，又要「精兵簡政」，就會彼此矛盾，舉棋不定。分成兩個階段，基本建設和若干重工業生產的指標先下後上，任務就比較明確。

（二）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如果現在不減，財政繼續虧空，市場發生動亂，就會更加被動。對於減人，大家一定要下定決心，否則沒有出路。

（三）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嚴格管理現金，節約現金支出；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幾種高價商品。高價商品

品種要少，回籠貨幣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資料不漲價，就不會出大問題；堅決同投機倒把活動作鬥爭。

（四）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幾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把全國各地價值約四千萬到五千萬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於高價館子，價錢賣貴一點。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籠不少貨幣。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生產。除增加糧食外，重新考慮保證經濟作物增產的辦法；對不同的產糧區，研究出不同的增產辦法；撥出一部分鋼鐵、木材製造中小農具。

（六）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裏得到體現。「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要「把這些事情擺到頭等重要的位置」。[9]

陳雲的這篇講話，對時局的分析鞭辟入裏。既沒有「形勢大好」的套話，也沒有顧及毛澤東「已經走到谷底」、「最困難時期已經過去」的估計。他提出要用五年時間來進行調整，與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前提出1962年大抓一年，爭取各行各業都「躍進」的想法大相逕庭。他說建設規模超過了農業、工業所能負擔的極限，使一些不願退卻的人深感沮喪。他關於存在通貨膨脹的說法，也十分刺耳，社會主義還有通貨膨脹嗎？在一些人看來，這有點匪夷所思了。

然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的領導人完全贊同陳雲的意見。劉少奇對陳雲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陳雲接受了這個建議。

---

[9] 陳雲：〈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載《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189－206。

二 重設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2月26日，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在北京召開。

在李富春、李先念講話之後，陳雲發表講話，再次闡述了他在西樓會議上的意見。全場靜謐，全神貫注。陳雲講完，全場完全自發地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國務院的部長們，很久沒有聽到過這樣沒有假話、套話、大話，完全實事求是的講話了。陳雲的分析透徹明瞭，不容置疑。在此之前，雖然大會小會也講困難，但總感覺似乎猶抱琵琶半遮面，藏着掖着。這一次困難講夠了，辦法也確實可行。大家心裏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真是「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會後，各部委紛紛要求傳達。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全部傳達，怎麼講就怎麼傳達。劉少奇甚至同意用中央的名義轉發全國。

這些天，劉少奇對不斷揭發出來的問題心急如焚。2月26日，他看到財政部一個報告，反映北京鋼廠由於超負荷生產，造成連年虧損，幾乎把國家的投資全部賠光了，劉少奇批給彭真、劉仁閱處，嚴厲地指出：「國營工廠如果照這樣辦下去，結果會怎樣呢？難道不會亡國嗎？」[10] 3月5日，劉又在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黨的監察工作情況反映》刊載的〈青海省公安機關破壞法制違法亂紀情況十分嚴重〉的材料上批示：「小平、彭真同志閱後，交謝富治同志辦。中央公安部應派人到青海去會同省委嚴肅處理。青海公安機構違法亂紀情況，應引為教訓。」[11] 同日，劉再次在商業部《商業工作簡報》上刊載的〈部分地區農村缺煤情況嚴重〉的材料上作出批示：「關於群眾的燒柴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商業機構是不能不管的。否則，要破壞生產。」[12] 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國家主席劉少奇在這個非常時期，連農民的燒柴問題也不得不過問了。

---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49－550。

11 《劉少奇年譜（1898－1969）》，頁550。

12 《劉少奇年譜（1898－1969）》，頁550。

當然，劉少奇最惦記的，仍然是盡快把陳雲的意見發下去。3月12日、13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轉發陳雲講話的中央批語。劉少奇當眾問：「對困難的估計，是有十分只講八分好，還是有十分就講十分好？」到了這個時候，在北京幾乎沒人希望掩蓋困難了。劉的決心很大，他認為，不把困難估計夠，工作不能由被動變主動。這次中央常委擴大會通過了中央轉發陳雲講話的指示，指示明確說：「我們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一種很不平常的時期，即非常時期。」「中央認為，在這樣的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大力恢復農業，穩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也就是說，目前全黨必須集中力量，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解決吃、穿、用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至於基本建設，在最近兩三年內，除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擴大再生產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一律停止。」[13] 從這個「指示」看，中央一線領導人對「後退」，是下了堅決決心的。劉少奇說：這個指示「我們這個會是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

3月16日，劉少奇偕周恩來、鄧小平飛武漢，向正在武漢東湖賓館休假的毛澤東匯報了中央常委的決定。劉對毛說：「我們同意陳雲講話，起草了一個指示，會議上是通過了，還要請主席看一看。」劉接着說：「這個問題我也在會上講了，如果主席同意，我們就發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們重新開會議論。」毛澤東看了看陳雲講話和中央轉發講話的指示，表示同意擬發省、軍級參閱。毛澤東曾經批評：「四時八節，強迫簽字」。這次是不是「強迫簽字」呢？毛澤東沒有表露。3月18日，中共中央將陳雲講話加上按語轉發到全國各省市和各部門。同時下發的還有李富春、李先念兩個講話。這個中央批語傳達了西樓會議精神。

西樓會議後，中央常委開始醞釀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中央財經小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組長陳雲，副組長李富春、

13 《劉少奇傳》，下冊，頁900。

李先念。它直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負責指導全國財經事務，但在性質上是諮詢機構。後來「大躍進」發動後，一切常規被打亂，這個小組也就在實際中停止了工作。現在，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指揮部。劉少奇竭力主張把中央財經小組恢復起來，並且希望陳雲繼續擔任組長。陳雲因為身體原因，一再推辭，提議由其他人擔任組長，自己當組員，他有意見可以提，他也相信，財經小組的同志會認真考慮他的意見。[14] 所以，最初曾確定李富春為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周恩來、陳雲都是組員。在此次討論中央批發陳雲等講話的指示時，劉少奇又提出，有同志建議，讓陳雲同志來當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富春當副組長，請大家再議一下。李富春當場表態，陳雲當組長最合適，自己當陳雲的助手。與會人員一致贊同劉少奇的提議。這次，中央財經小組是實質性領導機構了。陳雲當時沒有參加會議，他知道後還是推讓由其他人來擔任這個職務。劉對陳說，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15] 在這番推讓之間，似乎傳達出某種中共政治文化的信息，表現出中共領導人不同的人物性格。劉主持中央一線，責任重大，並且已下定了「大幹」的決心。而陳看起來，還是有些顧慮。身體不好當然是一個最好的藉口，但聯繫他說過的不願讓毛「難堪」，是否可以猜想，他還有更深的用意在裏面呢？因為毛對形勢的看法是大家都清楚的。毛又不在北京。這些都是有某種忌諱的。

陳雲，中國共產黨內最傑出的計劃經濟專家，他以創造出「鳥籠經濟」著稱於世界。他的最大特點，是實際。要不然不說，要說就是實際狀況和實際辦法。這使他在 1956 年至 80 年代初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不能成為政治的「主流派」，好像是游離於核心內外一個中央副主席、常委。但陳雲自1949年初從東北調回中央後，在主管中央財經工作上「點子」很多。他在政務院成立後出任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具體組織領導了建國初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迅速穩定

14 《陳雲傳》，下冊，頁 1311。

15 《劉少奇傳》，下冊，頁 901。

了動盪的經濟形勢，根除了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脫韁野馬般的通貨膨脹，發展了經濟，支持了抗美援朝戰爭。緊接着又領導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工作和「一五」計劃的制定和經濟建設工作，有着卓著的貢獻。毛澤東對陳的這些功績是很讚賞的。但陳雲對經濟發展的「實在」性見解，又往往不那麼遂毛的「激越」之心。例如1956年反對冒進，毛就對陳十分不滿。可是，在對「大躍進」混亂有所省悟時，又念及陳雲的好處，有「國弱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說。這就是陳雲在「大躍進」以來一直保持低調，在形勢許可的情況下，做一些調查研究，建立自己經濟謀略的原因。在大多數情況下，陳是索性緘默不語。經過三年「大躍進」和三年（1959年至1961年）嚴重經濟困難，大家回過來看看陳雲當年的那些論點，恍然若金玉良言。因此，由陳雲出來重新主管財經工作，是眾望所歸。

3月7日，在第一次中央財經小組會上，陳雲再次講話。講話大致重申了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西樓會議已經講到或多次講到的問題。關於對1962年年度計劃的調整，陳雲提出：「今年的年度計劃，需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調整，重新安排。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後，後三個季度就不要變動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樣『一年計劃、計劃一年』，使計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他着重強調了農業和市場這兩個問題，認為：「現在調整計劃，實質上是要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放慢一點，以便把重點真正放在農業和市場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滿足恢復農業生產的需要。」「第二要滿足市場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業品生產的需要，根據實際可能，能多給一點就多給一點。」「這兩項定下來，再考慮其他。管年度計劃，首先就要安排好農業和市場。」「今年的計劃，特別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農業、市場這一頭定下來，然後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業。工業也要首先照顧維修、配套、維持簡單再生產，滿足了當年生產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設。有多大餘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設。今年如此，今後也要如此，使人民生活一年一年好起來。」[16] 陳雲說：在計劃方面，「要準備對重工業、基

16 《陳雲傳》，下冊，頁1312－1313。

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四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在，再不能猶豫了。」[17]「傷筋動骨」四個字不僅用得貼切，也形象地表達了陳雲對大規模調整的決心，而且被認為是當時調整的一個綱領。

關於解決城市食品供應不足、人民體質下降的問題，陳雲除堅持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應一兩大豆的辦法外，又建議撥一點鋼材製造一些機帆船，增加一些捕魚網具，讓水產部門出海多捕一些魚，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萬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魚吃；另外要保證豬的收購，壓縮一部分出口，使每人每月有半斤肉吃。「這樣，魚、肉兩項，五口之家一個月就有五斤。」在當時，每人每月有半斤肉和半斤魚，是個頗為誘人的承諾。事實上，這些指標只在最大的城市裏得到了實現。

關於綜合平衡，陳雲強調，要實在地弄清兩個問題：「一點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搞綜合平衡？一點是，從甚麼『線』出發搞綜合平衡？」關於第一個問題，有些人認為，當時還不能搞綜合平衡，因為沒有條件。他們主張先訂出幾個遠景指標，然後推算出各種數字，制定建設方案。陳雲則認為不可：「我的看法是，綜合平衡必須從現在開始，今年的年度計劃就要搞綜合平衡，開步走就要搞綜合平衡。不能說在達到了多少萬噸鋼以後再去搞平衡。要從現在綜合平衡的經濟水平出發，經過切實的研究和計算，看遠景規劃能達到甚麼水平，而絕不能採取倒過來的辦法。」其實，陳雲說的這個道理，就是「量入為出」，先有了賬本，再開始投資賺錢，而不是「大躍進」的方法，不顧本錢，一下就大幹起來。關於第二個問題，陳雲說：「在這方面，這幾年的教訓已經夠多了。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在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從短線出發搞綜合平衡，「生產就可以協調，生

17　陳雲：《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頁210－211。

產出來的東西就能夠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費資金。」陳雲說：「只要綜合平衡了，指標低一點，也不怕。看起來指標低一點，但是比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動，避免被動。」[18]「綜合平衡」，是陳雲經濟思想的核心，搞計劃經濟，不搞綜合平衡，等於不要計劃。就是這樣一條基本規律，「大躍進」中被批得體無完膚。說綜合平衡是消極平衡，是忽視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主張積極平衡。說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事物的發展就是不斷打破平衡。其結果可想而知，吃盡了苦頭。陳雲在這個講話裏對「積極平衡」這個「大躍進」的理論基礎大膽地給予了批駁，這在當時還是有勇氣的。陳雲尖銳地指出：「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做，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能平衡。」從這個道理出發，陳雲說：「以後再不要只想到鋼了。」[19] 陳雲的講話可謂一針見血。

此外，在陳雲講話裏還有特別動感情的一段話，可以看作是那一代共產黨人的黨性宣示。陳雲說：「同志們，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現在我們面臨着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於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20] 這話給以人破釜沉舟、最後一戰之感。從1962年陳雲的作為看，這話包含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為不丟掉政權，一切暫時性的辦法都可以上。後來人們傳出，陳雲的真實想法是，共產黨讓老百姓吃不上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必須採取非常措施，哪怕這個措施在改變了困境之後再棄之不用也可以。例如在3月中旬後的杭州療養期間，陳雲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即認為與他設想的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個路子。他對身邊工作人

---

18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08－212。

19 陳雲：《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頁189－206。

20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頁208－212。

員說：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分田到戶」也好，叫「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按照〈國際歌〉詞中「全靠我們自己」的話辦，盡快恢復生產。此時，陳雲還兩次請商業部長姚依林到杭州，商談可否將國家徵購糧數字定死，超產部分歸農民；在農村當前形勢下可否採取分田到戶的辦法等。[21] 作為執政者和共產黨人，陳雲的這些想法非常可以理解。他是準備用「猛藥」的。

劉少奇、周恩來十分贊同陳雲的意見。周恩來當場用一副對聯概括了陳雲的思想：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陳雲這個講話記錄，經他本人審看過，最後在小範圍內印發。中共中央迅速對陳雲等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作出反應。3月18日，中共中央在關於批發陳雲等同志講話的指示中說：「中央認為，在這樣的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大力恢復農業，穩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也就是說，目前全黨必須集中力量，增加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至於基本建設，在最近兩三年內，除了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擴大再生產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今年年度計劃，必須根據上述原則迅速進行調整。」[22]

在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後，陳雲到南方療養。在3月13日的中常委擴大會議上，正式決定由陳雲出任重新設立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在中共黨內，這種類似的小組，實權甚大。中央財經小組，相當於經濟內閣。所有重大經濟問題都要由小組研究，提出決策，然後交中央通過執行。人們不妨檢看小組成員，總理周恩來僅僅是小組成員而已。但是，在「文革」前兩次建立中共中央財經小組，都半途而廢。這不能不說是既定制度下的優化性缺失。在武漢的毛澤東，同意了中央常委對陳雲的這個非常任命。

---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15－116。

22 《陳雲傳》，下冊，頁1316。

劉少奇從武漢回到北京後，覺得陳雲對經濟工作的意見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他要秘書鄧力群組織幾個人，把陳雲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言論收集起來，編輯印發。在黨內除了毛澤東的講話外，彙編印發其他人的講話，尚無先例。而且陳雲的經濟思想與「大躍進」是兩種不同的建設思路。陳雲幾次表示不同意。劉少奇勸說道：「可以不廣泛印發，只發給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和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同志看看。」據鄧力群回憶：「我們就編了一份材料，大約四五萬字，提要一萬多字。開始，題目稱為《陳雲同志論幾年來的經濟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經有了《論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再來一個『論』甚麼，不好。於是把題目改成《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23] 陳雲的經濟言論很快編印了出來。劉少奇特地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推薦這些論述：「主席：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只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此外，陳雲同志在今年3月7日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很值得一看。以上幾個文件，已要辦公廳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是否還要發給其他同志？請主席閱後酌定，再徵求陳雲同志意見。」毛澤東收到材料，未置可否。不過，這份材料，直到8、9月北戴河會議時，還擺在毛澤東的桌子旁邊。由此看出，毛澤東對這件事是很重視的。

劉少奇從思想上、組織上、輿論上，盡力支持陳雲。他深知，這是受命於危難之際，責任重大，工作艱巨，況且陳雲的身體又一直不大好。陳雲一再推辭。劉少奇親自登門看望，促膝長談，交換意見。4月19日，劉少奇簽發中共中央通知，向全黨宣布，陳雲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組長，周恩來、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程子華、谷牧、姚依林、薛暮橋等為成員。這時，陳雲已到華東休息。調整的主要工作由劉、周、鄧負責。重大決策陳雲參與意見。

---

23 《陳雲傳》，下冊，頁1318－1319。

三 著名的「五月會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關於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史稱「五月會議」。在1962年實行經濟調整過程中，「五月會議」佔有重要地位。出席「五月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陳毅、李富春、賀龍、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譚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楊尚昆、羅瑞卿。還有中央局、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國務院工交、農林、財貿、文教、科學各口的負責人，共105人。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林彪沒有參加。

在這之前，各部委和各省市都傳達了「西樓會議」精神，尤其是陳雲的講話，在高級幹部中震動很大。但如同任何一個政黨一樣，黨內的思想並不是完全統一的。雖然黨內都同意了調整，但在程度和方法上，仍有相當不同的意見和聲音。一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人對陳雲的「西樓會議」講話表示異議；還有一些人不同意中央在七千人大會後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提出，在七千人大會上中央對形勢已經作了正確的估計，現在只過了幾個月，又講一篇同那時的估計大有區別的話，這樣好嗎？[24] 劉少奇認識到，一方面要支持同意陳雲講話和2月以來中央精神的同志，讓他們堅定「傷筋動骨」調整的決心。另一方面，還要再召開強力的會議以統一思想。4月26日，中央應各省市的紛紛要求，發出補充通知，將傳達陳雲講話的範圍擴大到地、市委級。各省和中央各部門在聽了傳達之後，普遍反映強烈，思想進一步解放，敢於暴露過去不敢暴露的問題。中央財經小組在3、4月廣泛聽取各部門的匯報後，着手大幅度調整1962年計劃。調整計劃草案隨即由薛暮橋帶往杭州，向正在那裏療養的陳雲匯報，陳雲同意後，4月下旬正式報送黨中央。

---

24 《劉少奇傳》，下冊，頁903。

「五月會議」對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在大會上，李富春講了進一步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縮短工業生產戰線和貫徹農輕重方針的問題；李先念講了糧食、外貿問題；鄧子恢講了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制度的問題；謝富治講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林楓講了教育問題。在最後一天的大會上，四名政治局常委講話，周恩來講了經濟形勢和方針任務以及糧食、外匯、市場、精簡等問題；鄧小平講了當前的中心工作、甄別平反和加強各級黨委領導核心的問題；朱德講了農村工作問題；劉少奇講了當前經濟形勢和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這些講話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可見中央常委們之用心良苦。這種細緻入微的講話安排和工作布置，遠遠超過了七千人大會。之後，會議展開討論，討論重點仍然圍繞着對形勢的估計。

由於有了這幾個月的醞釀，這次中財小組提交給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對於面臨的經濟困難講得更加具體。報告說，西樓會議揭露了財政收支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應量和社會購買力之間有很大的逆差，使我們對當前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的認識，比過去進了一步。報告具體擺出了國民經濟八個主要方面的困難情況：一是糧食供應還很緊張，經濟作物還在繼續減產，整個農業戰線的恢復不可能很快。全國糧食總產量要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三、五年的時間，整個農村經濟要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時間。二是工業生產要上去，沒有農業的恢復不行，沒有工業內部的大調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設規模縮小以後，必須踏步兩三年，作好調整工作，才能創造條件，繼續前進。四是貨物運輸量減少了，鐵路運輸的緊張狀況暫時緩和下來，目前突出的問題是短途運輸能力嚴重不足。五是職工人數大大超過了目前的經濟水平，特別是農業的生產水平。六是市場的供應情況，特別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後三、五年內很難有大的改善。七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外匯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需用於進口糧食。八是財政虧空，貨幣發行過多，主要商品挖了庫存，生產資料大量積壓。許多企業嚴重虧損，目前算起來一共可能有250多億元，或者更多一些。報告總括說：上述國民經濟八個方面的困難情

況，集中反映為國民收入的顯著下降。「1961年的國民收入總額為790億元，比1957年的932億元減少了142億元。如果不扭轉國民收入的這種下降趨勢，我們就不可能增加積累基金來擴大再生產，也不可能增加消費基金來改善人民生活。」

中財小組的這份報告把當時的困難形勢講得很透。在會議討論中，大家紛紛發言，表示贊同。有人說：「現在困難很大，而調整進度卻很慢，主要是因為大家對困難的深度和克服困難的艱巨性認識還不一致。比較普遍的情況是：還有些盲目樂觀情緒和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農業有個好收成，明年就可以萬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觀望、等待，硬撐着空架子，不肯收攤子減人，使以後恢復起來更加費勁，而且萬一國際上有個『風吹草動』，糧食進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設想。」有的反映：「現在還有些部門和地方對恢復農業的困難沒有足夠的認識，進行調整的決心不大，還是陳兵列馬，以為只要有一兩個好夏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馬重新再上。這是同中央精神相違背的。」有人大聲疾呼：「要有『毒蛇噬臂、壯士斷腕』的決心，把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用在刀口上，打殲滅戰，同時忍痛割愛掉一些東西。」所謂「毒蛇噬臂、壯士斷腕」，從字面上解釋，就如同股市裏的「割肉」，長期被套現而根本不能解套時，只能下決心賣掉股票，其痛苦是必須忍受的。當然，「毒蛇噬臂、壯士斷腕」更表現的是一種決絕的態度：承認錯誤，正視錯誤，改正錯誤。在中共執政的十三年歷史上，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因此，後人應十分看中這八個字。這八個字準確概括了「五月會議」的決心。

劉少奇在會上做總結講話。他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現在經濟上來說，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幹部講清楚。講了這樣多年的大好形勢，現在講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形勢，這個話是很難講。」劉少奇特別點到了中央局書記們，他接着說：「我們這回切實這樣講一講，你們回去跟省委書記講一講，然後大家才好講。」劉少奇直言不諱地改變了七千人大

會關於「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基本估計。他說：「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劉少奇這樣闡述問題，無論就形勢還是困難程度，都至少維持了他在七千人大會前起草報告時的調子。不過，這一次毛澤東不在北京，對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說了算。所以他可以堅持這樣的觀點。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後揭露出來的財政赤字和工農業存在的問題，更堅定了他此時的主見。劉的講話原話如下：「對困難的估計，無非是這樣三種，估計夠了，或者估計過了頭，或者估計不夠。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危險性不大。我們估計有那麼多困難，後來發現好一點，困難沒有那麼多，這好，這危險不大。但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就危險了。我們多少年都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是估計過頭了危險，還是估計不夠危險？比較起來，還是估計不夠危險。現在還沒有那種因為把困難誇大而使工作受損失的危險。將來可能有這種危險，但是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我們應當充分估計當前的困難以及現在還想不到的困難。要準備迎接困難，克服困難。否則，對克服困難我們就會精神準備不夠，這是危險的。一個人，充分估計了困難，但不害怕，還是幹勁十足地挺起胸膛前進，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產黨員的革命氣概，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而且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挺起腰桿前進。我想，我們革命家的氣魄，馬克思主義的氣概，應該是這樣。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5] 劉之所以講這番看起來有些「糾纏」的話，原因很明顯，就是黨內對形勢的估計始終存在分歧。寧肯放大困難，也不掩飾困難，中央一線領導人這時已經把話說到了「絕處」。但即使如此，這些話究竟能不能解決若干認識問題，就像劉反覆講困難一樣，似乎也不能估計過高。因為歷史說明，

25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45－446。

1962年之際，雲雨翻覆的事情出得太多。僅僅兩個月之後，政治走向又拐了彎。

周恩來的講話，同樣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他認為調整恢復短期內難以完成，應該有一個獨立的調整時期。這個階段大約三至五年。他說：「前年經濟調整的時候，覺得很快就調整過來了，去年經濟調整也還是這樣想。今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在西樓開會，陳雲同志講了話，少奇同志作了結論，毛澤東同志也同意，就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主要內容就是恢復。」他說：「現在看，這個調整時期要相當長。一般設想，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恐怕就是個調整階段，甚至於還不夠。恢復短期內難以實現。」為甚麼需要這麼長時間？因為糧食生產恢復到1957年水平，「總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區也許要超過五年。至於農業的全面恢復，包括經濟作物，農、林、牧、副、漁，都要超過五年。」之所以要一個獨立的調整階段，還因為「我們對新的發展，總的規模還沒有完全摸清楚」。他深有感觸地說：「要承認自己不行」，「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周也指出：調整的方針是「按照短線，不留缺口，並且留有餘地。這個方針不能一步實現，要逐步實現，但是必須堅持這個方針」。周恩來看到，農輕重次序嚴重失調。這個問題七千人大會上雖然說了，但現在表現得更突出了。所以要首先抓住調整農輕重次序這個關鍵來調整。這個調整不能以為今後一年馬上就緒。生產秩序要就緒，時間要長一些。他說，對於指標，現在我們應該更冷靜地來看這個問題，這是個艱巨的任務。經濟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要翻身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不是一件小事，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26] 周恩來的話雖不像劉少奇那樣尖銳，但仍然很「硬」，很到位。他沒有在形勢好壞的問題上多做文章，而是強調調整所需要的時間。這樣說，政治風險

---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84。

自然要小些。當然，他是主持工作運行的人。他的真正認識肯定不是形勢大好，走出了谷底，而是相反。

五月會議還涉及到了農業生產制度問題。鄧子恢在談到農村工作問題時發言說：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自留地、飼料地、借冬閒田、自由市場等也可以適當放開或擴大。他說：「我認為，當前在一定範圍之內，擴大小自由沒有危險。過去我們對自發資本主義的危險，我看也有點誇大了。因此要適當擴大小自由。」「我認為，適當擴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飼料地、借地、借冬閒田等，總不要超過總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產關係還是集體所有制，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變資本主義呀？幹部是我們的，國家主要的經濟是我們的，就發展資本主義呀？把資本主義看得太厲害了。」[27] 鄧的話不僅有理，更帶着勇氣。它們當時曾被目為中共思想的「異類」，但的確是實事求是和沒有虛飾的聲音。後來，這些話成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論，遭到全黨的批判。

經過這樣一番議論，參加會議者對中央一線的意見有了了解。雖不能說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贊同意見，但大家為推不翻的道理所說服。從這個角度說，五月中央工作會議達到了它預期的目的。在60年代的中共經濟調整史上，五月會議同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齊名，成為一次著名的扭轉思想的會議。會議所通過的中財小組報告，確定了三至五年時間專門用於調整。會議並確定了大幅度調整的措施。這些措施概括地說就是：「減人」、「下馬」、恢復農業和穩定市場。同「大躍進」以來的所有舉措相比，這些措施的每一項都是「真刀真槍」地行動，都是在「傷筋動骨」。

---

27 鄧子恢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5月9日。引自《劉少奇傳》，下冊，頁906－907。

四 非常措施

非常時期，必須採取非常措施。這些措施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減人」、「下馬」和恢復農業、穩定市場。

關於減人。從1961年就開始了。所謂減人，就是減掉自「大躍進」以來陡增的城市人口和各業職工。「大躍進」曾使城市勞動力發生極大的短缺。於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及其家屬數量，自1958年以來出現了暴漲。由於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兩元性質，實行城市供應都由國家包起來的政策，城市人口的暴漲必然帶來供應緊張。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五風」以及1960年以來自然災害的原因，全國糧食及副食品大幅度短缺，從而極大限制了城市供應的資源，造成了城市的壓力。前面我們提到的幾個主要城市都發生糧食告急的現象，正是這種全國性緊張的後果。國家急於減人，減掉的人如何處理？唯一的出路是回農村。農村雖然也正經受着飢餓的煎熬，但畢竟比城市裏人人都伸手向國家要糧食、要蔬菜好解決得多。從今天的觀點看，這種人口流動是反向的。正常的城市化進程，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還沒有出現。實際上，人們只是用了最簡單的辦法，即人多了減人，人少了加人。加人時無所顧忌，減人時越多越好。當然，擺在中共領導人面前的，也只有這樣的辦法。

據統計，1960年全國城鎮人口已達到1.3億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增加了1/4。以人口大省四川省為例。據四川省計委和省勞動局1961年2月20日向省委的報告，1957年時，四川全省農村共有全勞、半勞力2651萬人，1960年只有2353萬人，減少了290萬餘人。而在同一時期，由國家開支工資的職工卻由189萬人增加到484萬人，增加了1.5倍多，其中基本建設職工由22萬人增加到67萬人，增加了2倍多。特別是，由農村調出的勞動力，大部分是精壯男勞力，人民公社辦工業佔用強勞動力也比較多，這使農業生產一線的勞動力質量顯著下降。[28]

---

28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211。

考慮到四川省當時總人口為6485.6萬人（1962年）[29]，農村壯勞力減少是相當大的。而在同樣是人口大省的山東，自1958年以來農村人口也減少了近200萬。[30]這兩個省的農村勞力減少可能具有代表性，即，自1958年工業和城市迅速膨脹以來，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大約都在百萬以上。

中共中央1961年確定的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的方針是，當年減少城鎮人口1000多萬，其中精減職工873萬人。然而，到1961年底，城鎮人口還是比1957年多出2758萬人。經過「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國務院擴大會議的討論，人們看到城鎮人口還是過多，糧、油、副食供應難以保證。因此「五月會議」決定，在1962年內再減城鎮人口1000萬，其中職工850萬。這是一項不得已而採取的非常措施，相當於一次人口的大遷徙。當時有人評論說：「這是一個中等的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也沒有的。」而對於負責實際運作的周恩來而言，這是一個相當繁重的任務。周當時說：「今天的情況又是千頭萬緒，動一根頭髮就要牽動全身，稍一不慎，就會出亂子。我們應該有準備，一個是力爭不出亂子，另一方面也要準備，萬一出了亂子也沒有甚麼可怕。我們只要把情況跟幹部、群眾講清楚，大亂子可以克服。可是辦事不能急躁，必須要謹慎從事，不能草率從事。」「決心要大，步驟要穩，工作要細，要負責到底。」[31]

對執政者說來，下這樣一個決心的確不容易。不過，造成這樣一種局面，也沒有必要非說成是「史無前例」，似乎又創造出一個甚麼

---

29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30。據該書，四川總人口1957年為7081萬；1960年為6619.8萬；1962年為6485.6萬；1965年為7137萬；1971年為8583.7萬。

30 譚啟龍：〈回顧六十年代山東的國民經濟調整〉，載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國民經濟調整》（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230。另據《山東省情》，山東省在1964年7月1日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全省總人口為55496219人。山東省委研究室編：《山東省情（1949－1984）》（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47。

31 《周恩來傳（1949－1976）》，下冊，頁685。

歷史的奇跡來。從城市遷出2000萬人口，自然像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搬家。但是，這個搬家在性質上不是一次經濟運動。它的成本損失幾乎是無法計算的。當時中國人口大約六億五千萬左右。此次遷徙涉及的人口比例幾乎是三十分之一。在正常工業化的進程中，城市人口增加是必須的。如果把「大躍進」看成是中國工業化的一次嘗試，那麼，結果卻出現這樣的人口逆向流動，剛好證明中國1958年工業化的失敗。因此，歷史學家們在考察中國現代工業化進程時，應從工業化本身的得失來分析問題，而不是簡單歌頌「史無前例」。對執政的政黨說來，處理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自然很不容易。因而劉少奇也說：「我們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這也算一個勇氣。搞這件事，我看應該是決心要大、行動要快，但是要有區別、有步驟地來進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風。在向群眾解釋時，黨政領導要負責向群眾作自我批評，說我們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有很多缺點，因此把你們招來多了，現在只好請你們回去。要向他們請求，要求他們，要做普遍深入的群眾工作，以便使我們的思想跟群眾的思想能夠統一起來，然後就能統一行動。」劉少奇的態度比較真實。他是從承認錯誤出發的，而不是滿足於「史無前例」。

這樣大社會性行動，影響極大。作為執政者，首先應考慮的是社會穩定。同周恩來一樣，劉少奇也想到的是不出亂子。他說：要先保證「大城市不鬧大事，盡可能不出亂子，少出亂子，不出大亂子。但是我們也還要準備出亂子。」人民是顧全大局的。事實證明，精減和下放都進展得比較順利，沒有出大亂子。如此浩大的人口遷徙，到了9月份，就基本完成了。當年全國共減少職工940多萬人，減少城鎮人口1048萬人。毛澤東說起這件事，也曾感慨萬千：「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不是共產黨那個能辦到？」三年前，彭德懷在上廬山時也說過，我們的老百姓多好呀！要在歐洲，早造反了。後來，彭因此話而罪加一等，定性為反毛。可是，當人們靜下心來，承認自己的錯誤，而要中國老百姓同自己分擔錯誤造成的後果時，誰也不會否認中國老百姓的質樸、無怨和忍耐。同時，通過這件事也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的威信和號召力宛如高山。一聲令下，

地動山搖。這倒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它是一個共產黨執政最初時期的特有現象。顯然，對任何具有組織性和忍耐性的民眾說來，這種「招來揮去」的事絕不能多做，否則，執政黨的威望就要透支了，就會失信於民。1979至1980年，鄧小平幾次談到這件事。他說，過去遇到困難，黨中央一句話，全國照辦，非常頂事。「兩千多萬職工下放，走群眾路線，講清楚道理，大家並不埋怨。」他感歎說：「現在就不那麼容易了。」

關於「下馬」，就是堅決降低工業生產指標，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對現有工業企業進行「關停併轉」。年初，計劃1962年的基本建設投資額壓低至67億元。這不但比1960年的384多億元少310多億元，而且比1961年的127億元也少將近一半。經過五月會議的深入研究之後，中共中央決定再壓低到46億元。後來，又追加到67.6億元。施工項目也被減少三分之二以上。大批新建項目砍掉了。大批在建項目也被迫下馬停建，留下大批半拉子工程。這的確可稱為是「傷筋動骨」。這一砍，使居高不下的積累率大幅度地降了下來。從1960年的39.6%，1961年的19.2%，降到1962年的10.4%。這是建國後幾十年間，積累率最低的年份。以山東省為例，經過關停併轉，至1961年底，全省企業總數(包括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由上年的11522個，減少到7530個，淨減3992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由上年的14.97億元減少到4.15億元，淨減少10.82億元，其中，鋼、鐵、煤炭產量都有較大幅度的減少。此外，山東還動員近十萬人支援邊疆。[32]

降低指標，重點是降低重工業指標。中共中央決定對原1962年的計劃指標，再分別降低5%到20%。其中煤從2.5億噸降為2.39億噸；鋼從750萬噸降為600萬噸。鋼產量指標從1960年的2000萬噸降到1961年1000萬噸，再降到1962年的600萬噸，砍了70%。現有工業企業的下馬即關停併轉，更是「壯士斷腕」的重大舉措。1961年底全國共有61800多個國營企業，中央直屬的基本建設單位共有849個。

---

32 譚啟龍：〈回顧六十年代山東的國民經濟調整〉，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國民經濟調整》，頁224。

這樣多的企業和建設單位，不但同目前的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而且同調整後的1962年工業生產建設任務也極不適應。例如全國有食品企業2.1萬多個，製糖、捲煙、罐頭等行業的開工率只達到20%到30%；又如1962年棉紗的計劃產量只有260多萬件，最多只要保留500萬到600萬紗錠、100個以下的紡織廠，可當時共有近1000萬紗錠、236個紡織廠，一半以上生產能力閒置。又如按照調整計劃，有50至60個機牀廠開工就夠了，但當時生產機牀的專業工廠還有110多個。總之，全國有許多企業生產任務不足或根本沒有任務，但它們還要消耗很多燃料、電力和一部分原材料，國家要支付大量的工資和管理費用。中央確定：下定決心，「有計劃地保住一批工廠，縮小一批工廠，合併一批工廠，關掉一批工廠，並且改變一批工廠的生產任務。」

經過調整，全民所有制企業在1961年減少2.5萬個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8萬個，相當於1960年末9.6萬個企業的44.8%。冶金、建材、化工和機械工業企業的數目分別減少70.5%、50.7%、42.2%和31.6%。加強了煤炭、石油、化工等短線產品的生產能力。轉產了110個機械工業企業約3萬人、5500台機床到農業機械生產部門，也撥出了一些企業給軍事部門加強軍工生產和維修的能力。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大批下馬。農村社隊辦的企業基本上停辦了。大批基建項目和現有工業企業的大批「下馬」，這是許多人難以接受的現實。自己辛辛苦苦搭起來的架子，誰都不願被砍掉。「下馬」成了以後受人詬病的把柄。然而，不退則不進，不砍掉一批企業，老是端着個「大架子」，就無法擺脫困局。減人、下馬的目的，就是為了集中一切力量用於農業和市場的恢復。當時採取了許多應急性措施。包括恢復銀行嚴格管理資金制度，控制貨幣發行量；嚴格財政管理，各大區和各省市應得地方財政結餘、地方預備費、地方投資，都由中央按年度按季度進行分配；嚴格物資管理，清倉核資，把一切積存物資都利用於市場；盡可能增產日用品，確定一批高價商品，以回籠貨幣。當時賣高價的商品有高檔煙、酒、糖果、點心、自行車、縫紉機等。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半斤魚，以保證市民最低生活需要等。

而一切措施的最終結果，就是看農業能不能增產。鄧小平在「五月會議」上講：「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都要靠生產隊拿出來。」然而，恰恰在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上，引發了一場重大爭論。

第四章

包產到戶：中國社會主義初期的一個癥結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農業生產的制度形式，便成為政治層面一個非常嚴重和爭論不休的問題。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責任制、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這些為一般人很難弄懂實質的農業生產制度，包裹着許多政治理念和政治取向的不同。甚至，因為它而起的爭論，到後來竟成為社會轉向和重大政治鬥爭的起因。而1978年以後中國的改革，也竟從這個長期的爭論點上發生突破。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它關係重大。在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過程中，除中國外，似乎都沒有在農業生產制度問題上發生過影響巨大的爭論。它們也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基本實行的是公有性質的或以公有性質為主的農村生產制度和社會制度(有些國家如波蘭農業經營以個體為主）。後來，到二十世紀90年代蘇、東發生劇變，也並不由農村生產制度引發。這種現象頗為弔詭。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在1962年之際，這成為一個政治關節點。

一　歸去來兮責任田

無疑，曾希聖是責任田問題上省一級領導人的第一個被難者。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上下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

針對曾的專橫和跋扈。據曾的傳記作者說，曾的脾氣暴躁，作風專橫，是因為他長期負責破譯敵人電碼。這種工作極為艱難，極易造成人的暴怒、乖僻孤僻。[1] 曾是老資格，建國後長期任職省委一把手，遂將早年形成的秉性也帶到地方，導致幹群關係緊張。但是，曾被免職，更大的原因是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在安徽省推行責任田這件事，曾先向毛澤東口頭匯報，然後又得到書面的允准。但毛澤東同意可以「試」的話，並不是真正同意了推行責任田的意思，毛澤東根深蒂固地認為，所謂責任田，其實就是包產到戶，或者是單幹。在農村問題非常嚴重，餓飯、死人都已經暴露出來時，毛澤東的同意「試」，是可以理解的；但原則上並不同意。曾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在安徽興致勃勃地公開推廣，就顯出其政治上的幼稚。曾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說：「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沒有認真研究，不求甚解，貫徹不力……使黨受到了嚴重損失，使人民受到了嚴重損失，使工作受到了嚴重損失，造成了嚴重非正常死亡，破壞了農村生產力。」[2] 曾在小組的檢討十分沉重，承認對不起黨、毛主席，更對不起安徽人民和廣大幹部。

曾在七千人大會後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李葆華繼任。隨之，安徽省委改組。新任省委書記李葆華上任後，即着手糾正「責任田」。1962年3月20日，省委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承認責任田的辦法「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是錯誤的」，「是迎合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辦法」，其「嚴重惡果」是「出現了嚴重的單幹傾向」；「產生兩極分化的苗頭」；「削弱和瓦解了集體經濟」；「影響國家徵購和生活安排」；「影響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對基層組織起了腐蝕和瓦解的作用」；並說「這個錯誤的責任，完全應當由以曾希聖同志為中心的省委來承擔。」省委的決議要求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其餘部分在1963年內改過來。

---

1 參見《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曾希聖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2 《曾希聖傳》，頁508。

這裏還有一個插曲。1961年秋，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受毛澤東的委託，到安徽、河南考察。胡考察歸來，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其中關鍵部分講到責任田。胡斷言：責任田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胡說：「這種做法對調動社員的積極性確實起了積極作用」，「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並不否認這個事實，一棍子打死」。「但是，這種做法已經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糾紛」。「隨着時間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系列的危險：1、會發生不等價換工，從而產生剝削；2、違反簡單協作優於單幹的原理，從而降低生產效率；3、大家既然對集體生產不關心，就不可能發展擴大再生產的能力；4、集體觀念淡漠下去，集體組織也會癱瘓。總起來說，這種做法發展下去，最後會引導到降低整個社會生產水平。」[3] 無須說，即使在二十世紀60年代思想行為就顯現出開放氣度的胡耀邦，也是不贊成責任田的，並且言語甚重。他的「一種起過作用當具有危險性的做法」的話，頗像人們形容罌粟花：好看但極其危險。《曾希聖傳》的作者接着披露：二十一年後，1982年10月24日至11月1日，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再次來到安徽視察工作。在談到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時，胡耀邦說：從歷史情況來說，在1960年以後，黨內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先知先覺者。當時主張改革1956年後農業長期推行的辦法。他還說，對「責任田」的認識有先有後，當時我對這個辦法是不贊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筆債，我這次來安徽是來還債的。胡接着稱讚了曾希聖，認為曾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驅。[4] 其實，「還債」和「先驅」，兩個詞在這裏都「過」了。責任田引起災禍，根本上責任不在胡耀邦，毛澤東那裏首先就無法通過，黨內大部分人也是起而共討之。而把曾希聖看作農村改革的「先驅」，有一定道理。曾是省一級大員，可以推行

3　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有關「責任田」辦法的文件彙編〉，轉引自《曾希聖傳》，頁502。

4　中共安徽省委辦公廳：〈有關「責任田」辦法的文件彙編〉，轉引自《曾希聖傳》，頁502－503。

自己的主張。但是，比曾看得遠和做得早的卻大有其人。鄧子恢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比曾要堅定得多。而那些位雖卑卻為「責任田」奔走呼號、冒死進諫的人，更值得人們景仰。特別是，農民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更是共和國農村建設的主體，他們從沒有放棄改變現狀的希望。

1960年代初，贊成和實行「包產到戶」比較突出的地方，還有廣西省。1962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原小隊）後，廣西各縣在訓練幹部的會議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農村公社以下幹部，有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思想。一般佔到會幹部總數的25%左右，「五風」和受災減產嚴重的地區，佔60%。「龍勝縣共有1867個生產隊，其中790個（佔42.3%）已經包產到戶。」中共廣西省監委和中共中央監委都批評這是「鬧單幹」。

與公共食堂一哄而散的情形相反，1962年春的糾正「包產到戶」卻很困難，許多農民不願意改，有的明改暗不改，形成頂牛。

農民的反彈如此強烈是官員們沒有想到的！這種客觀存在的矛盾，引起了黨內的一番大討論，同情和支持農民的輿論驟然興起。

安徽省太湖縣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能讓，挺身而出，直接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洋洋萬言，力保責任田，反對省委3月20日關於改正責任田的決議。他不會不知道，省委這樣做，正是貫徹中央的精神。但他仍以為民請命之責，不惜冒險力陳。錢能讓寫道：「根據太湖縣一年多來實行責任田的結果，我想作一保薦，不過與省委常委1962年3月20日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是相違背的。儘管如此，我總認為『責任田』的辦法是農民的一個創舉，是適應農村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六十條》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重要補充。有了它，當前的農業生產就如魚得水，錦上添花。」1961年3月，太湖縣90%以上的地區推行了責任田，「真所謂它的一出現，就以它的顯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們（包括鄰縣鄰省邊界地區）廣泛注意，迄今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儘管有人責難它『糟了』『錯了』，然而廣大農民群眾總認為是『好了』『對了』。記得去年春，我在執行這一工作的過程中，農民群眾的那股勁頭是我十多年來（除土改外）的第一次見

聞。」「推行這一辦法的結果，現在可以肯定地說，1961年是太湖人民在精神上、物資（質）上的一個新的根本性的轉折。荒、逃、病、死，一瞬而基本變成熟（荒地變成了熟地）、健（體質健康了）、生（婦女懷孕了，江塘公社甘嶺大隊558個人，1962年懷孕的就有60個婦女）」。「迅速轉變，究竟是甚麼力量呢？拿農民的話說『就是責任田好』。」

錢能讓舉了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太湖縣徐橋實行了責任田，附近的宿松縣沒有實行。徐橋嫁到宿松縣的姑娘們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為的是多吃幾餐飽飯，回去還帶些糧食走。做母親的歎息道：「你們宿松縣不實行責任田，真急人。」錢能讓回顧歷史說：「從辦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以來，生產關係的變化，公社、大隊、生產隊組織形式的每一次調整，沒有那一次不都說是適應。現在看來，其實並非如此。」1955年是太湖解放後農業生產力發展和群眾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年。之所以如此，除了國家對農民的支援外，「主要是有了土改後的連續三四年農民積極性所發展起來的物質基礎，和初級社的生產關係還相適應的原因所致。」而現在的「責任田」，「它比1955年的初級社來說，其優越性可不言而喻，就是比起高級社來，它在制度上是更加合理，更加完備了。是具體貫徹『按勞分配』一個新的發展和進步。」他認為，多年來農業上的問題「主要就是責任沒有到人」。錢能讓極不贊成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的決定，他寫道：「急急忙忙的收回責任田，吵吵鬧鬧的指責是『單幹』，很可能因為一部分是好心同志不知底裏，一部分還是以『本本主義』的觀點害怕農民不跟我們走。可是農民還是贊成責任田，無論下鄉也好，出差在輪船碼頭等車休息也好，許多農民有關責任田這方面的道理，與我在省裏聽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道理，則完全相反。許多奇跡，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所有不贊成『責任田』的各種議論，我想請到這裏一聞一見，是會有很大教益的。我很擔心，省委決議1962年內就要大部分改過來。根據這裏的情況，是不可能的。因為農民他不會相信空話的，你做不出樣子，證明比他的辦法優越，除掉強迫命令，我看是扭不過來。」

「據我們調查摸底，擁護責任田的起碼佔80%以上，甚至於佔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同呼吸，該不能算是尾巴主義吧！怕80%甚至90%以上的不跟我們走，這恐怕也不能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90%以上的人民大眾的道理呢？」

最後，錢能讓請求毛澤東直接派人前來調查，弄清是非。他甚至說：「像荒、逃、餓、病、死一字不漏的太湖縣能夠在一年內而且還是在那樣大旱的情況下，基本上解決了吃的問題，那麼其他有類似情況的地區也未始不可試行這個辦法。」希望把安徽的「責任田」推向其他省市。即使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人們也不得不欽佩錢「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勇氣。他真是一個在政治上有堅定信念的「單幹理論家」。

事實上，在責任田問題上為民代言的，遠不僅錢能讓一人。當時，政策限制與農民的願望相抵觸，與實際情況相背離。能增產的辦法，上面說是資本主義，不讓搞；不利生產的辦法，上面說是社會主義，壓着搞，農民想不通，許多幹部也想不通。一些有血性、有頭腦又不知深淺的小人物，也對人民公社提出了挑戰。

1961年初冬，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接到一封信件，長達一萬餘字，每一句都在述說包產到戶的必要以及它的好處。作者請求他把這封信轉交給毛主席，還在信的最後寫道：「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戰鬥。有人講我這樣下去很危險，一鬥、二鬥把自己的腦袋鬥下去。我回答說，這是你們的說法，是你們的觀點方法問題。我鬥得對，我很站得住腳。」這簡直就是包產到戶的宣言書！

馬寅初與寫信人素昧平生。但從信封上知道，這個人是浙江省嵊縣人，他的同鄉，名叫楊木水，鄉下年輕的蠶桑技術員。他把他的「宣言書」寄給馬寅初的唯一動機，是他覺得他這位品學兼修的同鄉有着上達民聲的熱情和威望。但楊木水哪裏知道，這時的馬寅初，遠非從前。自從毛澤東指責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論，質問說這是馬克思的還是馬爾薩斯的以後，他的處境艱難，何能上達民聲。不過，馬寅初的舉動超乎楊木水的意料。他居然專程回鄉去面晤楊木水。當他把楊木水邀進自己的房間之後，縣委的官員們就驚慌不安起來，不斷

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門，希望加入進去，以此來阻止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這令馬老先生極為震怒，他拒絕任何人的參與，直到幫助楊木水把包產到戶的「宣言書」修改一遍才開門出來。分手之時兩位剛剛結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覷。老的說：「正確的意見不要輕易放棄，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想說甚麼卻甚麼也沒有說，後來他對女友說：「說不定哪一天我就會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們分道揚鑣吧。」

我們不需要知道這封包產到戶「宣言書」是如何處置的。這已經足夠了，從這段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著名學者的風骨和一個無名小輩的血性。

1962年4月21日，一個名叫馮志來的二十七歲的年輕人完成了他的文章，題為〈半社會主義論〉。文章劈頭就問：「甚麼是我們眼前的出路？包產到戶！」他直截了當地承認「這是單幹」，他嘲笑那些把「單幹等同於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小生產的人」，「難道看到自己的父親有鼻子，就認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親嗎？」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人民公社：「有人認為，人民公社是最完備的形式，可以容納共產主義的生產力，真是荒唐透頂。想將胚胎預先取出當嬰兒養是不行的，即使給他穿上美麗的衣服，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馮志來湊了一百六十元錢，搭上一列火車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又送了兩份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他以為這樣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沒人理睬他。回到家裏，馮志來再接再厲，用了兩個月，又寫出一篇，叫做〈怎麼辦？〉的長文，說是為了補充他的那篇〈半社會主義論〉。他的新作是一篇討伐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筆鋒犀利地直指農村裏的悲慘局面。他在文中仰天長問：「錯在哪裏？」人們都說是天災造成的，可是「天災是次要的，『五風』僅僅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左』的錯誤……異想天開、創造狂、虛假浮誇，都得到鼓勵，在高速的口號下，殘酷地剝奪農民。大躍進變成大倒退，多快好省變成少慢差費。更不幸的是不承認這些事實」。也許，他真的沒有自我保護的意識，不知道這將給自己帶來甚麼樣的後果；也許，他真的是不顧一切。1958年他因為口沒遮

攔而被開除出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他大哭了一場。這一次他的心理準備要充分得多了。

上次赴京送文章，竟無人理睬，他覺得自己人微言輕，這一次把文章投遞北京的時候，他借名人效應，自稱自己是馮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願，北京的回信來了，可不是寫給他的，而是寫給當地黨的機關，要他們追查作者的後台是不是馮雪峰。這差點給馮雪峰又罪加一等，馮已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

然而，《人民日報》那時候收到的信，不僅僅是馮志來一個人寫的。另外一個人，陳新宇，寫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裏務商，因為嚮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藍圖，高喊着「我愛農村」，就參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隊伍。結果他看到農民對於公社根本沒有興趣，卻對包產到戶一往情深，就一氣寫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報》。他告訴報紙編輯，他「原來是去糾正包產到戶的，可是反而被群眾和事實說服了，現在堅決主張包產到戶」。這一回編輯居然大動惻隱之心，將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個叫做《讀者來信》的不公開的刊物上，並且加上了一個標題：〈重談包產到戶〉。陳新宇說他「確信包產到戶是終將出現的必然的現象，有非常堅定的勝利信心，決不放棄自己的主張。」像馮志來一樣，他閉門拒友，堅持獨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當。

7月中旬，陳新宇接到了報社寄來的稿費，共計二十五元五角。他將稿費買來一大堆桃子分給同事，一時間他的周圍竟有了笑聲。他哪裏知道，就在這時，風雲突變。事情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指着浙江省省委書記說：「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幹理論家」，口氣之嚴厲，令人驀然。

如果說，上述幾個敢於「冒天下大不韙」的人，都來自浙江和安徽這樣比較富庶的省份，他們通常被認為頭腦靈活，捕捉政策信息靈便，那麼，再傾聽一個土生土長的西北農民的呼喊，則映照出責任田所代表的更原始的生命意義。〈一葉知秋〉（又名〈當前形勢懷感〉），陝北戶縣農民楊偉明發自內心帶血的文字，曾經驚動了中共領導高層。據說，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這篇文章有一句話，一葉知秋，異地皆然。

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希望……戶縣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5]讓毛澤東提議反擊的東西，或者說所謂「知秋」和「知冬」的到底是甚麼呢？翻看楊偉名的遺稿，我們會發現，他真有點大不敬！楊竟然這樣說，要有1947年黨中央「主動撤離延安」的膽魄，糾正所犯錯誤，改弦易轍。楊說：「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飢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這種情況，已經是一望可知的事實，用不着連篇累牘地再進行分析了。」[6]楊認為：「看來形勢是逼人的。不過困難的克服，倒是很易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盡快地應用於當前形勢，諸如一類物資自由市場的開放、中小型工商業以『節制』代替『改造』。農業方面採取『集體』與『單幹』聽憑群眾自願等，都是可以大膽考慮的！」[7]

在〈當前形勢懷感〉中，楊偉名專門寫了一節「恢復單幹」。他是農民，他的感覺和看法是從真正的「草根」中來的：「近年來農村中不斷有『恢復單幹』的傳說，這種傳說我們不能認為是『別有用心』者的造謠；說他是目前農民群眾單幹思想傾向的反映，則是比較妥當的。如果目前農村群眾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復單幹的願望，那麼他們所希望恢復單幹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樣的單幹呢？就目前群眾的認識水平和交談情況來看，多半數『是』，少半數『不是』。」[8]楊偉

5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一位民間思想家的悲情記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2。

6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2。

7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2－3。

8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6。

名分析認為，少數的持「不是」態度的人的看法比較合理，即不回到合作化之前的土地所有關係是可行的。這種土地所有關係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他說：「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認識上覺得現在再要恢復單幹，就不必恢復合作化以前那樣的單幹，而是以新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單幹形式出現。這種單幹，其所以有別於合作化之前的那種單幹，正是因為，土地雖分到戶，而地權仍歸集體所有，勞動致富，生產發家，剝削行為概不能有。」[9] 如果仔細琢磨，楊偉名四十多年前所構築的理想的農村土地關係，其實同1970年代末在安徽首先出現的「大包乾」很是相似，只是它更帶靈活性：是土地而不是地權被分於農民；農民可在土地上通過勞動發家致富，同時也廢止了剝削。楊偉名說：「『分田到戶』，不是要求一律單幹，而是願意單幹者，可以允許，願意集體者可以另行自願結合，這樣集體與單幹兩種形式，同時並存。估計這樣因皆出於個人自願，生產會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時雖說『入社自願』，實際多為『大勢所趨』，現在採取自願，正是補救了過去的不自願。農業合作化以來，生產所以停滯不前，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初多數不是出於真正自願有關。」[10] 老楊看得真準！他算是把準了農民的脈，找到了解決農村問題的鑰匙：農民沒有可靠的土地關係，自然沒有生產積極性。由此出發找合適的農業生產形式，才是解決農業凋敝的正確路徑。更可貴的是，老楊並不是一個蠻幹者和不負責任的批評者。他在文章中給共產黨留足了「面子」：「有人慮及分田到戶於國際視聽有礙。其實人民公社依舊保留，分田到戶(農民)仍歸公社領導，為公社社員。至於集體與單幹之間的領導關係——單幹到戶，歸隊領導，還是歸公社領導，可以另行研究。」[11] 按老楊的設想，如果真以「撤出延安的精神」，認真對待「過」和「退」，以「養雞取蛋」而不是「殺雞取蛋」的方法，農村調整是可以成功的。當然，沒有一個領導人會按老楊的意見做。

---

9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6。

10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7。

11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7。

於是，老楊面前的路注定遍布荊棘。隨着〈一葉知秋〉為毛澤東否定，他自己也就陷入了政治麻煩之中。1962年後，老楊被免去生產隊會計。「文革」中，他難逃重劫，於1968年遭批鬥迫害。當年即因不堪忍受折磨，服毒自盡，終年四十六歲。

二　「河北有個胡開明」

毛澤東在1962年8月6日的北戴河會議上說：現在就有鬧單幹之風，愈到上層愈大。9日，在會議中心小組上他又說：河北有個胡開明，有這麼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的論調的傳達，感到壓力。你壓了我那麼久，從1960年以來，講了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麼。[12] 作為河北省副省長，胡開明屬於那些「愈到上層愈大」的「鬧單幹」的代表者之一。經毛澤東點名，他成了中共黨內的知名人物，影響甚至延續了幾十年。

胡開明是何許人，為甚麼能得到毛澤東的特別「垂青」？

打開歷史資料，我們終於可以得知，胡開明是中共黨內知識分子幹部，是真正有骨氣為民請命而大智無私的省級領導人之一。胡開明生於1913年，浙江樂清人。十六歲加入抗日組織反帝大同盟。1933年考入北平國立東北大學經濟系，為「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曾任東北大學救亡會常委、東北大學出席北平市學聯的代表。在「一二·九運動」中，他被國民黨憲兵團逮捕。胡於193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進入延安在抗大學習。抗戰中，胡在晉察冀根據地任職。1949年後，先後在察哈爾、河北省任黨政負責人。1954年起任河北省副省長。1962年，胡開明調任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8月，

12　《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年7月—1963年12月），頁403、417。

連續兩次上書毛澤東，主張在農村實行「三包」到組的責任制。9月，開始遭到批判。「文革」後得到平反。1978年出任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同所有中共幹部一樣，胡開明在1958年也對「總路線」充滿了信心。當年6月，他曾在天津大學作過一次長篇報告。報告說：「根據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要求，為了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省近期的任務是要建立起以農業技術改造為中心的工業體系，實現『四化』、『三網』，即實現水利灌溉機械化，農業耕作機械化，交通運輸機械化，化肥普及化；建立機械網、電力網、交通網，並在一些主要工業生產部門採用國內外最新的技術成就和現代化設備，生產新的高級產品。」他在報告中認為，按照當時中國鋼、發電、原煤等主要工業產品的增長速度，粗略估計「三年就可以趕上英國，七年就可以趕上美國。」[13] 這個論調雖然比較「冒」，但在當時並不算特別「突出」。那時，大家一樣都被「躍進」理想所愚弄。

後來胡開明對人說，如果不去張家口主持一個地方的工作，也是不會發現基層和百姓中的真情的。1959年廬山會議後，原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因認同彭德懷信的觀點而被撤職。當時帶領工作組在張家口指導整風反右傾的胡開明，由此提出到張家口主持工作的要求。當年底，中共中央批准，胡開明出任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1961年5月，張家口市委改為地委後，胡也改任地委第一書記，同時仍為河北省委常委）。作為地方長官，胡開明首次到基層視察便來到張北縣。張北縣在「大躍進」中被稱為河北糧食高產「元帥縣」。但胡在當地看到，農民家庭是「每人四顆土豆，一鍋酸溜溜（酸柳果，即沙棘）湯，人們一口湯、一口土豆地吃着『飯』」。可是，據報告說，張北縣糧食平均畝產410斤，創造過歷史記錄。事實上，張北位於內蒙古高原南緣，平均海拔1500多米，地廣人稀，土地貧瘠，氣候乾燥，風多雨

13 引自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43。

少，十年九旱，無霜期極短。1949年時，張北縣平均畝產只有55斤。解放後雖有發展，畝產也只有100斤左右。但在「大躍進」中，受「放衛星」的影響，張北縣提出「實現畝產400斤，爭當糧食元帥縣」的口號。為實現這個「牛皮」，人們曾想到要用肉湯追肥，於是打狗、殺貓、抓蛤蟆、撈蝌蚪、逮草魚、找毛毛蟲，以為肉湯原料。甚至還將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實驗田裏。但到收成之日，張北縣的畝產仍然只有110斤。可當年被吹出去的「神話」，卻肯定全縣9萬畝糧食作物平均畝產412斤，並放出一顆畝產莜麥3012斤的「衛星」。高指標和浮誇必定引來高徵購。老百姓受放「衛星」之累，才不得不以土豆度日。[14]

當時，整個張家口地區形勢也非常嚴峻。從1959年到1961年，張家口地區連遇自然災害。風、旱、雹、水、病蟲五害並來，使60%以上的耕地嚴重成災。受災人口佔全地區的54.11%。[15]對胡開明說來，人民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本書前面曾提到過飢餓中老百姓的極端例子。這些例子就來自張家口，是胡開明所親見的。當時，張家口某地的人們已經對中毒失去了感覺。他們為使肚裏有食，竟然去扒伴上了農藥的麥種充飢；而完全沒有營養成份的代食品，食後讓人腹脹難挨，嘔吐不止。胡開明雖然想盡一切辦法，比如開倉秘密放上繳糧、解散公共食堂等，都不能救民於水火。宣化市1960年實行每人每天四兩糧定量後，平均每月死亡人口達到了一千多人。[16]

胡開明認為，要渡過這一巨大的困難，根本辦法還是要把生產搞上去。從歷史上看，從互助組到合作化這一段，生產是上升的。但到高級社時，生產就開始下降。胡開明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估計過快。這幾年農業減產，總是說有天災，具體到局部地區，沒有天災也減了產，這說明生產關係的變革搞過了頭。[17]

---

14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48－150。

15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56。

16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63。

17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76。

用老百姓的說法，是「喬武舉的毛驢，有人騎沒人餵」。胡開明經過同幹部群眾反覆醞釀、討論，一致認為，「三包一獎」制（指包工、包產、包投資、超產獎勵）存在問題很多，「春定夏變秋不算，很難實現和兌現」。只有以小隊（即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於是，胡開明親自起草了〈關於郭壘莊分配大包乾的調查報告〉。報告提出：「『三包一獎』制一遇自然災害就不能兌現，更難分清天災和人為減產各佔多大比重，而且『三包一獎』制手續複雜，講不清，算不清。由大隊統一核算，避免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不利調動社員和小隊積極性。報告主張，以「分配大包乾」代替「三包一獎」，實際上就是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18] 這比毛澤東正式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要早了幾個月。

但胡開明並未止步，他還要再冒「退」一步的風險。不久，他提出了實行「三包到組」的建議。這樣，他就「挑」出了一個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大題目。

在張家口市郊區的孤石大隊，胡開明看到一片長得格外喜人的蔬菜。隊幹部告訴他，作業組是自願結合的，菜地包到組，工分、產量也包到組，叫做「三包」到組。現在人們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幹活細了，上糞多了。與相鄰的大隊菜地相比，蔬菜長勢完全兩個樣子。胡開明認識到，「三包」到組有如下好處：首先，戶數少了，與社員利益更直接；其次，一組間的社員便於互相諒解、互相監督、自覺勞動；第三，勞動力好支配，農活好安排；第四，幹部參加勞動多了，偷不了懶。這個辦法，比起生產隊核算來，鞋子又「小了兩號」。[19] 胡於是建議在全地區推廣。後來，經平反回到張家口的原市委第一書記葛啟等人，又建議在嚴重困難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但胡開明沒有同意。他仍然堅持認為，「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最適合當時的農村生產力發展。

---

18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 179。

19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 183。

1962年7月，華北局農村工作座談會在北戴河召開。行前，在準備材料時，胡的夫人李克林對胡說：「在工業上可以搞小組核算，農業上怎麼不可以搞？毛主席說要『五不怕』(即指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我們革命、工作了幾十年，怕甚麼？」[20] 胡開明非常同意夫人的意見。在他當時寫的〈要如實反映情況〉一文中，他表示：要實事求是，必須如實反映情況。如實反映情況是實事求是的第一步。如實向黨反映情況，講老實話，是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是衡量黨員幹部堅持實事求是作風的第一個標準，是黨員黨性是否純正的具體表現。共產黨員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從來都不怕流血和殺頭，難道還能夠為了一些個人利益得失而不向黨講真情實話嗎？[21] 胡開明的這些「豪言壯語」，表現了他高貴的個人品質和共產黨員氣節。但同時也說明，當時中共黨內講真話的壓力極大。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說過，光講五不怕不行，關鍵還是要講黨內民主，被國民黨殺頭可以，但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

1962年8月8日，胡開明向毛澤東上書，推薦農業生產責任制度。這份上書題為〈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建議提出，目前農村勞動管理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義的計酬方式必然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建議論及了「三包」到組的七大好處，即，第一，由於生產單位小了，生產組有了超產部分的分配權，集體的利益和社員的利益就更為直接了，所以社員都能「掏出真心幹」，力爭多超產；第二，解決了組與組之間評工記分標準不統一的矛盾；第三，小組人數少，便於監督；第四，自願結合，心同意合，可互相幫助；第五，由於戶數少，便於實行民主管理，靈活安排農活；第六，減少了幹部誤工補貼；第七，小組成員固定，地段固定，同時實行「三包」合同長期不變，有利生產。建議還針對反對

20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94。

21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94－197。

意見進行了辯白。其中爭論說，如果說現在生產隊對生產組實行「三包」，是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組了，那麼，過去大隊對生產隊也實行「三包」，為甚麼還改變基本核算單位呢？顯然，「三包」到組，基本核算單位還是生產隊。有人說，小組包產以後，又有一部分分配權，不好。我認為好。因為小組有了超產部分的分配權，他們就力爭超產了；他們愈力爭超產，完成包產和完成國家徵購就愈有保證。同時，小組分得這種超額報酬，也屬於多勞多得部分，是完全合理的。這樣做，一點也影響不了生產隊的統一分配計劃。[22]

8月18日，胡開明又第二次上書毛澤東，所附材料為〈關於農村口糧分配辦法的意見〉。這個材料的主導思想是：在生產資料都歸公之後，在大家口糧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況下，一味強調按勞分配是不行的。胡開明認為，應該實行「基本口糧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辦法，而廢除目前農村普遍實行的「按勞動工分分配加照顧」的辦法。胡開明解釋說：實行「基本口糧和按勞分配相結合」，暫時看來，物質刺激作用似乎不如「按勞分配加照顧」來得強烈。但它的最大好處是，能夠比較全面做到「既調動了最大多數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又確實保證了人多勞少的困難戶和農村非農業人口的一般口糧標準」。因為，它在口糧較低的條件下，首先保證了全民的基本口糧，維持了正常的社會勞動，但同時這種基本口糧又僅僅是保命的最低需要，要想生活好，還必須依靠多勞多得。[23] 簡單說，胡的這個意見，就是要在現行的農村分配制度中，加大農村按勞分配的比重，減少人為「照顧」的因素。

毛澤東在接到胡開明第一個材料後於16日批了一句話：「印發各同志討論。」態度十分曖昧。可在8月9日，也就是胡開明上書的第二天，毛在中心組會上就講了上述那段「河北有個胡開明」的著名的話。今天看來，胡企圖以講道理的方式來說服毛澤東，實行「包產」

---

22 胡開明：〈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載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301－309。

23 胡開明：〈關於農村口糧分配辦法的建議〉，載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310－316。

責任制，對恢復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確有很大的好處。但在毛澤東看來，此時全黨必須從政治方面看待生產責任制。他明確發出信息，黨內有一批人「在困難時期頂不住，支持單幹，已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其表現形式就是農村生產責任制和包產到戶。顯然，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道理可講了。

此後，胡開明只有做檢討的「份」。在「文革」中，由於有毛澤東對他的這番奚落和批判，使他更是如墮入「萬丈深淵」。直到1981年，胡的這一「反革命集團案」才得到徹底平反。歷史嘲弄人也非常眷顧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半年，胡開明被任命為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在那裏一幹五年半，為安徽的農村改革繼續「鼓與呼」了六十六個月。由於這樣的原因，胡開明的名字，不能不同揭開中國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序幕以及由此引發出的一場大爭論相始終。

三　風起高牆

高處不勝寒。

1962年，關於農村生產制度的爭論，最終集中在中央高層中。因此，真正的暴風雨還在「天端」。

在中央高層的爭論中，田家英扮演了特殊角色。田家英任毛澤東秘書十幾年。他本來深諳毛澤東的心理，對包產到戶同樣持反對態度。可是，一個契機使他政治態度發生了改變。他最後竟成為點燃兩個主席之間衝突導火索的人。

1962年2月25日，毛澤東把田家英叫去杭州。要田再組織一個調查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調查，主要了解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毛澤東給田家英指出了四個調查地點：湘潭的韶山（毛的家鄉）、湘鄉的唐家坨（毛的外祖父家）、寧鄉的炭子沖（劉少奇的家鄉）、長沙的天華大隊（劉1961年3、4月間蹲點的地方）。他特別囑咐田家英，要向劉少奇報告一下，問他有甚麼指示，他那裏有甚麼人要參加調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除了表示同意外，還很關心調查組，說湖南3月份天氣還很冷，可以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給大家穿。田家英組織了一個十七人的調查組。

3月22日，在武昌東湖招待所，毛澤東親自接見了調查組全體成員，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座。毛先是一個一個地問每個人的名字，接着講了一些當時流傳的政治笑話，談笑風生。一到外地，毛澤東的心情就變得好起來。

最後，毛澤東向調查組提了幾點希望：第一，要同當地幹部，省、地、縣、社各級幹部相結合。第二，不要亂指揮。第三，頭腦裏不要帶東西（指思想框框）下去，只帶一件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第四，要做歷史的調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第五，看到壞人壞事不要亂說，好的可以說。第六，參加點輕微的勞動。「毛澤東當時親切、溫和而又輕鬆的談話情景，至今還給我留下清晰的印象。」參加調查組的逄先知回憶說。

毛澤東對這次調查寄予厚望。有了前次成功的浙江調查，他相信田家英領導的這次調查同樣會給他很大的幫助。毛所希望得到的結論：一是如何恢復農業生產，二是如何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此時，他對不少地方仍在搞包產到戶已有所耳聞。

田家英的心情是愉快的，一則得到毛澤東的信任，一則與毛澤東的觀點又一致了。他把這次調查的重點放在如何恢復農業生產這個問題上。當時，陳雲正在組織人力調查和深入研究這個問題。這也是全黨各級組織都在研究的一個題目。田計劃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為中央起草一個〈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的文件。

3月底，調查組全部到達農村。分兵三路，一路去韶山大隊，一路去大坪大隊（唐家坨）、一路去炭子沖大隊。天華大隊沒有去。田住在韶山。田家英一行一進村，遇到了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炭子沖好一些，據說這是因為劉少奇1961年回家鄉時曾批評過包產到戶。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調查組其他人也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歷數公社化以來

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同志辯論到深夜。田家英本不贊成包產到戶，大家還記得上年3月他含淚給毛澤東寫信反對包產到戶的事。然而，時隔一年，經過一段調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變化。他認真聽取和思考農民的意見，覺得很有道理。調查組內也有人主張包產到戶。田組織全體組員討論，鼓勵暢所欲言，雙方爭論非常激烈，而又都心平氣和。田認真聽取雙方闡述的理由。當時不主張包產到戶的意見佔上風，但他仍鼓勵少數幾個人繼續研究。

此時，田家英內心陷入了矛盾。從實際看，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對恢復生產有利。但茲事體大，不能輕舉妄動，特別是在此地更應謹慎。此地一動，勢必影響全省。因此，儘管私下裏已萌生贊成包產到戶的想法，在公開場合，對農民和幹部的要求絲毫不鬆口。

田家英就是帶着這種矛盾的心情，同逢先知一起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的。當時，陳雲也在上海，他們將三個點的調查報告同時送給毛、陳兩人。所得到的反應迥然不同。陳雲讀後很稱讚，說「觀點鮮明」。在這之前，田已將炭子沖大隊的調查報告寄給了劉少奇，劉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毛澤東卻很冷漠，大概沒有看，只聽了田的口頭匯報。毛對田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這是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問題的又一次明確表態。

在上海期間，楊尚昆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田家英當即表示同意。田家英從上海回到韶山，調查工作已接近尾聲。田沒有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此時，包產到戶在全國呈現迅速發展之勢，推行包產到戶的呼聲日益高漲，成了黨內議論的重要話題。為了進一步弄清這個問題，田家英派出兩人立即趕往安徽無為縣，了解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他們調查的結論大致是：包產到戶對於解救已經遭到破壞的集體經濟的危機，迅速恢復農業生產，肯定是有利的和有必要的；但是，將來要進一步發展農業經濟，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調查組回到北京已經是6月底。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作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打斷了。劉說：「現在情況已經明瞭了。」接

着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且詳細講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少奇同志，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田家英問。劉少奇說：「可以。」稍頓，劉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見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他為慎重起見，並且希望能夠真正聽到「秀才」們的真實意見，囑咐田不要說是他的意見。

離開劉少奇處，緊接着田家英又向鄧小平報告關於起草〈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的設想。鄧的話不多，很乾脆：「贊成。」田家英立即組織起草班子。他的指導思想就是：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與此同時，田家英還向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得到一致贊同。表面看，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原來，此時北京已對包產到戶問題有廣泛議論。中央常委幾乎所有人都贊成包產到戶。不過中央是否確定推行包產到戶，關鍵就看毛澤東的態度了。

此時，中共黨內另一位農村問題專家鄧子恢，也正為積極推行包產到戶而奔走。鄧子恢是老資格共產黨人。他可以說是福建地區中共黨的領導人。建國後，鄧曾在中南局任主要職務，後改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5年因為就集體化速度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爭論，曾是毛澤東要拿大炮轟的人物。從這一點說，鄧在政治上絕對是個敏感之人。

七千人大會上，安徽的「責任田」雖受到批判，但廣西、湖南、河南、貴州、陝西、甘肅等省農村分田到戶的訊息不斷傳來，鄧子恢急於了解農村的情況，在同廖魯言、陳正人、王觀瀾商量之後，再帶一個工作組去南方。

2月中旬離開北京後，他們首先到了湖南長沙。在了解到湖南省一部分生產隊於1961年春耕時出現「單幹風」，秋收時再次興起，1962年春又一次出現的情況後，鄧慨歎，連毛澤東的家鄉湘潭、劉少奇的家鄉寧鄉，社員要求「分田到戶」的呼聲也如此高。同時他也得知，湖南省委不主張分田到戶，正在着手研究解決改進生產經營管理、健全責任制的問題。

接着鄧子恢等到了廣西南寧。在武鳴縣，他深入到一些公社，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幹部座談。在座談中同幹部討論的問題有：大活集體幹，小活分開幹；牲畜分戶餵養，生下幼畜，三條腿歸戶，一條腿歸集體；自留地、開荒地增加到總耕面積的15%－20%等等，大家樂哈哈贊成。他聽取了廣西自治區黨委領導人的匯報：很大一部分農村，公社以下幹部有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思想傾向，有不少生產隊已經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龍勝縣50%多的生產隊已經包產到戶。為了防止滑向包產到戶，自治區黨委提倡實行臨時作業組。談到龍勝縣的包產到戶，自治區黨委領導同志感到壓力很大。鄧子恢體諒他們的心情，說：「你就讓他們單幹，怕甚麼，先把40%多的集體經濟搞好，其他50%多的慢慢來，當然也不要公開承認他們單幹。」

聽了這些話，自治區黨委領導人如釋重負。他們請鄧子恢向機關廳局以上幹部作了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報告中，他集中地論述了農業生產責任制。他對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優缺點做了比較。他提出，現在就是把集體和個體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如何結合？他說：其形式與方式就是在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下，全面推行和建立包工、包產和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這裏雖然還沒有點出包產到戶，但它的精神已有了，只差一層薄紙沒有捅破。鄧子恢總是把包產到戶與單幹區分開。單幹，鄧子恢一向不主張，這同楊偉名的看法有相同也有出入。鄧自己說：「這次回龍巖，有些老同志偷偷地對我說：『子恢同志，最好是單幹！』我說：「我們黨不主張單幹。」「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水淹田，火燒屋，生老病死，就會垮下去，單幹是長久不了的，組織起來才天長地久。」鄧子恢這樣說。

鄧子恢到南寧，任務之一是參加全國農墾工作會議。會後，他同老戰友張雲逸一起來到桂林。桂林地委的領導人向他們匯報說：龍勝縣有許多生產隊「包產到戶」了。聽了地委的匯報，鄧子恢和張雲逸一起來到龍勝縣。龍勝是個山區，侗、苗、瑤、壯、漢多民族聚居，地少山多，居住分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迫使龍勝人民不顧客觀條件，放棄以林為主的生產方針，實行以糧為綱的方針，加上高指

標，高徵購，群眾生產生活極端困苦，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許多生產隊從1961年冬開始實行包產到戶，到1962年春上擴展到了半個縣。縣委急得不得了，部署扭轉，但收效甚微。縣社的幹部憂心忡忡，愁眉不展。鄧子恢告訴他們：解決包產到戶問題，要從有利生產，有利團結出發，要實事求是。可以包工到組，也可以包產到組，小村獨戶的也可以包產到戶，不要怕說右傾，不要怕說單幹。包產到戶實際上並不是單幹。

離開桂林，鄧子恢與張雲逸分手，直奔河南。首先到信陽看望中央農村工作部下放的幹部。幹部們向他反映：信陽地區生產凋敝、群眾困苦。群眾為了活命，要求借地種點紅薯。可這裏的領導幹部都在等上邊的指示。「真是作孽！」鄧子恢氣憤地說，「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鄧子恢來到鄭州，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向他匯報了河南實行借地度荒的情況。豫北、豫東相當一部分地區，土地鹽鹼化嚴重發展，農業生產破壞很厲害，人民生活極端困難。農民紛紛破產度荒，拿衣服和家具到鄰省換糧食；生產秩序不穩定，人口大量外流；正常生產一時搞不起來。因此，經中南局同意，決定借給農民一部分土地，給一把鐵鍬，發一點種子，讓他們在集體的領導下生產自救。農民說這個辦法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鄧子恢認為這個辦法好，表示支持。

回北京的路上，在石家莊稍事停留，鄧子恢請來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聽了河北農村情況的匯報。回京後，他參加了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舉行的工作會議。他在會議上就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作了發言。他認為生產隊的經營管理工作，要着重建立生產責任制，實行明確的分工合作，以提高社員的責任心；山區分散，三五戶小村莊，農民不要集體，就讓他單幹，或者叫包產到戶，這是社會主義的單幹，他只要完成上繳任務，有甚麼不好。對鄧子恢提出的這些問題，會議上沒有做出決定。劉少奇說：「鄧子恢同志講的這些問題，以後再來討論。」毛澤東不在北京，沒有摸清毛的態度，是不可能作出決定的。

為了讓毛澤東了解當前農村的情況和問題，並支持解決這些問題，鄧子恢把他在會議上講的問題，寫成報告，於5月24日送給了毛澤東，也送給了中央。

正在這時，各地有關包產到戶的信函和材料源源不斷地遞到鄧子恢手裏。福建龍巖縣委書記李根發來信，告訴他江山公社出現了單幹，縣委正在糾正。他立即回信，提出要分析單幹的原因。建議派得力幹部去幫助江山公社搞好一兩個生產隊，作為示範；有些三五戶的小山莊，可允許包產到戶；河南借地二三分種紅薯的辦法，可以仿行。農民的渴望、各地幹部的企求、自己的親身調查，使鄧子恢得出一個清醒的結論：包產到戶或「責任田」是農民度荒、求生的一條出路。於是，他不顧個人安危，為民代言，宣傳包產到戶的好處。

6、7月間，他應邀先後到軍委後勤部、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直屬機關下放幹部大會、中央高級黨校作報告，主要講發展農業生產問題和鞏固集體經濟問題。他痛心地說，大躍進以來，農業連年減產，農業生產力下降很多，1961年比之1957年，耕地減少2億畝，大牲口減少1/4以上，農具減少40%，土地鹽鹼化擴大，山林破壞相當嚴重，農業勞動力減少2000萬個。他說，有天老爺同我們作對，但主要還是我們工作上的毛病。所有制變動大，分配上平均主義，生產上瞎指揮，經營管理沒搞好，幹部特殊化，工農業發展比例失調。他詳細比較了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優缺點，結論是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大於個體經濟優越性，但是，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現在全國有20%的生產隊單幹。怎樣鞏固集體經濟？他主張首先要固定所有制；要貫徹按勞分配政策；要糾正幹部特殊化作風；要發展小私有；要穩定徵購任務，派購要等價交換；要恢復供銷社，開放自由市場。其次要搞好生產隊的經營管理。現在實行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但生產隊的經營管理並沒有搞出一套。下邊反映，現在只是「大呼隆」變成了「小呼隆」，「大鍋飯」變成了「小鍋飯」。怎麼辦？要向社員放權，建立生產責任制。必須包產，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和產量結合是很難包的。有的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凡是包產到戶的，大田和自留地一樣。不能把作為田

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因為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

會場異常活躍。聽眾不斷遞上條子，提出許多問題。「人民公社是否辦早了？」「總路線是否正確？」「這幾年錯誤這麼多，又這麼長時間不能克服，是甚麼原因？」鄧子恢直言不諱，一一作答。他的報告贏得了一陣陣的掌聲，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央高級黨校向中辦的簡報稱：「鄧老很接觸實際，抓農業較穩妥、內行。我國農業如果讓鄧老抓，不會出那麼多問題，中央應考慮啟用鄧老來抓農業……」家裏人卻因此為他捏一把汗。他一生坎坷，如今年事已高，難以承受新的折磨，曾多次勸他少講話，謹慎些。但他不以為然，說：「怕甚麼，實事求是嘛！我講的都是事實，是站得住的，你們放心好了。」

四　攤牌

此時，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常委間，已對農村生產關係問題有了比較堅定的看法。上面提到田家英向劉少奇匯報時劉的態度，就已經非常明顯了。也就是說，1962年5至7月上旬，中央一線已經下了決心。

6月下旬，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關於安徽「責任田」問題的匯報。安徽「責任田」問題是一個敏感問題。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會上贊成和的反對的各佔一半。鄧子恢據理力爭：「責任田」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多數能做到「五統一」，怎麼能說成是方向性錯誤呢！「責任田」就是社員勞動和產量直接結合起來，加強了社員責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體生產的一條出路。恰逢此時，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來信，對省委作出改正「責任田」的決議思想不通，懇請調查了解，弄清情況，予以解決。看過這封信，鄧子恢沉思良久。1961年3月在中央廣州工作會議期間和5月路經合肥，他都聽曾希聖說過「責

任田」是個好辦法。可是，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批判，有「五風」問題，也有「責任田」問題；安徽省委改正「責任田」是毛澤東的意思。他感到問題棘手，過問吧，毛澤東面前怎麼交待；不過問吧，下邊的企盼要落空，與農民生死攸關的「責任田」要夭折。他不顧個人得失，下決心，派工作組去安徽調查「責任田」問題，由副部長王觀瀾帶領。

調查當然是要說服中央書記處。6月16日，鄧子恢看到了王觀瀾寫的調查報告——〈安徽省當塗縣責任田情況調查〉。報告說：當地百分之八十生產隊的責任田做到了「五統一」(即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和上繳任務統一於集體)。由於責任制和產量結合起來，農民個人利益與集體經濟結合緊密了，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對恢復生產起了積極作用。奉鄧子恢之命，工作組6月27日到了宿縣，對王樓公社王樓大隊和城關區劉合大隊進行了調查，7月18日向鄧子恢寫了兩個大隊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情況調查報告。調查的結果與上次王觀瀾的調查一樣，責任田做到了「五統一」。報告說：由於糧食顯著增產，群眾感到「包產到戶責任田」越幹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不要再變；他們一再表示，我們一不怕蔣介石，二不怕自然災害，就怕改變責任田。鄧子恢愈想愈感到，安徽的責任田有「五統一」，不是單幹；不但不是單幹，而且正是搞好集體生產、防止單幹的好辦法。對安徽的責任田應重新評價。

鄧子恢的意見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鄧說了一句著名而廣受爭議的話：「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會議結束時，劉少奇要求華東局轉告安徽省委，對「責任田」不要下結論太早，可以由中南局搞一個包產到戶的文件，將來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時再議。

事實上，劉少奇已經贊成「責任田」。7月7日，小平同志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的講話中，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他說，關於包產到戶，是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找出個辦法來」。他說：生產關係究竟以甚麼形式為

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現在要冷靜地考慮這些問題。過去就是對這些問題考慮得不夠，輕易地實行全國統一。有些做法應該充分地照顧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和特殊情況，我們沒有照顧，太輕易下決心，太輕易普及。

在關乎農村經濟變化問題上，陳雲是個重量級人物。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主要住在上海、杭州。他看了安徽「責任田」的材料和田家英湖南韶山調查的材料，認為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的辦法。他打算向毛主席進言。顯然，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政策，雖同意調整，進行局部改變，但並未放棄，如提出「包產到戶」，預料他是難以接受的。從以往的經驗看，提出這類意見，政治風險很大。提出來，還是不提，實在是一個大難題。陳雲決定盡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澤東直接陳述。6月24日，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與劉少奇、鄧小平等幾位中央常委交換了意見，看法基本一致。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後，也立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講了對包產到戶的意見，得到了他們的贊同。7月6日，陳雲給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同時，田家英也下決心，冒險以秘書身份向毛澤東進言。那時毛澤東正在河北邯鄲視察，他打長途電話要求面陳意見，那邊傳來電話說：「主席說不要着急嘛！」這句話明顯有些不耐煩的情緒。

7月9日，毛澤東從河北邯鄲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田家英。田家英系統地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他說：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佔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40%，另外60%是集體的和半集體的。現

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毛澤東靜靜地聽着，一言不發。這種情況，同劉少奇性急地打斷田家英的匯報，滔滔不絕、毫無保留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完全不同。最後，毛突然向田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子把田家英問住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他毫無準備。毛接着又問：「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沒有說同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人商量過，只回答：「是我個人的意見。」當時，毛沒有表示意見。沒有表態，這就是一種態度。田家英從游泳池回來，情緒不好。他說：「主席真厲害。」意思是說，毛主席把問題提得很尖銳，使他當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7月6日下午4時，陳雲前往毛澤東處談話。談話中，他闡述了個體經濟與合作經濟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並存的問題，認為當前要注意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克服困難。對於農村生產經營體制，他提出了性質更為尖銳的意見。他認為：應「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24]。在此之前，有同志勸陳雲不必急於向毛澤東提自己的建議。但他回答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怎能延誤時機。[25] 後來毛澤東在一個小範圍的會上曾表示，他很不同意陳雲的意見。但陳雲是中央常委，向中央主席講意見，組織上沒有錯誤。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傳出，毛澤東認為陳雲、田家英的建議是錯誤的，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問題提得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20。

25　《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頁120。

如此之高，使聞者十分震驚。這個消息很快傳給了陳雲，他聽到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他向身邊工作人員表示，「分田單幹」，我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但是，他顧全大局，對批評所謂黑暗風、單幹風未作解釋。

毛澤東對鄧子恢、田家英主張「包產到戶」（他認為這就是「單幹」）十分反感，對少奇、陳雲、小平沒有抵制甚至贊同，也不滿意。9、10、11日連續三天下午，他分別把河南的劉建勳、耿其昌，山東的譚啟龍，江西的劉俊秀召來北京商談農村工作問題。針對各地出現「包產到戶」，他提議以黨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改由陳伯達主持，不讓田家英參與其事。毛澤東批評說：「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搞甚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

鄧子恢不會不知道毛澤東態度已然明朗，但他仍想說服毛澤東。7月17日，他應約去見毛澤東，向毛澤東談了5月上旬向他報告的〈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的內容，談了符離集區委全體同志〈關於「責任田」匯報〉的內容，陳述了自己對「責任田」的看法，明確說：「責任田」能做到「五統一」，不是單幹；「責任田」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適應廣大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廣大農民的需要，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願改變。

毛澤東靜靜地聽着，一言不發，只是在鄧子恢起身要走時才說了一聲：把你給我的報告和符離集區委同志的匯報送來，我要看看。很顯然，毛澤東對鄧子恢的主張十分不滿。這時他已經準備對「單幹風」發動進攻了。18日，鄧子恢把毛澤東指名要的兩個材料送走之後，又叫工作組把兩個大隊實行「責任田」的情況調查報告，再認真加工一下，打印送毛主席。還叫人組織力量繼續收集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整理成材料，供中央北戴河會議之用。

工作組的陳正人、王觀瀾、郝中士等部領導人，都勸他調查報告暫時不送了，中央北戴河會議快開了，看看情況再說。鄧子恢很生氣說：「『責任田』是於民有利的事情，等到北戴河開會，就晚了。於民有利，怕甚麼！你們怕，我不怕，不怕丟烏紗帽！」7月22日把中央

農村工作部工作組寫的〈安徽省宿縣王樓公社王樓大隊實行責任田的情況調查〉、〈安徽省宿縣城關區劉合大隊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情況調查〉送給了毛澤東。這兩個調查報告，後來成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參考」文件。

毛澤東態度明確以後，大家不能不跟着轉變態度。7月18日，劉少奇在對下放幹部的講話中，專門講了鞏固集體經濟問題，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從高級幹部到基層幹部「對集體經濟的信念有所喪失」。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19、20日，由陳伯達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起草委員會會議，座談關於鞏固農村集體經濟的問題。大家異口同聲，對包產到戶取否定態度。柯慶施發言說：現在看，單幹不行，這個方向必須批判。劉瀾濤發言介紹了西北局圍繞「包產到戶」展開爭論的情況。陶鑄、王任重曾到廣西龍勝縣調查座談過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對他們的「座談記錄」評價甚高，認為「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的決定發下去後，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委寫出六十一篇討論的「書面報告」，基調是批評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這一順乎天意、應乎民願的政策，由此再一次夭折。這一次頂牛，農民又失敗了。一億農民的包產到戶淪為非法。真理又一次與中國共產黨人擦肩而過。當我們重新撿起包產到戶這個法寶時，中國農民已在集體那口清湯寡水的「大鍋」裏攪和了二十年。那些為民請命、敢冒風險的血性漢子，面臨滅頂之災。一場批判運動發動起來，據說受到牽連者多至四百萬人。

但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初期，否定責任田和包產到戶，又似乎有它的不可避免性。那時，人們還搞不清社會主義到底該是甚麼樣子，更不懂得所謂「農業生物學原理」(杜潤生先生語)。在毛澤東看來，責任田也好，包產到戶也罷，都違背了幾條基本的道理：其一，經過艱苦的調查和研究，大家終於達成一致，這就是〈農業六十條〉。六十條最核心的規定，就是以生產隊作為核算單位。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已經是不能再小的核算單位了，再退，就到了戶。而退到以每戶為核算單位，同合作化以前就沒有了區別。因此，在毛澤東

看來，六十條是底線，不能突破。否則，社會主義就白搞了！其二，形勢有沒有像一線領導人所說的那麼嚴重，毛澤東對此一直深有懷疑。1962年，他兩次到南方，其實就是要看形勢到底怎樣。他得出結論，情況決不像中央一線那些人估計得那麼「黑暗」。他認為，這些人因為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政治上就開始動搖。所以才有毛澤東對劉少奇所說：「我還沒死，你就頂不住！着甚麼急？」7月8日，也就是毛澤東回京兩天後，在他住處召開的小型會議上，毛澤東說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並不那樣壞，他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26] 這番話，在中央高層裏着實份量不輕。因為，不少地方大員們也不滿意中央一線總把形勢說得那麼糟糕。劉少奇應該聽得出來。回溯到七千人大會，不是柯慶施就說過：「報告」把形勢說黑了，嚴重了，讓人鼓不起幹勁，「越看越沒勁」等等。其三，毛澤東一言九鼎，沒有人可以撼動，黨內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政治環境：無論怎樣，不能同毛澤東爭論。前面提到的由劉少奇之子撰寫的材料，說在游泳池劉同毛澤東有過爭論，那些話形同「叫板」。其實，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做檢討說，毛主席一到北京，立刻讓陳伯達起草〈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生產的決定〉，我就知道了主席的意思。事實上，劉少奇是很難同毛澤東進行爭論的。從北戴河會議開始，劉少奇就不再有進一步的建言。這說明，黨內並沒有真正形成民主氣氛。七千人大會講民主集中制，只是停留在文件的文本之上。即使在中央領導核心，民主集中制也早已名存實亡。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農民們為尋求自己的豐衣足食，在特定制度下，並不容易。他們必須經歷種種磨難。今天，中國社會主義還在進行着相同的探索。

---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232。

第五章

調整風雲

七千人大會後，經過西樓會議和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中央一線領導人已經確立下「傷筋動骨」的調整目標。調整的範圍與力度，超過了前此以往中共的任何一次努力。調整不僅包括農業、工業、精簡城市人口等經濟領域的大動作，也涉及到政治上許多非常忌諱的「禁區」。儘管從性質上說，即使做到了「傷筋動骨」，調整也並不是變革，更不是改革。它最多一種回歸，即回復到比較持中、合理和寬鬆的政治狀態中。例如，我們今天常常議論的黨內民主，意識形態轉型等，在那個時代都還沒有發生。但是，調整畢竟做了一次重要嘗試，即在客觀上提供了某種政治轉型的契機。其歷史價值自然應予肯定。由調整引來的政治「反彈」，在調整進行中即不期而來。這是由於整體上的政治規則並沒有改變。甚至，「反彈」力更超過了調整的作用力，從而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從歷史過程看，從調整到「反彈」，是中共執政進程中的一次「政壇風雲」。它多少增加二十世紀60年代前期中共歷史的複雜性和可看性。

一　甄別平反與糾正錯誤

甄別平反，幾乎是共產黨執政國家的一個專有名詞。無論在東方還是歐洲，無論是還存在的還是已經不存在的共產黨，都曾頻繁而廣

泛地使用這個詞。從而，使這個詞多少帶有點悲劇的色彩。甄別，意為重新審查過去錯誤的定性；平反，是把錯誤的案件改正過來。我們看到，蘇聯、東歐國家多次對黨內案件甄別平反。而中國共產黨則因多次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因而進行甄別平反的次數更多。

在1961年5、6月舉行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時，甄別平反的問題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專門就甄別平反說過話。根據會議議定的精神，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其中作了如下規定：「為着發揚民主，有必要對於最近幾年來，受過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和黨員，實事求是地加以甄別。」「過去批判和處理完全錯了的，要改正過來，恢復名譽，恢復職務；部分問題批判和處理錯了的，就改正這一部分問題的結論。對於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的處分，應該交給群眾審查。至於錯誤地對群眾（包括富裕中農在內）進行的批判，應該在適當的範圍內向他們道歉；如果作了錯誤處分的，還應該糾正。」〈指示〉還規定：「今後在不脫產幹部和社員群眾中間，不許再開展反對右傾或者『左』傾的鬥爭，禁止給他們戴政治帽子。」由此開始，從農村到各界各方面甄別平反工作正式進行。當然，這次甄別平反的重點是縣以下農村。但甄別平反的範圍相當寬泛。

指示發出了一年時間，各地對文件的執行卻大不相同。有些地方執行不力，不重視，甚或有抵觸情緒。這是可以想見的，在自己手裏處理的幹部，要平反，剛好證明自己錯了。有些地方雖給予平反，但總要留一個尾巴，以證明當時被整事出有因。到1962年上半年，甄別平反工作，尤其是縣以下農村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顯得十分迫切。因為中央一線領導人亟待進行調整和恢復。一切措施成敗與否，都取決於農業能否增產。而農業的恢復工作必須要有人去抓，特別是有領導能力的人來推行。然而，自1958年以來，縣以下幹部在多次運動中被整的人很多。當時估計有一千萬，受到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其中被整人最多的有兩次：一是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運動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次是1960年底整風整社運動被劃為漏網地富分子或破壞

分子。前者是反「左」的，後者是執行「左」的，都成了犧牲品。這一反一正，使農村幹部無所適從，情緒低落。這種狀況何以能領導農業的恢復工作呢？

為了推動這一工作的深入進行，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發出了〈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對於黨員、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必須根據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加強領導，加速進行。」通知指出：「當前甄別工作的重點，是縣級以下的農村基層幹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方法是，「由上一級黨委派負責同志，幫助所在組織摸清被錯批判和錯處分的黨員、幹部的情況，召集他們開會、談話，然後召開幹部大會或黨員大會、群眾大會，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輕微錯誤，也不要留尾巴。有關領導幹部應該當場向被錯批判錯處分的黨員、幹部進行道歉。上級黨委應派人參加平反大會，說明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上級，號召卸掉包袱，加強團結和搞好工作和生產」。通知要求迅速解決基層幹部和一般黨員這批人的平反問題之後，集中力量比較快地解決縣以上一些人的甄別平反工作。

這個通知與1961年的指示都把甄別平反工作重點放在農村，但1962年的精神有兩點不同：一是甄別的範圍擴大了。不僅包括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反右傾」，而且包括了1960年底的整風整社和「民主革命補課」。二是宣布「一律平反」，不留尾巴。事實上就是一風吹，快刀斬亂麻。為了說明這一新方針，鄧小平在19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會議上作了專門的講話。他提醒大家說：「請大家注意，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於甄別平反工作的文件。這個問題，對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農村縣以下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他說：「最近軍隊搞得很好，就是一攬子解決。採取一攬子甄別平反方法的，比較主動，面貌也較好一些。因此，我們現在研究，大家都贊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一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了帽子。」

劉少奇插話說：「不要一個一個去甄別。」鄧小平解釋說：「因為縣以下都是一些下級幹部，問題只有那麼多，右傾也是右傾到那個程度，『左』傾也只『左』傾到那個程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輕視這個工作。除了個別嚴重的個別處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錯了的，就是對有一點點還對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決。上面的領導同志，要下去幫助他們承擔責任，向群眾當面公布，這實際上是我們承認的一個錯誤，是搞得不對。」

劉、鄧的這個精神傳達下去，甄別平反工作有了全面進展。到1962年8月，全國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已甄別黨員、幹部365萬人，當時認定，原結論錯了和部分錯了的佔70%。甄別了群眾370多萬人，都得到了平反。總共甄別平反了600多萬黨員、幹部和群眾。只可惜不久後重提階級鬥爭，平反沒能搞徹底，特別是在上層。

幾年來過火的政治鬥爭，不僅使黨內民主受到破壞，社會民主更受損害。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不敢講話了。1959年「反右傾」後，黨內的人，包括不少高級幹部，也不敢講真心話了。出現了「三看三不講」的不正常狀態，即：看風向——上邊風向不明不講；看眼色——領導眼色不對不講；看意圖——領導意圖不清不講。還有，講話「不離三、六、九」，即：「三面紅旗萬歲」、「從六億人民出發」、「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在這種心態下，共產黨很難與民主人士同舟共濟。因此，當時的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調整，還有政治關係的調整，其實質是強調民主，首先是改善同民主黨派的關係。

1957年反右派鬥爭，各民主黨派尤其是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受到傷害最多。從那以後，民主黨派基本上緘默不語。即使對三年嚴重困難也很少議論，與共產黨同甘共苦。只有在1960年下半年，要求資本家下放農村安家落戶，使資本家及其子女們惶惶不可終日，有如世界末日降臨。後來，毛澤東得知此事，親自批示，資本家不下農村，「似以下放到城市企業為好」。結果虛驚一場，大家感激涕零。然而，「大躍進」以來的失誤，總是一筆賬。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人家不罵，我們應該自己罵自己。周恩來說，應該在黨外人士和人大代表中交代清楚，進行溝通。毛澤東同意。

1962年3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劉少奇和周恩來就形勢和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作了非常坦誠的講話。最高國務會議制度，是當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度之外的又一個重要國務活動制度。由國家主席根據情況不定期地召集。參加者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同時也就包括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主要領導人。會議通常是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事前商量，或者進行重要情況的通報。「大躍進」以來，毛澤東主席召集過1958年1月的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同年9月的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和1959年4月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1959年4月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後，召集過1959年8月的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此後，1960年和1961年中斷。基本原因，是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許多情況看不透徹，一些話不好說，難於召開。恢復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本身就是一個象徵。

劉少奇和周恩來在講話中，把中共七千人大會和2月西樓會議的基本內容作了清晰的介紹，對國民經濟上的困難情況以及造成困難的原因，共產黨所犯錯誤及其經驗教訓，作了坦率真誠的說明。劉少奇把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口頭講話的內容和盤托出，甚至更加率直。關於犯錯誤的原因，他一口氣講了八條：經驗不足；不夠謙虛謹慎；違反實事求是；違反群眾路線；違反民主集中制；依靠強迫命令辦事；黨內外過火鬥爭使人不敢講話；黨內不純等等。對於劉少如此坦率誠摯的講話，出席會議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十分感動，認為中國共產黨還是光明磊落的、鄭重的、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黨。張治中先生即席發言，表示「萬分感動，萬分欽佩」。他說：這可以充分證明共產黨「對國家、對人民的忠誠態度和負責精神」。張說：「我當過十幾年國民黨的中央常委，從來沒有聽到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蔣介石無論在大會、小會上，都是罵這個、罵那個，從來不罵自己。」

按照慣例，全國人大會議和全國政協會議每年開會一次。但1960年3月開過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同時開過全國政協三屆二次

會議後，1961年沒有開過這兩種會議。1962年3月27日至4月6日，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全面地介紹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情況和存在的困難，以及1962年調整任務。4月28日，周恩來又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作了〈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的講話。兩篇講話，同樣實事求是地承認了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周恩來對黨外人士說：「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批評對方的短處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諍友。」他自然是想倡導一種民主風氣，倡導一種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的精神。的確，這次政協會議氣氛融洽。會議開了二十多天，二百名委員發了言，提出了四百多件提案。廣開言路又絕無怨詞。見此情況，毛澤東如釋重負說：「我們欠民主人士一筆債，現在還了。」

調整統戰、民族、宗教、僑務政策、在黨內甄別平反的同時，中共中央也在黨外人士中進行甄別平反和調整政策工作。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統戰部副部長徐冰主持會議並作總結報告，部長李維漢講了話。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會議匯報，周恩來、鄧小平等作了指示。5月28日，中央統戰部向中央作了關於會議的報告。1957年以來的幾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都存在「左」傾偏差，這一次會議，則是一個實實在在糾「左」的會議。

幾乎與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同時，4月21日至5月29日，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在北京召集全國民族工作會議，總結幾年來民族工作的經驗，討論今後的工作方針和任務。這一次會議比較全面地清理了1958年以後幾年中發生的「左」傾錯誤，並且提出了改善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批准了會議的報告。5月25日，中共華僑事務委員會黨組向中共中央作了專題報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建議。所有這些都屬於統一戰線的範疇。其基本精神是，「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認真調整同知識界、工商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數民族、歸國僑胞以及其他愛國人士的關係，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

如何調整關係？一是甄別平反，二是調整政策。

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傾」都波及黨外。反地方主義、反民族主義鬥爭中，黨外人士波及的更多。然而，涉及面最廣和

最為敏感的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對此，中央批覆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文件做了如此規定：必須堅決地、迅速地進行甄別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到處分或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應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鬥爭、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都應該平反。凡是平反的，應該摘掉帽子，恢復原來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當的職務。對在1958年以來其他運動中受過重點批判、處分或者戴了帽子的黨外人士，經過甄別，證明完全錯了或者基本錯了的，也應堅決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這裏只提到對交心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給予平反，而對其他大量被錯定為右派的數十萬人並不平反。因而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的錯誤沒有改正。

對其他右派分子的政策是逐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帽」是給出路的政策，與平反性質不同。「摘帽」工作，從1959年9月開始，1959年、1960年，兩批摘帽9萬多人，1961年摘帽12.9萬人，合計已達22萬餘人。1962年第四批摘帽，1964年又進行了第五批摘帽。五批共摘帽30餘萬人。當時，一些「右派」及其家屬要求黨給予甄別。中央統戰部也曾幾次提出「應該進行甄別」。1962年7月26日，再次向中央寫報告，提出這個問題。中共中央不同意普遍甄別。8月27日〈中央關於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覆示〉中，雖同意對「個別人」作甄別改正，但明示：「對右派分子不應當一般地提出甄別平反問題。」認為統戰部的意見「是不妥當的」，「這樣做起來，實際上會搞成一種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別，或者對許多右派分子進行甄別。這是沒有必要的，也是對黨和人民不利的。」

對於已經解除勞動教養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的人和右派分子人的安置問題，中央作出如下規定：「應當暫留原地，設法維持他們的生活，等候處理。」「對已經遣返回城市的，應該准許他們報上戶口。」文件還規定：「對右派分子的家屬和子女，應該根據中央原有的規定，按照他們本人的情況對待，不要稱為『右派子女』。在就學、就業、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視。」儘管不是普遍甄別，但「摘帽」和安置問題的提出，已經是大力度地政策調整了。被「摘帽」

的右派，多少會得到心理的安慰，待遇也會隨之有所改觀。當然，對於他們的政治傷害，還遠遠沒有得到平復。可是，就是這樣一點改變，也由於以後形勢突變，真正落實的並不多。

1962年的大精減運動中，資本家及其家庭再次受到衝擊。已經有些地區把一部分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和其他黨外人士下放農村或精減回家，引起了他們很大的震動。中央及時加以糾正。指出：要切實貫徹「包下來，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們穩定下來。對於在職的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全國約76萬人）和他們的家屬（妻或夫），不要下放農村。除個別確係願下鄉的外；已經下放的，如非本人自願，應該調回；對因關廠精減下來的，務使每個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事；對於縣和縣級以上的各級代表人物，不精減，不下放；對資產階級子女的升學，不要歧視；對不能升學的子女，應當同勞動人民的子女同等對待，等等。中共中央對已經交出自己的產業、接受改造的原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一般比較寬容。他們的處境也比右派分子好得多。

在1958年「大躍進」中，不但農民利益受損害，而且華僑在國內的家屬的利益也受到「共產風」的侵害。有的地方強迫歸僑和僑眷獻金、存款「放衛星」，造成人心浮動，僑匯大大下降，華僑和僑眷在政治上因「海外關係複雜」受到歧視。1961年以後，隨着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錯誤的糾正和退賠政策的逐步落實，華僑被迫獻金的問題基本解決。但是，所謂「海外關係」問題一直是壓在歸僑和僑眷頭上的一塊石頭。華僑受歧視現象相當嚴重。據僑委5月報告所說，不少地方和部門，不加分析地把歸國華僑、僑眷、歸僑學生在國外的家庭和親友關係，一律作為「資產階級關係」或「複雜的政治關係」看待，扣上「海外關係」的帽子，而濫加懷疑和歧視。有的地方和部門規定，凡有「海外關係」的人，一律不能入黨入團，不能參加工會，不能當積極分子；有的學校對歸僑學生的入學、實習限制很嚴，將政治經濟、外貿、財貿、新聞等系列為「機密專業」，不准歸僑學生報考。有的部門將歸僑幹部，當作精減下放的對象；歸僑幹部雖有優異的成績也不准提拔重用；有的單位在歷次運動和政治審查

中，把那些和國外親友有關係的人，列為批鬥對象或追查的對象；有的單位甚至把華僑與五類分子並列。……為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僑委黨組提出了相應政策。5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國家僑委黨組的報告，並在轉發時加了一個批示。明確指出：「所謂『海外關係』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線，混淆敵我關係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有害無益的。」要求有關單位，尤其是華僑、歸僑、僑眷佔人口相當比重的省和市對因所謂「海外關係」而引起的一系列問題有步驟地加以處理。孫中山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在中華民族為爭取民主和獨立的百年奮鬥中，海外華僑曾經給以國內極大的物質支援。其作為中國革命的海外基地，對國內精神援助也是巨大的。極「左」思潮無視這些民族歷史的重要因素，損壞華僑的切身利益，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中央高層領導人是看到這一點的。

全國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的問題也相當尖銳。會議批評在有些地區和有些問題上，錯誤是很嚴重的，主要是不重視民族問題，忽視民族特點，忽視宗教問題的民族性、群眾性和長期性，忽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特點，忽視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對團結上層的工作也大大放鬆了。有的地方採取了嚴重違反政策的手段，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在一些地方有所滋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和中央民委黨組檢查了自己的缺點錯誤，諸如1958年同意取消或合併了一些自治縣，贊成少數民族地區「一步登天」搞人民公社化，以及在批判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和廢除宗教壓迫剝削制度過程中的「左」的錯誤。會議把提出的重大問題列了十項，提出了處理的意見，報請中央確定。中共中央批准了會議的報告，強調指出：「宗教問題是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問題，在許多少數民族中，宗教問題同民族問題密切聯繫在一起，必須長期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應該按照群眾宗教生活的實際需要和意見，處理少數民族宗教上存在的問題，讓群眾的宗教活動恢復正常。」在民族問題上貫徹「有錯必糾」的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對1958年青海平叛中擴大化錯誤的改正。

1958年上半年，青海省局部地區少數上層分子，抗拒社會改革，發動了武裝叛亂。軍隊奉命進行了平叛。平叛鬥爭是正義的，但是，

在當時那種「左」的氣氛中，擴大化的錯誤是在所難免的。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中共中央決定進行了平叛，並實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這是西藏社會進步和人民翻身的偉大革命。但是在後期，也出現了「左」的偏差。1960年底，中共中央派民委副主任楊靜仁赴西藏作過調查。1961年1月5日，鄧小平聽取匯報後，明確指示：西藏民主改革要防「左」、防急，採取穩定發展、五年不辦合作社的方針。1月24日，周恩來也作了指示：「西藏的方針政策概括起來就是，土地所有制是農民個體所有制，這個制度要繼續好多年，中心是增加生產，這條要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1961年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曾在蘭州召集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在此之前青海省委還召開過三級幹部會議，對青海平叛擴大化錯誤進行了許多糾正的工作，將在押的人犯24365人宣布無罪釋放或「教育釋放」，平反了一批民族幹部的冤假錯案，恢復和重新安置了380名宗教上層人士，恢復開放了137座寺院，重申了黨的民族政策、統戰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正是在這種糾「左」的大環境下，1961年10月起，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副委員長到青海、新疆等地調查，於1962年5月寫成一份〈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即〈七萬言書〉），系統地、直言不諱地提出了他對西藏及其他藏區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周恩來接到報告後，非常重視，認為大部分意見和建議可以採納，遂指定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主持，針對〈七萬言書〉提出的問題，制定了四個重要文件，作出如下規定：——「應當在黨的領導下，進一步明確黨政分工，加強政府工作」；——「籌委和專署（包括所屬業務部門）的行文必須使用兩種文字，並逐步做到各級政府和業務部門的行文皆用藏漢兩種文字」；——「對寺廟和宗教職業者的要求和標準：愛國守法，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提過高的要求」；——「細緻地又穩又準地對現押案犯繼續做好甄別清理工作」；——「確實屬於錯捕、錯判的案件，應當一律平反，死了的要恢復名譽」；——「必須逐步創造條件，使各級政府的負責職務逐步由藏族幹部擔任。」隨後，西藏自治

區成立四個小組，由班禪副委員長負責落實宗教政策，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負責糾正平叛擴大化錯誤。如果不是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抓階級鬥爭，四個文件的貫徹將會對民族工作的改進起更大的作用。可惜，這一工作後來被迫中斷了。

在6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內，劉少奇對政法事務發表過多次指示。他批評濫施專政，呼籲健全法制。劉的這些行動，是鑑於自1958年以來幾年的「折騰」，黨內和群眾遭受了過火鬥爭，傷害了如此多的人。對此他深感痛心。他反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提出五年，可近幾年恰恰用對敵鬥爭的手段來對付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還在1960年秋，劉少奇親自處理過一件案件。郴州鯉魚江電廠有個二十一歲的女工回家探親，見到父母患浮腫病，還有不少鄉親患病無法醫治而死去，她在一氣之下寫了十二張「打倒、鏟除、消滅人民公社」的標語，跑到北京中南海北門就貼，貼了還叫值勤的衛兵來看，並要求中央領導同志到下面去看看人民的生活情況。衛兵將她押送公安部，經訊問，情況屬實，又轉送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她有期徒刑五年。劉少奇看了報告，說：「她還相信中央嘛，要中央領導下去看看嘛！這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以反革命為目的嗎？」他在報告上寫了一段批語：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繼續留原單位工作。他深知，由於災荒造成的社會問題，靠抓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1961年4月，劉少奇到家鄉調查，親自了解到基層亂捕、亂打甚至整死人的現象。其他反映上來的情況更是觸目驚心。這引發了他的反思。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關心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恢復法制的問題。3月5日劉少奇看到一份〈青海省公安機關破壞法制違法亂紀情況十分嚴重〉的材料，立即批給鄧小平、彭真閱並交公安部長謝富治辦。要求「中央公安部應派人到青海去會同省委嚴肅處理。青海公安機構違法亂紀情況，應引為教訓」。3月17日，劉少奇在武漢（他是同周恩來、鄧小平一道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的）找羅瑞卿（前任公安部長、時任總參謀長）、王任重、謝富治談話。劉說：「這四年的經驗教訓多得很，你們要好好總結，主要經驗是混淆兩類矛盾。混敵

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為敵。」劉少奇不無憤慨地說：「下面不按照法律，縣、公社甚至大隊用長期拘留、勞改、勞教等辦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他要求政法機關要認真檢查，徹底揭露、批判。他說：「當然，揭露出來是不好看的，是很醜的，但是，有那個事實嘛，怕甚麼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也要揭。」謝富治、王任重談到這幾年政法機關經常被批評為「右傾」的情況。劉說：「你們怕『右傾』嗎？無非是撤職。堅持真理，撤職也是好的，也光榮嘛！」當然，劉是在激忿當中，以為堅持真理而撤職是光榮，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其實這在中共黨內是很難做到的。

回到北京，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院開始清理和總結四年來的工作。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向劉少奇匯報。劉少奇對加強無產階級法制講了一席頗為深刻的話。他說：我們無產階級的法律還沒有成熟，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現在的經驗是兩方面的，赫魯曉夫不要專政，斯大林後期把肅反擴大化，我們也有混淆兩類矛盾的經驗。現在要糾正，要總結經驗教訓，要從理論上、方針原則上、機構分工上和具體辦法上搞出一套來。檢察院、法院要獨立辦事，黨委不要干涉具體事務，黨委甚麼都干涉不好。以後下面公檢法向上面寫報告要直接報，不要經黨委批准，經過黨委批准是錯誤的。要有對立面，唱對台戲，三機關互相制約也是對立面，也是唱對台戲。甚麼事情一個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況嘛。這幾年犯的「左」的錯誤是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犯的，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

5月23日，劉少奇又約請中共中央政法小組成員，談如何起草〈關於1958年以來政法工作的總結報告〉。劉少奇說：「目前這個時期總的經驗教訓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要是誤我為敵，打擊面過寬。」劉少奇尖銳地指出：「過去對矛盾性質認識錯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錯在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黨和政府中的國民黨作風，主要表現在這上面。用敵對手段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甚至黨內問題。這樣處理的結果，不僅不會解決矛盾，相反會使

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這個問題要好好講一下。」鑑於這幾年亂捕亂打現象許多是撇開政法機關，在黨委領導下幹出來的，劉少奇提出了一些涉及制度體制的意見。摘其要者，有如：——司法獨立是不對的，法院獨立審判是對的，是憲法規定了的，常委和政府不應該干涉他們判案子。要允許上訴。——不要提政法機關絕對服從各級黨委領導。如果地方黨委的決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從哪一個？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服從法律，服從中央的政策。——非專政機關辦勞改隊是非法的。——過去黨委搞肅反小組，確定捕人，隔離反省，整了很多人，當時是對的，今後不能再多搞。彭真插話說：「我們不是沒有法，還是有法的，當然還不完備。但這幾年對有的法都不執行，你們自己搞亂了。」

劉少奇的上述談話，反映出他反思的深度超出其他人，甚至也超出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認識。他似乎感悟到我們的政治體制存在弊端。然而，他只看到下面違反法制的問題，沒有觸及高層。幾年之後，正是從最高層發動，徹底地砸爛了公檢法，法制蕩然無存。他作為經過選舉產生的共和國元首，也被這「無法無天」的狂潮吞沒而去。劉少奇呼喚的法制，終歸連他自己也未能保住。正如一位哲人所說：「革命吃掉自己女兒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二　彭德懷上書風波

廬山會議閉幕已經近三年。共和國元帥彭德懷在北京西苑附近的吳家花園賦閒反省也有兩年時間了。在破舊和零落的小院裏，他經歷着怎樣的精神煎熬，是活躍在政壇上的高官們所無法體會的。儘管在廬山會議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遭到更為嚴厲和莫須有的追究，但他的事情還遠遠沒有完。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又在講話中提到了彭德懷。劉當時是這樣說的：「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

反黨集團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劉說：彭「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

劉又說：「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來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甚麼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大舉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說彭德懷篡黨，當時就認定有國際原因。劉說：「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同志講過的差不多的話，例如甚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甚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篡黨。」講到這裏，毛澤東補充說：「沒有國際背景。」劉接着解釋說：「彭德懷

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這番話，當然是經過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所確定的口徑。[1]其目的，是為說明總路線和「大躍進」性質的正確。但是，在中共黨內，「反黨集團」、「國際背景」等罪名，都是「十惡不赦」的大罪。特別是「國際背景」一條，不僅「十惡不赦」，而且永難翻身。毛澤東對彭最為忌恨的也是這一條。例如，他在當年6月21日在同朝鮮最高人民議會代表團團長的談話中，就講了相同內容的話。他說：「彭德懷在黨內有個小團體」，同高崗「他們是聯盟，有國際背景，是搞顛覆活動的」。這就幾乎就為彭德懷定了死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譏諷中國「大躍進」一事始終耿耿。因此，他也最憤恨國內黨內的人同赫勾結起來。

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理所當然地被剝奪了出席七千人大會的權利。會後他得知劉少奇說他是「高饒反黨集團成員」、「有國際背景」、「陰謀篡黨」後，大哭了一場。對於這樣的「重判」、「冤判」，他不得不起而為自己辯護，進行申訴。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以信的形式報送了一個長

1　如果說再次提出彭德懷的問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思，那麼會上有些情況似乎是有矛盾的。例如，朱德2月3日在山東組發言說：「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運動中打擊面寬了，傷了人。黨內鬥爭有時同對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經過這次會議，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團結起來。」朱德的這個發言在劉少奇之後。他當然聽到了劉對彭德懷的態度和對問題的進一步定性。那麼，朱德為甚麼還特意要講黨內鬥爭的擴大化問題，希望「把平反的工作搞好」？當然，朱德不會專門說彭德懷。可是，朱關於黨內鬥爭的言論，肯定是有所指的。至少，是他內心積存的一種陰影，不吐不快。對於彭德懷，朱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因為在廬山會議上，朱德即有「避重就輕」的講法，而被毛澤東當場譏諷批駁。七千人大會難得一點的政治寬鬆，為朱德抒發內心積慮提供了場合。由此可見，即使中央常委有了一致的意思，人們想法也不一樣。黨內鬥爭過於殘酷，是人們不願看到的。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1886－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824。

達八萬字的申訴材料（後來被稱為「八萬言書」）。在報送時，他還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尚昆同志：我閱讀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以後，實事求是的作了檢討，（對）不符合事實的我也作了說明……。」

彭德懷的「八萬言書」，共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廬山會議前後的情況。第二部分，關於高饒聯盟的問題。第三部分，我同外國人的接觸過程。第四部分，我的歷史過程及其幾個問題。第五部分，關於軍事路線。

「八萬言書」對加給他的「罪名」進行了逐條的辯解：對於說他在廬山會議之前幾次會議和廬山會議初期有話都不講，到會議中間才把信拿出來的指責，他「覺得與事實有出入，實在腹懷委曲」。列舉事實作了說明。對於指責他「背着中央進行派別活動，陰謀篡黨」，他表示：「這個罪名，我實在覺得委曲」。他辯駁說：「在八中全會時，對我給主席的信以及我的一些言論都提到了高度原則上進行了分析，即『1959年7月14日寫給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書，和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一些發言和談話，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的綱領。』可是，這次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和講話中說：『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這就是說，那封信就不是甚麼『反黨綱領』了。對那封信的這一估價，我是同意的。但是，少奇同志在報告和講話中又提到，『他在黨內背着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我實在難以領受。」關於他同黃克誠的關係，他擺事實辯白道：「是一種同志之間的工作關係，確實沒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甚麼秘密。」關於他同高崗、饒漱石的關係，他詳細說明了歷來接觸的情況，證明自己與高、饒沒有甚麼「反黨集團」性質的關係。

彭德懷在信中沒有直接提到毛澤東，而是針對劉少奇的話，是有策略考慮的。他憤憤然寫道：1962年1月27日，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到底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是彭高聯盟。」我認為少奇同志這樣來強調這個問題，未免有點過分。同時與事實也是有出入的。關於裏通外國，搞顛覆活動，使他受

到莫大的冤屈和侮辱。他表示，作為一個堅貞的愛國者，我「對私通外國搞顛覆活動的行為是深痛惡絕的」。彭德懷詳述了自己從1936年以來為數不多的同外國人接觸的情況。他說，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將領，不懂外語，每次同外國人接觸，都有人陪同，有翻譯在場，怎麼個「裏通外國」呢？他寫道：「我承認在1959年出國訪問時，只着重地解釋了西藏叛亂的情況、炮擊金門的意義，而沒有着重宣傳我國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是一個缺點或者也可以說是錯誤。但是，我沒有背着我黨在外國人面前搞甚麼不利於我黨的勾當來討好外國人，更沒有甚麼『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彭德懷以決絕的口吻寫說：我誠懇地要求黨中央根據一貫實事求是的原則，派專人徹底清查這一是非問題，如發現事實確據，按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而無怨。彭德懷之所以要寫自己三十多年的歷史情況，是要對所謂他歷來同毛澤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說法加以澄清。此外，還澄清了對他歷史上某些具體問題的指責，如所謂「反對唱《東方紅》」等。彭德懷在信的末尾表白道：「現在我們國內正處於困難的時候，克服這個困難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主席及中央各同志，正在緊張地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我從廬山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快近三年來，未做任何工作。當我提出這些問題時，來煩擾中央同志，內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慚愧的！不提出來吧，又難抑制自己那種委曲和苦惱心情。懇希諒察。」

信送上去後，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彭德懷於8月22日給中央寫了一封短信，再次表達自己的心情和對中央的懇切希望。可是仍沒有回音。當時，中央正在北戴河開工作會議，反對「翻案風」等三風正是討論焦點，連劉少奇也經受着思想上的衝擊。這些黨內新情況，當然是吳家花園裏的彭德懷所不了解的。但是，「八萬言書」畢竟為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材料。它不僅使我們聽到一位功高德劭的被難者的心曲，也提供了黨內在喪失民主機制後造成危害的證言。1965年，毛澤東約彭德懷見面，說了「不寫就不寫，一寫就寫了八萬言」，同時也說到，你我之間到底誰錯，有可能「正確在你一邊」這樣的話。但據學者們研究，毛澤東其實對彭絕對的不放心。彭的黨內背景和

「國際背景」，讓毛澤東難以寬容。而此時，八屆十中全會的反「翻案風」已經颳了三年，又有一批老幹部被審查、負案在身。這豈非是又一次的政治悲劇。問題在於，1962年的前半年，是黨內政治氛圍最好的時期之一。彭德懷本來可能會期望有好一點的前景，可卻遭到更為不公的待遇，而且發難者竟是劉少奇。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已表現出很大的對以往數年的保留態度。這樣，學者們總是難以處理這段公案：在寫劉率領之下的大刀闊斧的調整的同時，又不能故意遺忘身心受到更大傷害的彭德懷。揚劉與抑劉之間，難以下筆。答案其實也簡單。我們寫歷史，總是帶着個人的情感；我們作政治判斷，總離不開道德評判。其實，歷史的主要功能，是記錄政治的運行。因此它既不能過於情感化，也不能禮頂道德。政治運行有自己的邏輯和規則。離開規則，我們就看不清它的由來和走向。彭德懷已是黨的敵對分子，對他不可能存在迴護、惋惜和辨誣。無論他以前功勞多大，現在也只能作為反面教員，以證明黨的工作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正確性。而調整則性質不同，它是部分地糾正黨的錯誤。它無論從目的還是方法上，都是黨性的表現。儘管在調整過程中，包產到戶的意見和平反甄別的舉措都出現了。但那是只是為渡過困難採取的暫時措施，它們決不是自外於黨的行為。因此，批彭與調整並不存在矛盾。劉的行為也無可置疑。其實，所謂道德和情感，只是當代人的感覺。現在人說起彭德懷，大多為之感慨、惋惜。這非常自然。但應該想到，歷史已經發生極大的變遷，人們已多次修正了自己的道德和情感標準。這就是歷史研究為甚麼必須冷靜、達觀的根據。無法更改的是，歷史就這樣在1962年留下了彭德懷上書這一場悲劇性風波。

三 「脫帽加冕」

知識分子比工人、農民更注重「面子」。而這個「面子」在十幾年來已經被傷害過多次。所謂「面子」，其實不是虛榮，而是人的價

值承認和尊嚴認同。說到底是「被信任感」。舊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是政治上的軟弱，從群體上說，中國舊知識分子缺少獨立立場和個性精神，儘管他們中許多人都有遊學歐美的經歷。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對新政權抱有極大的愛忱與擁護。這是他們通過新舊社會的比較得來的政治態度。但是，舊知識分子由於其自身的階級屬性，在新社會裏仍面臨長期改造的任務。他們需要從意識上真正同舊思想、舊觀念和舊習慣相決裂。有一個說法，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一尖刻的用語，長期用來提醒舊知識分子所必須建立的新的階級認同。

但是，從本質上考察，由中國舊知識分子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培養的新知識分子總合起來構成的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是以愛國和報效國家為己任的。他們事實上同共產黨和工人、農民同舟共濟，有了十三年以上的建設國家的非凡努力。對中國知識分子說來，回報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們更渴望的是認同：共產黨和國家對他們的身份、階級歸屬、工作貢獻、社會價值以及思維方式的認同。如果沒有這些認同，他們將完全陷於迷茫之中。可惜，在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和運動之後，知識分子的被認同感愈來愈削弱。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愈來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中國共產黨並非對此熟視無睹，但卻始終不能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形成全黨一致性的認識。建國之初，面對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相互隔膜的情況，毛澤東曾提出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這在當時是有道理的。但在隨後發動的各項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身心屢屢受挫。1956年初，中央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周恩來以一國總理身份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聯盟」。這個宣布表明，作為特定歷史意義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至此應當結束，知識分子不應是異己力量而應當是依靠力量。然而，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改變了毛澤東的估計。他不但認為知識分子仍是一種異己力量，而且認為在資本主義和資本家臭了以後，知識分子是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認定資

產階級知識分子是現存的「兩個剝削階級」的一部分。他們有500萬，加上他們的家庭，約為3000萬人。他後來多次說，對舊知識分子，我們採取的是完全包下來的政策，意即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遠未結束。這就不僅把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把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也囊括在內。知識分子的處境更加艱難了。

1957年反右，受傷害的主體是知識分子，對55萬右派分子的處理相當重。或下放勞改，或遣返農村，或發配邊疆。其影響所及不只是55萬右派及其親屬。遭此一劫，知識分子隊伍大傷元氣。許多人從此三緘其口，很少有人敢說話了，其個人及家庭的命運，更是十分淒涼的。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基本傾向是排拒知識和科學、直接訴諸於群眾運動的一種發展模式。對知識、科學和知識分子的貶斥達到極點。「破除迷信」變成破除科學和常識，「尊重實踐」變成崇尚無知，「解放思想」變成唯意志論。在「插紅旗、拔白旗」的「紅專辯論」中，一批有獨立見解的專家、教授被當作「白旗」拔掉，一些潛心學問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被戴上「白專道路」的帽子。有的人認為，「知識分子既然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就是革命對象」，「對知識分子像打鼓，不打不響」，「必須以鬥爭為主」，「知識分子三天不敲打就翹尾巴」。科學家的嘴被封住，他們面對違反科學，甚至違背常識的許多做法瞠目結舌，不敢說話。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知識分子也被動員起來，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也要「大躍進」。在工農業「放衛星」和風靡一時的新民歌運動的催促下，文藝界號召「放衛星」，要求快寫、多寫，命題作文，限期限量。一些文學家、藝術家奮力追趕潮流，寫出標語口號式作品，謳歌「人間奇跡」和「人間天堂」，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油添醋，推波助瀾。更多的人對於這種外行干預、書記坐鎮、命題作文的做法無所適從。許多專業人員、學校教師、專家學者走出教室、書齋和研究室，投身於火熱的群眾運動，接受大潮的洗禮，經受筋骨的磨煉，實現靈魂的淨化。

對於這種種「左」的做法，毛澤東本人也有所察覺。1958年1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內部刊物上看到一份反映清華大學一

個黨支部對待教師寧「左」勿右的材料後，給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建議將這份材料印發全國一切大專學校、科研機關的黨委、總支、支部閱讀並討論，以「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不是依靠對象，但畢竟是統戰對象。他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為我所用。有了這封信，周恩來立即在28日晚上召集宣傳、文化、教育等部門負責人到西花廳開會。到會的有陸定一、康生、張際春、楊秀峰、周揚、錢俊瑞、張子意、胡喬木、劉芝明、夏衍、陳克寒、林默涵、徐運北、張凱、黃中、榮高棠、沙洪、邵荃麟、吳冷西、姚溱等。參加會議的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這樣回憶道：周恩來以鮮明的態度批評各部門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錯誤。對教育部門，周恩來批評在大學教授中「拔白旗」是錯誤的，反對學校中把一切工作成績歸給學生而不是教師的做法。對衛生部門，他指出要尊重和保護醫務界的老專家。對文藝部門，他批評過分誇大文藝的政治作用，指出精神產品不能「放衛星」，「人人寫詩」、「人人作畫」的口號是錯誤的。他要求與會者保持清醒的頭腦，回去後「在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注意糾正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偏向」。「有些同志開始思想不通，後來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這次會議，特別是周恩來同志的一番話，起到了『降溫』的作用。」

1959年5月3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又約見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的部分文藝界代表和委員，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藝界人士座談，進一步分析「大躍進」中對知識分子產生這些「左」的偏向的原因。周恩來提出了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他說：「我們一些同志總是強調某一方面，變成一條腿，而一條腿走路，難免就要跌跤。」但是，由於當時全國仍處在繼續「躍進」的形勢下，周恩來的意見沒有得到貫徹，有些省市甚至不讓傳達。周恩來後來說：「使我難過的是，講了以後得不到反應，打入『冷宮』，這就叫人不免有點情緒了。」

1959年廬山會議後，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錯誤又有新的發展。文化思想界是「反右傾」運動的一個重要戰場。一些文藝觀點、

文藝作品和文藝家以及學者及其學術觀點受到批判。李何林的「藝術即政治」、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論」、張庚的戲曲理論、郭小川的詩、劉真的小說、尚鉞的歷史分期說，都被批判示眾。尤其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的批判，鑄成了「錯批一人，多生三億」的不可逆的歷史錯誤。直到1960年馬寅初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持續三年的批判才告結束。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遺傳學、優生學等現代科學均被作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而予以批判和否定。「反右傾」運動主要在黨內，但知識分子受衝擊也不在少數。在這種氛圍之下，知識分子處境尷尬，心情壓抑，普遍心懷怨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甚麼時候才能摘？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何時是個頭？怎樣才能「又紅又專」？追求「紅」可望不可及，追求「專」又有「白專」之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還靈不靈？在許多單位，「雙百方針」變成了「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黨如何領導文藝？「外行領導內行」是必然規律嗎？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隨着「大躍進」逐漸偃旗息鼓，知識文化領域的混亂也漸漸歸於沉寂。196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力量於經濟調整，階級鬥爭的基調降到了幾年來的低點。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門開始糾正「左」的錯誤，着手制定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的政策措施。

在中共領袖中，周恩來是同知識分子關係最密切的人之一。他對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向來高度重視。五年前他的〈知識分子報告〉被實踐所否定，兩年前他關於文化領域降溫的話也無人理睬。這使他相當沮喪。現在，政治氣候有所變化，他決定再作努力，恢復知識文化領域內的正常氛圍。

借着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周恩來決定從他熟悉的文藝界入手，了解知識分子的苦衷，確定知識分子政策。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別召開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檢查幾年來文藝工作中的問題，研究改進工作的措施。地點在北京市新僑飯店，故這次會議被稱「新僑會議」。

下面材料取自一則報導，反映出周恩來同演藝界人士的親密關係以及他對文化人的信任態度：6月16日晚上，周恩來誰也沒有通知，

來到新僑飯店，碰巧遇上趙丹。由趙丹引領，他來看望因病臥牀的黃宗英。趙丹一路嚷着把周恩來帶到黃宗英的房間：「宗英，快，快！總理來啦！總理來看你，看大家啦！」周恩來笑盈盈走進室內，端詳着黃宗英那身打扮，覺得奇怪：素布衫褲、家製布鞋，有點鄉下婦女的味道。他笑着問：「怎麼？連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黃宗英急忙解釋：「常下鄉……」周恩來贊許地說了一句：「好。」隨後又說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說話間，文化部副部長兼電影局局長陳荒煤，上海天馬電影廠黨委書記丁一、廠長陳鯉庭和沈浮等人聞風而至。小房內氣氛融洽，笑聲朗朗。新僑飯店的服務員納悶：總理怎麼與藝術家們這麼熟，像老朋友似的！周恩來衝着黃宗英搖搖頭說：「更瘦啦！甚麼病？讓醫生仔細查查。」黃宗英趕緊解釋：「總理，我沒甚麼大病，一多半是急出來的。老完不成任務，白吃人民的飯。」黃宗英的話，是有所指的。她長期當演員，1959年，她被任命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專職編劇。這樣的轉行，來得太突然，黃說：「我一下子腦子漲得老大」。再加上當時文藝創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強，任務壓得太緊，領導層層審查，關口太多。黃宗英當了一年的編劇，劇本絕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黃宗英向周恩來訴說着一個「五個書記掛帥」的事情。不久前，她奉命創作電影劇本《好當家》，要求兩個星期體驗生活，一個星期交出創作提綱，一個星期交出劇本初稿。為保險起見，市委第一書記親自關懷、過問，上海電影局第一書記、電影廠第一書記、公社第一書記（還加上縣委負責人）層層掛帥，電影廠副書記親自坐鎮。這是一個塑造黨的書記光輝形象的「重大題材」，偏偏這位黃宗英一輩子不認識幾個書記，更沒有當書記的體會。這樣的陣容，這樣的時限，這樣的題材，把個創作組壓得腦汁絞盡，靈感全無。藝術家們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鎮創作組的電影廠副書記生病睡覺之機，黃宗英等人一口氣搞了個通宵，把提綱順了下來，交差了事。大家私下裏稱：五個書記掛帥，也養不出「胖娃娃」來。書記掛帥、黨委領導、命題作文者，由此可見一斑。「總理，我們電影這一行，誰都有發言權，而藝術家本身的發言權……就難說了。我們是不怕文責自負、戲責自負的，老實說，歷次運動也沒

人替我們負。我們的黨——各級黨委，究竟以甚麼方式、怎樣來領導劇本創作，領導藝術生產，我們認為應該研究、討論。」黃宗英一股腦兒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來，在總理面前，她很少心理障礙。黃宗英的話打開了大家的話匣，你一言我一語地向周恩來反映會上的情況和藝術家們的呼聲。代表們多次要求周恩來能到會上與大家談一談。周恩來對此會心一笑。

果然，周恩來沒有辜負演藝界人士的願望。6月19日，周恩來為這兩個會議作了重要講話。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可只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了『一言堂』麼？『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的，所以，我們要造成一種民主風氣。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周恩來批評說：「幾年來有一種做法，別人的話說出來，就給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他說：「這種風氣不好，現在要把這種風氣改過來。」

這篇講話，是根據前兩天文藝工作者們反映的問題而準備的。周恩來說：「心有所感，言之為快。」周恩來一口氣講了「心有所感」的七大問題：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問題、階級鬥爭與統一戰線問題、為誰服務的問題、文藝規律問題、遺產與創造問題、領導問題、話劇問題。這七大問題都是文藝界十分關心的政策問題。最為引人注意是他關於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他強調地說：「要造成一種風氣，使大家敢於講話。只要對社會主義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說出來。」周恩來說：「要改變文藝界的作風，首先要改變幹部的作風；改變幹部的作風，首先要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首先從我們幾個人改起。」周恩來最後說：「我今天所說的這些話不一定對，我是樹個『的』，讓大家來射；樹個活靶子，讓大家來攻攻。」周恩來把自己的話說是樹個活靶子，讓大家來攻，給文藝界人士以極大的震撼。

「這是在一個長久時期的沉悶的政治空氣中打了個驚雷。」一個與會者如是說。趙丹坐在台下仔細地聽着，太過癮了。本來他這次從

上海來是不想說話的。在來北京開會之前，上海市委某負責人曾告誡他們，去北京開會不要發言，上海的工作沒有甚麼要檢查的。因此，趙丹在開會的頭幾天，一言不發。主持會議的陳荒煤很納悶，問：「阿丹，你為甚麼不發言？」趙丹心中有氣，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給我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此人說話不算數』，我才敢言。」原來，趙丹一直在尋求「免鬥牌」。周恩來的講話打消了趙丹的顧慮，情緒活躍起來，也忘了一位藝術家與一國總理的身份差別，竟為了一部由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究竟是小說好，還是電影好，與周恩來爭論起來。這部電影叫《吉達和她的父親》，由同名小說改編而來。在周恩來與藝術家們遊香山時，趙丹說：「總理，我保留我的意見，覺得小說就是比電影好。」因為頭一天，周在大會講話說到電影比小說改得好，引出了趙丹的這句話。周恩來聽完，略停腳步，偏過頭來看着趙丹微笑。「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見，我可以堅持我的意見。你趙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來說完哈哈大笑，趙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圍的人也被他們逗笑了。這是一次無關宏旨的友善的爭論，周恩來想借此活躍一下民主空氣。有人和趙丹開玩笑說：總理承認你趙丹是「一家之言」，你總算得到一塊「免鬥牌」了。

新僑會議前後，中央開始制訂科研工作條例和文藝工作條例。兩個條例的意圖都是調整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首先出台的是聶榮臻主持起草的〈科研十四條〉。從 1956 年 10 月，聶榮臻受命為兼管科學技術工作的副總理以後，從此與科技界結下了終生之緣。老元帥的後半輩子主要同科學家們打交道。從愛國主義走上共產主義的老一代革命者，都有一個強國夢。中國科技基礎之落後，科技人才之匱乏與宏大的科技發展目標的矛盾，使聶元帥產生了緊迫感。尤其中蘇兩黨翻臉，赫魯曉夫撤走專家後，更顯出自己為數不多的專家的寶貴。在聶的旗下，集中了當時中國最精華的一批科學家，如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等搞兩彈的專家。他們中許多人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衝破阻力，毅然歸來報效祖國，其拳拳之心可昭青史。這樣的知識分子難道不能信任嗎？

然而，情況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好。這幾年來，即使最受保護的科技界也難免受到干擾和衝擊。科研單位同樣存在浮誇風、瞎指揮風。黨員幹部自視高人一等，不尊重科研規律和科學家的事業，不務正業，讓科研人員用一半以上時間去幹體力勞動、參加政治學習，輕率地、頻繁地在科研所搞政治排隊、批「白專道路」等。專家們顧慮重重，不能潛心於事業。

從1960年冬天起，聶榮臻開始組織人員調查了解科研院所的情況，提出政策。1961年7月6日，一份〈科研十四條〉的文件提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立即引起與會者共鳴。李富春說：「對人的政策，主要是個紅與專的問題，這方面有偏向，空洞地要求紅。」劉少奇插話說：「空談革命是帶引號的革命。」鄧小平說：「我看就是要老老實實當好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替他們解決困難。」彭真說：「乾脆寫明確，兩三年內，各研究所不搞政治排隊。」劉少奇說：「現在有偏向，要承認，有偏就要糾。」周恩來說：這個文件「財政、文教系統也可以發」。毛澤東沒有參加會議，會後，他批准了〈科研十四條〉。

〈科研十四條〉直接是為了解決科技界的問題，但事實上是調整整個知識分子政策的第一個文件。6月19日，中央在下發〈科研十四條〉的批示中指出：「文件精神對於一切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

與此同時，文化部和全國文聯黨組着手起草文藝工作條例。文藝條例的通過沒有科研條例那麼痛快，相對於科技界，文藝界歷來是一個敏感區。196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將文藝工作條例印發各地徵求意見，當時共計十條，稱〈文藝十條〉。經過八個月的反覆修改，壓縮成八條，於1962年4月30日印發實行，改稱〈文藝八條〉。〈文藝八條〉批評了文藝工作領導中不執行雙百方針、進行簡單粗暴的批評、限制和干涉，妨礙藝術創作和學術自由探討，忽視同黨外作家藝術家合作，進行過火鬥爭，片面追求數量，文藝工作領導幹部獨斷專行、自以為是等「左」的錯誤。規定要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嚴格劃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界限，正確劃分政治問

題、世界觀問題、學術問題和藝術問題之間的界限。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問題。不許用行政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世界觀、學術和藝術問題。也不應把學術、藝術問題隨便引伸為世界觀問題等等。這些規定切中時弊，對文藝的復蘇起到了積極作用。

經過上面一系列的鋪墊，知識分子終於在1962年初迎來了「早春天氣」。當年2至3月，著名的廣州會議召開。「脫帽加冕」不僅成為話題，而且留給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永久的記憶。

所謂「廣州會議」，其實是兩個。一個是聶榮臻主持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一個是文化部、中國戲劇家協會籌組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2月16日，聶榮臻主持的科學工作會議，原本是想「藉下發〈科技十四條〉以後的有利形勢，搞出一個新的科學規劃來。」三百一十名各個專業、學科的科學家集中到廣州後，聶榮臻找一些科學家談心，發現他們的顧慮很大。有人問聶榮臻：「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提法如何理解？」他們說：「一提到知識分子，就叫資產階級的，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視，從沒聽到有人提誰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聶榮臻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解決，報告了周恩來。這時周恩來、陳毅已到廣州。周恩來當即表示：「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人民的知識分子。」過去在國務院開會，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總是爭論不休。一次會上，聶榮臻說：「革命這麼久了，大學為我們培養的都是知識分子，難道都是為資產階級培養的？這不能理解嘛！」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很激動。她說：「辦那麼多學校，都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幹甚麼！那不合乎邏輯。」的確，共產黨下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培養出來的人都是「資產階級的」，不能信任，那不是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為自己培養掘墓人嗎？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悖論啊！就像毛澤東一心想使中國盡快富強，卻又擔心富了以後不革命的悖論一樣。這個悖論不僅困繞着知識分子，也一直困繞着毛澤東。

文化界的廣州會議是周恩來親自指導召開的。會前，周恩來要求主辦單位進行充分的準備，對全國劇作家的情況及有關各級領導的思

想情況做一次全面調查。從調查報告中，周恩來進一步體會到知識分子要求摘去「資產階級」這頂帽子的心情多麼急切。2月1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在北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他(她)們正準備赴廣州參加會議。周恩來希望他們在創作上進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到廣州去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把會開好。這時，周恩來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他本來不打算去廣州，請陳毅去給這兩個會議的代表講話。但是，從廣州傳來了與會者要求摘掉「資產階級」帽子的強烈呼聲，使他下決心親自去一次，解決這個問題。

2月25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了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的情況，並說：準備和陳毅一起去廣州，「談軍隊轉業十萬幹部的安置問題和科學機構的精簡問題。同時也準備同科學家見見面，聽聽他們意見。」

2月26日，周恩來和陳毅一起飛抵廣州。他看望了會議代表，聽取了聶榮臻、郭沫若等的匯報。3月1日，周恩來約集兩個會議的黨內負責人陶鑄、聶榮臻、于光遠、張勁夫、林默涵、范長江等座談，着重討論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聽完大家的議論，周恩來明確作出結論：從總體上講，知識分子不能再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3月2日，周恩來在廣州羊城賓館向參加兩個會議的科學家們和作家、藝術家們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說：「不論在解放前還是在解放後，我們歷來都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為了強調他的觀點，他重申了1956年1月他對知識分子狀況的基本估計，重申劉少奇八大報告中關於「知識界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的論述。同時引用了列寧的一段話。指出：「列寧在對『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的說明中包括了知識分子。」「對於知識分子的估計要以這個為綱。」要在這個根本估計的基礎上確定黨和國家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報告中，周恩來批評了1957年以來對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長期的，方法要和風細雨，不能粗暴，這樣氣才能順，心情才能舒暢。他說，知識分子最怕別人給他「上大課」，要促膝談心。

周恩來的這場報告連同他1951年、1956年兩次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成為建國以來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的代表作。周恩來因為工作太忙，無法等到會議結束，就於3月4日趕回北京。廣州會議委之於陳毅。陳毅之所以到參加廣州會議，是因為陳除外交外，一直兼管科學和文化工作，分管科學、文化，也就是分管知識分子。陳毅素有儒將之稱，秉性豪爽，文人氣質。他嗜愛古籍，喜交名流。由他分管知識分子工作倒是恰當人選。

對於文化領域的「左」的做法，陳毅早有批評。上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的戲劇編導工作座談會上，他就語出驚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罵得一塌糊塗」，「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認為陶淵明的詩一無是處」。「不僅歷史上的人物都有缺點，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都有缺點，毛主席從來沒講過他沒有缺點」。「我們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別有用意的」。那年8月10日，陳毅在北京高校畢業生集會上，他又大聲疾呼：「前一個時期，有的單位把那些埋頭搞業務、少參加一些政治活動的人，當作白色專家來進行批判。這是不對的，應該給予糾正。目前我們國家正需要大批專家的時候，他們能夠埋頭業務，對社會主義建設，對祖國，對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正是值得歡迎的。」他說：「從來沒有空頭的政治，政治都是通過業務來體現的。」

這次來到廣州，在會上會下，聽到科學家、劇作家傾訴幾年來遭受迫害和歧視的痛苦：曾被「拔白旗」點名批判，乃至開除黨籍、遣送勞改的人數，竟佔了與會者的大部分！陳毅驚駭激憤不已。3月5日和6日，他在科技大會和劇作家座談會上作了兩次講話。陳毅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陳毅說：「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我把我講話的大體意思跟他講了一下，他贊成我這個講話。他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他說：『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應該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

今天我們向你們行脫帽禮！』」說到此，陳毅站起，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這一個突然的動作，使得全場一下子掌聲雷動。陳毅接着動情地說：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驗，尤其是這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考驗，還是不抱怨，還是願意跟着我們走，還是對共產黨不喪失信心，這至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十年八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十年八年還不能鑑別一個人，共產黨也太沒有眼光了。今天我們團結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真正有幾個能替我們解決問題的人，一個抵幾百個！……愚昧是個很大的敵人。陳毅說到這幾年有些黨的領導機關和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矛盾，傷了感情，傷了和氣」。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是領導機關「錯了」，「對的」是知識分子。為甚麼？就是某些領導幹部缺乏民主作風，「太粗暴、太生硬」，搞得知識分子不敢講話。科學家們見你畝產一萬斤，也不敢說話；見你的大水庫不合科學原理將來要造成災難，也不敢提批評意見。「一批評就是反黨，一批評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講到這裏，陳毅悲憤交集。他說：「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只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將來只能養成一片頌揚之聲……危險得很呢！」陳毅還講到「無為而治」、「坐享其成」。黨委領導業務，要通過黨的專家來領導。「講黨領導一切，主要是指路線、方針、政策……至於專業問題，最好不要亂干涉。」陳快人快語，語出驚人！科學家、文藝家聽到這樣的講話，自然忘掉了斯文，歡呼雀躍起來。當年的記錄稿上註明，陳毅三萬餘言的講話中，會場響起六十多次掌聲和笑聲。

討論中，會議代表們普遍認為：周、陳講話「很全面、很透徹，感情充沛，聽來親切，使人深受感動，心悅誠服」。歷史學家周谷城聽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消息後說：「知識分子過去認為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覺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終是做客的思想，積極性還沒有發揮出來。」如今，「得到一個光榮稱號，是勞動人民了，對這一點特別高興。我對這一點也很興奮。我覺得只要有這些感覺，精神就活躍起來了」。他的話代表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心聲。

3月28日，周恩來在三屆二次人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將「脫帽加冕」的精神鄭重地宣告給全國人民。他在報告中說：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應該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心情舒暢地、自覺地、逐步地進行（改造），而不應該採取任何簡單粗暴的方式。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求過高過急，是不適當的；把某些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更是錯誤的。如果說在廣州會議，周恩來陳毅還只是在小範圍內的個人講話，那麼政府工作報告則是經過中央常委討論批准，並且由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鄭重結論。應當更有份量，更具權威性。

四　早春天氣乍暖還寒

1962年前半年，對中國知識分子說來，是又一個春天。聶榮臻曾回憶說：那時候「中國科學院、國防部五院、二機部九院等許多科研單位，晚上燈火通明，圖書館通宵開放，一片熱氣騰騰，我國真正出現了科學的春天。至今我還認為：如果沒有那幾年的實幹，『兩彈』也就不會那麼快地上天。我們常說，中國人民是很聰明的，並不比別的民族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有些科學家的確很有才能，關鍵是怎樣發揮他們的才幹，要有正確的政策，要關心他們的生活。」三十年後，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談話中，也曾回憶說：「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

在教育領域，〈高教六十條〉等條例的貫徹，教育迅速走上了正軌，進入了教育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共和國各方面的人才，許多出自於60年代初期。據統計，至1963年初，全國試行〈高教六十條〉的

學校達到二百多所。其中由各部委領導的七十一所，省、市、自治區領導的127所。全國的其他高等學校也大都參照條例精神改正了工作。[2] 在具體工作方面，各高校普遍對專業、專門組和師資進行調整；制定和修改教學計劃和教學內容，加強基礎理論、基礎知識課教學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合理安排教學、生產勞動和社會活動時間，針對過去所缺的課程，安排補課計劃；加強對學生文化成績進行考試和考核的制度建設。如南京大學將已設立和準備設立的33個專業調整為28個，將已建立和準備建立的64個專門組調整為55個。由於減少了110門新課任務，有關的系、組得以騰出力量，加強基礎課教學，並對已開出的150多門新課進行充實和提高。[3] 這一系列調整措施，大大改變了1958年以來高等教育的混亂狀態，使國家正常的社會生活得以恢復。據統計，至1965年，全國高等學校已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434所，在校學生由44.1萬人增加到67.4萬人；中等學校由1.24萬所增加到8.09萬所，在校生由708萬人增加到1431萬人，其中中專、農業中學、職業中學發展到6.28萬所、498萬名學生。國家因此儲備了德才兼備的人才。[4]

而文藝領域對政治氣候的反映，歷來最為敏感。在1961年和1962年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活躍和繁榮的局面。無論小說、散文、詩歌，還是電影、戲劇、音樂、舞蹈、曲藝、美術，都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品。文化調整，除了召開會議，制定條例，領導人講話外，還為受過批判的作品和作家恢復名譽。「廣州會議」重新肯定了受批判的話劇《洞簫橫吹》、《同甘共苦》、《布穀鳥又叫了》等劇作，同年8月，文化部又發通知，停止發行近五十部頌揚浮誇風、共產風的影片，如《柳湖新頌》、《春暖花開》等等。一批優秀的傳統劇目和民間舞蹈重新登上舞台。近現代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更為興旺。1961至

---

2 《中國教育年鑑》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頁238。

3 參見《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28。

4 數字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474。

1963年攝製的故事片《暴風驟雨》、《達吉和她的父親》、《五十一號兵站》、《風雪大別山》、《北大荒人》、《北國江南》、《李雙雙》、《東進序曲》、《甲午風雲》、《怒潮》、《紅日》和戲曲片《三打白骨精》，舞劇片《小刀會》，歌劇片《洪湖赤衛隊》，話劇《杜鵑山》、《兵臨城下》，京劇《謝瑤環》、《海瑞罷官》，崑曲《李慧娘》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優秀作品。出版界還出現了《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針砭時弊、清新悅目、深受群眾喜愛的散文、雜文。社會科學和文藝理論方面，也出現了活躍空氣。文化界為此歡欣鼓舞，期待着文藝繁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的真正到來。著名戲劇作家田漢在「廣州會議」之後，作詩一首：

一時春滿越王台，水暖山溫聚俊才。
書記翩翩攻藥石，將軍侃侃發驚雷。
鳥多喑啞緣風厲，花不齊開待鼓催。
指日乾坤紅紫遍，情深莫忘嶺頭梅。

然而，並非所有知識分子都如此樂觀。與黨內名流相比，黨外知識分子卻更顯得心有餘悸，疑慮重重。〈科研十四條〉下達後，科學工作者一方面為之興奮，一方面又信心不足，擔心不久「行情」會變。教育部到北京大學徵求對〈高教六十條〉的意見時，有的知識分子說，「希望把這些條例刻在石碑上」。這句話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喜憂參半的心情。他們的擔心和疑慮不是沒有根據的。

顯然，「脫帽加冕」之論，並不能消除知識分子長期形成的敏感。政策調整的力度究竟有多大，持續時日究竟能多長等等，都是飽受「運動」之苦的知識分子們所憂慮的。其實，真正給予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的政治待遇，並不幾個領導人說說即成的。這種事要有規則，要按制度，要執政黨裏所有人都承認，要把它變為執政黨的一種精神需要。所謂勒石為信，正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容易激動容易輕信但又容易憂心忡忡的心態。他們最怕精神層面的傷害。因為，他們主要靠精神來支撐自己的信念。

歷史證明，知識分子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內部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改變對知識分子性質的判斷。對「脫帽加冕」的反彈，實際早有預兆。〈文藝八條〉的制定，從討論初稿到定稿發出，經過了將近一年時間。可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文藝八條〉比1961年8月1日下發徵求意見的〈文藝十條〉，卻有相當多的後退。例如，〈十條〉講制定文藝條例的是為了「創造更多的好作品……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八條〉則改成「為了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更好地發揮戰鬥作用，更有效地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十條〉有「正確地認識政治和文藝的關係」，〈八條〉抹掉了。〈十條〉有「正確地細緻地劃分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藝術問題的界限」。〈八條〉則改為「文藝批評應該鼓勵香花、反對毒草」。強調了毛澤東的六條政治標準和對毒草的批評。〈十條〉有「加強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一款，〈八條〉卻改成「加強團結，繼續改造」，重點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變為繼續加強改造。這些修改明顯地增強了政治色彩，表明黨內對知識分子和文藝領域的整體仍有相當負面的看法。

由於這樣的原因，〈科研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的下發貫徹都遇到了黨員幹部的一些抵觸。當然，決定性的分歧，主要不在基層而是高層。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央內部就有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柯慶施在上海竟不讓傳達陳毅的講話，[5] 理由是防止知識分子「翹尾巴」。當時中宣部的主要負責人也不同意周的說法。甚至還有人說：要不是看見文件上寫明陳毅，還以為是「右派分子」的講話呢！可見中共黨內意見之對立。

當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態時，毛澤東沒有說話。而通常沒有說話，已經是表態了：毛澤東不同意「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說

5 近來上海有人撰文稱，傳柯慶施故意不傳達廣州會議精神的說法，沒有根據。柯曾派出市委幹部參加了會議，並在會後向市委幹部進行了傳達。有關情況暫作存疑。但柯在1962年提出「大講十三年」的口號，目的還是肯定和維護過去的整體做法。這個事實是準確的。

法。可能，「脱帽加冕」更會招致他的不滿。毛澤東此時着重思考着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這個鬥爭正是因為調整給「反面」的東西開了後門。同時，亦應看到，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定性，在中共黨內從來就沒有取得過舉黨一致的認識。黨內相當大部分人對知識分子的懷疑，是根深蒂固的。毛澤東甚至一度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好，可見他絕對沒有把知識分子當作工人階級的認識。在這一點上，當時的許多人包括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天真的。由於複雜的社會和歷史原因，中共當時還不可能科學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由此，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思想文化的調整，的確攪動了中國60年代前期的歷史風雲。

第六章
緩和與霜凍

進入60年代，中蘇兩黨之間，出現了一線緩和的晨曦。在此之前，從1956年到1958年，再從1958年到1960年，中蘇兩黨之間離心離德的現象，愈來愈明顯。1960年當年，在莫斯科會議召開之前，兩黨關係曾急劇惡化。先是在華沙條約國協商會議上，中蘇兩黨就裁軍問題發生爭端。中國聲明，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對中國都沒有約束力。這使赫魯曉夫非常不滿。其後，中共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將矛頭指向現代修正主義。中蘇意識形態爭論開始尖銳化。再經世界工聯理事會的衝突和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激烈爭論，中蘇兩黨已近撕破臉皮。1960年年中，蘇聯召回了一千餘名在華專家，並撕毀兩國訂立的合同，終止了合作項目，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心理，造成巨大傷害。但是，到11月劉少奇訪蘇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會議後，中國在兩黨關係方面做出一定的讓步，情況又似乎好轉了起來。這一段分分合合的歷史，猶如冬春兩季，既有緩和又有霜凍，但總的歷史趨向，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乃至分裂，都將無可挽回地一步一步發展開去。

一　出現緩和

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中蘇爭論出現了一個短暫的間歇期，公開的直接的論戰停止了，中蘇關係似乎有改善的趨向。

何以會出現這種「緩和」的局面？這應從劉少奇訪蘇說起。1960年底劉少奇訪蘇，經過激烈的爭論，達成了一個相互妥協的〈莫斯科聲明〉，劉少奇與赫魯曉夫會談，雙方都表示以後要停止爭論，避免衝突，以協商的方式解決雙方的分歧，以維護中蘇兩黨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對於莫斯科會議的結果，毛澤東感到滿意，這使他堅定了自己的一個信念：國際共運也同黨內鬥爭一樣，可以運用「團結——鬥爭——團結」的方式解決問題。1960年12月9日，毛澤東親率中央政治局成員前往機場歡迎劉少奇一行訪蘇歸來。《人民日報》發社論，肯定莫斯科會議，讚揚中蘇友誼。

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九中全會的一個基本精神，是決定從1961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國內工作，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方針，不受任何國外事件和國內事件的干擾。會議還認為，中蘇兩黨在堅持還是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方面，已經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則鬥爭。中蘇分歧實際是從二十大開始的。從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發表關於中印邊界衝突的社論開始，兩黨爭論公開化，一直到1960年莫斯科八十一黨會議，歷時十五個月。八十一黨會議達到高峰。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八十一黨會議的報告。這個報告系統評論了八十一黨會議的進程和鬥爭情況，確定了中共的四點收穫：第一，會議最後達成協議的聲明是好的。第二，這次會議揭開了蓋子，破除了迷信，表明蘇共是可以批評的。過去那種蘇共說了算、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跟着他指揮棒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這種情況將會發生深遠影響。第三，這次會議鍛煉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隊伍。在起草委員會的二十六個成員中有七個黨是堅定的。在八十一個黨裏有十二個黨的觀點也是比較一致的，除了亞洲的，還加上拉丁美洲的一些黨。由於有這樣一個隊伍的團結鬥爭，最後把赫魯曉夫的圍攻頂住了、瓦解了。第四，經過這次莫斯科八十一黨會議，確立了兄弟黨之間協商一致的原則，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獨立的、平等的、平起平坐的關係。而且中蘇兩黨之

間還達成一個君子協議，就是對於重大的國際問題，中蘇兩黨一定要在協商一致之後才寫到國際會議的共同文件中去。[1] 鄧小平最後提出，雖然同蘇共和赫魯曉夫的鬥爭還沒有完結，但看來通過八十一黨會議，一場大鬥爭可以告一段落了。[2]

毛澤東對參加八十一黨會議所爭取到的形勢很滿意，他說：「這次八十一黨會議成績很大，應該說取得了偉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魯曉夫發動的反華浪潮打下去了。我們現在要講團結，跟蘇聯、跟社會主義國家，跟兄弟黨都要講團結。就是罵過我們的黨，也還是要和它講團結。一定要採取這樣的方針：團結——鬥爭——團結。」劉少奇說：「經過這次鬥爭過後，最近一個時期的鬥爭可能會緩和一些。緩和對我們有利，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都有利，我們應該力爭延長緩和的時間。」顯然，中國正處於經濟極端困難的時候，必須集中精力於國內。過於激烈和寸步不讓的行事風格，就像1960年那樣，肯定是不適當的，會因中蘇論戰而弱化了更為緊迫的國內問題。

此後，中國主動為緩和關係作出了努力。其端倪可從毛澤東與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中反映出來。這次談話是在八屆九中全會之前的1960年12月26日進行的。起因是契提出向毛澤東祝賀六十七歲壽辰。上世紀90年代，美國威爾遜中心冷戰項目主辦的《冷戰在亞洲》刊發了載有這次談話的契爾沃年科日記。該日記一直保存於蘇聯中央檔案中，被標為「絕密」。據契爾沃年科記述，談話開始，毛澤東在接受契的誕辰祝福時，「深為感動」。「他一點沒有掩飾自己的情感，用最熱烈的言辭表達了他對這種同志式祝願的感謝」。「他說，在他生日能收到如此高貴的祝賀，是他的榮耀。他要求轉告他個人對赫魯曉夫同志以及蘇共中央主席團同志們的謝

1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444－445。

2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445。

意」。隨後，毛澤東談到了他日常的工作情況，特別是卸任國家主席後的生活和主要活動。毛稱讚了莫斯科八十一黨會議，認為會議開得很成功，「在會議上發生爭論和進行討論，是非常好的事，而不是壞事」。毛還坦率地告訴契爾沃年科，中國現在還存在着相當的困難，特別是正在關注農業問題。為此，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考慮縮短工業戰線」。毛在談話中還提到中國工業的瓶頸問題，承認煤炭工業和運輸業都比較緊張，以及這些工業部門之間的關係和相互影響。契爾沃年科在日記中記述：談話是在「意想不到」的極為誠摯、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談話一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談話結束後，毛澤東一直把我們送到汽車旁。他一邊熱情地與我們道別，一邊再次要求轉達他對赫魯曉夫同志和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們的衷心問候」。[3] 契爾沃年科這份日記的價值，主要在於它記錄了毛澤東當時對蘇聯人「意想不到」的親切態度。兩年半以前，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赫魯曉夫見面時，態度完全是兩重天。赫是大黨大國領袖，親自秘密飛中國解釋潛艇和聯合艦隊問題，已是屈尊俯就，高度重視了。但在中南海，他不但遭到毛澤東的斥責，而且據有些書籍披露，赫甚至在游泳池裏還遭到一番戲弄。顯然，一黨對一黨的交往，爭論和吵架都是正常的。但不能有失禮的訓斥和輕慢。兩年半過去，中國國內和蘇聯對華關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毛澤東的態度也出現變化。可以說，毛這次同蘇聯大使的談話，是中蘇關係出現和緩的一個信號。

2月，中國派代表團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中蘇條約十一周年活動。北京的慶祝活動也擴大了規模。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萬人大會。吳玉章、郭沫若主持和講話，周恩來、彭真、陳毅、譚震林、薄一波、羅端卿、習仲勳等領導人出席。2月14日晚，陳毅主持1200餘人的招待晚宴。陳毅講話，周恩來祝酒。全國十三個大城市舉行了千人慶祝晚會。

---

3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3期。

3月11日，陳毅在中央統戰部作報告，主題是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他說：「搞好中蘇關係，這要提到第一位。去年12月莫斯科聲明發表以後，中蘇團結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他說：「最近蘇聯的一些負責人，很強調中國對他們的幫助，我們也要繼續強調蘇聯對我們的幫助，對他們的幫助表示感謝。」經過這一段的爭論，中國領導人總結了一條經驗：「在解決兄弟黨分歧的時候，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堅持團結，是完全必要的。」這條經驗成為此後中蘇論戰中中方的一條重要策略原則。

一場爭論的暫時平息，使赫魯曉夫有時也感到有必要與中國搞好關係。1961年初，他做出一些姿態，包括局部恢復對中國的經貿關係。2月27日，赫魯曉夫給毛澤東來信，提出蘇方通過貸款形式供給中國一百萬噸糧食和五十萬噸古巴糖的建議。3月11日，周恩來代毛澤東回答蘇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話說得很婉轉，周說：我們面臨糧食供應暫時困難的時候，我們首先動員自己的內部力量，其次利用當前的國際條件，爭取以延期付款形式從國際市場再多進口一些糧食，從而把蘇聯建議提供的糧食留做後備，只在從國際市場進口糧食發生困難的情況下，才向蘇聯提出糧食貸款的要求。至於以貸款方式進口五十萬噸古巴糖的問題，如果蘇聯國內市場不甚急需，我們擬同意接受這部分援助。

不冷不熱，合情合理。中國並不想完全割斷中蘇經貿關係。中蘇雙方各派出政府貿易代表團，先在北京，後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談。4月7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一個〈中蘇貨物交換的協定〉，中方接受了供應五十萬噸古巴糖的建議，蘇方不再追逼中國償還欠債，同意「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6月19日，又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經濟合作協定〉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8月，蘇方又派出貿易代表團來華商談1962年的中蘇貿易問題。在北京，周恩來接見了蘇方代表團；在莫斯科，赫魯曉夫接見了中方代表團，雙方領導人相互轉達問候。

4月蘇聯發射載人宇宙飛船成功，周恩來發電祝賀。6月第二次發射成功，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發電祝賀。

中蘇關係似乎有了轉圜的機會。1961年隨蘇中友協代表團訪華的列·別·傑留辛回憶說：「總之，給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造成兩黨關係惡化的趨勢已經停止，這使人們產生了一線希望，沉悶的烏雲將散開，友誼的陽光……將重新照耀在蘇中兩國的大地上。」「但生活辜負了人們的這些希望。」傑留辛感慨地說。中蘇經貿關係也沒有預想的那樣維持在一定水平上。赫魯曉夫不會對他的魯莽行為認錯，中國再不願把自己的對外貿易拴在一棵樹上了。說到這裏，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

新中國成立之時，正遇東西方冷戰白熱化之際。中國長時間處於美國等西方世界的封鎖、禁運之中。中國在政治上實行「一邊倒」方針，在經濟上也只有從蘇聯、東歐尋求援助和結成貿易夥伴。起初，蘇聯「老大哥」也真是慷慨解囊。這對中國來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不用解釋。憂從何來？造成了經濟上、貿易上、技術上過分依賴，未免受制於人。1959年，中蘇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47.9%，如加上東歐幾國，那麼中國的對外貿易，有三分之二是與蘇聯集團做的。幾乎百分之百的成套設備和技術資料都引自蘇聯、東歐國家。結果，中蘇之間一翻臉，蘇聯一撤退專家、撕毀合同，給中國以致命打擊，造成巨大損失，中蘇貿易額大幅度減少。1960年下半年蘇聯甚至趁人之危，向中國逼債，這傷了中國人的自尊心。中國決心勒緊褲帶還債。到1964年，提前一年還清了蘇聯的全部貸款，本息共計十四億新盧布。蘇聯這一逼，反而起了一個好作用，迫使中國領導人另闢蹊徑。本來，這種「一邊倒」的貿易、技術格局，也並非完全由環境造成。從西方引進並不是根本不可能。西方人總是要賺錢的。1956年，奧地利就主動向中國推銷過氧氣頂吹轉爐煉鋼的新技術，卻被中國拒絕了。中國相信了斯大林的話：現在「存在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社會主義的世界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用不着去西方世界找技術。現在，由於中蘇貿易的路子走不通，中國向西方開了一個小口子，把貿易重點從蘇聯、東歐轉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亞非拉國家。首先是恢復了1958年中斷的中日貿易。1960年8月，周恩來向日本人提出了一個「貿易三原則」，對原來「政經不分」的原則作了一些變通，

為恢復中日貿易開了綠燈。1962年，用延期付款的方式從日本引進了第一項維尼綸成套設備。此後幾年，以同樣方式從法國、英國、聯邦德國、瑞典、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日本等國引進了六十五項技術設備，用於冶金、石油、化工、機械、電子、輕紡等方面。這也算最早的一次利用外資（資本主義）吧。只是後來，「左」傾思潮再起，引進被迫中斷。

二　平波之下的湧浪

但後來證明，中蘇雙方對緩和關係所作的努力，原來只具有表面和策略性質。雙方都認為〈莫斯科宣言〉是自己觀點的勝利，赫魯曉夫以為有個〈莫斯科宣言〉就可能把中共管住，使其不再批評蘇聯的路線。他的緩和關係的上述表示同樣出於這個目的。其實在分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一紙宣言對哪一方都不會有甚麼約束力。實際上赫氏自己就不願受〈莫斯科宣言〉的約束。會議一結束，他就發表了與〈莫斯科宣言〉觀點不同的講話。

毛澤東並未改變他對蘇聯領導人已經變修的看法。1961年2月出版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這是根據毛澤東1959年初的提議編輯的。過了兩年，時過境遷，但反對「帝、修、反」的初衷並沒有改變。毛澤東親自修改，並加批語：所謂「鬼」，包括「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實行復辟或企圖復辟，特大的天災」等等。他在序言中說：「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春暖花開了嗎？」這實際表明了毛澤東反對「帝修反」的不妥協的決心。

引起雙方關係再度緊張的是，中蘇雙方都沒有停止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爭取支持者，這種爭奪甚至發展到世界和平理事會、體育聯盟等國際組織以及民族民主國家。其中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兩國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這個時期，蘇聯人罵阿爾巴尼亞實際上在罵中國，中

國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其實是指赫魯曉夫。阿爾巴尼亞，一個只有幾百萬人的小國小黨，竟然敢太歲頭上動土，反對赫魯曉夫的路線，站在中共一邊。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其一，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同時暗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是「斯大林分子」，這激怒了霍查等人，憤起防衛。其二，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有世仇，它們對赫魯曉夫與南斯拉夫調情十分警惕。其三，阿爾巴尼亞北方有南斯拉夫、東方有希臘，都是宿敵，西臨大海，孤懸一隅，始終有被吞沒的危機感，怎能跟隨赫魯曉夫大唱裁軍高調呢？

赫魯曉夫對阿爾巴尼亞這個彈丸小國的共產黨桀驁不馴，惱羞成怒。他說：「他們整個軍隊都穿我們的包腳布，而他們還在罵我們。」不斷向阿施壓，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使阿的經濟面臨危局。阿爾巴尼亞轉而向中國尋求援助，代表團常來中國。中國堅決地支持了阿黨的立場，引為反修知己。中國在自己陷入嚴重困難之際，仍滿足了阿爾巴尼亞的要求。1961年2月簽訂貸款協定，向阿提供11250萬盧布貸款。4月，又簽訂了向阿供應成套設備和技術援助的議定書。中國專家取代蘇聯專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分別會見阿代表團。其意義遠遠超出純經濟援助。對此，赫魯曉夫十分惱火。1961年5月，蘇聯撤走了八艘駐紮在阿海岸的蘇聯潛艇，使阿國防暴露。1962年又把阿從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中趕了出去。另一方面，赫魯曉夫背棄了莫斯科會議上中蘇共同批判南共「現代的修正主義」的立場，加緊了蘇南關係的改善。1961年3月，兩國簽訂了五年貿易協定；7月，南外長訪問了莫斯科。在中共看來，蘇聯惡化蘇阿關係和改善蘇南關係都是為了向中共施壓和挑戰。中國輿論繼續開展對「鐵托集團」的批判，而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這是在罵他。

還有幾件事情，表現出中蘇之間很難取得協調。這些不協調之處，主要是在國際性會議的觀點爭執。首先是裁軍。赫魯曉夫的世界緩和目標極為明顯。他從50年代後期開始，極力推行「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理念。而在中共看來，赫的這一套無異於夢囈。帝國主義的存在，資產階級的存在，決定了世界範圍

的剝削、壓迫和侵略，怎麼可能有「三無世界」呢？在1961年召開的三個國際群眾組織會議上，即在莫斯科的世界工聯會議、新德里的亞非團結理事會會議和斯德哥爾摩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上，蘇聯代表每次都提出，要把裁軍、實現「三無世界」作為重要的議題。而中國代表則堅決反對這種「口號」，提出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為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支持各國民族獨立運動，支持各國人民為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而進行的鬥爭。中國代表團提出，裁軍問題不是最重要的議題和所謂壓倒性的任務。為了世界和平，必須解決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問題，發展民族經濟問題，並應該支持歐美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為改善生活而鬥爭、反對壟斷資本的剝削等等。在這些會議上，中蘇兩國雖避免正面爭論，但都無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只是顧忌雙方達成的默契，才沒有相互批評。蘇方沒有採取主動改善關係的行動，中國也沒有新的更高姿態。

但是，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中蘇雙方卻陷於「冷戰」。1961年3月，蘇聯領導人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領頭通過了一個指名譴責阿爾巴尼亞的決議。同時，蘇聯軍隊從阿爾巴尼亞發羅來海軍基地撤出，把阿爾巴尼亞暴露在北約組織面前。5月，蘇聯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援助。8月，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拒絕阿爾巴尼亞代表出席。這個行動在法理上相當於開除了阿爾巴尼亞華約成員國的資格。中共中央認為，赫魯曉夫採取的是各個擊破的方法，即先壓服阿爾巴尼亞，然後再有所行動。對此，中共的立場是，堅決支持阿爾巴尼亞黨抵抗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但這種支持並不作公開表示，對蘇聯的行動再做觀察。估計蘇聯會完全破裂同阿的關係。中共需要對事態的發展做進一步觀察。

但是，蘇共二十二大的召開，使表面平靜的兩黨兩國關係最終發生惡化，從而逐步走向破裂。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蘇共召開二十二大，照例邀請世界各國共產黨派代表團參加。但引人注目地沒有邀請阿爾巴尼勞動黨。中國派團赴會，團長周恩來、副團長彭真。10月12日，周恩來與同機赴會的越南代表團胡志明、黎笋會談時指出：這次赴會，一則去祝

賀，二則準備強調團結，強調反帝。顯然周恩來是抱着誠意赴會的。然而，赫魯曉夫及蘇共二十二大的一系列舉動，使中共代表團大失所望。在會上，蘇共進一步推出它的新路線，在蘇共二十大「三和路線」的基礎上，又提出「兩全」路線，即認為蘇聯社會消除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成為「全民的國家」，蘇共已經成為「全民的黨」。在中共看來，這是典型的修正主義綱領。按照馬列主義的正統觀點，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黨只能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過，中共代表團認為，只要蘇共不強加於人，可以不去理它。

然而，赫魯曉夫在會上發動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新批判，其激烈程度超過了1956年。會上決議把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列寧公墓中移出，並予以焚毀。同時再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反黨集團」，開除莫洛托夫、馬林柯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等人的黨籍。這雖然是蘇共內部的事，但也有殺雞給猴看的用意。因為莫洛托夫在維護斯大林和反對「三和」路線方面同中共立場相似。對斯大林「鞭屍」，也有影射中共領袖之意。這對毛澤東刺激很大，毛澤東後來十分警惕「埋藏在身邊的赫魯曉夫」。

更為嚴重的是，赫魯曉夫竟率領數十個到會祝賀的兄弟黨領導人，激烈地攻擊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罪名是阿反對蘇共二十大，不反斯大林、黨內整肅親蘇分子、對蘇不友好、不全文登載蘇共二十二大綱領草案等等。這種缺席圍攻完全是指桑罵槐，利用阿爾巴尼亞這個靶子，向中國人發難。據說，蘇共二十二大籌備期間，在準備黨綱報告和政治報告時，「決定不涉及中國問題，不觸及中共的特殊立場」，由蘇共中央主席團正式批准的報告稿中也沒有提及阿爾巴尼亞問題。然而，赫魯曉夫獨自決定把批阿的內容加進報告，有意挑起爭論。對赫魯曉夫這一舉動，連蘇聯人都感到吃驚，紛紛猜測赫魯曉夫的動機。有人認為，赫魯曉夫想檢驗一下毛澤東和霍查之間關係的穩固程度，也有人認為赫決定給中國人點厲害看看。也有人認為，赫想利用中國國內的局勢，動搖毛澤東的地位。因為蘇聯人從秘密渠道得到情報說：中共內部對蘇方針有分歧，毛的對內政策遭到失敗，中央

政治局產生了分裂，對毛的不滿在增長。這種無法證實的情報，對赫來說，寧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

無論赫魯曉夫出於甚麼動機，他指桑罵槐向中共發難，表明他並不重視中蘇和好。仍在不顧後果實施他「以壓促變」的手段，企圖按他的條件建立中蘇關係。周恩來不得不起而反駁。10月19日，周首先宣讀了毛澤東簽署的賀詞，這已經是例行公事了。緊接着，周發表了講話，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團結。他說：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業聯結起來的，是在共同鬥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的。維護這種團結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義務。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如果不幸發生了爭執和分歧，應該本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平等和協商一致的原則，耐心地加以解決。對任何一個兄弟黨進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責，無助於團結，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不能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態度。這種態度只能親者痛、仇者快。中國共產黨真誠希望，有爭執和分歧的兄弟黨，將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互相尊重獨立和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周恩來的講話雖有批評，但是和解性的，沒有把問題全部捅破。周的講話，贏得了全場多數人的掌聲，但「赫魯曉夫面紅耳赤，表情沉重」，他和他的同事們沒有鼓掌，「全場為之注目」。

會下，周恩來與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換意見，提出黨際關係三原則：（1）對敵鬥爭一致，互相支持；（2）兄弟黨的內部事務，不能干涉；（3）保持內部團結，分歧不能向敵人暴露。10月21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拜謁列寧、斯大林陵墓並獻花圈，以示對批斯大林的不滿。很快，蘇方就把花圈撤走了。

10月22日，周恩來、彭真與赫魯曉夫、科茲洛夫、米高揚、安德羅波夫等人進行了長達九小時的會談，就蘇阿關係、蘇共二十大、評價斯大林、「反黨集團」等問題詳細地闡明了中方的立場。

10月23日，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提前回國，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團團長，繼續留在蘇聯。周臨行前，向赫魯曉夫告別。他說：「目前，我們國內還很困難，去年遇到了那麼大災荒，這一年我

的頭髮白了很多，這次一定要趕回去。」周的告別理由既是實情，也有留有餘地之意。中共內緊外鬆，保持了克制。

這時，中共已經認定，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已經不可回頭了。1961年11月19日，周恩來在北京向中央及北京市機關一定級別的黨內領導幹部作了一次關於蘇共二十二大的報告。指出赫魯曉夫及其領導核心，不甘心1960年莫斯科鬥爭的失敗，企圖通過這次大會，以其二十大以來的觀點，代替兩次莫斯科會議的文件，並強加於兄弟黨。蘇共二十二大在政治上是顯然的後退。赫魯曉夫策略是「指桑罵槐」，桑即阿爾巴尼亞、斯大林、反黨集團，槐即中國；是「殺雞給猴看」，即通過反阿、排阿來威脅其他黨，孤立和打擊中國。赫在國際問題上的政策，是無條件的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不要革命，片面強調戰爭可以避免，乞求和平。其方針是一切為了大國首腦會議，大國協商解決世界問題。蘇共綱領貫穿着和平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想。講話對修正主義的根源進行了分析。認為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修正主義的本質是向資產階級妥協，向帝國主義屈服，不革命。中共的方針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反對分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後發制人，有理、有利、有節；堅決反對沒有阿爾巴尼亞參加的國際會議，反對不了就拒絕出席。提出要對他們隨時戒備，提高警惕，更不可信任，嚴防其突然襲擊。或為了達到他們某種利益而笑臉相迎，要作兩手準備。

事實上，中共對蘇共及赫魯曉夫的所謂修正主義問題，此時已經有了比較理論化的分析和認識。還在蘇共二十二大之前，蘇共中央發表了〈蘇共綱領草案〉。這是蘇共歷史上第三個綱領。作為赫魯曉夫領導蘇聯的里程碑，它準備在二十二大上予以通過。在今天看來，這個綱領是一個集「左」傾思想大成的文件。其中最為荒謬之處，是宣布「社會主義在蘇聯完全地和徹底地勝利了，這一勝利具有世界歷史意義」。[4] 根據這一重大的歷史判斷，綱領規定，蘇聯人民今後的主

---

4 波諾馬廖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頁710。

要任務，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使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人類歷史的最高水平。綱領說，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意味着：使全國完全電氣化和在這個基礎上完善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工藝和社會生產組織；使生產過程全盤機械化和愈來愈完全自動化；在國民經濟中廣泛運用化學；大力發展經濟效果高的新的生產部門、新的能源和材料；全面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物質資源和勞動資源；把科學同生產有機地結合起來和使科學技術高速度地進步；勞動者要具有高度的文化技術水平。所有這一切將保證蘇聯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大大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5] 顯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奮鬥」，蘇聯人沒能建成「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勞動生產率也遠遠沒有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非但沒有超過，而且差距愈拉愈大。甚至，蘇聯人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念也放棄掉，轉而信仰起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和觀念。這真是歷史對人們的絕大嘲弄。

問題還不僅於此。蘇共的綱領還對「共產主義建設時期的社會政治組織」進行了描述，提出了讓中共最為不齒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變為全民的國家，變為表達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機構。」[6] 蘇共對這一重大理論「創新」的解釋是：作為全民組織的國家將一直保存到共產主義取得完全勝利。同時，作為最先進的、最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在國家中仍然保持着。歷史的發展導致國家的消亡。要使國家完全消亡，既需要創造國內的條件，即建成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又需要創造國外的條件，即社會主義在國際舞台上取得勝利並得到鞏固。[7] 從這個表述看，蘇聯人似乎並沒有那麼「傻」，莽撞地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和立刻消亡國家。理論家們似乎又把綱領的含義往「回」拉，即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國家消亡的內外條件。但中共領導人還是把矛頭對準了這個「冒進」的綱領。

5　《蘇聯共產黨歷史》，頁 712。

6　《蘇聯共產黨歷史》，頁 714。

7　《蘇聯共產黨歷史》，頁 714。

1961年9月15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他的住處召開中央常委會，討論〈蘇共綱領草案〉問題。會上，代表理論宣傳領域發言的陸定一說：〈蘇共綱領草案〉反映了赫魯曉夫這一幫人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不講階級鬥爭，不講階級分析，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在世界範圍內講改良主義，講人道主義，講「三無世界」，不講無產階級革命，有一點西方中產階級鼓吹世界主義的味道；而在國內問題上，大講全民黨、全民國家，這就是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粹，有如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區別於一切機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它的革命理論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現在蘇共在它的〈蘇共綱領草案〉裏大講全民國家，說沒有任何階級衝突了，沒有任何階級鬥爭了，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了。蘇共綱領大講全民黨，說黨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了，是全體人民的黨了，黨的階級性質改變了。這是蘇共在理論上的重大背叛，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特別是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背叛。[8]在這次常委會上，毛澤東沒有做長篇發言，但有許多插話。這些插話代表了他的某種基本看法：總的估計是，這兩年我們的鬥爭沒有能夠完全拖住赫魯曉夫，更談不上改變他的立場。他是更頑固地堅持他的立場的。看來，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當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學家，而是一些在銀行存了幾十萬、上百萬盧布的那麼一些人……這個特殊階層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搞非法經營、黑市、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那麼一幫子人，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蘇共綱領草案〉中。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赫魯曉夫講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現在蘇聯社會正在分化。[9]

8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461。

9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463。

不知道毛澤東大講蘇聯社會已經分化的材料來自甚麼地方。其實，直到蘇聯解體，蘇共黨政治局委員一級的官員，工資也僅僅比一般工人高幾倍，説不上是兩極分化。倒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蘇聯人對科學家極為尊重，科學家的工資超過中央高級官員的情況是事實。但的確不能因此説，蘇聯社會正在分化。重要的是，毛澤東這些插話是在〈蘇共綱領草案〉發表不久的初步討論中，但其精神已經具備了後來「九評」裏某些基本論點的雛形。毛澤東説，我們同赫魯曉夫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在國家關係上是國際主義同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我們要發表赫魯曉夫這個〈綱領〉，利用這個東西來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解決為甚麼説他們提出的這些觀點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為甚麼我們堅持反對他的錯誤觀點。[10]

幾個月後，七千人大會召開。這時，中共領導人已經「吃透」了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新綱領。他們對蘇共目前的格局和未來走向的看法，已經固定下來。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講話中説：幾年來，世界的形勢本來對各國人民、被壓迫民族，對社會主義陣營，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很有利的，對帝國主義是很不利的。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產生了修正主義。劉説，到了蘇共二十二大，莫斯科型的修正主義已經發展成為比較完整的體系了。劉説，我們跟修正主義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關於世界革命的路線的分歧。劉還説，現在列寧已經去世，斯大林也去世了，許多列寧和斯大林幫助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是不是有可能發生分歧、發生叛變呢？有這種可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現在已經分化了。[11] 劉的這個判斷顯然是相當嚴重的。同 1960 年底相比，中蘇兩黨關係的性質全然改變。毛澤東也説，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頂峰就是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10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 465。

11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 482 － 485。

有比較完整的綱領、路線和理論體系，這就是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綱領〉和赫魯曉夫所作的報告。這就是他的頂峰，從此就走下坡路了。[12]

顯然，經過蘇共二十二大，中蘇之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而且不可挽回。這種狀況在今天看來，是很難用國際共產主義理論的是非來加以判斷的。誰對誰錯，似乎沒有辯論的價值。但是，赫魯曉夫在中共面前「耍大牌」的作風以及對中國人的不尊重，使他在任之際頗碰了幾次釘子。不過，這時，中共對蘇共的估計，與蘇共對中共的估計一樣，都把它看成是少數人篡奪了領導權，而國家、黨、人民沒有變。周恩來說：蘇聯是列寧的故鄉，演化到資本主義不容易，在國內必然會遭到人民愈來愈大的反對，國際上帝國主義也不會輕易買赫魯曉夫的賬，在相當長時間內蘇聯仍是美帝的主要對手，這種情況，赫不可能採取完全投靠美帝的方式，他要在對等的地位上同美帝妥協。周相信，「歷史的發展，這種逆流遲早會被糾正」。由於蘇共二十二大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國內幹部和群眾間也議論紛紛。中共中央決定有步驟地在黨內和群眾中進行一次宣傳，主要是由周恩來於1961年11月19日在北京向中央及北京市一定級別的幹部作了一次報告，並將報告錄音分送各省市，聽錄音的人員嚴格限制在縣委書記以上的黨內負責幹部。對黨內外幹部群眾，則進行口頭宣傳，傳達中央的觀點。《人民日報》有選擇地公布了蘇阿雙方的材料，暫時不作評論。顯然，中共對中蘇爭執採取了克制的態度，控制了傳達範圍，暫時忍而不發。11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說：「兩個體系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大敵當前，必須加強團結。」25日，又發出通知強調，「要避免發生一切可能被敵人利用來破壞中蘇團結和社會主義各國團結的事情」。196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指示，及時糾正了各地超越中央限制的過激行為。強調，修正主義一定要反，團結也一定要加強。反修只是反對蘇共某些同志的錯誤，而絕不是反對蘇聯、蘇聯黨和蘇聯人民。同修正主義鬥爭也應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

---

12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489。

要求在反修教育中，一律不點蘇聯、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名，內部文件一律避免把修正主義同蘇聯、蘇共和赫魯曉夫聯在一起，以免洩漏。中共的這種節制具有策略性，但也與這一時期一種對外戰略考慮聯繫在一起。其主要目的是團結反帝。而且中國必須集中注意力於國內調整，不能把注意力再次引向反修鬥爭。假若激憤情緒一起，黨內別想保持冷靜了。

三　王稼祥的建議書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引出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的一番建議。說到王稼祥，人們不會陌生。他就是那位曾經跟隨王明路線排斥過毛澤東，後來又幡然悔悟，支持毛澤東的著名中共早期領導人。經過延安整風，對「左」傾路線有過痛切反省。大凡遭到過大挫折的人，對人對事都會有一種他人不及的感悟和冷峻。張聞天如此，王稼祥也如此。可惜，張聞天已經被中共黨內激烈的政治鬥爭所吞噬。不然，以他的學識和素養，在正常的黨內生活中，一定會有很大的理論和戰略性貢獻。

1962年上半年，中國可以說處於內外交逼的局面。國內還沒有真正走出困境，國際環境又明顯地惡化，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在繼續，美蘇之間既對抗又在進行單獨的大國政治和軍事交易；中蘇關係日益惡化；中印邊境上的衝突與對抗在加劇；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火日益擴大；美國和蔣介石集團不時對大陸東南沿海進行騷擾，鼓噪反攻大陸；美國與日本有「安保條約」的關係，美國在南朝鮮駐有重兵。中國仍處於三面包圍之中。當時中國採取的是一種「兩條線」的戰略，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一切反動派」作為自己的戰略口號，其實質是既反美又反蘇，不過還是以美為主要對手。在反帝和世界革命問題上實行激進政策，承擔了在物質上和道義上支援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重擔。

王稼祥認為，面對國內外特殊形勢，有必要調整對外政策，謀求某種緩和的局面。1962年上半年，他在內部小範圍中，幾次談了他對一些國際問題的看法和對調整對外方針的意見。2月27日，他徵得中聯部黨委的同意，聯名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建議信。「五月會議」上，王稼祥又對國際問題作了發言。二十世紀80年代出版的《王稼祥選集》，收錄了他60年代初的六篇文稿。其中尤以〈略談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兩文提出了大膽的觀點和主張：在世界戰爭問題上，王稼祥在批判了赫魯曉夫片面強調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觀點的同時，也試圖糾正中國黨內片面認為世界戰爭注定不可避免的觀點。他提出：「不要說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根本矛盾必然導致發生世界戰爭；不要說必須在消滅美帝國主義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不要簡單地說『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地強調世界戰爭的危險，而沖淡了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要籠統地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就世界戰爭來說，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們應該是「動員人民群眾提高警惕，加強鬥爭，克服戰爭危險，爭取實現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王稼祥批評了中國黨內存在的「左」的觀點。他說：「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有和平共處』，『必須徹底消除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才能實現和平共處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說法，是錯誤的。」在和平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他指出，和平運動「具有廣泛性，包括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愛好和平的人們，包括那些僅僅害怕戰爭災難的普通的人們，和平運動是群眾性的運動，應該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群眾的覺悟，採取為群眾所能接受的各種方式來進行鬥爭。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講夠」。對和平運動要予以適當的估價和支持，並進行某種合作。「和平運動應該同情和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又「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並且「在和平組織中，不要把民族解放運動講得超過了和平運動」。

王稼祥向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提出的建議，其主要觀點有四條：第一，發表一個全面的對外關係的聲明，正確地全面地闡明和確認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和平政策。這種政策的任務是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須的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爭取有利條件加快建設速度。第二，為了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加速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對外有必要採取緩和的方針，而不是採取加劇緊張的方針。第三，在國際鬥爭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發揮主觀能動性，要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而不能勇往直前一鬥到底。在當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部集中到中國來；對中印邊境問題，要設法打開僵局，尼赫魯不是中國的民族敵人；對蘇聯的鬥爭，要高度警惕赫魯曉夫居心不良和力圖孤立中國，甚至不惜同我們分裂。第四，關於我國的對外援助，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別是我國目前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和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地方甚至還要適當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事先講明，以免被動」。

這些言論和主張，在當時堪稱空谷足音。這是又一次冒險陳詞。王稼祥的上述思想顯然在中聯部管轄的群眾團體外事活動中發生了影響。王稼祥明確地把〈略談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作為中國出席國際群眾團體會議時，在遇到有關國際問題的爭論時的發言依據。1962年7月，由著名作家茅盾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爭取普遍裁軍與和平世界大會。這是蘇聯主導的一個群眾性國際會議。茅盾奉命在會上採取了同蘇聯完全一致的立場。7月9日，茅盾在裁軍大會上的發言，其口徑依然是兩句話：一句是中國支持裁軍；一句是不要輕信美帝裁軍的誠意，應當立足於鬥爭。但其基調則是強調第一句話，表達了中國希望和平和緩和的願望。他說：「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就流行一句有名的格言『和為貴。』」他說：「我們這一生對於和平生活的渴望，正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如大旱之望雲霓。』」他說：中國政府一貫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始終堅持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方針，堅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實行

和平競賽，各國之間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中國一貫主張通過談判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不訴諸武力，願意同美國人坐下來談判。他說：中國始終不渝地把中蘇友好和社會主義國家友好合作，當作自己的最高國際義務等等。中國代表團採取的與以往迥然不同的做法，使得蘇聯人喜出望外，蘇聯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甚至為此特別提議授予中國代表團以金質獎章。

王稼祥的上述建議究竟在中央的決策層面上發生怎樣的影響？這個建議是否得到中央常委們的支持，現在都還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證實。但可以肯定，像莫斯科裁軍會議上的講話，決不會是王稼祥或中聯部的擅權。1962年初，印尼、越南、英國、瑞典和新西蘭等國共產黨提出召開新的國際會議的建議。蘇共中央2月22日給中共中央來信，表示支持這個建議，並且建議「放棄容易激化不能消除我們分歧的公開聲明」。4月7日，中共中央在覆信中，建議結束公開爭論，強調「我們的共同點是主要的」，「我們之間的分歧，畢竟是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內部問題」。中共中央主張首先進行黨與黨之間雙邊會談和多邊會談，蘇聯應帶頭恢復與阿爾巴尼亞的正常關係，以此作為召開國際會議的初步措施。當時，雙方雖然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但事實上，整個春夏兩季中蘇之間的公開爭論停止了。顯然裁軍會議上採取的做法，與4月中共中央覆信中有關。

事實上，中共的一些領導人如劉少奇已經看到，要團結反帝，要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就不能不包括「修正主義者」。因為按當時的看法和標準，沒有變修的黨只是寥寥幾個了。6月27日，劉少奇與鄧小平、彭真等會見阿爾巴尼亞黨代表團團長卡博時，就表達了這種觀點。他說：

> 我們要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其中包括真正的共產黨員、革命者、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的資產階級，也包括修正主義在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要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那就只能團結很少數的人。如果包括修正主義者，團結就不能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目前，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如果要包括多數黨，包括所有的黨，就只能在某些重要問題上一致，不能在所有問題上一致。求同存異，不同意的就不寫在文件上，實際上，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帶有某種程度的統一戰線的性質。

說到縮減對外援助，就涉及到整個對外戰略問題。事實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澤東就鄭重承諾了對亞非拉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的支持。當時的主要目標是反帝反殖，把亞非拉人民的鬥爭看作社會主義陣營的同盟軍。60年代，毛澤東逐漸形成了反帝反修戰略。這時，對亞非拉民族解放鬥爭的支持，有了新的內容：主要對美，其次對蘇，即與「修正主義者」爭奪對世界革命的領導權。

所謂支持，不能只是說空話，還要物質援助。認為中國有國際義務，援助其他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這是舉黨一致的。但是，當時許諾承擔的義務，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能力。1962年初承諾的外援竟達69億多元。其中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國家，佔80%，它們是越南、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等；另外是對亞非拉國家，佔20%，有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爾、埃及、錫蘭、也門、印尼、阿爾及利亞、幾內亞、古巴、緬甸、老撾、馬里、加納、敘利亞、索馬里等國。其中主要有三個國家，一是阿爾巴尼亞，這是反修同志；二是越南，處在反美前線，直到1965年初之前，中國在援越抗美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三是阿爾及利亞，長期進行抗法武裝鬥爭。

1960年底，正當中國處於嚴重災荒之時，中國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1961年援阿的負擔愈來愈重，中國正值最困難時期，周恩來都感到難以完全滿足對方的要求。

12月25日，周恩來同來華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凱萊齊談援阿問題。他說：我們根據力所能及承擔國際義務。但是，由於我國連續遇到三年災荒，加上蘇聯撤退專家，所以遇到了極大困難。因此，援助不能像你們希望的那麼多、快、大、好。1962年2月6日，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說：國際義務必須承擔，現在我們承擔的國際義務一天比一天重起來了。……我們必須勇於承擔國際義務，同時又要

實事求是。勇於承擔，當仁不讓，見義勇為，這是我們的志氣，我們的義務；實事求是，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說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後做，不要使他們發生錯覺，以為我們甚麼都行了。由此，我們知道，王稼祥關於「不要亂開支票」的話，與周恩來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精神是一致的。或許他正是受到了周講話的鼓勵才提出了這條建議。

然而，王稼祥的建議在整體上難於為當時多數人接受。在「帝修反聯合反華」的形勢下，提出「緩和」建議，這不是「動搖」嗎？當毛澤東得知中國代表團在裁軍會議上的表現後，十分吃驚和惱火。北戴河會議上，王稼祥受到嚴厲批評，被概括為實行「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反動派和，對革命鬥爭支持少）的路線。從此，他實際上不再主持中聯部工作了。1988年，張香山著文說：「野心家康生的鼻子是很靈的，當他嗅到王稼祥意見未被採納的事情後，就乘機唆使和鼓動一些人公開進行反對。」張文說，「三和一少」是康生提出來的。其實在當時，在反帝反修問題上有一股同仇敵愾之氣。「緊張」，而不是「緩和」，更能為黨內所接受。當然，關鍵取決於毛澤東的態度。

6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既是明顯的又是隱忍的。明顯的方面在於，中共已經形成了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固定看法，甚至可以說，是已經把問題看死了：不再懷疑問題的性質，不再抱有希望，不再期待轉變。特別是在理論上，中國人認為，修正主義一詞的使用，已經有了事實根據。彷彿馬克思主義者對第一國際、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再現了一樣，在當代它又延續了開來。由此，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而在另一方面，同蘇聯關係的完全破裂又沒到火候。如果現在就破裂，對國家和世界革命都不利。因此，兩黨兩國的關係被暫時地維持着。但是，膿包終究要被捅破。在中蘇兩黨和兩國的領導人中，當時的選擇竟然都是鬥爭到底。於是，中蘇之間，似乎注定要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你死我活的敵人。義憤易來，理性難得。這種敵對事實上對中國和蘇聯的歷史影響都是巨大的。只是這種影響當時人還沒看出來。

第七章
重提階級鬥爭

自1949年以來，在中共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央全會，曾多次改寫了黨的發展軌跡。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就是改變當代中國歷史軌跡的一次重要全會。值得指出的是，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政治路線，是以一種難以理解、有些「不期然而至」的特殊面孔突然到來的。此前，全黨正實行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這個調整方針或路線，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意見，並經毛澤東首肯的。可實際情況是，毛澤東在2月七千人大會結束後即離開北京，他分兩次在南方巡視和居住了三個半月，一直沒有領導調整的進行。7月6日返回北京後，毛澤東即召開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以重提階級鬥爭的思路，改變了國家政治走向。八屆十中全會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它直接引導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使中國政治向極左方向行走了十六年。

一　何來憂患？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至7月6日這半年時間，毛澤東一直呆在外地，從武漢到上海，再到杭州，遊歷名山大川，按他自己的話說，

「當了一回徐霞客」。然而，毛澤東決非真的超然物外，寄情山水。他對經濟建設失去興趣之後，注意力轉到了階級鬥爭問題上，密切地關注着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1962年上半年，國際環境的確出現了某種緊張狀況。西邊有印度尼赫魯的邊境肇事，東邊有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的蠢動，北邊中蘇邊境也不安寧。在毛澤東看來出現了「帝修反聯合反華」的逆流。對於這些外敵滋擾，毛澤東應付裕如，並不感到有大的壓力。他甚至認為這不無好處。5月31日，毛澤東對羅瑞卿說：「有點敵人搗亂比較好，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還有一說：『多難興邦。』」

毛澤東更為關注的當然是「修正主義」。對於中蘇之間的分歧，毛澤東一直把自己的觀點視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純潔性，悍衛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利益的原則問題，決無妥協的餘地。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之後，中蘇矛盾進一步加劇，毛澤東對蘇聯乃至國際上修正主義問題估計更加嚴重了。

詩言志。這個時期，毛澤東寫了多首帶有濃烈反修色彩的詩詞，以表達心跡。1961年11月17日，毛澤東和郭沫若七律一首：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12月，毛澤東步宋代大詩人陸游原詞，「反其意而用之」，作「卜算子·詠梅」一首，27日，親自批示內部印發。詞曰：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渴望戰鬥，渴望有千鈞之棒，澄清宇內，盡掃陰霾，他盼望嚴冬過後，盡綻春蕾。只是因為國內深陷困局，才暫時隱忍不發。

儘管在當時世界的幾十個共產黨中，中共的觀點並不被多數政黨所接受，毛澤東卻不感到孤立。他抱有真理必勝的堅定信念。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按：此段話為1966年重新修改毛的七千人大會講話時新添的。前章已經做了說明）

蘇聯變修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被修正主義篡奪了，那麼中國呢，有沒有這種危險？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只是點了一個題目：「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面教員，從他們那裏吸取教訓。」後來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談起這一次講話時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不鬥爭，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看出一些問題。」查毛澤東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並沒有他同卡博講的這段話。也許記憶混淆了。但警告之意卻是明顯的，只是當時大家的心思都用到糾正錯誤上了，沒有注意毛澤東的暗示。反修問題並不是七千人大會的主題。

從國際上反對「修正主義」，到國內防止「修正主義」，這似乎是順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延伸。早在1960年5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的談話中就說：「我國也有修正主義者，以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為首的修正主義者，去年夏季向黨進攻。我們批評了他，他失敗了。跟他走的有七個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連他自己八個」。從此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者」同「修正主義者」等同了起來。七千人大會雖然微妙，但毛澤東是以滿意的心情結束大

會的。通過大會，在形勢如此危難的時刻，他的威望反而更高了。唯一使他不能釋懷的，是黨內對形勢和困難的估計，對三面紅旗的評價，都出現了並不符合他看法的分歧。毛澤東是帶着某種不安離開京城的。

然而，從西樓會議到五月會議，劉少奇、陳雲、周恩來、鄧小平等一線常委們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重了。劉少奇甚至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不要怕講漆黑一團。周恩來講農業恢復至少五年。陳雲講五年內只能講調整，不能講發展。這還有甚麼希望呢，還有甚麼總路線、大躍進呢？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毛澤東在周遊「列國」時，頻繁地把各路諸侯找來談話，向他們提出了這個題目。各省市負責人、各大區負責人都對毛澤東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地方官員說這話時，有的也許是順着毛澤東的話說，有的則發自內心。他們感到講困難沒有勁，有些人總是等待出現新躍進，對於地方所屬企業的「關停併轉」難以割捨。對調整措施還存在一股抵觸情緒。毛澤東從外地得到支持，更加強了他對中央一線的不滿。

如果單是對困難形勢的不同估計，那只是工作上的分歧，問題是毛澤東從中看出了政治問題。他後來說：「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成一片黑暗。」（8月11日）他說：「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還有包產到戶，毛澤東從來把它等同於單幹。農民和基層幹部中有主張「單幹」的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黨內有一股「單幹風」，愈到上層愈厲害。鄧子恢、田家英、陳雲都主張包產到戶，劉少奇竟然不加阻止，毛澤東甚為不滿，這不是遇到困難就動搖，喪失信心嗎？

問題還不止這些。還有甄別平反，彭德懷竟寫了八萬言的信。這封信由楊尚昆轉給了鄧小平，毛澤東剛回北京，鄧小平就轉給毛澤東，並將此事報告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提出彭德懷問題是否應該給予甄別處理。劉少奇和周恩來當時都沒有表態。在一次領導人會面時，劉少奇、周恩來向毛澤東說到彭德懷問題，毛澤東顯得很不高興。他

說：「洋洋八萬言書，我看了，已請中央辦公廳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劉少奇和周恩來一見此狀，不便多言。毛澤東認為，彭德懷要翻案！

毛澤東感到了壓力，感到了挑戰，感到了威脅。不僅是對他本人，也是對他的路線，對他的社會主義模式。現在，國內最困難的時期真的過去了，經濟形勢出現了明顯好轉，他要發動反擊，扭轉這種局面了。困難時期潛伏的分歧迅速公開化。薄一波回憶說：毛澤東是同意進行調整的，但前提是：必須首先肯定1958年以來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不容許有甚麼觸動；對前幾年所犯錯誤的分析，對困難的分析和克服困難的辦法，必須與之合拍。西樓會議、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使調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步，在某些方面觸動了這個大前提。因而，毛澤東就要出來干預和糾正了。

二　「東臨碣石有遺篇」

1962年有兩個會議給歷史留下深刻痕跡：一個是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一個是秋天的八屆十中全會。兩次會議恰好代表了共和國建設史上兩種不同的發展趨向。前者繼承了中央八大的穩健的路線，它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唱主角，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贊同的。後者繼續着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的一種「左」傾趨向。它以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為轉折，劉少奇等人雖有不同觀點，也不得不放棄己見，追隨毛的思路。

所謂八屆十中全會，其實是由一連串會議組成：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三個會議前後一貫，所以，毛澤東在全會第一天說，這次會議實際上已經開了兩個月。

轉折是在7至8月北戴河會議上出現的。要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是5月份就確定了的。當時確定會議是研究調整和恢復問題。

7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通知確定了四項議題：農村工作問題；糧食問題；商業問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周恩來等正是根據這些議題準備文件的。包括〈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等。7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在避暑勝地北戴河召開。50年代以來，北戴河成為中共中央夏季召開會議的常選地點。這次北戴河會議開始的十天，按原定計劃討論上述三個文件。大家並沒有感到有甚麼異常。儘管涉及到「包產到戶」問題，並不把它看得很嚴重。

毛澤東開始是批文件，「甩石頭」。8月2日，他把安徽太湖縣錢能讓保薦責任田的信印發大會。同日，他又將兩份反映南斯拉夫經濟混亂的報導批給到會者，他寫道：「請大家討論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還是走馬克思列寧主義道路好。」8月5日，毛澤東先在華東組、華中組會議上吹風。他說：「我周遊了全國，從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

8月6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一上來就撇開工作問題，專講階級、形勢、矛盾，給大會出題目。關於階級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不是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的國家是否也適應？關於形勢問題，他說：究竟這兩年如何？有甚麼經驗？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關於矛盾問題，他說：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餘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又說：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業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單幹之風，愈到上層愈大。鬧單幹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餘，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幹。如

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毛澤東這篇講話一出，會議氣氛頓時緊張起來。他關於對「一片黑暗」的批評，對「包產到戶」的批評，明顯地是針對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的，是針對在一線的中央常委們的。而且他把黨內分歧有意與蘇共的「兩全」路線聯繫起來，把「包產到戶」與走資本主義道路聯繫起來，這就使對方難以分辯了。

隨後，毛澤東又在8月9、11、13、15、17、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闡發他講話中的觀點。所謂中心小組，是會議開始時由劉少奇提議成立的，便於集中討論和決策。中心小組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伯達、陸定一、羅瑞卿、謝富治、谷牧、陳毅、楊尚昆、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陶鑄、李雪峰、劉瀾濤組成，共二十四人。林彪沒有到會。陳雲到了北戴河，因為腹瀉，寫信給鄧小平並轉毛澤東，說明身體狀況不好，向中央請假，得到毛澤東同意。中心小組實際上只有二十二人。

8月9日毛澤東說：「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這次會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多次批評以後，劉少奇不得不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困難估計的說法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8月11日，劉少奇說：「五月會議我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一是說1962年夏收減產已成定局，一是說單幹在全國估計已佔20%。」毛澤東插話「農業恢復要五年、八年，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精減兩千萬人、減少徵購等都不靈，或者說，這些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8月15日，李富春發言解釋說：「五月會議提出爭取快、準備慢，問題是有些同志把重點放在準備慢上了。」毛澤東插話說：「『爭取快、準備慢』，哪一方面也適用。快了，頭一句靈；慢了，後一句靈。」8月17日，周恩來發言說：「過去一個時期，我們把困難說得多了一些，這對黨內發生消極影響。雖然我們採取了正確

措施，但使人看問題容易看成漆黑一團。」然而，他同時例舉了大量事例，說明自七千人大會以來取得的成就。他說：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沒有洩氣，想方設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務，而且措施得力，見效也快，效果比預期的好。要肯定成績。周恩來實際上委婉地回答了對「黑暗風」的批評。

然而，毛澤東的話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8月13日中心小組會上，一位軍隊負責人說：「農業恢復的時間越說越長，工業指標也越講越少，我們一輩子沒有希望了，還有甚麼搞頭。」譚震林也不贊成說農業的恢復要五年。他說：「實際上，『五風』糾正了，搞了〈十二條〉、〈六十條〉，恢復就會很快，只要兩年就達到1957年3700億斤的水平。」毛澤東插話說：「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主要是今明兩年，64年掃尾。」有人在小組會上說：「大躍進的形勢，肯定會要很快重新到來的。」並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有人說：「現在整個國民經濟的中心不是恢復問題，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都不是個恢復問題。」有的說：「『三面紅旗』究竟打不打？現在似乎理不直、氣不壯了。」有的說：「大躍進似乎很難開口了，簡直就不好提了。」有的說：「現在似乎總路線不好講了，大躍進也不能講了，成績不能講了，一講成績就受諷刺。」「說光明就感到有壓力。」有人批評說：「現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躍進說得越不像話越好，越鬆勁、越單幹越好。」與七千人大會完全相反，會議迅速「左」轉，大家很快跟上了毛澤東。形勢剛剛有所好轉，許多人又按捺不住，躍躍欲試了。

鄧子恢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所謂「黑暗風」帶來的「後果」，「證據」之一是造成人們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喪失信心，主張「單幹」。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為大家描述了一幅「單幹」引起兩極分化的可怕圖景。8月5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9日，毛澤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份，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

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

批判「單幹風」，鄧子恢成了重點。會上，他夏天的幾次報告成了批判的靶子。白紙黑字，鐵證如山！鄧子恢只好檢討。8月11日，他在中心小組會上聲明：最近幾天，已經覺得自己的包產到戶主張是不正確的。然而，鄧子恢的這個聲明並不能抵擋來勢兇猛的批評浪潮。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上寫下長篇按語，印發大會。他寫道：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就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1955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我們歡迎鄧子恢同志在1962年8月11日核心小組會議上所作的聲明。他說，他在最近幾天，已經覺得自己的單幹主張是不正確的了，這是值得歡迎的。但他沒有聯繫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鄧子恢上年獲得的兩次表揚一筆勾銷了。老賬新賬一起算，鄧子恢又成了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會上一邊倒，原來贊成或容忍過包產到戶的人轉變立場，參加到對包產到戶的討伐之中。這場批判一直延續到移師北京的預備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所有人都表態批評了鄧子恢。

9月25日，董必武在全會講話中說到「單幹風」時，毛澤東又插話：「鄧子恢同志曾當面和我談過保薦責任田，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甚麼談話，是受他的訓。」他批評說：「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鄧子恢同志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隨後，中央撤銷了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鄧子恢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事實上不再任用。會上，毛澤東問：「鄧

子恢同志還跟別的同志談了沒有？」這是在將劉少奇的軍。劉少奇、周恩來不得不進行解釋。毛澤東反覆講：「建議可以，但不能採納。」話中隱含着對劉少奇沒有抵制包產到戶的不滿。幸好，他還不知道劉少奇曾讓田家英轉告他贊成包產到戶的意見。在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田家英60%的包產到戶、40%搞集體的主張。田獨自承擔了這個壓力。

批「單幹風」，也含有批陳雲之意。更何況批「黑暗風」陳雲更是「在責難逃」。但會上毛澤東始終沒有點陳雲的名。或許他認為這樣做動作太大；或者他對陳雲的經濟才幹不願一棍子打死。會後他這樣說：「陳雲的意見是錯誤的，但他有組織觀念，守紀律，是向中央常委陳述的，沒有對外宣傳。」儘管如此，八屆十中全會後，陳雲「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幾乎成了定論。他的政治處境日益困難，從此被打入冷宮，不再重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批判「翻案風」，是北戴河會議的一場「重頭戲」。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多次講話、插話，批評彭德懷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慶施等人談話。柯慶施說：「《海瑞罷官》影射毛澤東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不服氣，要翻案。」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接着，他又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在這之前，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早就嗅出《海瑞罷官》中的「陰謀」，當面向毛澤東告狀，要批判《海瑞罷官》。毛雖未置可否，但對黨內外有人要為彭德懷鳴不平越發警覺起來。

8月11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上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8月13日，毛又說：「我們只堅決反對背後搗鬼的，不怕搞陽謀的。」

這時，大會的注意力集中到批鄧子恢身上了，批彭還未形成高潮。誰想到彭德懷自己的第二封信，恰好提供了批判的靶子。彭德懷沒有參加北戴河會議，也許他還不知道北戴河會議的風向已轉，對1962年的全面平反還抱有一線希望。8月22日，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

國外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他寫道：「我帶着苦悶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請求對我所犯的錯誤，進行全面的審查，作出正確的處理，泣伏呈辭，懇希鑑察。」彭的這封信遞上去，引來了與會者激烈的聲討。一些人立即提出：這是逼着中央全會來討論他的問題，是向中央挑戰。

這時北戴河即將結束，多數與會者移師北京繼續參加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8月26日，預備會議開始。9月3日，毛澤東召集小範圍會議，布置要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全會各小組會上討論。此後，一次新的批彭浪潮掀起。與1959年廬山會議不同的是，這次是背靠背批判，彭德懷接到通知，不准其參加八屆十中全會，也不准其國慶節上天安門。批判一直到全會結束，大組發言、小組發言都充滿了火藥味，其聲勢不亞於1959年。當時陳伯達的一篇發言，頗能代表會議的氣氛。陳伯達說：「今年6月間，彭德懷又來了一封八萬字的不知羞恥自我吹噓的長信，在信中對他自己和以他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活動，裏通外國的活動，全部翻案，全部猖狂進攻。到了8月22日，他又來了一封卑鄙下流的信。總之，他是要來干擾我們的，不來干擾他是不甘心的。」陳伯達還從「理論」高度論證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出現張邦昌、石敬塘。」陳伯達罵彭德懷「不知羞恥」，「卑鄙下流」，而這種漫罵竟成為時髦而無人制止，使中共黨內對落難同志的落井下石、袖手旁觀之風越加盛行起來。有了陳伯達的肆無忌憚，批判於是墮落為漫罵。許多人也開始了不講理的批判。彭德懷又被戴上了許多新的罪名。如說彭寫此信是1962年夏天颳的「翻案」陰風，是配合「三尼」(當時把肯尼迪、尼基塔·赫魯曉夫、尼赫魯和鐵托簡稱為「三尼一鐵公司」)反華，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發起新的進攻，一百多頁信紙裏面埋的是「炸彈」，是反黨綱領；說彭一貫反對毛澤東，一貫支持、執行錯誤路線，是「野心家、陰謀家」；說不但是彭高聯盟，而且在六屆五中全會，彭就被選為中央委員，認識了王明，因而，中國的反黨集團，不是一個小集團，而是大集團；說彭參加革命是來「入股」，是資產階級民主派，極端個人主義，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黨，在歷史上屢犯錯誤；說彭是「裏通外國」，是「國

際反動別動隊」。就這樣，發言者都把「信」上升到敵對分子搞篡黨奪權陰謀的高度去批判。受彭德懷案牽連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等，也都一一檢討和受到批評。

恰在這時，黨內意識形態的「監察官」康生，又有了新的施展「才藝」的機會。他從一篇小說中發現了一個反黨「大陰謀」。這就是著名的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之案。《劉志丹》是一部歌頌陝北根據地創建者之一劉志丹的歷史小說。作者李建彤，是劉志丹之弟劉景范的夫人。作者1956年應工人出版社之約而寫。小說初稿寫出來以後，作者請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審閱。習當年擔任過陝北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劉志丹的戰友。習認為小說沒有寫好，於1960年春天，兩次約作者談話，指出：要把劉志丹放到大革命的整個時代去寫，要體現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習特別提醒：不要寫高崗。

1962年夏，作者改出小說上部，工人出版社準備出版，一面印成送審樣書送審，一面交《工人日報》於1962年7月28日至8月4日連載發表，《中國青年》雜誌也予刊載。小說得到了一些陝北老幹部的支持。但同為陝北紅軍幹部、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或者出於歷史上的恩怨，或者出於對政治鬥爭的敏銳，反對出版這本書。北戴河會議期間，他看到有些報刊已開始連載部分章節，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准發表。8月24日，康生給楊尚昆寫信，說他沒有看過這部小說，但他斷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的寫作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要求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1962年9月8日，預備會議上各組已開始批彭兩三天，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首先提出小說問題，他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勳同志「主持」寫的（後來又說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着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於是，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9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彭的過程中，對小說《劉志丹》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勳、賈

拓夫、劉景范等打成「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按當時的邏輯，寫劉志丹就是寫陝北，寫陝北就是寫高崗，而高崗與彭德懷早已結成反黨聯盟，習仲勳又是西北野戰軍的政委，彭德懷的老搭檔。如此這般，「高彭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就成立了。從一本小說中發現蛛絲馬跡，抓出一個「反黨集團」。康生延安整風時捕風捉影羅織罪名的熟練手段又派上了用場，而且這僅僅是開始。

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唸了這張條子，接着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審查彭德懷和習仲勳兩個專案組。習仲勳專案組由二十人組成，康生任主任。從此，開始了對小說《劉志丹》案的先定性、後求證的漫長的審查過程。一大批原西北根據地的幹部和與小說《劉志丹》有些瓜葛的人都在劫難逃，「文革」中飽受牢獄之苦。後來，鬥爭焦點幾經轉移，習案早已淡化。1974年12月21日，毛澤東親自指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劉景范等人才得以走出牢獄，然而結論仍舊。直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才為習仲勳等人徹底平了反。

因文藝作品而獲罪，《劉志丹》不是第一部。然而，自從「利用小說反黨」的觀點一出，文化領域就在劫難逃了。此後，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屢屢爆出，其源頭蓋出於此。

除去彭德懷和《劉志丹》，還有一件屬於「翻案風」的案子也令毛澤東大為震怒。事情緣起於1962年六七月間，國家機關黨委曾向幾個單位分別布置了個別右派的甄別試點工作，由於各種原因，對這些右派的甄別試點，有的沒有進行，有的剛剛開了個頭，或者只作了一些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就停止了。國家機關黨委布置對個別右派的甄別，是有文件精神根據的。1962年7月26日中央統戰部擬就的〈關

於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曾規定「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屬要求甄別（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應該進行甄別」。中央統戰部當時擬訂這個文件，顯然是適應着政治關係調整的。在大部右派分子已經給予摘帽處理的形勢下，個別確實搞錯的右派分子給予甄別平反，顯然是應該的。特別是民主黨派內和黨內有影響人士中的右派，他們的甄別應該更為寬鬆才對。

國家機關試圖對個別右派分子進行甄別一事，由9月24日編印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內部刊物《宣教動態》登載出來。這則消息立即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於9月29日做出批示。批示以極為嚴厲語言和非常憎惡的態度說到：「劉、周、鄧三同志閱。請鄧查一下，此事是誰布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1] 敏感的毛澤東，立即把這件小範圍並未真正實行的舉動，同6、7月份中央一線領導的調整聯繫起來，從而再次坐實了確有「翻案風」的存在。「猖狂之至」一語，已經不像同志之間的批評了，它幾乎是在痛斥和「臭罵」。這表明了毛澤東的憤怒態度。毫無疑問，這件不幸的事情，對毛澤東形成自己關於1962年階級鬥爭的概念，起了加固的作用。

三 「警鐘長鳴」

8月26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移回北京繼續開，是為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而無論在哪裏開，會議的氣氛愈來愈熱，揭發的問題也愈來愈多。

---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00。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問題提出來了。9月14日，陳毅在華東組發言。陳毅說：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說我們對美國鬥得過分了，對修正主義鬥得過分了，對尼赫魯鬥得過分了，要和緩一點。一少，是指我們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點。這種「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錯誤的。大量的事實說明我們同肯尼迪、赫魯曉夫、尼赫魯聯合戰線的鬥爭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的鬥爭又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不能說已經鬥過分了。對於民族解放運動，隨着我們力量的不斷增長和技術的提高，我們還應當給他們以更多的支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目光短淺，不能打小算盤，要打大算盤，不能只算經濟賬，要算政治賬。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樣的一股歪風，主要是三年的暫時困難，把一些馬列主義意志不堅定的人嚇昏了。毛澤東十分贊同陳毅的發言，把登有這篇講話的簡報批給江青閱：「可看，很好。」

陳毅批評了王稼祥的觀點，然而，他自己和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也受到了攻擊。8月9日，有人就在北戴河會議中心小組會上質問：「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8月13日，又有人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有的，不能資產階級還存在，就沒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毛澤東插話：「從意識形態來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存在。」9月11日，陳毅在預備會議對他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作解釋。鄧小平接過話茬，說：「陳總講的是對的。」毛澤東不同意，他對陳毅說：「人家請你講話總是有目的的，總要沾點光，沒有利益他不幹。我對總司令講過，你到處講話要注意。」毛澤東的這些插話，聯繫到他關於「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話，表露出他對知識界的高度不信任。

問題還不在對知識分子的不放心，問題在於怎麼會有這樣的政策？8月10日和12日，毛澤東連續寫了兩個批語，批評「封鎖消息」、「搞獨立王國」。8月10日的批語嚴厲地批評：「許多領導機關封鎖消息，不作論證性的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實行獨立王國」。「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執行『紀律的一條路了』。」8月12日，

他又批評：「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致中央同志對組織部同志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

聯繫到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人們強烈感到，這裏講的「封鎖消息」、「獨立王國」決不只是指中組部、外交部等具體部門。

不過，經過從北戴河會議到預備會議，方向終於被扭轉了，形勢也被扭轉了。而旗幟就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

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開會的第一天，毛澤東從容地闡述了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和路線。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要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老幹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層幹部、基層幹部、特別是青年人中進行教育，我們必須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大會就講，使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澤東講的階級鬥爭，雖然包括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包括地富反壞、資產階級等等，但他的主要注意力顯然不在這裏。他認為：反革命有是有，已不很多，無非是「一個游魚三個浪」。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黨內，甚至放在上層出修正主義問題上。早在8月13日，他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一定會出馬列主義。按辯證法，事物總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們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9月24日，毛澤東說：「我們除了在國際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國內也還有人民群眾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它做右傾機會主義，現在看，恐怕以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薄一波回憶說：「實際上，他在這裏所說的修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衝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風』（即黨內認識分歧）說的。」

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經過他反覆修改，寫進了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從而形成了全黨的路線。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

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會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階級鬥爭的弦重新繃緊，「反修」的警鐘從此敲響，中國從此走上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不歸路。

北戴河會議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三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處在一線的中央常委都脫不了干係；尤其是劉少奇。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一些話就已使人感到刺激。後來主持中央工作，又出現了「三風」。還有，他1939年在延安發表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於1962年8月1日由《人民日報》重新發表。這是經過他親自補充和修訂的。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每個共產黨員人手一冊，發行量竟超過了《毛澤東選集》。一段時間《修養》對共產黨員的影響竟可與毛澤東的「老三篇」相比美。也許有感於「大躍進」以來黨員幹部水平低下，希望以此來增強黨員的自身修養。但此時此地重新發行，難道不怕樹大招風嗎？還有，《論共產黨員修養》中有這樣一段話：「這種人根本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只是胡謅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的衷心和熱情。」但凡了解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段話當年是針對王明的。從劉少奇的思想和修養而言，他決不可能有其他用意。然而，在那種敏感時期，很難不引起一些人的聯想，以後的事態表明，《論共產黨員修養》最終沒有逃脫「左派」們鷹一般的眼睛。不過，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

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始終沒有點名批評劉少奇，也沒有點其他常委的名。顯然毛澤東雖有不滿，但還不認為問題有那麼嚴重。全會在人事上只動了一個不算太大的手術。劉少奇和中央常委們作自我批評，盡力跟上毛澤東的思絡，在這個前提下謀求對階級鬥爭作一些約束，使正在進行的調整工作得以繼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講話後，陳伯達、李先念、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柯慶施、劉瀾濤、李富春、彭真等先後在會上發言，表明自己的態度。

9月26日，全會最後一天，劉少奇的講話和毛澤東的大段大段的插話，給人一個印象：似乎兩個主席的認識又取得了一致。劉少奇說：「贊成毛澤東的講話。我們黨在革命勝利以後，在毛澤東領導下，一直是比較順利的，但到1959年、1960年，因為受到天災和我們工作中有錯誤，算是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困難。問題是採取甚麼態度。我們在困難面前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克服困難，堅持毛澤東、黨中央革命的道路，繼續勝利前進。這是大多數同志的態度。」「第二種，在困難面前被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後倒退、單幹，這是鄧子恢同志的態度。……」毛澤東此時插話道：「名義上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說是經營方式，實際上就是單幹。」劉說：「除鄧以外，還有許多人向中央寫信，主張單幹，鄧是代表。」劉迴避了陳雲等人的意見。接着，劉又說：「第三種，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發起進攻，企圖推翻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馬列主義領導，這就是彭德懷、習仲勳的態度。第一種是正確的；第二種是動搖，不堅定，喪失信心，不懂馬列主義；第三種是敵對的態度。」毛在這裏又插話說：「第二種是不懂馬列主義，是屬於認識上的，過幾年一看好些，就改了，他當時沒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沒有想到國際國內關係。民主革命勝利以後，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四大自由，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當時在頤年堂就批評過鄧老。」劉說：「單幹是沒有出路的，只有社會主義大農業才能使農民免於貧困和破產，農業才能過關。鄧老主張單幹，就是違背了最重要的兩條，因此是香花還是毒草，是很

清楚的，是一枝毒草。」毛又插話說：「可以建議，但不能採納。有的地方開一次會贊成單幹，但在執行半年以後，開一次辯論會，過去如何，將來如何，四屬五保戶如何，沒有可能一家一頭牛，就又不贊成單幹。」劉說：「宣傳單幹優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黨領導單幹，黨就要變質了，就不是共產黨。」

劉少奇講到這裏，又回到對困難的認識。他說：「現在我們的困難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經過了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開始好轉，應該繼續前進，要堅持革命的道路，但宣傳還要注意一點，還要講有困難的。」劉說：「今年五月會議對困難估計多了一些。如果採取第一種態度，把困難估計得多一點，就沒有甚麼問題；如果採取第二種態度，估計困難太多，就會動搖社會主義的信心，喪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壞的影響。農村集體經濟可以鞏固，單幹風大，實際單幹不多，並不嚴重，只有安徽、甘肅多一些。已經單幹了的，可以重新組織起來的。這股單幹風要打下去。」毛在這裏插話說：「有一家就一家，幾家就幾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願意的就組織起來。不願意來的就不來，也不要罵他們是走台灣的道路，但要說他們方向是不正確的。將來要來還可以來，現在不要聞風而來。散的很多地方，如安徽，分二年、三年、分期分批組織起來，先說服願意的組織起來，一年增加一些。」劉接着說：「第三種態度，利用我們暫時的困難向黨進攻的是反動的。他們希望我們犯錯誤，對我們的困難幸災樂禍。彭、高、習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沒有甚麼綱領，有時也提出綱領，如廬山會議彭德懷的意見書仍是反黨綱領，這次八萬言的信也是綱領。在七千人大會上，我說彭的信從表面上看來有些是符合事實的，他就說不是反黨綱領。是綱領，綱領不能一點事實也沒有呀！有部分是符合事實的，才能迷惑人。這次信也是迷惑人，開始有些人認為問題沒有那麼大。」毛插話說：「提出與蔣介石一樣的綱領，不會拿出來。」劉說：「《劉志丹》八十萬言書也是綱領。」毛說：「布哈林只有一句話——發財吧！」

接着，劉少奇的講話又轉到階級鬥爭的反修理論問題上。他引用了毛澤東在1957年〈正處〉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

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的一段話。接着批評了斯大林在1935年說已經解決的話，「這是不正確的，同列寧講的不符合。」毛插話說：「與列寧說的相反。」劉接着說：「兩條道路的問題未最後解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毛插話說：「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又出了赫魯曉夫。現在看起來，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時間，我經常這樣想，要經過反覆。」劉說：「斯大林在集體化以後講誰戰勝誰的問題國內解決了，國際未解決。在這裏還是主席講得對。」毛插話說：「我是根據列寧的說法。列寧有預見，他是在1924年死的，革命勝利後他有七年的實際經驗。」劉說：「斯大林不對，麻痹了自己。」毛插話說：「後頭又出了反革命，驚惶失措，殺了很多人，有些應該殺，有些不該殺，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劉說：「誰勝誰負要經過長時期才能解決，蘇聯、南斯拉夫、東歐的經驗都證明了，我們要接受教訓。我國如果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石一樣，形式上可能不同了。」毛插話說：「彭上台也會打着社會主義旗幟騙人的。」劉說：「誰勝誰負問題還未最後解決，……」毛插話說：「至少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劉少奇：「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我們要準備五代到十代，我們算第一代，共一百年到二百年。」

從這段幾乎是劉少奇與毛澤東對談式的講話看，劉少奇的思想又回到了毛澤東的軌道上，回到了階級鬥爭的思維定式上。而全黨也都心服口服地接受了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的解釋和對反修防修的警告。大家都講階級鬥爭，都講反修防修。然而，階級鬥爭這把達摩克利斯利劍究竟會落在誰的頭上呢？

屢遭挫折的田家英，書生憂患重上心頭。梅行回憶說：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有天晚上，我到他的住所去，一直談到天色微明。他憂慮重重，深怕又出現第一次廬山會議的局面，使全國的經濟和政治再一次掉進深淵。我們談到群眾生活面臨的苦難，談到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也談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有時變幻莫測，令人心悸。

聊以寬慰的是，毛澤東贊同了劉少奇的建議：階級鬥爭不要影響工作。劉少奇說：「我們這次會議揭發了彭、習反黨陰謀，是我們黨的一

個偉大勝利。反黨集團實際上是幾支反黨別動隊，人數不多，用不着全黨去對付，我們工作不要受干擾，由少數人對付他們。對國際修正主義也要組織少數人去鬥爭，大多數人做好工作，我行我素。對全黨幹部進行教育，討論一下是必須的。廬山會議上過當。」毛澤東同意說：「高級幹部十幾萬人，十七級以上討論一下，不要捲入這個鬥爭。」

這畢竟說明，殷鑑不遠。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一哄而起反右傾，結果鬧出一個全國性的大饑荒。毛澤東曾為之後悔不迭。這時老百姓剛剛吃上幾頓飽飯，如果再來一次一哄而起，後果將不堪設想。毛澤東自己在9月24日的講話中也講到：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階級鬥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當天下午，在陳伯達發言時，毛又插話說：廬山會議以後，又有國外修正主義的干擾，以至於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整了一年，我們的精力就是對付那方面去了。這一次，不管國際國內發生甚麼事，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只有那麼大的事，沒有甚麼好大的事。

階級鬥爭不能干擾工作，這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共同商定的。前一天（9月25日）周恩來在大會講話，明確地說：階級鬥爭，如彭、習兩案，已有專案組審理，調整工作不要受干擾；反右必須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幹部和群眾中去，不要搞運動，這是廬山會議的教訓。他說：還有大量調整工作要做，要抓緊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中央一線的這個共識，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之後，這就使調整方針在會後得以繼續實行。這不能不說是人民的一種造化。調整因此又進行了三年。這三年中，國民經濟得到根本性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曾經達到「文革」發生前歷史最好水平。從上海市1965年豬肉每市斤九角六分、雞蛋每市斤七角八分、帶魚每市斤三角的物價上，我們可以推測調整完成後的中國社會生活。[2]

2　王延謙編：《我國近七十年物價簡史（資料）》（上海：上海市企業管理協會財貿分會，出版年份不詳），頁187。

八屆十中全會上還通過了幾個相關的文件。它們是：〈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糧食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這些文件大部分是鞏固調整措施的。正因為它們得以繼續貫徹並實際發揮着作用，才有60年代前幾年經濟全面復蘇的局面。

第八章
抓住龍尾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確認了毛澤東所提出的「階級鬥爭」路線。毛澤東的基本思路也集中到抓階級鬥爭上面來。這時中國政治的真正走向，是從檢討「大躍進」以來錯誤、糾正各方面缺欠、全面調整社會關係等，轉到了以階級鬥爭為基本線索的「左」的進程上。雖然，經濟調整還在進行，但是，它在中國政治中已是從屬性的舉動。在這之後，中國政治領域發生了一系列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批判重又開始。事實上，這種十分嚴厲的政治批判和全國性的「四清」運動，仍然沒有化解毛澤東內心存在的陰影。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中國革命成敗的命運問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裏的問題，仍舊迴旋在毛澤東的腦際，他仍然感覺存在着巨大的疑問。1965年5月，毛澤東有重上井岡山之行。這可以看作他選擇重大革命步驟前的一次「熱身」。他對中國革命終極成果的憂慮，使他試圖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來解決中國革命的紅色永遠不被污染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抓住了龍尾，也就扭動起龍的全身。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一　尋找階級鬥爭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閉幕後，毛澤東開始在兩個方向轉入反攻，一方面在國際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一方面在國內開展四清五反運動，

目的是根絕修正主義的根源。他得心應手地同時導演着兩部歷史大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也努力一步步跟上了毛澤東的思路。全黨乃至全國人民都被動員起來，不同程度地加入了這場歷史劇的演出。

關於對農民和農村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這一直是毛澤東及他的戰友們關心的一個大問題。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農民雖然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農民畢竟不同於工人，他們是小私有者，有自發傾向，必須不斷地向他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才可能引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1957年反右之後，他就指示要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再次提出在農村進行社教，1960年上半年，在農村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年底，又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1961年11月，中央又一次發出農村社教的指示。農村社教幾乎成了全黨經常性的課題。因此，當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農村社教時，恐怕黨內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不過這次教育的重點不是農民，而是幹部。

黨內易於認同階級鬥爭，還在於對官僚主義的痛惡和對修正主義的擔心。官僚主義本是許多社會的一種通病，它只有通過民主和法制的不斷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傳統社會主義觀念，官僚主義只能是資產階級社會肌體上的「寄生蟲」，社會主義社會一旦出現官僚主義，那就是蛻化變質，就是階級鬥爭。

開國伊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時時警惕幹部隊伍的官僚化和蛻化。然而，高度集權的體制和運動式的發展模式，偏偏助長了官僚主義的發展，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強迫命令、多吃多佔等所謂「五風」泛濫，正是大躍進的一個後果。接踵而來的饑荒又引發了「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現象。富貴思淫慾，飢寒起盜心。對這種種現象，毛澤東一開始就認定為階級鬥爭了。前面已經提到，他甚至在1960年秋冬就斷定「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了。說是

「壞人當權、打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復辟和瘋狂掙扎。要求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在三類社隊開展奪權鬥爭。只是當時正處於經濟最困難和群眾情緒最低落的時期，毛澤東不想在這時再發動一場大規模階級鬥爭。事實上也難以通過階級鬥爭擺脫危機。然而，這種形勢估計在黨內已發生影響。

當認定蘇聯變修後，人們很自然地找尋這個列寧創建的大黨何以變修的原因。前文已經談到，毛澤東不知援引怎樣的證據，在1961年已經認定蘇聯修正主義的根源，是社會的兩極分化，赫魯曉夫代表這富有者階級。1961年11月19日，周恩來在關於蘇共二十二大的報告中也說，「它的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這個判斷是代表中共中央作的。「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蘇聯有，中國就沒有嗎？反觀自身，人們很自然地把種種真實的或虛幻的問題看成了修正主義。1962年7月1日，鄧子恢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作報告說過的一段話，很具代表性。他說：幹部的特殊化，這是最脫離群眾的，老百姓很不滿意，……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這一批幹部不改變，將是修正主義的基礎，二十年以後，中國也要出現修正主義，你不要認為我們不會出現修正主義。老一輩都死了，這些傢伙今後還不當赫魯曉夫嗎？蘇聯集體農莊的主席收入很高，也是特殊階層，怕打仗，怕戰爭，要與美國肯尼迪求和妥協。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二十年以後也要產生修正主義，危險之至，因此，無論如何要解決這個問題。鄧子恢對「修正主義」何等的擔憂！對防止特殊階層的出現何等的急切！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不久卻成了「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再以後又成了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者。可以想見，鄧子恢對批判他的農村政策主張可能想不通，但對毛澤東發動反修防修決不會有心理障礙。這就是黨內普遍的心態。

還有劉少奇，他對黨內官僚主義的痛惡溢於言表。他在七千人大會講話中他指出了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再把這些現象作出階級鬥爭的解釋並不困難。1962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同中央組織部負責人談話時說：「十中全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將來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義？現在有人要搞，高崗、彭德懷就是。……從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來看，搞社會主義，有些曲折，不是甚麼奇怪現象。從打倒資產階級，消滅剝削制度，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共產主義，中間經過幾個曲折，是合乎情理的。」

大家都在警惕修正主義，但甚麼是修正主義？各人心中所指可能大不相同。如何防止修正主義，劉少奇說：「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種保證，國家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種保證，最基本的制度，就是這個。」他總結蘇聯的教訓，認為斯大林對敵鬥爭堅決，但破壞了民主集中制，一切個人說了算，一切光榮歸於斯大林。赫魯曉夫利用了這點，他自己也搞這一套。劉少奇找出的病根和開列的藥方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想法呢？

不管怎樣，由於國際反修鬥爭的同仇敵愾，由於對國內出修正主義的共同擔憂，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反修大旗一舉，全黨就動員起來了，緊張起來了。

八屆十中全會後不久，毛澤東再次外出周遊視察。這一次他跑了十一個省。令他失望的是，他提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並沒有引起全黨的重視。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分別在長沙、邯鄲向他匯報了這個問題。

八屆十中全會後，各省市先後召開會議，傳達貫徹全會精神。但各地負責人領會有深有淺，見事有快有慢。不少省份把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限制在落實〈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的範圍內。着重於糾正包產到戶做法，落實各項政策，鞏固集體經濟，並不刻意把它同階級鬥爭掛勾。江渭清回憶當時江蘇省委的思想狀況，應該是有代表性的：1962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江蘇省委召開代表大會，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中心是傳達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

講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坐鎮督促。12月15日，會議閉幕那天，毛澤東抵達南京，接見全體與會者。會後，江蘇省委對全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出部署。儘管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已把階級鬥爭提到了尖銳的程度，儘管柯慶施到會給江蘇省委施加壓力。江渭清回憶說：「我同省委書記處的其他幾位同志商量，大家感到這幾年農村運動不斷，幹部已經折騰得夠了，生產形勢才開始好轉，經不起再折騰了，決定把農村社教的重點放在鞏固發展集體經濟上面。所以省委在關於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沒有突出強調批判鬥爭，而是強調以正面教育為主。」到1963年2月，省委轉發試點經驗時，仍然明確要求：「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必須以全面貫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為中心，着重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廣泛進行社會主義方向的教育；二是切實整頓社隊幹部的思想作風；三是劃清若干具體政策界限，特別是不能把正當的家庭副業、正當的集市貿易和政策規定範圍內的自留地，當作『資本主義』，以免造成混亂。」江蘇省委的做法反映了最初人們對社會主義教育的理解。這在毛澤東看來，這有點文不對題，是對階級鬥爭不敏感。

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對形勢的看法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196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湖南省委關於糾正「單幹風」的報告，就把「單幹風」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報告說：「鬧單幹的，有地、富分子，有富裕中農，也有貧農。在我們黨內和幹部隊伍中也有一少部分人主張分戶單幹。」「從根本性質上看，『單幹風』與反對『單幹風』是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產生單幹風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壞分子搗亂，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作怪。」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的報告，更是描述了一幅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畫面：各方面的情況表明，當前的階級鬥爭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風」颳得很大，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企圖復辟，「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從各方面威脅着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河北省委的報告對形勢的估計如出一轍：在九十個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揭發出許多階級鬥爭情況。投機倒把活動有十萬起，「千字號」的上萬，「萬字號」的上千；反革命集團活動有一千三百多起，地富反攻倒算有二萬六千多起，反動會道門活動有八千起，巫婆神漢、陰陽先生有五萬多人；特別嚴重的是一些黨員、幹部帶頭參加了封建迷信活動。在這裏再次出現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互動現象。無論是出自階級鬥爭的思維定式，還是曲意迎合毛澤東的思想，這些報告都把問題擴大化了。群眾的小偷小摸、宗教迷信、巫婆神漢、投機倒把種種陰暗面都歸結為階級鬥爭，顯然混淆了兩類矛盾。即使有這種種現象，大多沒有經過核實。

這兩個省委的做法是用階級鬥爭和整風整社的方式來進行社教。湖南的經驗是：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糾正「單幹風」上，繼而把「單幹風」與「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的統稱）「緊緊相連」，於1962年12月起重點強調「徹底揭開當前階級鬥爭的蓋子，針鋒相對地展開鬥爭，教育幹部，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地颳『東風』，打擊敵人，遏止『黑風』。」以此「把敵人和『黑風』整住」。河北的經驗是：先是「克服了自發單幹傾向，遏止了單幹風」，繼而於1963年2月中旬開展了「普遍進行清賬、清庫、清工、清財」的「四清」工作。「四清」在檢查糾正基層幹部中存在的鋪張浪費、挪用公款、多吃多佔以及貪污盜竊行為，整頓幹部作風，貫徹勤儉辦社、民主辦社方針上，有積極意義，因而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保定地委還總結了學習文件、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幹部檢討交待、查證清理、進行退賠、建立制度、鞏固成果、檢查驗收等步驟方法。

毛澤東十分讚賞他們的經驗。後來，他在1963年5月說：我「跑了十一個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絕地講社會主義教育，其他人都不講。」

在全國各地走了一圈後，毛澤東感到有必要專門召開一次會議，督促和布置各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現在就要搞一個階級鬥爭」：五反四清。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從1月15日周恩來代中央起草關於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通知中看，這次

會議的四項議題都是工作問題，甚至沒有提到四清五反。然而後來的會議，重點討論的卻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城市「五反」運動問題。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重視，毛澤東接連將湖南、河北省委關於社教和整風整社的報告印發會議討論。在會上，他多次引用了這兩個報告的內容和結論，以此敦促其他省市抓緊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向各地敲警鐘。

劉少奇主持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12日在彭真作關於「五反」運動的報告後，劉少奇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

2月25日，劉少奇作〈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毛澤東插話說：「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義根子。」2月28日，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在會上又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打擊瘋狂向我們進攻的颳『黑風』的惡風邪氣、牛鬼蛇神。」毛澤東的這些話大家都很擁護，這時國際上的反修鬥爭正日益激烈，國內的反修防修鬥爭的空氣自然升溫。

會議決定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不過，這時確定的「四清」、「五反」內容比較具體，對象比較明確，農村「四清」即清賬目、清庫存、清工分、清財務；城市「五反」即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大抵重點集中在基層幹部作風問題的範疇，未涉及路線和政策分歧，但要用階級鬥爭的方法進行「四清」、「五反」，這個思想已相當明確了，目的就是挖掉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五反運動的指示也強調地指出：開展這一運動是「為了健全制度，改進思想作風，克服和防止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腐蝕，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

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指示規定，「五反」運動只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民機關、國營和合作社營企事業單位、物資管理部門、文教部門中進行。根據中央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區機關立即在今後開展「五反」運動。城市的運動尚為溫和，叫領導幹部「洗手洗澡」。在農村則開始社會主義教育的試點。

毛澤東更關心農村「四清」，注意發現和推廣各地的經驗。3月23日批發山西昔陽縣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材料。並親擬標題「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幹部全體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範例」。4月，毛澤東又開始外出巡視。4月8日，他聽取河北省委匯報時插話說：「我們的支部書記是否靠得住呀？有的也靠不住」。他很贊同河北省委蹲點調查研究的辦法。上次（2月）他同林鐵和劉子厚就說過：「要紮根串連，要貧僱農團結起來。」會後，4月9日，毛澤東到達山東，聽取山東省委書記白如冰的匯報。他插話說：「如果我們不整風，那些縣都要出修正主義。」

經過二月會議的發動，各地階級鬥爭的「敏感性」迅速增強，紛紛向中央寫出報告，反映本地階級鬥爭情況和進行階級鬥爭的做法。毛澤東首先發現了東北局宋任窮4月10日寫來的報告，接着又發現河南省委的報告、河北保定地委關於「四清」的報告、邢台地委關於建立貧下中農組織的報告，十分重視。4月25日，毛澤東在上海對周恩來說：「這幾個文件值得注意。」不久，他又讓彭真趕到上海，代中央起草轉發這些文件的批語。5月2日，彭真起草了對東北、河南兩個報告的批語。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指出「社會主義教育是一件大事」。向各地提出要求：檢查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認識和工作，檢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點和採取的方法是否適當，查一查是否還有很多的地、縣、社沒有抓住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話（看來一定是有的），應當在農忙間隙，在不誤生產的條件下，抓緊進行。特別要注意分步驟的方法、試點的方法和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政策。

毛澤東歷來發動運動的辦法是通過抓典型，推廣局部的經驗指導全局、推動運動。現在，他的思想發展得很快，全黨又像1958年，讓人有些跟不上了。例如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和書記劉順元聽完

二月中央工作會上毛澤東的講話，都感覺到「按照毛主席的意思，顯然是要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搞社教了」。他們仍顧慮重重，認為搞得不好，很容易混淆兩類矛盾，還是穩妥一點為好。回南京後，在向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講出了他們的看法，常委們也都贊成搞穩妥一點。2月底，江蘇省委向中央作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報告〉，仍然規定全省農村社教要把重點放在階級教育方面，主要解決農村兩條道路鬥爭問題；堅持先上後下，先黨內後黨外，層層培訓骨幹，進行正面教育；教育的內容要結合當地實際，完整地宣傳和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及各項有關規定。與當時中央批發的其他省的一些典型材料相比，江蘇省委的這些要求被認為「對兩條道路的鬥爭抓了，對階級鬥爭這個綱沒有高高舉起」。後來，江渭清不得不作自我批評。

這種求穩怕亂的思想不會是個別的。在後來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彭真就談到：大家感到從北戴河會議以來跟不上主席的思想，跟不上下邊那些先進單位。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也表示，北戴河會議後，大家認識不一致，至少是認識深淺不同，所以大家要求每兩三個月在主席處開一次會。雖然跟不上，但大家都認真地在跟，這時運動的對象主要在基層，要解決幹部中的陰暗面，這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二　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有了綱領

1963年4月26日，毛澤東巡遊到了杭州。在這裏，他親自主持做了兩篇大文章。一篇是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覆信，即〈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向赫魯曉夫發出一支林中響箭。一篇是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一共十條，後來把它稱為〈前十條〉。再次顯示出他的大手筆。鄧小平和彭真協助毛澤東，分別具體組織這兩個文件的起草工作。

5月2日以後，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召集到杭州，舉行包括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小型會議，研究制定農村社教的文件。部分省委書記也應召到會。會前，彭真奉命已主持寫出第一稿，5月2日各大區書記到後，彭真又同他們討論修改了兩次。毛澤東看後，覺得不夠尖銳，沒有提到馬列主義理論的高度。5月7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說：「可以不要那麼長，短些，嚴肅些，要寫些這樣的問題，如認識不一致問題」，「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樣一套。」他說，「生產的形勢，一年比一年好，階級鬥爭的形勢是嚴重的，尖銳的。」他根據地方報來的材料，列舉了農村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

5月8日，毛澤東連續批印了湖南省委的兩個報告和原載《中南通訊》的河南、湖北、湖南的四個文件。他批道：「這幾個文件很好，看到了問題，抓起了工作。……可以作為各省、地、縣、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光輝的材料。」在會上，他又講了認識問題。批評說：「不光是外國的修正主義者和國內的資產階級不承認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我們有許多幹部、黨員對敵情的嚴重性也是認識不足的，甚至熟視無睹的。」他說：「資產階級右派和中農分子把希望寄託在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這『三自一包』上面。」我們搞「五反」、「四清」，「就是挖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挖資本主義的根子，挖修正主義的根子。」

5月9日，毛澤東又批了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並寫下了很長的批語，他向全黨發出嚴重的警告：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

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

毛澤東把問題提到如此尖銳的程度，向人們描述了如此一幅令人警覺、擔憂、可怕的危險情景，不由得不使人汗顏警怵。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意見，執筆將文件再作修改。5月10日，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毛澤東關於浙江省七個材料的批語和他批示過的二十件材料，作為文件的附件。

毛澤東看到大家的認識已被喚醒，便於5月11日晚發表講話，着重強調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傷人過多，一定要搞試點。他說：「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後年。」

最後，他又回到主題。他說：「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記》，……天和地都不唱，單唱《香山記》，就是抓階級鬥爭。」

周恩來5月10日才到杭州，他是為當面向毛澤東報告「躍進號」貨輪遇難事件的處理情況來到杭州的。10日和11日，出席了毛澤東主持的小型會議。對於〈前十條〉他只提出了一條建議，即把「團結百分之九十幾」的幹部和群眾，改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表示同意。這一改把打擊面限制在了5%以內。周恩來回到北京，根據毛澤東的委託，於5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經過討論，對文件作了一些無關大旨的修改，20日下發全黨。

〈前十條〉是毛澤東指導社教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十條題目如下：（一）形勢問題；（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的問題；（三）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四）我們的同志對於敵情的嚴重性是否認識清楚了的問題；（五）依靠誰的問題；（六）目前農村中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政策和方法問題；（七）怎樣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的問題；（八）「四清」問題；（九）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問題；（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其內容基本上是毛澤東的各次批語和講話的彙集。許多段落是原文照搬。

為了證明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論斷正確，〈前十條〉列舉了九種「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的表現：

（一）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總是企圖復辟，伺機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復，打擊貧下中農；（二）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千方百計拉攏腐蝕幹部，篡奪領導權。有些社、隊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在他們手裏，其他機關的有些環節，也有他們的代理人；（三）地主富農分子進行恢復封建的宗族統治的活動，進行反革命宣傳，發展反革命組織；（四）地主富農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動道會門欺騙群眾，進行罪惡活動；（五）反動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例如：破壞公共財產，盜竊情報，甚至殺人放火，多處發現；（六）在商業上投機倒把的活動很嚴重，有些地方，這種活動是很猖狂的；（七）僱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的現象也發生了；（八）在社會上，除了那些繼續搞投機倒把的資產階級分子以外，還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靠投機、剝削大發其財；（九）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同地主富農分子勾結一起，為非作歹。這些分子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文件引用湖南省委一個報告的話說：「政治上和平共處，組織上稀裏糊塗，經濟上馬馬虎虎，怎麼能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得出結論說：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階級鬥爭，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這是決定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根本問題。」這裏，對農村階級鬥爭情況的估計，已經嚴重地脫離了實際。然而，毛澤東卻認為已經獲得了正確認識。這個認識是經過了建國後十三年的實踐，特別是近三年的實踐才得到的。在〈前十條〉的前言中，他寫下了那篇著名的哲學短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結果，歷史證明，中國人的正確思想，根本不是從虛妄的所謂社會主義階級鬥爭中來的。從階級鬥爭中學來的，只是一場大思想混亂。

〈前十條〉還強調「依靠貧農、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並且「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以前」都如此，強調要「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即建立貧下中農組織，開展「四清」同社會主義教育相結合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

劉少奇沒有參加5月小型會議。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陪同下，於4月12日至5月16日訪問了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國。5月12日小型會議結束時，他還在國外。他回到昆明後，看到〈前十條〉文件，很贊成文件的內容。他認為，三年經濟困難之後，出現許多不良的現象，脫離群眾、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等，對此不能熟視無睹，應該解決。

八屆十中全會時周恩來說「不要搞運動」，劉少奇說只用少數人對付「反動別動隊」，這些設想顯然不能實現了。四清五反運動逐漸發動起來，誰也無法提出反對意見。由於在反修問題上的共同認識以及對克服官僚主義的共同關心，不能說現在劉、周、鄧等人只是在被動地「跟」，他們應該說是非常主動地投入到運動中來的，只不過對這場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各自會有不同看法而已。周恩來一直把它看作一次反官僚主義的運動。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來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分兩次作了〈一次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的長篇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這個報告，堪稱中共黨內迄今為止最為形象深刻地刻畫官僚主義臉譜的一份珍貴文獻。可見他對官僚主義現象感受之深和深惡痛絕。只因篇幅過長，不能在此一一引述。周恩來指出：「我們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繼續發展下去。」他要求領導幹部要過好思想、政治、社會、親屬、生活這「五關」。

1963年初在各地逐步開展的農村四清運動，大都比過去的運動來得穩當些。然而，任何運動一旦納入階級鬥爭的軌道，就具有了對敵鬥爭的性質，難免發生過火行為。事實上，在運動搞得積極的地區，如湖南、湖北等地，在年初就已發生亂打亂鬥的現象。1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一份嚴禁運動中打人的通知，其中附錄了湖南常德地區、湖北麻城縣發生的亂鬥、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的材料。

2月2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議論到湖南、河南農村搞「四清」太急的問題。周恩來說：「已向主席反映，主席說要試點，不能急。」3月15日，帥孟奇向中央寫了一份湖南農村社教的報告。其中反映有

些地方已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到2月底，全省已死人76人（王延春報告說有97人）。

杭州會議後，彭真到河北、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八省視察，歷時一個月，同樣發現打擊面過寬，混淆政策界限的偏向。7月4日，他向毛澤東和中央寫報告，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緒；對於上中農、工作人員中的地富和資本家子女、犯錯誤的幹部要正確對待，防止出偏差；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要在不損害嚴肅性原則下盡可能從寬處理。他主張除領導權被地富篡奪的、蛻化變質的，或情況混亂、領導無力的社隊，應派工作隊外，一般應基本依靠基層幹部進行運動。「不要重複老區土改整風時『搬石頭』、『跳圈子』的錯誤」。

有鑑於試點中出現的問題，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作出一些具體政策規定。9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期間討論了上述已發現的問題，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田家英執筆起草〈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即（〈後十條〉）草案。這同樣也是一個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階級鬥爭的綱領。因為社教本身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產物，所以〈後十條〉不能不與〈前十條〉相銜接。這樣它不可能跳出階級鬥爭的大的框框。

〈後十條〉高度評價〈前十條〉「是一個偉大的具有綱領性的文件」，強調開展農村社教運動，「對於打退曾經囂張一時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猖狂進攻，對於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和無產階級專政，對於鏟除發生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對於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都有着極重大的作用。」規定運動的五個要點，「階級鬥爭是最基本的」。基本的方針則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是，起草這個文件的目的，是着眼於防「左」和反右。規定具體政策界限，力求縮小打擊面、約束過火鬥爭，減輕對經濟生活的消極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對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做了許多政策規定。關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文件認為，這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眾的一個前提條件。應該「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工作隊的任務，主要是給基層幹部當『參謀』，出主意，進行指導幫助」，

決不能包辦代替。對基層幹部要以教育為主，處分面要嚴格控制。關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眾，強調正確處理兩類矛盾。尤其講到正確對待中農和上中農，正確對待地、富、反、壞分子，正確對待地富子女。文件特別講到一般不重劃階級，不進行清查漏劃地主、富農分子工作。在中央工作會議最後一天大會上，鄧小平向全體與會者宣布：「這個文件大體上比較好。」看來中央一線領導人對這個文件很有信心。10月5日，文件報送毛澤東。

然而，〈後十條〉（草案）一披露，議論之聲就起了。有人說這個文件右了。其中某些地方高級領導人也這樣議論，這對執筆起草者田家英形成了一種無形壓力。這時田的處境困難。5月杭州會議，起草〈前十條〉時就沒有通知田家英。以往這類工作是少不了他的。自從1962年向毛澤東進言包產到戶以來，田明顯被冷落了。後來，田家英曾議論過〈前十條〉中的一段話，即：「依靠貧農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田頗不以為然，認為此話不通，「難道階級成份也能遺傳嗎？」誰知這話被傳出去了，很快受到批評。現在又有人說〈後十條〉「右了」，處在政治「高危」地帶的他，自然着實有些不安。正在這時，從武漢傳來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在全國宣講前後兩個「十條」的指示。田家英等看到這份指示，心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因為有了毛的指示，就表明毛澤東認可了〈後十條〉。這時已是10月下旬。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0月31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後十條〉（草案），11月1日，劉少奇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後又由鄧小平主持再作修改。11月4日，由田家英再赴上海，送交毛澤東。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通過這個文件。隨即由毛澤東批准下發全黨。

能夠指望〈後十條〉去防止過火的行為嗎？面對澎湃而來的階級鬥爭大潮，這些具體政策規定顯得蒼白無力。毛澤東贊同這些規定，但他更關心的是如何把階級鬥爭搞徹底。5月杭州會議後，他多次講到「三分之一」的領導權被篡奪的問題。許多地方領導人都贊同或者

附和這種估計。6月14日，毛澤東在邯鄲同河北省委書記林鐵談話說：「你們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講他們是佔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徹底，有的後來變了，有的富裕中農當權……湖北同志說地主有心，我們無意，現在清醒了。」8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日共領導人藏厚雄人時，說得更明確：「現在在農村還有三分之一的生產隊掌握在敵人及其同盟者的手裏。」9月9日，毛澤東同新（西蘭）共主席威廉斯談話說：「對於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單靠中央和少數黨委本身解決不了問題，必須發動群眾上下夾攻。」他說，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依靠隊伍。在農村依靠比較窮的農民，在機關依靠多數工作人員、下層幹部。10月2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巴盧庫時說，和平時期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們現在又碰到這種情況，黨內不純，部分組織已經被敵人佔領了，所以如果我們再不搞，再過十年，中國也會出修正主義。按照這種估計，在農村，至少在三分之一的社隊就不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依靠基層幹部」的問題，而是發動群眾奪回領導權的問題。11月15日，毛澤東親自代中央寫指示，要求在全黨全國宣講「雙十條」；12月14日，他又給林彪寫信，要求在部隊宣講這兩個文件，並且要求部隊抽調幹部到地方工廠、農村作宣講工作。

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相繼發出〈關於在全黨組織幹部宣講隊伍，把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的指示〉和〈關於繼續抓緊進行「五反」運動的指示〉。前一個指示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他明確提出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至少需要三至四年完成。要求從中央委員到縣級黨委委員，除年老體弱者以外，一律要「充當宣講員，至少一至兩次。有意避開不去的，叫做消極怠工分子」。

從3月底到4月底，毛澤東外出視察，先後在邯鄲、漢口、杭州等地，聽取了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委，西北局和河北、河南一些地委領導的匯報。反覆強調領導幹部要下去宣講兩個文件。3月28日，毛澤東在邯鄲召集四清座談會。他插話說：「我們有十年沒有搞階級鬥爭了，52年搞了一次，57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機關、學校，這一次要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

好」。他用贊許的口氣說：「說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他批評城市五反指示沒有談階級鬥爭，批評有人主張學大慶、學解放軍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階級鬥爭的那一派。」毛澤東尖銳地說。在這裏，毛澤東第一次把不搞階級鬥爭的人看成一個派別。

4月2日，毛澤東來到漢口。他問王任重：「你是不是向群眾宣講過？」王任重答覆：省委、地委、縣委的負責同志都下去宣講了，自己還未下去。毛澤東大為不快，尖銳批評說：「你為甚麼不去，你又不老，又沒有病，又不是右派，應當親自向群眾去宣講兩個十條。」毛澤東反覆強調：運動要搞深搞透，不要走過場。

毛澤東反覆督促各級領導幹部下去宣講雙十條。其主要用意不在幫助人們「掌握政策」，而在於喚醒全民的階級鬥爭意識，使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場反修防修鬥爭中來。正因為如此，伴隨「雙十條」全民宣講的，是更加猛烈的階級鬥爭大潮的興起。

三　夾縫中的經濟調整

1963年這一年，儘管階級鬥爭愈來愈熱，但國民經濟調整和工農業生產依然保持了正常秩序。畢竟從國務院到各級政府部門在正常運轉，四清五反還在試點階段，也沒有搞到工人農民中間去。再者，八屆十中全會、毛、劉、周、鄧達成了一個共識：階級鬥爭不要影響工作。毛澤東甚至說過：要把工作放在第一。劉少奇說，只用少數人去對付反動別動隊，多數人抓工作。

然而，干擾不可能沒有。事實上從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已經逐步走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軌道。毛澤東本人的注意力幾乎完全被國內外反修防修佔據了。各級領導幹部很大部分精力也都被吸引到這個方面來了。在1962年8月到1963年7月，將近一年左右時間裏，是否需要繼續貫徹調整方針，發生了搖擺。其原因不言自明：一則由於調整初見成效，經濟形勢有所好轉。這使人們產生了錯覺，以為問題

基本解決。不必再花那麼長時間調整了。二則由於批判了「黑暗風」，使黨內抵觸調整的意見得到了支持，而主張調整的意見受到了指責。代替陳雲主持調整的周恩來首當其衝。

還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期間，同時召開了城市工作會議，落實調整措施。北戴河會議上大批「黑暗風」的情況傳到城市工作會上，會議的空氣立刻變了，不少人認為中央財經小組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把困難說得過多。對於中央決定的減人、壓縮基建、企業「關停併轉」三大措施阻力很大。許多地方和部門向中央討價還價，紛紛要求少減人，少下馬一些，少關停併轉一些。態度最差的甚至斷然拒絕。有人乘批「黑暗風」之機，責備中央領導人，把指責矛頭對準實際主持中財小組的周恩來，只差沒有公開點名。有的在二月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上贊同中央決策的人，現在也開始反悔埋怨，甚至對周恩來說了十分難聽的話。

周恩來派去聽會的吳冷西和田家英聽到這些意見，憤憤不平，打電話給周恩來的秘書許明，要求面見周。周把他們叫去，吳、田向周訴說城市工會會議上不正常的氣氛，情緒激動，說着說着就開始流淚。他們不僅為周鳴不平，更為中央決策落實不了而惋惜。他們認為：「這些同志對國家大事如此輕妄，怎麼得了！」

周恩來不得不安慰吳、田二人不要激動，同時指出：非常措施是中央會議決定並經毛主席同意的，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他深有感慨地說：1959年春調整時，我身為一國總理，竟然連調一千噸鋼也做不到。現在又遇到這麼大的阻力，可見實行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不容易，現在證明七千人大會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會，雖然開了一個多月，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說：你們可以相信，中央是堅持原則的，議而有決，決則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談過，抓階級鬥爭不能影響調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贊成。吳冷西回憶說：「這次談話一直到深夜，我們在門口向總理告別時，田家英還熱淚盈眶。」

在城市工作會議上，周恩來不得不苦口婆心地進行解釋，他指出：中央決定減人、下馬、關停併轉這三項措施，確是「傷筋動骨」。砍那麼多基建項目，關停那麼多工廠企業，每砍一刀都是血淋

淋的！這些都是用人民血汗錢建設起來的呀！中央就那麼忍心，就那麼狠心？這是從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被壓垮，我國將會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敗下去。不調整，不採取非常措施，猶豫拖延，就會坐失良機，拖垮我們的國家，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在黨內氣氛迅速「左」轉之時，周恩來有如此堅定的態度，實在難得。1962年10月6日，周恩來與鄧小平共同簽發了〈關於當前城市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文件作出十二條規定，繼續貫徹調整方針。

然而，因為政治走向改了，分歧是難以彌合的。1963年1月18日，國家計委的一份報告中提到：「最近有過一段時間，有些同志對於經濟形勢的好轉程度估計得過高了一些，要求在1963年過多地增加基本建設投資，過多地增加職工。」這時，有些地方、部門、單位，放鬆了減人，甚至隨便招收職工。1963年第一季度，工農業生產出現良好增長勢頭，財政結餘十億餘。這就使從中央到地方部分人樂觀情緒更加抬頭。3月1日，中央發出的一份指示認為，國民經濟將會「以比較快的速度向前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高漲時期」。各地遂將1963年當作「三五」計劃的頭一年，紛紛喊出打好第一仗、奪取開門紅的口號。年初，國家計委和有關部門已擬定了從1963年起開始「三五」計劃的初步方案。但是按照穩健派如周恩來們的想法，整個「三五」計劃五年都用於調整。

究竟是繼續調整，還是開始新的「大躍進」？在6月1日至15日的全國年度計劃工作座談會上，兩種意見爭持不下。一些人認為「八字方針」不要再提了，另一些人堅持還要進一步貫徹「八字方針」。7月1日，李富春把分歧意見提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拍板：再用三年作為調整年份。7月30日，鄧小平在工業問題座談會上傳達中央的指示：「還要進行三年調整，重點鞏固、充實、提高，創造條件，為第三個五年計劃做好準備。」8月6日，薄一波在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上說：「毛主席最近指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然是作為調整的年代。我們原來打算，今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現在不搞了。1963年、1964年、1965年調整三年，1966年開始第三個五年計劃。」這樣，一段時間來的決策搖擺終於得到克服。

是甚麼原因使一些人的頭腦降溫、從而不得不接受繼續調整的意見呢？是天災。

1963年中國又發生了嚴重自然災害，北澇南旱。北方的河北、河南、山東、蘇北、皖北和遼寧部分地區，突降暴雨，造成大澇；南方的廣西、湖南、雲南、貴州及江西、廣東部分地區則久旱無雨。農業收成損失嚴重。尤其是糧食產量的恢復眼見不會有大的起色，要恢復到1957年的3901億斤的水平，估計還要兩三年時間。依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認識，調整到位的主要標準是看糧食能否恢復到1957年水平。

旱澇災荒，農業欠收，這倒給了決策者一貼清醒劑，分歧減少了。9月19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到災荒時說：國內現在遇到的困難，是一種插曲，也是考驗我們。形勢好了一些，就常常容易發生錯覺，以為很好了，很容易腦筋有點熱。腦筋熱了，拿冷水洗一下好。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們還相當落後，相當貧窮，好轉以後，要上去，還需要時間，速度不能估計太快了。周恩來還講到，再用三年調整，還有一個原因，即用這段時間還清欠蘇聯的外債。無債一身輕，到1966年開始三五計劃。繼續調整的方針就這樣定下來了。不過後三年調整與前兩年的側重點不同。到1963年上半年，減人下放、基建下馬和企業關停併轉這三項「傷筋動骨」的措施基本完成。三年調整的重點轉到充實、鞏固、提高，填平補齊，成龍配套。8月6日薄一波說：「歸納起來，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兼顧國防第三。這是發展工業的方向，也是國民經濟計劃的方向。在三年之內，調整就是這樣擺法。」

四　階級鬥爭樣板

1963年秋冬，各地開始組織大批工作隊，下農村展開第二批「四清」試點。

伴隨雙十條的全民宣講，運動中的火藥味愈來愈濃了。過火鬥爭有增無減，自殺事件屢有發生。如湖北省第一批試點死了2000多人，

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二十五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省在這年秋冬，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這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愈來愈嚴重。上上下下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把運動搞徹底，而不是運動中的偏差。基於嚴重的「敵情」估計和社教運動要依靠貧下中農的規定，四清工作隊便搞起了「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等神秘化做法。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根據劉少奇要她下去鍛煉的指示，作為工作隊員參加了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的四清試點，化名董樸。臨行前，她請示劉少奇，應注意點甚麼。劉說：「要有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然而，說不帶框框，「雙十條」對形勢的估計就是框框。1980年王光美回顧說：當時「我是真心真意接受『以階級鬥爭為綱』指導思想的」。

桃園大隊本來是個一類隊，一類支部，生產好，徵購任務完成也好。支部書記吳臣是貧農，自認為沒甚麼問題。「磨了米、砍了肉」準備接待四清工作隊。但工作隊不信這些。基於大隊的領導權不知是否在搞復辟的敵人手裏的考慮，工作隊進村便搞起「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功夫」來，照搬民主革命時期開闢新區的做法，開始了背靠背揭發鬥爭。

其實「紮根串連」的做法，並非始自四清運動。最早出現於1960年和1961年。1961年初，廣東省坦州整社工作團總結他們的中山縣坦州公社進行整風運動的基本經驗說：「怎樣才能把群眾真正的發動起來？坦州的經驗證明，必須採取紮根串連的辦法，首先組織起一個貧下中農的核心隊伍，這可以說是繼土改、合作化以後的第三次『組織起來』。工作團進村以後，經過短短的幾天的工作，立即證明了紮根串連是深入發動群眾的唯一辦法，不管是三類隊，還是一、二類隊都必須如此。」對於坦州工作團總結的經驗，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都曾給予肯定，說這是「一個指導文件」，要求各地「斟酌仿照辦理」。

1963年2月，毛澤東要發動四清運動時，便對林鐵、劉子厚說：「你們有多少三類隊？要紮根串連，要貧僱農團結起來」。桃園工作隊

就沿用了這個做法。經過紮根串連，背靠背發動，終於發現了支部書記吳臣搞小買賣、跑單幫、吃喝賭博、打罵群眾等問題，決定撤掉吳臣的職。形勢急轉直下，緊接着挖出了幾個「貪污盜竊、多吃多佔」的「大案」來，並且查出漏劃地主五戶、富農二戶。隨後又順藤摸瓜，追查吳臣在縣、區、鄉的支持者。挖出了一個蛻化變質的副區長蘇長吉，挖出了縣委辦公室一個主任、縣人委辦公室一個副主任、縣水利科的一位科長。工作隊由此得出結論：四不清既有下面的根子（地主富農），還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護。上面的根子要不要追查？問題提了出來。

春節臨近，工作隊員董樸即王光美回到北京。毛澤東聽了她的參加四清的匯報。毛澤東很贊同她的分析，說：「根子在上面。」劉少奇也非常重視王光美反映的情況。1964年春節期間，他同王光美談話說：「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的根子在哪裏？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邊的根子，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沒有？要不要挖？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般幹部的不好作風的影響）」，「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基層幹部，在公社、區、縣和地委有根子」，「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勢力或者反革命勢力復辟了，就是因為這些幹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他強調地說：「可以挖上面的根子，……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

工作隊秘密串聯的階級鬥爭手法，引起了吳臣等挨整幹部的強烈反彈。而被清理和揪出的這些基層幹部的意見，更進一步證明了「階級鬥爭」的激烈。1964年3月27日，劉少奇給王光美寫信。信中認為：「吳臣的一夥要復辟，以便徹底推翻四清的成果。」「宗派活動如果達到了這種程度，是否已經是一種嚴重的反黨活動，是一種實際上的反革命活動？」「吳臣領導的桃園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這是劉少奇作出的一個非常脫離實際的階級鬥爭式的估計。

一個貧農書記領導的一類生產隊，何以變成了一個「復辟」的典型呢？當然，「復辟」是完全沒有根據和極為荒唐的。但是，農村幹

部的作風問題和幹群關係的問題的確存在。這是一個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社會問題。陳雲曾說過：我們的基層幹部就像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很多（大意如此）。陳雲畢竟比較實際。譬如俯下身去找螞蟻，遍地都是螞蟻。但螞蟻終歸不是大象。顯然，教育和整頓是必要的，但不能統統歸結為階級鬥爭。至於把由於過火鬥爭激化的矛盾，又當作「反革命」，當作「復辟」，這就更使認識步入了自我論證的惡性循環。當時，階級鬥爭就這樣製造出來了。

四清運動迅速地向「左」轉。其結果就是各地不斷發現「復辟」典型。經過理論總結和鬥爭經驗昇華，上報到中央來的，都是展開奪權鬥爭的經驗。

天津小站，是以生產津門貢米聞名的地方，如今也成了資產階級復辟的典型。同時，小站在當時大出其名，是因為在那裏不僅發生了復辟，而且還完成了以階級鬥爭方式重新奪回權力的一場鬥爭。

小站的社教運動自1964年1月開始。3月起，市委抽調大批幹部加強了工作組的力量。《紅旗》雜誌社編輯部派出十餘人去幫助工作，總編輯陳伯達在小站蹲點。運動開始是從「四清」入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清不出甚麼來。工作隊發出疑問：「這裏是我們的天下還是敵人的天下，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們的？」於是轉入奪權的政治鬥爭。處分了區委和公社的一些領導人，局面終於打開，群眾被充分發動起來。經過一番鬥爭，小站共打掉了三個「反革命集團」(為首的一個是原水稻專家、一個女勞動模範、一個是小站鎮的總支書記）。這就是小站的奪權鬥爭。

無獨有偶，奪權鬥爭也不能不在城市出現。當時令全國震動的，是甘肅白銀廠的奪權鬥爭。白銀廠，即白銀有色金屬公司。該公司50年代開始興建，1962年部分建成投入生產，是一個擁有一萬一千多職工的大型銅、硫生產聯合基地。白銀廠的問題在運動開始前已經有了某種反映。據薄一波回憶：「白銀廠的工作是有問題的，但有關單位向上反映時誇大了，以致造成那裏的問題非常嚴重的假象。」在接到甘肅省委的報告後，1963年2月20日主管工業的副總理薄一波與冶金部、中組部、西北局、甘肅省委有關領導會商，決定由高揚文（冶

金部副部長）帶領二十人的強有力工作組，迅速進駐白銀廠整頓處理。2月25日，薄一波在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請示中，認為白銀公司「實質上已為資產階級所篡奪」。「其錯誤性質是屬於敵我矛盾的。必須採取革命手段，改組領導班子，才能保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7日，周恩來批示同意。

3月，高揚文率領由冶金部和甘肅省派出的共五十餘人的工作組，進駐白銀公司。進廠伊始，就「以階級鬥爭為綱」，放手發動群眾，展開奪權鬥爭。原公司一名黨委第一書記、兩名副書記及其他一些人，受到黨內嚴重的處分。其中有人還被判了刑。據說，這個案子還同「高崗手下的紅人」、原省領導人張仲良有關，因此成為當時轟動全黨的大案。1966年6月，中共甘肅省委、冶金部黨組向中央寫出報告。報告認為這個公司「被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篡奪了領導權，使無產階級的國營企業演變為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統治的企業，使國家財產受到很大的損失」，「全民所有制的財產遭到嚴重的破壞」，「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成風」，「領導集團成員生活極端腐化」，「社會風尚敗壞」，「反革命活動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擊和陷害好人」。說這裏「成了一個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統治的世界，即掛着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統治的世界」。6月23日，中共中央把這份報告批轉全黨。中共中央的批語說：一個剛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聯合企業——白銀有色金屬公司，沒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篡奪了企業的領導大權，變成為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統治的獨立王國。這樣一個嚴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白銀有色金屬公司事件，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資產階級是死不甘休的，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採取各種隱蔽的方式，打入社會主義企業，企圖篡奪領導權，從而破壞社會主義所有制，把它演變為地主、資產階級所有制，這是同黨內出了修正主義分子分不開的。白銀有色屬公司事件，最根本的教訓就是，在我們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硬是忘了忽視了社會上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一客觀事實，這裏再一次提醒同志們注意，我們千萬不要以為社會主義的江山是鐵打的。如果我們對過渡時

期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認識不足，那麼，就會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蝕和進攻失去警惕，不加防範，地主、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隨時就有可能得逞。

十五年後，小站事件和白銀廠事件都被平反。冶金部和甘肅省委關於「白銀廠事件」的覆查報告說：這是一起重大的冤案。奪權報告中列舉的所謂「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統治」的結論是錯誤的，不符合事實，許多的罪名顛倒了黑白。天津市委覆查結果，小站的三個所謂「反革命集團」案，純屬子虛烏有，應給予徹底平反。今天看來，說這些單位當年完全沒有問題，也難以使人相信，但當作「復辟」的典型，則肯定是錯誤的。然而由於這兩個奪權樣板，不但加重了當年社教運動中的「左」傾錯誤，而且造成全黨風聲鶴唳的氣氛。自己製造出來的敵人，似乎驗證了自己提出的虛妄理論，結果完全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五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

毛澤東發動四清五反運動，是為了從基層做起，挖掉修根，清除所謂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然而，他真正憂慮的，是修正主義會發生在上層，發生在中央。小站和白銀廠，雖然被「篡奪」了領導權，也值得高度警覺，但他真正關注的，是修正主義者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從四清運動開始，毛澤東一方面督促自己的幹部下去搞運動，一方面思考怎樣防止高層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這一時期，他同外國黨的領導人頻繁談起1962年上半年的「右傾動搖」，而且態度愈來愈嚴肅，批評愈來愈嚴厲。1963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武漢同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談話說：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些。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1964年2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再次會見威爾科克斯，談國際反修和國內防修問題。毛澤東說：「中國社會是一分為二的，誰也不能說中國是不能分的。」威爾科克斯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取得了政權以後，還需要有反對派？」毛說：「不是需要，而是事實上必然出現各種反動派。」威說：「我現在的確愈來愈年輕。」表示了對毛澤東的論斷的讚賞。毛接着說：「我也是這樣。現在很高興。前幾年不那麼高興，這有一個過程，一鬥就高興了。」緊接着，他談到國內。他說：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和黨。這實質上就是修正主義的思想。他們聯絡部（按：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裏就有少數這樣的人。另一個是統戰部，它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裏面卻有人不講階級鬥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每個部都找得出這樣的人。例如農村工作部裏面就有一個鄧子恢，也是中央委員，還是副總理，卻主張單幹，實際上不要社會主義農業，主張「三自一包」。從國外來說，被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嚇倒了，在國內由於天災人禍，經濟受到損失，於是修正主義就露頭了。有一陣子可猖狂啦。毛澤東還說：針對三和一少，我們的方針就是三鬥一多，這就是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和馬列主義的政黨和馬列主義派別。三和一少是赫魯曉夫的口號，三鬥一多是我們的口號。

被毛澤東點名的一共三個人：王稼祥、鄧子恢和李維漢。李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他的問題也同所謂資產階級有關。李維漢建國以後一直掌管着中央統戰部，負責同民主黨派和資本家打交道，肩負着對資本家和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責任。既然是改造，總得要見成效。於是，從1956年起，李維漢研究統戰工作理論政策，提出了一個「五社一短」的改造目標：即把民主黨派根本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變成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各民族成為社會主義民族，宗教成為社會主義的宗教，並且在短期內消滅資產階級。李維漢的這些思想，曾在1962年4月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加以

闡發。然而，八屆十中全會後很快受到批評。從1962年10月開始，統戰部內部召開了一共四十多次批判會，批判李維漢，歷時半年多，罪名就是「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

1964年2月金日成到中國來，毛澤東同他進行了更深一層的談話。毛澤東說：「天下大事分則必合，合則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我們同高崗、彭德懷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毛澤東接着說：「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又說：「這些人在國內也主張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是包產到戶。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農村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他們在1962年上半年到處宣傳。夏季我們開了一個會議，是工作會議，中央委員、省委書記都來參加，把這些問題都抖摟出來了。然後，又開了中央全會，開了兩個月——8月到9月。」毛澤東繼續說：「這個會議開過以後，這些犯錯誤的同志都檢討了，說自己不對了。有一個同志是主張三自一包的，就是鄧子恢，他是長期搞農村工作的，是農村工作部長，是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頭更多。所以說『天下太平』，沒有這麼回事。我說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會有的。所以，要有意識的保持對立面。例如王明和赫魯曉夫一樣，彭德懷是赫魯曉夫的人，是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現在仍然保持原有職務。但是王明不同。這種政策將來可能危害我們，也可能危害你們。」說到這裏，毛澤東道出了他最深層的擔心。他說：「彭德懷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麼，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崗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這些人總是想復辟的。所以要提高警惕。」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毛澤東問金日成。金日成答道：「那我們就更困難了。」毛澤東說：「總會比阿爾巴尼亞好一些。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新西蘭的威爾科克

斯，還有印尼的同志，但還沒有得到機會同越南同志講。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麼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號召其他共產黨起來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確有些天方夜譚。可毛澤東就是這樣對中國的前途表示擔心。這時，在擔心的後面，他把希望寄託在解放軍身上。他對金日成說：「假如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是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聽到這裏，相信金日成已經墜入五里霧中，他不解地問：「你不是說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義嗎？」毛澤東回答說：「是打預防針。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進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賣，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在座有不少朝鮮的年青同志，你們不要把中國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這樣就不對了。中國有光明的一面，這是主要的一面，同時還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約有1000萬人。我計算了一下，在6.5億人口中，這種人就佔1/65，就是65個人中有一個。如果現在不加以注意，他們就會泛濫起來，蘇聯現在不就泛濫起來了嗎？」

3月23日，毛澤東在北京同日本共產黨訪華代表團侍田里見等人談話時，也同樣講了中國黨內的問題。之後，毛澤東去了武漢。但他仍覺言猶未盡，想同日共領導人再談一次。在4月8日給秘書林克信中他說：「日本代表團，何日經武漢去越南？我想同他們在武昌談一次話，在（再）問明白為要。」4月10日，毛澤東在武漢又與侍田里見等作了一次交談，話題仍然是國內外反修防修問題，重點卻在國內。他說：「就在那年（1962年）8月，我們討論了整個路線，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開了一次十中全會，發表了十中全會公報。當時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魯曉夫的調子一樣，即強調三和一少。在國內問題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強調自由市場、自留地，把集體經濟、社會主義市場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經濟放在第一位，農民的自留地放在

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負盈虧、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負盈虧，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就是三自。還有一包是主張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種，不搞集體。當時是一股風，1962年很猖狂。」毛澤東說：「中央聯絡部部長就主張三和一少。他本來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積極起來了。此外還有統戰部，一部分人主張把幾個資產階級政黨在幾年內改變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只是兩個例子，其他還不止。中央各部，每個部都不是太平的。每個部都可以一分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就有十幾個是修正主義者。」

不知出於怎樣的動機和衝動，毛澤東此時有特別強烈的傾訴欲望。本來，這些話是不宜向外國人表達的，家醜總還要有所保密。但毛澤東沒有捂住秘密。他甚至無保留地公開了中共黨內的問題。合理解釋是，他此時的確意識到，這些話已到了不講不行的地步。他已經感覺到，不僅國內防修，而且事實上國內已經存在修正主義了。這個修正主義主要不在基層，而是在領導層，甚至在中央。因此他說，中國可以一分為二，中央每個部都可以一分為二，地方也不太平。從他對1962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措施耿耿於懷的情況，從他反覆號召外國黨起來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的談話中很容易感覺到，他心目中的對立面，絕對不僅僅在中央委員和省部一級。僅僅一個統戰部、一個農村工作部和一個中聯部，是不能出赫魯曉夫那樣的大修正主義分子的，憑這些人還不可能有掉腦袋的危險。但問題出在中央，赫魯曉夫如果就睡在身邊，那情況就不一樣了。毛澤東堅決拒絕赫魯曉夫停止論戰的建議，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論戰，挑明國內修正主義的問題，從而動員群眾，壯大階級力量。4月25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澳共（馬列）主席希爾時說：「過去，我們的幹部、黨員和人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有甚麼不同，公開爭論開展以後，大家才知道有兩種共產主義，有兩種共產黨。」所謂兩種共產黨，就是馬列主義的黨和修正主義的黨。毛澤東要人們明白，危險是現實存在的。

「膿包」最終總要挑破。毛澤東終於把問題提上了中央工作會議。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一開始，與會者的發言就與「後十條」的精神大不一樣，政策問題

不再被提起議論。會上印發了甘肅省委和冶金部黨組關於白銀廠奪權的報告，介紹了天津小站奪權情況。由此，許多極「左」建議被提了出來，例如有人提出要在農村社教中「搬石頭」，要在城市「五反」中劃階級等等。

6月2日，劉少奇講話，提出「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了他們的人的觀點。這裏他不再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如何如何了，反而認為，有些地方四不清幹部對工作隊的辦法是「喂、頂、拖、混」，要想辦法擺脫他們。他認為：在性質上，「他們抵抗四清就是『反黨』，破壞就是『反革命』，要開除黨籍。」他主張，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幹部、依靠基層組織」。看來，劉少奇對形勢的估計也已經愈來愈嚴重。他顯然受到桃園大隊社教經驗的影響。

然而，沒有人的思想超過毛澤東。6月8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大局第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鄭重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他告誡各中央局的大員們，不要只看生產。要抓武裝，要抓槍。要想到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危險。他還提出，為防止修正主義，必須着重培養好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他還提出了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6月1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反修報告，闡述毛澤東的觀點。在劉講話過程中，毛澤東又作了長篇插話。劉少奇說：「要想一想，我們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毛澤東說：「已經出了嘛！像白銀廠，還有陳伯達同志調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有了嗎？我們國家，我看三分之一或者還少一點，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在壞人手裏。」劉說：「列寧的故鄉出了修正主義，才引起我們嚴重注意。」毛插話：「有了修正主義，才有《列寧主義萬歲》。可能出修正主義，準備出，不注意一定出，如果注意了可能不出，也可能出。出了怎麼辦？要想一想。出了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他脫離群眾，無非是鬧幾年，幾十年，還要垮，又走向反面。」劉說：「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都可能產生修正主義。」康生插話：「這是一條規律。社會主義國家不注意要出修正主義，注意也要出修正主

義，關鍵在於他能不能掌握領導。」劉少奇說：「反修鬥爭材料，正反兩面的東西都要印給黨內看看，如彭德懷、習仲勳寫的東西，小說《劉志丹》、吳自立的《平江革命鬥爭史》。」毛說：「要把蔣介石選集印出來，看他是怎樣罵我們的。」毛說：「我看中國搞赫魯曉夫那一套修正主義比較難一些。我們七億人口，工業不發達，比較落後，但比蘇聯民主。」劉說：「中國是七億人口的大國，搞修正主義，統一很難。搞起來，各省會獨立。」毛、劉的這番對話，已經到了危言聳聽的地步。似乎中國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邊沿一樣。這時，毛澤東終於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要把這個意思向各省、地、縣傳下去。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麼辦？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各省委要頂住！」

對於臨戰狀態的黨，毛澤東認為必須搞清陣線。他主張：「工業、農業、商業都要劃階級，學校、機關、軍隊、文化團體也要劃階級。此外，街道、小市鎮也要劃階級。」他說：「壞人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佔據了我們的要害部門，當了權，也不得了。」毛澤東還說：「例如冶金部是否劃？中央各部門是否也要劃？階級出身和本人表現，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會後，中央下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貧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草案）〉，提出了對過去劃錯了階級成份都應該認真審查並改正過來。關於城市劃階級問題，要在各大區進行試點。

大家都在講出修正主義，但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劉少奇指證的「修正主義」、「和平演變」主要還是指蛻化變質分子，周恩來更加明確指官僚主義。他們很少談到路線之爭，尤其不談1962年上半年。毛澤東講修正主義當然也包含幹部的蛻化變質、官僚主義種種陰暗面，但在他心目中，更主要的是路線之爭，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和「五社一短」之類。劉少奇和毛澤東都講修正主義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而且要出在中央；都講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各省要頂住，要獨立，要造反。可是，中央不就是由毛、劉、周、朱、陳、林、鄧等組成嗎？敵人究竟是誰呢？大家其實都還在五里霧中。當時，「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這個問題一經提出，可以想見，大家的神經都立刻緊張起來。

會議期間，賀龍元帥向毛澤東匯報了北京軍區楊林軍事表演的情況。毛澤東聽了很高興，提出要看一次軍事表演。6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偕劉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賀龍、聶榮臻、李先念、李井泉、譚震林、烏蘭夫、陸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劉瀾濤、楊尚昆、譚勁光、許光達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區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陣營浩大，雲集西郊射擊場。兩個主席興趣盎然地觀看了表演。

6月16日，毛澤東又把原班人馬帶上十三陵水庫，出乎意料地在大壩邊的小樓裏接見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所有人員。毛澤東在這裏談了軍事戰略問題，對1960年以來「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作了改變。他再次發出號召：「要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六　劉少奇動了「真格」

6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掛帥，指導全國的社教運動。不知是真的感到形勢嚴峻，還是想竭力跟上毛澤東的思路，6月會議後，劉少奇的思想進一步「左」轉。6月底到7月，劉少奇外出視察。先到天津，再到濟南、合肥、南京、上海、鄭州。這次外出，除了解運動情況外，就是為了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劉少奇在天津、濟南、南京等地先後都召集了軍隊系統幹部座談會，了解政治工作、軍事訓練和戰備工作。這或許是為了落實五月會議上毛澤東關於準備打仗的思想。作為主持中央工作的黨的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過問軍隊的事本是極正常的。然而，黨內歷來有嚴格分工，過去除了陪同毛澤東，劉少奇很少單獨召見軍隊幹部會議。因此，這次外出就顯得非同尋常。

劉少奇歷來嚴厲。但這次外出，不僅嚴厲，還顯得很急躁，脾氣很大。劉少奇從天津到濟南時，華東局就派魏文伯專程前往迎接，然

後陪他到安徽。劉少奇一行抵達合肥後，魏文伯就用電話給江渭清和江蘇省委打招呼。劉少奇對前一段「四清」運動很不滿意。魏文伯在電話裏說：「渭清同志，你要小心！這次少奇同志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提醒江渭清要有思想準備，在劉少奇到南京後「注意」。7月14日，劉少奇到了南京。他不住招待所，而是在省委辦公大樓的辦公室裏臨時搭了個鋪。當天下午，江渭清和李士英、彭沖等省委負責人向他匯報工作。劉少奇親臨省委四屆四次擴大會議，分別於7月15日和17日作了兩個下午的講話。劉少奇講話，有些是談工作問題，如闡述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提出各級黨委都要重視培養接班人，大膽選拔年輕幹部，包括知識分子幹部等。但講話的中心是闡述為甚麼要搞社會主義教育。幾次講話都對當時城鄉社會主義教育，包括江蘇的「四清」運動，提出了批評。歸結起來，集中在三個估計上：一是對「大約三分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他認為，「也許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縣領導說沒有那麼多，這是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險的。二是對幹部隊伍狀況的估計。他認為，「真正有嚴重問題的」、「四不清」的，佔基層幹部的多數，不是少數；沒有多少問題的、可靠的、團結了百分之九十五群眾的幹部很少，不是多數；對基層幹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層幹部改變了，再來依靠」。三是對運動情況的估計，他認為，社會主義教育已經搞了一年多，「農村、城市都沒有搞好」。這個革命運動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營更廣泛、更深刻、更複雜，因此沒有充分時間不行。劉少奇在講話中向大家透風，「後十條」要修改。他反覆強調只有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群眾，才能團結百分之九十五幹部。他指出：「四清」不只清經濟，還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他再次強調，要「追根子」，認為生產隊有嚴重問題，一定是大隊有人保護。大隊有嚴重問題，一定是公社有人保護。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保護。工廠、機關也一樣。處長有嚴重問題，一定有部長保護。「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劉少奇嚴厲批評了許多領導幹部

浮在上面，不蹲點，他反覆強調，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各級領導都要蹲點。有了兩個大隊、兩個工廠的經驗，才有資格當省委書記、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

劉少奇的這些思想是他從天津到濟南、合肥一路反覆強調的。這幾個省市領導聽到批評，沒有當面表示異議。然而到了江蘇，江渭清卻與劉少奇發生了「頂撞」。劉少奇講話後，江渭清對劉少奇講：「說社教都沒搞好，江蘇不是這個情況。」劉少奇說：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敗仗嘛！江堅持說：不能這麼講，我們了解，已經開展社教的社隊，百分之六十打了勝仗。江說：江蘇基層幹部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劉說：你這是沒有下去，講的還是三年前老情況。江說：我經常下去，對情況還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說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劉打斷了江的話，轉而問江：你贊成不贊成王光美同志報告？原來，王光美先期到了南京，在省委四屆四次擴大會議上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江渭清竟沒有到會。江渭清想，可能劉少奇認為這是對「桃園經驗」不重視。江說：從江蘇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劉說：那你們江蘇就不執行了？江說：不盲目執行。說到此處，劉沒有作聲。第二天晚上，劉少奇離開南京前，江渭清偕夫人去看望劉少奇和王光美。劉與江個別交談，嚴肅地說：「你昨天講的那三個意見（即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績的，基層幹部多數是好的，對王光美同志的報告不能盲目執行），是不對的。」江執意堅持。劉發了脾氣。

7月25日，劉少奇回到北京。因為感到黨內存在嚴重的右傾，因此向毛澤東作了他此次出行的匯報。毛聽後說：「不要怕『左』，半年總結一次。」於是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主要負責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作社教運動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報告。後來他說，這個報告不戴「右」的帽子，實際上全是反右。

8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後十條〉的修改由劉少奇親自主持。根據陳伯達的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

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當天，劉少奇又離開北京，經武漢、長沙抵達廣州。這次南下，除了具體督促各地社教外，主要任務是修改〈後十條〉。因此，劉少奇要田家英同他一道南下。田感到非常為難，他本不贊成對農村形勢和基層幹部的過左估計和「紮根串連」、「搬石頭」等左的做法。但又很尊重劉少奇，也不能不服從組織，只能勉為其難。臨行前，田家英報告了毛澤東，請求指示。毛交待兩條：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在飛機上，田將毛澤東的兩點意見轉告了劉少奇。

到達廣州後，劉少奇親自主持修改〈後十條〉，加進了一些十分尖銳的內容和語言。在做法上，與毛澤東對田家英講的意見也呈相反態勢。劉少奇主張，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8月16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提出了「關於集中力量進行城鎮五反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建議」。信中說：「各個縣分別搞時，一是缺少辦法，一個是縣委同下邊犯錯誤幹部有牽連。因此，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一個縣可集中工作隊員上萬人，聲勢浩大。省地機關派工作隊，上下左右同時清理。建議中央機關也要抽出人組織工作隊有一萬至幾萬人。」他說：「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8月18日，毛澤東批覆劉少奇的信說：「少奇同志：覺得很好，完全贊成，今天（18日）即與中央各同志商意（議），照此辦理，迅速實行。」

毛澤東本不贊成這樣搞，何以作這樣的批覆呢？兩天之後即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找李雪峰和華北各省、市委書記談話，李雪峰等人表示不贊成劉少奇主張的這種部署。他們認為：每個縣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河北一百四十一個縣，按這個進度，五年才能搞一半，時間搞得很久。毛澤東說：「少奇同志信我已經批了，中央同志討論了，你們不贊成，怎麼辦？」毛澤東還探問，據說有的人對王光美的報告有保留。所謂「王光美的報告」，即是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所作〈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這個報告後來人們簡稱作「桃園經驗」。據王光美1980年說：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

欣賞，推薦給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勵表揚我，還在中央會議上表揚了劉少奇，鼓勵我到各地去講」，「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後十條（草案）〉」。於是王光美在河北省講了以後，又到其他省市作報告。劉少奇似乎對「桃園經驗」特別的珍愛。8月19日，即毛澤東在北戴河找李雪峰談話的頭一天，劉少奇從廣州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由中央批轉王光美的報告。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為此，劉少奇還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批語。批語中說：這個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是有普遍意義的」。同一天，劉少奇將〈後十條〉修改稿讓田家英帶回北京，並致信毛澤東和中央，建議先給各中央局、省、地、縣徵求意見，在10月會議時定稿。

毛澤東收到劉少奇的信，擱置了一星期。8月27日，即劉回京第二天，毛澤東就劉少奇兩封信所提之事作了批示。關於〈後十條〉修正草案，毛沒有同意立即下發省、地、縣，而只批示「此件請印發各大區書記及少數參加會議的同志，加上中央參加會議的同志，越快越好，請他們研究，並提意見，再作修改。」至於王光美的報告，毛澤東批道：「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並「請小平同志辦」。這時，中央正在召開一個小型座談會，有各大局第一書記和江蘇等八個省委第一書記參加。討論〈後十條〉修正草案和社教部署，由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少奇說：「這次運動要上下左右一道解決，所有根子都要挖出來，所以要徹底革命，非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不可。」劉還提到「反右傾」。他說：「這次運動，我們有些同志怕幹部躺倒不幹，怕影響生產，東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義』，不怕『和平演變』，不怕脫離群眾。這是個甚麼問題？本質是甚麼？」他又說：「前幾年『寧左勿右』，現在又『寧右勿左』，這對運動的阻礙相當大。」

劉少奇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江渭清的，但又不僅僅是針對他一人。他特別提到在南京時聽到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幹部對「四清」骨幹「打擊報告」，「反攻倒算」的情況。7月29日，王光美打電話給江渭清，

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指示：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劉少奇之所以在這個會上重申對「高溝事件」要作「現行反革命處理」，是要以此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當時，劉少奇曾找江渭清個別談話，說他看到江蘇的一個通知，要「學習江渭清同志的講話」，問江：「為甚麼不學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這一問，顯然問題嚴重了。江渭清回答說，不曉得有這樣一個文件，待我請省委查一查。這時，在北京開會的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連打三個電話給江渭清，非要江作檢討不可。後來，江渭清讓省委辦公廳做了一個檢查。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向劉少奇寫信檢討了錯誤。9月30日，劉少奇寫了一封〈給江渭清同志的信〉，嚴厲批評各地幹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這封信經毛澤東同意，印發全黨，成為「四清」運動中的一份影響頗大的文件。江渭清「頂撞」劉少奇，成為四清運動中上層的一段公案。

〈後十條〉經過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再經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審閱，9月18日由劉少奇簽發給縣以上黨委和工作隊。這個修正草案，後稱〈後十條修正草案〉，以區別於1963年11月下發的草案。〈後十條修正草案〉，對原草案作了許多重要修改。一是增加了毛澤東提出的衡量社教運動搞得好還是不好的六條主要標準；二是規定領導人員必須親自蹲點；三是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四是先解決幹部中的問題，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基礎；五是「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對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要在紮根串連、調查研究以後，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六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地區要認真進行補課工作」；七是整個運動，大體分兩個階段，分別解決四不清和敵我問題，組織建設問題。這七點中，第五點是最重要的變化。根據這一條，所有進行社教運動的基層組織和幹部，都靠邊站了，由工作隊取而代之。

在〈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前後，劉少奇還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運動向「左」轉。9月1日，以中央名義轉發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向全黨推廣紮根串連的做法。10月12日，劉少奇代中央

起草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信中提出的「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提出對已爛掉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應進行奪權鬥爭，迅速加以解決。

10月24日，劉少奇又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由陳伯達親自搞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提出基層幹部躺倒不幹的，可由貧協組織取而代之。11月13日，中央印發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團的領導權限的規定(草案)〉，規定凡工作團集中進行運動的地方，當地縣委和縣人委即由工作團領導。在這些文件中，影響最大的是「桃園經驗」和「小站奪權經驗」。這些文件如傾盆大雨般潑下去後，各地緊張動員起來，從各行業、各部門抽調大批幹部組織工作團、工作隊和工作組。一些在校大學生和一直視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這次當了一回革別人命的人。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記述了1964年9月10日後工作團的聲勢。他這樣說到：為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必須組織強大的工作隊。全省組織一支六萬人左右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和一支二萬人左右的城市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以後隨運動的深入發展，逐步壯大這支隊伍。要求機關幹部除老弱病殘和其他不適宜參加工作隊的人員以外，區以上機關按三分之一、公社按五分之一、企事業單位按10%－15%的比例抽調。另外，選拔一批優秀的農村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回鄉職工以及城市企事業工人和不脫產幹部參加工作隊。工作隊要以開展運動的縣、市為單位建立團部，由所在地區的地委書記擔任團長。與此同時，省委決定成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和「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協助省委掌握運動情況，研究有關政策，處理日常工作。

如此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讓國家政治形勢發生了強烈震盪。每個地區集中上萬人搞一縣的四清，以大兵團「作戰」方式，大揭階級鬥爭蓋子。其結果是發現，這裏也「爛掉了」，那裏也「爛掉了」，

基層幹部大多數都是敵對階級分子。許多地方開展了奪權鬥爭。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基層幹部們，惶惶然如熱鍋上的螞蟻。其中不少人走上了「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山東省曲阜縣東郊大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紅旗單位，支部書記郭守明是全省著名勞模，在他領導下，大隊發生巨大變化，群眾生活大有提高，然而工作隊進村，不問青紅皂白，發動群眾整幹部，將全大隊幹部隔離審查，郭守明全家被鬥。青海省一個公社，工作隊認為要撤職處分的幹部佔47%，其中認定為地富反壞的佔21%，蛻化變質的佔26%。許多地方還發生打人、捆人現象，自殺、逃跑事件頻頻發生。在北京郊區通縣，二萬多工作隊員進縣，一百一十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七十多起，死五十多人。貴州省委認為全省一半以上地區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重劃階級，甚至審查社員成分，清洗混入的敵人。

「點」上的「左」傾行為很快影響到「面」上的四清。山東煙台地委提出幹部退賠指標。乳山縣連開十八天三級幹部會，限三天退完。縣委動員說：「如果不立即退賠，就要考慮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這五頂帽子，哪一頂給你戴。」不少幹部怕戴帽子，只好賣掉口糧、房子、衣服、被褥來退賠。山東菏澤專區成武縣，有些單位以「參觀」的名義串到幹部家搜查，有的連身上穿的棉褲也被迫脫下退賠，只剩下一條單褲；有的全部家當都上繳了，牀上只剩下一片席。這種風潮很快也蔓延到城市社教運動。上海市向一百三十三個單位派駐了一萬五千人的工作隊，有的單位發生打人、罰站、掛牌遊行、經濟搜查現象，甚至使用錄音誘供、監視偵查等方法。

事實上，這些構成文本的四清運動情況，只是通過不同渠道反映上來的某些細節。實際情況比這還要嚴重。下面這則史料來自新華社記者楊克現。他作為一名社教工作隊員，記述自己真實的觀感。楊回憶，他本是懷着知識分子淨化自己靈魂的心情來參加社教的。據長輩說，知識分子只有到基層去，到火熱的群眾運動中去經受鍛煉，接受教育，才能得到脫骨換胎的改造。但報名那天，社教總團辦公室負責人見他來自新華社，便以革命需要為由，強留他在總團機關籌辦《長

安社教報》。楊克現回憶說：進入社隊陣地前，我們報社的編輯和「四清」工作隊員們一起，全都去聆聽了有關長安階級鬥爭形勢的報告，以提高鬥志。作報告的是中共西安市委副書記、長安社教工作總團張國聲副團長。報告列舉了種種事實說明長安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張強調說，整個西北地區土地改革很不徹底，長安縣更不徹底，漏劃了大量地主與富農，貧下中農「尚未徹底翻身」；又說，長安曾經是胡宗南和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大本營，國民黨殘渣餘孽不少，他們混入革命隊伍，還在殘害貧下中農；又說，長安縣靠近西安大城市，城鄉資本主義勢力勾結一起，正在向社會主義農村猖狂進攻。聽了他的報告，隊員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長安縣滿眼都是敵情，貧下中農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有的隊員說：「聽了張書記的報告，好似大家要去解放西藏一樣。」儘管敵情描述得如此嚴重，張書記還口口聲聲說自己右。

楊克現所在的《長安社教報》，雖是總團機關報，但總團又直屬西北局領導。據說中央書記處、中共西北局都有領導在長安蹲點，但隱姓埋名，地點保密，不准採訪。這樣，《長安社教報》處於關門辦報的狀態。每期稿件，幾乎全是工作總團團長李登瀛的批件和工作總團辦公室篩選出來的報告。這些報告無一不在說明，長安縣的階級鬥爭形勢比預料的更為嚴重。其中最令人吃驚的當推總團團長批來的、王曲分團團長、寶雞地委書記張方海同志的文章。文章認為，工作隊進村後，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結果，發現整個王曲的基層幹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敵對階級分子，或是漏劃的地富，或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或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或者兼而有之。這些人裏裏外外、上上下下勾結在一起，專了貧下中農的政，貧下中農怎麼能夠翻身！王曲離縣城不遠，是著名作家柳青一直體驗生活的地方。他在那裏寫出力作《創業史》，向人們展現了王曲轟轟烈烈的土改和合作化運動場景。怎麼現在基層幹部全部都成了敵對分子呢？柳青《創業史》中帶領農民奔集體化的英雄人物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也挨了鬥。

為採寫報導，楊克現找到王曲「四清」工作隊長、寶雞地區的一位縣委書記。楊說明來意後單刀直入地問：「你們分團長不是說，你

們王曲分團所在這一帶地方，農村百分之七八十的幹部都是敵我性質的矛盾嗎!?」工作隊長先是一愣，稍一鎮定，便下炕去關了房門，生怕被人偷聽去似的壓低了聲音反問：「百分之七八十的敵我矛盾!?」「說實話，夠上敵我矛盾的，恐怕連百分之三四十也沒有！」楊克現忽然覺得這竟是此行的重要發現：上下級之間，對形勢的數量估計，相差一倍。況且，誰敢擔保，這百分之三四十的數量分析也合乎實際！「那你為甚麼不向社教總團反映？」「唉，這種時候，誰敢？」縣委書記聲音變得更小了，甚至有點悲慘，愁鎖眉尖。他說，他參加過多次運動，知道階級鬥爭到黨內就是路線鬥爭。一個人不能白白地作為路線鬥爭的犧牲品！

長安農村敵情嚴重得無以復加。如何打退階級敵人猖狂進攻，西北局領導秘密蹲點的細柳分團創造了一個新經驗叫「小戰鬥」。「小戰鬥」就是對「四不清幹部」先不開大的鬥爭會，而是要他們按照工作隊的指揮行動，創造條件使他們犯錯誤，培養反面教員，以訓練積極分子。楊克現回憶說：右和右傾機會主義，要知道，多少年來這都是一個可怕的詞兒，大家都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避着它。自從批鬥「四不清壞幹部」的「小戰鬥」打響以後，總團一個個「小戰鬥」都打得「十分漂亮」，「戰果輝煌」。奇怪的是，工作總團幾乎每天都接到「四不清」幹部自殺的報告。有人背後說，這是土改、合作化以來自殺人數最高的記錄。楊回憶說，自殺，是不能登我們的《長安社教報》的。自殺，按作家的說法，這是一個人絲毫看不到生的希望的悲劇。但我們總團的領導不是作家，他們一直在大抓階級鬥爭，並且堅決認為，從階級鬥爭的觀點看來，自殺正是長安縣「四不清」幹部頑固對抗社教運動、階級鬥爭嚴重尖銳的具體表現。因此要求每個工作隊碰到這種問題，都必須就地批判消毒，以重振工作隊的威力。此時此刻，縱使有憐惜自殺者的隊員，若不是噤若寒蟬，也許都在加強學習後，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能那樣雅致和溫良恭儉讓而「弄通了思想」，調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階級鬥爭，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一段咒語，它使人們失去理智、失去判斷力，甚至失去同情心。對敵鬥爭，爭先恐後。鬥爭對象

一旦被視為敵對階級，人們就決不能發憐憫惻忍之心。大家寧「左」勿右。這是在所謂革命的名義下形成的一種「人性規律」。對右，避之如瘟疫；對「左」，趨之若鶩。「左」是方法問題，右就不同了，輕則立場不穩定、旗幟不鮮明，重則將被歸入異類。在所謂革命的名義下，革別人命的人可能忽然會變成被革命的人。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階級異己分子、資產階級，只要其中的一頂帽子被戴上，他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社教運動到了1964年下半年，動亂的端倪已經出現，只不過它是有組織，有領導的動亂而已。

第九章
對決

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紛爭，以中國和蘇聯為主角。美國人很早即開始研究，中蘇兩個共產黨大國，是否會永久友好下去？他們之間會不會發生鬥爭和分裂？這個猜想，最終被他們證實了。應該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聰明的。因為，他們看到了中蘇兩黨在歷史、現實、利益、理念、價值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對於一個老式的戰略同盟來說，這種利益和觀念差別，最後導致分歧和關係破裂，幾乎不可避免。中蘇兩黨之間原本掩蓋着的矛盾，在1962年以後終於無所顧忌地爆發出來。兩個黨的領袖，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都是個性強悍的共產黨人。毛澤東作為一個大黨領袖，無論就地位和資歷而言，都高過鐵工出身的赫魯曉夫。而赫魯曉夫在坐穩蘇共領袖位置之後，也愈來愈顯現出試圖主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甚至主宰世界的政治野心來。對於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是不能容忍的。從意識形態爭論到國家關係破裂，中蘇兩黨互相攻訐，試圖證明自己理論觀點的正確和道義原則的公正性。當然，這些爭論至今也未能獲得對錯和輸贏的評判。但是，爭論卻對雙方國內政治的發展產生了持續久遠的影響。特別是中國，為這場爭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從歷史演變看，這場難以避免的爭論和分裂，形成中蘇之間的一次對決。毛和赫（包括赫之後的勃烈日涅夫）都反對妥協。結果，對決從1963年正式開始。

一　引火線

1962年秋，中蘇之間、中共與其他共產黨之間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再次激烈起來。事實上，這年上半年中蘇之爭的間歇只是表面的。兩黨之間的爭論通過相互之間的信函仍在繼續着。只是在公開場合各自保持了某種克制。然而，正是這一時期，中蘇兩黨，或者說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相互激怒的事件頻繁發生。其中突出者有四件大事：一、中國新疆邊民外逃事件；二、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進一步接近；三、蘇聯在中印邊境衝突中的「中立」立場；四、古巴導彈危機及中國對蘇聯的批評。在這些事件的分歧中，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總是糾纏在一起。究竟是由於國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識形態衝突？還是意識形態分歧惡化了國家利益的矛盾？一時很難搞得清楚。

1962年5月16日，赫魯曉夫訪問保加利亞時，在瓦爾納發表講話稱，蘇聯必須全力以赴地與南斯拉夫合作，並以此幫助南斯拉夫加強其社會主義地位。此後，批評南斯拉夫的聲音在蘇聯新聞界銷聲匿跡了。9月24日至10月4日，勃列日涅夫以蘇聯國家元首的身份正式訪問了南斯拉夫。他強調：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魯曉夫瓦爾納講話所規定的原則基礎之上的。蘇共與南共的進一步接近，表明赫魯曉夫在國際共運的論戰中，最終放棄了兩面作戰的策略（即在反對中共「教條主義」的同時，也表明與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劃清界線），決心公開與南斯拉夫站在一起對付中共。在毛澤東看來，這標誌着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已不可回頭。6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朝鮮勞動黨代表時公開斷言：「修正主義不會改了。」

引起毛澤東下這個結論的還有中蘇邊境事件。1962年4月22日至6月，中國新疆伊犁和塔城地區發生了少數民族邊民集體逃亡事件，據說逃往蘇聯境內的邊民達六萬七千餘人。客觀說，造成這個事件的原因，的確與中蘇分歧有關。事件發生後，中蘇雙方為此再度展開了相互指責。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指出這是「蘇聯當局搞顛覆活動」，對蘇聯當局收留越境者提出抗議。4月29日，蘇聯政

府覆照中國政府，指責中國政府沒有採取相應措施阻止大規模越界。8月30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照會蘇聯指出，蘇方「策劃和組織了這次大規模越界」，中國新疆地區處於「蘇聯嚴重的顛覆活動的」威脅之下。中蘇邊界驟然緊張起來。與此同時，一些歐洲國家的黨開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銳地批評中國黨的路線和政策，這更加引起毛澤東的強烈反感。

引起中共強烈不滿的另一件事，是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蘇共及歐洲國家共產黨幾乎都對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正當防衛立場表示不理解甚至批評。這就不只是意識形態之爭，而牽扯到國家主權了。如果說60年代初期有些事端難以避免，那麼中印邊境之戰就是一例。客觀說，中印關係惡化，中印邊境衝突的出現，不是中方造成的，也是中國領導人不願意看到的。無論從毛澤東強調反帝統一戰線還是周恩來為安定四鄰、睦鄰友好週邊而進行的大量工作來說，中國都不希望中印關係陷入僵局。

自從1959年第一次中印邊境衝突以來，周恩來為說服印度尼赫魯坐下來和平協商解決邊界紛爭，付出了許多努力。1960年4月周恩來親赴印度，與尼赫魯進行了七次會談。為了挫敗西方的挑撥和化解周邊國家的疑懼，中國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簽訂了中緬邊界條約，隨後又同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簽訂了邊界條約。以此昭示中國致力於周邊友好的誠意。但唯獨中印邊界僵局無法打破。1960年10月，周恩來與斯諾談話中分析了印度的動機。他說：印度並不想解決邊界問題，他們心裏的真正意圖是想把中國的西藏地區變成一個緩衝地帶。他們不希望西藏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西藏。

1961年，印度軍隊趁中國忙於解決國內困難，先後派兵進入中國軍隊後撤地區，建立了43個據點。直到1962年上半年，中方才發現印軍入侵的情況。中國政府多次交涉，印軍拒不退出。中方由此不得不恢復巡邏，邊境局勢日趨緊張。7月以後，中方三次建議中印雙方舉行邊界談判，又遭印方拒絕。10月12日，尼赫魯反而進行全國總動員，下令「清除」中國軍隊。10月20日，印軍從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發動了進攻。

在國際關係中，由於錯誤判斷形勢而魯莽行事的事例不勝枚舉，尼赫魯也犯了這樣一種錯誤。1963年3月15日，陳毅外長在回答瑞典記者有關中印邊界衝突時說：「這首先是由於中國一再忍讓，印度政府得到一個錯覺，以為中國不會進行反擊，同時，印度政府錯誤地認為中國國內的經濟情況很困難，在國際上很孤立，因此妄圖用武力來迫使中國屈服。」毛澤東對解決中印邊界矛盾的決心下得很晚。直到1962年10月之前，他並不把印度的騷擾看得多麼嚴重。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東南沿海，主要目標是對付美蔣。這時，蔣介石正蠢蠢欲動，要「反攻大陸」。5月29日和31日，毛澤東在上海和杭州兩次召見總參謀長羅瑞卿。他說：「要準備蔣介石集團四十萬人秋後登陸，不要為西面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過去。我們的戰略方向還是東面，這是我們的要害。」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中央軍委一方面從各地向福建集結部隊，先是秘密開進，後來公開活動，目的是讓蔣介石知道大陸已有準備，遲滯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展開政治攻勢，並在外交上確定以美制台的方針。周恩來曾電召中美華沙會談的中方代表王炳南，指示他盡快回華沙，以了解美方的態度。6月23日，王炳南約見美方代表卡伯特，強調指出：中國認為美在蔣背後起作用，蔣的冒險行動要由美國來負完全責任。卡伯特當場表明：美決不會支持蔣進攻大陸，他甚至透露美國願與中國聯合起來制止蔣介石。

美國的台海政策一直非常慎重。台灣海峽局勢再度緊張不能不引起美國關注。此時，美國政府認為，大陸雖有困難，遠未達到蔣介石說「一觸即發」的地步。美國也不相信蔣介石可以一舉「統一中國」。這樣，如果美國捲入其中，勢必陷入與中國的長期戰爭。更何況，肯尼迪政府正在悄悄地研討美國對華政策的某種改變。因此，美國也正急於向中國表明：美既不支持蔣反攻大陸，也不會放棄台灣。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表示，美在台海地區的政策是「和平和防禦性的」，在未獲得美國同意之前，國民黨將不採取「反攻大陸」的行動。經過中、美、蔣三方的幕後活動，各自都摸到了對方的底。美國不支持，大陸有準備，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冒險行動胎死腹中。

然而，尼赫魯卻仍然抱着強硬態度。他有些有恃無恐，非要對北進政策訴諸行動。10月12日，當尼赫魯實行全國總動員，揚言要把中國軍隊清除掉時，毛澤東最後下決心要打一仗。10月20日，中國軍隊進行了大規模自衛反擊作戰。印軍根本沒有料到中國會大規模反擊。一交手，印軍就毫無鬥志，潰不成軍。兩次反擊，第一次俘虜九百多名印軍，第二次俘虜更多。而印軍宣布，他們連一個中國俘虜也沒有抓到。中國很快收復了印軍越過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以北的中國地區，並且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正當國際社會為中印邊界衝突鬧得沸沸揚揚，周邊國家憂心忡忡之時，11月21日，周恩來突然單方面宣布全線停火，並分階段從1959年「實際控制線」後撤二十公里。這一宣布引起世界輿論巨大轟動。它表明中國並不想與印度大打，只是為了維持國家主權恢復邊境平靜。中國政府處理中印邊界衝突是有理有節的。

然而，中印邊境衝突對於毛澤東的形勢判斷，對於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卻起了不小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不僅隨時準備與中國決裂，而且有與美、印聯手對付中國的戰略意圖，所謂「三尼一鐵公司」聯合反華的說法在黨內流行起來。所謂「三尼一鐵」即指美國的肯尼迪、印度的尼赫魯、蘇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南斯拉夫的鐵托。所以中印自衛反擊戰被賦予反對帝、修、反的三重意義。

認為美、蘇兩國都有利用中印邊境衝突的意圖，不是沒有根據的。正當中印交戰之時，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中心代理主任托馬斯·休斯敦給總統肯尼迪的報告，道出了美國的戰略意圖：……邊界的持續衝突實際上對美國有利，它將使我們在解決印度——巴基斯坦問題時發揮影響，使中國的入侵處於一種最不利的環境，使我們贏得印度的支持，使國際政治歷史發展方向得到重新確立，並使蘇聯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而蘇聯不僅繼續奉行所謂「中立」立場，事實上早就有意識地利用這一事態，加緊了對印度的拉攏，逐步與印度建立了軍事關係。1961年4月，蘇聯賣給印度八架軍用運輸機，接着又提供了能爬高一萬七千米的直升機。1962年夏，蘇聯又與印度簽署協

定，向印度提供米格戰鬥機和特許在印度建立一座製造這種飛機的工廠。同時，蘇聯增加了對印度的經濟援助。蘇聯人辯解說，蘇聯供給印度飛機對中印邊境事件不會產生影響，但尼赫魯所以有恃無恐，很大程度上就是摸到了美、蘇的態度，並且有了這批蘇聯的飛機。

中國邊防軍很快發現印度在使用這批飛機。10月8日，周恩來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通報了中印邊境形勢，指出印軍可能發動一場大規模進攻，中國將「堅決自衛」。在這次談話中，周同時提到：「他們（印度）利用了蘇製米式直升機在西段和東段進行空投，運送軍需，有時還用蘇製運輸機，印度使用蘇製飛機進行挑釁，對我們前方戰士有影響。」這裏，周恩來只是通報了情況，並未表現出如1960年蘇聯撤退專家時的那種憤慨。而且說：「我們只是通知，對蘇方沒有任何要求。」這正好反映中蘇分歧已經太深，中國對蘇聯已不抱幻想，因而也無所謂「要求」。然而，這件事肯定強化了中國領導人對蘇聯領導人的惡感。10月21日，周恩來訪問朝鮮，在平壤同金日成談話時又提到這件事說：我們的「戰士們看到蘇聯造的飛機非常生氣」。

古巴導彈危機成了中蘇重開論戰的導火線。在中印邊界衝突之時，蘇美之間也正陷入一場空前危險的核對峙之中。1962年7月至9月，蘇聯向古巴派去了一百艘艦船，秘密地將中程導彈和可載核彈的「伊爾28」轟炸機運進了古巴。然而紙裹包不住火，蘇聯的秘密行動很快被美國的U2偵察機發現，美國肯尼迪政府立即作出強烈反應：封鎖古巴海域迫蘇撤退。由此，引發了戰後以來美蘇之間最嚴重的核軍事對峙，世界差點被拖進一場真正的核戰爭。兩個核大國「眼珠對眼珠地瞪了一下」。但在最後時刻，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在巨大的核恐懼面前妥協了。蘇聯同意從古巴撤走導彈核武器，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並相應從希臘和土耳其撤走核武器。

對於古巴抵禦美國入侵的鬥爭，中國在道義上給予了堅決支持。但對赫魯曉夫導演的這場危險的鬧劇，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以冒險主義開始，以投降主義結束。以犧牲古巴主權利益為代價謀求與美國的妥協。中國批評赫魯曉夫以冒險主義開

始，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美國的鼻子底下部署導彈、核武器，其後果是應該估計到的。赫魯曉夫當時和後來始終說是為了保衛古巴。這話並不可信。赫魯曉夫的一位高級顧問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透露：「古巴領導人從未提出過在島上部署帶核彈頭的火箭問題。他們深知，部署這種火箭對古巴人民來說具有極大的冒險性。」「他們堅信，他們同意部署火箭，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鞏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

赫魯曉夫設想把導彈部署到古巴去，是他在對保加利亞的訪問中提出的。當赫魯曉夫同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黑海邊交談時，馬告訴赫說：黑海「對岸的土耳其有美國一個火箭核基地。從這個基地發射出來的火箭，可以在六至七分鐘之內摧毀位於我國南部的烏蘭和俄羅斯的一些大中城市」。赫魯曉夫當時反應強烈地說，「為甚麼蘇聯無權做美國做的事情呢？為甚麼不能，比方說，把我們的火箭部署到古巴去？」一個冒險計劃從此萌生。不過，赫魯曉夫從來沒有想過要與美國打一場核戰爭。他的這一行動只是要展示一下蘇聯的威力，希望美國承認蘇聯的核大國對等地位，改變蘇美之間力量的戰略平衡。

自1959年以來，赫魯曉夫一直在尋求與美國的平等地位，謀求大國協商主宰世界事務的格局。具體的戰略目標是希望蘇美法英達成協議，永久確定戰後雅爾塔體制劃定的歐洲邊界，承認兩個德國的合法性。然而，使赫魯曉夫十分惱火的是，美國似乎無視蘇聯的對等實力地位，拒不承認歐洲邊界和德國「一分為二」。對此，赫早就想顯示一下蘇聯的威力。1961年赫以建立柏林牆相威脅，沒有成功，隨後，蘇聯宣布恢復核試驗，並且連續生產出當量上億噸甚至幾億噸的巨型原子彈，引發了美蘇之間新一輪核競賽。古巴導彈危機不過是這場核競賽的一個惡果。事實上，古巴導彈危機成了美蘇之間走向某種緩和的契機，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意志力的較量，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看到，在原子時代，玩弄核遊戲等於自取滅亡。這種相同的恐懼感使他們很快從過去的死敵變成夥伴。1963年1月5日，赫魯曉夫放棄單獨同東德締結和約的打算，使德國和柏林危機宣告結束。同年6月，白宮和克里姆林宮之間建立了總統「熱線」，使兩國領導人可

以在必要時絕對保密地直接進行磋商。7月2日，美、英、蘇在莫斯科簽定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赫魯曉夫希望得到的美蘇對等地位和共管核武器的目的，在一定意義上達到了。

可是，美蘇古巴導彈危機以及之後形成的美蘇緩和，卻成了蘇聯及其影響下的各國共產黨與中共重開論戰的導火線。正當美蘇對峙並尋求妥協之時，中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10月25日，中國政府發表支持古巴反對美國戰爭挑釁的聲明。10月27日，美蘇就古巴導彈問題達成妥協。10月28日，北京舉行了有一萬多人參加的支持古巴反對美帝國主義戰爭挑釁大會，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和國元帥和將軍們都參加大會。大會發出致卡斯特羅的電文。電文說：偉大的古巴革命是壓不下去的，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團結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可靠的力量，它是任何武器都摧毀不了的。電文還說：「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永遠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實的戰友，永遠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難。」11月1日，陳毅外長覆照古巴駐華大使佩德羅蘇，支持卡斯特羅的五項聲明，指出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是虛偽的，麻痺古巴人民鬥志的「兩手策略」，並且指出「古巴的命運掌握在古巴人民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國家手中」，「古巴的獨立和主權決不能談判，古巴的自由和權利決不能拿來交易」。

中國的這些輿論，既是反美的，也是針對蘇聯的「投降主義」的。從當時的情況看，中國批評「投降主義」，並不是想阻撓蘇聯從古巴撤退導彈。中國認為蘇聯以犧牲古巴革命和主權利益為代價，與美國討價還價，出賣世界革命，謀求美蘇共管。在當時中共領導人的理念中，雖並不否定核戰爭的破壞性後果，但並不相信核戰爭真的會打起來，反對渲染核恐怖而懼怕革命。中國的批評再次激怒赫魯曉夫。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回憶當時赫魯曉夫被激怒的情形說：「可以看得出，他們（中國）的批評深深觸動了他的心。他惱火、委屈、氣憤。他覺得，對所發生的事情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的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他覺得，毛澤東再次表現出

想把蘇美推向決死一鬥，而自己卻站在一旁，正像中國諺語所說的，坐山觀虎鬥，這是非常危險的。」

中國的強硬反映和批評，也引發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一致指責。當時，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國家，美蘇核競賽和核對峙的恐怖陰雲，構成了人們嚴重的心理擔憂和恐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雖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顛覆行為，但都不願看到真正具有威脅的核對抗。因此，人們對美蘇妥協和緩和抱有特別的期望。他們慶幸世界免於一場核災難。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們對中國的反應極不理解，幾乎都持批評態度，似乎挑起這場危機的不是赫魯曉夫和肯尼迪而是毛澤東。對於這一點，當時中國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似乎並不真正理解。

恰在此時，歐洲五黨先後召開了黨代表大會。無例外地，五黨都在會上攻擊了中共，從而形成了所謂「反華大合唱」，引發了中蘇之間正式的公開論戰。

1962年底，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等五國共產黨召開黨代表大會。與以往一樣，各國的黨代會都邀請世界各國黨派代表參加，這次與會的有六十餘個黨的代表，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沒有被邀請，而南斯拉夫的代表卻重新回到「大家庭」。這明顯反映出社會主義陣營「分化和改組」的跡象。中共中央應邀派出代表赴會。參加保、匈、捷三黨會議由伍修權帶隊，參加意大利黨代會由趙毅敏（另一位中聯部副部長）帶隊。

11月5日至14日舉行的保加利亞黨代會上，日夫科夫的講話直接譴責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在六十四個與會黨代表中批評阿黨的有二十個。到11月20日至24日舉行的匈牙利黨代會上，譴責阿爾巴尼亞的國家代表增加到三十個。卡達爾的報告、庫西寧（蘇共領導人）的致詞和各國代表的發言中，都有意影射攻擊中共，還有六個外國代表指名批評中共。墨西哥代表言詞最為尖銳，他說：「中國同志和阿爾巴尼亞同志歪曲了馬列主義原則，偽造歷史事實，企圖以此來證實自己的保衛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立場和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政策。」在中共看來，這些言論和行為，不過是蘇共指揮下有計劃地

對中共的圍攻，「是修正主義者發動反華運動的一個新步驟」。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伍修權，「抓住禍首，進行回擊」，對於僕從國不予糾纏，同時指出蘇阿關係惡化的責任在蘇共，揭露反華大合唱，抓團結和召開兄弟黨會議的旗幟。11月24日，伍修權遵照指示，利用閉幕酒會的機會，發表講話，回擊了大會上對阿黨的譴責和對中共的影射攻擊。不過這次會議，中共與蘇共還沒有完全撕破面子，雙方都沒有點對方的名。

然而，在12月2日至8日舉行的意大利黨代會上，分歧完全公開了。11月30日，趙毅敏率團抵達羅馬。當晚，意共領導人巴葉塔兄弟向趙提出：大會將公開討論某些分歧問題，會直接涉及與中國的分歧；大會未邀請阿爾巴尼亞，但邀請了南斯拉夫。趙當即表示反對，特別是對公開分歧的事，請他們慎重考慮。巴葉塔兄弟報告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陶仍堅持原意。他的理由是，意共黨員和群眾都關心分歧問題，意共領導需要公開說明自己的立場。陶並說：「有禮貌地表示與中國不同意見，不是批評，更談不上攻擊。」他說：「像我們這樣的一個黨不需要指桑罵槐。」12月2日，陶里亞蒂在開幕會上的總報告中，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中共和毛澤東的主要觀點。他強調說：「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核戰爭將意味着文明的毀滅，是「人類的自殺」。他呼籲「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避免戰爭」。他批評毛澤東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觀點，強調說：「肯定說帝國主義是一隻簡單的紙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錯誤的」。他稱讚古巴危機期間蘇聯的政策是捍衛了古巴的獨立，批評中印武裝衝突是「沒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對阿爾巴尼亞的「誣衊和攻擊行徑」和中共與阿黨「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團結」表示痛惜。他還警告中共代表團：「當你們說資本主義已經在南斯拉夫復辟時，大家卻知道這不是真的——就沒有人相信你說的其餘一切了。」他主張，通過「和平共處」，「革新全世界的結構」，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和創立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他認為「和平過渡」已經「成為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戰略原則」。陶的這些話，完全同中共平時闡述的觀點相對立。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三十三個黨的代表，其中反阿又反華的有十五個，反阿但不反華的有六個。再次形成了對中共和阿共的圍攻的態勢。趙毅敏等中共代表在會議上表現出很強硬的政治態度，頑強地頂住了壓力。陶里亞蒂報告指名批評中共時，代表團「採取不起立，不鼓掌，不理睬的辦法，表示異議」。在陶談到蘇聯關於古巴危機期間的政策時，全場起立鼓掌，「唯有我們安坐不動，引起全場震動」（趙毅敏語）。12月4日，趙毅敏向大會致詞，進行反批評。會場上發出噓聲。趙發言後，西共領導人伊巴露麗上台發言。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名女領導人在講台上揮舞着拳頭，大聲喊叫。次日，巴葉塔作專題發言，再次批評中共。蘇共代表此時隱在幕後，發言並不顯山露水。《米蘭晚郵報》評論說：「中國代表們在會場上所有眼光注視下顯得那麼倔強。」

這種情形同時在捷共黨代會上發生。捷共和其他黨的代表在會議之中給中共戴了五頂帽子：「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民族主義」和「教條主義」，指責中國在古巴問題上反對「明智的妥協」，要把全世界「拖入熱核戰爭」；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闖禍。伍修權參加了12月4日至8日的捷黨會議。會議最後一天，他在大會發言中回擊了對中共的指責，並向大會提交了一封信。該信建議召開「一次所有共產主義政黨協商會議」，來討論各黨之間的分歧。特別惡劣的是，在東德統一社會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親自出馬指名攻擊中國。[1]

12月12日，赫魯曉夫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對外政策的講話，為他的古巴危機期間的政策進行辯護。講話依然是明批阿爾巴尼亞，暗指中共。他說：「在古巴衝突的和平調停期間，大家可以聽到那些自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人們不滿的尖厲聲音。」他在評價中印邊境衝突時，再一次明白地偏袒印度。他說：我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國打仗。中國單方面停火、後撤，當然很好，但是，中國部

1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505。

隊當時不從原有陣地前進，豈不更好？這個暗示是明顯的，即中印邊境戰爭是由中國挑起的。他公開地為南斯拉夫辯護，並且指出「正是那些採取了和正在採取教條主義立場的人們出現了主要危險」。

二 反擊

面對五國黨代表大會上出現的情況，毛澤東決定反擊。

一方面，這些外國共產黨攻擊中國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干涉了中國內政，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五黨會上的對中共的攻擊，牽涉到一系列理論意識形態問題，也使毛澤東的國際「反修」找到了突破口。還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其中就包括着要看到國際修正主義對國內的影響。毛澤東對於在中蘇分歧中採取忍讓策略早已不滿。他認定對國際修正主義如果不展開反擊，不僅會使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入歧途，而且也會使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發生錯誤的演變，助長「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其結果是很難保證中國不出修正主義。而在國際鬥爭中又把反帝、反修和反對各國反動派的鬥爭相聯繫，利用中印邊境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兩個事件同時揭露「現代修正主義」真面目，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必要行動。這次五國黨會上的爭論，尤其是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直接指名批評中共，使毛澤東感到：再也不能忍讓，必須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地進行反擊。他在接見日共中央領導人時明確表示：陶里亞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開攻擊我們，我們就不好公開回答。現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澤東是以睥睨的目光看待各國共產黨的「反華大合唱」和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的。當他認定必須進行反擊的戰略原則時，他是具有無比氣魄的革命鬥士。對於是否會樹敵太多，是否會被孤立的問題，毛澤東認為，表面看，在一個時期，我們在形式上是少數，但實際上是多數。只要路線正確，是不會被人打倒的，就會勝利。對於打

擊的目標，毛澤東說過：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杭州度過他六十九歲生日。這一天，他豪情勃發，思緒萬千。寫下了《七律．冬雲》：「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其反修旨趣、鬥士風格，統由詩來言出志向。1963年1月9日，毛澤東又書贈周恩來《滿江紅》詞，用意更為直白：

>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欲學鯤鵬無大翼，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千萬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澤東已經發出戰鬥的響箭。他渴望革命精神翻江倒海，「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劉曉（駐蘇大使）、伍修權、趙毅敏回國後，毛澤東把他們叫去杭州匯報情況。聽完匯報，毛澤東對前方「戰士」給予了鼓勵和慰問。緊跟毛澤東、高舉「反修」大旗的康生，在此前後也以伍修權和趙毅敏出國遭遇為題材，寫出幾句打油詩來，其中有這樣兩句：「伍泰然四闖惡狗村，趙再見獨戰騾馬國。」後來伍修權解釋說：「『惡狗村』是誣指我剛去的東歐四國，『趙再見』是因為『趙』是意大利語『再見』的意思，『騾馬』則是意係羅馬的諧音。」毛澤東的反修詩與康生的打油詩，反映出當時黨內「世人皆修我獨馬」，欲挽狂瀾於既倒捨我其誰的普遍心態。「反修」大旗一樹，全黨立即緊張起來，國內政策分歧暫時置於腦後，大家都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同仇敵愾，一致對外。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寫作小組，以「參加過莫斯科八十一黨會議、起草過給蘇共《答覆書》的秀才們組成一個班子，收集1960年莫斯科

會議以後，特別是蘇共『二十二大』以後，蘇聯在正式的或者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違反八十一黨會議聲明的材料，特別是收集攻擊阿爾巴尼亞黨和不點名攻擊我黨的材料。還要聯絡部、外交部、新華社和調查部也專門成立一個班子，來收集這方面的材料」。[2] 寫作班子集中於釣魚台國賓館，首先「負責對五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情況先行研究、分析，然後提出對策，並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起草有關的致辭、聲明和評論」。[3] 中央書記處直接負責寫作班子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就每篇重要文稿的寫作都要召開會議，進行專題討論。毛澤東在外地或在北京，親自掌握寫作情況，審閱批改文稿。1963年2月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後，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決定寫作小組的命名：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組員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等，此外還有若干「秀才」：許立群、姚臻、喬冠華、王力、范若愚、胡繩和熊復。陳伯達為非正式的「機動」組員。可以說，這些人都是一時之秀。

同「國際修正主義」展開論戰的響箭，已經搭在弦上。

1962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的社論，答覆了赫魯曉夫12月12日講話。社論標題是毛澤東親自修改的，原題為「堅持真理、分清是非，團結對敵」。毛當時在武漢。他在文稿上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閱。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4] 社論批評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攻擊另一個黨的錯誤做法，只能加深分歧、製造分裂，為親者痛、仇者快。文章指出，這種「惡劣的表現」，起源於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蘇聯的地方）。文章在回答外國黨對毛澤東的「帝國主義是紙老虎」觀點的批評時，堅決主張共產黨人應「在戰略上蔑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同時不指名地批評了赫魯曉夫的「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文章說：「我們既沒有要求把核武

2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493－494。
3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506－507。
4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515。

器運進古巴，也沒有阻撓把所謂的進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對我們來說，根本說不上甚麼『冒險主義』，更說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熱核戰爭』。」這篇社論的發表，標誌着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經過保、匈、捷等黨的代表大會對中共和阿黨進行「圍剿」之後，中共發起的正式反擊。

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這篇社論是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的。劉少奇認為，陶里亞蒂在他們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稍有理論色彩，應該有一篇社論給予回答。[5]社論重複了上述許多論點，批評了陶里亞蒂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點。關於古巴危機，文章指出，中共從不主張玩弄核武器，從不認為避免核戰爭是「慕尼黑」，但堅決反對「用犧牲別國主權的辦法，去換取帝國主義的妥協」。

1963年第一期《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社論指出，列寧主義「目前空前厲害地遭受現代的修正主義者的攻擊、歪曲和糟蹋」。現代修正主義者竭力掩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矛盾，把後者描寫成「和平的」、「民主的」、「超帝國主義」；在爭取世界和平、爭取和平共處問題上把列寧主義庸俗化到極點；以反對教條主義為藉口攻擊馬列主義；故意散布謊言，不許被壓迫人民和民族進行革命，「只要能夠渾渾噩噩、糊裏糊塗地活下去就行」。社論指出：「修正主義是麻痹人民的鴉片，是安慰奴隸的靡靡之音。」當前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這篇社論也是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他認為文章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毛澤東還特地規定，社論「可以於今日下午廣播，明日見報」。[6]

1963年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知，通知正式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應充分利用有利形勢，在國際共運中爭取左派和中間狀態的同志，對於右

5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517。

6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517。

派分子的挑釁，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不予糾纏」，而是同他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絕不退讓。

1月11日，彭真向黨外人士作反修報告，回答了大家對中蘇會不會分裂的疑慮。他在報告中說：要準備對付修正主義者的一切挑釁和進攻，包括準備對付分裂。他闡明了中蘇分歧的根本點在於：(1)革命不革命？(2)反帝不反帝？關鍵是反美不反美？(3)對民族解放運動是不是真正支持？(4)維護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戰爭，是依靠美帝頭子的明智和兩大國首腦的明智，還是依靠四種力量的聯合鬥爭？(5)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是不是和平共處？(6)兄弟國家、兄弟黨的關係是父子關係，還是獨立、平等的兄弟關係？1月29日，中央轉發了彭真的報告。中共中央的通知和彭真的報告，表明中共已做好了中蘇分裂的最後最壞準備。

蘇聯和歐洲各黨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反駁中共。1月7日，蘇聯《真理報》發表長達萬言的文章，再次批判「紙老虎」的觀點，譴責阿爾巴尼亞，為蘇南關係和好作辯護。1月15日至21日，在東德黨代會上，氣氛惡化到了極點，赫魯曉夫親自赴會並作了長篇發言，他的發言第一次指名批評中國，並且呼籲「停止共產黨之間的攻擊」，起了動員作用。中共代表伍修權在大會發言，歡迎停止相互攻擊的建議，建議早日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然而，與會的各國代表失去了耐心和理智，伍修權的講話不斷地被「呸」聲所淹沒。當提到蘇方時，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子、吹口哨、跺地板，一片混亂，企圖打斷伍修權的發言。大會執行主席一再阻止伍繼續致詞。伍致詞後，大會執行主席竟然提出抗議，表示「最堅決地拒絕」中共代表對南斯拉夫的批判。伍只得硬着頭皮頂住。他後來回憶說：「我當時心裏雖然不免尷尬，表面上卻還鎮靜，我想自己正代表着一個偉大的黨，執行着自己領袖的指示，作為一個客人來到這裏，主人不能也不應該對我無禮，就像毛主席詩中說『我自巋然不動』地硬着頭皮頂住了。有的記者形容我當時能『泰然自若』，因而稱我為『伍泰然』。」

經過歐洲黨的幾次會議，國際共產主義大論戰的陣線也趨於分明：一方是蘇聯影響下的歐美各主要政黨的聯合陣線，一方是中共的

孤軍作戰。阿爾巴尼亞成為中共的「戰友」。意共、法共、美共等四十多個黨當時紛紛發表決議、聲明和文章譴責中共，尤其是譴責中共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強硬立場。1月9日美國共產黨的聲明，指責中共實行的是「導致熱核戰爭的政策」，甚至說中共假左派的路線同最冒險的美帝國主義者路線相吻合。

針對上述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實行回擊，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着重回答了在東德黨代會上對中共代表的圍攻。從2月20日起，《人民日報》全文刊載赫魯曉夫兩篇講話以及蘇共、法共、意共攻擊中共的材料，準備逐一加以批駁。這時中共有意在策略上留了一手，避免點蘇共領導的名，而以意共、法共等領導人為批評對象。

三　破裂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中，赫魯曉夫掌握着多數黨，處於有利地位。他開始的策略是，讓其他「兄弟黨」領導人撕破臉皮，自己避免直接點中共領導的名，以「指桑罵槐」為能事。在造成圍攻中共態勢時，卻又呼籲停止公開論戰。2月21日，中共中央突然收到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表達對「正在動搖兄弟黨的團結的公開的持久的激烈爭論」的關心，建議停止公開論戰，召開中蘇兩黨會議，為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作準備。

這時，一些處於反帝鬥爭前線的黨對國際共運論戰憂心忡忡。尤其是越共領導人，他們亟需中蘇兩國的共同支援。在以往的爭論中，越共雖有不同觀點，但總是傾向於中共一邊。現在也開始猶豫起來。胡志明與諾沃提尼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停止爭論，加強團結。胡還在中蘇之間進行調解，這使中共領導人十分不滿，認為他們「不分是非，只講團結，不講原則」，但是認為越共對中國基本上是友好的，反帝是堅決的，因此以團結為主，並作「善意的」批評。

2月23日，毛澤東接見蘇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他告訴對方：赫魯曉夫一面說要停止公開論戰，一面自己又公開批評中國黨。最近你們批評中國黨的文章有四篇，赫魯曉夫本人的就有兩篇。我們從20日起登你們的這些文章，今天登完。對於所有這些批評，我們都得回答，有來有往，你們可以罵人，我們也可以回罵。現在已經有幾十個黨公開指名攻擊我們了。毛澤東說：你們說我們是教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專講空話、假革命、民族主義，你們放手批評好了。契大使說：這樣下去不得了。毛澤東說：現在不過是打筆墨官司，是所謂意識形態鬥爭，有甚麼了不起？第一，天不會塌下來；第二，山上草木照樣長；第三，女人照樣生孩子；第四，河裏的魚照樣游。時間過去了兩年，毛澤東同契大使再談話，已經不那樣和緩熱情了。

開弓沒有回頭箭。在正式答覆蘇共之前，中共加強了論戰的攻勢。中共中央決定，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再發表若干文章。2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1963年《紅旗》雜誌第三、四期連載長篇評論〈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國內各大報刊加以轉載。該文在《人民日報》從3月1日至4日連載四天。隨即出版了單行本。這篇文章洋洋十萬餘言，是論戰中的一顆重磅炮彈。文章闡述了中共與「現代修正主義者」之間存在的主要原則分歧。文章嘲笑蘇共領導人害怕在蘇聯報刊上發表中國的文章和干擾中國的電台廣播，批判陶里亞蒂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尤其批判他是「議會迷」。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評美國共產黨聲明〉。〈答多列士〉一文綜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目的在回答那些指責中共是分歧的「罪魁」、「禍首」的黨。之所以指名多列士，是因為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中，談論分歧最多、攻擊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等黨最惡毒的就是法國共產黨的多列士。[7]之後，3月9日，中共中央覆信蘇共中

---

7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525。

央，重申1962年4月7日信中提出的建議，表示歡迎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建議，為創造良好氣氛，中共暫停公開答辯，但保留對公開攻擊答覆的權利。之所以表採取這樣的態度，是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給赫魯曉夫和蘇共留有餘地的方針。至此，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國共產黨一共發表了七篇文章。而在每一篇文章發表前，都用很大篇幅來刊登對方的反華言論。充分表明了中共對論戰的自信。[8]

3月30日，蘇共中央再次致函中共中央，表示蘇共有許多理由答覆中共的攻擊，但不願中蘇論戰讓敵人感到高興。語調似乎很和緩，但信中系統地闡述了國際共運總路線問題，並為中蘇會談規定了五點討論範圍。有先聲奪人，為會談定基調之意。在這次信函中，蘇共中央還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這是蘇聯最後一次向毛澤東發出邀請。當然，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是不會去蘇聯的。4月2日，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召見蘇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對此答覆說：毛澤東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蘇會談。

中共領導人認為，蘇共領導人的一個重要意圖，是要把蘇共二十二大綱領當成國際共產黨人的共同綱領。為了不讓蘇共乘機封住中共的口，必須在兩黨會談之前對蘇共綱領亮明自己的觀點。4月4日，中共中央將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全文發表，同時組織起草答覆文件。先由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一份關於對蘇共綱領的意見《備忘錄》，因為份量還嫌不足，未發出。4月17日，毛澤東讓秘書林克通知鄧小平、康生、陸定一、陳伯達去杭州，「討論對蘇覆信」問題，隨後組織人馬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作為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來信的答覆。文件起草之始，毛澤東就確定了兩個方針：一是要公開發表，二是要鋒芒畢露。文件起草過程中，分別向在京的和路過北京的兄弟黨有關人士徵求意見，爭取支持。5月22日，毛澤東同專程赴杭州的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思談話，系統地介紹了中蘇分歧的由來，表示要採取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的方針。

8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530－531。

經雙方多次交涉，中蘇兩黨會談定於1963年7月6日至20日在莫斯科舉行。然而，會談還未舉行，論爭的氣氛已經升級。6月14日，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發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覆信（簡稱〈二十五條〉），並於6月17日公開發表，這份由毛澤東親自定題定稿的覆信，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駁斥了蘇共的觀點。文件指出，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只能根據1957年和1960年共同簽署的〈宣言〉和〈聲明〉所規定的革命原則，而不能根據別的其他甚麼東西，而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概括起來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也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中共中央並通知蘇共中央，中方將派出以鄧小平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進行雙邊會談。〈二十五條〉的發表實際上使中蘇論爭達到了又一高峰。赫魯曉夫為此惱羞成怒。他在6月18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嚴辭抨擊中共中央使中蘇分歧「尖銳化到極點」，並且斷然拒絕接受中方的建議。當天，蘇共中央發表聲明，指責中共中央6月14日的覆信「歪曲了莫斯科宣言和聲明」。6月21日，發表蘇共中央全會就即將舉行的中蘇兩黨會談作出的決議：「責成蘇共中央主席團在即將舉行的同中共中央代表的會談中」，「堅定地執行」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線，並「斷然拒絕中共中央對我黨和其他共產黨，對蘇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對……蘇共領導的攻擊。」

7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名單，並指出蘇共對中共6月14日的信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但表示：「鑑於中蘇兩黨會談即將舉行，中共中央對於蘇共中央和蘇共領導人對我黨的攻擊，暫時不作答覆，但是保留答覆的權利。」7月4日，蘇共中央發表聲明，公布參加會談的蘇共代表團成員名單。並對中共中央7月

1日聲明進行反擊。7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發聲明，表示「不能同意蘇共中央在(7月4日)聲明中對中共7月1日聲明的歪曲指責和攻擊。」「責成代表團在(中蘇兩黨)會談中對蘇共中央的歪曲、指責和攻擊給予必要的評論。」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蘇聯驅逐中國使館工作人員和留學生的事件。毛澤東對中蘇論戰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他總是在自己的報刊上全文公布對方的批評文章和雙方來往信件，盡可能把爭論公開化，以教育人民。但蘇共對中共的文章不予轉載。於是自年初以來，中方利用駐外使館和新華社駐外分社開始向各駐在國散發材料，爭取支持力量。中共中央6月14日信發表後，蘇共以公開發表會導致論戰激化為由，拒絕在蘇聯發表。中共認為這是封鎖，是有意向蘇聯人民「隱瞞」中共觀點。於是通過駐蘇使館人員和留學生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散發6月14日覆信的俄文版，引起衝突。6月27日，蘇聯外交部照會中國使館，宣布三名使館工作人員和兩名留學生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回國。6月30日，被驅逐人員抵達北京，機場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7月7日，北京召開大會，支持我方人員的行動。7月9日，蘇共中央為此發表聲明，指責中國領導人這種行為會給蘇中友誼帶來危險。7月10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予以反駁，說「這是一種正常的對等的活動」。因為蘇聯駐華人員也在中國散發過蘇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蘇聯「採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態度，是不能達到真正團結的。」

這一連串的聲明和反聲明，駁斥與反駁斥，表明雙方已經毫無縮小分歧的打算。據中方統計，在蘇共中央全會後不長時間，僅蘇聯境內發表的指責攻擊中國黨的文章和材料就有三百篇之多，其他黨的攻擊文章還不在其內。雙方都要在會談之前造成先聲奪人之勢。中蘇兩黨會談就在這種氣氛中開場。

1963年7月5日，鄧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成員有康生、楊尚昆、劉寧一、伍修權、馮自力（駐蘇大使），顧問為吳冷西、范若愚、張香山、姚溱、王力、余湛。蘇共代表團團長仍是蘇斯洛夫，團員有格里申、安德羅波夫、伊利切夫、波諾馬廖夫、薩丘

科夫、契爾沃年科。會談從7月6日開始，一直持續到20日。一共舉行了九次會議。

這是一次被稱之為「聾子對話」的獨特的會談。會議之始，根據蘇斯洛夫的建議，就會議開法，達成五點協議，規定兩團交替發言，對方發言時不要打斷，會議結束前，雙方不發表任何關於會談消息。

一場各自陳詞、相互辯駁的會談開始了。其日程開列如下：第一次（7月6日），蘇斯洛夫發言。第二次（7月8日），鄧小平發言。第三次（7月10日），蘇斯洛夫發言。第四次（7月12日），鄧小平發言。第五次（7月13日），波諾馬廖夫發言。第六次（7月15日），彭真發言。第七次（7月17日），安德羅波夫發言。第八次（7月19日），康生發言。第九次（7月20日），蘇斯洛夫發言，鄧小平發言。引述中蘇雙方各次發言的內容，會不勝其煩。無非是各自陳述自己已經多次公開表明的觀點，批駁對方的觀點。值得說明的是，中方的行動一切都在毛澤東的指揮之下。代表團每天及時將會談情況和內容報告北京，中央向毛澤東報告請示後，又立即給代表團發來指示。所以，會外反而比會內忙。

開始，這種「聾子對話」式的會談還能持續，然而，會談期間，蘇共中央按捺不住了，違背了雙方達成的會談結束前不發布會談消息的協議，於7月14日公開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關於這封〈公開信〉，當年的起草人費·布爾拉茨基回憶說：「在列寧山的會議廳裏舉行會談期間，蘇斯洛夫跟蘇聯其他領導人召集我們開會。他說必須趕快在一天之內準備好一份表明蘇共同中國領導人爭論的立場的文件，並當場把這稱為〈公開信〉。然而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蘇斯洛夫當時說『給他們出其不意的打擊』時的臉部表情，他同時發出甜而又甜、輕而又輕的笑聲……但第二天他又提出懷疑：當會議還沒有結束時該不該就這樣做？後來我明白了，這是蘇斯洛夫個人特有的作風。」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對中共中央〈二十五條〉建議信進行了全面反駁和回擊。這就使開始那種各說各的「聾子對話」也對不下去了。在第八次會談中，康生發言嚴厲批評蘇共歪曲和攻擊中共代表團

的立場，並且破壞了君子協定，單方面發布消息。他十分激烈地批判了蘇共否定斯大林和「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路線。康生發言後，蘇斯洛夫立即提出「堅決抗議」。他說：「抗議你們對我們黨的領導、對赫魯曉夫同志，對我黨幾次代表大會決議的歪曲、捏造和誹謗」，聲稱「中共領導要對這一切行為承擔全部責任」。鄧小平接着發言說，「你提甚麼抗議」，「如果說要抗議的話，我們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議」。

會談進行不下去了。根據北京的指示，鄧小平建議，這次會談暫告一段落，雙方可以在另一時間繼續舉行會議，時間和地點由兩黨中央另行商定。7月20日，第九次會議討論會談公報。蘇斯洛夫說：蘇共曾準備繼續會談，但因中國同志建議暫停，蘇共願意響應。他為蘇共〈公開信〉辯護說，發表的原因是因為中共沒有接受停止論戰的建議。他再次提出建議停止論戰。鄧小平發言說，我黨歷來主張不把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在平等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蘇共〈公開信〉，蘇共和其他黨對我黨進行了大量的攻擊，我們還沒有回答。他說，待作了必要的答覆之後，看你們是否言行一致，再來討論停止公開論戰的問題。會議毫無結果，唯一達成的協議是另擇時間繼續會談，僅是沒有把路完全堵死而已。當天下午，蘇共中央主席團宴請中共代表團。宴會上，鄧小平重申邀請蘇共代表團到北京舉行會談的希望。赫魯曉夫表示願意接受這個邀請，下次會談時派代表團去北京。當晚，中共代表團乘專機回國。

鄧小平啟程回國時，毛澤東特電代表團成員分乘兩架飛機，以防不測。這時，中共對蘇聯的戒備已非常深了。7月21日下午，鄧小平一行回到北京時，毛澤東偕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幾乎所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親赴西郊機場，歡迎凱旋歸來的「反修戰士」。建國後，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出國代表團歸來，只有少數幾次。可記及的是1960年劉少奇訪蘇歸來、1961年周恩來參

加蘇共二十二大後歸國以及這一次鄧小平率團參加兩黨會談後歸來。[9]機場上聚集了五千多人的歡迎隊伍，還有各國使節和國際友人等。整個機場被鑼鼓聲和「反修」口號所震動。代表團走下舷梯時，毛澤東領頭迎上前去，與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問好，並有少先隊員獻上鮮花。在全體合影留念後，代表團繞場一圈，全場發出一片雷鳴般的歡呼聲和掌聲。中外記者將這一盛大場面攝入了鏡頭。第二天首都各大報刊都對歡迎場面進行了突出報導。伍修權作為當事人之一，後來在回憶中感慨良多。他說：「對這場破格破例的歡迎儀式，我們都明白這並不是衝着我們這幾個人，而是借題發揮地對外國『帝修反』特別是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組織的一次規模宏大的政治示威，我們這些人只不過是按毛澤東『總導演』的安排走上國際舞台的一些盡職盡心的『演員』。」

歡迎儀式結束，毛澤東破例沒有讓代表團成員各自回家休息，車隊集體奉命緊跟毛澤東的車開進了中南海。毛澤東坐下來，就讓鄧小平、彭真作詳細匯報。鄧、彭匯報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專心靜氣地傾聽，不時地點頭稱是，毛澤東有時還插上幾句話，說幾句笑話。顯然他為這第一回合的勝利而興奮。毛澤東評價代表團的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他認為，所謂完全的勝利，就是代表團沒有同蘇方達成任何有失原則的協議。毛澤東說，現在目的已經達到，就是兩黨會談暫時告一段落，像公報所講的，以後再繼續舉行。留這麼一個尾巴，這麼一個餘地，就是說中蘇兩黨的關係還不是完全破裂。但是，離破裂也差不多，已經到了邊緣了。[10]本來希望彌合分歧的中蘇會談，反而成了中蘇兩黨走向徹底破裂的里程碑。會談後，毛澤東斷言：我們現在與蘇聯的分歧是敵對性質的矛盾了，只是我們現在還是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來解決。

9　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623。

10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623－624。

四　「三家條約」

使毛澤東斷定中蘇分歧已是敵對性質的，不只是中蘇會談的破裂。赫魯曉夫在中蘇會談之際，正在莫斯科同美、英談判部分核禁試條約，並於中蘇會談後的7月25日與美、英簽署了這個條約。中共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把事情做絕了，終於走上了美蘇聯手約束中國的道路。

50年代後期起，蘇美兩國就不時提出過裁軍和核禁試建議，但都為對方拒絕。伴隨禁試建議的是核競賽的升級，核門檻愈壘愈高。然而，到了1962年秋，美蘇雙方重新獲得了推動核禁試談判的動力。一方面雙方都從古巴導彈危機中感受到了核恐怖，另一方面雙方在防止核擴散，制止非核國家擁有核武器上找到了戰略上的共同點。當時美蘇想限制的，一個是法國，一個是中國。

1961年，美國得到情報，中國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製核武器，估計兩三年內就可以製造出來，肯尼迪上台伊始，就在考慮如何阻止中國成為核大國。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中蘇重開論戰，裂痕不可彌合，肯尼迪政府認為，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美國的基本看法是，赫魯曉夫反美調子低，對打開蘇美關係表現主動。中國在宣傳中強烈反美，支持世界革命，倡導武裝鬥爭，比蘇聯更「好戰」。美國的策略是拉蘇聯打中國。通過美蘇緩和支持赫魯曉夫反對中共的觀點，通過加強對中國的壓力增加中國的威脅感。1963年1月，肯尼迪在白宮的一次會上說：「如果一次禁試條約只涉及美蘇兩家，就意義不大，如果能影響中國，價值就很大了，特別是今年比去年更重要。」這番話表明，肯尼迪估計中國研製核武器即將成功，因而他急切要加快美蘇條約談判，企圖通過蘇聯管束中國。他猜想赫魯曉夫會有相同的考慮。

肯尼迪的猜測不是無根據的。但赫魯曉夫想控制中國已是有其心而無其力。1962年8月，蘇聯正式通知中國說，他們已接受美國國務卿臘斯克關於簽訂一項核禁試條約的建議。說這項建議提出，核大國

禁止向無核國家轉讓核技術、制止核擴散，無核國家也應同意不擁有核武器。蘇聯通知雖然沒有要求中國要做甚麼，其用意已盡在不言中。中國政府於9月和10月兩次向蘇聯政府提交備忘錄，明確表示，蘇聯向美國承擔義務，是蘇聯自己的事，但中國希望蘇聯不要破壞中國的主權，代替中國承擔義務。然而蘇聯不予理睬，宣稱它的強大「火箭——核盾牌」不僅保障着蘇聯的安全，而且保障着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的安全。在中國領導人看，這完全是核壟斷。中國的安全能夠寄託於日益走向敵對的「盟友」的核保護嗎？

1963年6月6日，中國政府再次向蘇聯政府發出備忘錄，尖銳指出：蘇聯的那一套是要「保護自己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只許你們一家幹，不許別的兄弟國家同你們一道幹」，「要大家服從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備忘錄明確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承認某一個或者某幾個大國壟斷世界核力量，對別的國家任意發號施令的特權。」中國的本意是勸阻赫魯曉夫不要簽署條約。然而，赫不僅聽不進，而且在不同場合攻擊中國。7月2日，他在柏林講話，對肯尼迪表示讚賞。7月4日的講話更是影射毛澤東，說「只有瘋子」才指望用戰爭來摧毀資本主義制度。他煞有介事地說：「每消滅一個資本家，就會有一百萬工人陪着送命……有些人不那麼看，隨他們去吧，歷史會教訓他們的。」7月25日，蘇聯終於同美、英在莫斯科簽訂了〈關於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這個條約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試驗。在中共領導看來，條約並不能約束美、蘇自己，而只是想剝奪中國也包括法國進行一般核試驗的權利。

赫魯曉夫選擇這個時間來談判簽約，也極具挑釁性。這時，中蘇會談已告失敗，中共代表團還未離開莫斯科，美國代表團就已到達。其象徵意義昭昭然。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曼對記者說：「這次能夠達成協議，第一個原因是目前的中蘇分歧，赫魯曉夫在這個時候非常想有這麼一個條約。」他在內部講話說得更加透徹：「赫魯曉夫選擇這個日子，很可能說明他要用美國來作打手或槓桿，逼中國讓步。」不過，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清楚，他們誰也沒有辦法壓毛澤東接受條約的約束。簽約時，哈里曼一再追問赫魯曉夫：「你們能使中國簽字

嗎？」赫魯曉夫避而不答。他只表示：對於這樣一種發展「並不過分不安」，因為「自1960年以來，蘇聯不肯向中國提供任何工業性質的技術援助」，他斷言：「中國缺乏發展核能力——包括核武器和運載系統——的工業基礎。」

「三家條約」一草簽，立即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7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揭露了這個條約的歧視性，指出，其目的在於鞏固核大國的壟斷地位，束縛別人的手腳，而它們自己可以繼續製造、儲存和使用核武器。聲明提出了全面、徹底、乾淨、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的主張，並且倡議召開世界首腦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

8月2日，周恩來以總理身份給世界各國政府首腦寫信，轉達中國政府的聲明，希望得到各國政府的有利考慮和積極響應。同日，《人民日報》發社論，8月10日又發「觀察員」文章，對條約全面痛加駁斥，提出反對核霸權、核壟斷、核訛詐的口號，認為三國條約，有害無益，適足以麻痹世界人民鬥志，方便了帝國主義。文章表面矛頭指向美國，實質上針對美、蘇兩家。

此時，肯尼迪政府考慮過對中國採取行動，摧毀中國製造核武器的能力，並且一再摸蘇方的意圖。7月15日，美國國務院給正在莫斯科的哈里曼發去密電，指示他「就限制或防止中國的核發展探詢赫魯曉夫的意見，並探詢他是否願意針對這一方向由蘇聯採取行動，或接受美國的行動」。據報導，蘇方對美國希望與蘇聯合作摧毀中國的核計劃是了解的，但蘇聯始終沒有響應。赫魯曉夫不想走得那麼遠，畢竟他還是共產黨的頭。

不管中國當時知道不知道這些內幕，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決不會屈服於這種壓力。這只會促使中國加緊研製自己的核武器。自從赫魯曉夫拒絕提供原子彈樣品以後，尤其是1960年撤退專家之後，中國領導人就下了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武器。當時中國正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陳毅元帥說：「脫了褲子當當，也要把它們搞上去。否則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子就不硬。」1961年以後實行經濟調整，大批企業下馬，但原子彈和導彈研製不僅沒有下馬，而且加強了力度，國務院設立國防工業辦公室。為了集中領導，協調攻關，1962年11月，

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一個十五人的「兩彈」專門委員會。周恩來親任主任，成員有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七個副總理和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文七個部長。核研製正取得突破性進展。毛澤東豈會受制於「三家條約」，屈服於美蘇的核訛詐。這只能強化他對赫魯曉夫的惡感和鄙視，強化他回應挑戰的欲望。1965年秋，毛澤東作《念奴嬌・鳥兒問答》詞。在下半闕，毛澤東寫道：

>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毛澤東用擬人化的問答，痛罵了赫魯曉夫的「三家條約」，對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極盡鄙薄和譏諷之意。

五　公開論戰

6月14日中共中央〈二十五條〉建議信的發表，7月14日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披露，這兩個文件的面世，使中蘇分歧和論戰完全公之於世了。過去遮遮掩掩、照顧面子的考慮已顯多餘。毛澤東決定發動全面反攻。中共中央認為，反攻對中共有利。公開論戰將使世界各國馬列主義革命隊伍迅速壯大，將在全世界掀起一個反對修正主義、研究毛澤東思想的高潮。

7月20日，就在鄧小平率團回到北京的當天，中共中央決定將蘇共中央〈公開信〉作為反面教材全文發表。同時再次發表中共中央〈二十五條〉建議信。隨後，在黨內傳達了中蘇兩黨會談情況，並將《中蘇兩黨會談記錄》發給十七級以上黨員幹部閱讀。9月6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開始陸續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系列論戰文章，即人們熟知的「九評」。這九篇文章的題目分別是：〈蘇共領導

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1963年9月6日）；〈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9月26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10月22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11月19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12月12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1964年2月4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3月31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7月14日）。

「九評」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撰寫。每篇文章均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毛澤東最後審閱定稿。這九篇文章大量地披露了中蘇分歧的內幕，全面批判了蘇共綱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蘇共領導人。蘇共以同樣的方式應戰。據中方統計，從蘇共〈公開信〉發表，到10月的三個月內，蘇聯報刊廣播就發表和轉載了有反華內容的文章、資料計一千一百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動中國黨內和國內的「健康力量」起來反對中共中央的領導。毛、劉、鄧都受到指名批評，但矛頭集中指向毛澤東，劉少奇次之。參與批判中共的其他「兄弟黨」也不在少數。一場空前規模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公開大論戰展開了。這一階段論戰，與此前不同。中蘇雙方都拋棄了指桑罵槐的迂迴策略，再也不用拿第三者當墊背了，而是直呼其名，因而也就更難有緩和餘地。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同斯特朗等外國友人談話時說：「從蘇共二十大到去年7月，我們比較被動。現在我們轉入了反攻，有大鬧天宮的勢頭，打破了他們的清規戒律。」

毛澤東高層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使赫魯曉夫有些招架不住了。他感到，長此以往地對罵下去，將會削弱自己在國內外的地位，使他控制的各國共產黨發生分裂。因此，多次向中共建議停止公開論戰，重開兩黨會談和共產黨國際會議。

1963年10月25日，中國黨的「四評」發表後，赫魯曉夫呼籲停止公開論戰，他說：「就讓時間來檢驗誰的觀點更正確。」蘇聯報刊還發表了許多共產黨倡議召開國際會議的聲明。11月29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說，對公開論戰爭論問題的範圍愈來愈大，「感到嚴

重的憂慮」，要求「停止發展下去」，「把分歧放一放」。信函還提出恢復中蘇貿易、重新派遣專家、談判中蘇邊界等問題。

歷史就是如此弔詭。1963年初，中共呼籲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時，赫魯曉夫以目前召開會議可能引起分裂為由，拒絕了中共的建議。時過半年，赫魯曉夫呼籲召開國際會議，又輪到中共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

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11月29日來函未予理睬。此時中共中央正在組織擴大國際反修鬥爭，從更多方面展開對以蘇共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196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把批判的內容，從政治理論方面，逐步擴展到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方面，要組織更多的黨內外理論、學術工作者和幹部，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認為擴大反修鬥爭，有利於鍛煉隊伍、教育群眾。為此，決定成立了由廖承志、周揚為正副組長的中央國際研究指導小組，成員有劉寧一、孔原、趙毅敏、蔣南翔、劉少文、李一氓、張彥、馮鉉、熊復、姚溱、于光遠、孟用潛、喬冠華、宦鄉、盧緒章、吳冷西、朱穆之、徐光霄、陳忠經等二十一人。並且決定建立蘇聯東歐、美國、西歐、日本、印度、東南亞、西亞非洲、拉丁美洲、國際關係、外國文學、國際行情、工人運動等一大批國際問題研究所，分別由中聯部、外交部、中調部、中宣部、文化部、外貿部、全國總工會等部門直接負責。各重點高校分別成立了相應的研究所和院系，以加強國際問題研究，全面開展反修鬥爭。

毛澤東不僅認為蘇聯被修正主義篡奪了領導權，而且對歐洲黨的現領導也失去了信任。但他始終相信，修正主義者是少數，他們不會長久。他的目標是通過論戰，使蘇共和各國黨內「馬列主義者」的隊伍壯大起來，並使更多的國家擺脫蘇聯的控制。毛澤東從蘇共、保共、匈共、捷共中央不斷換人的現象中得到鼓舞。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對外賓說：「蘇共內部不穩定」，「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毛澤東堅決拒絕了赫魯曉夫停止論戰的建議。他說：「停止爭論不是一方說了就算，而必須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公開協議。雙方不止是兩個黨，而是幾十個國家的黨。因此，爭論很難停下來。」

從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中共又連續發表了「六評」、「七評」。事實上，中共的論戰文章的確吸引了一些國家共產黨中的「左派」，成為他們的理論來源。在這些黨內已經出現了一些冠以「共產黨（馬列）」名稱的小組織。這是赫魯曉夫十分惱火的事情。

蘇共並沒有停止行動。舉「停止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的旗幟，對赫魯曉夫來說，也只是一種策略。1963年底，蘇共中央向黨內基層傳達的一份文件中，系統地批判了中共觀點，並說：「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在壓制着中國共產黨的生活和活動。」在1964年2月4日中共發表「七評」之後，蘇共放棄了調和的表像，於2月12日背着中共向各國共產黨發出一封信，號召採取「集體措施」，對中共實行「反擊」。信中並且告知，蘇共中央即將召開全會討論中共的活動。此後各黨分別闡明自己的觀點。

2月14日，蘇共中央舉行了有六千多名積極分子參加的中央全會。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向全會作了一份長篇反華報告，對中共領導進行了迄今最為全面的指責。其中尤其指控中共「採取了分裂各國共產黨、建立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派別和小組的方針」，指責中共「企圖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擴大到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蘇共全會決定要「公開地、堅決地反擊中共領導的不正確觀點和危險的行動」。這篇講話無異於宣布蘇共準備再次公開論戰。只是因為應羅馬尼亞黨的要求，蘇斯洛夫的報告暫時未予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很快知道了這些情況。2月18日，彭真奉命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口頭通知契爾沃年科。20日，中共中央覆信蘇共中央，揭露此事。並且說：你們說攻就攻，叫停就停，「充分暴露了你們的頑固的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惡習」。蘇共「明目張膽地進行宗派的活動、派別活動和分裂活動」，採取「惡劣的兩面派作法」。

2月22日，蘇共中央覆信，承認有向各國共產黨發出信件一事，並辯解說，2月12日信所以不給中共，是因為中共一直沒有對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建議作出答覆。2月27日，中共中央覆信，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建議：兩黨訂立一個協定，雙方在自己的報刊上，對等地發表批評自己和自己批評對方的已經公布和將要公布的文件、文章

和材料。2月29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終於答覆了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信，表示願意就邊界問題達成談判協議，但拒絕了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建議。再次談到在援助和貿易問題上蘇聯領導人損害中國利益的一系列事實。關於論戰，覆信指出，這是蘇共二十二大挑起的，「現在，公開大論戰已經全面展開，真理越辯越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越辯越發展，壞事開始變成了好事」。覆信明確告訴對方：中共對蘇共公開信的答覆還沒有完。

最後，中共中央提出四點建議：（一）停止公開論戰，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黨，進行各種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通過協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公開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議。（二）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並且積極支持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舉行這次會議之前，應當做好準備工作，克服困難和障礙。（三）中蘇兩黨繼續舉行會談，是開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因此提議，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議。（四）在中蘇會談之後，舉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及印度尼西亞、日本、意大利、法國等十七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會議，以便為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作進一步的準備。

蘇共中央於1964年3月7日覆信，說中共中央建議10月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是「拖延時間」，表示不同意由十七國黨籌備國際會議，提出了由1960年會議的起草委員會二十六國黨參加籌備的方案。蘇共中央建議：（一）1964年5月，在北京繼續舉行蘇中兩黨代表的會議。（二）二十六個兄弟黨代表的籌備會議，在1964年6、7月召開。（三）同兄弟黨協商於1964年秋舉行國際會議。並以必須停止公開論戰作為條件。這就是說，蘇方堅持：先停止論戰再舉行會談，中方堅持：只有達成了協議才停止論戰。

羅馬尼亞黨在這場論戰中，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他們一面勸阻蘇共中央不要發表蘇斯洛夫的報告，一面要求中共停止公開論戰。3月2日至11日，由總理毛雷爾率領羅共代表團來到北京，同劉少奇

率領的中共代表進行了秘密會談，但收效甚微。中方堅持，只有在雙邊或多邊會談達成協議之後，才能停止論戰。3月25日，羅共再作嘗試，羅總統喬治烏·德治分別給中、蘇駐羅大使一個草案，建議由蘇、中、羅各派代表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為國際會議作準備。這個建議未得到響應。羅共自己也引起了赫魯曉夫愈來愈大的不滿，到後來蘇、羅兩家也吵起來了。

3月31日，中共發表了「八評」，即〈無產階級革命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赫魯曉夫，集中批判了他的「總的錯誤」即和平過渡的理論。堅持認為：「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無產階級必須進行武裝鬥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中共放棄了在1957年和1960年出於策略考慮接受的「和平過渡」和「非和平過渡」兩種可能性的折中觀點。文章批判赫魯曉夫是「繼承托洛茨基的歷史上最大的投降主義者」的衣鉢，使蘇聯退到了資本主義。文章奉勸蘇共「領導同志」把赫魯曉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3月底到4月上旬，赫魯曉夫在訪問匈牙利期間，對中國領導人進行猛烈的回擊。他反誣中共是「托洛茨基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譴責中共領導人「不負責任地拿千百萬人的生命來進行賭博」。蘇共中央決定發表了2月14日的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報告，給中共以回擊。

毛澤東為赫魯曉夫的被動而高興。4月25日，毛澤東接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不無得意地說：「現在是我們在指揮赫魯曉夫，叫他跳他就跳，叫他笑他就笑。赫魯曉夫這個人是可以挑起來的。」他說，赫魯曉夫本來不想發表2月14日的決議和以蘇斯洛夫名義作的報告，我們卻要他發表，辦法是發表「八評」，「這樣就迫得他把那個決議和報告發表了。」

5月7日，中共中央覆信蘇共中央。信中說：你們在2月背着我們向兄弟黨發出反華信件，又在中央全會上決定「公開地、堅決地反擊中共領導」之後，提出今年5月舉行中蘇會談，以「盡快地調整現存的分歧」，是十足的偽善。關於中蘇會談時間，毛澤東在信中親自加了一段：「照目前的情況看來，不僅今年5月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是不

可能的，就是今年10月舉行也太早了，以推遲到明年5月較為適宜，到時如果兩黨任何一方認為時機不成熟，還可以繼續推遲。」信中說：全世界各國黨的代表會議的籌備會議甚麼時候舉行，要看中蘇兩黨會談的結果而定。參加會議的黨仍以十七國的黨為宜，不同意由十七黨擴大為二十六黨的建議。至於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代表會議，在目前情況下，遲開比早開好，甚至不開比開好。準備時間也許需要四、五年或者還要長一些的時間。毛澤東在信中警告說：如果蘇共中央一意孤行，一定要召集部分黨開會，「你們就必須承擔分裂的責任」。

6月15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援引1957年莫斯科會議決議關於「委託蘇聯共產黨和各兄弟黨協商的條件下負責召集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文字，堅持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召開二十六黨籌備會議。中共給予的公開回答是在蘇共中央公開信發表一周年，即7月14日，發表了「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論戰文章，題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這篇文章有對赫魯曉夫蓋棺論定的性質。

7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覆信蘇共中央，集中批駁了蘇共中央援引1957年宣言自稱有召集會議的權利的說法。按毛澤東的說法，要「駁（剝）奪他的甚麼召集權」。覆信說共產國際解散以後十多年沒有國際會議，各國革命卻勝利了，為甚麼現在要這樣急急忙忙開會呢？毛澤東在信中加了以下的話：蘇共要召集的會議，「只是一個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極其渺小的會議」。他嘲笑蘇共領導現在處在欲開不成、欲罷不能、騎虎難下的窘境。他寫道：「我們堅信，你們的所謂大會召開之日，就是你們進入墳墓之時。」

毛澤東估計蘇聯開不成這個會，「因為大多數黨都怕開分裂的會，實際上蘇共領導自己也怕開這種會」。然而赫魯曉夫看來真要一意孤行了。7月30日，蘇共中央又致函中共中央，硬性下通知說：仍以二十六國黨組成籌備國際會議的起草委員會，這些黨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達莫斯科，如果其中任何一個黨不派代表參加，委員會也要開始工作；國際會議於1965年年中舉行，這個黨或那

個黨拒絕參加的話，也不拖延。蘇共中央要中共中央報告參加二十六國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名單。同時向其他二十五國黨發出了邀請。這表明蘇共決心不顧中共的阻撓，要單方面採取行動了。8月30日，中共中央覆信，堅決反對蘇共領導非法召集分裂會議，聲明決不參加非法的分裂會議。至此，兩黨的關係完全陷入了僵局。

這場關於停止論戰、召開國際會議的爭論，表面看，分歧只在時間和程序問題上：赫魯曉夫急不可耐，而毛澤東故意推遲；赫魯曉夫堅持先停止論戰後開會，毛澤東堅持在雙邊和多邊達成協議之前不能停止論戰；赫魯曉夫堅持籌備會仍由原來二十六國黨組成，毛澤東堅持籌備會只能由十七國黨參加；赫魯曉夫堅持國際會議仍由八十一國黨參加，毛澤東堅持應當包括「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黨」（如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錫蘭、印度、英國的「共產黨（馬列）」）。其實質是，雙方都要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毛澤東的目標是要打亂赫魯曉夫的章法，挫敗他挾國際會議以自重的企圖，剝奪他的國際會議的召集權。毛澤東認為時間對中共有利。事實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已毫無共同語言，硬要開會也只能是吵鬧一場，走向最終分裂。

六　赫魯曉夫下台

反修論戰戰猶酣。中共原本計劃連發「十評」文章，哪知才發了第九評，赫魯曉夫突然下台，論戰失去了對手，「九評」由此成了歷史名詞。毛澤東後來若有所失地說：赫魯曉夫下台「使我們喪失了一個寫文章批評的對象」。

1964年9月，赫魯曉夫隆重慶祝他七十壽辰後不久，即前往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黑海度假勝地度假。但風雲驟變，他的克里姆林宮的同事突然派專機將他接回莫斯科，並解除了他的一切黨政職務，1957年夏季幫助赫魯曉夫挫敗莫洛托夫「宮庭政變」的朋友們，今天又把赫魯曉夫趕下了台。

決定是10月14日作出的。當晚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要通報重要事情。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伍修權第一個聽取了蘇聯的通報。契爾沃年科說：鑑於赫魯曉夫「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任命柯西金為部長會議主席。伍修權立即將情況報告了楊尚昆，楊馬上報告了毛澤東。

10月16日，是具有戲劇性的一天。這一天，蘇聯塔斯社發表蘇共中央全體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報，宣布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同一天，中國新華社宣布：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一個上天（原子彈），一個下台（赫魯曉夫），兩條震憾世界的爆炸性新聞，同一天公諸於世，這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刻意安排？

伍修權說：這是毛澤東導演的又一幕極其精彩的國際話劇。他說：「原來我國的原子彈試驗早就一切就緒，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個最有利的時機。赫魯曉夫一下台，毛主席當機立斷，立即下令『起爆！』於是不僅把世界公眾的視線牽到了中國，更把我國的這一勝利和赫魯曉夫垮台巧妙地聯繫到了一起，形象地說明『蘇修』的失敗和我們的成功。」

余湛的回憶則是另一種說法：「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卻說，我們選在這天進行核爆炸，意在向蘇聯顯示實力。這當然純屬瞎猜。報導前毛澤東還擔心不實，請周總理核實後再公布，怎麼可能想炸就炸呢？」今天由參加原子彈爆炸的科學家和領導人披露出來的實況，已經證明這不是一次刻意的安排。因為原子彈爆炸對於氣象、環境和技術要求極為苛刻，不允許有任何非安全因素發生，並且，中國是首次核試驗，必須要把成功放在第一位，否則將造成推後甚至停頓繼續實驗的後果，那將是非常嚴重的。刻意安排之說只是良好的附會而已。

無論是刻意「導演」，還是偶然巧合，絲毫不影響它們的戲劇效果和象徵意義。赫氏下台，本來只是蘇共內部的一次「宮廷政變」，但中國許多人都相信是「九評」把他轟下台的。原子彈爆發成功更使

人們群情振奮。毛澤東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此時雖然對赫氏下台的真實原因及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趨向還不摸底，但毛澤東還是決定打出一張牌：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時機，派出周恩來為首的龐大代表團，前往蘇聯祝賀節日，實際意圖是摸摸蘇共新領導的政治意向，尋求避免中蘇徹底決裂的新途徑。

中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向蘇聯發出了重修於好的信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給蘇共新領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發去賀電，電文並公開見報。中國報刊暫時停止了論戰，開始正面介紹蘇聯新的建設成就。11月5日，毛、劉、朱、周再次聯名發去節日賀電。11月6日，北京各界舉行慶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會。11月7日，劉少奇、鄧小平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同日，《人民日報》發表〈在偉大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11月8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慶祝大會上的講話。考慮到在這之前雙方還在對罵，這些姿態在國際上格外引人注目。

中共對蘇共領導人更迭到底採取怎樣的態度？周恩來11月1日告訴全體國務委員：我們的態度，第一，歡迎，拍賀電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第三，要觀察一個時期。第四，在一些國際會議上，必要時還要同蘇聯爭一爭，該反對、該棄權的，我們還要反對、棄權。看得出，這次行動的出發點是推動蘇聯新領導改弦更張，放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儘管所抱希望並不太大。當時對蘇聯新領導也有三種估計：一是換湯不換藥；二是湯換了藥也會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魯曉夫更難打交道。據說，赫魯曉夫對自己的政策表現「把握不定」，「想尋找出路」。蘇斯洛夫等人則對現行路線表現堅定不移，可能由於怕赫魯曉夫動搖而將他撤職。要了解事件真相，惟有直接同蘇聯新領導接觸。

周恩來赴蘇前，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轉達了中共中央派團赴蘇的意見，同時建議蘇邀請十二國黨也派代表同時赴蘇，以便相互接觸和溝通。周同時召見各有關國家駐華大使，告知此事。蘇聯很快發出了邀請，除阿爾巴尼亞外，越、羅、古、朝、保、匈、捷、波、蒙等十一國積極響應並派團赴蘇。

11月5日，周恩來、賀龍、伍修權、劉曉、潘自力、喬冠華、姚溱、王力、余湛等一行中國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代表團受到柯西金等的歡迎，下榻列寧山政府別墅。此處對中國代表團並不陌生，前次中蘇兩黨會談中共代表團就居住於此。然此次重來，庭院依舊，招待的主人卻換了，大家不免有些感慨。後來余湛回憶起一件當年的趣事：「有人想起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七言絕句《再遊玄都觀》：『百畝園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並將詩中的『劉郎』改作『周郎』，奉贈周總理。回國後，和毛主席談及此事，有人認為稱周總理為『周郎』有些不恭。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說，還是『周郎』好。」

周恩來稍事休息，立即開始緊張活動。禮節性地拜訪了蘇聯各位新領導和各國代表團，並接受他們的回訪，參加節日的各種活動，利用一切機會同蘇聯領導人和各國代表團接觸，進行非正式交談和正式會談，了解他們的想法，闡明我團結對敵的願望。活動情況每晚向中央請示報告。周恩來改善中蘇關係、推動蘇聯變化的願望，卻原來只是一廂情願。蘇方僅僅撤掉了赫魯曉夫，並沒有否定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思想和路線，新領導人仍然堅持其既定方針，相反還企圖使中共改變方針。

蘇共的意圖很快由魯莽的馬利諾夫斯基元帥洩露了。11月7日十月革命節閱兵後的晚宴上，周恩來同蘇聯領導人交談後，便向蘇聯元帥們聚集的地方走去，準備找他們交談。此時，迎面走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他見到周恩來便說：「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妨礙我們。」「你胡說甚麼？」周恩來立即正顏厲色地頂了他一句，隨即轉身拂袖而去。馬利諾夫斯基仍在胡言亂語：「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搞下台，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下台了」。他見周恩來已經走開，又走向正在同崔可夫元帥談話的賀龍副總理，對賀說：「不要讓毛澤東、赫魯曉夫們來妨礙我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回了他的挑釁，並報告了周恩來。代表團的同志聽說後，都極為氣憤，迅即離開了宴會大廳。

周恩來回到我駐蘇使館，仔細核實和分析了馬利諾夫斯基挑釁的全部情況，考慮到蘇聯顛覆兄弟黨的歷史記錄，認為事情決非偶然。這是公然煽動要推翻我黨和國家的領袖，必須嚴肅對待。

11月8日，美國、法國、英國的通訊社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這裏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這使問題更加嚴重化複雜化了。當天上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米高揚、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回拜中共代表團。稍事寒暄，周恩來便就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事件向他們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周要求澄清：「蘇共歡迎我們來的目的之一是不是要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中國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

勃列日涅夫解釋說，他們是事後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憤怒，馬利諾夫斯基是酒後胡言，他不是主席團成員，不代表蘇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向中國同志表示道歉。周恩來義正詞嚴地指出：馬利諾夫斯基並非酒後胡言，而是酒後吐真言。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動，而是反應蘇聯領導中仍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即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以老子黨自居的傾向依然存在。當眾對中國黨政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是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採用過的惡劣手段。勃列日涅夫說：我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你們道歉，這是比馬利諾夫斯基的道歉還要高級的道歉。波德戈爾內說：我們和馬利諾夫斯基劃清界線。他們說：這個問題已經結束。周恩來堅持說：「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勃列日涅夫連連說：「那當然，那當然！」

中蘇兩黨會談還未開始，氣氛已完全惡化。馬利諾夫斯基的公然挑釁，不僅為中蘇重修於好設置了極嚴重的障礙，給中蘇關係造成了長期難以治愈的創傷，而且給中國政治帶來了難以言明的深刻影響。事實上不只是馬利諾夫斯基的酒後狂言。在周恩來看來，中蘇能否重修於好，就看蘇共領導願不願向中共代表團透露赫魯曉夫下台的真實原因，是否改變赫魯曉夫的路線。然而，從11月5日到達莫斯科，到11月9日正式會談前，無論周恩來如何多方探詢，蘇方始終守口如瓶，諱莫如深。

11月9日第一次正式會談，周恩來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說可以在下次再談，這不會妨礙我們研究改善中蘇關係的建設性辦法。他緊接着提出建議，開始討論停止公開論戰，並圍繞這個問題尋找其他步驟。勃氏執意不談赫氏下台的原因，周恩來只好暫時擱置一邊。但周恩來沒有接過勃列日涅夫的議題，同他們討論停止公開論戰，而是提出關於召開國際共運會議的問題，以便從中尋找蘇聯新領導究竟和赫魯曉夫有多少差別。周恩來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慶祝會上的講話中說，召開兄弟黨會議的條件成熟了，依我們看，條件並未成熟，還要創造。」勃列日涅夫說：「只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周恩來問：「你們是否不再提你們過去決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開的那個起草委員會？」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堅決：「不！我們講的就是這個委員會。」周恩來說：「如果把兄弟黨會議同赫魯曉夫下命令開的那個起草委員會聯在一起，就沒有談判餘地了。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回到赫魯曉夫問題上來了。」無論周恩來怎樣勸說，勃列日涅夫都執意不改。周恩來建議另闢途徑，通過雙邊和多邊協商，開個團結的會。他們堅決不幹，決不妥協也不講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揚比較坦率，他最後吐出真言，說在同中共的分歧問題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沒有些微的差別。

周恩來不愧談判高手，從召開兄弟黨會議這個具體問題上，逼出了蘇聯新領導人的真言：他們和赫魯曉夫在對華政策上完全一致。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揚的發言堵死了此次尋求中蘇團結反帝新途徑的大門。周恩來得出結論：「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

11月11日，在第二次會議中，周恩來正式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點，在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詞和我的書面祝詞中所表示的願望，我們堅決不變。第二點，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要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決不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不過，我們要奉勸你們，不要走絕路，要懸崖勒馬。第三點，在你們繼續執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11月12日，最後一

次會談，由勃列日涅夫介紹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不出所料，沒有談出甚麼新內容。

11月13日，周恩來率團回國。去機場送行途中，柯西金在汽車上對周說，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甚麼要解除他的職務呢？周恩來問：區別何在？柯西金卻又閃爍其詞，避不直言。代表團來時頗有勁頭，回國時不免有點失望，甚感敗興。哪知毛澤東利用這一機會。再次導演了一場精彩活劇。專機在北京機場徐徐降落，上年7月那盛大場面再度出現。毛澤東再次領着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領導人，和數千各界群眾，為代表團舉行熱烈的歡迎儀式，仍舊是歡呼聲、鑼鼓聲，依舊是握手、獻花、照相、繞場一周。只是主角由鄧小平換了周恩來。毛澤東這次舉動包含更多的意義。他要向外界顯示中國黨和人民的團結一致，顯示中共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堅定立場，也表明他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政治大局，蘇共妄想趕他下台的圖謀永不會得逞。同時，盛大的歡迎場面也昭示了中國的興盛與風發的意氣。

七　斷裂

改善中蘇關係最後一次機會，因為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性質而不可能被雙方領導人把握住，中蘇關係不僅沒有好轉，結怨卻更深了。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肯定地說，加深了中共特別是毛澤東的警覺，因為蘇聯不乏顛覆其他黨的領導的歷史記錄。特別是西方媒體煽動的中國代表團與蘇聯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的謠言，也加重了本已惡化的局勢。

過去，赫魯曉夫那光禿的腦袋總在毛澤東腦子裏晃動，現在又多了一個勃列日涅夫。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斯諾說：「在俄國有人說中國有個人迷信。」毛澤東說：「恐怕有一點。……赫魯曉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

1964年11月21日，新華社播發了《紅旗》雜誌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社論說赫魯曉夫「之所以垮台」，「是由於他推行修正主義總路線和對內對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的結果」。筆墨官司重新開始。

1964年11月24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發來信件，說26個黨中主張召集會議的有19個，這些黨有權進行會議的實際準備工作，並通知會期推遲到1965年3月1日。12月12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關於召開籌備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起草委員會的通告〉。12月11日至16日，以古巴的羅德里格斯為首的九國黨代表團到達北京，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毛澤東接見他們並回答說：「不行，要爭論一萬年。」1965年2月，柯西金去越南民主共和國途經北京，與周恩來和毛澤東會談。柯西金要中國黨在三月國際會議和越南問題上接受蘇聯的方針。柯西金說：三月會議改為協商會晤，多邊會談，日期、名稱、內容都變了，希望中國共產黨參加。周恩來說：三月會議是根據1964年7月30日一個黨的命令決定於12月開的會議而推遲的，我們不參加。毛澤東說：我們不參加三月會議，不停止爭論，不停止支持左派。要停止，你們收回公開信，收回蘇斯洛夫攻擊我黨的報告，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線。否則，要爭論一萬年。柯西金說：「不要那麼久。」毛澤東說：「那就減少一千年，剩九千年，這是最大的讓步，一讓步就是一千年。」

不過，中國領導人並不想把兩黨意識形態論戰引向國家關係的破裂。周恩來對柯西金說：國家關係應該發展，兩國之間可做的事情還不少。他具體提出公開慶祝《中蘇條約》簽訂十五周年、發展貿易、進行文化合作、旅行、互派留學生、繼續完成未完成項目等六項內容。柯西金表示贊同。

1965年3月1日至5日，蘇共領導召開的國際會議起草委員會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十九個黨，美國共產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拒絕參加的有阿爾巴尼亞、越南、印度尼西亞、中國、朝鮮、羅馬尼亞、日本等七個黨。與會各黨擔心從此全面決裂。蘇共中央不得不將「起草委員會」會議改稱為「協商會晤」。

3月23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的文章，批評它是一個製造分裂的會議，駁斥了會議對停止公開論戰的呼籲。在此之後，中國共產黨不再承認存在一個「社會主義陣營」。1966的3月，蘇共舉行第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不發賀電。從此中蘇兩黨關係完全中斷，長達二十三年之久。

中蘇兩黨的唇槍舌劍、筆墨官司不能不導致國家關係的全面惡化。勃列日涅夫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他更注重於訴諸實力政策，60年代中期以後，不斷增兵遠東、駐兵蒙古。特別是1966年蘇蒙簽定軍事協定，蘇軍得以合法進駐蒙古共和國境內，逼近中國。中蘇邊境日趨緊張，昔日盟友變成了敵國。到60年代末，兩國的軍事對峙使中蘇兩國走到了戰爭的邊緣。直到80年代末，兩黨兩國才打破堅冰，重歸於好。雙方都為近三十年間的對抗方針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關於這場爭論，1989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蘇聯的後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時，有過一段精彩的對話。鄧小平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字裏行間透出對當年論戰中的教條主義的反思。比鄧小平小二十七歲的戈爾巴喬夫可以對此置身事外。他說：「我的年齡比你小，那場爭論我們不想對此作出評價，而是指望你來作出評價，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鄧小平接着說：「從60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60年代中蘇兩黨那場視同水火的爭論，真正有實質意義的內容，是反對蘇共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維護中共自身的獨立和尊嚴。這種強烈尋求自身獨立和尊嚴的意識，甚至開始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時以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不正確的干涉，深深

刺激了從中國本土革命中湧現的領袖們。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迷信，自遵義會議後開始被突破。延安時期，毛澤東和本土革命中成長起來的領袖們，已經完成了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理解和設計。他們如同羽化的蝴蝶，從繭子裏破殼而出，飛向了遠方。

再要束縛中國本土革命的領袖們，已經不可能了。而要繼續玩弄大國大黨主義，必定會遭到中共的強烈反彈。毛澤東在抵制這種干涉方面表現了非凡的勇氣和魄力。然而，到後來，中共也對其他黨，尤其是南斯拉夫和蘇聯國內外政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全盤否定，基於一些「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對於南斯拉夫率先衝破斯大林模式，對於蘇聯、東歐國家剛剛露出來的改革趨向，對於西歐共產黨尋求非暴力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嘗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視之為「修正主義」。這實際上也可歸於鄧小平所說的「空話」之類，即含有教條主義的東西。

假如讀者有充分的耐心，詳細地對比閱讀中蘇雙方論戰的主要觀點，不會是一件無益的事情。本書限於篇幅的原因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須強調一點，這就是在中蘇大論戰中，中國黨方面在理論觀點上的最重大失誤，是錯誤地認為南斯拉夫和蘇聯國內存在着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三評」即〈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文，說南斯拉夫是「資本主義復辟了的國家」。對南斯拉夫在斯大林高壓下，於1948年後採取的一些衝破了蘇聯模式的經濟措施，如拆借數億美元的外債，解散了許多強辦的農業合作社，工廠實行工人自治，城市中有相當大數量的個體手工業，憲法允許有少量僱工等，都視作證據，來批判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在農村泛濫」，「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得出結論說，「歸根結柢，是由於南斯拉夫黨和政權性質的蛻變」所致。認為南斯拉夫有個「官僚資產階級」。其和平演變過程是：「政權性質的蛻變，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復辟。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來，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逐步形成以後，他們就要求進一步強化資產階級專政，進一步發展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的

政治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等等，顯然是非常教條化和錯誤的。

「九評」即〈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有着更為強烈的「空話」色彩。文章認為，在蘇聯不僅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還相當有力量，「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幹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形成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這些判斷顯然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要害在於，國際上怎樣「反修」，國內便有了參照系。用自己製造出來的批判修正主義的「風月寶鑑」，反照中國社會，似乎同樣存在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一種莫名的危機感瀰漫起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已在「九評」中形成。中蘇大論戰把中國黨引向了反修防修的迷霧之中，這是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最值得反思的歷史現象。

第十章
緊張的政壇

中國60年代前期的歷史特徵之一，是國內政治的緊張化。這種緊張是全面、深刻和危機四伏的。當時人們的感覺，似乎是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將要發生某種腥風血雨般的重大事變。人們的這種感覺，大多是由日復一日的政治宣傳、政治運動和政治批判誘發出來的。事實上，這種感覺是虛假的。它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虛幻出來的。緊張和危險，一旦成為人們意識中的「真實」，它所釋放的反應能量將是巨大的。人們會睜大眼睛，到處尋找可疑的敵人。舉凡文化、學術、藝術、思想領域裏一切稍許不被革命認同的東西，都將遭到懷疑和敵視。甚至，原本是社會生活中的小矛盾、不經意的摩擦，都會被標上「階級鬥爭」的記號。而當黨內真的出現思想分歧和爭論，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產生某種歧見時，那整個黨將面臨一次「徹底的洗牌」。1965底突然發生的羅瑞卿事件，不僅給這一歷史時段增加了迷津，而且給中共黨內政治生活添加了新的緊張。可以想見，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內，人們的精神和情緒都是緊繃着的。

一　批鬼戲

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對於國內的「反修」鬥爭，首先注重的是農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但他始終沒有放鬆對文化領域的警惕性。

1962年12月21日，毛澤東巡視各地來到上海，在同華東的省市委書記談話中，就提出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問題。他說：「對資本主義要有一些人專門研究，宣傳部門應多讀點書，也包括看戲，有害的戲少，好戲也少，兩頭小中間大。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佔優勢。梁山伯不出糧食，採茶燈不採茶，舊的劇團多了些，北京的京劇團就不少。過去的文工團只有幾個人，反映現代生活，不錯。」

毛澤東對戲劇界的不滿，由來已久。毛澤東歷來認為，歷史由勞動人民創造，他們應是歷史主角，但在舊戲中，帝王將相、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成了主角，勞動人民只是配角。因而，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有意改造舊戲。然而，在各種文藝形式中，戲劇最具程式化，改造談何容易。1961年以後，由於文藝政策的放寬，傳統劇目的上演多了起來。其中也有一些未加整理、格調低下、解放後一直禁演的劇目。但其實問題並不那麼嚴重也不難解決。然而，在重新強調階級鬥爭的政治環境下，毛澤東把這些東西同修正主義聯繫了起來。他對柯慶施等人說：「對修正主義有辦法沒有？要有一些人專門研究。宣傳部門應多讀點書，也包括看戲。」

毛澤東得到的文化界首先是戲劇界的信息，許多是由江青提供的。作為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建國以來雖任職中宣部和文化部，但基本沒有在公眾面前露面。她的首次亮相，要追溯到1962年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訪華，當時江青曾出面接待她。毛澤東同江青的關係，很難講得清楚。他們愛恨交加。當然更多的是寄予期望。毛澤東曾經說過，江青政治上很尖銳。從骨子裏說，江青是熱衷於政治的。處在中共權力核心的周側，身份又極為特殊，使她逐漸膨脹起政治野心。她曾作有一首奇詩，人們通常把它作為江青野心的表露：「江上有奇峰，鎖在煙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文革」中，江青曾憤憤地說：「劉少奇他們專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讓我參加黨的活動。」可見江青在政治上愈來愈不甘於寂寞。而從制度上說，共產黨也沒有嚴格的規定，限制最高領袖的夫人參予國家政治。在現代歷史上，在由一個人說了算的政治條件下，其他共產黨也曾出現過最高領導人的夫人躋身國家高位的情況。

江青涉足政治是得到毛澤東允許的。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甚麼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但後來，他改變了看法，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據「文革」中紅衛兵印的《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說，江青在60年代初的幾年裏「審查了一千三百多個京劇劇目」，從而得出結論：「目前劇目混亂，毒草叢生。」說江青審查了一千三百多個京劇劇目，係誇大之詞。說她完全為了「審查」而看戲，也不可信。至少在八屆十中全會之前，她在北京看戲，在杭州看戲，大都為了消遣，進行「文化療法」。1962年上半年，江青在杭州養病，康生陪伴她一連看了兩個月的舊戲，包括未經整理的解放後一直禁演的舊戲。江青的確有特殊的政治嗅覺。1962年7月6日，她觀看了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立即認為有「嚴重政治問題」，向毛澤東報告，說應該批判。但當時毛澤東並沒在意。

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江青約見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齊燕銘不知此話來歷，不以為然。不久，江青又召見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陸定一、周揚、齊燕銘、林默涵，向他們提出：「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部長們依然是無動於衷。這次他們太不敏感。江青的話是傳達了毛澤東對文化界的不滿。於是江青決心拿崑曲《李慧娘》做突破口。崑曲《李慧娘》，是老劇作家孟超由《紅梅記》改編而成的，描寫南宋一個貪贓枉法、賣國求榮的宰相賈似道，一日與其妾（良家婦女，逼迫為妾）李慧娘遊西湖，偶見一少年當面怒斥賈似道。李慧娘不禁發出兩聲「美哉！少年」「壯哉！少年」的感歎。賈似道大怒，將其推入湖中，含冤而死。然而李慧娘冤魂不散，變成了鬼，用頭撞死賈似道。1961年夏，崑曲《李慧娘》在京上演，後到各省巡迴演出，頗受好評，也得到周恩來的贊許。孟超的好友、北京市統戰部部長廖沫沙觀看此劇後，寫了一篇劇評〈有鬼無害論〉，登在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報》上，署名「繁星」。其意思是說：《李慧娘》中寫了鬼，但是個好鬼，有鬼無害。

江青認為《李慧娘》有政治問題，有鬼魂形象，需要批判。但文化部門掌握權力的人不加理睬。康生知道此事後，立即支持江青。康

生是個很虛偽的人。他對舊戲其實十分迷戀。「大躍進」失敗，災害降臨，他突然轉移興趣，到處遊山玩水，搜羅文房四寶，點看舊戲。其中許多是禁演的，如《花田八錯》、《辛安驛》、《十八址》、《寶蟾送酒》、《柴市節》、《戰綿竹》、《八陽》等。演員心有餘悸，他跑到後台，給演員打氣：「你放手演，出了問題算我的。」1961年3月22日，康生還到戲曲編導工作座談會上講話，號召「把劇目搞寬一點」，「不要太窄了」。此話一傳，在北京、上海先後上演了一批未經整理的劇目。康生對崑曲《李慧娘》也特別熱心。劇作者孟超是康生同鄉，改編過程中多次徵詢康生意見。康生發話：「《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出鬼魂我就不看。」彩排期間，康生親自將疊句「美哉！少年」的後一句改為「壯哉！少年！」正式公演後，康生又親臨觀看。看後甚為滿意，特寫信給作者：「祝賀該劇演出成功。」稱讚孟超「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指示「北崑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甚麼現代戲」。然而，康生的是非標準完全以政治風向而定。當聽到毛澤東對戲劇不滿，聽到江青要批《李慧娘》後，康生立即翻臉，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狠狠地批評中宣部、文化部「右傾」，要追查「鬼戲泛濫」的責任。

江青的話可以不聽，但康生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話不能不執行。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黨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在批評有鬼魂形象的戲演出漸增的問題時，突出地批評說：「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

江青看到這份報告，仍不滿意，認為是「官樣文章」。她要「衝破傳統」，「爭取到批評的權利」。1963年3月下上海，她終於找到了另一個知音柯慶施。柯慶施把任務交給華東局宣傳部長俞銘璜。俞銘璜人稱「蘇中才子」。俞百般無奈，奉命寫就一篇批判文章：〈「有鬼無害」論〉，1963年5月6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署名「梁壁輝」。「梁壁輝」者，「兩筆揮」也。文章使用索隱的手法，說《李慧娘》劇作者是影射攻擊共產黨，賈似道是共產黨的總理，李慧娘反

對賈似道就意味着人變成鬼也要向共產黨復仇。可見江青對「鬼戲」的批判，關鍵不在於它有鬼魂形象，而在於神經質地認為這些鬼魂形象影射攻擊了大躍進及其後果。〈「有鬼無害」論〉的作者俞銘璜，在文章發表的半年之後就病逝了，時年四十七歲。他沒有預料到，自己捉刀代筆的這篇文章，開啟了文化批判的序幕。從此，全國戲劇界開始大批「鬼戲」。江青後來說：「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毛澤東支持了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5月8日在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說：「有鬼無害論是農村、城市階級鬥爭的反映。」

江青下上海，尋求柯慶施的支持，不是偶然的。她是以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為奧援。柯慶施在1958年後，政治生涯如日中天。因為發表「乘風破浪」的講話，頗得毛澤東的賞識。在毛澤東對周恩來反冒進大為不滿時，曾動過由柯慶施取代周出任總理的念頭。中共八大二次會上，柯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60年成立中央局時，他被委任為華東局第一書記，繼續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長，是響當當的華東「第一人」。在六個中央局書記中，毛澤東最為信任和賞識的有兩個，一個是中南局的陶鑄，一個就是柯慶施。柯慶施本來就對周恩來、陳毅主持調整文藝政策不滿。1961年6月「新僑會議」時，他指令上海代表「要帶耳朵，不要帶嘴巴。上海的路線是正確的，用不着檢討」。周恩來講話批評「五子登科」，柯不准在上海傳達周的講話。柯還批評趙丹、張瑞芳等人是「通天演員」。1962年「廣州會議」周恩來、陳毅的講話，上海市堅決抵制，不准宣傳。

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重新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正合柯慶施的口味。當聽到毛澤東關於戲劇中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太多的講話後，柯慶施大加發揮，1963年2月12日，柯在春節團拜會上講話，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即寫建國以後十三年。他說：「因為沒有人提倡寫十三年，所以我來提倡。」「只要是寫十三年的，我就帶老婆孩子買票來看；不是寫十三年的，請我看也不看。」隨後，在柯慶施的支持下，在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東代表發言強調：電影、戲劇中現代的、革命的題材太少了，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妖魔鬼怪的題材太多了，外國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經有喧賓奪主」，「泛濫成災」的味道，應該制定解決的措施。

對於柯慶施所提「大寫十三年」的口號，人們有不同的意見。在同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新僑飯店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上，展開了激烈爭論。張春橋在發言中進行辯解，講了「寫十三年有十大好處」，他甚至宣稱：「只有寫十三年，寫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才是社會主義文藝。」周揚、林默涵、邵荃麟則發言指出：「寫十三年」這個口號具有片面性。他們尤其批評了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的論點。

提倡寫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無可厚非。然而把「大寫十三年」作為口號提出，具有極大的「左」傾片面性。柯慶施是在發揮毛澤東的思想，但似乎比毛走得更遠。毛沒有否定舊戲。他只是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太多，有西風壓倒東風的味道。在上年12月21日的那次談話中，他還說：「《楊門女將》、《罷宴》還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說服不了他們。」而「大寫十三年」的口號，限定只有寫十三年才是社會主義文藝的論點，不僅一概否定了傳統題材，也否定了建國前二十八年的革命題材，這無異於以題材決定扼殺文藝創作。

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口號，還有有意與周恩來、陳毅唱對台戲的味道，有藉此製造出一條「路線」來的用心。

「大躍進」中提出「寫中心」、「畫中心」、「唱中心」，要求文藝為鼓吹「三面紅旗」服務，嚴重束縛了文藝家的手腳，帶來文藝蕭條。有鑑於此，調整時期，周恩來指出：至於題材，完全可以允許作者自由選擇。古代，沒有社會主義，但有中國人民優良的傳統，人民創造了許多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還有不少神話，都可以寫。他又說：演現代劇可以表現時代精神，演歷史劇也可以表現時代精神。……如果只是把現實生活搬上舞台，那有甚麼看頭。陳毅更是快人快語。他說：要寫的東西很多，中國近百年的歷史、幾千年的歷史都可以寫，近四十年的革命實踐也可以寫，十二年來已經成熟的東西也可以寫，為甚麼要逼迫我們的作家忙於去寫一些不成熟的東西，糟蹋精力，糟蹋勞動力，這不好。

當時文藝界的領導人，對「大寫十三年」口號雖有異議，但從總體上接受並執行了毛澤東關於在文藝戰線反對「修正主義」的指導思想。1963年4月，全國文聯在北京召開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周揚作了〈加強文藝戰線，反對修正主義〉的報告，把反對「修正主義」特別是蘇聯文藝上的「修正主義」作為當前的戰鬥任務。

二　批「兩界」

毛澤東本人的注意力愈來愈轉向知識界和文化界，對文藝界尤其是戲劇的不滿與日俱增。196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們搞十條，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實際上是反對國內的修正主義」，「反修也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文學、藝術、戲劇、電影、藝術等等都應該抓一下」。「要『推陳出新』，『陳』就是封建主義，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推出去，出社會主義。」他說，「過去的戲總是那一套，帝王將相，小姐丫鬟，保鏢就是黃天霸，搞這一套不行」。[1]同年11月，毛澤東兩次尖銳批評《戲劇報》和文化部。他說：「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主義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2]

1963年12月12日，中宣部編印的一份《文藝情況匯報》登載了〈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的文章。該文介紹上海抓評彈的長編新書目建設和培養農村故事員的做法。毛澤東看後，想用上海來促北京，促全國。他把此件批給北京市委的彭真、劉仁，並寫了一段批語。批語如下：

1　毛澤東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551。

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51。

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

這就是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兩個著名批示之一。批示很大程度上依據的是柯慶施提供的材料。柯因此於12月25日華東話劇匯演的開幕式上講話，大講他的「大寫十三年」的主張，並且嚴厲批評指責了文藝界：我們的戲劇工作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還很不相適應……對於反映社會主義現實生活和鬥爭，十五年來成績寥寥，不知幹了些甚麼事。他們熱衷於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戲劇，熱衷於提倡洋的東西、古的東西，大演「死人」、鬼戲，……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着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

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田漢趕來參加這次匯演。但批評戲劇界，田漢首當其衝，因為他是劇協主席。田漢在上海遭到冷遇，新年除夕晚宴主賓席竟沒有他的座位。大會即將結束，秘書處傳來消息，閉幕會主席台上沒有田漢的座位。為避免尷尬，田漢悄然離開了上海。這時，一般人還不知道有毛澤東的批示，但已聽到風聲，文藝界有事了。

毛澤東把批件批給彭真、劉仁，也表明他對北京戲劇界的不滿。但並非只是對北京市的批評。彭真看到指示後很緊張，打電話給周揚和林默涵，讓他們去看指示，認為這個問題要認真對待，要向政治局寫報告，請少奇同志來抓。

---

3 毛澤東：〈關於文學藝術的批示〉，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330－1331。

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藝術界三十餘人舉行座談會，由周揚傳達和闡述了毛澤東的上述文藝批示。鄧小平、彭真等參加並都講了話。看來，大家都認同毛澤東對文藝界問題的看法，都認為見事遲、抓得慢了。當周揚講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他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那些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緊接着，他提出田漢編劇的京劇《謝瑤環》的問題。他說：「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彭真說：「主席這個信是寫給我和劉仁同志的。主席為甚麼寫這個信？他就是覺得北京這個文藝隊伍是相當的鴉鴉烏。在文藝這個戰線上，我們的革命搞得比較差，可以說比較落後，也可以說最落後的。」「文藝戰線上的革命所以落後，首先是我們領導方面有責任。拿我來講，……在整個文藝上我沒有注意。……我看，你們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這方面的工作。這個問題可不能忽視。有很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因為看了小說，看了文藝作品。匈牙利事變的時候，並不是將軍組織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樂部。現在我們讓一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封建主義的東西在那裏泛濫，連我在內，我也是讓人家泛濫的一個，咱們大家分擔責任。我看，主席現在提出這個問題很及時，再不搞要吃虧，包括我們的子女，都要讓人家挖了牆腳。」[4] 鄧小平說：「現在看來可以說有三句話：第一句話，統一認識；第二句話，擬定規劃；第三句話：組織隊伍。」

正當中央着手整頓戲劇界之時，戲劇界又發生了「迎春晚會」事件。1964年2月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在政協禮堂舉行春節晚會，北京和外地的戲劇工作者二千多人參加。因為是文藝界人士舉辦的晚會，不免有一些新奇的布置和着裝。但此事被一位「思想警惕性很高」的參會者捅了上去，揭發晚會「着重的是吃喝玩樂，部分演員節目庸俗低級，趣味惡劣」。在此形勢下，揭發不啻是雪上加霜。陸定一對

4　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52－553。

此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劇協的一部分人已經腐敗；所有各協會工作人員都應該輪流下放鍛煉和加強政治學習」。

中宣部立即向劇協黨組織作了傳達，責成作出檢查。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總支書記和支部書記五十餘人，連續開會三次，進行討論。會議認為，「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當前階級鬥爭在文藝隊伍中的反映，是劇協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暴露」，並認為「類似『迎春晚會』這種事和由此而暴露出來的問題，在其他協會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因此，「有必要在文聯和各協會全體幹部中，進行一次整風學習，吸取教訓，使壞事變成好事」。此後，全國文聯及各協會開始了整風。參加整風的有全國文聯、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音樂協會、美術協會、電影工作者協會、曲藝工作者協會、舞蹈工作者協會、民間文藝研究會和攝影學會等十個單位全體幹部。經過二十多天的集中整頓學習，5月8日，中宣部文藝處寫出了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這個報告草稿認為文藝界中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一）沒有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文藝方向。在八屆十中全會前，各協會方向模糊，對階級鬥爭形勢認識不清。（二）文藝理論批評旗幟不鮮明，戰鬥性不強。（三）對文藝隊伍的進步一面看得多，落後一面看得少，忽視了對他們的思想改造工作。各協會負責人紛紛表示承認錯誤。中宣部據此寫出了報告。

但報告還未定稿，自稱「流動哨兵」的江青藉口個人要看，私自將這份草稿送交毛澤東。這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文藝界的惡感。6月11日，中央工作會議得出某種結論，認為高薪文學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學家都是修正主義社會基礎的一部分。

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起草的報告草稿上寫下了批示，這個批示也就是毛澤東關於文藝問題的第二個著名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

5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31。

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5] 這個批示事實上對問題的估計更加嚴重了。文藝界已「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再走一步，就變成「裴多菲俱樂部」，那就是要策動反革命政變了。這個批示一出，整個文藝界為之震驚。其對後來的歷史走向，產生了嚴重和長期的影響。1980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63年和1964年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中對文藝工作的指責，不符合實際情況，並且被後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所利用，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整個文學藝術、電影和戲劇界都呈風聲鶴唳狀。有人形容說：毛澤東的批示，「是一顆重磅炸彈。一陣刺骨的寒風，不僅吹走了電影界盼望的春天，還涉及其他文藝部門」。[6]

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舉行了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參加觀摩演出的有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二十八個劇團，二千多人。演出了《蘆蕩火種》（即《沙家浜》的原劇）、《紅燈記》、《奇襲白虎團》、《節振國》、《紅嫂》、《紅色娘子軍》、《草原英雄小姊妹》、《黛諾》、《六號門》、《智取威虎山》、《杜鵑山》、《洪湖赤衛隊》、《紅岩》、《革命自有後來人》、《朝陽溝》、《李雙雙》等劇目三十七個。這次匯演是在周恩來、彭真的親自關心下舉行的。這一批京劇現代戲是京劇界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勉力京劇改革的成果的匯萃。當時周恩來親自抓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編導和排練。

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在開幕詞中說：「今天這樣多的京劇團集中北京演出，舞台上既沒有帝王將相，也沒有才子佳人，都是新時代的工農兵形象，這在京劇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也是戲曲歷史上所沒有的。」陸定一講話說：我們要立定志向，努力工作，保證我們的後代不出修正主義，保證資本主義在我國永遠不能復辟。周信芳講話說：我們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和決心，把京劇這一武器拿到無產階級手裏，根據

6　沈容：《紅色記憶》（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頁129。

社會主義的原則加以改造，使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匯演期間觀看了《智取威虎山》等劇。

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江青早就處心積慮地把京劇「這一武器」拿到自己手裏，把自己裝扮成京劇革命乃至文化革命的「旗手」。她的辦法是兩手，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創作」，用她的話說，叫做「大破大立」。她首先插手《紅燈記》的創作，把《紅燈記》打上了「江記」的戳號。繼而又把《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抓在自己手裏，後來又抓了《奇襲白虎團》、《龍江頌》和《海港》以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把這幾個劇樹為八塊「樣板」。

1964年6月23日，周恩來召集部分演出人員座談會，江青公開出席，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演說，江青因掌握了毛澤東的批示精神，底氣十足，一派「旗手」口吻：我對這次演出表示祝賀……對京劇演革命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佔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那是不能設想的事……，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明方向。江青煞有介事地提出一個令人「驚心動魂」的數字。她說：全國的劇團有3000個，其中90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80多個是文工團，其餘2800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90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佔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引人注意的是，江青三次表揚上海，卻一句不提北京。表揚上海，也就是表揚柯慶施。

6月26日，毛澤東對江青的這次講話批示道：「講得好。」在對現狀日益不滿的情況下，毛澤東愈來愈讓自己的夫人出面，來轉達自己的想法。7月31日，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的總結會上，周揚作了總結報告後，康生點了一大批電影、戲劇作品的名，其中有《北國江南》、《舞台姐妹》、《逆風千里》、《林家鋪子》、《早春二

月》、《不夜城》等，還有京劇《謝瑤環》、崑曲《李慧娘》。康說，這些都是「大毒草」。康並公開點名批判田漢。

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第二個批示，使整個文藝界為之震動，文化部更是首當其衝。毛澤東親自召開了一次會，有彭真、陸定一、康生等人參加，專門批評文化部，也批了中宣部和周揚。會上提出要徹底整頓文化部，指定由陸定一、彭真、周揚三人組成領導小組，由陸定一主持。陸當場表示自己「見事遲」，不宜由他主持，建議由彭真掛帥。毛表示同意，並點名康生和吳冷西也參加小組工作。

7月7日，中央書記處開會，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根據毛澤東的提名，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五人小組，以彭真為組長，負責「貫徹中央和主席關於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批示」。後來，這個小組稱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三線建設工作匯報時插話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裏。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裏？20%？30%？或者是一半，還是大部分不在我們手裏？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裏。」說着，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齊燕銘也不好，聽說他是你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還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整個文化部都垮了。」

在文化部整風的同時，公開報刊對文藝作品的批判範圍日益擴大。8月14日，中宣部向中央書記處寫了〈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毛澤東閱後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別的，都需要批判。」之後，先後被公開批判的影片有：《北國江南》(陽翰笙編劇，沈浮導演）、《早春二月》(謝鐵驪編劇、導演）、《舞台姐妹》(林保等編劇，謝晉導演）、《紅日》(瞿白音編劇，湯曉丹導演）、《兵臨城下》(白刃、林農編劇，林農導演）、《革命家庭》(夏衍、水華編劇，水華導演）、《林家鋪子》(夏衍編劇，水華導演）、《聶耳》(于伶等編劇、鄭君里導演）、《怒潮》(吳自立等編劇，史文幟導演）、《不夜城》(1958年7月即已開始被批判）、《兩家人》、《球

迷》、《逆風千里》、《抓壯丁》等。被批判的戲劇則有《李慧娘》和《謝瑤環》。

被批判的小說更多，據人民大學戴知賢教授統計，有六十五部之多。其罪名大約歸為六類：一、反黨反毛主席，為高崗、彭德懷樹碑立傳；二、歌頌錯誤路線，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三、歪曲階級鬥爭，宣揚階級調和論、人性論、和平主義；四、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五、醜化工農兵，歌頌美化敵人；六、大寫「中間人物」，反對塑造工農兵美好形象。被批判的作家達五十五位，包括楊沫、梁斌、歐陽山、丁玲、王願堅、周而復、秦兆陽、沙汀、艾蕪、茹志鵑、周立波、曲波、馬識途、趙樹理、陳翔鶴、李准、康濯、馬烽等幾乎所有優秀小說家。這些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時，遭遇更慘，或傷、或殘，或關牛棚、或入牢獄，有的被迫害致死，如趙樹理、周立波、陳翔鶴等。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字獄從這裏開始。

批判還擴大到一些文藝理論觀點。如在電影界，批判了瞿白音的〈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也遭批判。特別突出的，是批判了「寫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作協書記處書記邵荃麟（也是作協黨組書記）主持，茅盾、周揚作了報告。邵荃麟在講話中，針對幾年來文藝創作主題狹窄、方法簡單化、模式化和教條主義偏向，提出文藝題材和創作方法要多樣化。不但要寫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還要寫中間人物，要向現實生活突進一步。這些論點，後來被說成是主張寫「中間人物」來「反對寫英雄人物」，是要「在文藝創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爭地盤」，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是「同毛澤東文藝思想針鋒相對的現代修正主義的文學主張」。邵荃麟則被指斥為「資產階級中間抵抗社會主義革命力量在黨的文藝領導機構中的代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等人把這次大連座談會誣為「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的黑會」，邵荃麟則被作為「黑幫分子」、「叛徒」、「反革命」批鬥，1971年6月10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說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這話不錯，知識界也不例外。文化批判確實培養了一批「左派」，他們或從這種批判

中找到了快感；或希望通過批判名家出人頭地；也有虔誠的信奉者以參加一場「聖戰」而感到神聖。因而，文化批判有不可遏止的勢頭，無產階級快沒有自己的作家和作品了，剩下的只有擅寫批判文章的「棍子」。這使主持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者有大水沖了龍王廟的感覺，他們試圖控制局面。1965年2月23日，周揚召集各協會和主要報刊負責人會議，提出寫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亂猜」、「亂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絕對化」，不能搞「教條主義」；並強調對夏衍、田漢等「要有歷史觀點」，「要一分為二」，「政治與學術要分開」。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說：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戲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麼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趕快剎車。

1965年4月，文化部、全國文聯和各協會的整風結束。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覆〉，免去了齊燕銘、夏衍等文化部副部長職務。5月，改組了文化部領導，成立了以蕭望東（原南京軍區副政委）為書記，石西民、顏金生（軍隊紅軍老幹部）為副書記的新黨組。一年以後，這個新黨組也被砸爛了。鄧小平講話和整風結束，文化部改組，有使文化批判降溫的用意。然而，到這時，已經欲罷不能了。對毛澤東來說，事情還沒有開始。

文藝界的批判，很快擴展到了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教育學、醫藥衛生界等各個學術領域。把反修鬥爭擴大到各個學術領域，這首先是從國際反修鬥爭提出來的。1963年10月到11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擴大會，專門貫徹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10月26日，周揚在會上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報告，系統地論述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任務。11月13日，劉少奇也到會作反修報告，他提出：「在哲學、社會科學各個戰線上要更進一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綱，來帶動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也帶動各方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術研

究和寫作工作。」[7] 12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發通知，要把國際反修的批判領域擴大到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方面。為此專門成立了反修指導小組，並且先後在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成立了反修小組。

反修鬥爭的視野從國際轉向國內，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當中，「理論權威」康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親手製造的一場學術圍剿，是對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批判。中國的哲學離政治太近了。哲學是甚麼？哲學就是詮釋的工具，詮釋政治、詮釋政策、詮釋領導人的言論。政治風向一變，哲學也跟着變，弄得自己莫衷一是。這是哲學的幸還是不幸？楊獻珍有些不同，他想說點自己的話。楊是一位資深的革命者，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953年正當展開社會主義改造時，楊獻珍不同意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是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認為仍然是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結果被概括為「綜合經濟基礎論」受到批判；1958年哲學界發生「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爭論，楊獻珍不同意把「同一性」視為「等同」。康生報告毛澤東，毛說：「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散布出來，楊獻珍「反毛主席」，結果受到批判。強調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實際上是為當時「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唯意志論提供理論支持的。而楊獻珍恰恰對這種主觀唯心主義進行了嚴厲譴責。1958年11月，他對學員說：「大躍進」中一些人沖昏了頭腦。

1959年6月，楊獻珍對地方黨校來訪者談話，尖銳批評了大躍進中各地弄虛作假的惡劣作風。7月，他又在一次報告中批評一些地方大躍進「現實主義百分之一，浪漫主義百分九十九」。這些情報都反映到康生那裏，廬山會議後，康生布置在中央黨校展開對楊獻珍的批判鬥爭，達八九個月之久，罪名是「反對三面紅旗」。楊被迫寫了〈向黨低頭認罪〉的檢討書，康生才暫時放過，楊的職務由中央黨校校長降為副校長。然而，時間不過兩年，楊獻珍又面臨了一場更大的災難。大禍是由一個哲學命題引起的。「一分為二」是毛澤東對列寧關

---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84。

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概括。1964年4月楊獻珍在一次講課中卻提出「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對立統一的表達方法。聽到楊的闡述，黨校教員艾恆武、林青山心有所感，寫了一篇〈「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文章，5月29日登在《光明日報》上。《光明日報》在艾、林的文章刊出前，將清樣送給了康生。這時，康生直接領導着一個「反修哲學寫作小組」，專門炮製「反修文章」，主要成員有關鋒、林聿時、吳傳啟、林杰、張恩慈等。他們正在搜尋批判對象，看到艾、林的文章，如獲至寶。康生「一看有問題」，艾、林「是楊獻珍的代言人」。關鋒看到清樣後說：「這可是一條大魚，應當捉住，不能讓它縮回去。」「反修哲學小組」根據康生批示寫了〈「合二為一」不是辯證法〉一文。6月5日，登在《光明日報》上，署名項晴。文章說：「『一分為二』同『合二而一』是對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調和矛盾。」康生利用全國京劇匯演大會開會之機，把艾、林的文章與項晴的文章交給江青，請她「送主席看」。康生慣用的辦法是先拿到「尚方寶劍」，再展開批判。

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會上發話：「『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號召展開對「合二而一」的批判。毛澤東如此表態，不只是「合二而一」的提法觸犯了他的權威，更因為他認為這與「反修」和「革命」路線唱反調。他在國際國內正在進行一場旨在打倒修正主義的革命運動，強調鬥爭、矛盾、樹立對立面、反對帝修反，強調世界革命和國際共運可以一分為二，黨內也可以一分為二。這時突然冒出「合二而一」，這顯然是為修正主義張目。毛澤東的表態，使康生有了「整」人的武器，於是他發動了對「合二而一」和楊獻珍的批判。康生採取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即登一些贊成「合二而一」或雖不贊成但是進行學術討論的文章，釣更多的人上鈎，然後再反擊和批判。1966年10月5日康生不無得意地說的：「1964年『合二而一』的鬥爭，開始像是學術鬥爭，我們有意識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講話。以後點了楊獻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這個鬥爭一來，楊獻珍就垮了。」

這場批判聲勢浩大。從1964年6月至9月，康生先後九次親自召開會議布置批判文章。《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等黨刊都登載了點名批判楊獻珍的文章。到1964年底，中央和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文章達五百篇之多。除哲學界都動員以外，還以工農兵的名義發表哲學批判文章。經過一場批判鬥爭，1965年3月1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委會向中央作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報告說：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一夥，是個小赫魯曉夫。他把高級黨校搞成獨立王國，幹了許多壞事」。其「主要錯誤」是：「一、反對毛澤東思想。」「二、製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三、攻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四、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颳單幹風。」「五、攻擊歷次政治運動，大鬧翻案風。」「六、同彭德懷一道反黨。」「七、站在赫魯曉夫一邊。」「八、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九、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進行宗派活動。」「十、企圖抓全國黨校領導權，並且伸手到許多方面去。」9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高級黨校的報告，撤銷楊獻珍的職務。楊獻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嚴重的迫害，在監獄「監護審查」達八年之久。受這一冤案牽連，有兩人（孫定國、黎明）遭迫害致死，黨校受批判者達一百五十餘人，社會上受到牽連者難以統計。

受到嚴重批判的還有北京大學教授、哲學家馮定的兩本書《平凡的真理》和《共產主義人生觀》。馮定的這兩本通俗哲學讀本，出版發行量甚大，在青年人中有廣泛影響。然而，康生作出批示，認定它為修正主義的毒草。兩本宣揚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書之所以一夜之間變成「毒草」，原來起因是書中說了這樣兩句話：「不能誇大個人的作用」和「不應該將領袖神化」。在當時氛圍下，這當然是犯了大忌的，成了攻擊「偉大領袖」的罪證。幾個月之內，全國各種報刊發表批判文章數百篇。

1964年下半年，康生、陳伯達在圍攻楊獻珍、馮定的同時，還開始組織圍攻經濟學家孫冶方。1924年入黨的孫冶方，為黨內資格甚老的經濟學家。可貴的是，他不戀官場，而是致力於學問。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孫冶方針對中國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上的弊病，提出提高經濟效果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關鍵；在計劃經濟中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要正確運用經濟槓桿，提高利潤指標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要擴大並適當規定經營管理的權限，正確處理國家集中領導和企業獨立經營的關係；要提高固定資金折舊率，加強對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等等。在1961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的一次理論會上，孫冶方對價值規律、利潤、獎金和企業的自主權等問題發表了系統鮮明的看法。顯然，這些觀點是社會主義社會關於經濟理論研究的有創見的思想，也是糾「左」的，它對改革傳統體制模式進行了寶貴的探索。但康生卻把孫冶方的觀點作為「修正主義」思想報告了毛澤東，並說孫冶方比蘇聯的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1964年下半年，孫冶方受到圍剿批判。康生、陳伯達說他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文革」中，孫冶方被關進監獄達七、八年之久。然而，孫冶方其人，兼有學者的剛直不阿和革命者的堅韌不屈的秉性。他凜然應戰，決不認錯。在獄中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寫他的政治經濟學。1975年4月10日，孫冶方獲釋出獄。他下車就對接他的人說：「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

由以上對文藝界和知識界等「兩界」的批判，暴露出黨內存在的一系列理論觀點和政治取向的分歧。如果說，在概念上「文化大革命」係專指文化領域的「革命」，那麼革文化的命的運動，從1963至1964年就已經開始了。

三　「兩個主席吵架」

國際反修、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這一系列的鬥爭，使社會政治氣氛愈來愈緊張。反修鬥爭不僅使農村基層幹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黨本身乃至中央內部的關係也不正常起來。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愈

來愈感到隔膜和不滿。說到「一線、二線」體制，這其實是毛澤東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談到「一線、二線」問題時說：「想要使國家安全，鑑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8]

這雖然是毛澤東後來的說法，但「一線、二線」的設立，的確是毛澤東根據蘇聯的經驗而考慮的「國家安全」措施。50年代後期，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決辭去國家主席一職，還有一條理由，是要擺脫「雜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從毛澤東的個人性格來說，豪氣干雲和見微知著兩者兼而有之。在領袖地位牢牢確定之後，他更願意的是在書齋裏鑽研問題，似乎中國古代文化的精奧和世界新事物的離奇，對他產生着無窮的吸引力。當然，他已經是一個偉大民族的領袖，但真正的領袖並非事必躬親的「操盤手」。領袖應該是永遠處於高瞻遠矚和深邃思想的高處，指導人民朝既定方向前進的人。他年輕時說過，自己既有「聖賢傳教」的一面，又有「豪傑辦事」的一面。現在辦事的一面愈來愈離他遠去，而傳播思想的一面卻愈來愈向他走來。他的思想闡釋，已經在中國革命中是無人可以企及的了。當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內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愈來愈多，而國家主席一職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又不勝其煩時，他極力想擺脫「雜務」，專注於研究，這符合毛澤東的性格。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處於一線，是毛的安排。例如毛澤東自己指定了劉少奇為接班人，這是他對蒙哥馬利元帥

8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50。

說的。1959年4月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1961年9月毛澤東又講過以後「兩個主席都姓劉」。

然而，這種「一線、二線」體制和個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難處理的問題是「一線、二線」的關係。甚麼需要呈報「二線」決斷，甚麼可由「一線」處理，全憑信任。毛澤東退居二線，專注理論，但他畢竟本質上是個革命家、政治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指導實踐。起初，他自信不當國家主席，「個人威信不會……有所減損」，「在必要時，我仍可以作主題報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線之時，發生了「大躍進」、廬山會議、三年困難這一連串的事變，他自感威信受到了減損。尤其是當他認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傾」、「動搖」，「是壓我的」以後，產生了對第一線尤其對劉少奇的不滿。1962年召開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把問題「抖出來」，是對第一線的一次嚴重警告。

1964年，從反修防修出發，毛澤東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幹部都要下去蹲點，可忙於體制內既定程序工作的幹部們卻遲遲推不動，就是有些人不願下去。為了落實毛的指示，劉少奇叫中央組織部長具體安排，並且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連公社書記也不能當。」這樣一來，全黨聞風而動。僅北京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關，司局長以上幹部就下去了一千多個。這給了毛澤東深深的觸動：還是少奇的話管用。在這之後，又發生了赫魯曉夫被趕下台，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事件，這不能不對毛澤東發生影響。在11月底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不知劉少奇是否聽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論事回答說：「我搞不來這麼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毛澤東說：「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

恰在這時，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在社教運動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關於運動的搞法，毛澤東實際上不贊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團作戰」，不贊成運動主要依靠工作隊紮根串連、而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在他多次的批示中，透露他對劉少奇的做法是勉強「同意」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開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會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就連毛澤東讚揚的大寨的領頭人陳永貴也受到了衝擊，還是周恩來親自發話，保陳過關的。這很容易引起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

不過，毛澤東並不認為劉少奇「左」，而認為他是「形『左』實右」。即，沒有弄清主要矛盾和運動的性質。關於主要矛盾和運動性質，劉少奇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對問題的性質看得嚴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看了薄一波轉報的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陳正人在寫給薄一波的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裏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規定，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在信上旁批說：「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在兩個文件上做了言詞激烈的批註。他寫道：「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按指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

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9]

同一天，毛澤東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宴請羅代表團的報告上批示道：他們看我們的幹群關係不準確，我們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他們不感覺，我們的大批官僚資產階級壞幹部在他們看來正是好人。

「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官僚資產階級壞幹部」，從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黨內特別是黨的幹部隊伍的「階級鬥爭」看得十分嚴重了。它已經不是少數「分子」，而是形成了一個「階級」。他心目中的革命對象，也不是一般幹部，主要是領導幹部。事實上，已經需要對黨本身進行一次「革命」了。只不過這些批示還沒有公開。但凡是看到這兩條批示的人，無不感到震動。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乘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因此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當時認為，進行一般的工作匯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而在另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

會議只開了幾天，毛澤東還沒出面就要結束。這時毛澤東已忍無可忍，憤怒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

9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388－1389。

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不容置疑地下了命令。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繼續開會。12月20日，毛澤東來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對話，使分歧公開了。這次公開衝突成了毛劉決裂的轉折點。爭論的焦點是社教運動的重點應當指向哪裏。

毛澤東主張重點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地富是後台老闆，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劉少奇這一次沒有附和毛的話。他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有甚麼矛盾解決甚麼矛盾。他說：「有三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幹部。有的幹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錯誤，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地富當了權的。」毛澤東說：「不要管甚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就沒有希望。」毛澤東說：「無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打有拉，這套策略，我看現在還用得着，現在這個黨內就是國共合作嘛！也有統一戰線。」「還有少數爛掉了，省委也有爛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爛掉了！你青海不是爛掉了！貴州不是爛掉了！甘肅不是爛掉了！雲南還是『個別』的，不夠。河南吳芝圃『左』的很嘛！」毛澤東接着講下去：「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着手不行。」李先念插話說：「不整當權派，最後就整到貧下中農頭上。」毛澤東肯定地說：「根本問題就在這裏！」他唸了杜甫的四句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接着說：「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們對冶金部也是擒賊先擒王，擒王鶴壽嘛！」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種矛盾交叉。」

毛澤東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堅持說：「還是有甚麼問題解決甚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這一句脫口而出的定性，使張霖之成為「文革」的第一批高級幹部的殉難者之一。

與會者們面面相覷。會場有些僵持不下。毛澤東轉換話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做法。他說：「擠牙膏，擠那樣乾淨？寬大處理嘛！退賠從嚴對，要合情合理，不必講徹底。」毛澤東說：「有的地方只有十戶八戶，沒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寬，不可打擊面過寬，二不可潑冷水，不要下去潑！現在還在反右。」「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毛澤東既強調「打擊面不要太寬」，一方面又強調「不要潑冷水」，他這樣解釋自己的想法。他說：「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一則擔心把運動搞到一般群眾中去，二則擔心糾纏一般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忽視了重點：走資派。在他看來，危險就在這裏。[10]

20日的會議使參加者們的心情格外沉重起來。

然而，毛澤東餘慍未消。

12月26日，是毛澤東七十一歲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壽宴就擺在中南海毛澤東的住所。操辦者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吃飯，一共三桌。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夫婦、胡耀邦、陶鑄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柯慶施未到場。被請的還有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範人物。

10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68－1371。

毛澤東自己的兒女，一個也沒來。當時小女兒李納響應號召，下鄉未回，大女兒李敏來祝壽，毛澤東硬是不讓她參加。客人們陸續來到。陶鑄、曾志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是最早一批來到主席處的。不一會，毛澤東走了進來，環視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諸侯」。「坐麼，大家都坐麼。」毛澤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七十一歲了。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飯……」一絲悲涼和傷感，大家無言以對。此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及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也陸續來到。毛澤東提高了嗓門：「今天李敏回來了。我問，你回來幹甚麼？李敏說：給您祝生日。我說：你沒資格。因為你不下鄉！」「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作大了，驕嬌之氣。拒絕到農村去，城市裏生活舒適喲，不出修正主義才見鬼！」毛澤東大聲說着，誰都知道，這不是在說李敏。李富春和蔡暢夫婦來到了。他們與毛澤東是世交，關係與眾不同。「富春啊，」毛澤東扭過頭來大聲地對李富春說：「你們甚麼事情都不同我講，啊，甚麼話都不同我說。現在甚麼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這沒頭沒腦的責備，顯然弦外有音。

大家心裏也明白，「搞獨立王國」雖然是面對李富春說的，但決不是批評李富春。劉少奇、鄧小平同樣一言不發地大口吸煙。幸好江青走過來招呼大家入席。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澤東的左右，陶鑄夫婦和羅瑞卿分在主席這一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胡耀邦及各大區書記及江青本人，則分坐在另外兩桌。這種安排是毛澤東親自囑咐的。「大官」們只有陶鑄夫婦有與主席坐在一桌的殊榮，表明毛澤東對陶鑄的信任。

席間，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說話，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其他人都默不作聲。參與者只記得毛澤東大聲地讚揚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錢學森是中國的導彈之父，為不久之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並沒有提到這件事，只是表揚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毛澤東大聲地批評社教運動中「只靠工作隊，搞神秘主義，打擊面過寬」

的問題。他說：「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大隊，誰更了解那裏的情況？只有群眾。」說到這裏，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劃：「我是要坐在群眾一邊的。」這一劃，在黨政軍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劃出了一條界限，也在毛澤東自己與各級「當權派」之間劃了一道界限。當然這是想像中的一道界限。但這一劃，確使參加宴會者心裏一驚。曾志回憶說：「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麼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的磣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裏嘻笑斥責，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鑄後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澤東又來到會場。他帶來兩本書放在桌子上，一本是《黨章》，一本是《憲法》。然後發言。再次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他還聯繫到1962年的「包產到戶」和「單幹風」，說：「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毛澤東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毛接着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毛澤東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毛澤東講這些話，許多人摸不着頭腦，不知指誰。劉少奇、鄧小平沉默不語。會場的空氣近乎凝固了。從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到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其間只過去了三年，中共中央核心內部的人際關係，已經惡化到了這樣的程度。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講到「霸王別姬」，警告幹部們不要鬧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可是，他現在倒像是「寡人」了。他一個人拿着黨章和憲法，對中央一線領導人發難，究竟是他還是別人掌握着真理呢？如果歷史是可解的，那麼，我們的結論可能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而應該是歷史的：毛那一代人面對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他們一定會那麼做。

四 「二十三條」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分歧，在會外還很少人知道。但已經透露的各種跡象，還是使各省市感覺到了一些政治的異樣。因為，剛發到手的〈十七條〉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銷毀。〈十七條〉原是會議前半段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一個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內容比較簡單，只有十六條。根據會上討論意見，又反覆修改為十七條。12月24日和27日，毛澤東批示「照辦」、「照發」。12月28日，由彭真批發，以中央118號文件發出。〈十七條〉根據毛澤東12月20日講話，已經加進了關於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和「重點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包括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當權派」的提法。

文件發出後，12月30日，毛澤東又授意陳伯達在〈十七條〉關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段話中作了如下修改：「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在幕後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改的第二頁倒數三行文字，重印。請少奇同志閱後交機要室辦。這是伯達同志建議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則請交辦。」經劉少奇同意，中央辦公廳發文說，118號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請停止下發，並自行銷毀。」

陳伯達是毛澤東的三位政治秘書之一。另外的兩位胡喬木在養病，田家英已受政治冷落，陳伯達是活動在核心左右的唯一秘書（是政治地位很高的秘書，陳在1956年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其人在政治漩渦中善於舞動長袖，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跟緊人」。至於跟錯跟對，就是天算了。1964年，陳曾對劉少奇表現得很尊重。「桃園經驗」的推廣下發，讓劉少奇掛帥統管農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積極建議的。然而，當看到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時，陳伯達迅速調整情緒，緊跟毛澤東。12月27日他在會上從「理論」上批評了劉少奇的兩個提法。他說：「所謂清

不清，歷代就有這個問題，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國民黨也說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質。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確的，性質不清楚，就會迷失方向的。」陳的發言，得到毛的讚賞。後來毛澤東修改文件時，特別把這個意見寫了進去。停發〈十七條〉，也是陳伯達建議的。這使毛劉之間的分歧更加明朗化。由於〈十七條〉停發，會議又繼續開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屆人大選舉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當天，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劉少奇解釋說：「工作隊集中學習文件是為了反右傾。」毛澤東嚴厲地說：「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第二個〈十條〉「太長了，太繁了。」毛澤東提出：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紮根串連」，要依靠群眾，清少數人。「有則清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澤東對各大區書記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的第一個十條，為甚麼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毛澤東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指書記處，一個是指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對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內容從十七條變為二十三條。改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月14日，會議討論通過，由彭真送毛澤東審閱後，正式發出。此次會議結束。

毛澤東在修改〈二十三條〉時，加進了嚴厲批評了「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話。他寫道：「這兩種提法」「不說是甚麼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甚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甚麼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甚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段話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的名，但毛劉的爭論事實上半公開化了。知情的中上層幹部憂心忡忡。因為毛劉之間的分歧不同於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分歧。毛劉分歧可

能導致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變動。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會後，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受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數人的委託，向劉少奇進言：「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無論如何不能和毛主席發生矛盾啊！」劉接受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自我批評，以後，又在自己的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劉少奇檢討了不尊重主席的錯誤，常委們批評了劉少奇。然而，兩個主席之間的裂痕，已難以彌合了。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裏，劉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毛澤東已明顯不再信任劉少奇，甚至也不信任在一線工作的書記處了。正是這次的分歧，使毛澤東下了徹底同劉少奇決裂的決心。正如薄一波回憶說：毛劉分歧「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裏提到「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上講：「引起我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1970年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毛在回答甚麼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的問題時說：「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不管這些事後的追憶是否符合實情，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毛澤東多次講「身邊的赫魯曉夫」，原來已指向劉少奇。

高層分歧，基層並不了解。〈二十三條〉關於「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也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倒是〈二十三條〉關於糾正「左」的偏差的規定，如盡早解放一批幹部，退賠可以減緩減免，嚴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實際中發生了影響。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縣召開的十萬人廣播大會上講話調子就比較溫和，特別強調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強調抓緊生產鬥爭問題。彭真的講話錄音由劉少奇、鄧小平批轉全國各地，起了一定的「降溫」作用。〈二十三條〉下達後，各地糾正了「四清」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運動向平穩方面發展。在整個運動中，工農業生產一直是正常的。

五　醞釀「新革命」

各地「四清」運動在抓緊進行，而毛澤東本人卻對這場運動不太感興趣了。他認為四清運動、文化戰線的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國結束「四清」運動的有694個縣、市，佔總數32%，正當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時，「文化大革命」運動興起，「四清」運動實際上不了了之。

1963年、1964年，中國政壇在「階級鬥爭」的輿論下，持續緊張。感到壓力最直接的要數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那些高層領導人。他們紛紛檢查，以求「回到正確方面」來。1964年下半年，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再次被批判，與1963年比，這次罪加一等，名曰「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年底，中央決定撤掉了他的部長職務，隨後又被撤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職。李維漢被迫承認犯了「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錯誤。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覺得自己已是快七十歲的人了，如果硬頂着不檢查，被開除黨籍，再為黨做工作的機會就沒有了。」陳雲原本以沉默相應對。然而，毛澤東不斷地批「三自一包」，後又與劉少奇發生正面衝突。這使陳雲感到愈來愈大的壓力。1965年6月18日，陳雲再次向毛澤東書面檢討自己1962年「對農業恢復速度的估計」，以及「用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的「右傾錯誤」。他在信中解釋說：因為重新分田是「一件極大的事」，所以「只和我的秘書和研究糧食問題的幾位同志談過」，「只向你和中央常委中幾個同志（陳雲當時沒有同朱德談過此事）提出了這個意見」，「未在別處亂說」。[11] 信中說：「在1962年，我對農業恢復速度的估計：糧食方面，每年只能增長2%－3%，因此，要由2800億斤糧食恢復到3600餘億斤，需要八年時間。經濟作物的恢復更要遲些。現在事實上三年就恢復了。這完全證明了我的估計是錯誤的。1962年7月初，我曾經向你提出，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355。

同時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幾位同志談過，用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產量。這個意見是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它關係到農業方向集體經濟與小個體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現在用加強集體經濟的辦法，三年就恢復了農業，如果用分田的辦法，可以想是資本主義會大發展，後患不堪設想。思想根源，在於沒有把人與物的關係搞準，沒有人的因素第一這種思想。這是右傾錯誤。」陳雲的自我批評，是誠懇而又攬過的。但毛澤東還是點名批評了他。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更明確地批評說：「修正主義是一種瘟疫。1962年在國際上在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是陳雲，而且對我們講，不僅要包產到戶，還要分田到戶。說這樣四年才會恢復，解放軍也會擁護。鄧子恢到處亂竄，颳單幹風。陳雲還守紀律，但是最厲害。」但講過之後，毛澤東沒有對陳雲再深究。在他看來，主要危險並不來自陳雲。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來訪的美國友人斯諾。他再次提到了「死」。斯諾問：中美關係改善有沒有希望？毛答：「我看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他轉向在座的鄧小平，「也許你們有希望」。毛澤東說到要「見上帝」有數次之多，每次都有不同的「語境」，或感慨，或激將，引出人們的各種話題和猜想。但無論怎樣說，他決無退隱之意。他的真實心理，可用王任重所記1965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一段插話，和他同護士吳旭君的談話來說明。王任重記：毛澤東說：「我快要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12] 吳旭君回憶，毛澤東對她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不改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13] 有理由

12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96。

13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89－1390。

相信，這兩段話是毛澤東真情表露。它們為解釋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複雜多變的歷史，提供了相當精準的「密碼」，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毛澤東是壯心未已的人。在他心中，理想和期許是不能改變的。面對世界和中國一系列不滿意的事情，他怎能甘心去見馬克思、見上帝呢。他一定要採取重大的行動，改變現實，最終實現自己不可動搖的信念。從性格說，毛澤東最大的特點應該是挑戰。他以向大自然挑戰，向國內外敵人挑戰，向生命極限挑戰為樂事。他說過：「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對他來說，壓力只能激發挑戰的欲望。

1965年5月，毛澤東南下來到武漢。他以七十一歲的高齡再一次暢游長江。他對陪同他游長江的青年人說：「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游完長江，毛澤東重新登上他闊別三十八年的井岡山。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也是毛澤東奮鬥成功的出發地。重上井岡山，使他感慨萬千。他連續寫下兩首詞作：調寄「水調歌頭」和調寄「念奴嬌」。兩首詞後來都為中國人所傳誦。詞中有這樣的長短句：「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可謂以詩言志的絕品。

毛澤東此時重上井岡山，決不只是故地尋蹤。他要找回的是當年風雷激動、旌旗奮起的豪情。據陪同他上山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回憶，一路上都想匯報四清工作，但毛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14] 後來人們才知道，毛澤東此時已經在醞釀新的革命了。

這年，毛澤東雖然有時與劉少奇同時出現在公開場合，但已很少思想溝通。當年夏，法國文化部長安得烈．羅爾羅斯來訪，他按照外

14　龔固忠等主編：《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頁278。

交禮儀，向中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遞交了戴高樂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中國官員順序站在劉少奇之後。然而，羅爾羅斯看出來，站在另外一邊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主角。遞交信件後，開始談話，始終是毛澤東講話，劉少奇等「只是一群緘默的證人」，羅爾羅斯回憶道，「毛澤東低語道：我是獨自和群眾在一起的……」這年，毛澤東很少呆在北京，他長時間在外地巡視，同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軍區領導人談話，打招呼。其中最主要的話題，就是「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主要討論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和長遠規劃。9月18日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到會講話。他首先講到國際形勢，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蔣介石一直在叫反攻大陸，越戰升級。現在不單是加強戰備，戰爭實際上在越南打起來了，問題在於我們要準備大打，準備美帝投原子彈，打世界大戰。他提出要「誘敵深入」、「關起門來打狗」。主動大撤退，全民皆兵。毛澤東關於戰爭的一番論述，使與會者都思想準備不足。遵照毛的指示，9月1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羅瑞卿等立即行動起來，召集軍委座談會，研究國內外形勢及可能的戰爭前景和戰略方針問題。

在1964年9至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這次會議毛澤東又這樣說，實際是說得很肯定了。彭真尚不懂毛的話的實在含義，因此在10月12日的會上隨着說：「恐怕我們的各級黨委就要把黨一直抓下去。因為出不出修正主義，還是在黨。黨裏面不出修正主義，別處出了也不大要緊。」毛澤東這時插話：「中央出了，你們地方不出，不要緊。」「中央幾個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於地方出了，中央照樣出，那就不好了。」毛還插話說：「靠老爺，不靠人民，你有飯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貧下中農。工廠裏也有這個問題。」[15] 10月10日，毛澤東同中央局第一書記們談話時說：「如果

15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96。

出了赫魯曉夫，那有了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還說：「小三線很重要。有人說分散了怕造反。我看兩條：準備化為水，不怕造反。」「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於美國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在地方搞起的。」[16] 兩天後，毛澤東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繼續發表他的「造反」言論：「我不怕你們造反。你們製造機器，製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你們不要年年造反喲，如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造反，那你還不是修正主義嗎？而一個省也造不起來。」[17] 在正常情況下，這番「造反言論」可以說是離奇之至，即使在當時，中央大員們大約也是聽得一頭霧水。

而在這之前，毛澤東已作出一個決定，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外放任職。彭德懷去西南三線任副總指揮，黃克誠去山西任副省長。有人解釋說，這表明毛澤東在反省自己，從大局出發，捐棄前嫌，重新安排彭、黃、張的工作。其實，沒有證據表明此時毛澤東有反省之意，相反，由康生主持的彭德懷、習仲勳的專案組正加緊工作，寫出報告，認定「彭德懷和黃克誠這些人是反革命、階級敵人。」因此，真實考慮很可能是：正當戰備緊鑼密鼓、國內「反修」鬥爭醞釀大行動之時，毛澤東認為彭德懷、黃克誠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必須分配到外地。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這時毛澤東正授意江青組織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而批《海瑞罷官》，就是批為彭德懷翻案。正是彭德懷到達三線的當天，《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

16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95。

17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95－1396。

六　點火

批判《海瑞罷官》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7月。江青曾向毛澤東進讒言，但當時毛沒表態。1964年，江青對林默涵說，《海瑞罷官》劇本很壞，主張分田，同單幹風有聯繫，只是還沒有提出罷官問題。她又找周揚談了這件事。周左右為難，在中宣部的一次會上周說：在《海瑞罷官》問題上，我們欠了一筆債，怎麼辦？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李希凡沒接受。於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再次尋找柯慶施的支持。江青的行動，是得到毛澤東的同意的，但瞞過了中央政治局的所有人。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專門說過這件事：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匯演以前，作了些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要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1967年9月，毛澤東自己在同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談話中，也談到這件事的經過。他說：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

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從毛澤東這段話看，他不只是「同意」，而且是「建議」。江青1963年批《李慧娘》曾得到過柯慶施的支持。那時，上海同北京唱對台戲的味道，已經很明顯了。這回江青再次求助柯慶施，柯一口答應下來，把任務交給了張春橋。張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1964年時受江青之託修改京劇《奇襲白虎團》，與江青已有密切來往。張春橋本就是一個寫批判文章的高手。1957年《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許多批「右派」文章，都出自張春橋之手。1958年，張寫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深得毛澤東的讚譽，從此引起注意。然而，張春橋其人，城府甚深。他知道此事來頭不小，從而寧願退居幕後，於是向江青推薦了上海一位「青年文藝評論家」，此人就是姚文元。

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姚蓬子是舊上海的一位文化名人，出版家，曾為左翼作家聯盟成員，但在1933年被捕叛變，1934年發表脫離共產黨聲明。解放後一直賦閒在家。對姚蓬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其子姚文元卻名聲沒有乃父那樣大。姚1948年加入中共，擅長「批判」文章，且文風霸道，人稱「姚棍子」。1955年批胡風、1957年反「右派」，姚文元都曾大出風頭。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錯的」。不久，姚於1957年6月10日《文匯報》上發表〈錄以備考〉，又引起毛澤東注意，令《人民日報》於6月14日轉載。毛專為《人民日報》寫了〈《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社論，其中稱讚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遂名聲鵲起。當年僅二十六歲。

又過了八年，姚文元雖有「青年文藝評論家」的虛名，但還未發跡，只是個《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權力有限，不得不仰仗張春橋的提攜，對張言聽計從。張春橋引薦，江青召見，姚文元應聲而至。江青首次召見姚文元，姚是騎着一輛舊自行車而來的。當下，江青交下「大批判」的任務，姚文元俯首允諾。但張與姚都沒有看過京劇《海瑞罷官》，只是聽江青說是「毒草」。兩人「沒有碰過明史」，不得不從「埋頭讀書」開始，從1965年2月開始準備，到10月拿出成稿，歷時八個月，改了十稿。其間，從成都傳來噩耗，柯慶施病

逝，江青從此失去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張春橋、姚文元此時高調出現，與江青建立了密切的信任關係。批《海瑞罷官》的每次修改稿都由張春橋把它夾在《智取威虎山》劇本內，坐飛機送到北京，與江青一次次討論，修改，定稿，之後再送毛澤東。毛一共看了三遍，最後認為可以，遂讓江青拿去交張春橋。張春橋交上海《文匯報》發表。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時間是1965年11月10日。

京劇《海瑞罷官》，是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創作的。早在1959年3至4月上海會議期間，毛澤東有感於黨內無人敢向他提意見，連劉少奇等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導致了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出現許多問題。毛澤東在觀看湘劇《生死牌》後說，現在應該提倡學習海瑞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他還講了一段海瑞罵皇帝的故事。海瑞罵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又忠心耿耿，聽到嘉靖皇帝死訊，竟在牢中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出來了。毛澤東要胡喬木找幾位歷史學家寫海瑞的文章。胡喬木找到吳晗，後者慨然命筆，寫了〈海瑞罵皇帝〉一文，發表在1959年6月。吳晗似乎餘興未消，9月21日又發表了〈論海瑞〉一文。〈論海瑞〉寫出來時，已是廬山會議剛開過。吳晗也算敏感，怕遭文禍，在文章末尾寫上了一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話，以示此文與彭德懷無關。後來吳晗應京劇名家馬連良之約，寫了《海瑞》一劇。友人蔡希陶見劇本並不是寫海瑞一生，而只寫其二、三事，且末尾有海瑞不滿庸官、掛印棄官而去的情節，遂大筆一揮，在《海瑞》劇名中加上「罷官」二字，改為《海瑞罷官》。劇本1961年1月發表於《北京文藝》，並由北京京劇團上演，馬連良飾海瑞，裘盛榮飾徐階，李多奎飾海瑞母親，竟集京戲界一時之彥。

《海》劇是寫明朝大臣海瑞任應天府巡撫期間，敢於將原宰相徐階的第三個兒子徐瑛（強佔民田、強搶民女的惡霸）處死，並通令縉紳退田等的故事，宣揚了海瑞剛直不阿、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精神。據說：「此劇上演後，毛主席很高興，在家裏接見了飾演海瑞的馬連良。」然而，歲月流轉，風雲變幻。毛澤東對文藝界不滿、對北

京市委不滿、對中央一線不滿，需要一件事情為突破口。江青早對《海瑞罷官》有成見，事情就因此而發。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武斷地指責《海瑞罷官》塑造了一個假海瑞。其核心部分是捕風捉影，認定《海瑞罷官》影射現實。他寫道：「《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甚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甚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的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颳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甚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甚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18] 姚文的發表，使文化領域的批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此前的批判，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限於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則把批判從文化領域引向了政治領域。

然而，一開始，姚文的背景，它與毛澤東的關係，不僅中宣部的陸定一不知道，北京市委的彭真不知道，連中央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也都不知道。彭真只知道毛澤東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問過他：「吳晗可不可以批判？」他回答「有的問題可以批判」。毛澤東指的是政治上的批判，彭真指的是學術上的批判。彭真更想不到一個月後姚文元的文章與毛澤東有甚麼關係。但姚文畢竟來頭不

18　《人民日報》，1965年11月30日。

小，又直指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領導很緊張，打電話詢問中宣部。林默涵回話「不知道」，一句也不多說。因為他猜到，這是江青搞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北京日報》總編輯范瑾專門開會研究轉載問題，決定先向《文匯報》了解情況，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報》就登，否則就不登。由於張春橋嚴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鎖消息，《文匯報》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詢問均無所獲。在此情況下，鄧拓決定即請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暫不轉載，待他回京後再定。當時，全國各地報刊先後都轉載了，就是北京沒有轉載。江青十分惱火，從上海打電話給林默涵，問：「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林答：「看到了。」江青又問：「怎麼樣？」林默涵由此證實了自己的判斷：「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來的」。江青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出小冊子。」後來毛說過（1967年5月）：「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毛澤東更增加了對中宣部、對北京、對中央的不滿。似乎更加證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他的意見在北京行不通了。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聽取《紅旗》雜誌的匯報後說，吳晗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對姚文元文章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彭真找中宣部周揚、林默涵、許立群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商量轉載問題。林默涵告知，江青已打電話來，不轉載恐怕是不行了。彭真不得不同意轉載，但認為要加一個按語，說明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彭真很謹慎，把按語草稿送給周恩來閱，周恩來也很策略，在按語中加了毛澤東的兩句話：「即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11月29日，《北京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語中強調「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按語說：「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

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報》將姚文刊發在第五版「學術討論」專欄，以表示把討論限定在學術範疇。

根據彭真的指示，12月12日，《北京日報》、《前線》雜誌發表了鄧拓署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組織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甚麼社會思潮〉。12月27日《北京日報》發表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12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這些文章力圖把對《海瑞罷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學術範疇，以保吳晗過關，但這更激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姚文元文章的發表，在不知內情的學術界引起重大反響。元史專家翁獨健憤然地說：「姚文元給吳晗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結論，這是莫須有的罪，和秦檜陷害岳飛時的理由一樣。」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說：「吳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江青、張春橋則有意「引蛇出洞」，把地下的意見「引到上面來」，結果使許多為吳晗抱不平的知識分子落入文網。在康生授意下，由戚本禹操筆，寫成〈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刊載在12月8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上，不點名地批判了翦伯贊、吳晗的「資產階級歷史觀」。

1965年11月13日，也就是姚文見報的第三天，毛澤東坐專列離京外巡。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19日抵達上海。隨後到杭州，下榻西子湖畔的劉莊別墅。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解決羅瑞卿的問題。此次外出巡視，毛澤東共在外地停留半年多。在這期間，舉國已是天地翻覆了。

毛澤東授意撰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決非率意而為。1967年毛澤東曾說：「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毛澤東要通過批吳晗來觀察北京的動靜，分清陣線。後來江青得意地說：「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說得更明白：批《海瑞罷官》，「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制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不過，這都是後話。在當時，恐怕連康生、

江青等人對毛澤東的意圖也不完全知底。以至江青費了八個月搞出來的文章，只聯繫了「單幹風」，沒有抓住「罷官」這個「要害」。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作了一次長時間談話。陳伯達等人是為給幾部馬列經典著作寫序之事，應召來到杭州的。但這次談話，毛澤東很少談寫序之事，卻講了一大篇哲學問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文章的話。毛澤東說：「一些知識分子，甚麼吳晗啦，翦伯贊啦，愈來愈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辦法。吳晗老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19] 毛澤東這段話，把《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罷彭德懷的官聯繫起來，問題陡然升級。第二天，12月22日，毛澤東又向專來杭州的彭真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對毛說：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毛只好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之後再作結論。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去上海，向張春橋等人轉達了毛澤東的這個意思。

江青得知毛澤東有這麼一段談話，歡欣鼓舞，囑令整理談話記錄。艾思奇、關鋒花了一通宵，寫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記錄〉，交給田家英。田家英提出，不要把這段「要害是罷官」的話寫進去，因為它不符合事實，《海瑞罷官》與彭德懷問題沒有關係。田之所以要刪去這段話，是因為有毛澤東同彭真談話的精神。這個意見首先得到胡繩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關鋒不表態。回到北京，關鋒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寫進去不可，經過一番周折，只得恢復。談話記錄於1966年1月9日經彭真批發印出。「要害是罷官」的話一出，政治批判的份量更加增強。這場從文藝問題開

19 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01。

始的批判，逐漸演變成為以1958年「大躍進」以來包括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四清運動中的分歧問題為內容的批判，人們感覺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但究竟政治走向如何，人們還普遍沒有料及。而實際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值得記憶的是，由於田家英在杭州堅持刪去毛澤東講「要害」的話而遭嚴厲追查，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談話記錄」的罪名。1962年以後，由於包產到戶的問題，毛澤東已對田逐漸疏遠。現在江青又抓到這個把柄，田家英的政治生命已接近盡頭。1966年5月20日，田家英被停職反省。5月23日上午，田在中南海自己的家中含冤離世，年僅四十四歲。繼鄧拓之後，田家英成了「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七　羅瑞卿事件之謎

發生在1965年最後幾天的羅瑞卿事件，為當代中國政治添加了更為難解的謎團。這個謎團是如此難解，以至當事者的女兒在事後多年仍耿耿難平。羅點點在自己的回憶錄裏，曾試圖從多個方面尋找揭開謎底的鑰匙，結果仍難以得出言之鑿鑿的確證。她首先詢問的是當事人——大難不死的父親。羅瑞卿告訴她：「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還認為是毛主席和林彪對我的誤會。」[20] 可見，當事人甚至比她更懵懂。於是她想到了父親的「冒尖」。因為在1965年上海會議批羅時，羅的一位熟人在探望中回答羅「為甚麼要採取這種辦法？我到底犯了甚麼錯誤」的激動發問時，曾衝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21] 羅點點後來了解到，在1955年定軍銜時，就有人說羅瑞卿的大將軍銜授高了。因為在大將中，羅的資歷最淺。[22] 再後來，羅點點

20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頁178。

21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213。

22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27。

得知，父親在中共八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名單中，位置就非常靠前。在中共執政後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八大中央委員是唯一一次以得票多少來排定名單的。在這份名單中，羅瑞卿位列第十七，「比許多爸爸一再對我們說要特別尊重和愛戴的伯伯叔叔還要靠前」。[23] 這是殊榮還是隱憂？羅點點寫道：到1965年，羅瑞卿在黨政軍等五個方面共兼了十三個職務。「說句玩笑話，如果真有離了他地球就不轉的人，爸爸得算一個。」「但爸爸就是不懂這點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的千古名訓。」[24] 在尋覓中，羅點點還想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時送給羅的兩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兩句出自《大戴禮記》的話，是毛澤東對羅瑞卿的讚許還是警告呢？羅點點說：1965年羅瑞卿在江青要穿軍裝的小事上始終堅持原則，以至鬧得不快，證明毛澤東對羅「水至清、人至察」的基本看法是多麼正確，「這種小事情沒有哪一件不提醒毛澤東，羅瑞卿就是他說過的那種連小事都不肯通融的人」。[25] 當然，羅點點還提到了更重要的方面：第一，既然「毛澤東從來沒有懷疑羅瑞卿有野心，是壞人。所以，除非是毛澤東有品質問題，否則他為甚麼會白白冤枉一個好人？」[26] 第二，「事實是，在林彪要毛澤東幫助他搬掉爸爸這塊絆腳石的時候，毛澤東的心裏正在湧動着一個更大的革命波瀾。為了掀起這個後來被稱為文化革命的波瀾，為了除掉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們，他需要林彪作為盟友。」[27] 前一個提法，立刻遭到他革命母親的嚴詞駁斥。而後一個看法，無論如何還需要歷史事實的驗證。因此羅瑞卿事件的發生和有關分析便是必須的了。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澤東在上海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羅瑞卿進行了背靠背的揭發批判。林彪、

---

23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35。
24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213。
25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54。
26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54。
27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86。

葉群、吳法憲、李作鵬在會上攻擊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這次會開得很突然、很神秘。會議開始之前，常委中除了毛澤東、林彪，誰都不知道會議內容，要解決甚麼問題。與會人員被分批召到上海。到開會時才知道是為了整羅瑞卿。會議給與會者每人發了一袋材料，這是葉群送來的。會上最活躍的是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她作了三次發言，足足講了十個小時。她說：羅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有事，損失太大。羅的個人主義已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的位置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又會要求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她說：1964年羅即逼林退位。其中最要害的「證據」是劉亞樓的「四條」。葉群揭發說：1965年2月，羅瑞卿和劉亞樓兩個人躺在牀上，密談一直到天黑，說羅要劉轉告葉群四條意見：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甚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要他們去管。葉群講得天花亂墜，林彪又叫吳法憲(已接任空軍司令員)在會上發言，幫腔，一口咬定羅瑞卿對劉亞樓說的那四條，劉又告訴了吳法憲。但這是死無對證。因為劉亞樓（空軍司令員）已於5月病逝。與會人員既驚訝又懷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說話都很少，很謹慎。劉少奇會前聽了葉群的匯報，隨口說了一句：「難以置信。」鄧小平說了四個字：「死無對證。」

在與會者中，可能只有賀龍會前有些預感。[28] 因為在這之前，根據林彪的安排，軍委直屬機關就批判了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會議主持人告訴賀龍說：「蕭的後台是羅瑞卿。」賀龍當即表示：「羅是扛大旗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林總的。」「我可以擔保羅不是反革

28　根據郝治平的回憶，賀龍事先也不知道上海會議內容。接到開會通知後，賀龍曾帶上地圖，預備會議討論軍事上的事情。見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90。

命，他絕不會反黨。」當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央會議的通知時，賀龍敏感地感到，這次會議非同尋常，可能牽連到自己。會議第一天晚上，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造訪賀龍，恰好李井泉在座。劉對賀說：「事情真有些突然。賀老總，你是管軍委日常工作的，這件事你事先知道嗎？」賀龍說：「我也是剛知道。」劉又問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嗎？」李說：「我也不知道。」劉沉默了一會，說：「這麼說，咱們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嘍！」

上海召開會議之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視察工作，一無所知。12月10日，中央要他馬上到上海開會。羅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接到通知就飛往上海。一下飛機，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迎接，將他送到一個地方，警衛森嚴，實際上是軟禁。羅瑞卿長期搞保衛公安工作，馬上意識到自己失去了自由，非常生氣，又莫明其妙。稍許，周恩來和鄧小平召他談話，說明了上海會議的情況及葉群代表林彪對他的指責。羅一聽，不啻晴天霹靂，他立即起而爭辯：「我沒有反對林副主席、沒有伸手、沒有反對突出政治，殺了我的頭也不承認這些。」羅要求面見林彪。周恩來立即制止說：「你怎麼這樣天真，這樣幼稚？」的確，按黨內鬥爭規律，此時再申辯，長一百張嘴也說不清。羅也是老革命了，何以如此「天真」。其實不怪。想必羅過去經過無數黨內鬥爭，但角色不同，臨到自己頭上，就當局者迷了。

定羅瑞卿「篡軍反黨」，這的確使最高領導層感到突兀其來、驚感不已。會後，朱德來到杭州，心情沉重，對夫人康克清說：「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說他（羅瑞卿）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

羅「篡軍反黨」難以置信，不僅因為來得突然，而且誰都知道，羅是聽毛澤東話的，同毛、林關係從來都不錯。羅瑞卿1959年9月同林彪一起，走上領導中央軍委工作崗位的。林彪任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羅瑞卿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在歷史上，羅與林也有淵源。從井岡山時期到長征途中，羅瑞卿一直是林的部屬，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到延安後，林任紅軍大學校長，羅任教育長。二人相處融洽，過往甚密。解放戰爭時期不在一個戰場，但平津戰役後，羅曾

提出隨林彪南下的請求，因毛澤東決定讓羅出任公安部長而作罷。到廬山會議後，林又成了羅的頂頭上司。羅對林是尊重的。林彪強調學習毛著，從原則上講同羅瑞卿是合拍的，因為羅瑞卿對毛澤東不僅十分崇拜，而且忠心不二。

此外，誰都知道，公安部長「羅長子」是毛澤東的大「衛士長」。建國以後，毛澤東的一切外出活動的保衛都由羅親自安排，事必躬親，形影不離。毛澤東說過：「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毛澤東每到一地，都要到江河湖海游泳，羅瑞卿總是先行試水，或派人試水，做到萬無一失。羅原本不會游泳，為了保衛毛澤東，年過五旬還是刻苦學會了游泳。羅瑞卿唯一「反對」過毛澤東的事情，是他經常勸阻毛澤東到危險水域游泳。1957年7月，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突然提出要暢游三峽，並向中央和羅瑞卿寫了信。這可嚇壞了羅瑞卿，他想阻止，又無法說服。於是親赴三峽視察水情，只見漩渦翻滾，驚濤拍岸，真如毛詞所描述的：「捲起千堆雪」，使人不寒而慄。羅勘察半月，讓人繪了水情圖。回京向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匯報，證明從三峽到武漢水段不宜游泳，中央常委不同意毛澤東去游，毛也只好作罷。凡此種種，足顯羅對毛的忠誠。毛澤東的生日家宴上，總有羅瑞卿和汪東興。毛心緒不好時，可對羅瑞卿、汪東興發怒，讓他們從房子裏滾出去。但事情過後，則雨過天晴，毫無芥蒂。毛對羅的信任和親近可見一斑。

如此這般，羅瑞卿怎麼會「篡軍反黨」呢？為甚麼林彪要下決心扳倒羅瑞卿，而又說服了毛澤東呢？要解讀其中原因，必須深入到中共黨內複雜的權利關係和人事關係，同時考慮當時國際國內和黨內的政治緊張。

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接管軍委工作後，林彪與羅瑞卿關係一直相處很好。矛盾是從1961年發生的。不過，這個矛盾不是林羅個人間的齟齬，而是林彪與總政主任羅榮桓元帥之間的矛盾，遷怒於羅瑞卿的。林和羅榮桓的矛盾，是關於突出政治問題。羅不同意林把突出政治搞得那樣玄，已經有了庸俗化的嫌疑。林自然不高興。但這個矛盾沒有鬧開，不久即隱了下去。

1962年秋，林彪夫人葉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揮部隊入閩，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澤東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賀龍元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毛多次告訴羅瑞卿，要多向賀請示工作。此後，到1964年，報紙上經常見到羅瑞卿同賀龍一道活動的報導，林彪對羅瑞卿的不滿即由此開始。林彪從建國以來一直養病。林的病始終是個謎，很怪，怕見陽光，怕見水，怕吹風，怕見人，一見人就出汗。因為怕見水，長年不洗澡。醫生檢查，又查不出器質性毛病。林彪的病症與精神因素有關，而且與吸毒（嗎啡）有關。林彪吸毒，這在高層成了公開的秘密。軍委衛生部長傅連璋壯着膽，將檢查結果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抄錄了曹操一首名詩《龜雖壽》，委婉地提醒林彪戒毒。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時就說過林彪：「別的事都是馬列主義，就是對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義。」這成了林彪的一塊心病。

60年代，毛澤東對林彪厚望有加，但林彪總是疑神疑鬼。1963年5、6月，林彪兩次讓秘書或夫人葉群給羅瑞卿打電話，說林彪身體一直不好，不能過問軍委的事，讓第一線的人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總部擋，較大的事辦公會議討論，再大的事軍委常委討論，更大的事情直接報告主席、中央」。但在中共黨內政治生活中，許多講出的話，並不一定就是本意，裏面往往暗含着玄機。林彪的這些話就不可當真。他說重大的事情直接報告主席，其實是反話。林彪最不滿的就是這種「越級」報告。林還不滿羅與賀龍接觸多，向他請示少。一次他從外地回京，立即要見羅瑞卿，羅正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回電話說：「會散了就去。」，林一聽火冒三丈，拍了桌子，隨即寫下幾句沒頭沒腦的話：「大捧別人，大跟別人，回京後根本不來見面。……讓他做絕。」「……當作又一彭黃也」。[29] 這些匪夷所思的話，在某種程度上透露出中共黨內人事關係和權力關係的複雜情景。

---

29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66。

1963年12月，羅瑞卿和葉劍英元帥總結推廣了南京軍區某軍連長郭興福的練兵方法，主要是幹部以身作則，會講會做，讓戰士帶着敵情練兵，從嚴從難要求，大大提高了練兵質量和練兵熱情。1964年1月3日，軍委轉發葉劍英的報告，總政治部也發出了〈關於宣傳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指示〉。隨後，全軍各部隊掀起了學習的熱潮。在此基礎上，經軍委決定，在全軍舉行了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動。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了北京部隊和濟南部隊的比武表演。毛澤東極感興趣，給予了高度評價，並指示要在全軍普及「尖子」經驗。7月和8月，全軍分十八個比武區舉行了比武大會，參加表演的部隊和民兵共13700餘人。軍內幹部45000餘人、地方幹部42000餘人觀看了比武表演。

林彪對於大練兵和比武，開始表現沉默。以其身經百戰的軍事生涯，他不會不明白練兵對軍隊的重要性。此前，他也曾就軍事訓練作過多次指示。要求軍隊要打得準、開得動、聯得上。但林彪心裏有一本賬：現在軍隊打的主要是政治仗，而不是軍事仗，儘管備戰的呼聲很高。因而，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一套政治建軍的思路。而羅瑞卿在他的建軍思路之外，與其他老帥們搞在一起，另搞一套大練兵和大比武，而且轟轟烈烈，驚動了毛澤東和所有中央領導人，得到讚揚和肯定，毛澤東一次講話還否定了林彪上台後提出的戰略防禦方針。林彪在昆明養病，完全成了局外人。他認為自己的軍權不落實。

1964年8月，毛澤東讓賀龍、羅瑞卿一道去北戴河，向他匯報軍隊高級幹部減薪問題，以防止幹部「變修」。討論中，賀龍建議：「是不是連軍銜一齊取消算了？」毛澤東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塊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後，羅瑞卿電告林彪秘書，但林遲遲不表態。兩天後才回話「林總同意」。林遲遲不表態，決非對取消軍銜有異議，不滿的是如此重大的問題，賀龍、羅瑞卿「越位」直接去見毛澤東，把他撇在了一邊。

此時，還有一件意外的事傳到了林彪的耳朵裏。在一次公開場合，劉少奇說：「我們的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劉講這個話

也是有原因的。當時毛澤東從反修防修出發，提出了培養接班人問題，要求「每個人都要準備接班人，還要有三線接班人」。劉可能由此而提到了羅。這件事由一位邀功取寵者報告了林彪，林非常惱火：這不是要奪我的軍權嗎？

羅瑞卿就幹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匯報時，也曾講過有些老幹部應該主動「讓賢」。生性多疑的林彪聽了，認定是要他讓賢、讓權，更對羅瑞卿懷有嫉恨之心，遂決意要把羅瑞卿整下去。但這種心裏話當然不能擺到桌面上來。於是林彪抓了一個原則問題：政治與軍事的關係。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機，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說：「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根據林彪的意見，葉群帶着工作組到了基層連隊找素材，抓住有些單位比武中有錦標主義、形式主義、拼湊尖子的問題，大作文章。整理了四份調查報告，說：「部隊軍事冒尖，政治不濃，脱離了毛主席的建軍路線。」12月28日，林彪在廣州緊急召見總政領導人，對他們說：「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衝垮了。」「四個第一不落實。」而且說這「是帶有全軍性的問題」。強調要「突出政治」。這次談話內容整理出來，後來以中央軍委〈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的名義下發全軍。

本來，關於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澤東早有多種表述，如靈魂、統帥、生命線等等。然而，一個題目，做來做去，都是老話，就沒有了新鮮感。林彪的確富於「創造」，提出一個「突出政治」的口號。他說的所謂突出政治，就是在軍事訓練、生產等與政治工作發生矛盾時，要給政治工作讓路；時間上誰讓誰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訓、生產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林彪大講「突出政治」可謂「一石兩鳥」。一則迎合了毛澤東的思想，此時，毛正不遺餘力地強調政治掛帥。一則給了羅瑞卿一頂大帽子。衝擊了「政治」，那就不是工作偏差而是「建軍路線」的錯誤了。

林彪對大比武的批評，羅瑞卿無法接受。他說：「1964年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毛著？主要的不是」。他說：「政治也不能亂衝一氣。」1965年1月

6日至9日，第八次軍委辦公會議傳達林彪的指示，各軍區的將軍們雖原則表示「擁護林總指示」，但大都不贊成否定1964年的大練兵和大比武。會後，羅瑞卿說：「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頭政治，哪裏有這種政治！」「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羅瑞卿這些話後來成了反對林彪和反對「突出政治」的罪證。

此後，林彪採取了一系列彈壓羅瑞卿的舉動。4月22日，林彪與路過蘇州的毛澤東會面，徵得毛的同意，決定增加楊成武為軍委第一副秘書長，有節制羅瑞卿之意。5月底，軍委作戰會議結束，羅瑞卿作總結發言。林彪提出「不准任何個人以總結的名義講話」，下令撤銷羅的總結講話。林彪知道，單一個反對「突出政治」，不足以扳倒羅瑞卿，於是指使葉群私下搜集羅瑞卿的材料，罪名是羅要「篡軍反黨」。一共整了十一份材料。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說「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先派葉群呈送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這時林彪在蘇州，毛澤東在杭州。當天，葉群攜帶了林的信和吳法憲、李作鵬等人寫的「揭發材料」，乘飛機到杭州向毛澤東告狀。葉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見到毛澤東，毛也不知道她有甚麼事，讓她等。葉群就和毛的秘書徐業夫談了談。她從杭州打電話請示林彪，想給主席寫個東西送上去。林彪批評她：「你糊塗！真蠢！」意思是必須向毛澤東本人講。葉群又去，寫了個條子，要求面談。這樣才見到毛澤東。據說葉群向毛澤東講了足足五個小時，毛聽了五個小時，毛澤東問得很仔細，但一直未表態。後來顯然聽信了葉群的話，毛讓把材料留下，叫葉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並派汪東興乘專列送葉回蘇州，以防「不測」。12月2日，毛澤東在葉群送來的材料上批示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他認為：「哲學上的折衷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

葉群在五個小時內究竟同毛澤東談了甚麼，由於只有談話者兩人在場，沒有記錄，因此內容可能永遠不得而知了。但是，天不欺人。

這件事情卻被毛澤東當時的警衛人員從旁記錄下來。在1996年9月出版的《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專門有一節記述了「葉群向毛澤東密告羅瑞卿」。作者張耀祠可以算作準當事人。他在毛葉談話時三次進入房間，告訴毛澤東時間已經太長了。他回憶說：「三次催葉群，只能聽到她的話頭話尾，聯繫起來看，是葉群向毛主席告羅瑞卿的狀。她對主席說：『我過去對羅瑞卿是畢恭畢敬的，沒有想到羅瑞卿跟林彪的關係搞得這個樣子。』葉群又說：『羅瑞卿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林彪的位子讓給他沒關係，但會不會發展到「逼上奪權」的程度呢，我想會的。主席，他是兩個眼睛盯着這個位置的。』葉群還羅列了一些羅瑞卿的罪名。她說：『羅瑞卿反對林彪「突出政治」，他說，「病號嘛，還管甚麼事，病號應該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張耀祠判斷：「雖然那時毛主席對葉群的這些話半信半疑，但顯然對羅瑞卿的看法變了。」[30] 張的回憶雖為孤證，但知道內情的人認為它基本可信。[31]

林彪告狀告准了。12月8日，毛澤東親赴上海，坐鎮召集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他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作敵人看待」，「羅是野心家」。不過他又對林彪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反對我游泳，那也是好意。」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曾作自我批評，說他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錯整了羅瑞卿。

毛澤東的確是聽了一面之詞。然而，以他的睿智和敏察，何以會聽信一面之詞呢？很難相信，毛澤東會懷疑羅瑞卿對他的忠誠。作為軍隊統帥，他當然知道軍隊練兵是天經地義的事，況且他在檢閱大比武時表了態。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他下決心進行一次大的革命行動之前，必須整理隊伍，找到可以依靠和信賴的人。很明顯，無論在黨內還是軍內，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林彪是更值得信賴和依靠的

30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頁30－31。

31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86。

人。特別是林在軍隊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無人能夠企及的。用江青的話，林彪是「尊神」，是她親自請到的。自然，在政治捭合中，他選擇了林彪。

自七千人大會以後，尤其是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對中央一線的不滿不斷加深，林彪的份量就更加重了。毛澤東對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等一套政治話語，十分讚賞，並且要求把這一套做法推廣到地方。1963年10月16日，毛澤東批示：現在全國學解放軍、學大慶，學校也要學解放軍。解放軍好是政治思想好。他要求國家工業部門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行四個第一、三八作風。11月16日，毛澤東又專門為此事給林彪、賀龍、聶榮臻、蕭華等人寫信，指出地方政治幹部的來源可由四種方法解決：一是從軍隊抽調；二是地方派人到部隊學習；三是派到軍隊政治學院當學生，畢業後回去工作；四是自己按解放軍政工條例抓起來。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讚揚林彪說：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經毛澤東的號召，全國工業系統從部到工礦企業紛紛建立起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工作制度。林彪提倡的一套做法迅速普及到地方。

1965年1月15日，毛澤東在軍委貫徹林彪關於突出政治指示的通知上批示：「完全同意，照此辦理執行。」這是對林彪與羅瑞卿分歧的第一次表態。2月22日，毛澤東接見海軍幹部工作會議和《解放軍報》編輯、記者會議時，再次表示對林彪的支持。他說：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未想到過甚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

毛澤東對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所以情有獨鍾，是因為林的這一套原本就是迎合了毛的思想，毛強調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關鍵是「人心改造」，林的突出政治為「人心改造」創造了具體形式。還有一層，在對中央一線不滿的同時，毛澤東也感到需要有點個人崇拜。儘管，這時人們對他的個人崇拜已很嚴重了。林的突出政治，實

質上是突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在部隊掀起的學毛著運動，創造了許多鮮活的形式。這個運動通過「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推廣到地方，產生了未曾預料到的覆蓋效果。後來在全國形成紅色海洋，並越出了國界的那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就是在這個運動中誕生的。1961年4月，林彪指示《解放軍報》應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於是毛澤東的著作和言論被分門別類，製成語錄，每天一條，見諸報瑞。部隊反應熱烈，林彪自鳴得意。1964年，總政將語錄集輯成冊，編出一本《毛主席語錄》，林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並指示「要像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這樣，全軍人手一冊。《語錄》下發後，地方轟動，紛紛求索，也引起毛澤東極大興趣。《毛主席語錄》從此走向全國，走出國門，據報載，僅「文革」幾年內，國內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種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種版本，總印數為五十多億冊。按當時的全球三十多億人口算，男女老幼人均1.5冊，被國際上公認為「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書」。「紅寶書」有如此魅力，不僅中國人，許多外國人也對它頂禮膜拜，不能說不得益於林彪提倡的背警句、摘格言、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經驗。人們就像背誦信條一樣，簡明易懂、耳熟能詳、老少咸宜、婦孺皆知。

在這個「紅海洋」運動中，毛澤東愈來愈被神化，愈來愈高居於中央集體之上。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成了人們的精神追求，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愈來愈要仰視，林彪的「旗手」地位牢牢地確立，影響急遽上升。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毛澤東期望的。1965年11月26日，羅瑞卿告訴毛澤東，他準備去蘇州看望林彪，毛神情開朗地囑咐羅：「去看看好。要他好好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點的報告。」毛當時甚至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可見他對林彪期望之殷切。[32]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能容許任何人對林彪構成挑戰。

---

32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頁181。

然而，毛澤東是不是對林彪就完全信任呢？當時的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說過一段話，耐人琢磨。他說：搞掉羅瑞卿，不等於說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幹部是反覆的、長期的……本來，把羅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對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軍隊。不然為甚麼定了一條：文革期間不准調動軍隊，調一個排也要軍委主席簽字，就是必須由毛主席簽字。可見毛還是不完全放心，不讓林有權調動軍隊。[33] 事實證明，林彪所獲得的權力，即使同劉少奇相比，也差得太遠。

上海會議上，羅瑞卿被調離軍隊領導崗位，由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但毛澤東的口氣似乎還不想把羅瑞卿徹底搞倒，他還要觀察一段。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找羅第二次談話，傳達毛澤東的話：如果沒有這三條（指反對林彪、伸手、反對突出政治），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但羅急切希望澄清是非，回京後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求解除軍隊的一切職務，很快獲准。羅多次申訴沒有三個問題。隨後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作小組」，對羅進行審查。林彪顯然不希望把羅的問題掛起來。會後，為搜羅罪證，葉群出主意，讓吳法憲逼劉亞樓的俄籍妻子翟雲英。翟雲英說：「沒聽劉亞樓說過四條，只見他去世前伸出了四個指頭……」秘書記下來，叫翟雲英簽上名，以為旁證材料。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會議，對羅進行揭發批判。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3月4日至16日，參加會議的有軍隊各總部、公安部的負責人四十二人對羅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中央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會議。鄧小平主持了一次「開幕式」後，為避開處理羅的問題，到西南三線視察去了。彭真也很少與會。這時，不僅認定羅瑞卿有上海會議指證的「三條」，而且加了一條：「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羅瑞卿問題已上升

33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605。

為敵我矛盾。京西賓館會場完全成了批鬥會。羅回憶說：「我實在忍受不了，頭腦快要爆炸似的，比受甚麼罪都苦啊！」無奈的羅瑞卿決定以死抗爭。3月18日，他留一張紙條給妻子郝治平，述說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囑咐家人遵守紀律，然後從住所的樓上跳下，但卻只跌斷一條腿。

羅瑞卿的自殺，召來更嚴厲的批判。3月22日至4月8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與會者增加到九十五人（增加五十三人），對羅進行缺席批判鬥爭。會議最後作出〈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認定的「罪名」有：「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等。被定性為「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打着紅旗造反」的「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

羅瑞卿事件是發生在1965年底以前中共黨內的一次撲朔迷離的政治鬥爭。它同當時中共黨內的政治緊張相聯繫，同中共面對的複雜國際國內動向相聯繫，也同中共黨內的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走向相聯繫。西方的「文革」歷史學家們，喜歡把這件事情看作是「開啟了『文革』的大門」。他們更相信，毛澤東是依次地把軍隊、宣傳（陸定一）、首腦機關（楊尚昆）和京畿（彭真）問題統統解決掉以後，再發動對劉少奇的進攻。他們的學術猜測是富有想像力的。但作為歷史的解釋，人們還不得不深入到事件內部去發現其原因，並在合理的背景下解讀它們。結論應該是，緊張的政治，必然帶來一觸即發的意外事件。在那個時代，甚麼都可能發生！

第十一章
面對「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世界

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輿論對國際形勢的描述，可以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三個詞組來概括。這三個「大」，其實是中共自己對世界的體驗。它反不反映真實世界的潮流，還需要研究。但是，自身的體驗對自己總是真實的。因此，體驗影響着自身的國際理念和行動規則。60年代前半期，中國發生的許多重大事端，都可以從三個「大」中找到深刻的根源。人們對外界的反應，也是從動盪、分化和改組的思路上作出的。在三個「大」的觀念背景下，中國同蘇聯、美國等大國之間的關係，折沖樽俎，鬥勇鬥智；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也色彩紛呈。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的政治走向，受到世界形勢變幻和自身反應的影響，愈來愈向緊張、動盪和激奮的方向展開，這使60年代前期中國歷史的面貌，更加複雜化了。

一　走向大分化

新中國對外戰略方針的演變，經歷了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歷來，在學術界，有新中國前四十年外交「十年一變」的說法。儘管，這個說法並非科學論證，但卻多少反映了包括60年代在內的中國對外戰略關係的某種變化節奏。

60年代的中國對外戰略方針，在整個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中，是以經歷許多重大而急遽的變化而顯示其特徵的。這些變化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在許多根本的方面改變了中國外交的面貌。如就這些變化的具體過程而言，其起始點首先是中蘇關係從分歧走向破裂；隨之是國家處於一個兩面對敵的最危險的時期；最後到達對新的國際格局的新判斷。這些變化，主要圍繞同前蘇聯和美國的相互關係而展開。但同時，它又反映着這一時期對我國外交戰略發生影響的其他世界性重大問題。總的說，60年代中國對外戰略的走向，大致劃出了一道弧線。即從原本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

歷史剛剛進入60年代，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關係，便呈日趨緊張之勢。這一年的6月，發生了赫魯曉夫藉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晤」之機，對中共內政外交政策突然加以指責、攻擊的事件。在赫魯曉夫同中共代表團長達六個小時的「會晤」中，這位蘇共中央的第一書記，歷數了從「百花齊放」方針、大躍進到中印邊界衝突、「東方壓倒西風」等一系列中國黨的所謂錯誤。他的指責完全是以勢壓人式的，既不想講道理，也不顧及兩黨本應存在的平等地位。

赫魯曉夫的這種「突然襲擊」，揭開了中蘇兩黨正面衝突的帷幕。在此之前，兩黨之間儘管在眾多問題上存在着分歧，也有好幾次不歡而散的會面。但雙方都還保持了克制，沒有撕開臉面，並盡量把爭論限制在內部和有限的範圍內。這一次，卻有所不同。

實際上，這是幾年來中蘇兩黨積累的矛盾的一個爆發點。在6月以前，中共中央先後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名義，發表了三篇紀念列寧誕辰的文章。這三篇文章後來以〈列寧主義萬歲〉為題，結集成小冊子出版發行。〈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論述和回答的正是關於當今世界處於甚麼時代、列寧主義是否過時、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帝國主義的本性是否發生了變化、革命鬥爭與議會鬥爭，以及如何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問題。很顯然，這都是針對着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近年來所堅持的理論觀點。〈列寧主義萬歲〉被譯成中文、英文、俄文、日文、法文等數種文字向海內外發行，引起了國際上的很

大反響。[1] 從而，它也形成了對赫魯曉夫的一種嚴重挑戰。從歷史發展和國際共運既定體制的觀點看，中蘇兩黨之間的這種論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除去兩國不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以及某些歷史「恩怨」外，國際局勢的演變和對不同戰略利益的訴求，幾乎必然地將原本結成同一「陣營」的兩個國家，拉開了距離。只不過，進入60年代，這種分歧開始向着公開化、激烈化和關係破裂的方向發展而已。

問題的實質在於，當50年代中期開始的國際緩和趨勢日益明顯起來時，原本對付同一個敵人，即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那種強烈的利益需求，開始發生着變化。蘇聯領導人在斯大林去世後，採取了一系列新的主動的外交步驟，緩和與西方的關係。例如，赫魯曉夫上任不久，即寫信給中國領導人，建議中、朝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作出妥協，以便結束朝鮮戰爭；1954年召開的日內瓦會議，蘇聯扮演了主要角色，最終導致了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1955年7月，經蘇聯提議，美、英、法、蘇在日內瓦召開四國首腦會議，討論德國問題、歐洲安全問題、裁軍問題和加強東西方接觸問題；兩月後，蘇聯再次邀請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訪問莫斯科，進行雙邊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此時，蘇聯已經放棄了它原本堅持的在和平民主基礎上實現和平統一德國的主張，而以建立外交關係為條件，換取西方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承認，從而，也就迫使西方接受了兩個德國並存的現實，等等。

很明顯，蘇聯外交新戰略的目標，是希望通過主動並靈活的外交行動，逐步緩和同西方的尖銳對立，解決戰後遺留問題，使二次大戰後蘇聯在歐洲的既得利益得到承認和保證。這種以緩和為目的的外交戰略，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產生了兩點值得注意的影響：其一，蘇聯作為陣營中最強大的國家，希望別國能對它的外交戰略予以配合。例如，赫魯曉夫在1955年同路過莫斯科的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兩次會談，提出「將來要在華沙會議的基礎上促進兩大集團搞歐洲集體安全，來緩和歐洲緊張局勢……；蘇聯要提出裁軍方案，提出蘇聯與西

1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264－265。

方大國協議裁軍比例，蘇聯將自動裁減軍隊，以爭取和平談判、和平競賽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希望中國也能裁軍，從政治上配合蘇聯」。[2]其二，在理論意識形態方面，蘇聯主張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強調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認為無產階級完全有可能通過議會鬥爭來奪取政權。[3]後來，這個問題演變成了「要不要革命」的重大爭論。

其實，赫魯曉夫的所謂外交新戰略，並非是別出新裁，它們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提了出來，是戰後斯大林的一個基本戰略構想。例如，關於「和平過渡」的觀點，最初反映在英共黨的綱領中，認為英國可以實現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政權。這個觀點，斯大林是認可了的。同時，斯大林在戰後，也不願意各國發生革命。斯大林不准中國革命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當時斯大林的一個根本思想，是懼怕各國實行武裝鬥爭，以革命方式奪取政權，會引起再一次的世界性戰爭。此外，他還擔憂資本主義陣營不允許社會主義陣營進行和平建設，因此又提出社會主義國家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制度要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競賽」等觀點。赫魯曉夫實際只是接過了斯大林的戰略性思想而已。

然而，「不准革命」和迫使各國適應或接受蘇聯的戰略安排，是一件強人所難甚至是干涉別國它黨內部事務的無理行為，它曾使中共在爭取自身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中，走過相當艱苦的路程。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很難忘卻。毛澤東後來多次講到這件事情：「解放戰爭時期，（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4]顯然，在斯大林去世後，再重新以這樣一種方式去「安排」別國事務，「規定」別國的發展道路，是很難行得通的。

---

2 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9－13。

3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35－136。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237。

另一方面，新中國建立後，其對外戰略的確定，不能不依據自身的利益和既定的目標。中國當然需要國際局勢的緩和，因為新中國建立之後所面對的最迫切的任務，即是展開經濟建設。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並沒有給中國的和平努力以廣大的空間。朝鮮戰後，美國沒有響應中國提出的和平、緩和以及進行接觸的呼籲。[5]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新中國始終充滿敵意。當時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和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凱南，始終僵硬地認為，新中國是比蘇聯具有更大潛在威脅的國家。[6] 因此，彭德懷元帥在同赫魯曉夫的上述會談中，這樣告訴後者：「中國還有台灣沒有解放，朝鮮局勢還不穩定，還面臨着美國的嚴重威脅。美國和蔣介石也有可能在東南沿海進行侵略、進犯……目前我們的力量還受朝鮮半島局勢的牽制。」[7] 可見，一個國家的戰略重點，首先是國家自身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去配合別國的某種戰略安排。因而，要中國納入莫斯科設計的所謂大國合作以爭取世界局勢緩和的軌道，顯然既無道理，也無可能。

這種不同戰略利益的差異，從赫魯曉夫取得斯大林逝世後個人的政治穩定開始，變得突兀起來。原因是，赫魯曉夫還是「過去那種蘇共說了算、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跟着他指揮棒走」。[8] 此時他的大國主義，甚至超過了以往。按毛澤東的話說，是赫魯曉夫這個人「想怎麼幹就怎麼幹」。[9] 這就不能不引起兩個愈來愈嚴重的問題：一、兩國國家關係的緊張；二、理論意識形態的論爭。

5　中國在1955年建議就雙邊問題同美國進行大使級談判。中國還釋放了數名在押的美國人，並願意批准十五名要求到中國大陸採訪的美國記者的簽證。但美國務院堅持其不准美國人到大陸旅行的長期禁令。1956年，中國政府再次建議中美記者互訪，但華盛頓又一次拒絕了這個建議。

6　參見張少書（Gordon H. Chang）著，梅寅生譯：《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台北：金禾出版公司，1992），頁155。

7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9－13。

8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444。

9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72。

在國家關係方面，1958年蘇聯試圖建立中蘇「聯合艦隊」，引起中國的極大警覺。當時，中國海軍尚無潛艇。因此組織「聯合艦隊」，實質上成了蘇聯一家獨佔。這顯然已超出了國家間的平等合作，而涉及到主權問題了。中國對此無法讓步。1959年的中印邊界衝突，理在中國一方。但作為軍事盟友，蘇聯卻指責中國、偏袒印度，這當然不能為中國所接受。而美蘇首腦戴維營會談後，赫魯曉夫到北京來大談不應「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希望中國主動同美國改善關係；以及建議中國釋放被關押的美國罪犯等等，不能不使中國領導人聯想到，赫魯曉夫訪美前宣布中斷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原子彈技術資料，撕毀中蘇關於原子彈的協議，是一個完整的向美國獻媚的行為，是以中國的國家利益向美國送進見禮。[10]

正是這種由國家戰略利益的矛盾所引發，兩國間思想意識形態的爭論也加劇了。這個爭論，主要是圍繞下列問題而展開，即：當今時代是否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既然帝國主義還存在，戰爭的階級根源還存在，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和平共處」是否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的總路線？等等。可以看出，意識形態爭論是國家戰略利益矛盾的延伸。其實質在於說明，社會主義國家「對帝國主義究竟取甚麼態度」？還「要不要革命」？還需不需要「辨明敵我」？開始，人們還在試圖說服對方。隨後，戰略利益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使爭論逐漸演變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路線之爭，演變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之爭。而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特徵，就是叛賣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對帝國主義投降。

從1962年開始，中蘇關係無可挽回地向最終破裂一步步走下去。這一年，中國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區，發生了邊民暴亂和外逃蘇聯的事件；翌年，美英蘇簽署關於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這個條約很大程度是針對中國的，它試圖用國際條約的形式，將中國排斥在核大國之

10　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17－222。

外。[11] 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蘇聯以犧牲中國利益來換取同美國的合作，進而達到主宰世界的意圖，已經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此外，從1960年8月至1969年3月，中蘇邊境發生大量的衝突事件。其中，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事端，即多達4189起。[12] 從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開始向中蘇和中蒙邊境增兵。至1969年，蘇聯沿中蘇邊界共部署了正規部隊32個師，中程火箭部隊12個師，以及5個空軍軍團，共3685架戰鬥機。在外蒙則部署了5個師和可發射核武器的中程導彈基地。[13] 1969年3月，中蘇終於在珍寶島地區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

大約在1964年前後，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同蘇聯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問題。[14] 事實上，中蘇兩國的戰略盟友關係，至此已經不復存在。分手的兩個共產黨大國，各自都在經歷自己的重大戰略轉變，從而使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向一個不確定的方向演變下去。

對中國說來，60年代的這個重大戰略變動，促使中國外交發生了深刻變化。

首先，通過這個變動，中國從蘇聯控制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中擺脫出來，贏得了外交上真正獨立自主的地位。必須承認，社會主義陣營的結成，有着歷史必然性。然而，由於傳統的關係，陣營內部過分強調「統一性」和「一致性」，並且把這種「一致性」最後變為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這就損害了各國的利益。當50年代國際局勢的緩和初露端倪時，由於各國的戰略需求不同，他們對形勢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從而產生出政策性的差異。這時再以「一致性」來壓服人，甚而

11　時任美國談判代表的副國務卿哈里曼於6月21日發表談話說：美國同蘇聯、英國在部分禁止核試驗的問題上達成協議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協議可以制止擴散核武器。我們能夠合作防止中國獲得核力量。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5－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628。

12　1969年5月24日中國政府關於中蘇邊界問題的聲明，見《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13　張少書：《敵乎？友乎？》，頁265。

14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778。

以犧牲別國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其結果必然是盟約的破裂。面對破裂的危險，中國從捍衛自身利益出發，沒有屈從於壓力，從而贏得了對自身利益極為寶貴的戰略靈活性。這一點是值得慶幸的。在以後一個長時間發展中，例如在後來的二十年或三十年，它的重要性便愈發顯露了出來。

其次，分化和破裂，給中國的對外戰略及其思想帶來了一系列大轉化。這些轉化雖然經歷了必要的準備和鋪墊，但畢竟使中國外交沿着愈來愈實際的方向走下去。其中對「中間地帶」的重新認識、與某些發達國家的重要接觸，以及最後的對中美關係作出新判斷，都是中國外交戰略中現實主義因素被肯定、被堅持的過程。這一點，在中蘇關係破裂之前，是無法想像的。

第三，也必須看到，意識形態爭論對中國的內政外交也發生過消極影響。自第二國際以來，國際共運內部的思想分歧，常常引出激烈的思想鬥爭。這些鬥爭最後總是以極端對立的兩極出現，並被貼上例如「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政治標籤，結果使相互理解、補充和轉化這些矛盾的必要環節失去了意義。在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並使自己的國家加入到國際政治「遊戲」中時，這種絕對化是危險的。例如，在同蘇聯關係破裂後，中國進而強化了意識形態爭論中的立場，這就造成了在國際社會中「兩面對敵」的局面。在大約五年時間裏，中國同時與美蘇兩強的軍事威脅相對抗，在國家安全方面，這是最危險的時期。毛澤東對此也深有感觸。他當時說過：「我們現在孤立了……」[15]「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16]不過，事物總是相反相成。正因為

15 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人的談話，1969年3月22日。見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係紀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119。

16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55。

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對外戰略才又開始醞釀新的轉變，以度過這「最冷的冷戰」[17] 時期。

二　「最冷的冷戰」

可以說，在中蘇兩國難以妥協的爭吵背後，始終站立着一個黑影，這就是美國。除去那些較為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爭論外，所有涉及國家戰略和安全利益的不同觀點，都同冷戰敵手美國有關。例如，是否在策略上應對美有所緩和；是否可以通過和平共處或和平競賽的方法，與美國進行比拼，等等，爭吵的雙方互不相讓。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當中蘇之間因對美戰略而劍拔弩張時，美國在中國的戰略視野中，卻暫時退居到次要位置。

1958 年金門炮戰後，由於中國確定了台海問題一攬子解決的方案，台海局勢復歸於平靜。隔日傳來的炮擊聲，只是一種政治戰的點綴而已。當時中共中央決策層，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上。對美關係基本處在凍結狀態。

只是到了1962年，事態開始出現變化。當時台灣的蔣介石集團，試圖趁中國大陸發生經濟困難之機，要挾美國支持他反攻大陸，從而引起了台灣海峽的再度緊張。蔣介石同肯尼迪政府進行了激烈的討價還價，試圖說服美方，此時反攻，時機非常有利。但美國決策圈子裏的大多數人，不認為蔣能夠實現他的許諾。他們想像，以蔣的力量去反攻大陸，是不現實的，甚至是可笑的。此時，美國完全清楚，他們不應該被蔣介石拉下水，捲入一場同中國的軍事衝突。因此，美國透過華沙談判，告訴中國政府，在目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美國人甚至說：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

17　語出美國冷戰史學者舒爾茨博格（Cyrus L. Sulzberger）一本著作的名字：*The Coldest War: Russian's Game in Chin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家聯合起來制止他。[18] 美國的這一態度，使中國得以保持克制的立場，最終化解了可能發生的又一次台海危機。

但這一事件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1962年下半年，他在會見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時說：過去幾年，對帝國主義進攻的問題，我們想得不多，現在得想一想。[19]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總參謀部對東南沿海的地形作了勘查，並向毛澤東寫出了報告。[20]

事實上，自1961年肯尼迪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對華政策開始有了某些「意向」性的變化。還在1957年，時任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的肯尼迪，曾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文章，認為全球政治正在由美蘇的兩極對立，向一個新的結構發展。在這個結構中，兩極之外的中國和歐洲，已經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他指責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對華政策，過多地強調武力，也過於僵硬。他主張要重新估價對華政策。1960年6月，肯尼迪又在一篇講話中主張，通過在日內瓦禁止核試驗會談，謹慎地促進與中國大陸的聯繫。[21]

進入6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政治狀況也開始有所改變。同50年代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情形相比，氣氛多少有了一些寬鬆。美國某些政治家們依稀看到，共產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是一種現實。它在亞太乃至世界事務中有着不能忽視的作用。許多國際問題，特別是東南亞以及東北亞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很難解決。硬是採用不承認的「鴕鳥政策」，是愚蠢的。此外，對美國利益說來，長期對中國採取僵硬的敵視態度，使這種關係永遠緊張下去，對雙方都是不利的。而適當地進行接觸和對話，或可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對各自

---

18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89－90。

19 引自李捷：〈物極必反：六十年代的中國國內政治與中美關係〉，載姜長斌等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頁500。

20 黃瑤、張明哲編：《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385。

21 引自羅斯瑪麗·福特：〈60年代國內政局與中美關係——重新定義：美國國內因素與對華政策〉，載姜長斌等編：《從對峙走向緩和》，頁540。

利益都有好處。出於這樣的原因，肯尼迪執政後，在他的日程表上出現了如下幾個問題：1、應否繼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大使級會談，怎樣確定保持這種接觸的目標；2、應否在聯合國改變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策略；3、對中國大陸正在遭遇的糧荒應否採取提供援助的立場(美國內有相當多的輿論認為，美政府應向中國大陸出口剩餘的糧食。他們認為，這樣做，至少可以在道義方面為美國贏得好評)，等等。當時具有這種意向性變化的政府官員，有副國務卿切斯特．鮑爾斯、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森和國務院情報委員會主任希爾斯曼等人。儘管他們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人。

必須指出的是，在總的政策背景上，6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基點，仍然是遏制而不是接觸，即所謂遏制亞洲的共產主義。上述調整對華政策的意向，其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它的意義，更多的是相對於上一屆政府所奉行的「戰爭邊緣」政策和「大規模報復」政策，而不是一種政策性質的改變。在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期間，美國仍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中，中國是「最好戰」的；「從長期來看，中國是最主要的敵人」。[22] 這兩位總統都堅信「多米諾骨牌」理論，以為在亞洲如果不能遏制共產主義，西方在亞洲的盟友就會鏈鎖式的倒台。此外，肯尼迪在大選中僅以微弱多數擊敗共和黨人尼克松，因此他的政治資本並不多，在第一屆任期內，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政策調整。況且，肯尼迪本人是美國第一個當選的信奉天主教的總統。這也決定他基本的反共立場。

不過，在「冷凍時代」，也有一些微妙的信號。如1960年8月30日，周恩來在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一方面指出，美國企圖繞過台灣問題來緩和中美關係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在美軍撤出台灣問題上，又提出了比以往靈活的建議，即美國首先必須同意從台灣撤出其軍事力量，至於何時和如何撤出台灣的具體步驟，可以在隨後討論。[23]

22　引自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395。

23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91.

10月22日，毛澤東會見斯諾。他告訴後者：中國「要的是整個台灣地區」，不過中國會承擔維護和平的責任，不主動向美國開戰。中國對台灣的政策是，「要談判解決，不要武力解決。這條道理美國政府早已知道」。[24] 似乎，在美國大選即將揭曉，尼克松和肯尼迪在中國台灣及外島問題上進行激烈辯論時，中國領導人有意在做謹慎的試探。

在整個60年代前期，中美之間的敵對，主要因兩個問題而展開。

1 關於中國的核武器計劃

根據近年解密的歷史檔案，美國對中國製造原子彈的憂懼以及據此進行的研究和不斷變化的對策制訂過程，完全是一個有聲有色的故事。

1961年肯尼迪進入白宮後，美國政府中的情報和研究人員，越加密切地注視中國核武器發展情況。他們推斷，中國不久即可能加入核俱樂部。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的回憶，肯尼迪認為：「60年代最大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的核武器爆炸。」[25] 這種估計反映了美國領導人的一種內在緊張。他們感到，中國製造核武器，將不僅對美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而且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友的安全也構成威脅，並可能引發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這是美國極不願看到的情景。為此，美國亟欲同蘇聯合作，簽訂禁止部分核試驗條約。1962年夏，肯尼迪曾坦白表示：他在核禁試問題上的重要考慮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國擁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一項禁試條約有助於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國認真予以考慮，而不管蘇聯提出的建議如何。[26] 據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署長威廉·福斯特在1964年會見一位歷史學家時所透露，肯尼迪曾經考慮採取一項危險行動，迫使中

24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449－450。

25 張少書：《敵乎？友乎？》，頁220。

26 轉引自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422－423。

華人民共和國遵守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當時，肯尼迪甚至試圖放棄他正在推行的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多邊核力量」計劃，來換取蘇聯在必要時同美國的合作，以打擊中國。

事實是，在60年代初，美國人對中國的核計劃並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國才得到了蘭州氣體擴散廠的照片。那時，他們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進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測。直到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國核設施的有效圖像。而因為航程的關係，U-2飛機很難飛到羅布泊這樣中國深遠的內地。當時美國的情報分析感歎道：我們對中國核計劃所知道的東西，是那麼零碎，就如同我們了解蘇聯在甚麼性質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國核計劃一樣，是那樣破碎不堪。

到了1960年底，美國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採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鈈。同時，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會在1962年提供鈈。據此，情報專家極為肯定地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鈈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而作為第一代的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鈈。至此，對中國原子彈的製造，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

於是，有人開始提出對策。1961年9月，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喬治·麥吉向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建議說，一個有效消除中國原子彈造成心理影響的辦法，就是鼓勵甚至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因為當時印度的第一個核裝置已經接近爆炸試驗。這時，麥吉一點都沒有顧慮印度擁有核武器之後會給亞洲帶來的不穩定，而只是想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當時，曾經擬議由美國總統科學顧問杰羅姆·韋斯納在訪印期間，拜訪印度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向他探詢，中國的核計劃將會對印度發生多大影響？其用意在於，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這個計劃最終被否定。因為，美國決策者還是害怕擔當擴散核武器的名聲。臘斯克最終同意了麥吉的另一個建議，即打一場宣傳戰，宣傳美國核武器的絕對優勢，同時貶低中國的核能力。

在1963年1月22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關於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當時在肯尼迪左右的顧問們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蘇聯領導人關於和平共處以及核武力升級的危險性的立場，是可靠的。比起中國來，這種態度顯然更少危險性。就在這次會議之後，無任所大使艾夫里爾·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說，蘇聯人對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在哈里曼同蘇聯外交官的談話裏，他們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個禁止核試驗的條約，可以針對中國。哈里曼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麼，「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劃。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

在美國人眼裏，同蘇聯聯手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是有可靠基礎的。因為，蘇聯已經切斷了對中國核計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蘇聯支持禁止核試驗和防止核擴散條約，即具有針對中國的意思。從1962年8月開始，蘇聯對美國關於訂立國際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反應積極。在臘斯克看來，這個條約就是以中國為靶子的。

美蘇聯手的可能性，使美國高層有些按捺不住。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63年4月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則就是使用強制手段。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幹，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儘管軍人們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這份報告，但他們不是沒有擔心。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李梅將軍即在有關這份報告的備忘錄中坦言，公開使用武力來強制中國是不現實的。即使迫使中國簽了條約，也無法保證它能實行。此外，如果美國採取單邊行動，不管是進

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復和戰爭升級。至於如何使美國的行為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但是，如果有蘇聯的哪怕是默許的合作，情況就會不同。因為一旦美國採取行動，蘇聯就會在戰爭升級和迫使中共接受條件的兩極中，起緩衝作用。

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事實上是第一個向蘇方發出試探的高級官員。5月中旬，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邦迪向後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對此不感興趣。他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當時，「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於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儘管邦迪還想加以誘惑，但多勃雷寧還是拒絕談論中國問題。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布，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他們認為這是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於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個複雜關係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要麼堅持「多邊核力量」，要麼取悅蘇聯。最後，肯尼迪似乎下了決心。在哈里曼即將出使蘇聯前的一次內閣會議上，肯尼迪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當時，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對。支持者認為「多邊核力量」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反對的人則提出，「多邊核力量」已經把美國和歐洲的關係深深地絞在一起，現在根本沒有放棄的可能。

肯尼迪還是扔不掉美蘇聯手遏制中國核計劃的念頭。當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試探，赫魯曉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國核計劃，以及如果要蘇聯採取行動，它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採取行動」上到底抱有甚麼想法。雖然，哈里曼最後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採取政治的或其他步

驟來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此外，這位第一書記還極力淡化中蘇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關於中國有了核武器將對蘇聯構成威脅的觀點。他對哈里曼說，中國的核計劃沒有那麼厲害。有了核武器，中國會更加自我約束。因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他準是喊叫得最兇的人」。

儘管肯尼迪沒有獲得赫魯曉夫的承諾，但他並未放棄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肯尼迪總統談到了所謂具有「威脅的形勢」。雖然他承認，中國在核計劃方面，要達到「羽翼豐滿」的程度還需時日，但「我們現在就希望採取步驟，來減緩這種危險的前景」。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在同肯尼迪會談之前，蔣經國造訪了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後，蔣經國又會見了邦迪，他們也談到了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作戰問題。蔣經國勁頭實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幹。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並引起大的衝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

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談話中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三百到五百人的突擊隊派到像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根據談話記錄，蔣經國當時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對此，肯尼迪仍未完全放心。鑑於豬灣事件的經驗，華盛頓和台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準確的情報。肯尼迪告訴蔣經國：「不管採取甚麼行動，它都要適合實際情況。」幾天後，蔣經國會晤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計劃小組，來研究派遣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雙方約定，任何行動都必須經過雙方最高層的批准。

也就在這時，美國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開始了他關於中國核試驗意義和後果的研究。約翰遜研究的最可取之處，是它

沒有危言聳聽。約翰遜的報告指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裏，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係，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在約翰遜看來，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國的核威脅減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個有核的中國，處在美國可攻擊的範圍之內，而中國對美國卻做不到這一點。因此，中國就不得不考慮，在它進行侵略時，會受到美國核武器或常規武器的反擊。這種情況使中國決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國大陸處於嚴重的攻擊之下。約翰遜認為，中國製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自己謹慎的、後發制人的軍事政策。應該承認，美國政府裏的確還有像約翰遜這樣一些明白事理和比較聰明的人。

儘管約翰遜把中國冒險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沒有忘記強調中國核試驗的政治含義。他認為，中國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後，會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國結盟的鄰國的「意志」，使他們同中國和好相處，從而消蝕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正如國務院另一份支持約翰遜觀點的報告所說，中國會「避免莽撞的軍事行為」或「核訛詐」，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為「政治武器，以贏得尊敬，促進中立主義，鼓勵革命」。

正當美國政治家和軍人們為中國核武器的處置問題絞盡腦汁時，1964年10月15日，美國間諜衛星的照片顯示，中國的羅布泊核試驗場已經完成了最後的準備。包括由雙層圍欄環繞的高340英尺的鐵塔，成列的儀器掩體，兩個小一點的鐵塔和各種地堡、平台。同時，美國情報人員還觀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來往於試驗場的大批次的飛機，在1964年又恢復了飛行。這表明，最後的準備正緊張地進行。中央情報局負責科技情報的助理局長唐納德·張伯倫肯定，爆炸就在這幾天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西部的荒漠上空，騰起了巨大的蘑菇雲。美國設在世界各地的十三個情報觀測站中，有十一個立即捕捉到了這個蘑菇雲所釋放的巨大電磁脈衝。駐日本美軍基地名為「足尖舞蹈者」的探測飛機，爆炸後多次起飛，收集中國原子彈的核灰塵。當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檢查這些從輻射雲中收集的灰塵時，他們簡直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認定的鈈，而是鈾-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這意味着，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發展的。直到當年底，U-2飛機才證實，蘭州氣體擴散廠早已投產了。

核爆炸後幾小時，約翰遜總統發表聲明。不過這聲明已不可能再有甚麼新意了。它只是說，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諾對亞洲的保護。但中國同時發表的聲明，卻在世人面前擲地有聲：一、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二、中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應被銷毀。

在台灣，蔣介石被核爆炸震驚了。因為，這爆炸聲對他反攻大陸的夢想不啻是沉重一擊。蔣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應採取軍事行動，在中國大陸研製出核運載工具之前，摧毀它的核設施。但在美國人那裏，蔣碰了軟釘子。

約翰遜總統在核爆炸後曾經任命了一個專門小組，希望對防止核擴散問題作出研究。這些加入專門小組被稱為「聰明人」的前政府高級官員，對各種所謂防止核擴散的方案進行了披閱，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實際上，打擊中國核設施是作為整個「激進」的防核擴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這些政策還包括：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實質性地從歐洲撤出戰術核武器；封鎖法國在太平洋的核試驗基地；以及最小威懾核戰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專門小組更同意羅伯特・約翰遜的觀點，不主張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打擊。但他們對核擴散問題看得很重，視其為「重大威脅」。因此，他們建議，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核政策，並形成和通過一個國際性條約。小組認為，接受中國作為一個有核國家已是不可避免。這要求重新考慮對華政策。其關鍵點，是把中國接納進軍備控制條約。

顯然，這是一項意在「羈縻」的建議。但由於它同受國務院支持的「多邊核力量」計劃相矛盾，結果沒有得到約翰遜總統的支持。國務卿臘斯克雖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擴散條約，但在另一面，卻主張

建立起「核武器銀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亞洲國家加入其中，以對抗中國的核力量。實際上，這是默許或承認這些國家制定自己的核計劃。

這樣，從實質上說，儘管中國原子彈的爆炸成功，使美國高層對核擴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彈所造成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約翰遜總統在拿出一個意義重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時，仍是困難重重。

在這場以武力阻斷中國核計劃「鬧劇」的末尾，還有一個小插曲：1965年春，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不知通過甚麼渠道偵知，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能力。這意味着，中國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擊美國的領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軍甚至還設想，中國會引發一場「催化戰爭」，即中國使用其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攻擊美國本土，而使美國誤認為是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從而迫使美國核反擊。當時的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曾向國務院提出建議，應在中國導彈潛艇的處女航行時，將它擊沉。後來的事實證明，美國海軍已經緊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國才試驗自己的導彈核潛艇。

2 中美敵對的第二個問題：越戰的迅速升級

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都認為，越戰是在亞洲遏制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手段。約翰遜甚至認為，如果美國在越南南方失敗，那麼蘇聯和中國，特別是中國，就會填補美國離開後的「真空」，可能會有強大的中國軍隊從「山間小路」湧進印度支那。他聲稱，決不做「目睹東南亞重蹈中國覆轍」的美國總統。[27] 從1964年起，美國在不斷擴大對越南南方的侵略的同時，加緊策劃針對越南北方的戰爭。當年8月5日，美國以北部灣事件為藉口，轟炸越南北方。1965年2月，美

27　轉引自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49－1972）》，頁497。

國開始對越南北方進行持續轟炸。3月，又派遣3500人的海軍陸戰隊進駐峴港。這是美國第一次向越南派遣大量地面部隊。它標誌着越南戰爭從所謂的「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

越戰的升級，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直接威脅。而一旦美國出兵越南北方，則可能與中國直接發生軍事對峙。[28] 對此，中國不能不調整自己的戰略方針。這一重大戰略方針的調整，發生在1964年。它可分為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

所謂對內的戰略調整，是指國家改變了原本被概括為「吃穿用」計劃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而代之以大力發展國防工業和建設「三線」的戰爭準備計劃。在對外方面，中國此時的主要戰略動作，是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戰爭。對中國說來，這既是出於國際主義義務，又是保衛國家安全的必要行動。還在北部灣事件之前的1964年6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時就指出：如果美國進攻北越，擴大戰爭，我們將作出最強烈的反應，做到甚麼程度，要視當時情況而定。[29] 在此基礎上，1964年7月，中國、越南和老撾三國在越南河內舉行三黨會談。會談中，中國方面估計，越南戰爭的發展有兩種可能：一是美國強化「特種戰爭」；二是把「特種戰爭」擴大為「局部戰爭」，即在南越和老撾直接出兵，轟炸或進攻北越。中方表示，要盡一切可能把戰爭限制在目前的範圍之內，同時積極準備應付第二種可能；如出現第二種情況，中國的方針是「美國走一步，中國走一步；美國出兵，中國也出兵。」[30] 實際上，中國此時已基本作出了類似抗美援朝戰爭那樣的戰爭準備和承諾。

北部灣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發表「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進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的嚴正聲明。[31]

---

28 轉引自李捷：〈毛澤東向兩極格局的挑戰〉，載姜長斌等編：《從對峙走向緩和》，頁634。

29 曲愛國：〈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戰場的軍事行動〉，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84。

30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20－221。

31 《人民日報》，1964年8月7日。

從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陸續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等支援部隊計23個支隊、95個團另83個營，共32萬餘人次。其中最高年份為17萬人。[32] 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援部隊有力地配合了越南人民軍的作戰行動，為奪取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雖然，中國在戰略上作了最壞的準備，但並沒有放棄爭取不發生戰爭的努力。周恩來在1965年的幾個不同場合，請外國領導人轉告美國四句話：一、中國不主動挑起戰爭；二、中國說話是算數的，所承擔的國際義務是要履行的；三、中國是做好了準備的；四、只要美國轟炸中國就是向中國發動戰爭。戰爭是沒有界限的。[33] 實際上，這是中國對戰爭態度的一條底線。它要傳達給美國人的是，中國不會主動向美國開戰。而在美國，愈來愈多的人擔心，越戰會演變成另一次朝鮮戰爭。因此，對中國採取「遏制而不孤立」的做法，逐漸為美國政界所接受。1966年3月16日，在中美第一百二十九次會談中，美國談判代表有意透露，美國對中國沒有敵意。那些說美國打算進攻中國大陸的報導，是不負責任和是不正確的。這樣，美國也向中國作了一次政策性「透底」。

可見，即使在「最冷的冷戰」時期，也不是沒有一線「轉換」的契機。應該說，中國在60年代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戰爭考驗。但事物往往在最危難的時刻，會發生驚人的轉變。問題在於，人們如何發現轉變的徵候，把握轉變的時機。必須肯定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而對外界做出的反應，是必要的。只是，應該研究這種反應的適度性。正如我們看到的，中美之間在對峙最嚴重的時候，始終謹慎地避免發生直接軍事對抗。這就為後來整個政策的轉變，預留了充分的空間。

32　曲愛國：〈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戰場的軍事行動〉，載《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頁91。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445、457。

三　尋找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

1963年1月9日，正在廣州的毛澤東，讀到了郭沫若1月1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一首詞：《滿江紅》。毛澤東為郭詞中「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兮扶之直」兩句感奮不已，遂奮筆疾書，寫出了60年代前期最為中國人吟詠不絕的詞作之一《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詞中說：「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這是政治家用詩人的浪漫，對世界大勢的描畫和概括。

60年代中期，廣大亞非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運動，掀起了一個高潮。從第二世界大戰結束至1963年，已經有五十多個亞洲和非洲國家獲得了獨立。昔日的殖民主義體系，陷於土崩瓦解的境地。中國自己也是第二次大戰後從殖民主義體系中獨立出來的國家，這使她同廣大亞非拉國家有相同的命運感和使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處於大分化和大分裂的邊緣時，中國領導人在亞非拉廣大地區，看到了聚集起來的「反帝、反修」力量。那裏，是一個廣闊的戰略空間。

在60年代前期，中國領導人多次出訪亞非國家，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增進同這些國家的相互了解和友好關係。其中，以周恩來和陳毅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對亞非十三國的訪問最具影響。在對非洲的訪問中，周恩來總理反覆闡述了中國同非洲國家發展關係的五項原則，以及中國對外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這些原則的基本點，是支持亞非各國反對帝國主義及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支持他們所奉行的不結盟政策；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願意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這種外援助決不附加條件，也不謀求特權。中國同亞非國家發展關係的真誠，使自己的形象和威信進一步樹立起來。在整個六、七十年代，中國在亞非「新興國家」中始終獲得了比較可靠的支持。

中國在兩極之間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在戰略上，是由「中間地帶」、「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來統領的。「中間地帶」論，即指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着一塊「極其遼闊的地帶」，它們包括亞非拉三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是

毛澤東1946年同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提出的。毛澤東當時認為，帝國主義在沒有征服這片廣大的中間地帶之前，是談不到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進攻的。[34] 作為一種戰略性理論，「中間地帶」問題在50年代和60年代又兩次被毛澤東提起。但在理論闡釋上，前後卻有所變化。

在1957年提到「中間地帶」時，它的理論內涵大體同40年代相一致。毛澤東當時說：帝國主義「特別放肆地干涉那些位於美國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中間地帶各國的內部事務」。[35]「現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國都想霸住……所以我覺得，它是霸中間地帶為主。」[36] 可以看出，這時的「中間地帶」論，基本是着眼於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着眼於兩個陣營的對抗。這種對抗，首先是基於國際的「階級分析」，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然後才着重於戰略，即社會主義陣營應該採取的政策策略。

然而，在60年代，對這個理論的闡釋，有了明顯的變化。從1963年底開始，毛澤東幾次集中談到「中間地帶」問題。他的側重是：「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這種「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大西洋許多國家也不贊成美國。……他們是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37] 這裏，毛澤東已經把利益矛盾放在了觀察國際力量組合的第一位，即強調國家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而明顯淡化了國際矛盾的階級性質。這種變化顯然是在國際政治格局深刻變動的背景下

3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193。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620。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93。

37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07－508。

產生的。它把原本的「集團」式、「盟友」式的戰略思維，帶到了更加接近實際、獨立的戰略框架中。因此，有人甚至說，這是「中國外交走向真正的獨立自主，走向成熟的新的起點」。[38]

由「中間地帶」和「兩個中間地帶」為核心的新的對外戰略思想，對中國外交擺脫兩面對敵、尋找新的戰略空間具有現實意義。首先，1964年的中法建交，即是這種戰略思想指導下的突破。毛澤東在中法建交前夕對法國議會代表團的講話，鮮明地闡述了這一點。毛澤東說：我們做個朋友，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們也不是你們的黨，……但我們可以合作。在我們之間有兩個共同點，一是不許哪一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二是兩國在經濟和文化上加強來往。[39] 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打動了法國人，因為它符合國際利益的矛盾關係。中法建交後，有人曾詢問戴高樂總統的動機。這位法國總統只以一句話來回答：「法國承認的，僅僅是世界的現實。」[40]

60年代，中國在承受美蘇兩個大國政治軍事壓力的同時，也先後同日本及歐洲的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家建立了商務關係。[41] 雖然，限於條件，中國還不可能在政治上同這些國家發展關係，但雙邊貿易卻增加了相互聯繫。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從西方國家進口了大量糧食，這對緩和經濟困難，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在70年代打開外交新局面，是以60年代上述戰略變化為基礎，是60年代獲取的必要戰略空間的延續。

面對動盪和分化改組不斷的世界，中共開始思考調整自己的戰略方向。1964年2月，中蘇兩國在北京開始邊界談判。談判進行了半年

---

38 李捷：〈毛澤東向兩極格局的挑戰〉，載姜長斌等編：《從對峙走向緩和》，頁624。

39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87－188。

40 Wladyslaw 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354.

41 《當代中國外交》，頁190－191。

多，雙方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和諒解。在雙方戰略利益形成衝突、意識形態分歧已經公開化的背景下，這是不難預料的。問題在於，這時的談判同歷史上中俄邊界爭端糾纏在了一起，從而更加造成雙方的對立。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中俄歷史上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三個不平等條約。如果蘇方在領土問題上援引香港、澳門的例子，你們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

顯然，對蘇聯這樣一個具有深厚大俄羅斯思想傳統，又極端注重邊界與安全關係的國家，提出歷史上的舊條約問題，在性質上要比一般的劃界談判嚴重得多。特別是當赫魯曉夫聽到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訪華代表說，沙皇俄國靠武力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筆賬呢」時，反應強烈。他對訪蘇的日本議員說：「中蘇邊界是神聖的。」「誰膽敢破壞它，誰就會遭到蘇聯各族人民的最堅決的反擊。」[42] 至此，中蘇邊界談判已無回旋餘地。雙方在當時號稱世界最長的陸地邊界兩端，布開劍拔弩張的陣勢。這種狀態一直延伸至1969年珍寶島地區的大規模武裝衝突。1969年10月，雙方才再次開始邊界談判。

中蘇邊界衝突造成的緊張，並非國際大格局中唯一的矛盾，儘管它帶有某種國際角逐的信號意義。1964年勃列日涅夫執政後，蘇聯經濟開始了一個較快的增長期。據統計，如以1965年的固定基金為100，到1975年，蘇聯的固定基金已增至209。國民收入增長了186%。也就是說，十年間，蘇聯經濟大體上翻了一番。[43] 國力的增長，使蘇聯加大了對軍備的投入。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美蘇之間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大約是四比一。到70年代初，美蘇兩國的戰略核武器已形成均勢，在數量上，蘇聯甚至已超過美國。由於這個原因，1972年5月，美蘇兩國在對等威懾和同等安全的前提下，簽訂了第一

42　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43　陳之驊主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30－31。

個限制戰略核武器協議。而此時，美國卻被越戰拖入了一個難以解脫的深淵。不僅巨大的戰爭負擔使美國政府感到窘困，國內的反戰與民權浪潮，也使得美國最高行政當局焦頭爛額。60年代末，美國的內政外交處在一灘泥潭中。

其次，中國從蘇聯陣營中分裂出來，逐漸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雖然，中國不是超級軍事強國，經濟實力也稱不上強大，但中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在地區性安全問題上，中國早已有了事實上的發言權。例如，在越戰問題上，中國就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國際鬥爭中，中國的獨立不羈，不能不使人感到它力量的存在。最早意識到這一點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蘇聯問題專家唐納德．扎戈利亞。他在1965年3月眾院召開的聽證會上，首先使用了後來社會科學家們經常利用的幾何圖形，即把「中美蘇關係」比喻為一個「三角」。他告誡說：「這種關係中的任何兩強之間的關係變化，都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第三者。」[44] 這就是後來「三角」、「大三角」說的由來。這種說法反映了60年代末以來國際戰略格局的本質。

第三，即所謂國際力量的分散化。其主要表現是，隨着歐洲和日本的復興，這些原本依賴美國的戰略盟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獨立要求變得強大起來。美國的統治地位日漸削弱；而原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由於陣營的動盪和分裂，也對蘇聯產生某種離心傾向。同時，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在國際舞台上進一步崛起，要求有更多的發言權和平等地位。於是，戰後的兩極格局，正在日益消蝕。美蘇兩國再不能想當然地控制世界了。

新的國際格局要求人們適時地調整自己的政策。

這是一個十分微妙複雜的歷史轉變鏈接點。在總的大局判斷上，中國領導人概括出時代特點，是「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但在具體的政策構架上，還需要耐心的觀察，冷靜的思考。直到幾年後以珍寶島事件為代表的中蘇緊張局勢，才把事態導向清晰化了。中美之

44 轉引自張少書：《敵乎？友乎？》，頁255。

間的戰略利益，也隨之凸現出來。1969年的3、4月之間，是中國領導人開始作出決斷的重要時間。3月22日，毛澤東曾發自內心地指出：「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45]不難想像，這就是他後來所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46]的一個導語。

四　「動盪」和「分化」環境下中國國內經濟運行的突然轉軌

從1962年起至1965年，是中國國民經濟恢復調整時期。無論從理論設計還是人民心理角度看，這個時期選取一種政治經濟平穩發展的戰略最為合理。但是，由於政治上「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指導思想的提出，特別是由於中共領導人感到自己正面對着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複雜國際環境，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運行方向卻因此發生了重大改變。

政治經濟平穩發展的戰略本來是確定了的。事實上，計劃部門的官員，甚至早在1962年就開始對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恢復性質作了某種考慮。例如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1962年年底就致信毛澤東，提出發展農業應作為第一位的任務、以農業為基礎來完成工業化、以及着重於人民生活的改善等三項主張。[47]可以看出，這一初步設想已經具備了後來的所謂「吃穿用計劃」的雛形。1963年初，三五計劃以李富春〈關於編制長期計劃工作的要點〉為題正式交付中共中央討論。〈要點〉認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奮鬥目標，應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而不應把其他的經濟取向，例如國防和發展尖端軍事技術作為主

45　王永欽：〈1969年——中美關係的轉折點〉，《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

46　王永欽：〈1969年——中美關係的轉折點〉，《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

47　李富春：〈關於十年規劃問題給毛澤東的信〉，1962年12月31日，載《李富春選集》（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頁302－304。

要的努力方向。它們最多是處於兼顧的地位，並且在總體上是收縮的。當然，當時更沒有提出戰備問題。[48] 中共中央同意〈要點〉的設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以「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兼顧國防、突破尖端技術」的次序安排經濟計劃。[49] 這可以看作是對三五計劃的正式批准。

計劃官員對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採取積極態度，概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們認為，大躍進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計劃變動太快，甚至處於隨心所欲的無計劃狀態，因而「吃了苦頭」。[50] 其二，大躍進嚴重破壞了農業，甚至發生糧荒，幾年中人民口糧竟難以為繼，因此必須以吃穿用為主導方針安排計劃。鄧小平於9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建設五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約佔總耕地數的三分之一)的主張，[51] 是「吃穿用方針」的極好註腳。

應該說，這是一個實際的、比較符合社會需求的計劃設想。但是，實際歷史進程卻並未按照大多數人的願望發展。進入1964年，中國國內經濟政治即開始發生變動。發生變動的原因，是這時毛澤東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看法有了重大改變。他不再認為恢復性計劃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義，而強調戰爭危險的迫近，強調「敵人到處可來」的觀點。從而，改變了社會預期的恢復性目標，將「吃穿用」取向變更為以戰備為主的社會性動員。這項變動調動了極大的物質資源，甚至使國家的基本工業布局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改變，並進而波及到政治格局，造成了從基層到中央的全面緊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的政治經濟歷史上，這個變動應是影響十分重大的一次。而這個變動，至少在表面上同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以及周邊緊張局勢有關。

---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194。

4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95。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93。

51 楊茂榮：〈六十年代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的一次重大調整〉，《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27。

有關1964年前後中國的外部形勢問題，目前通行的說法是：「(1964年時，)中國周邊環境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局勢，外來軍事侵略彷彿隨時可能發生。1964年8月5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兩個多月，美國海空軍向越南民主共和國發動襲擊，把侵略的戰火從越南南方燃燒到北方，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在北面，1964年以來的中蘇邊境衝突在不斷惡化。在西南面，中印邊境的緊張局勢也沒有完全消除。」[52] 因此，中國的基本戰略方向便不能不向戰備傾斜。

從簡單因果關係看，這個闡釋似乎具有合理性。因為，在60年代中期，中國在世界上處於相當嚴重的孤立地位。在同美、蘇兩個大國的關係方面，矛盾日益深刻、激烈，幾乎喪失了調和餘地。美國決策者頑固推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遏制政策，在東南亞的叢林中，捲入愈來愈深。而中國奉行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外交路線，也使得同美、蘇矛盾愈加突出。在某種意義上，越戰和周邊的緊張局勢，可以看作是這種矛盾突出化的反應。也就是說，至60年代中期，中國正面對着外部眾多的「敵手」。這些「敵手」無論在潛在還是現實的意義上，都有可能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危害。於是，選擇戰爭準備作為國家經濟政治的着重點，就變得必要了。

但是，簡單的因果關係比較難於說明事物的全部。當我們分析一個重大的國內政治經濟變動的原因時，需要對更為複雜的形勢作出評估。這就是說，除考慮外部威脅外，還要看到中國內部的矛盾因素，以及由外部威脅與內部矛盾交相作用所產生的緊張。6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政治局勢相當複雜的時期。國內外的「變數」都比較大。一個需要研究者特別加以注意的方面是，同50年代相較，後續的十年，國內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變得愈來愈顯著，它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明顯加強。如果說，外部威脅是一種實際考慮，那麼，意識形態因素就類似於「發酵劑」，會加重實際上的「危險感受」。這樣，當我們觀察這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09。

一時期的政治經濟變動時，兩種因素都必須考慮進去，才能獲得合理的歷史闡釋。

從這樣的邏輯考慮，中共面對的所謂「變數」，應該有如下幾種結果：A、如果外部威脅帶來的風險大於國家突然實行經濟政治「轉軌」所要承擔的風險，那麼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向戰備和改變工業布局，就是合理的了；B、如果高估了外部威脅所帶來的風險而迫使國家經濟政治發生轉軌，那麼這個「轉軌」的風險代價勢必過高；C、如果「轉軌」並不主要地來自對外部威脅的考慮，而是另外的因素，例如意識形態的影響，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以及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等等，那麼，就有必要作出進一步的歷史分析。這種實證性的討論，將會在較大程度上挑戰目前的流行結論，即越戰是影響60年代中期中國自身變化的最重要原因；中國在越戰上作出了「高強度」的反應；以及中國因此在60年代中期以後的冷戰中佔有了特別重要的地位等等。事實是，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轉軌」，並非由於國內或國際的單方面原因，也就是說，政治經濟轉軌具有風險，但它顯然並不僅僅是因為顧慮外部或僅僅顧慮越戰的威脅。儘管這個威脅的確存在，而且在日益增大。「轉軌」具有更為複雜的背景性因素的作用。

有證據表明，以往對1964年中國國內戰略性變化原因的研究，是很不精確性的。其主要原因，是所謂「流行觀點」在研究者的意識中佔了穩固地位。但是，歷史邏輯本身卻要講求它的精確性：例如，北部灣事件發生於1964年的8月初，而毛澤東提出改變三五計劃指導方針卻至少是在兩個多月以前；又如，毛澤東關於改變戰略指導方針的意見，是在原有工作日程正按議定節奏的運行當中，向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人提出的，這使它帶有了某種突然的性質。於是，下述問題就變得重要了：毛澤東為甚麼要以一種突然的方式，打破正常工作計劃，而用別人完全沒有料到的新東西來代替原有設計呢？再如，在這種突然改變原有計劃的過程中，其他因素，如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爭論的擴大化和國內階級鬥爭被愈加凸出出來，是否也在發生着作用？當然，更為必要的是作出解釋：認定越戰是促使中國政治經濟變動第一位的外部因素，那麼，在估價戰爭強度與可設想的波及範圍時，是否

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憂慮已經強烈到足夠大，以至達到必須修正共同肯定的休養生息計劃的程度？

答案應從毛澤東斷然改變三五計劃指導方針的原因說起。

如上文所說，毛澤東本人原本是擁護「吃穿用」計劃的。他曾於1963年8月首先提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應作為調整的年代。[53] 毛澤東的這個意見，是在當時要不要繼續調整的兩派意見爭執不下的情況下，向中共中央核心提出的。這表明他最初並不主張重新擺開大投資的經濟戰場，在後來所說的「三線」地區建立用於戰備的工業設施，更沒有將戰爭準備納入視野。這是大躍進遭到嚴重失敗之後人們普遍願望的正常反映，並且還說明，由於物質的以及人們情緒上的原因，當時對政治經濟所能做出的重大改動，是沒有充分道理的。

可是，毛澤東在不到十個月之後，即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即將開會討論已經醞釀成熟的三五計劃之前，提出了他的「三線計劃」。他在5月10日和11日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有若干重要插話，其中兩點改變了匯報者原有的思路：第一，當談到鐵路交通在第三個五年內只能搞那麼多時，毛澤東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第二，當談到基礎工業、交通同各方面還不適應時，毛澤東說：「沒有坐穩，沒有站穩，是要跌跤子的。兩個拳頭——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54] 顯然，把一個「屁股」即基礎工業搞上去，而其他不能太多，是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的。因為李富春在1963年底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上，剛剛代表國務院申明：「各級計劃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55] 而國防工業成了另一個並列的「拳頭」，也非計劃官員們原本之所設想。

53　薄一波：〈關於一九六四計劃的問題〉，《黨的文獻》，1998年第4期，頁5－6。

54　〈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的插話（節錄）〉，《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1。

5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95。

這裏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有沒有證據説明，毛澤東突然改變已經基本成型的三五計劃的「盤子」，提出戰備與三線建設的意見（這是不能違背的意見），同當時的越戰戰況之間有明顯的因果關係。研究證明，這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反證就是上面所説，毛有關必須實行戰備和加緊三線建設的觀點，在提出的時間上都早於8月5日，即北部灣事件發生，美國開始轟炸越南北方，越戰明顯升級為同越南北方的戰爭這個標誌點。這應該不是偶然的。

從5月10日、11日開始，毛澤東關於戰爭和預防戰爭的説法，呈現了愈來愈明確和嚴重的趨勢，6月16日在十三陵談話達到高峰。5月10日、11日毛澤東的説法是：不建攀枝花，「打起仗來怎麼辦？」「打仗，我還是寄希望於步兵。原子彈要有，搞起來也不會多，但要搞起來，搞起來嚇嚇人。黃色炸藥和大炮很頂事，帝國主義對這個很害怕。」[56] 5月27日，同中央常委集中談搞四川三線問題時説：現在要準備，要着手。現在不着手，耽擱了時間，將來不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甚至於三、四、五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打仗還是靠常規武器，但是，為了使帝國主義在發動戰爭之前考慮一下，還是要有尖端的東西。[57] 6月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説：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甚麼時候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着覺。那麼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

---

56 見李富春1964年5月1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説明〉，《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2。李富春引用毛澤東的上述説法時，用了「主席最近説」的時間限詞。從上下文推斷，毛的這席話，應該是在5月10日、11日講的。

57 見周恩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若干問題〉，《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5－19；劉少奇：〈繼續控制基本建設，着手搞西南三線〉，《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9－20。

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58] 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談到戰略防禦方針時，否定了原有的「北頂南放」的防禦戰略，指出，敵人到處可來，應處處備戰，提高警惕，根據敵來勢，以決定主攻、主防方向。[59] 並提出，大區書記要抓軍隊，不能只要錢不要槍。[60]

可以看出，無論是就戰爭準備還是三線建設而言，此時毛澤東並沒有專門考慮越戰及越戰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反之，他設想的是，敵人到處可來，應處處備戰。同時，毛澤東也沒有放棄1960年以來預定的敵人主攻方向。他在1964年就議論過，敵人從哪裏來？主要是中間突破，割斷南北，兩翼來不怕，中間突破危險，最不放心還是北京、天津。他還認為，敵人也可能走八國聯軍老路，進渤海，從天津登陸。[61]

敵人到處可來，要處處備戰的概念，表面上是說明處在一種迫近的危險中，但實質上對來敵的估計是十分模糊的，反而沒有原本確定的「北頂南放」、「島重於岸」[62] 的原則在戰略上具有針對性了。周恩來對「三線」的定義性解釋是：「除了攀枝花（位於西南川滇交界處）以外，我國周圍各省都是第一線。東南沿海，舟山是最前邊，東南幾省是第一線。對東南亞來說，南邊是第一線。對印度來說，西藏是第一線。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互相來說又都是第一線。比如，西藏有事，內地都是三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陝南、甘南、攀枝花。」[63] 這裏對東南西北四個方面都考慮到了。姑且不論現實危險

58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1199－1200。

59　陳小魯：〈陳毅與中國外交〉，載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152；另參見《羅瑞卿傳》，頁472、477－478。

60　《羅瑞卿傳》，頁472。

61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頁208；《羅瑞卿傳》，頁385。

62　「北頂南放」和「島重於岸」兩項戰略方針，是林彪1959年主持軍委後逐步明確的。參見劉志男：〈1969年，中國戰備與對美蘇關係的研究和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3　《周恩來傳（1949－1976）》，頁811。

是否真有那樣大，僅就最低限度而言，對南部即越南方向的防範，同其他三方向是平列的。這就是說，對所謂南方已經「燒到家門口的戰火」(此時還未發生北部灣事件)，當時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感覺到中國應該進入臨戰狀態。由此可以判斷，改變三五計劃的基本指導思想，提出三線備戰問題，並不是有了特別急迫的戰爭壓力，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於某種不確定的危險感覺。

與其說從南方來的戰爭壓力要大一些，不如說當時人們還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在李富春5月28日所作「關於計劃安排的幾點意見」中，「三五計劃」中原本要新建的項目，最大的就是酒泉鏡鐵山鋼鐵廠。該項目預計到1972年至1973年完成一期投資，規模為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噸的產量（預計投資十一二個億；已投資兩個多億）。[64] 但5月27日毛澤東同中央常委談話後，酒泉鏡鐵山的戰略地位發生了變化。李富春說：「所謂後方，一個是西南，一個是西北，現在最靠得住的還是西南。」[65] 鄧小平當場做的解釋是：「酒泉過去和西南一樣是大後方，現在變了，也算第二線。」[66] 很明顯，酒泉大後方地位的改變，是同周恩來上面關於「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的說法出於同一考慮。只是，鄧在這裏說酒泉所處的西北「算二線」。至於周恩來所說的「修正主義」，當然是指蘇聯。

自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衝突之後，中蘇邊境開始變得不安定起來。1962年又發生波動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從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蘇邊境地區共發生1000餘次衝突。[67] 這些衝突不僅有損於兩國正常關係，而且也引起雙方對歷史上中俄簽訂之不平等條約的保留性質辯。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公開提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聲

64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1。
65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1。
66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21。
67 《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明，如果蘇方援引香港、澳門的例子，那麼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1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又進一步明確提出「整個中蘇邊界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68]

當然，說毛澤東要翻歷史舊賬，把中國歷史上被俄國割去的領土再要回來，是荒唐的。毛澤東和中國政府顯然不會那樣做。因為它既無國際法理依據，也沒有現實可能。中國不會謀求蘇聯領土這一點是肯定的。而說這些話的目的，按毛澤東自己的表達，只是「採取攻勢，說些空話」，讓赫魯曉夫「緊張一下」。[69]

在毛澤東看來，「緊張」與「不緊張」之間，有着辯證的、互換的關係。有時，為了一個階段的不緊張，往往有意去製造一定程度的緊張。在緊張達到某一限度時，釋放或減緩緊張度，從而爭取到所謀求的不緊張；有時，為了另外的目的，可以製造緊張，然後得到矛盾或問題焦點的轉換。毛澤東常講不怕鬼的故事，意思即在於說明：愈怕鬼，鬼愈來；愈不怕鬼，鬼反而嚇跑了。外國人，不論是蘇聯人還是美國人，對於毛澤東這種浸透了中國文化精義的戰略思想，在很長時間裏摸不到頭腦。有時，他們把表面上「緊張」所隱含的意圖看重了，真的被調動起來，形成面對面的緊張；而有時卻又太過自信，從而忽略掉某種非常重要的信號；還有一些時候則拘泥於「末節細枝」，從而像墜入「五里霧中」，在複雜形勢面前不能發現「登堂入室」的門徑。直至很久以後，人們才認識到，毛澤東非常善於以虛實結合的謀略來調動「敵手」，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其情其景就像中

68　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42。

69　毛澤東當年10月在會見崔庸健和巴盧庫時，再次談到蘇聯違反中俄不平等條約而侵佔中國領土問題。但他說：中國現在是「採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頁43。

國兩個著名的文化特徵：長城與空城計（The Great Wall and Empty Fortress）。[70]

儘管中蘇意識形態爭論在1964年激化到了最高點，但沒有證據表明，當時蘇聯有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意圖。邊界問題的確構成了雙方爭執的一個熱點，不過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識形態爭論的一個陪襯。蘇共中央1964年3月7日給中共中央的覆信，竟對他們前一年11月來信中列在第一位、要求中共中央回答的邊界問題，隻字未提。[71]當時中共中央對蘇聯內部狀況的估計是：赫魯曉夫搞工業黨、農業黨、大開荒，效果甚差，內部思想混亂，不滿情緒增長。毛澤東甚至預測到，赫魯曉夫在近期可能要被搞下台。[72]因此，毛澤東認為，在中蘇關係上，「現在我們轉入了反攻，有大鬧天宮的勢頭，打破了他們的清規戒律」。[73]此外，中共中央核心層對赫魯曉夫也持這樣的看法：此人欺軟怕硬。我們硬一點，他不見得會怎麼樣。但是我們軟下來，反而會吃虧。[74]在1964年的若干次外賓會見中，儘管毛澤東向客人詢問過蘇聯是否會打仗的問題，但內部的底線估計仍然是：「激他拋出一切法寶來」，比方說採取「集體措施」、斷交、撕毀中蘇同盟條約，以至出兵。但現在要大規模出兵打中國還不可能。而搞點摩擦、製造一些邊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75]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麼做有限的軍事準備是必要的，而從打核戰爭出發來進行戰略性預防，以至對整個國民經濟做適應戰爭的重大調整，則理由不甚充分，為時也過早了。

同時，在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決策核心的主觀認識上，對南部來敵，即美國有可能在越南所造成的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也還沒有

---

70 見安德魯·內森（Andrew J. Nathan）、羅伯特·羅斯（Robert S. Ross）著，柯雄等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對安全的尋求》（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

71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725。

72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734。

73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16。

74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675－676。

75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826。

達到即將發生戰爭的緊迫程度。1964年7月1日，劉少奇在天津部隊軍級幹部座談會上指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談了軍事問題，講了敵人進攻的幾種可能性。我們從最壞的可能性作準備，準備好，爭取最好的可能。現在還沒有看到帝國主義要想打的象徵，但是，要做準備，要經常有敵情觀念。」[76] 這裏所說的「帝國主義」，顯係指美國。但它否定了越南戰爭正在向中國迫近的可能性。劉少奇在這裏使用了「有準備」和「敵情觀念」兩個語句，屬提示性用語，並不表明事態已經具有了重大的緊迫性質。在1962年台海危機中，這類用語可能更為常見。因此可以肯定，指出帝國主義目前「還不想打」，是劉少奇對毛澤東十三陵談話的準確理解。向軍隊高級幹部交代這種理解，對後者把握國際鬥爭的基本動態有重要意義。

毛澤東本人的判斷更具戲劇性。1964年8月13日，即北部灣事件發生後十天，毛澤東在同越南領導人黎笋分析美國是否決心越過十七度線侵佔越南北方時說：看來美國、越南和中國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他因而贊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採取巧妙辦法以不去惹怒美國人的決定。[77]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認為：如果說，美國把蘇聯當作近期的主要敵人，而把中國看作是長遠意義上的敵手，那麼，因為帝國主義是實用主義者，「『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麼重要，太久了」，這個敵人於是可以忽略。此外，從歷史上看，美國從來都是要到最後才參加國際戰爭。因此他通常不會是世界性大戰的發動者。特別是「現在美國手伸得太長，是十個指頭按住了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78] 因而他很難騰出手來，同中國作戰。此外，毛澤東還相信：「美國會接受法國的教訓，已經（在越南）打了三年打不贏，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考慮到毛澤東在朝鮮戰爭和1958年台海危機中同美國直接較量所獲得的經驗，以及在1962年台海危機中

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94。

77　引自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44。

78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14。

美國轉達的不支持台灣進攻大陸和不會捲入同中國的衝突的信息，他對美國不企圖同中國發生戰爭衝突的估計是有道理的。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如何看待總參謀部1964年4月25日提出的關於「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的報告。[79]這個報告在研究中理應受到高度重視。它實際是上述我們謂之「流行觀點」的基本依據。

據《羅瑞卿傳》記載，自1962年中國軍隊在沿海地區準備抗擊蔣介石集團的登陸作戰以來，東南方向始終比較緊張。總參謀長羅瑞卿於1963年5月至7月實地勘測了從浙江到山東半島的地形，並向毛澤東寫出了報告。此時，受中蘇關係惡化的影響，北部和西北部地區也多少使人感到了威脅。羅瑞卿於當年7月又對吉林和黑龍江的部分地區進行了勘察。1963年10月，羅瑞卿再次銜命勘察了新疆的阿爾泰、塔城、伊寧以及喀什地區。[80]顯然，原來主要以防備美蔣進攻的「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正逐漸為「敵人處處可來」的思想所取代。總參謀部的報告大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報告認為：國家經濟建設在防備敵人突然襲擊方面存在着比較嚴重的問題：A、工業過於集中。僅十四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約60%的主要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B、大城市人口多。據1962年底的統計，全國有十四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二十五個五十萬至一百萬人口的城市；C、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附近。在敵轟炸大城市時易同時遭到破壞；D、所有水庫的緊急洩水能力過小。而大型水庫中，有五十二個位於主要交通線附近，十七個位於十五個重要城市附近。[81]報告在1964年4月25日由總參作戰部向副總長楊成武上呈。毛澤東於當年8月12日對報告作了簡要批示。這時，距報告上呈已經近四個月，為北部灣事件發

79 《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頁34－35。

80 《羅瑞卿傳》，頁385。

81 《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頁34－35。

生後的第七天。這種情況似乎說明，報告本身在提出時還不具有特別的緊迫性。但在8月5日之後，形勢有了明顯的變化，報告的指向性和意義加強了。

即使如此，我們也很難以報告來作為國家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的唯一佐證。這不僅是說，毛澤東批示的時間在他提出戰略轉變意見之後，而是說這種估計和預防的目標，對中國的安全對策以及機制說來，仍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敵人是誰？敵人在哪裏？他們可能從哪裏來？他們甚麼時間來？是否四面八方都可能來？沒有人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如果對來敵的估計都無法確定，那麼這種緊張顯然也就失去了大部的必要性。1965年，越戰升級。美軍一面大舉轟炸北越，一面大規模增兵南越，介入地面作戰，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這當然不能坐視不理，中國政府一面向美國發出警告，一面加大援越力度。1965年4月2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向美國轉達中國政府的立場：（1）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2）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中國所承擔（援越抗美）的國際義務要履行；（3）中國已經做好了準備。

4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加強戰備工作的指示。同時決定派遣防空、工程、鐵道、後勤等支援部隊赴越南。國內戰備的空氣日益濃烈。然而，使國內政治空氣變得緊張而又捉摸不定的，更多的還不在於戰備，而在於這種戰備的火藥味與反修防修的火藥味的摻和。毛澤東在這個時期前後多次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講「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的話，就很好說明了他更擔心的東西是甚麼。此外，如果毛澤東真的相信戰爭已迫在眉睫了，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那麼，他又怎麼敢於在不久之後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自亂陣腳的政治運動呢？顯然，更具有意義的是，毛澤東總是把準備打仗與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相聯繫。

目前，學術界通常把1969年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作為中國軍事戰略防禦的重點全部北移的標誌。其時間界限應定在1969年6月20日至7月4日由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開的「三北」作戰會議。因為這個會

議形成了〈「三北」地區作戰會議紀要〉。而「三北」作戰紀要曾經是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北部作戰的指導性文件。[82] 這裏，要真正確認這樣一種明確的軍事敵對關係，即從1964年算起，毛澤東主張放棄「吃穿用」計劃而走向戰爭準備，同時推動在國民經濟上具有重大投資方向改變的「三線建設」，歷史至少又走過了五年。鑑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上述對越南戰爭的判斷，我們至少還可以排除掉另一種可能，即，整個國家經濟政治的戰略變動，是因為美國在越南構成的軍事威脅。結論似乎是，一定的威脅是存在的，但不可能達到了臨戰狀態，以至放棄壓力還十分大的國民經濟恢復，去進行全面的戰爭準備。

顯而易見，「流行結論」還有一個重要缺陷，這就是它只循着關於戰爭已在迫近的單一線索進行思考，而忽略了當時國內的另一條歷史主線，即被放大的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對整個國家政治安全所產生的影響。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來，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實際走向是兩相背離的：經濟繼續維持調整；政治則向越加強調階級鬥爭的「左」的方向發展。人們必須注意到，當階級和階級鬥爭被強調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時，整個國家的政治安全形勢也已經達到了極其緊張的狀態。此時，倒真正是「處處都有敵人」了。而不管外部的敵人還是內部的敵人，都具有推翻現有政權的可能。於是，使形勢緊張化便在邏輯上顯得有道理了。並且，從事實上說，在6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經濟並行的背離狀態是不可能延續長久的，政治總要「統領」經濟。因而，並行是暫時的，它不能不為某種突發事件所打破。「戰爭迫近說」是當時最強有力的外力因素，可以充當破壞平衡的砝碼。它的作用就在於，強化政治的、軍事的緊張氛圍，從而把並行的另一端納入社會一元化的政治發展。

---

82 參見劉志男：〈1969年，中國戰備與對美蘇關係的研究和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44。

五　國際與國內政治的一種特殊交互作用

可以說，1962年以來的中國政治，是以一種難以挽回的能量推動國家向緊張化發展。由於階級鬥爭需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說法，獲得了黨內合法意義上的認同，持續只有多半年除經濟以外的各方面寬鬆調整期就即實際宣告結束了。1963年，「四清運動」開始。緊接着，毛澤東有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這兩個批示所引起的文藝界思想政治鬥爭，一般被看作是「文革」發動的鋪墊。因為兩個批示之後，除文藝界之外，哲學界、史學界、經濟學界，也都發生了嚴重的政治批判鬥爭。有些代表性人物，如夏衍、齊燕銘等人，已經在報紙上被公開點名批判。1964年，以鬥爭對象為「四不清」分子的「四清運動」在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人的推動下，愈加蓬勃地展開。不久，「四清運動」更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要整的對象則變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概念的出現，可以被看作是向「文革」邁進的關鍵性的一步。

一般說來，當戰爭迫近時，國家的應變措施應該是保持最大限度的政治穩定，同時開動經濟機器，盡可能接近戰爭準備的完成。然而，中國60年代中期的現象恰恰相反。沒有人能按正常的邏輯解釋，當北部灣事件使越戰不斷升級，而北方邊界的軍事壓力也在逐漸增大的情況下，中國內部的政治運轉反而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問題，而且這種問題的發生，在根本上都是人為製造的，直至引發文化大革命這樣全面政治動亂的爆發。顯然，這不是循着單一的戰備線索去推斷所能合理解答的。

據說，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毛澤東至少有三次在談黨內鬥爭的同時，提出要準備打仗。一次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另一次是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以1964年5月至6月的這一次最具分析意義。

1964年3月17日，毛澤東在家中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鬥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

題上來，聯繫國內反修防修問題。[83] 這是毛澤東本人思想的一個重要動向。

國內反修防修是國際反修的邏輯發展。在中共中央連續發表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已經構築了一個在社會主義時期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的龐大思想體系，即所謂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否則，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這樣，毛澤東為中國的前途與安全描繪了一幅十分悲觀的圖畫。事實上，在這幅「悲觀」的圖景中，摻雜了大量但卻是虛幻的黨內鬥爭因素。

人們對產生修正主義的思想認同，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公平意識遭到破壞。而這種現象的根源，在蘇聯則是出現了「高薪階層」和「農村自發勢力」。從結果上看，蘇聯的「特殊階層怕打仗，怕戰爭，要與美國肯尼迪求和妥協。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二十年以後也要產生修正主義，……」[84] 這就是為甚麼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態度，成為中蘇論戰焦點之一的原因。

與此密切關聯的，是所謂和平時期對革命者意志的消蝕。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說：和平時期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們現在又碰到這種情況，黨內不純，部分組織已經被敵人佔領了，所以我們再不搞，再過十年，中國也會出修正主義。[85]

事實上，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十三陵談話的大部分，是講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問題。毛澤東列出了做合格接班人的若干條件。

---

83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733。

84 鄧子恢1962年7月1日在中央高級黨校的報告，引自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995。

85 蘭冬連等：《求索中國》，下卷，頁1012。

它們後來為「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援引並在隨後中國政治進程中發生重大影響。[86] 而接班人問題的引出，既同整個國際反修大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又與當時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出現的某些新說法有關。毛澤東認為，蘇聯修正主義上台，是隨赫魯曉夫騙取斯大林信任，成為接班人而出現的。這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嚴重教訓。同時，他還注意到，赫魯曉夫是善於搞政變的人。他上台後搞了五次政變，一次一次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打下去。這個教訓同樣值得重視。[87] 基於這樣的看法，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麼辦？中國出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中央，各省委要頂住。

從這樣的角度觀察，則人們不難發現，軍事戰爭準備與政治準備之間有着不可忽視的內在聯繫。由此看來，1964 年提出戰爭準備問題，並因此而更改按正常思路確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指導原則，有比較複雜的政治背景。它至少是國際反帝反修和國內階級鬥爭所造成空前的緊張的綜合性產物，而不是單純的對國際軍事壓力所作出的反應。相反，由於戰備問題的提出，排除了國家按正常設想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可能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劇了緊張。

當然，人們不能否定，越戰所造成的戰爭壓力的確存在；同樣不能否定的是，在60年代，一般意義上的戰爭準備也具合理性。但是應該看到，所有這些外部因素，都是可以通過某些外交運作達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的。例如，對美國越戰所造成的威脅，對中蘇邊界以及整個雙邊關係等等，都有尋求另一種應對的餘地。而放棄緩和的努力，因外部的緊張而刺激起更大的內部緊張，使極為重要的國民經濟調整也喪失了繼續的根據，則顯然是不合理的。

86　「九評」列出之關於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條件，一共五條。有意思的是，這五項條件的每一條，都同赫魯曉夫作了對比。如：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着馬克思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而絕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可見，當時的是非標準，完全是以赫魯曉夫作參照的。

87　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冊，頁 779 。

正如毛澤東當時即認識到的，核武器「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88] 以防備原子戰爭為目的的三線工業基地，終因原子戰爭沒有爆發而被迫改變自己的功能。事實上，有人指出，早在50至60年代，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已經顯現出來。[89] 而中國自己卻揹着沉重的備戰包袱，在國內的政治動亂中一直走到1976年，甚至更晚。

有兩個歷史細節值得玩味。其一，進入1965年，當越戰升級、中國國內抗美援越達到高潮的時候，毛澤東卻以極其冷靜的態度指出：打仗有兩種可能，[90] 打得起來和打不起來。對於美國人，毛澤東似乎有着特別的理解。其二，1965年，毛澤東對計劃部門的「遲鈍」愈來愈不滿。他重新成立了直接對自己負責的「小計委」，來考慮「戰略問題」。當然，不久之後，他更完全打碎了黨和國家機構，開始了一場雄心勃勃的革命。

上述證明，越戰對中國國內經濟政治變動的影響，是有限度的，並不像人們一般設想得那樣直接、強烈。至少，國內經濟政治的變動是由綜合和複雜的因素造成的。而在其中起決定影響的，反而應當是中國內部事務發展的邏輯或因果關係。從總體上說，在60年代中後期，意識形態所發揮的作用，在影響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發生變動時，往往要大於現實方面的考慮。這就是現實性的計劃（哪怕是國家長期經濟計劃）、方針、政策，最後終為政治的、思想的甚至是戰備的「意外」所打破的原因。當然，這些政治的、思想的和戰備的「意外」，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到了國際因素的影響。面對着所謂「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世界，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動，是自然而合理的。對一個執政黨和它的領袖說來，有備無患，是非常正常的反應。正如中共第二個〈歷史決議〉所說，儘管毛澤東晚年犯有許多重大錯誤，但他「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

---

88 《毛澤東外交文選》，頁476。

89 何方：〈論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9年第2期，頁77。

90 毛澤東：〈在打仗問題上要有兩手準備〉，《黨的文獻》，1995年第3期。

義的壓力……」。作為中國人，毛的這一突出的政治作為，是應該得到肯定的。但是，從冷戰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過高估計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可能並不準確。中國在60年代的政治經濟變動，更多的是因為內部原因，而不是「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引起的。恰當的歷史定位和分析，在研究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歷史時是必須的。

作為本章結尾，「三線」建設的大致面貌似乎應做簡單交代。

1964年，毛澤東關於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建設的主張，得到了黨內擁護。當時，大家都感到領袖的深謀遠慮。同時，國家計劃部門立即行動，將「三線」建設具體落實到三五計劃的編制中。毛澤東關於三線建設的思想，還引起了人們對改變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格局的想像力。周恩來就是從這方面考慮問題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擴大會上說：我覺得，主席提出這個戰略思想，我們從中可以引伸出許多認識來，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人口也不平衡，經濟發展更不平衡，以後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個大的經濟鬥爭。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寫出〈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初步提出三線建設的若干部署和實施意見。報告建議在國務院成立專案小組，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等十四人組成，以李富春為組長。報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設項目應擺在三線，並按照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布點，不要集中在某幾個城市；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要有計劃地全部或部分地搬遷到三線；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庫；恢復人民防空委員會，積極準備北京地下鐵道的建設，考慮在上海、瀋陽建設地下鐵道。對上述各項工作，確定由專案小組成員分工負責，用8、9兩個月的時間進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體方案，經專案小組綜合研究後，報中央批准，分別納入1965年計劃和「三五」計劃。[91] 事實上，這個報告已經籌劃出三線建設的基本格局。

9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00－1201。

根據中央意圖，各有關部門迅速展開了西南、西北兩個方向的三線建設安排。安排主要為三個反面：1、擴建部分老廠，建立新廠；2、將國家獨有的在功能上不可替代的重點工廠以及需要配合三線建設的工廠，整體搬遷到三線；3、布置為三線建設提供設備和材料。隨後，中央分別在西南和西北設立三線建設指揮部，負責組織中央有關部門在三線地區新建、擴建和遷建項目的計劃協調和物資供應等項事宜。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由李井泉、程子華和閻秀峰負責。彭德懷於1965年也被派往西南，擔任副總指揮，直至「文革」開始後被揪鬥。西北三線指揮部則由劉瀾濤、王林、安志文和宋平等負責。

從1964年下半年開始，三線建設實際展開。至1965年底，在西南、西北兩個方向新建、擴建和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300多項，其中鋼鐵工業14項、有色金屬工業18項、石油工業2項、建材工業14項、化肥工業10項、森林工業11項、建材工業10項、紡織工業12項、輕工業8項、鐵道工程26項、交通工程11項、民航工業2項、水利工程2項。此外，還有農業、林業、郵電、商業、廣播、教育事業等項目。這一時期，由一線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有49個。軍事工業方面，在西南地區規劃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長江上游重慶至萬縣為中心的造船工業基地；在西北地區規劃了航天工業、航空工業、常規兵器、電子和光學儀器等工業基地。[92] 毛澤東以極大熱情關注的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經過建設工人和幹部的非凡努力，也開工並逐漸建設成型。其第一期規劃的年產規模為鐵礦石1350萬噸、生鐵160萬至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基地跨金沙江陡立的兩岸，地形以崇山峻嶺和深谷激流為主，建設者以神奇的創造力，完成了一項工業奇跡。如今，攀枝花已成為中國十大鋼鐵工業企業之一，成為一座繁盛的城市。

對於三線建設的歷史評價，目前存在各種說法。的確，由於對世界革命形勢和戰爭危險估計得過於嚴重，因而在興建三線的決策中，

---

9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02－1203。

不能不存在失算的地方。同時，也很難蠡測說，中美之間、中蘇之間沒有爆發戰爭，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有了準備。但是，即使在今天，人們也應該承認，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使中國獲得了一個當時並未意識到的客觀結果，即用國家的力量在一個較短時間內，使中國的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改變。這倒應驗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設想，將沿海和內地的經濟發展強制性地加以均衡化。可以說，傳統體制的優勢或許就在於它能集全國之力，幹一些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想像的事情。三線建設的展開，有兩個字：一是建，二是搬。關於建，三五計劃新建項目大都擺在三線，並且按照「分散、靠山、隱蔽(林彪進而提出『進洞』)」的方針布點。關於搬，則是把一線的某些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線。這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一次工廠、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大搬家。一年半時間從上海等地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就有49個。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但三線建設並沒有停止。經過這次經濟戰略的大轉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後的甚至是荒漠的窮鄉僻壤，令人驚異地出現了一批工業、科研、國防基地和城市。這個巨大的經濟變遷當屬於現代中國歷史。

第十二章
需要「精神」的時代

任何國度任何社會，都離不開精神生活。沒有純粹的經濟動物，也沒有純粹的政治動物。當然也沒有純粹的精神動物。物質與精神，是不能相互分離的一對生命元素。凡是人，都要在一種精神影響下或精神範式中生活。由社會人共同擁護的精神原則和在之上建立的精神網框，構成了一個社會的精神範式。如果精神範式缺失，這一社會生活將陷於失態。因此，社會需要精神支撐，人也要有賴以支撐的精神寄託。不過，歷史研究顯示，社會的精神追求並非是均衡的。有時，社會對精神的需求非常強烈，以至整個社會都充斥着某種精神取向；有時，社會對精神的追求又是弱化的，人們所想，基本附着於物質層面。當一個社會物質條件並不豐盈但卻以理想主義目標為全部想像時，它對精神的追求就非常急迫。中國二十世紀60年代的前半期，恰好是這樣一個對精神追求非常急迫的時代。為了克服物質困難，為了回擊所有侵蝕社會主義的敵人，為了實現崇高的政治理想，為了塑造全新的社會和全新的人，這是個特別需要精神的社會，更是一個特別需要精神的時代。

一　時代精神的樁柱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並不是一座想像中的風雨危樓。一方面，當時中國社會穩定，經濟活躍，風尚良好。社會公眾

思想純潔，耽於理想。人們視物欲為邪惡，以奉獻為崇高。各級官員們也大多廉明公正。如同任何一個良性社會一樣，它雖有官僚主義之憂，卻無嚴重腐敗之患。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堅如磐石。儘管國際環境複雜，國內政治運動不斷，但始終保持了國家運行的穩定。國際反修、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鬥爭，造成了社會一定程度的緊張，但並沒有離散人們的精神追求。相反，這些政治運動更加凝聚和強化了人們對理想的堅守。用歷史眼光看，這一時期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黨和政府的政治基礎，在中共執政的五十餘年中，都是最穩固和強大的。

為了研究這個社會的精神樁礎，有必要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做一番調查。

中共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由於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1960年冬以後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1] 所謂「逐步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可以從社會的各個方面發展來考察。從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時間裏，除一五計劃期間中國經濟處在較大幅度的發展中以外，另一個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期，則應屬於1961－1965的調整五年，儘管這種平穩發展帶有恢復性質。這五年，中國經濟真正走出了由於「大躍進」造成的谷底。從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來看，按當年價格，1965年我國社會總產值達到2695億元，國民收入達到1387億元；[2] 按可比價格計算，分別比1956年增長60.3%和34.8%。[3] 以「一五」計劃期末的1957年為基數，在1958年到1965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譯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9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頁33、50。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1993）》頁34、51數據計算。

年的八年中，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門基本建設投資額達1627.98億元，投產大中型項目936個。[4] 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主要工業產品，鋼增長1.29倍，達到1223萬噸；原煤增長77.1%，達到2.32億噸；發電量增長2.5倍，達到676億千瓦小時；原油增長6.75倍，達到1131萬噸；天然氣增長14.71倍，達到11億立方米；水泥增長1.38倍，達到1634萬噸。[5] 主要農業產品中，棉花增長27.93%，達到4195.5萬擔。[6]

在工業建設方面，調整的五年也是成就巨大的。以1965年同1957年相比，全國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按原值計算，增長了1.76倍。新建、擴建一大批重要企業，如十大鋼鐵廠，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屬冶煉廠，幾十個煤炭企業和發電廠。武漢、包頭兩大內地鋼鐵基地主要是在這個十年建設起來的，戰略大後方的攀枝花鋼鐵基地是在這個期間開始建設的，我國最大的鞍山鋼鐵基地在這個時期得到進一步擴建。這個時期發生的「大躍進」，給工農業生產和其他事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但是從工業建設的布局來看，某些方面的建設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1958－1960年間開工的。這幾年新建的若干項目，經過後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形成的煉鐵能力佔1950年至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煉鐵能力佔32.7%，採煤能力佔29.6%，棉紡錠佔25.9%。[7] 經過五年調整，一些工業技術的經濟指標又有所提高。1965年生鐵合格率達到99.85%，鋼材合格率達到98.5%，棉花一等品率達到97.4%。[8] 機械工業有些產品的性能和質量已經接近或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

4　《中國統計年鑑（1993）》，頁149、167。

5　《中國統計年鑑（1993）》，頁446－447。

6　《中國統計年鑑（1984）》，頁146。

7　馬洪、劉國光、楊堅白主編：《當代中國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384。

8　《當代中國經濟》，頁356。

可以認為，至1965年，中國已經初步建成了相當規模和一定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電力工業有很大發展。煤炭工業逐步向現代化發展。冶金工業經過調整，到1964年，鋼和鋼材品種都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以前不能製造的高溫合金鋼、精密合金鋼、高純金屬、有色稀有金屬，這個時期都能煉製了；機械製造包括製造汽車、拖拉機、萬噸遠洋輪船所需的多種鋼材，國內基本上都能解決了。機械工業分別形成冶金、採礦、電站、石化等工業設備製造以及飛機、汽車、工程機械製造等十幾個基本行業，而且能夠獨立設計和製造一部分現代化大型設備，到1964年我國主要機械設備自給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9] 電子、原子能、航天等新興工業在這個八年裏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成為中國重要的產業部門。1965年，中國已經能生產雷達、廣播電視發射設備、電視中心設備、無線電通訊設備、原子射線儀、各種氣象儀、水聲設備、電子計算機、電視機等。支援農業的工業有了很大發展。從1957年到1965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21萬千瓦增加到1099萬千瓦，化肥施用量由37.3萬噸增加到194.2萬噸，農村用電量由1.4億千瓦小時增加到37.1億千瓦小時。[10] 在調整的五年中，中國工業門類中以石油工業的發展特別突出。1959年我國地質工作者在東北松嫩平原找到工業性油流，1960年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決定從各方面抽調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進行勘探開發，迅速建設起大慶油田。一年探明油田面積並進行試採實驗，三年建設起中國最大的石油基地，產量達全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質理論、油田開發和煉油工藝方面都有突破性進展。隨後，還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能夠自給。這是當時中國的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交通運輸方面，從1958年到1965年，全國新增鐵路營業里程7900多公里，[11] 包蘭（包頭至蘭

9 《當代中國經濟》，頁356。

10 《中國統計年鑑（1993）》，頁341、349。

11 《中國統計年鑑（1993）》，頁514。

州）、蘭青（蘭州至青海）、蘭新（蘭州至新疆）等線建成通車，不僅把西北五省區聯結起來，而且把西北地區同華北和沿海地區聯結起來。川黔（四川至貴州）、桂黔（廣西至貴州）線也建成通車，將廣西、四川、貴州三省區聯結起來。成昆（成都至昆明）、貴昆（貴陽至昆明）、湘黔（湖南至貴州）、湘桂（湖南至廣西）等線先後開工，並部分通車。全國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鐵路，福建、寧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車。鐵路貨運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50.67%，客運量增加了50.94%。[12] 公路、水運、航空等事業也有較大發展，全國大部分縣、鎮通了汽車，沿海港口新增十幾個萬噸深水泊位，遠洋方面開闢了通往東南亞、歐洲和非洲的三條航線。

如果從科學技術的角度看，60年代前半期實質性的推進也是驕人的。到1965年，十二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中的許多具體要求均已達到。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在科學技術方面，國防尖端研究成果最為顯著。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製「兩彈」(原子彈和導彈) 為中心，加速國防科研和工業發展的決策。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首，包括聶榮臻、羅瑞卿等在內的十五人專門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兩彈」的研製。經過廣大科技人員、解放軍指戰員以及有關部門的職工、幹部的努力，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集中代表了我國科學技術當時達到的新水平。此外，1965年我國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蛋白結晶；改良和育成了矮桿、抗鏽力強和產量高的小麥品種，並進行大面積推廣，都是當時比較重大的和具有國際水準的科學技術成果。

根據計算，1965年中國的鋼產量為1223萬噸，約佔世界的第七位；原煤產量為2.32億噸，佔世界第三位；石油產量為1131萬噸，佔世界第十五位；發電量為676億千瓦小時，佔世界八位。如果綜合其

12　《中國統計年鑑（1993）》，頁518。

他工業門類的生產狀況，中國1965年重工業的總水平，大體可以佔到世界的第八位。[13]

對一般民眾說來，自身的生活體驗最具社會評判價值。而剛剛走出災荒的老百姓，最依賴的還是農業的恢復，其中包括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糧食、食油、肉、蛋、菜、棉布等的收穫和供應。從統計數字上說，到1965年，中國農業總產值達到了590億元，略高於1957年水平，但糧食總產量還是略低於1957年。由於人口的增長，全國人均糧食及農副產品消費水平還未達到1957年水平。但比起1959年至1961年的困難時期，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老百姓開始吃飽了肚子。據統計數據，全國城鄉居民平均消費水平，1965年比1957年提高7.7%，達到了125元，比1962年增加了8元。其中，農民達到100元，增加12元；職工達到237元，增加11元。1965年城鄉人民重要消費品的消費水平與1962年比，也有了較大提高。按全國人口平均，糧食1957年為406斤，1962年為329斤，1965年為368斤；食用油1957年為4.8斤，1962年為2.2斤，1965年為3.5斤；豬肉1957年為10.2斤，1962年為4.4斤，1965年為12.6斤；棉布1957年為19.5尺，1962年為10.6尺，1965年為16.8尺。[14]這些珍貴的數據，顯示了調整過後社會生活正在走向正常。

1964年12月20日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是60年代前期中國人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其中最有意義的事項，是周恩來代表政府宣布：持續四年的調整已經基本結束。周恩來指出，經過調整，工業和農業的關係比較協調了，工業內部的關係也比較協調了，工業支援農業的能力進一步加強了，企業內部的生產能力絕大部分已經填平補齊、成龍配套，設備損壞和失修的情況已經改善。我們的經濟力量比過去增強了。這意味着中國開始真正走出「低谷」。根據當時的設

---

13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編：《中國工業五十年：新中國工業通鑑》（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頁1599－1601。

14 《中國工業五十年》，頁68。

想，經過1965年的準備，國家將於1966年開始進入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周說，按照這個設想，中國的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次會議的另一個重大宣示是，由周恩來代表黨和政府，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即「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段話中的「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一語為毛澤東所加，它表明人們正處於一種決心將中國重加振興的思想狀態中。毛澤東在政府工作報告還添加了如下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為甚麼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顯而易見，「吹牛皮」和「放大炮」，都非經濟用語。它們的語言功用，與其說是描述經濟，莫如說是鼓舞人民，煥發人民的精神力量。相比較而言，中國的現代化追求，更多的是以人民群眾的艱苦奮鬥、奮發圖強為支柱。而同所有追求現代化的「後發」國家相一致的，是中國的現代化更認同「加速度」。它所採取的模式，在相當時間內還難以擺脫「大躍進」式的「跳躍」(不管是「土躍進」還是「洋躍進」)。而實現「躍進」和「跳越」的關鍵，在於強調人的精神因素。毛澤東很讚賞自己的一句話：「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在毛澤東看來，建立物質基礎的主導，首先在人們精神的提升。沒有時代精神，沒有社會理想，即使有再豐富的物質存在，也無法保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人懷疑毛澤東「人是要有點精神」的箴言。無論工人、農民，還是知識分子，都生活在一個自覺的張揚精神的社會氛圍中。回顧剛剛走出的艱難，人們有理由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奮鬥，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種社會氛圍，在二十世紀60年代達到了高峰，從而給那個時代烙下了不能磨滅的精神標誌。

二　時代精神的標誌

一個時代的精神標誌是甚麼？似乎沒有人可以用隻言片語來加以概括。而如果從歷史敘述的角度看，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無論如何不應被抽象化。一個社會的精神標誌，應該是指那些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中宣示出來，而由每個社會成員認可、遵循和弘揚的東西。它既在大的社會行動中體現出來，也在小的甚至每個人的生活細節中得到折射。它是細小而普世性極強、在社會中趨於一致的價值觀的凝結。

在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工人的行為，最直白地反映了這種凝結的價值觀。以大慶油田開發為代表的精神範式，則可以算作這個時代的突出標誌。

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石油部黨組關於「集中石油系統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殲滅戰的辦法，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會戰」的報告。這個批示揭開了中國工人展示時代精神的序曲。大慶石油會戰匯集了石油部、地質部以及農墾、機械、冶金、電力、建工、鐵道、林業、商業等界動員的勞動大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從當年退伍的軍人中招募了三萬人參加會戰。在很短時間內，從全國各石油管理局和三十餘個石油廠礦、院校的幾十支優秀鑽井隊、幾千名科技人員、上萬名工人和七萬餘噸器材和設備被抽調出來，在白雪皚皚的松嫩平原上，面對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國民經濟的暫時困難，開始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石油開發工程。

大慶油田的開發，可以用「驚天地、泣鬼神」來形容。在物質條件極端匱乏、自然環境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僅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建成了年產600萬噸的大慶油田。三年中，石油工人共計打井1178口。其鑽探深度和進尺數量都打破了世界記錄。1963年當年，大慶油田產原油439.3噸，佔全國原油產量的67.3%。12月25日，新華社奉命報導：1963年全國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潤滑油等主要產品產量全面超額完成計劃；中國自己設計和新建成的大型煉油廠，建設時間縮短了一年……這些成就預示着，

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說來，「一去不復返」幾個字，意義非凡。[15] 它標誌着一個劃時代的成就。它成為中華民族揚眉吐氣、意氣風發的精神載體。

對中國人更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大慶油田的開發，為國人戰勝經濟困難、奮發圖強建設祖國提供了強大的思想鼓舞：以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石油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幹部，在油田建設最艱苦的時期，吃大苦，耐大勞，公而忘私，奮勇拚搏，表現了那個年代中國工人的時代風貌。他們「寧肯少活二十年，拚命拿下大油田」的犧牲精神；他們「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奮鬥決心，感動和教育了幾代人。大慶人創造的「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以及「黑夜和白天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一個樣、領導在場和領導不在場一個樣、沒人檢查和有人檢查一個樣」等「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工作作風，表現了中國工人的道德觀和使命感：在國家面對嚴重困難的時刻，中國工人是挑起振興國家重擔的基本力量。沒有人能動搖這種信念；沒有人能替代這種作用。中國工人是國家和民族的真正主人公。由這種使命感所煥發的精神力量，可以無堅不摧，無往不勝。大慶工人的這種信念，為中國人留下了長久的精神遺產。

中國農民在1960年開始的三年暫時困難中，也表現了突出的向自然災害和物質匱乏抗爭、與農民傳統觀念決絕的精神。其中，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林縣農民開鑿紅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壯舉，成為著名代表。

大寨生產隊位於山西省晉中太行山麓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區。這裏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全村耕地被溝壑切割成無數小塊，分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就在這貧瘠的山梁上，大寨人看到發展生產的根本出路，在於治山治溝，向大山和深溝要土地。從1953年治理白駝溝開始，大寨人用了五年時間，改造了全村七條大溝，把深溝變成了良田。用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在五個冬春，革了七條溝的「命」，即

15　由於資源和使用量增長等原因，中國從上世紀末期開始大量進口原油。

總共壘起了長十五里的一百八十多條大壩，將300畝坡地壘成了水平梯田，將4700多塊地修成了2900塊，還增加了80多畝好地。1962年，在全國大災和嚴重困難的年景下，大寨糧食畝產竟達到774斤，高出同縣平均產量530斤，一畝地等於別人的近三畝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農民創造的奇跡。而這個奇跡，是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實現的。陳永貴作為村黨支部書記，表現出超出一般農民的公而忘私、嚴於律己和目光高遠的品格。在陳的帶領下，大寨整個浩大的治溝工程沒向國家要一分錢，完全憑藉自己的雙手，苦幹、實幹、拚命幹，實現了農民豐收的宿願。《人民日報》曾報導說：「十一年，大寨人開鑿了多少石頭？移動了多少土方？他們沒有統計，現在也計算不出來。不過，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隻手就足夠了：這一百多隻手上結滿了老繭，被厚厚的死皮裹起來。這是鐵掌！」[16] 大寨農民的艱苦奮鬥，對整個國家的農民起到了示範作用。毛澤東首肯了大寨農民的奮鬥精神。1964年12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號召，並把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從此，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大寨精神成為中國農民的象徵。

同在六、七十年代，河南省林縣農民用最普通的工具，劈開太行山引漳河水入林縣，建成「人造天河」紅旗渠的壯舉，也極具精神感召力。

林縣位於太行山東麓。自古以來就是嚴重乾旱缺水的地區。50年代初，全縣90萬畝土地中只有1.3萬畝可以水澆。農民吃水要到幾公里甚者幾十公里外去擔。嚴重的乾旱，造成農民的極度貧困。從50年代前半期起，林縣農民開始了「重新安排林縣山河」的嘗試，一個跨越太行山到山西引水的大膽設想，逐漸形成了。林縣農民的大膽計劃得到了縣委和河南省委和政府的支持。1960年農曆正月十五這一天，

16 莎蔭、范銀懷：〈大寨之路〉，《人民日報》，1964年2月10日。

成為林縣3.7萬農民改天換地的起點。農民們以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半的口糧和最原始的釬、斧、鑿等工具，向太行山要路，向大自然要水了。經過不到8個月的苦鬥，林縣農民斬斷了45道山崖，搬掉了13座山塄，填平了58道溝壑，穿鑿了總長度600餘米的7個隧洞，建渡槽、路橋和防洪橋56座，完成土石方445.65萬立方米，砌石42.86萬立方米，終於攔住了濁漳河，引水上山。接着，林縣農民又經過四年時間，完成了紅旗渠第二、第三期工程，於1965年4月5日實現了總幹渠的通水。通水，是林縣農民夢過多少回的事情。這個重大時刻被電影膠片記錄下來：當渠水翻着浪花從渠道奔湧而出時，幾乎所有林縣的農民都跑出家門。在新修的大渠上，用各種盆缽捧起甜水。鏡頭上農民那特有的含蓄、會心和羞澀的歡笑，感動了當時所有的中國人。

大寨和林縣農民的業績昭示，在這個世界上，貧窮並不可怕，惡劣的自然環境也可以被改變。只要有了奮鬥精神，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任何危難都可以被平復。它再次證明，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人，需要精神，需要理想，需要志氣。而困難，正是激發人們志氣和精神的動力。在困難面前，農民們成就了原本不可想像的壯舉。

中國知識分子在60年代前半期也是張揚精神、顯示價值的一個重要群體。儘管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政治運動，但中國知識分子以民族興盛為己任的終極關懷，並未稍許泯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默默工作，甘於奉獻，創造了許多重大的科學技術成果。這些成果是國家發展歷史上的結晶。在尖端武器特別是核武器的研製和實驗領域，中國科學家創造了堪稱輝煌的業績。他們幾乎隱姓埋名，從事着與國家存亡興衰高度相關的科學研究。他們克服了令世界上所有科學家難以想像的巨大困難，在完全沒有外援的條件下，在物質生活極度窘困的情況下，獨立地研製出原子彈和導彈，為民族貢獻了非凡的才智。據真實記載，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曾多次打聽他的同學和世交鄧稼先的下落，後者從美國歸國後即在物理學界消聲匿跡了。直到1971年，楊才知道鄧參與了中國核武器的研製。1971年，楊同鄧終於在北京重新聚首。但楊振寧一直希望得到證實，中國核武器的研製，確實沒有外國人包括美國人的參與。這一關乎中國核技術水準的重要求證，終於在

楊即將離開中國的最後一刻，由鄧親自飛往上海加以認定。據說，楊為此當場淚流滿面。三十多年後的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決定〉，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予以表彰。鄧稼先此時雖已逝世，但仍然名列榜中，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有良知的中國人，不但要記住中國曾經經過的艱難，更應該記住這些獲得功勳獎章的科學家的名字。他們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排名按簡體字的姓氏筆畫為序）；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以上為追授）。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中也將人文精神和愛國主義運用於教育，培養、造就了中國不可多得的科學技術人才。至1965年底，全國自然科學技術人員共有245.8萬人，其中研究生畢業的1.6萬人，大學畢業生113萬人。全國專門的科學研究機構達到1714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達到了12萬人次。在這支科技大軍中，不乏像錢學森、錢三強這樣世界級的大科學家，也有年輕一代極富創造力的科學家群體。他們的科學研究若以物質報酬計算，則是微不足道的。從本質上說，他們是以強大的精神力量來支撐自己的學業和工作的。大科學家們埋頭於科研教學，忘我地進行工作；青年知識分子更是活躍於社會的充滿朝氣的群體，他們積極向上，發奮學習，以國家需要為己任，創造出許多重要業績。聶榮臻元帥曾經在一段回憶中準確形容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當時普遍生活困難，但大家幹勁十足，中國科學院、國防部五院、二機部九院等許多科研單位，晚上燈火通明，圖書館通宵開放，一片熱氣騰騰。我國真正出現了科學的春天。」[17]

中國文藝界是二十世紀60年代張揚時代精神的推動者。其實，他們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群。儘管他們激越的思維不斷受到階級鬥爭

17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834。

觀念的打壓，儘管他們像「戴着夾板的舞者」，但他們沒有消沉。他們努力創作，奮力拚搏。其實，他們的所有作品都表明，他們也同樣是時代精神的感染者。經過1962年前後文藝政策的調整，文學藝術工作者內心的創造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把謳歌、讚頌和宣揚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精神原則，作為自己極力追求的基調。

60年代的文藝創作，主要通過革命歷史和現實題材兩個方面進行。中國革命歷史波瀾壯闊，為文學藝術家們的創造提供了不竭源泉。同時，也正是革命歷史所蘊涵的精神，同當代人的時代精神相契合相共鳴，才演繹出60年代前半期豐富多彩的藝術畫卷。二十世紀60年代前期，是中國革命歷史題材創造最為豐盛的時期之一。許多影響久遠、膾炙人口的電影和舞台劇就產生在這一時期。《革命家庭》、《紅旗譜》、《暴風驟雨》、《燎原》、《怒潮》、《革命自有後來人》、《五十一號兵站》、《紅色娘子軍》、《野火春風鬥古城》、《林海雪原》、《小兵張嘎》、《烈火中永生》、《白求恩大夫》等，表現了各個歷史時期革命鬥爭的不同側面，再現出了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精神境界。這些影片在藝術創造上達到了超過以往的新高度。它們主題鮮明，對鬥爭生活的表現深刻豐富，既有簡潔凝煉、樸素清麗的感人故事，又有濃墨重彩、氣勢磅礴的戰鬥場面。它們成功塑造了一大批真實的革命者的銀幕形象，發揮了極大的革命傳統教育功能。其中，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地道戰》，發行了三千五百個拷貝，創了新中國電影史的記錄。今天，這些電影被中國人稱作「紅色經典」。人們仍然喜愛它們。從它們的故事中，體驗60年代充盈、瀰漫的時代精神。

在60年代前期，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電影，也得到群眾的高度評價。《李雙雙》、《枯木逢春》、《北大荒人》、《冰山上的來客》、《霓虹登下的哨兵》、《英雄兒女》、《雷鋒》、《年青一代》等一批影片，都是經典之作。它們無論在反映和揭示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塑造鮮明、生動和豐滿的銀幕藝術形象方面，還是在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的美學追求上面，都比以往有了重要進步。它們以積極向上、愛憎分明、艱苦奮鬥、克己奉公以及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奉獻精神，作教

育觀眾的素材，對培育當時社會良好的風尚，教育一代「革命新人」，發揮了不能替代的功能。可以說，在二十世紀6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年青人，都是在接受這些「紅色經典」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它們不滅的印記。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有數千名文藝工作者參與創造、在慶祝建國十五周年誕生的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這部以謳歌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革命歷程為主要內容的大型歌舞劇，匯集了各個革命歷史時期的經典歌舞，重現了最具特徵的歷史場面，歌頌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革命的歷史進程。它極盡革命精神和藝術追求的高度結合，以恢宏的氣勢，精湛的編排，優美的舞蹈、膾炙人口的歌曲，達到了思想與藝術表現形式的完美結合，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藝術氛圍，使觀看者受到革命傳統與時代精神的雙重感染。如果說，二十世紀60年代的確出現過一種時代精神的標誌，那麼，《東方紅》可以作為它最顯著者之一。它的精神感染力可以用一位大學生的觀後感來加以說明。當年，這位清華大學學生在《人民日報》上是這樣談到自己的感想的：「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我深深感到我們青年一代肩上擔子的重大……我們決不能把先輩們流血犧牲得來的革命果實從我們手中丟掉。我要更好地聽黨的話，努力學習，走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勞動化的道路，決不辜負革命先烈的期望。」[18] 1964年10月15日，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首度公演，毛澤東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觀看了演出。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件事情將1964年的國慶，催動為時代精神的巨大磁場。

二十世紀60年代，還曾經是中國人中英雄輩出的時代。雷鋒、焦裕錄、王進喜、孟泰、陳永貴、歐陽海、王傑、麥賢德、邢燕子、侯雋、草原英雄小姐妹、南京路上好八連，等等。他們在不同的領域不

18 胡錦濤：〈生動的一課——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

同的行業從事不同的工作，但都毫無例外地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無私乃至生命的奉獻。他們的事跡在那個時代廣為傳誦。他們的名字，也成為中華民族長久的精神象徵。

二十世紀60年代最大的精神力量，來自於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運用。最先提出群眾性地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是人民解放軍。1960年3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以中國革命主要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軍隊建設為中心，在全軍加強理論工作和理論教育。7月，總政治部批轉濟南軍區〈關於組織青年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報告〉，要求各級領導組織士兵學習毛澤東著作。從此，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在全軍逐步開展起來。1960年10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同日，林彪發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一文。隨後，軍委擴大會議提出：「高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進一步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體指戰員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1960年10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應該同時研究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研究現代修正主義的東西。我們要了解甚麼是現代修正主義，就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19] 1961年1月林彪在〈關於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強調：「我軍的幹部，都應當認真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在目前，無論是幹部和戰士，都應該挑選幾篇必修的和當前實際鬥爭聯繫最密切的文章去精讀，領會精神實質，解決當前部隊的現實問題。也就是說，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學習毛澤東思想，一定要立竿見影，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之『矢』，來射部隊實際之『的』」。[20] 中央軍委因而在關於1961年國防建設工作綱要中規定，要將學習毛澤東思想列為部隊工作的中心任務。在四好連隊和五好戰士運動中，「政治思想好」的基本標誌是認真

19　中共中央財貿政治部編：《政治工作學習文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頁88－89。

20　《政治工作學習文件》，頁90。

學習毛澤東著作。[21] 1964年，《解放軍報》率先從《毛澤東選集》中摘錄語錄，每日登載於頭版報眼，進而編纂出影響巨大的《毛主席語錄》。可以說，軍隊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展開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很大程度上是1960年以後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時推動的。一方面，它強化了軍隊乃至全國的「政治思想第一」的導向，助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整合了社會思想，形成了特定的社會思想氛圍。

中共中央宣傳部也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發行前夕，向中央報送〈關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宣傳和學習問題的報告〉。報告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偉大記錄，是我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結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最好的教科書。」「這本書的出版，必將發生極其深遠、極其廣大的影響。它不僅對於提高全黨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鼓舞人民群眾的革命鬥志，加強全黨團結，發揚埋頭苦幹、勤儉建國的精神，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對於加強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鬥爭，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也具有重大意義。」[22] 報告提出，必須積極宣傳第四卷，通過寫文章，做報告，號召幹部和群眾認真學習。但報告指出，由於當前「以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極為緊張，在布置學習時務必注意妥善安排」。

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發行為契機，以軍隊學習毛澤東思想為先導，全中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高潮。這一學習運動對當代中國的精神塑造影響深遠。它不但定型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而且將中國社會毛澤東思想化、毛澤東精神化了。

如果，歷史敘述一定要讀出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精神的標誌性符號，那麼由李劫夫創作於1964年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大約可

---

21 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445。

22 參見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212。

以擔當這個任務。歌這樣唱道：「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向前進！向前進！革命洪流不可阻擋；向前進！向前進！朝着勝利的方向。」毫無疑問，這是60年代中國絕大多數人精神面貌的寫照。儘管歷史已經流淌了這麼久遠，但沒有人可以否定，那是一個艱苦奮鬥的年代，一個樂於奉獻的年代，一個崇尚理想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當然，也不會有人否定，那是一個特別需要精神的時代。

三　時代精神的異化

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複雜的情景。一方面，人民在巨大的經濟困難面前，在國際反華勢力的壓力面前，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堅韌、團結、積極和昂揚向上的奮鬥精神。時代精神充斥着整個社會生活。這是國家和民族得以穩定的動力。另一方面，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左」的思想傾向，也在相應的社會氛圍裏滋長起來。它不但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一個基礎，而且從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角度看來，它還是一種非常具有典型特徵的精神異化現象。

所謂異化，是指由自身生長出來具有同質的事物，最終轉化為同自身對立並支配自身的東西。中國革命意識形態是從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生長起來的。它在革命的過程中，主張暴力和打碎舊制度。但是，它的終極目的並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希望通過革命，在中國建立起獨立富強的民族國家。應該說，這樣的理論邏輯在1956年以前，是順向發展的。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認識和提出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全黨的「任務已經由領導人民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全黨要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的正確結論。可是，不久之後，理論邏輯便發生了錯位，「革命」意識形態重新居於社會的主導地位。毛澤東1964年在同毛遠新的談話中說：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甚麼是革命？革命

就是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推翻地主，然後建立工農聯合政權，並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這番話大致表明了毛澤東所持有的不斷革命的革命意識形態主張。從1957年開始，中共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了改變，並進而修改了原本的正確主張，逐漸確立起「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革命」意識形態得到張揚並走向異化。

從根本上說，「左」的「革命」意識形態和社會思想傾向，根源於對社會主義本質的不正確解釋。從以經濟建設為根本任務，到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轉變表明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追求發生了改變。階級鬥爭不同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它作為革命的手段，只是催化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共產黨執掌政權），並不能給社會提供其他合理的和有效用的東西。因此，把階級鬥爭當作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綱領和發展動力，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不能解釋，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束以後，階級對抗究竟從何而來？這個階級對抗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止息？用階級鬥爭的方法能否解決社會物質源泉的湧流問題？等等。

但是，「革命」意識形態和其主要的表現形式——階級鬥爭觀，作為一種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解讀，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確為許多人所崇拜。甚至在發達國家的「左派」中（包括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的某些人士），也有人篤信階級鬥爭是解讀社會主義的唯一鑰匙。例如法國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夏爾·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美國經濟學家保羅·斯威濟（Paul Sweezy）等，都支持中國以階級鬥爭為特徵的社會運動，支持文化大革命，認為中國的道路才是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貝特蘭就認為，對社會主義國家說來，最困難的事情不是推翻舊的統治階級，而是摧毀舊的社會關係，並防止它的復辟；在法律上確定社會主義所有制，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消除階級存在的條件。他認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新生產關係的幼芽；蘇聯在1936年宣布剝削階級已不復存在而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阻礙了蘇聯無產階級去繼續改變生產關係，摧毀階級存在的基礎。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卻為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提供了正面的教益。[23] 瑞典的「左派」理論家霍姆伯格則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特點不僅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且主要地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並行使生產資料佔有者的權利，即監督和領導生產，以及決定產品分配。如果官僚主義分子把國家政權從工人階級手中奪去，從而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的話，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復存在，而變成完全另一種類型的社會了。」[24] 應該說，這些「左」派理論家們，在理論上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在對現實社會的觀察中，也誤讀了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除階級鬥爭以外的許多複雜社會矛盾。他們不能正確理解這些複雜矛盾，從而形成了自己「左」的政治觀點。他們的理論觀點，代表了社會中久已存在的社會意識，進而擴大了「左」的社會思潮。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無論「左」派理論家或以普通民眾意識出現的「左」的社會思潮，在極大程度上來源於對社會主義社會公平、平等問題的憂慮。在一般的社會主義理念中，公平、平等具有核心價值。無數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實現社會公平、平等作為社會主義的唯一本質來追求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平等、民族與民族的平等。總之，平等才是社會主義。差別不是社會主義，階級分化、貧富懸殊更不是社會主義。為了防止分化，必須去私立公，必須實現更高程度的所有制的公有。為了實現這種平等，就必須用階級的觀點，用階級鬥爭的方式，來杜絕可能的社會階級分化和貧富差別。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均平」觀念，也契合了這種社會主義平等觀。如，中國農民希望發家致富，但最擔憂和釋放出最強烈反應的，也是財產的不均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工人，絕大多數來自於農民。他們沒有參加過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沒有經歷過發達資本主義文化的薰染。他們僅僅是成為了生產工人，意識

23　夏爾．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著，《國際問題資料》編輯組譯：《蘇聯國內階級鬥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 1－2。

24　尼爾斯．霍姆伯格（Nils Holmberg）著，鍾典譯：《和平的反革命：蘇聯從社會主義變成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頁 82。

的絕大部分仍然是舊有的。因此，他們也把維護社會的絕對均平當作至高理想。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從小生產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極易形成「均平」一類「左」傾理念。而社會的其他成員，如軍人、幹部等等，由於生活在汪洋大海式的小生產社會環境中，自然也不能脫逃傳統「均平」觀念的影響。

在「均平」至上的文化和政治觀念基礎上，中國人牢固接受了馬克思和列寧的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在《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一系列著作中，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還不得不保留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不僅在所有制方面依然存在，在分配領域還佔有支配地位。而資產階級法權的本質，就是默認不平等。」從這樣的理論出發，現實結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由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但卻並沒有真正實現公平和平等。它在實質上成了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因此，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公平和平等的重要任務。終於，中國式的「革命」意識形態在馬克思和列寧那裏找到了張揚的根據。

胡喬木先生曾指出：馬克思和列寧的《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和《「左」派幼稚病》等著作，決不能當作教條句句照搬。毛澤東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確是把馬克思和列寧的話誤解了。所謂資產階級權利並非真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只是勞動者平等交換勞動的權利的形式（馬克思說是原則）與資產階級等價交換商品的權利的某種類似罷了，更說不上政治上的等級制等等。這種等級制恩格斯早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而且資產階級權利即平等交換權利正是與等級制完全相反的。[25] 胡還說，幻想社會主義可以不要高度發展生產力，是完全錯誤的。社會主義既然是人類最先進的制度，如果沒有高度發展的經濟，這個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社會主義的各個方面是互相聯繫的，怎麼樣達到高度的經濟

25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45－146。

水平，可以不講，但決不能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如果沒有物質基礎，一切都談不到。有些社會學家、空想家，認為平等就是最高的理想。其實，離開了發展生產力，就離開了革命的目的，也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26] 顯然，胡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資產階級法權」理論，的確在相當時期中「害」了中國人。它把人們的目光完全引導到社會主義分配領域的所謂「資產階級權利」，教人們怎樣辨別這種權利、如何認識這種權利的不平等，以及必須為消除這種權利去進行「鬥爭」，卻偏偏忽略了社會主義的第一任務——發展生產力。所謂「資產階級權利」問題，實際是個「偽」問題。如果說是人們誤解，那多少掩蓋了問題的實質。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是馬克思發明的。它是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還不夠充分發達條件下，唯一可行的分配原則。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也必須承認不平等，承認分配上的不一致，否則，社會主義即沒有發展動力（當然，社會主義要強調社會的福利因素，並反對和制止社會性的貧富分化）。而社會主義的不平等，只能通過發展生產力，使社會財富獲得充分湧流時才能解決。而默認貧窮，卻在分配領域發現「階級鬥爭」，則是完全弄錯了「題意」。

但中國人在很長時間裏確實弄錯了「題意」。毛澤東在1958年就提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此後他一直關注這個問題直到臨終。張春橋在毛澤東啟發下面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揮了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觀點，造成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大躍進運動中許多空想式的觀念，或者說從1958年以後中國出現的愈來愈高漲的「革命」意識形態，就是以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為理論依據的。例如張文寫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內部，從工農紅軍到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從井岡山根據地到後來廣大的解放區，在那裏，從來就是以軍民平等、官民平等、上下平等作為處理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根本原則的。」「人們攻擊

26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頁102－103。

供給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給制不能刺激生產積極性……不過，說穿了，說得通俗一些，還是那句老話『錢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資『刺激』，就像花錢買糖果一樣，甚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能夠立刻買到手。」文章還引用了馬克思稱讚巴黎公社的一切公職人員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來證明巴黎公社的英雄們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等級制度和法權制度、否認物質利益原則的正確性。[27] 這些說法在理論上有很大謬誤，但必須承認，它極易引起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共鳴。因為在人們意識中，社會主義的最高理想，就是平等和公平，而不是貧富差別和階級分化。

在糾正大躍進「左」的錯誤和經濟調整過程中，平均主義的錯誤觀念曾經受到批判。毛澤東為糾正平均主義的「左」的錯誤，進行了極大的努力。但是，以追求公平和平等為主要目標的社會主義觀，仍在人們思想深層存留着。例如，在二十世紀70年代又一次提出的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批評八級工資制度，並最終將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出現，歸結為資產階級法權發生作用的結果等觀點，就表明了這種不正確的社會主義觀的存在和發展。

由此可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成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一個關鍵點。而當時反對國際上「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又恰恰證明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實現平等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正確性。因為蘇聯的「現代修正主義」，正是以在國內造成階級分化和事實上的社會不平等為主要特徵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一文，列舉了大量材料來說明赫魯曉夫時期蘇聯「變修」的事實。其中最重要的根據，就是在蘇聯「不僅舊的資產階級分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幹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赫魯曉夫用所謂『物質刺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

27 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差距……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這個特權階層……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侵吞蘇聯勞動人民的勞動果實，佔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正在逐步地把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28] 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這種「揭露」，表明它同我們理想中「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背道而馳。蘇聯變「修」的反面教材，促使人們認識到，特權階層的出現，社會主義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利用資產階級法權擴大社會不平等的結果。中國的反修防修，必須以維護社會主義的公正性和反對可能出現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為根本任務。當然，反修防修和反對新生的資產階級的最重要武器，就是階級鬥爭。

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社會的「精神異化」，正同上述認識密切相關。作為一種理論意識形態的折射，「精神異化」現象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觀念深入人心。因為這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核心觀點。對於「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貫穿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從而必須不斷進行革命的「基本路線」教育，廣大群眾是認同的。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社會，用這種觀點認識人與人的關係，是人們最重要的思想出發點。特別是，經過從「大躍進」失敗到經濟調整這樣一個過程，人們更加認識到，為解決經濟困難而實行的一系列「非常舉措」，正是某些人丟棄社會主義原則，來推行資本主義的東西。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

28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已經擺在面前。而蘇聯「變修」的「現實」，又加重了人們的憂慮。因而，由毛澤東提出的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階級鬥爭」理論，越加深入人心。人們隨時準備去捍衛社會主義成果，捍衛深藏於心中的平等理想。

——反對特權、弱化等級制度、實現社會真正平等，是人們最認可的行動綱領。其中，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實行革命化的制度，受到群眾由衷的擁護。因為這是避免幹部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脫離人民的重大措施。在二十世紀60年代，基層幹部和群眾創造了幹部參加勞動的定點、定時、定責的辦法，並將這些幹部與群眾密切結合的做法，變為制度性的規定，以消除「公僕」變為「主人」的可能。可以說，這些強制性的規定，都是得到人們真誠擁護的。當時，社會對特權形成鄙視。在城市，一般工人的生活待遇，成為社會平均待遇的安排基準線。高收入和高待遇，都被視為同付出勞動的不合理交換而遭到批評。在農村，工分制度和五保制度，確立了農民生活的無差別化。城市絕無暴富者出現。在人們時代思維的深處，巴黎公社原則受到至高的崇敬。但人們完全忽視了，在社會主義中差別是不能避免的現象，過分地無差別追求，必然導致人們行為中的異化力量。

——突出政治的號召，在群眾中得到廣泛認同。從相反的方面說，講求物質利益在當時遭到社會的唾棄。「革命」意識形態認為，精神是最重要的。「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喪失了精神追求，就喪失了革命志向。精神可以變為原子彈，精神可以推動任何物質的發展和進步。人們普遍堅信，業務掛帥不能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鼓吹「白專道路」，正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特徵。二十世紀60年代，在「全國人們學習解放軍」的口號下，從中央到地方，業務領導機構普遍建立起政治部、政治處。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證業務工作的政治方向。「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成為社會行為的準則。而在當時的社會意識中，最大的政治就是階級鬥爭。因此，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階級鬥爭。突出了階級鬥爭，便可以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中國社會被政治化和精神化了。

——分配制度的均平化，既是社會的理想取向，也代表了群眾的精神需求。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基尼系數應低於0.28（1978年時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為0.28），這應該是社會實際公平狀態和社會穩定的標誌。那時，人們的收入差距事實上是微小的。城市人口在工資、住房和福利方面，基本沒有大的差別。農村社員的工分制度，是平均收入的極有效手段。它從根本上抑制了農民發家致富的可能。在城市，縮小工資差別，實行幹部減薪，在社會中贏得了廣泛好評。人民解放軍取消軍銜制度，實行官兵平等，對社會有重大的示範作用。它們成為淡化等級制度、努力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實際步驟。

——知識分子工農化，得到了包括知識分子本身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在60年代，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方式，縮小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的差別，着力使最可能異化為精神貴族的知識分子同作為社會基礎力量的工人、農民結合起來。幹部下放制度、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實行高等院校開辦農村分校、號召青年學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以及高等院校教師和學生參加四清、社教運動等等，都是促使知識分子工農化的有意舉措。當時的社會理念是，知識分子只有同工農群眾和實踐結合在一起，才能發揮自己的才智，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這種反智性的行為，在當時社會中被奉為正確的價值觀，被認作是知識分子進步的必由之路。而實際上，這樣做是將腦體勞動絕對地對立起來。

——教育必須革命化，以培養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教育革命的概念，早在1958年時已經提出。至60年代中期，毛澤東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和教育方向愈來愈不滿。他在評論中國教育體制、辦學目的以及授課方式時就講到過，古代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都不是在大學裏培養出來的。他舉了不少古代賢人的例子，其中專門說，李時珍沒有上過大學，但他寫出了《本草綱目》。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節座談會上，他說，現在書唸得那麼多，書唸得多害死人。知識分子應該下鄉。明朝的李時珍就是下鄉跑來跑去。1964年，毛澤東在同毛遠新的談話中，明確提出大學教育應該把階級鬥爭作為「主課」、「必修課」。在同尼泊爾教育代表團談話時，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大學

教育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現行的學制年限太長，課程太多。學生死鑽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甚麼也不知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尤其文科，太脫離實際，他們最不懂世界上的東西。這些話極為絕對化，相當於否定了當代中國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成果。但是，在60年代的中國，這種革命的「破壞」性意識形態，卻受到社會的追捧。人們信奉舊教育制度必須改革、學生必須在階級鬥爭的風浪裏進行改造這樣一種「革命」理念。

——同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傳統的觀念決裂，成為社會的風尚。由於階級鬥爭理論的存在，由於革命意識形態的張揚，所謂舊思想、舊觀念、舊風俗、舊習慣自然被看成是同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東西，需要立即加以清除。在何為「新」何為「舊」都一團混亂的狀況下，人們就開始了所謂思想決裂、行動決裂，以絕對化的所謂反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手段，來處理社會的文化、思想、習慣和風俗問題。這顯然是非常荒唐的。一種民粹主義的觀念被升騰起來；20年代中期湖南農民鬧革命時，以一定要在地主小姐的牙牀上打個滾為革命勝利的心理，再次復燃了。當時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國內根源。因此，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反對舊思想和舊觀念對人們的侵蝕，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

——警惕資本主義復辟，是人民最重要的任務。對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和所謂新生的資產階級，人民群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相對於汪洋大海式的小生產所產生的新生資產階級，舊的反動階級的殘餘，更具有危險。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時刻企圖變天和復辟。人們接受這樣的歷史經驗：一個政權的建立，總要經受復辟和反復辟的長期較量。正像法國大革命一樣，革命派要鞏固政權，就必須鎮壓反革命，同反革命復辟勢力進行長期鬥爭。由防止「復辟」而將社會上一切「不革命」的現象，如落後思想小商小販等都看作是復辟的根源，並進行殊死鬥爭，成了「左」的持守「革命」意識形態的標誌之一。

——社會盛行成分論。由於階級鬥爭理念不斷得到強化，「革命」意識形態愈來愈把社會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立營壘。而家庭出身，變得對「革命」與「反革命」的身份認定愈加重要了。中共在理論層面上是反對「出身決定論」的，也提倡「出身無法選擇，道路可以選擇」、「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但是，「革命」意識形態的本能，是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因此，成分論主張不可避免。大學錄取要有成分比例；工廠招工需要成分認定；農村地富出身的人，受到歧視等，反映了社會實際上通行着的唯成分論的規則。

——支援世界上受壓迫國家的民族和人民爭取解放，被認為是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人民最崇高的國際義務。這一方面反映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人民，有責任對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革命給予道義支持。另一方面則顯示了一種並不現實的所謂「革命」意識形態。經過對「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思想」的批判，世界革命的意識在人民和社會中越加得到張揚。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該擔當起引導世界走向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的歷史重任。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一個新的程度。在中國人民戰勝困難，取得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背景下、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在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創造性發展方面，毛澤東得到中共黨內乃至全國人民極大的崇敬和熱愛。黨員和群眾無條件地相信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相信毛澤東的話就是真理。這種個人崇拜漸漸發展為個人迷信和盲從。它使得原本黨內還存在的民主制度和氛圍變得愈來愈不重要了。毛澤東個人的意志可以統帥整個社會的精神方向。

這些關於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社會精神異化的簡單描述，大致說明了當時群眾性的具有「左」傾色彩的社會性思潮。二十世紀60年代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極大地限制了人們對所處經濟位置、社會思想狀態和國際地位的正確判斷。用今天通行的話語，就是對於「甚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人當時並不真正理解。而由於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國際局勢一定程度的緊張，人們極易發生思想精神扭曲。一般說來，落後國

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在由階級鬥爭為主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主的過程中，總是面臨搖擺。「革命」意識形態總要在這個轉變中成為舉足輕重的支配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落後國家的群眾性意識，在發展社會生產和爭取社會公平之間，總是更多關注社會的公平和平等，把平等視作最高的社會價值。而恰恰是資產階級法權理論，使人們找到了破除事實上的不平等和實現公正的社會主義最高價值的理論根據。由於這樣的原因，這個社會就成為一個特別需要精神鼓舞而不是物質利益刺激的社會；這個社會就出現了很多今天人們很難理解的社會精神現象。必須承認，是不甚科學的思想理論、帶有落後文化印記的社會意識和精神至上的心理趨向，締造了中國60年代的社會性思潮。這個社會思潮以「革命」意識形態為包裝，又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黨進行重大政治決策的群眾基礎，從而影響了中國此後十幾年的歷史進程。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的這種精神異化現象，雖然帶有明顯的「左」的色彩，但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煽動起來的極「左」還有本質區別。它還沒有發展到「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破壞程度。然而，「左」的社會思潮畢竟是「左」的政治路線的伴生物。它在人們追求不盡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目標時，會聚集起廣大的社會能量。一旦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界定為階級敵人；一旦資本主義復辟成為所謂的現實危險，這種社會能量就會在號召之下，很快轉變為集體性的激進力量，推動政治向錯誤的極端發展。這種情況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形容的：「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滅的時代。」[29] 這或許可以解釋，在「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年」之後突然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同先前社會中「左」的思潮之間存在的互動關係。

---

29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605。

後記

作者深知，如果再寫一篇冗長的跋語，那一定是要遭到讀者的奚落和譴責的。因為，作者在正文裏已經不厭其煩地說教、解釋和鋪陳一大堆令讀者索然無味的東西了。現在，能夠引起讀者一絲興趣的，或者也可能是比較「討巧」的作法，就是在這個短篇跋語中，批判作者拼命堆砌史實後面的所謂指導思想，或者說，對作者的「史觀」進行一番檢討。這大概還可以引來讀者的關注，最起碼，會讓讀者在「閱讀疲勞」中，找回一些心理平衡。

在無盡忍耐中通讀了本卷的讀者會發現，以所謂現代治史方法寫出的本書，竟然還充斥着舊式史學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國家治理者身上，而較少或很少反映歷史的本體——人民大眾。書中太多地講到毛澤東，講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講到那些可以制定和左右國家政策的「大人物」，可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他們改造自身和改造社會的努力，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誠然，哲人說過，世界上有能力書寫歷史的人，總共沒有幾個。哲人其萎，其言也善。但論到書寫歷史，則必須說，「大人物」的「書寫」應當具有充分條件。這個所謂充分條件是：如果沒有普通民眾的擁護，大人物幾乎無可作為。毛澤東說，一張白紙，可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裏的一張「白紙」，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那些曾經滿懷革命豪情的中國大眾。

既然懂得這個道理，那我們為甚麼還要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英雄史觀」的俘虜呢？記得初學歷史時，先生就告訴過我們，一部《二十

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譜而已。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其革命性的地方，就是否定了以帝王延替為「主線」的舊史學。可縱觀今天出現的新史學著作，遠的不論，凡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幾乎都同本書一樣，把筆觸大面積地放到領導人活動、決策等政治事件上，雖不能說是帝王家譜，也難逃「上層活動史」的詬病。這不能不反映我們潛意識中的「精英」情結。

無獨有偶，在當今大陸的影視界，也席捲起一股強大的「帝王熱」。甚麼《漢武大帝》、甚麼《貞觀長歌》等，動輒幾十集上百集，並且打的旗號不是「戲說」，而是正劇。不能否定，這些影片、電視劇的製片人，也就是那些腰纏萬貫的投資者，是聰明透頂的。他們不會向沒有回報的無底洞裏砸錢。他們投資這些歷史帝王大片，是因為看準了人們的喜好。說到底，這個喜好就是一種觀眾的偷窺欲。養在深宮裏的帝王和他們大大小小的老婆們，以及侍奉這些大大小小老婆的閹人們，構成了一個小型社會。他們中間的恩恩怨怨、扒灰吃醋，同帝王家裏的奪嫡鬥爭、兄弟殘殺糾纏在一起，具有非常強烈的隱秘性和攝人的故事性，而這些故事，又都遮擋在高牆深宮之中，平頭百姓自然是百窺不得，心急如焚。這就造成了心理和商業的兩大市場。兩個市場都指向一種需求：滿足偷窺欲。無庸諱言，就真正的知識傳播而言，這個「歷史熱」是病態和扭曲的。人們到底不能用「偷窺欲」來推動歷史的進步。

在當今的文化條件下，要清除所有病態的電視劇，是不可能的。媚俗的東西總有市場，不能強求人們的欲望一致。但我們這裏要說的，是嚴肅的史學研究和史學著述裏的「史觀」問題。如果打着「嚴肅歷史」招牌的史學著作，也從滿足人們的偷窺欲望出發，把主要的描寫放在高層鬥爭上面，像80年代蜂擁而出的《走下神壇》、《走出紅牆》之類，那就是害人了。

好的歷史研究，當然不是為滿足人們的「偷窺欲」，而是通過對歷史過程的敘述，揭示歷史的本質。那麼，甚麼是歷史的本質？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這些問題至今人云云殊。據黎澍先生研究，最早提出奴隸創造歷史的人，是斯大林而非馬克思、恩格斯。

後來，斯大林的觀點成為我們的座右之銘。可是，當我們大聲說奴隸創造歷史的時候，卻往往把奴隸們丟在一邊，大寫特寫起「英雄」來。這幾乎成了一種模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鄧小平，成為所謂嚴肅史學著作的主人翁。而社會主體的民眾，則常常被視而不見。

歷史真是靠幾個領袖和大人物左右的嗎？回答是能，又不能。能是肯定的。因為大人物掌握着國家權力，從而也就是掌握着國家的資源。他可以調動、提出、更改、加速、遲緩和反向引導歷史的發展。因而，他們能夠左右歷史。而所謂不能，是從這樣一個宏觀角度出發：一切領袖人物、英雄人物，都必須順應歷史潮流。這個潮流的本質，就是民眾的意願、要求、懷疑、拒絕甚至反抗的力量。這個力量如果爆發，是任何英雄人物都難以遏止的。因此，人民大眾並不是一張白紙。他們是歷史的能動的力量。

由此，我們提出一種貌似折中的觀點：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唐相魏徵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毛澤東在人民喊「毛主席萬歲」時，他回喊的是「人民萬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其中明確說「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形成的新一代中共領袖，又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所有這些政治宣示，都可以被看作是歷史演進中的「互動」關係：水與舟；主席與人民；代表者與老百姓；權、情、利與民願、民享、民有，等等。如果我們承認有這樣的歷史互動，那麼，治史者就應該兼顧互動的兩面，而不能偏廢其一。我們說，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的史觀，比較接近歷史發展的本質。

本卷動筆之前，也曾按照英雄與奴隸互動的思路來設計框架。但不知甚麼原因，在寫作中不知不覺地把「互動」偏向了「英雄」。當作者終於草完全書時，才驚訝地發現這個問題。其時，補救已晚，回天無力了。掩卷長思，作者終於有這樣幾個感悟。其一，史觀缺陷的作祟；第二，訓練方式的陳舊；第三，材料的限制；第四，歷史的本體導向。

所謂史觀的缺陷，前面已經有所交代。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黨史國史的寫作長期來形成一種模式，這就是以黨的領袖、黨的政策和方針的決定以及黨所召開的重要會議，作為黨史敘述主體。如果不把這些決策寫詳細，就不是黨史國史了。在這個模式支配下，社會和民眾在黨史國史中總是被忽略。中共黨史第一權威胡喬木在講解黨史寫作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 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很難工作。國家這麼大，問題這麼多，如果沒有在北京是幾百個幾千個，在全國是幾十萬個負責人成天在那裏操心、研究處理許多問題（他們也犯錯誤），很難使國家基本上能生存、活動、發展。如果離開了這個發動機，那是不可想像的。國家大、人口多、文化低、交通工具少，沒有民主傳統，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黨的領導。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各方面之間扯皮、拆台等等，不知道要發生多少衝突。從這方面來說，黨確實是人民的公僕，這是天公地道的，不宣傳這個事實是不對的。黨的作用在國家生活中甚麼時候可以減少、縮小？甚麼時候可以把一些活動社會化？也許要一百年。[1]

可能自有「黨史」以來，其寫作格局就這樣確定了。胡喬木講得對不對？當然對，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當代的歷史將成甚麼樣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寫北京的那「幾百個幾千個」和全國的「幾十萬個人，寫他們成天在那裏操心、研究問題」，寫他們的工作和決策，就成為黨史國史的必然。可是，當我們把歷史僅僅寫成這幾十人、幾百人和幾千人的活動時，這歷史也就離「家譜」不遠了。可以肯定，無論寫黨史還是國史，只寫這幾十幾百上千人，不能被稱作歷史唯物主義。

史觀決定了史風。以黨的活動為核心的歷史著述，延續成風。這代表了基本的史學訓練和修養。人們的思維和寫作，只圍繞黨的決

---

1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87。

策。而黨的決策又都來自黨的會議。於是「文山會海」，成為當代中國歷史著作的特徵。而嚴重的是，在這種訓練下的研究者和寫書的人，思想變得懶惰。因為只要有關於幾十人幾百人和上千人的材料，就足夠了。有關草根的材料，不必用心發掘。有關社會的景象，不需加以描寫。這樣一來，寫史就省力省時得多了。本卷的四十餘萬字，材料大多是圍繞這「幾十幾百和幾千人」來搜集、擺放和陳述的。雖然，作者也掙扎着想寫幾十幾百和幾千人以外的人，寫他們的精神、情感和作為，但明顯投入不夠。這突出反映了史觀、史風和史識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造成研究者只關心幾十人幾百人的原因，是體制因素。中國同西方不同。中國共產黨同人民的關係，在理論上說是一體的。特別是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民眾同黨基本沒有隔閡。無論在政治還是思想上，人民同黨的意志保持着高度一致。說這是「全能主義」也好，叫它「同心同德」也罷，事實就是如此。中國沒有所謂民主國家的契約理論，也不會出現以民眾為一方，通過投票等權利，同統治者相抗衡的可能。因此，研究幾十人和幾百人，幾乎等同於研究了大眾。反過來說，大眾的反應，同幾十人和幾百人的決策是相呼應的。這表面顯得荒唐，但實際並非誑論。

最後，丟掉社會和大眾，是因為研究者缺少材料。社會性和大眾思想動態的材料，不在檔案館裏，而要去發掘。而要發掘半個世紀以前的社會性材料，談何容易？必須躬親勞作、百折不撓，甚至要進行田野調查、個案追蹤。這比坐於書齋，檢索已有的材料，不知艱難多少倍。而所出的作品，在「賣價」和「評比」中並沒有大的區別。問題在於，大陸的許多研究者，已經「喪失」了「淘」材料的本能。他們（包括本卷作者）也用功，但基本是坐於書齋之側，用飛快的速度「碼字」。所用的材料，自然是愈順手愈好。這樣，就丟掉了社會和民眾。無疑，這是目前大陸研究者的「虛浮」表現之一。

既然我們的著作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偷窺欲」，也不是為了那幾十、幾百人做「家譜」，那麼，我們就必須改弦更張，眼睛平視，在史學意識上留有社會與民眾的位置。事實上，關於「四五運動」，就是可

貴的例子。這個「運動」被認為是民眾推動政治發展的典範。那麼，二十世紀60年代在中國農村不斷湧現的「責任制」、「包產到戶」等民間的「運動」，為甚麼不能有更詳細的研究呢？同時，60年代中國民眾中激進的「左傾」思潮，也應當給予歷史和理論的說明。因為它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運動，都關係緊密。可惜的是，史學家們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拿出有影響的作品。

歷史，的確不是幾個人幾十人的歷史。歷史歸根結底是所有人活動的記錄。這活動千姿百態、種類繁多。丟掉哪個部分，都造成歷史敘述的缺陷。馬克思說，歷史的結局就像一個平行四方形。它受着各個方面力的牽拉，以至所有人的意志都沒能得到最終的實現。所有人都必須在歷史面前妥協。這說明，哪裏是幾個人和十幾個人就左右了歷史的？劉少奇在被難中也說過一句特別悲情的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許多人引用過這句話，卻未必真實地感受了它。作為歷史學者，如果我們只是在被難時想起了人民和社會，那歷史的悲情將會一再重現。

跋語至此，應該打住。作者的意圖，是檢討本卷的短處，梳理治史的思路。只是在這一卷中，那些疏漏卻難以挽回了。如果從長遠議，這番檢討對作者和讀者都有所提示，則欣幸有加了。幸為藏拙，不可問世。衷心感戴讀者。

最後當然要感謝幫助過我的人們：金觀濤先生、劉青峰先生、沈志華先生、李丹慧先生。沒有他們幾位的激勵和督促，本書的寫作可能早就夭折了。特別要感謝的是蕭冬連先生。他對我的幫助和鼓勵，可以「無私」兩字概括。其慨然的風度和沉重的分量，對本書寫作都是決定性的。毫無疑問，我家人的寬容給了我不可替代的慰藉。因為，他們把一切瑣細的家事都承擔了起來。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馬若德教授（Prof. Roderick MacFarquhar）和赫斯特女士（Ms. Nancy Hearst）。馬教授同我就這段歷史的數次討論，使我受益良多；赫女士則慷慨地為我提供了許多研究資訊和資料。他們始終鼓勵我完成這一研究。

大事記

1962年

1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新年獻詞〉。社論強調，1962年是調整國民經濟的關鍵一年，農、工、商、學、兵、政、黨和群眾工作等各個方面，都要鼓足幹勁，實事求是，在當年內創造新的成就。

1月11日－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縣、重要廠礦企業和部隊負責幹部七千多人。大會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要加強集中統一。

2月16日－3月8日 國家科委在廣州召開了科學工作會議。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議肯定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恢復了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對知識分子的估計。

2月21日－23日 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在北京召開會議。上述兩次會議分析了財政經濟形勢，確定了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方針和政策。會議作出全面貫徹執行「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的重大決策。

4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

知〉，提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采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4月16日 新疆自治區塔城、裕民、霍城三縣居民六萬餘人逃往蘇聯。5月25日，發生伊犁暴亂事件。

6月10日 中共中央發出〈準備粉碎蔣軍竄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指示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提高警惕，加強戰備。6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蔣匪幫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妄圖竄犯大陸〉的時評，號召全國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注意防止和及時消滅潛伏的和空降的蔣匪特務的破壞活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竄犯之敵。7月2日，赫魯曉夫就台灣海峽局勢等問題發表聲明，重申誰膽敢進攻中華人民共和國，誰就必將受到偉大的中國人民、蘇聯各族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毀滅性回擊。

9月24日－27日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還先後召開了北戴河工作會議和全會的預備會議。毛澤東在開幕會上首先講話，進一步闡述了他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有關階級、形式和矛盾以及如何對待國內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他認為，要承認階級鬥爭的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會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領導主要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並增選了中央監委的成員。會議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幹風」（指包產到戶）和「翻案風」，決定設立兩個專案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和習仲勳進行審查。會議決定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撤消黃克誠、譚政的

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29日，全會發表公報，其中有毛澤東親筆所加的一段話：「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10月20日 印度軍隊自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向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中國軍隊被迫進行還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開始。11月21日零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從1962年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1962年12月1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的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

12月29日 公安部發布公報說，從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先後有九股美蔣武裝特務由台灣高雄乘船出發，偷渡大陸沿海的海豐、惠陽、惠來、電白、台山等五縣，企圖在廣東沿海建立所謂「游擊走廊」，為進一步實現竄犯大陸的軍事冒險創造條件。除一股未敢登陸逃往香港火頭盆島外，其餘八股武裝特務皆為廣東軍民殲滅。

1963年

1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鞏固偉大成績 爭取新的勝利〉。社論說：「剛剛過去的一年，我國的經濟形勢，從農業到工業，從農村到城市都在一天天地好起來。」社論提出，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進一步鞏固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集中力量恢復和發展農業。

2月11日－28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提出，從當年起，再用三年時間，繼續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把這三年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渡階段。會議着重討論了城市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決定在城市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會

上，毛澤東推介了湖南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河北省保定地區開展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並在講話中提出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說法，督促各地注意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2月 毛澤東在聽取中印邊境反擊戰的匯報時提出，看來軍隊還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個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強薄弱環節，搞好黨的建設。

3月1日 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要求在縣以上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運動。從此，「五反」運動在部分城市的基層逐步展開。

3月5日 《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題寫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這個題詞引發了國內持久的向雷鋒學習的運動。

3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說，近幾年來，有些在解放後經過改革的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劇目又恢復了原來的面貌。新編劇本如《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事實證明，「鬼戲」的演出，加深了人們的迷信觀念，助長了迷信活動，妨害了群眾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鬼戲」有停演的必要。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在停演「鬼戲」和「迷信戲」後，還應大抓戲曲改革工作，認真實行「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5月7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文章，批判孟超的新編崑劇《李慧娘》及廖沫沙所寫有關「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指其為階級鬥爭在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表現。

4月25日 國防部授予人民解放軍駐上海某部第八連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稱號。

5月2日－12日 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前十條〉對中國當時的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作了嚴重估計，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總是企圖復辟，伺機反攻倒算。有些社隊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在他們的手裡。而許多同志對於這些現象，「並沒有認真考慮，甚至熟視無睹，放任自流」。據此，文件提出了「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的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口號，提出要「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進攻。文件還指出：「幹部按照規定的制度認真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對於社會主義制度說來，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幹部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勢必脫離廣大的勞動群眾，勢必出修正主義。」會後，全國各地開始根據〈前十條〉的精神，重新訓練幹部進行試點，為大規模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準備。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後十條〉規定四清運動的基本方針，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打退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但同時也強調了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的重要性，並規定了一些正確和基本正確的政策。〈後十條〉下發後，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6月14日 中共中央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為題，覆函蘇共中央關於中蘇兩黨會談的建議。〈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共論述了25個問題，系統提出了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概括、當代世界及其基本矛盾等重大問題的意見，提出將派代表團到莫斯科進行兩黨會談。6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7月14日，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對中共中央6月14日的覆信進行了全面批駁。中共中央為說明真相，辯清道理，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進行了答辯。由此，中蘇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論戰全面展開。

7月31日 中國政府發表關於全面、徹底、乾淨、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的聲明。聲明是針對7月25日美英蘇三國代表在莫斯科簽署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而發表的。聲明說，幾個核大國企圖通過一個條約，來鞏固自己的核壟斷地位，從而把一切受核威脅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手腳束縛起來，使其不能增強自己的防禦能力。中國政府認為，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擴散是關係到世界命運的大問題，應該由世界上所有大小國家共同討論決定。由幾個核國家來擺布一百多個無核國家的命運，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在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擴散這樣重大的問題上，不允許采取欺騙世界人民的辦法。

9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提出1966年以後發展的兩步走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國家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9月 孫冶方因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的研究報告而遭到批判。孫主張要抓企業利潤，反對不計成本、不講效益的企業管理制度。他的這個觀點被說成是修正主義的。

11月 毛澤東對《戲劇報》和文化部兩次提出批評。毛澤東說：一個時期以來，《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又說。文化方面工作，特別是戲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誇大了文藝界存在的問題，使文藝界遭到嚴重的「左」的政治批判。

12月14日－次年2月29日 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14國。此次訪問共歷時72天，行程十萬多公里，是新中國外交中最令人矚目的出訪活動之一。周恩來在訪問馬里時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

則：一、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二、在提供對外援助時，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決不附帶任何條件，決不要求任何特權；三、以無息或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以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四、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幫助受援國逐漸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五、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六、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並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七、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證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八、派到受援國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等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在訪問索馬里時，周恩來發表了「整個非洲大陸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非洲「已經成為一個覺醒的、戰鬥的、先進的大陸」，「一個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新非洲一定要出現」等看法。

12月25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石油產品已經基本實現自給。報道說，中國人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1964年

1月1日 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時出版發行《毛主席詩詞》。本書除收入毛澤東以前發表過的27首詩詞外，還收入了未曾發表的10首詩詞。

1月13日－14日 首都百萬人集會反對美國侵略巴拿馬並聲援巴拿馬人民愛國鬥爭。12日，毛澤東曾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表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到20日，全國累計共1600萬人參加了示威遊行。

2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社論說，全國學習解放軍，就是要學習解放軍高舉毛澤東偉大紅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學習解放軍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學習解放軍堅持革命軍隊的優良傳統「三八作風」，學習解放軍注重創造四好連隊，加強基層建設等。

2月13日 毛澤東召開教育座談會（又稱「春節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說：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現在這樣不行。課程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制、課程、考試方法都要改，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的考試方法是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得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毛澤東說，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和高爾基，都是自學成才的。

4月22日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同香港英國當局代表簽定供水協議，決定修建東江—深圳供水工程。根據協議，工程將於1965年3月1日開始向香港、九龍地區供水，每年供水6820萬立方米。

5月 《毛主席語錄》編輯出版。根據林彪指示，從1961年5月起，《解放軍報》開始刊登毛主席語錄。這種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本次出版的《毛主席語錄》是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軍報刊載過的語錄，加以補充編纂而成的。《毛主席語錄》首先向全軍官兵發授。不久，這本語錄在全國發行，一版再版，到了「文革」期間，幾乎人手一冊。據1967年12月的統計，全國共印行《毛主席語錄》3.5億冊。

5月中旬－6月1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農業規劃和農村工作、第三個五年計劃、政治工作、財貿工作等問題。此外，還討論了反修防修、培養接班人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等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在6月6日發表講話。他從存在着新的世界戰爭和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應把全國的戰略布局劃分為一、二、三線。要下決心搞三線建設。根據這個意見，國家計委對〈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進行了修改。會議在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真正的共產黨人手中。毛澤東指出，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加階級的內容。劉少奇認為，「四

不清」不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險性在於上層。會議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追查「四不清」幹部在上面的根子。在這種對現狀不切實際的估計下，中共中央在9月份又對〈後十條〉進行了修訂。〈後十條〉修正草案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首先解決幹部中的問題，並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樣做的結果，是廣大基層幹部受到了政治打擊。

6月27日 毛澤東在文藝界整風報告上再次批示。批示指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澤東的這個批示也被稱作「關於文藝問題的第二個批示」。毛澤東作出批示後，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

7月14日 《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記憶在世界歷史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這是中蘇意識形態論戰裏中共發表的最後一封公開信。公開信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從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所提供的反面經驗中，汲取防止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教訓。文章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政策，公布了毛澤東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理論和條件。在相當程度上，「九評」為以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8月6日 中國政府就美國發動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武裝侵略發表聲明。聲明說，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人民是中國人民親如手足的兄弟，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

8月 中共中央批轉〈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

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毛澤東在對報告的批示中寫到：可能不止這兩部影片，還有別的，都需要批判，使這些修正主義的材料公之於眾。《早春二月》被指斥為宣揚站在革命之外的彷徨者，宣揚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北國江南》則被判定為「鼓吹中間人物」，宣揚「階級調和」。

9月1日 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簡稱「桃園經驗」）。這個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報告介紹了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在參加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的體會和認識，總結了工作隊進村後一整套「對敵鬥爭」的做法和經驗。中共中央轉發這個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10月16日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同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說：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完全為了防禦，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核威脅。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11月9日 高等教育部轉發〈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這個紀要是毛遠新（毛澤東侄兒）追記的本年7月5日毛澤東同他的談話。毛澤東在談到教育問題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麼能談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教改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12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對社教運動的名稱作了統一規定，即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簡稱為「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取消了城市的「五反」運動名稱。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和爭論。會議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其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

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後，在全國部分城鄉進行的「四清」運動繼續展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12月20日－1965年1月4日 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報告為中國人民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任務，這就是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1965年

1月25日 《人民日報》刊登批判馮定《共產主義人生觀》和《平凡的真理》兩部著作的文章。文章認定，《共產主義人生觀》公開宣揚資產階級世界觀，用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腐蝕青年；《平凡的真理》則被稱為是「唯心主義的大雜燴」。對馮定兩本書的批判，標誌着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批判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4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覆〉，免去了齊燕銘、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5月文化部黨組改組，成立了由蕭望東為書記、石西民、顏金生為副書記的新黨組。

9月3日 《人民日報》發表林彪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文章說，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對於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對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

9月19日 新華社報道，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

9月18日－10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主要討論1966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長遠規劃。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

針，會議同意了「以國防為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思想。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那麼怎麼辦？」的問題。他對國家政治形勢的看法越趨嚴重化。

9月29日 陳毅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坦言：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鬥中，願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犧牲。我們對美帝國主義不存在任何幻想，為了反對美國侵略，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於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16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大陸，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打敗它。打敗了美帝國主義以後，在全世界真正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就會到來了。

11月10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該文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2月8日－15日 毛澤東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認定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企圖奪取軍隊的領導權。羅因此被調離軍隊領導崗位，由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本月《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點名地對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進行批判，指斥翦的歷史觀點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

參考文獻

一　文獻資料

人民日報報史編輯組編：《人民日報回憶錄：1948－1988》（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

山東省委研究室編：《山東省情（1949－1984）》（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國民經濟調整》（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至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七、九、十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下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95）
中共中央財貿政治部編：《政治工作學習文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和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蘇省計劃與經濟委員會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江蘇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國教育年鑑》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編：《中國工業五十年：新中國工業通鑑》（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Maxwell Neville）：《印度對華戰爭》，上冊（北京：三聯書店，197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至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77）

《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年7月－1963年12月）

王延謙編：《我國近七十年物價簡史（資料）》（上海：上海市企業管理協會財貿分會，出版年份不詳）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尼爾斯·霍恩伯格（Nils Holmberg）著，鍾典譯：《和平的反革命：蘇聯從社會主義變成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

安德魯·內森（Andrew J. Nathan）、羅伯特·羅斯（Robert S. Ross）著，柯雄等譯：《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對安全的尋求》（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續編（1919－1949）》（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李先念：《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1950－1991年》，下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

李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李富春：《李富春選集》（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沈容：《紅色記憶》（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

林志堅主編：《新中國要事述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林福瑞、陳代光：《河南人口地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波諾馬廖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南大百年實錄》編寫組：《南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姜長斌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
科技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災害綜合研究組：《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4）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夏爾·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著，《國際問題資料》編輯組譯：《蘇聯國內階級鬥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馬洪、劉國光、楊堅白主編：《當代中國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張少書（Gordon H. Chang）著，梅寅生譯：《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台北：金禾出版公司，1992）
張愛萍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陳之驊主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陳雲：《陳雲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曾希聖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馮佩芝：《中國主要氣象災害分析（1951－1980年）》（北京：氣象出版社，1985）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黃瑤、張明哲編：《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蘇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著，范昌龍等譯：《1968年：反叛的年代》（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一位民間思想家的悲情記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上、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蕭冬連：《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龔固忠、唐振南、夏遠生主編：《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Wladyslaw 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二　報紙雜誌

《二十一世紀》（香港）
《人民日報》
《中共黨史研究》
《文匯讀書周報》
《北京周報》
《炎黃春秋》
《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
《當代中國史研究》
《學習時報》
《黨史博覽》
《黨的文獻》

索引

一畫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 108

二畫

七千人大會 47, 51, 52, 54, 55, 65－67, 74, 77－81, 83, 92, 96, 99, 100, 102, 103, 106, 107, 109, 113, 115, 119, 121, 125, 126, 128, 130, 139, 145, 146, 148, 149, 151－156, 158, 167－171, 174, 179, 180, 198, 203, 208, 209, 212, 213, 219, 221, 223, 226, 259, 265, 266, 267, 269－271, 274, 283, 285, 292, 306, 403, 419, 430, 432

九評 259, 358, 359, 364－366, 375, 474, 475, 502

二十二大 73, 136, 253, 254, 256, 259, 260, 268, 291, 344, 345, 349, 350, 354, 362, 372

二十三條 404－406

「八字方針」 307

八屆九中全會 89

「八萬言書」 224, 225

《十年論戰》 137

〈十年總結〉 64, 132, 133

三畫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32, 51, 108, 109, 140

三和一少 266, 281, 313－317, 319, 408

三線 389, 411, 426, 431

「下馬」 172, 173, 176, 177

大分化 433, 454, 458, 459, 476, 477

大改組 433, 458, 459, 476, 477

大動盪 433, 458, 459, 476, 477

大寨 398, 489－491

大慶 305, 429, 484, 488－490

大躍進 23－25, 43, 46, 53－55, 57－59, 64－66, 72, 74－77, 79, 80, 82－87, 89, 91, 92, 95－102, 104－106, 108, 110, 111, 113, 114, 118－121, 124, 129－133, 136, 137,139－143, 145, 147, 154, 156, 157, 161－164, 166, 172, 173, 175, 212, 213, 216, 223, 225, 228－230, 270, 271, 274, 283, 289, 290, 307, 380－382, 392, 394, 397, 414, 419,

434, 460, 463, 482, 483, 487, 501－503
小站奪權 318, 326
「工業七十條」 60

四畫

中央財經小組 160－162, 165－168, 306
中印邊界衝突 246, 333－336, 342, 434, 438
五月中央工作會議 172, 209, 271, 273
「五風」 145, 173, 182, 203, 290
分田到戶 165, 182, 188, 196－199, 204, 408
「紮根串連」 309, 323
「文藝八條」 60
《毛主席語錄》 430, 432, 496
毛澤東 23, 24, 28, 29, 53－68, 71－77, 79, 80, 82－97, 103－106, 108－116, 119, 120, 122－145, 147－149, 151－153, 155, 156, 158, 160, 162, 165－167, 170, 171, 175, 180－182, 184, 186, 187, 189, 190, 192－198, 200, 201, 203－208, 210, 212－214, 219, 222－230, 234－236, 242, 243, 246－249, 251, 252, 254, 255, 258, 259, 261, 265－287, 289－300, 302－305, 307, 309, 310, 312－320, 322－325, 331－335, 338－340, 342－345, 347－361, 363－369, 371, 372, 374, 377－432, 436, 437, 440, 442, 444, 454－457, 459, 460, 462－479, 487, 490, 494－498, 500－502, 504, 505, 507
王任重 80, 81, 98, 128, 196, 207, 305, 408
王光美 32, 301, 309, 322－325, 422
王延春 292, 302
王稼祥 76, 136, 167, 281, 314, 408

五畫

代食品 39－41, 191
包產到戶 57, 65, 165, 172, 179, 180, 182, 184－186, 188, 192, 195－207, 226, 270, 272－276, 292, 298, 303, 315, 403, 408, 419
北頂南放 320, 465, 470
古巴導彈危機 332, 336－338, 342, 347, 355, 457
四清 128, 289, 290, 294－296, 298－301, 304, 305, 308－311, 313, 318, 321, 322, 324－328, 377, 383, 395, 397, 398, 400, 404－407, 409, 419, 473, 482, 505
尼赫魯 263, 333－336
必然王國 57, 133, 134, 136
田家英 62, 69, 72, 78, 80, 110, 145, 195－198, 202, 204－206, 270, 276, 286, 302, 303, 306, 323, 324, 404, 418, 419
白銀有色金屬公司事件 312

六畫

伍修權 339－341, 343, 344, 346, 351, 354, 366, 368
全民國家 136, 257, 258, 353

全民黨　136, 257, 258, 353
回籠貨幣　155, 158, 177
地富反壞　282, 294, 327, 400, 415
朱德　80, 117, 167, 168, 273, 284, 320, 353, 367, 371, 406, 407, 422, 425
江青　127, 276, 281, 324, 378－381, 386, 388, 390, 393, 399, 401, 402, 411－420, 429
江渭清　292, 293, 296, 297, 321, 322, 324－326
米高揚　255, 367, 369, 370

七畫

李井泉　80, 83, 273, 320, 401, 402, 422, 426, 478
李先念　41, 66, 80, 153, 154, 159－161, 166－168, 273, 284, 320, 358, 400, 477
李富春　41, 66, 80, 88, 98, 159－161, 166－168, 234, 273, 284, 307, 358, 401, 402, 459, 463, 466, 477
李維漢　214, 218, 314, 315, 407

八畫

周林　143
周恩來　41, 47, 48, 61, 65, 80, 83, 84, 93, 94, 125－127, 138, 149, 152, 153, 158, 160, 161, 165－168, 171, 174, 175, 212－214, 218, 219, 227, 229－237, 239, 242, 248－250, 252－256, 260, 262, 263, 265, 266, 270－274, 276, 281, 283, 284, 287, 290, 291, 294, 296, 299, 301, 306－308, 312, 319, 320, 325, 333－336, 338, 343, 349, 353, 354, 357, 358, 367－373, 379, 381, 382, 387－389, 396, 398, 401, 402, 410, 415, 416, 421, 422, 425, 431, 485－487, 490
「官僚主義者階級」　399
林彪　80, 88, 116－123, 125－127, 138, 147－149, 153, 167, 273, 304, 417, 419－432, 479, 495, 496
社教運動　299, 302, 309, 311, 313, 320, 322, 325, 327, 329, 330, 398, 400－404, 409
肯尼迪　277, 281, 291, 334－337, 339, 355－357, 441－448, 451, 474
金日成　255, 315, 316, 336
侍田里見　316

九畫

信陽事件　61
前十條　297, 299－303
勃列日涅夫　332, 366, 367, 369－371, 373, 457
姚文元　411－418
「帝修反」　251
後十條　302, 303, 317, 321－325
柯西金　366－369, 371, 372
柯慶施　53, 80－87, 98, 129, 145, 149, 207, 208, 242, 273, 276, 284, 293, 325, 378, 380－384, 388, 401, 412, 413
〈科研十四條〉　233, 234, 241, 242
紅旗渠　489－491
約翰遜　443, 448－451

胡開明　37, 40, 189－195
修正主義　92, 101, 128, 129, 136, 205, 245, 251, 252, 254, 256, 259－261, 264－266, 268, 269, 281－283, 287, 289－292, 295, 296, 298, 299, 302, 304, 312－319, 324, 330, 332, 340, 342, 344－346, 348, 354, 358－360, 363, 367, 371, 372, 374, 375, 378, 383, 386, 387, 389－391, 393－396, 402, 408, 410－412, 415－417, 427, 434, 438, 440, 465, 466, 471, 474, 475, 495, 496, 502－504, 506, 507

十畫

原子彈爆炸　366, 402, 461, 494
夏衍　229, 389, 391, 473
時代精神　382, 390, 482, 487, 488, 492－494, 497
「桃園經驗」　322－326, 404
《海瑞罷官》　241, 276, 379, 411－415, 417, 418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218
馬利諾夫斯基　337, 368, 369, 371, 397
鬼戲　377, 380, 381, 384, 385

十一畫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57, 132, 179, 246, 255, 259, 264, 265, 297, 331, 332, 341, 342, 345, 347－350, 359, 365, 396, 438, 498
康生　128, 167, 229, 266, 278, 279, 318, 320, 343, 344, 349, 351－353, 379, 380, 388, 389, 392－395, 411, 413, 417
張春橋　382, 412－414, 416－418, 501
習仲勳　41, 248, 278, 279, 284, 319, 411
「脫帽加冕」　226, 235, 238, 239, 241－243
責任制　65, 179, 181, 190, 192, 193, 195, 198－203, 206
陳伯達　67, 69, 80, 94, 95, 126, 128, 167, 206－208, 273, 277, 284, 287, 299, 311, 318, 322, 324, 326, 344, 349, 394, 395, 404, 405, 418
陳雲　41, 77, 80, 87, 88, 93, 110, 127, 131, 148, 149, 153, 155－167, 171, 196, 197, 204－206, 270, 271, 273, 276, 283, 284, 306, 311, 396, 407, 408
陳毅　167, 235－239, 242, 248, 249, 262, 263, 273, 281, 301, 320, 334, 338, 357, 381, 382, 454
陶里亞蒂　340－342, 345, 348
陶魯笳　145
陶鑄　53, 80, 125, 207, 236, 273, 381, 399－403

十二畫

彭真　80, 86－90, 92－95, 126－128, 159, 167, 219, 221, 234, 248, 253, 255, 264, 273, 284, 295－298, 302, 320, 325, 346, 350－352, 354, 361, 383－385, 387, 389, 396, 397, 404－406, 410, 412, 415－418,

431, 432
彭德懷 58, 66, 77, 86, 87, 89, 96, 97, 113, 117, 119, 120, 123, 124, 135, 147, 175, 190, 221 — 226, 269 — 271, 276—279, 284, 285, 292, 315, 319, 390, 394, 405, 411, 414, 418, 424, 435, 437, 478
曾希聖 147, 179 — 181, 202, 203
「減人」 172, 173
越戰 410, 451—453, 458, 461, 462, 464, 465, 471, 473, 475, 476
階級鬥爭 128, 147, 212, 219, 230, 232, 243, 254, 258, 259, 267, 268, 271, 280, 282 — 287, 289 — 306, 308 — 314, 326, 328 — 330, 342, 377, 378, 381, 386, 390, 398, 399, 403, 407, 415, 459, 462, 472—475, 492, 497 — 499, 501, 503 — 508
馮志來 185, 186
黃火青 142, 144

十三畫

《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140, 149
「傷筋動骨」 116, 163, 167, 172, 176, 209, 306, 308
新僑會議 230, 233, 381
楊木水 184, 185
楊尚昆 71, 78—81, 93, 95, 104, 116, 127, 138, 139, 159, 167, 197, 224, 270, 273, 278, 320, 351, 432
楊偉明 186
楊獻珍 392 — 394
葉飛 142
資產階級法權 101, 413, 500—503, 505, 508
雷鋒 493, 494

十四畫

奪權 278, 291, 311—313, 318, 326, 327, 428
甄別 102, 168, 209—212, 214, 215, 218, 226, 270, 279, 280
蒙哥馬利 28, 29, 32, 48, 152, 396
赫魯曉夫 65, 76, 96, 132, 136, 220, 223, 233, 245 — 256, 258 — 263, 266, 277, 281, 286, 291, 292, 297, 314 — 317, 319, 320, 331, 332, 335 — 339, 341, 344, 346 — 350, 353, 355 — 361, 363 — 373, 375, 394, 397, 406, 411, 420, 434—438, 447, 448, 457, 467, 468, 473, 475, 502
趙紫陽 144
趙毅敏 339 — 341, 343, 360
齊燕銘 379, 389, 391, 473

十五畫

劉子厚 200, 292, 296, 309
劉少奇 29, 32, 47, 48, 67—69, 71—75, 77, 79 — 82, 87, 92, 94 — 97, 104—108, 110, 112, 115, 116, 118, 119, 123, 124, 126, 127, 130, 138—140, 143, 146, 147, 151 — 154, 158 — 161, 165 — 171, 175, 195 — 198, 200, 202—205, 207, 208, 212, 213, 219 — 221, 223 — 226, 234, 236, 245—247, 249, 259, 264, 270,

271, 273, 276, 283－287, 290, 292, 295, 301, 303, 305, 309, 310, 318－326, 345, 349, 353, 354, 359, 362, 367, 371, 378, 385, 391, 395－407, 409, 410, 414, 415, 417, 421, 422, 425, 431, 432, 469, 472
《劉志丹》 278, 279, 285, 319
蔣介石 203, 213, 261, 268, 285, 286, 319, 334, 410, 437, 441, 450, 470
調整 46, 55, 56, 58, 62, 65, 76, 79, 92, 100, 101, 116, 147, 151－154, 156, 158, 161－163, 165－169, 171, 172, 177, 183, 188, 204, 227, 210, 212, 214, 215, 225－227, 230, 233, 234, 240, 241, 243, 246, 261, 262, 267, 270, 271, 280, 284, 287－289, 305－308, 329, 357, 363, 381, 382, 391, 404, 443, 452, 456, 458, 459, 463, 468, 472, 473, 475, 482－484, 486, 493, 502, 503
論戰 137, 246, 247, 249, 317, 332, 336, 338, 339, 344, 346－349, 351, 353, 355, 358－365, 367, 370, 372－375, 441, 474
鄧子恢 110, 168, 172, 182, 198－203, 206, 270, 274－276, 284, 291, 314, 315, 408
鄧小平 24, 53, 55, 56, 66, 68, 69, 74－77, 80, 88, 90, 92, 95, 114, 127, 138, 146, 147, 153, 158, 160, 167, 168, 176, 178, 198, 202－205, 211, 212, 214, 218, 219, 234, 239, 246, 247, 252, 262－264, 270, 271, 273, 281, 283, 284, 287, 290, 297, 302, 303, 307, 320, 325, 338, 349－354, 358, 367, 371, 373, 374, 385, 391, 396, 399, 401－403, 406, 408, 410, 415, 421, 422, 425, 431, 460, 466

十六畫

錢能讓 182－184, 272

十七畫

薄一波 66, 80, 84, 86, 95, 98, 166, 248, 271, 282, 284, 307, 308, 311, 312, 320, 358, 398, 406, 477

十九畫

羅瑞卿 117, 119, 140, 149, 166, 167, 219, 268, 273, 334, 358, 377, 402, 410, 417, 419－432, 470, 477, 485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

錢庠理　著

從1962年起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是一個色彩紛呈、複雜變幻的時段，有人稱其為「變局」。這種「變局」，是在大躍進運動遭受重大挫折、外部世界對中國施加愈來愈大壓力的局勢下，中國人在理論、觀念、政策作出一系列求變求存的調整和應對而發生的。它根本改變了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歷史的走向：那些最為重大、最為精彩的政治變動和思想流轉，都發生在這個時段；同時，它又開啟了更為激烈變動的十年。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ISBN 978-988-172745-9
9 789881 727459